

〔德〕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
(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罗马史》与《罗马风云》

王　建

一

当我们放下手中厚厚的一沓译稿，那远隔千年的罗马风云似乎就在眼前，而本书的著者，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却渐渐地变得模糊。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行列中少有的历史学家，蒙森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罗马史研究领域，这一研究被明确地划分成蒙森以前与蒙森以后两个时期，看来我们不应怀疑，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划时代的学术巨擘。可是当我们读到他的遗嘱时却不由得产生另一个印象。蒙森在遗嘱中禁止他的家眷发表关于他的生平传记，也不许为此提供书信与文献，至多只许将这些材料交由某公共机构保管，三十年之内不得对外公开。他自认为在一生中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表面的成就，但是并未达到应有的目标，只是外来的偶然使他跻身于历史学家与语文学家的行列，其实无论是他的天赋和受过的教育都不足以使他负此盛名，他始终觉得自己名不符实，事业未有所成，这种痛苦在他的一生里自始至终伴随着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不禁使人感到迷惑。仅仅以谦虚作为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它迫使人们提出问题：蒙森究竟是不是一位开一代学术之先的人物？他的作品，尤其是《罗马史》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两种评价究竟孰是孰非？

二

读过蒙森的传记可以发现，蒙森终其一生埋头于古罗马研究，其研究几乎涉及古罗马的各个领域，在古罗马法律学、铭文学、钱币学、编年学以及古罗马通史方面他都有极深的造诣。追溯蒙森的古罗马研究，可以一直溯及他在基尔大学攻读法律之际。在这一时期里，他不仅萌发了研究古罗马的兴趣，而且还初步奠定了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按照他后来的观点，研究历史并不需要历史知识与方法的培训，而只需掌握两门知识——法律学与语文学，除此之外就要看研究者本人是否得到克里奥这位历史女神的垂青，没有天赋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权跻身于科学家之列，至多不过是一个匠人而已。蒙森本人正是在这两门知识的引导下，辅以实地考察和材料积累，逐渐步入了古罗马研究的殿堂，至于克里奥女神是否对他有所眷顾则正是在此要探讨的问题。纵观蒙森一生的诸多著述，暂且不计诸如《那不勒斯王国铭文集》(1852)，《下意大利方言》(1850)和《罗马币制史》(1860)等大量的研究性专著，仅就对罗马史研究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巨著便已巍巍可观。《拉丁铭文集成》以搜集所有的古代拉丁铭文并加以整理为宗旨，由普鲁士科学院组织实施，自1853年开始就委托蒙森负责这一工作。他不仅负责组织，而且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编写工作，直到1903年去世。这部《拉丁铭文集成》自1863年起开始陆续出版，它为后来的古罗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罗马国家法》(1871—1888)一书是蒙森从法律角度透析历史的代表作，某些评论家甚至将它的地位置于《罗马史》之上。最后一部力作是《罗马刑法》(1899)，这时蒙森已是82岁的高龄。或许应该感谢命运的眷顾，让这位历史学家得享高寿，从而能够将他的研究成果全部奉献给大众，但是情形并非完全如此，至少表面上看来尚有一丝遗憾，这就是尚未提及的《罗马史》。蒙森的这部代表作无论在外表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未完成的痕迹，1854年

至1856年陆续发表的第一卷至第三卷描写了自罗马建城至恺撒独裁的历史，1886年的第五卷则以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诸行省状况作为描述对象，告缺的第四卷应该展现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但由于后文中将谈及的原因迟迟未曾动笔，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学)的遗憾”。

若将目光投向《罗马史》的创作过程就会发现，蒙森动笔创作《罗马史》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看作是一次偶然的外来机遇。在一封致古斯塔夫·弗莱塔格的信中蒙森描述了这一过程。在蒙森到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之后，他曾为公众作过一个关于格拉古斯变革的报告，与他熟识的魏德曼出版社老板K.莱默尔和希泽尔因此而受到启发，于是委托他撰写一部罗马史，作为他们正拟出版的希腊史的姐妹篇。这时的蒙森无论是作为作家抑或学者都还毫无名气，更不必说作为历史学家，当时他的专业不是历史学，而是法律学，因此这里首先应归功于出版商的慧眼与努力，使得后世能够有幸读到这部皇皇巨作。在开始时连蒙森自己也感到踟蹰不定，他担心自己不能胜任，甚至曾建议出版商另觅一位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当他一提起笔，创作的激情就攫住了他，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便出现于读者面前，而且从全部出齐到他去世都未曾做过重大修改，正如他所称也不必做重大修改。蒙森创作《罗马史》得益于他早年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与钻研，得益于他在意大利的实地考察，但是这一切只是奠定了创作的基础，在创作过程中他做了大量的进一步的查证与研究工作。《罗马史》不像他起初所想象的一样只是“描写，而不是研究”，从蒙森在创作期间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难以言述的紧张艰苦的任务。搜集、查证、研究、撰写、誊抄、校对，并在第三卷付印之前对第一卷进行了全面修改，这一切都是在六年中完成的，与此同时他还进行着一系列专门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在创作过程中，这项工作有时甚至使他感到是一种累赘，但是当读者读到这部巨著时，却如诺贝尔

文学奖的授奖词所说，全书“丝毫看不出任何工作的艰辛”，它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新鲜与活力。

三

《罗马史》全书包括第一、二、三、五卷，《罗马风云》仅是摘译了其中的第三卷，译作删去了本卷中论宗教、教育、文学与艺术的第十二章（译出的该卷根据漓江出版社的建议将书名定为《罗马风云》）。这部著作的前三卷构成一个整体，描写自罗马城的出现直至恺撒建立独裁统治近七百年的历史。蒙森将这三卷分成五部，分别描写国王时期，意大利的统一，征服迦太基和希腊诸城邦，变革时期和建立军事君主制诸过程。其中前三部构成一卷，后两部则各自单独成卷，其中尤以单独构成第三卷的第五部分量最重，厚达630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在罗马历史上最激烈动荡和最辉煌灿烂的关键时期，由恺撒、庞培、克拉苏斯组成的“前三头”彼此之间纵横捭阖所酿成的风云变幻的图景，这是选译这一卷的主要原因。在这三卷于1854—1856年陆续出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停顿，直到1886年蒙森才推出了第五卷，这一卷与其说是《罗马史》的一个部分，不如说已是独立成书，它全景式地描写了罗马帝国时期诸行省的状况，它的开拓性贡献极受后世古罗马研究者的推崇，但在结构、布局和风格诸方面都与前三卷大相径庭。蒙森在创作《罗马史》之初就开始研究的罗马帝国时期在这本巨著中竟告阙如，这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十分鲜明——全书缺少第四卷！这个历史（学）之谜诱使后人做出了无数猜测。笔者认为，这个谜不是蒙森一时意气用事造成的，它来源于更深的层次，与我们一开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考察一下蒙森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解释，不难发现他从未对这一问题做出正式解释，而只是在信件或交谈中随意地提到各类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彼此大相径庭，莫衷一是。蒙森曾对阿道夫·

冯·哈纳克说，因为结识哈纳克过晚，所以未能尽早地理解基督教这一现象；在某次谈话中他又提出，他始终未能弄清罗马文明衰亡的原因；在某封信中他提到，他担心第四卷不会有前三卷一样的反响，很可能至多只是得到“行家的赏识”；他也曾说过，他毫无激情去描写恺撒之死；在去世前不久他又解释道，《拉丁铭文集成》的工作占去了他的时间，使他无暇顾及《罗马史》的完成。

以这些说法为依据，产生了后来诸种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些解释分成两类，一类认为蒙森不愿创作描写罗马帝国时期的第四卷，其原因也许是由于他热爱共和制，厌恶帝制，这一态度表现在他当时的政治立场上；或是由于他把恺撒视为理想中的英雄，不愿让恺撒在自己的笔下死去；或是由于他担心此卷不会有前三卷那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另一类则认为蒙森没有能力创作描写罗马帝国时期的第四卷，这派观点认为他不熟悉和掌握帝国时期的材料，尤其是未能掌握关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材料。最后还有一种独发奇想的观点，认为蒙森未出版第四卷是由于这部分手稿在1880年的一次失火中被烧毁的缘故。

在上述各种观点中，也许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某些真实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亦只是一些表面原因。蒙森确实常常根据个人爱憎来叙述历史，但是这种个人色彩只涉及如何叙述，而不涉及是否叙述；至于为反响担心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值得深究的是为什么蒙森会对第四卷有此担心，为什么他无法像创作前三卷时一样放心地创作，是作为创作者的蒙森还是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发生了变化。同样，材料掌握不足亦只是一个表面原因，从蒙森的信件里可以得知，他在开始创作时最初接触的就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材料，而且他的第五卷也是描写这一时期，许多罗马史研究者都承认蒙森掌握材料之广博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为什么当蒙森已成为罗马史研究的权威时，反而不像他在初撰《罗马史》时一样无所畏惧了呢？在开始写《罗马史》时他至多只是一个初窥门径者，那时

没有人(包括他自己)担心他材料匮乏,而现在不仅他人,而且连蒙森自己也缺乏自信,自认为尚未掌握必要的材料,这样似乎又回到了同一个问题,莫非由于时代的变迁,蒙森与这一代人都发生了变化?至于说无暇顾及更是表面原因,自1856年第三卷出版至1903年蒙森去世,他的著述数不胜数,为了这些专门性研究放弃了《罗马史》第四卷的创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至此笔者认为答案已昭然若揭。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历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罗马史》第四卷的告缺若放在这一背景中来分析则显得一清二楚。

在十九世纪中叶,历史学从历史哲学走向实证主义。原来的历史哲学学派被看作是凭空臆造,他们的普遍历史观被看作是虚幻的梦想,自康德以来历史学家描绘的人类进步的普遍进程被看作是一种理想中的世界,于是历史学家渐渐转向运用考据和查证的手段去搜集和整理历史材料,恰如科林武德所归纳的,他们遵循的准则一是微观研究,二是客观研究,即一方面排斥对历史做全面的研究与描述,另一方面又反对在研究中掺入研究者的一切主观成分,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蒙森主编的《拉丁铭文集成》才会问世,而《罗马史》的第四卷却成为永远的遗憾。

自汤因比和科林武德起就出现了下述的尝试:以历史学观念的变迁来阐释第四卷的告缺。笔者赞同这一说法。从蒙森那里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变迁的痕迹。可以把《罗马史》的前三卷看作蒙森前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鲜明地表现出他出色的驾驭通史的能力和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这一切在他的后期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历史编纂学的疑虑。如前所述,后期的蒙森认为历史编纂学只需要语文学和法律学基础,此外就要靠历史女神的青睐,这一观点似乎是对历史编纂学的贬低,其实是神化了历史编纂学,它使得蒙森踌躇不决,无法动笔写第四卷。这时的蒙森已不是初撰《罗马史》时的蒙森,虽然他在古罗马研究领域已赢得了同行的尊

敬，但是他感觉到《罗马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那个时代密切相连的历史学观念也已一去不复返。他曾在1873年忽生念头，打算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去寻觅撰写前三卷时的灵感与激情，以求完成《罗马史》全书，但是即便他去了莱比锡，想来也难免旧梦难温的痛苦，更何况由于观念的变迁，他所应写的不是一部如前三卷一样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罗马帝国史，而是像第五卷一样，在汇集众多材料的基础上写一部冷静客观的研究专著，对此他深感毫无把握。1877年在他六十寿辰之际，他曾向第四卷做了一次诙谐的告别，他将自己的两篇小论文装订成第四卷的版式，并在卷首赋诗向第四卷做别。不过即便如此，第四卷仍像噩梦一样始终难以摆脱。1883年11月19日，蒙森在一封信中又提到撰写第四卷的欲望，但他又接着写道："这一任务本身十分艰难，我简直无法知晓能有多大的进展。——只有轻率的年轻人才会对他毫不知晓的事情说长论短，而这里牵涉到撰写历史，至少是撰写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在1884年3月2日的信中他曾抱怨现有的材料少得可怜。显然困难不是来自于年轻者与年老者之间精力多寡的区别，而是来自于对历史编纂学的不同观点。如前所述这一变迁意味着一个时代性的转折，在此不应将蒙森仅仅看作是这一转折中的受影响者，他同时也是这一转折的促成者，但正是在这一转折之中，《罗马史》不可挽回地成为一部未完成之作。

四

在将目光深入《罗马史》之前，有必要先探究一番《罗马史》创作之际的罗马史研究状况。十九世纪上半叶，罗马史研究无论在内容重点与表达方式上都完全处于尼布尔（1776—1831）的《罗马史》（1811—1832）的影响之下。尼布尔的研究重点是早期罗马的村镇，他认为这是古罗马最健康的时期，随后便渐渐走向衰落。在叙述中他一反以往的罗马史研究传统，不再简单地转述以李维为代表的

古罗马历史著作,而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努力发掘和破译古代的诸种文献,从普遍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因此被誉为以语文学方法从事批判性历史编纂学的奠基者。作为在尼布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蒙森无法摆脱与尼布尔的联系,但是蒙森对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在尊重的同时并无推崇效仿之意。首先尼布尔将研究重点置于早期罗马,他的著作只叙至意大利的征服和诸阶层之间的斗争,而对意大利变革时期与帝国时期则根本未曾涉及。蒙森则认为早期罗马遗下的材料甚少,无法建构一幅真实的图景,而且他对古罗马的发展脉络完全是另一种理解。其次在尼布尔的著作中描述与研究并重,对历史的描述总是被考证、论述和设想等研究性的段落所截断,加上尼布尔的语言毫无生气与活力,充满学院派的枯燥繁冗,令读者望而生畏,简直难以卒读。蒙森喜爱的风格则是简洁生动,明白清晰,他在麦考雷的著作中看到可以以这种方式叙述历史,同时他本人也擅长这种风格,不带丝毫学究式的书卷气。综上所述,可以断言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虽然构成了蒙森创作的内在动因与前提,但是与其说两者之间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不如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变革与超越的契机。

在此背景上分析蒙森的《罗马史》,可以看出蒙森是继承了以往的传统而从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考察古罗马的历史的,在这一点上他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一特点鲜明地表现在对东方的描述中,在他笔下东方各国与各部族总是以落后蛮族的形象出现,至多只是肯定一下他们的勇武不屈。实际上当时的东方,尤其是小亚细亚地区深受希腊文明乃至更早的文明的影响,它们当时已处于很高的文明发展状态,当然在此也不应该用当代的眼光去过分苛求十九世纪的蒙森。

在古罗马的历史发展中,蒙森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基本法的变迁,他以此为基本线索勾勒出古罗马发展的脉络。从国王时期公民分成贵族与平民的时候开始,罗马历史就是两者之间对立冲突的

历史，具体表现于国家的基本法之中。从国王时期到共和时期只是表现性的权力转移，从共和时期到帝国时期也是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处在这一变化的中心的恺撒成为蒙森笔下最光辉的形象，与他相对立的人物则被置于灰暗的色调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对庞培、西塞罗和小伽图的刻画之中。在蒙森眼里，优柔寡断的庞培至多可称为一个合格的士兵，善言巧辩的西塞罗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而坚定的贵族派首领小伽图则恰似满口理论的一介书生。在此触及到蒙森的《罗马史》中的一个颇具争议的突出特点就是历史编纂中的主观性问题。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一直是历史学中的焦点问题，客观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历史学家向往的理想圭臬，不同的只是在当今史学界中更多的是探讨能否达到客观性，而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发展中是否达到客观性是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在从历史哲学向实证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具体地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历史学家是否在客观地描述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蒙森遭到了剧烈的抨击。在《罗马史》一书的具体描述中，引起争议的首先是蒙森将个人的感情色彩融入对人物的褒贬之中。如前所述，在蒙森笔下对众多人物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与恺撒的相互关系，在顺逆之间显示出不同的色调。不过笔者认为不能将这一特点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纯主观的爱憎倾向，由于在蒙森构想的罗马发展进程中，恺撒是一个处于转折点之上的伟大人物，所以这一褒贬的特色实际上隐含着蒙森从罗马史的全景角度所做出的判断，至少在当时的蒙森自己看来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判断。其次在《罗马史》中引起争议的还有一些非历史词汇的运用，蒙森在描述古罗马历史时运用了一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词汇，比如在描写军官时用到了“海军元帅”，在描写等级时使用了“容克地主”，在勾勒派别之争时用到了“党派”一词，这一特点显然与他曾关注与投身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由于这一特点他被人指责为在一部历史著作中掺入政论文章的色彩。笔者认为作为历

史学家蒙森并不是出于现实政治纷争的需要来创作《罗马史》,他运用这些词汇,从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某种现实性,一方面是在于他认为应将“足蹬古希腊悲剧式厚底靴的古代人物”从半空中拉下来,置于现实的世界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便于读者接受,“为此必须让执政官变成一位市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则在于蒙森认为,古罗马与当时的普鲁士社会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可比性,比如贵族阶层及其危机与衰落,开掘这种时代之间的可比性乃至关联性是历史哲学的特点,即关注历史的普遍性。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这一特点也渐渐地消失了。最后引起评论者不满的还有蒙森书中的文学色彩,他们认为在以虚构为基础的文学与追求真实的历史之间应划出明确的界限。在《罗马史》中蒙森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他赋予诸多古代人物以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这本书的文学特色才使蒙森荣获了 190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对历史著作中的文学特色蒙森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想像力不仅是诗歌,也是历史的源泉,有别于诗人的仅仅在于历史学家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想像力,即以客观史实为基础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实际上是一种尽可能地再现历史的能力,而这一再现不仅以客观存在的有限史料为基础,更应以历史学家从中分析勾勒出的历史发展线索为准绳,即以隐含在具体历史现象背后的抽象历史本质为基准。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蒙森著作中引起争议的诸种现象皆可归于蒙森构想中的一种历史本质或曰一条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所有的争论皆可归结于这一构想是否具有主观性。这一构想虽然已经不明显具备历史哲学的特点——普遍历史观,而只是在罗马史范围内抽象出一条基本发展脉络,但是依旧引起了实证主义及以后评论者的非议。非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断言有这样一条线索,并以此为基准描述历史,这里实际上触及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永恒话题,即历史中的现象与本质,具体与抽象,多样与一致,特殊与普

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这一组关系不仅涉及到对单个具体历史事实的理解，而且还涉及到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把握。在《罗马史》中蒙森能比较辩证地处理这一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历史研究总是寻求制高点，以求达到一览无余。在幸运的时候，它能够成功地在某些点上俯瞰到不可更改的必然规律，这些规律像阿尔卑斯山一样永存不变，同时它还能成功地俯瞰到人的种种激情，这些激情如浮云一般环绕着这些规律，无法将它们改变分毫”。蒙森写下这段话时正是《罗马史》一书进入结尾之时，它反映了这一阶段蒙森对历史研究的看法。从这种认识出发，蒙森勾勒出他眼中的罗马历史的发展线索，这一线索不同于以往研究者的观点，它不再重复上升—繁荣—衰落的基本模式，将共和时期视作发展的巅峰。蒙森的《罗马史》遵循一条内在发展规律，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必然结果，各个阶段紧紧相随，相互替代。这条规律具体表现为国家基本法的变迁。在蒙森笔下，国王时期是民主君主制，民众的意志与自由则通过国家法令来实现，随着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国王时期向共和时期过渡。共和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随着罗马的世界化，这种冲突的程度日益剧烈，规模日益扩大，最后导致共和制的崩溃，随后建立的帝国制度并不意味着衰落，而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恺撒处在这个转折点上，自然成为蒙森笔下最理想的人物。曾有人认为蒙森美化恺撒是因为他崇拜拿破仑三世，其实只要考察一下蒙森对罗马史的整体构架，则不难发现恺撒高踞群雄之上的原因。可惜蒙森未写出此书的帝国部分，否则恺撒的地位将更加明显。

从这条基本线索出发，蒙森确定了罗马史描述过程中的内在目的与评判标准，这里指的不仅是描述整个历史过程的目的与标准，而且也指描述具体历史事实的目的与标准。蒙森赋予历史的内在目的与评判历史的具体标准同样引来了评论家的指责，他们认为它们来自蒙森构想的历史发展基本线索，也是蒙森主观的产物，

即蒙森根据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而设定的。正如后来的评论家所指出,蒙森确实在运用这一方法中出现了一些失误,比如给一些历史人物设立他们从未追求的目标,以此评判他们的能力与功过,庞培被视为他这一失误的主要牺牲者。但是笔者认为运用的失误不等于方法的失误,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内在目的与评判标准的确立,而且也适用于基本线索的开掘。蒙森概括出某种抽象普遍性必定以牺牲诸多生动形象的具体特殊性为前提,虽然前者从后者中来,但是在两者之间不能强求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不能苛求基本发展线索对每一个具体史实做出解释,或对每一个具体解释承担责任。即便蒙森在运用中出现失误,亦应考虑到成功本身不仅取决于方法,还取决于其他的前提条件与辅助条件。实证主义者在否定蒙森出现的失误的同时,连整体把握历史的要求也放弃了,他们为了追求客观性而埋头于繁杂的史料之中,不过除非他们满足于做一个史料的保管者,否则一旦他们开始试图从史料中分析、整理、归纳出某种结论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掺入自己的主观倾向。反观蒙森却正是由于从整体角度把握历史,才第一次将研究重心转向贵族和平民的关系,从而突出了贵族阶层在罗马历史发展中的主要作用,这一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古罗马研究。

在突出蒙森《罗马史》的主要特点之后还需指出,蒙森在描述中始终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以描述史实为主,并对史实进行了多层次的展示,这种多层次的展示既体现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领域进行探究,亦体现于对具体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多角度的剖析,在这具体的描述背后隐隐透出蒙森心中的罗马史基本发展线索。正是这种具体的描述使蒙森的构想具有了客观的基础。对诸多领域的开掘,让历史本身说话,增强了论证的力量;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多角度剖析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蒙森在叙述中的倾向性,即评论家所指责的主观色彩。例如在对贵族阶层的描述中,蒙森指出它并不是生来就注定了腐化衰落的命运,而在它的内部则

蕴含着两种发展的可能性，即在平民一方既有渐渐上升的政治力量，又包含着街头群氓这股滋事闹事的力量。即使在描写被置于灰色调中的人物时，蒙森也常常给他们加上明亮的一笔。

综上所述，诸多要素构成了蒙森的《罗马史》，虽然有一定的失误，但是瑕不掩瑜，它不仅获得了同行的极高评价，而且也在读者中受到欢迎。这除了应归功于此书本身的内在特点外，而出版的时代——十九世纪中叶——也给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接受环境。在这一时期古罗马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古罗马研究仍有着极大的普及性，它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且读者大多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然而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这门研究渐渐成为一门深奥的专业学科，这就使得广大读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享受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历史学观念的转变，即从历史哲学向实证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使古罗马研究失去了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使《罗马史》式的著作成为历史的遗迹。

从历史哲学向实证主义过渡这一背景上来考察蒙森及其创作，人们可以认为蒙森的古罗马研究已达到了一个高峰，《罗马史》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对于处在历史观念的转变之中的蒙森来说，他不得不在痛苦的过渡中对自己做出痛苦的评价。由于历史观念的变迁，蒙森后期的历史观是对他前期历史观的否定，这种否定是观念转变后的自觉否定，不含任何被动与强迫的色彩。但正是这一自觉的否定，包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著作的否定，导致了蒙森的迟疑与迷惑，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历史编纂学的怀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它的神化。在考虑《罗马史》第四卷时蒙森表现出他的迟疑：是为了追寻昨日之梦去延续前三卷的思路（对这种写法蒙森已表示怀疑），还是遵从实证主义的宗旨写一部帝国史（对此蒙森没有把握）。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他的自我评价中。作为一个处在过渡期的人物，他不得不对一个割裂成两个部分的自我做出痛苦的评价：站在实证主义立场上他对前期的评价

予以否定，认为那是一种年轻人的轻率；对后期的评价也十分谨慎，自认为并未得到历史女神的垂青，因此在遗嘱中才会出现那样的自我评价。

其实从后人的角度来看，《罗马史》第四卷的告缺诚然是一件憾事，但蒙森在两个不同的历史学时期的贡献却更加突出了他的地位，他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转变，而且还是这一观念转变的促成者之一。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历史哲学与实证主义只是历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阶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历史学研究的不同侧面，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否定，而是彼此相辅相成的。正如蒙森的前后期创作，这些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们奠定了蒙森的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

至此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显露出谜底，两种迥然相异的评价恰恰源于历史与历史学家开的一个玩笑，当蒙森以娴熟的文笔勾勒出罗马的历史时，却未能意识到自己也置身于历史之中，他的痛苦经历正是历史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正如他笔下的恺撒也是一个处在转折点之上的承前启后者，在这个转折中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而已。

笔者认为从蒙森的事例可以看出，过去的客观历史只有落于文字，才能为一代代人所知晓，这一过程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又处于当下的客观历史之中，并昧于当下的历史，而被它所支配，即置于历史之中来写历史。这大概就是历史学家的悖论，一个在劫难逃的悖论，一个不断克服着的悖论。正是这一悖论引出了历史学中的诸种问题与争论，但也正是这一悖论使得历史学的发展成为可能。历史学的发展是一种从一个个新视角不断重新叙述历史的过程。

五

《罗马风云》的翻译与一般文艺作品的翻译大不相同，作为一

部历史著作，它要求译者将书中的专有历史名词译成中文中相应的词汇，并保持它们在全书的统一，这里主要是指专有人名、地名和部落名，为此我们参照了一部分传统译名，尤其是一些得到公认的通用译名，比如恺撒、庞培、伽图和汉尼拔等，大多数专有名词则根据原词经过查证后译出。在音译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德文和拉丁文的区别，尽量按照该词的拉丁文形式译出，书中出现的度量衡与货币单位亦在附录中附有对照表。一般历史名词的译出与统一也是注意的要点，例如执政官、行政官、财政官、监察官、护民官、民众大会和民众党等词汇，都是经过查证后译出。在翻译中译者常常面对两个层次的历史名词，这是由于蒙森运用了一些十九世纪的词汇来指称古罗马的事物，而对今人来说，这些词中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历史名词，比如容克地主、雇佣兵和宫廷党等，在遇到这类名词时我们尽量译成蒙森所指的古罗马事物。这种双重历史性不仅体现于一般历史名词，也体现于专有历史名词，尤其是地名，蒙森常在某古罗马地名后用括号注出该地十九世纪中叶时的名称，而这一名称对今人来说也已成为历史地名，所以我们或是直接译出今用名，或是注出今用名。

原书中注释较少，一方面由于蒙森撰写之初就声明将尽量少添注释，因为他的主旨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是一部描写重于研究的历史书，另一方面由于十九世纪中叶古代史研究有着广大的读者群，而这批读者又掌握着比较丰富的背景知识，因此蒙森可以略去一些关于基本知识的注释。我们在处理注释时曾打算增加一些译注，后来考虑到蒙森的《罗马史》并不是以研究为主，应保留原貌，同时为与整套丛书保持一致，不能出现一些注释多于正文的页张，所以除极少数必须的译注之外，译文基本维持原状。

《罗马风云》共译出十一章，译者分工如下：第一、二章王建，第三章徐萍，第四章李玲，第五章范文芳，第六、七章井茁，第八、九章姜丽，第十章任卫东，第十一章王柄钧，最后由王建负责统一校稿，

并与王柄钧、任卫东一起整理与增添诸附录。

这部译稿的完成首先应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章国锋老师的推荐与建议，以及德国洪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尼佩尔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的地图资料。在翻译过程中，关于资料曾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先生的帮助，在拉丁文与希腊文的翻译方面曾蒙德国对外学术交流中心蒂默曼女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焕生先生的大力支持，另外承老友王海波先生自英文译出授奖辞，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自身学识有限，匆忙之中完成的译稿定有诸多缺欠与失误之处，尚望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予以匡正。

1994 年 1 月 5 日于燕园

第二版序言

新版《罗马史》与原先的版本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指涵括罗马国家前五百年历史的前两部。在实用史开始之后，历史自行确定和安排展现的内容与形式；而在探究于此之前的时代时，对原始材料的研究是无边无际的，而且这些材料既无法确定其确切的时间，亦无法找出它们彼此的关联，这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使之难以令他人感到满意，当然肯定无法令他自己感到满意。虽然本书的作者在将这部作品呈献给读者之前，与研究和展现历史过程中的这些困难进行了认真的较量，但是必定会有不少不尽人意和尚待完善的地方。在这一版中，作者吸收了一系列新近的研究成果，例如罗马诸属臣在国家法中的地位，文学与造型艺术的发展。此外，这一版还弥补了许多较小的遗漏，使描述普遍地变得更加清晰和丰富，使整体布局变得更加明确和一目了然。此外在第三部中描述了在迦太基战争期间罗马城镇的内部状况，这一部分的描述不再像第一版那样只是粗略勾勒，而是以与该对象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所相宜的详尽细致加以处理。——公正的判断者，首先是那些着手解决相似问题的人，他们能够理解和谅解这一弥补性的工作。无论如何，作者必须感激地承认，公众的评判并没有注目于那些极其明显的缺漏和未完成之处，无论是掌声还是异议都是针对那些结束与完成的部分。

另外，作者力图将本书的外在形象安排得更加令人惬意。文中依然保留法罗按照罗马城的年岁制定的纪年法，页边的数字注出

相应的公元前纪年[1]。在纪年的换算中，一律将罗马建城的第一年等同于公元前753年和奥林匹克纪年的第六轮的第四年；当然，如果考虑到罗马的阳历以三月一日为岁首，希腊的阳历以七月一日为岁首，那么按照确切计算，罗马建城的第二年应是公元前753年的后十个月和公元前752年的前两个月，或者对应于奥林匹克纪年的第六轮第三年的后四个月和第六轮第四年的前八个月。罗马与希腊的钱币一律简化，罗马磅、塞斯特尔茨、德纳尔和阿提卡的德拉克玛一视同仁，超过100德纳尔的以相应重量的现今金价为基准，不高于100德纳尔的以相应重量的现今银价为基准，因此罗马的一罗马磅(等于327.45克)黄金按照金银之间1∶15.5的比价等于4000塞斯特尔茨，可估计成普鲁士的304.5塔勒，德纳尔按照银价可估价成普鲁士的7格罗森。附在第一卷中由基佩尔特绘制的地图将比文字叙述更形象地展示罗马军事统一的过程。页边的内容说明将使读者更易于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一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内容索引附在第三卷后面，由于其他必要事务的影响，作者无法如自己所愿，尽快地使作品能够更好地呈献于读者眼前。

布雷斯劳　1856年11月

---

① 在译出的《罗马风云》中，页边的公元纪年、提示和内容索引均已删去。

第三至第九版序言

第三(四、五、六、七、八和九)版在整体上与先前的版本没有明显的差异。任何公正和内行的评判者都不会认为,一部像本书一样的作品的作者有义务在新版中运用在此期间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这种运用其实是一种重复。自第二版出版以来,他人与作者自己的研究使作者看出本书的一些疏忽与遗漏,但是正如公正的报道所言,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做较大段落的修改。在第三部第十四章中曾有一段关于罗马历法基础的阐述,后来经过进一步地丰富材料和更妥帖地安排材料,这部分内容以一本专著(《至恺撒为止的罗马历法》,第二版,柏林,1859)的形式出版问世,因此现在书中的这一部分仅局限于粗略地描述具有普遍的历史重要性的结论。——除此之外,本书的布局未做任何改变。

柏林 1861 年 2 月 1 日;1864 年 12 月 29 日;

柏林 1868 年 4 月 11 日;1874 年 8 月 4 日;

柏林 1881 年 7 月 21 日;1887 年 8 月 15 日;

柏林 1902 年 10 月 1 日。

目 录

·译本前言·
《罗马史》与《罗马风云》………………………… 王 建(1)

第二版序言…………………………………………………… (1)
第三至第九版序言………………………………………… (3)

第 三 卷 从苏拉之死至塔普苏斯之战

第 五 部 军事君主制的建立

第 一 章 马尔库斯·雷必杜斯和
昆图斯·塞多利乌斯……………………… (1)
第 二 章 苏拉的复辟政权 ……………………………… (34)
第 三 章 寡头政治的垮台和庞培的统治 …………… (85)
第 四 章 庞培和东方……………………………… (106)
第 五 章 庞培不在时的党派斗争……………………… (142)
第 六 章 庞培的退却和觊觎王位者的联合………… (167)
第 七 章 征服西部……………………………………… (187)
第 八 章 庞培与恺撒共同执政……………………… (262)
第 九 章 克拉苏斯之死 共同统治破裂…………… (292)

第 十 章 勒隆度辛，伊利尔塔、法萨鲁斯和塔普苏斯……………………………… (321)
第十一章 老共和国与新君主制…………………………… (399)

·附 录·
授奖辞 ……………………………… C.D.阿夫·维尔森(489)
特奥多尔·蒙森小传…………………………………… (494)
古希腊罗马的度量衡及货币单位表…………………… (496)

特奥多尔·蒙森著

王建、王栖钧　等译

第　三　卷

从苏拉之死至
塔普苏斯之战

第十三版

柏林，魏德曼出版社，1922年

怀着旧有的热爱与忠诚

献给波恩的奥托·扬

第五部

军事君主制的建立

当他反复地回顾以往，
几乎将头转向后方，
他将如何寻觅表达这一切的词汇？
他想如何把这泉涌的文思连缀？
他想如何始终保持住勇气，
连续不停地书写下去？

——歌　德

第　一　章

马尔库斯·雷必杜斯和昆图斯·塞多利乌斯

当676年苏拉去世时，他所复辟的寡头统治毫无阻碍地统治着整个罗马国家，但是，正如这个政权由暴力所建立，它亦需以暴力来抵御或明或暗的对手。与它对峙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他们没有明确声明的目标，没有确切公认的领袖，他们是一群极其复杂的家伙，一般来说皆可称为民众派，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反对国家本身的苏拉式体制，完全出于多种多样的原因，怀有各种各样的意图。在反对派中有成文法的捍卫者，这些人既不搞政治，也不懂政治，但是苏拉随意处置公民的生命与财产，这在他们看来是极其令人憎恶的。在苏拉生前，当其他反对派保持沉默时，这些严格的法律学者就起来反对统治者：科尼利乌斯法剥夺了诸多意大利城镇公民的罗马公民权，而在法庭判决中对这一法令不予理睬；与此相同，在变革中公民权常因作战被俘和典卖为奴而丧失，而法庭依旧尊重这一公民权，认为其未被取消。在反对派中还有元老院中居于少数的自由派残余，他们曾力图与改革派以及意大利人达成交易，现在仍具有类似的倾向，他们想通过对民众派的承认来缓和苏拉创立的僵化的寡头政治体制。在反对派中还有真正的民众派，这是一些信仰真诚、固执顽强的极端分子，他们为了民众派纲领中的口号不惜献出财产和生命，然而胜利之后却痛苦而惊讶地看到，他们

未曾为某项事业，而只是为了某句套话进行了顽强的奋斗。对他们来说，首先要恢复护民官的权力，这一权力虽未被苏拉取消，但却被剥夺了它最基本的职权，但恰恰因此，它反而以一种更加神秘的魔力影响着广大公众，因为这个职位没有了可触感的实际作用，实际上已是一个虚幻的幽灵——护民官这个名称在一千年之后不是又一次使罗马发生了变革吗。在反对派中最主要的是诸多重要阶层，它们在苏拉的复辟中未得到满足，或恰恰在这场复辟中被伤及了自身的政治和私人利益。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分布于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富有而稠密的居民区属于反对派，他们十分自然地将665年被授予的拉丁权看作一个向完全的罗马公民权的过渡，由此为宣传与煽动提供了顺从的土壤。与此相似的是被释奴隶，他们同样由于其数量与财富而极具影响力，而且因为他们大量地拥入都城，所以变得尤其危险，复辟使他们重又沦落到以前那种实际上毫无投票权的状态，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与此相似的还有高高在上的金融家，他们虽然谨慎地表示缄默，但是始终怀有难以消解的恼怒，他们拥有的力量亦同样难以削减。同样心怀不满的还有都城的广大公众，他们心目中的真正自由就是粮食的无偿配给。更深的不满亦在酝酿着，它出现于被苏拉的查抄没收所触及的公民集团。他们或者如庞培党人，自己的财产被苏拉派的殖民者越割越少，在其城界内与这些殖民者共处于不断的争吵之中；或者像阿雷提乌姆人和弗拉特勒人，虽然实际上仍拥有其边境领地，但是，罗马人对他们宣布的查抄没收令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他们的头顶之上，或者最终走向没落。有的沦为乞丐，在以往的居住地日益潦倒，有的成为强盗，在森林中渐渐堕落，尤其是在埃特鲁利亚，这种情况特别严重。最终酝酿着不满的还有民主派首领的整个家族和追随他们的被释奴隶，那些首领们由于这场复辟或是失去了生命，或是尽尝流亡者的痛苦，有的在毛里塔尼亚的海滨颠沛流离，有的在米特拉达梯斯的宫廷或军队中暂栖其身；这个时代的政治

观念贯穿着严格的家族中心的特点，因此对留下未走的人来说，必须进行活动[1]，使被放逐的成员能够回到故乡，给死去的成员至少洗刷掉沾在他们及其子女身上的耻辱，并要求归还上一代的家产。在反对派中，最突出的是不受法律保护者的亲生子女，统治者在法律上将他们降为贱民，所以他们仿佛是响应法律的要求，起来反对现存的制度。——加入到这诸多反对派别中的还有大批破产者。其中包括所有高贵的与低贱的无赖，他们在合乎时髦或百无聊赖的花天酒地中失去了自己的家产和气派，他们中有高贵的先生，他们身上只有债务是高高在上的；还有的是苏拉的雇佣兵，苏拉的命令能够把他们变成土地的占有者，却无法将他们变成农民，他们在挥霍殆尽从不受法律约束者那里得来的第一份遗产后，又渴望着分到第二份——所有这些人只是等待着竖起一面旗帜，一面号召向现存的状况开战的旗帜，不管这面旗帜上写的是什么。同样必然加入到反对派中的亦有颇具才干者，他们想追求高高在上的位置，需要赢得对公众的影响力。其中有些人加入进来，是由于封闭的元老阶层拒绝他的加人或阻挠他的迅速升迁，所以他们拼命挤入这一阵营，试图借助民众的青睐以打破寡头政治一致排外和论资排辈的法则；另有些人更加危险，他们的雄心渴求更高的目标，而不满足于在同事间的尔虞我诈中参与确定世界的命运。在苏拉生前就已有这样的候选人用形式性的法律条文和灵巧的口才作为武器，与复辟势力展开激烈的论争，尤其是在律师的讲坛之上，这是苏拉留给合法的反对派的唯一阵地；比如谙练的演讲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生于648年1月3日），阿尔皮诺地区一个庄园主的儿子，他既小心谨慎又大胆无畏地反对大权在握的苏拉，很快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如果反对派仅是以此为筹码换取一张高

---

[1]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一位著名的文学教师，被释奴隶斯塔佰里乌斯·埃洛斯不取分文地给被剥夺法律保护者的子女授课。

级官员的象牙椅，然后心满意足地在消闲与舒适中安度一生，那么此类努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假如这张椅子不能满足一个受到大众喜爱的人，假如盖尤斯·格拉古斯将找到一位后继者，则一场生死之斗在所难免；然而至少此时尚举不出这样一个名字，这样一个为自己设立了如此之高的目标的人。这就是反对派的状况，可能苏拉自己都未预料会这么早，由他建立的寡头政权就由于他的死而不得不依靠自身，这时它不得不与之较量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对派。这项任务本身已非易事，同时又由于这个时代的其他社会政治弊端，使之变得愈加困难，尤其是这个政权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一方面政府要使诸行省的军事首领服从最高的公民权力，另一方面在罗马城中聚集着意大利和非意大利的无赖之徒，还有那些大部分处于事实上的自由状态的奴隶，政府要在没有军队可供支配的情况下对付他们。元老院仿佛置身于一座遭到各方面抛弃和威胁的城堡之中，真正的争夺即将来临。但是苏拉安排的抵御措施亦是可观的和持久的；即便整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对苏拉设立的政府表示明确的反感，甚至是敌意，但是这群混乱迷惘的反对派，他们既无共同目标，亦无共同的道路，而是群龙无首地分裂成上百个小派别。面对这样的反对派，政府仍然极有可能在其坚固的城堡中坚持很长的时间。只是他必须有坚持下去的念头，或至少为了保卫城堡，拿出一点儿精力，就像当初为他们建立这座城堡的那种精力；对一支无意反抗的城防部队来说，最伟大的防御天才亦只是徒劳地设置了他的深堑高墙。

当一切最终都取决于双方领袖的人格素质时，情况变得更加恶劣，因为严格地说双方都缺乏领袖。这个时代的政治完全为帮派团伙所把持，它们以最卑劣的形式出现。当然这不是什么新奇之事，以家族与团体为中心的特点与国家的贵族体制密不可分，数百年来它在罗马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是直到这个时期它才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同时它的影响也是现在（最初于 690 年）才变得如此

之大，法律性的镇压措施与其说制止了它，不如说表明了它的存在。所有的高贵阶层，具有民众思想者如同真正的寡头政治派，都分别在各个政治同盟里联合起来；市民大众，只要能经常参加政治活动的，都以选区为单位同样地组织了几乎具有军事组织特点的封闭性协会，这些协会以每个区域的负责者，即"区域划分者"(divisores tribuum)，为其当然首领和调停人。对这些政治团体来说，一切都是可以收买的：首先是选民的选票，当然也有元老和法官的表决票，同时还有制造街头骚动的拳头和率众闹事的头目——只是在收费标准上高贵者与低贱者的协会之间略有不同。政治同盟操纵选举、决定起诉并负责辩护；它请得到威望卓著的律师，必要时它可与某位投机者达成协议，以达到无罪开释的目的，这些投机者通常以法官的表决票做着收益颇丰的交易。政治同盟通过其封闭排外的团伙把持都城的街道，因此亦常常把持了整个国家。这一切事情都是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发生的，可以说是公开地发生的。政治同盟在组织安排上比国家机构的任何分支都完善；尽管在文明的无赖中，大家通常达成默契，绝不直接提及违法的勾当，但是没有任何人讳言政治同盟的事情，有威望的辩护人不怕公开清楚地袒露他与委托人所属的政治同盟的关系。如果偶尔出现某个人，他摆脱这类勾当，同时又不脱离公众生活，那么他一定像马尔库斯·伽图一样，是一个政治上的堂·吉诃德。取代了派别与派别之争的是团体及其竞争较量，取代了统治的是阴谋。这时出现了一个极其捉摸不定的人物普布利乌斯·塞提古斯，他曾是热诚的马利乌斯党人，后投奔苏拉，受到颇具恩惠的接纳。他在此时的政治喧嚣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角色之一，他是唯一一个能在元老院各派之间进行狡猾的挑拨和调解的人，同时他知晓国家政治方面的所有阴谋与秘密。在这一时期，他的情妇普莱西娅的话可以决定由谁担任重要的军事长官。这种可悲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由于在政治人物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任何一个具有超凡才干的人都会像清扫

蛛网一样扫去这种派别政局，但是这时最缺乏的正是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才略之士。频繁的内战使老一辈中的有威望者所剩无几，只剩下卢西乌斯·菲利普斯（663 年的执政官），一位富于智慧和口才的老人。他原曾具有民众派的思想，后来成为反对元老院的资产者派别的首领，当时他与马利乌斯党人关系密切，最后为了获取酬谢，他及早地投向获胜的寡头政权，在各个派别之间巧妙迎合，左右逢源。在后一辈中，属于纯正贵族的最著名首领有昆图斯·麦特鲁斯·庇护（674 年的执政官），苏拉的甘苦与共的战友；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鲁斯，苏拉去世之年 676 年后的执政官，维塞拉之战的胜利者之子；还有两位比较年轻的军官，卢西乌斯和马尔库斯·卢库鲁斯兄弟，前者在亚洲，后者在意大利，都曾在苏拉的麾下作战，获得了功勋；与他们相比，其他的元老大多不值一提，比如昆图斯·霍特西乌斯（640 年—704 年），他只是作为辩护人稍有名气，至于像德西姆斯·尤利乌斯·布鲁图斯（677 年的执政官），马梅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杜斯·里维阿奴斯（677 年的执政官）和诸如此类的无名之辈更是毋庸赘笔，他们唯一卓越出众的只是那响亮的贵族姓氏，但是即便是前四位亦只是稍稍超出这个时代的显贵的平均水准而已。卡图鲁斯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教养极好的人和诚实的贵族，但是才智平平，尤其缺乏军人的素质。麦特鲁斯不仅具备令人敬佩的人格，而且是一位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军官。675 年他结束执政官任期之后被派往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的卢西塔尼亚人和罗马的流亡者在昆图斯·塞多利乌斯的率领下再次起事。之所以让麦特鲁斯担任这一使命，不仅由于他与统治者苏拉有着密切的亲戚与伙伴关系，更多地是由于他众所公认的才干。两位卢库鲁斯亦是极有才干的军官，尤其是两者中的年长者，他具有令人钦佩的军事才能，同时又兼具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写作的爱好，即使是作为一个人他也值得尊敬。可是如果是作为政治家，那么即便是较出色的贵族亦未能避免软弱与短视，恰如这个时代里

那些平庸的元老们一样。面对外来的敌人，他们之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或许能证实自己的有勇有为，但是没有任何人表现出兴趣与机变，以完成真正的政治任务，并且作为名副其实的舵手引导国家这艘航船穿越充满阴谋与分裂的动荡不定的茫茫大海。他们的政治智慧只限于真诚地相信，寡头统治是唯一能够带来幸福的政治制度，从而出自内心地仇视和大胆地诅咒反对派的煽动和每种挣脱其控制的力量。他们小小的荣誉感极易满足。据说麦特鲁斯在西班牙时，不仅容忍西班牙的即兴诗人创作毫无和谐可言的陈词滥句，更有甚者，他每到一处都让人像对一位神祇一样，以敬献葡萄酒和焚香来欢迎他，在酒席宴间由一位飘然而下的胜利女神伴着模拟的雷声，将胜利者的金色桂冠戴到他的头上。这些传说与大多数历史轶事一样不甚可信，但是即便在这些流言蜚语中也已反映出，作为追随者的一代，他们的荣誉感已经日渐衰落。甚至连比较出色的人亦是如此，他们一旦获得了执政官的职位，举行了凯旋式，在元老院中得到了荣誉席位之后，就心满意足，不复追求权力与影响力。当他们刚刚开始对他们的祖国与派别真正有所帮助时，如果他们具有真正的荣誉感，他们本应尽力而为，可是他们却退出了政治舞台，在王侯式的奢华中走向没落。像麦特鲁斯和卢西乌斯·卢库鲁斯这样的人，他们当统帅时就不仅关心通过征服新的国王和部族来扩展罗马的疆域，而且同样关心以非洲和小亚细亚的美食来丰富罗马烹调中无数的野味、家禽和甜点的种类，他们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消耗在或多或少地需要一点儿才智的闲散之中。灵活机变的传统和放弃个体享受原是所有寡头统治的基础，但是在这个时代中罗马贵族已经衰落，他们只是被人为地重新树立起来，已然不复具备上述素质。他们一致认为集团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虚荣心就是荣誉感，顽冥不化就是坚定。如果苏拉的法律不是由他们，而是由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和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来维护，那么反对派能否摇动这一法律的基础还很难说；面对这样的捍卫

者，每一次进攻至少都意味着一次真正的冒险。

对苏拉的法制来说，有些人既非绝对的拥护者，亦非公开的反对者，在这些人中没有人比年轻的盖奈乌斯·庞培（生于648年9月29日）更吸引众人的目光，苏拉去世时他二十八岁。这对于被赞赏者和赞赏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幸，但是他的出现却是极其自然的。庞培，在身体与精神方面都十分健康，他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成为高级军官后仍与他的士兵们比赛跳跃、奔跑和举重，亦是一个健壮熟练的骑手、击剑手和一个勇敢的志愿兵首领。虽然年龄还将这个年轻人排除在每个职位和元老院之外，但是他已经是获得了大将军称号的凯旋者，在公众的眼里他占有仅次于苏拉的位置，而且甚至从那位漫不经心、半庄半谐的统治者口中赢得了伟大者的称号。不幸的是他的智能完全无法与这些前所未闻的成就相称。他既非居心险恶，亦非庸碌无能，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按照自然的安排他可以成为一个能干的警官，可是时势却使他肩负起统帅与国家领导者的重任。他是一个敏锐勇敢、经验丰富和十分出色的士兵，但是即使在军事这个方面他也不具有丝毫更高的才能；即使成了统帅他亦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以一种近乎胆怯的谨慎去采取行动，尽可能在建立了对敌手的绝对优势之后再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他接受的教育在这个时代具有普遍性，尽管他逐渐变成了一名军人，但是在去罗得斯岛时，他未曾耽误按照义务去欣赏与馈赠当地的演说家。他的正直是富人的正直，他通过家族继承和自己获取而得来的可观财产使他很自然地可以维持家计；他毫不鄙弃以元老们常用的方式获取钱财，但是他过于冷漠和富有，因此不会为了钱财去冒特别的风险，使自己沾上惹人注目的耻辱。他赢得了能干无私的美名，这一荣誉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有其根据，但是更多地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中开始流行的恶习，而不是他自己的德行为他赢得了这一美名。他那“诚实的面孔”似乎是妇孺皆知，在死后他仍被视作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位很好的邻居，在这个时代

大人物们有一种令人气愤的风气，他们通过强行收购或更恶劣的手段，损害弱小的邻居的利益，扩大自己的领地疆界。但是庞培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在家庭生活中他表现出对妻儿的依恋；此外他率先终止野蛮的习俗，在凯旋式的献俘之后不再处死被俘的敌方国王和统帅，这也给他带来了荣誉，但是这一切并未妨碍他遵从他的主人与导师苏拉的意旨与他相爱的妻子分手离婚，因为她属于一个遭唾弃的家族。在同一位统治者的示意下，他无动于衷地让人在他面前杀死了在患难期间曾热诚帮助过他的人；他并非如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过于残忍，但是或许更糟，他为人冷漠，无论是为善或为恶都没有丝毫激情。在战场的刀光剑影中他逼视敌手，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个腼腆的人，任何一点微小的起因都会使他满面通红，他从未能够毫无困窘地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总之他在与人交往中总是显得笨拙、生硬和迟钝。尽管他处处显示自己高傲的固执，但是像那些力图表现出自己的自立性的人所常有的一样，他实际上是一件可操纵的工具，对那些懂得如何支配他的人来说就是如此。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他的被释奴隶和被保护人，他不怕为这些人所控制，而这些人却恰恰知道如何操纵他。他最不适合的职业就是国家的领导者，他目标不明，手段失当，事无巨细皆显得鼠目寸光和手足无措，常常以庄重的沉默掩盖自己的踌躇不决与惴惴不安，当他自以为搞得不错的时候，其实只是怀着这种信念蒙骗了他人，也欺骗了自己。由于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同乡之间的关系，他未曾花费丝毫力气便得到了一个忠诚于他个人的颇具影响力的派别，靠着这一派别本来可以做出一番极其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庞培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无力领导和聚拢一个派别，假若这个派别尽管如此却依旧聚拢在一起，那么这一切的形成也丝毫没有庞培的努力，只是形势发展的惯性造成了这一局面。在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他使人联想起马利乌斯，但是马利乌斯具有农民的粗犷和感官的激情，他比庞培要容易令人接受，而庞培则是所有效仿伟人者

中最乏味和最生硬的。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扭曲的。他是苏拉派军官，有义务捍卫复辟后的法律，但是他同时又置身于反对派中，既反对苏拉本人，亦反对整个元老院的统治。庞培家族在近六十年才出现在执政官的名录之中，这在贵族的眼里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位庞培的父亲曾与元老院相对立，采取了某种十分令其仇视的中间立场，这位庞培自己曾置身于秦那派的行列之中——这些记忆可以隐入沉默之中，但是无法被忘却。庞培在苏拉麾下赢得的杰出地位使他在内心里与贵族们分道扬镳，但是这一地位在表面上却将他与贵族们紧紧地编织在一起，这种内心的分离与表面的交织在程度上相差无几。庞培原本智力有限，却以令人担忧的迅捷与轻松登上了荣誉的巅峰，在这高高的位置上，他为自己的成就而晕眩。仿佛是要嘲笑自己的枯燥的散文式天性，他竟将其与所有英雄中最具诗意者的天性相比，他开始自比于亚历山大大帝，自认为不应仅仅作为五百名罗马元老院成员之一，自认为自己是唯一的非同凡类者。实际上没有人像他那样，生来就适合于置身贵族统治之中扮演其中的一分子。如果庞培早出生二百年，他的威严的外表，庄重的礼仪，个人的勇敢，令人尊敬的私人生活以及缺乏首创性的特点，这一切可以使他侧身于昆图斯·马克西姆斯和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之间，赢得十分荣耀的一席之地。庞培与所有时代的大多数公民和元老之间有着亲缘性，在形成这一亲缘性的诸种力量之中，真正的元老式和罗马式的平庸起了不小的作用。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如果他能够表示满足，对他来说本来存在着一个颇具威望的明确职位，即担任元老院的军事统帅，他原本就被指定担任这一职务。但是这一职务并未使他感到满足，他想成为他无力能够成为的人，由此他陷人危险的处境之中。他孜孜以求地想在国家中获得一个特殊地位，可是当这个地位向他招手之时，他又无力下决心去攫取它；当某些人与法律未曾在他面前表现出绝对的顺从时，他怀着深深的恼怒接受这一事实。但是，他自己又处处以平等者中的一

分子的形象出现，带着并非完全做作的谦和．只要一想到去干某种违法的事情他就会感到颤栗。总之，他不断地与寡头统治处于深刻的紧张关系之中，同时又充任其乖顺的奴仆，他不断地为荣誉感所鞭策，可是这一荣誉感总是为自己的目标所惊吓，就这样，在永恒的内心矛盾之中，他那动荡不定的一生毫无愉悦地流逝过去。

与庞培一样，马尔库斯·克拉苏斯亦不属于寡头统治的坚定拥护者。克拉苏斯是这个时代极具典型性的人物。他与比他略小几岁的庞培一样，属于高贵的罗马贵族阶层，接受了符合这一等级的通常教育，像庞培一样他曾置身于苏拉麾下，在意大利战争中战功卓著，他在智能、文学修养和军事才干方面远逊于许多与他相似的人，但是他具有似无止境的旺盛精力，坚定不移地力图拥有一切和影响一切，这使他超越于其他人之上。他最热衷于投机冒险。在变革时期购买的地产奠定了他的财富的基础；他不轻视任何行业，在都城中他既大张旗鼓又小心谨慎地经营着建筑业；在各式各样的行动中他与他的被释奴隶们携手合作；他在罗马内外由自己或其手下出面办理银行；他借钱给元老院的同事，并且间或由他们出钱去完成任务或贿赂各个法庭的法官。在获取利润时他并不挑三拣四。在苏拉宣布其敌手不受法律保护期间，克拉苏斯曾被指责篡改过名单，自此苏拉不再让他继续参与国家事务；他继承了不少遗产，因为列有他的名字的那些遗嘱都曾被明显地窜改过；他不反对他的佃户使用暴力或秘密手段，将其主人的田产附近的普通居民逐赶出他们的土地。通常他避免与刑法发生公开的冲突，他作为真正的富人过着简朴的公民生活。通过这一途径，克拉苏斯在短短几年之内就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元老成为一笔巨额财产的拥有者，在他阵亡前不久，这笔财产在支付了异乎寻常的巨额支出之后仍达1.7亿塞斯特尔茨(合计1300万塔勒)；他成为罗马最富有的人，因而同时亦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人如果无力以他获取的利息养活一支作战的军队，他就不配自称富有，

可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也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克拉苏斯确实不满足于拥有罗马最充实的钱箱，他的目光瞄向了更远的目标。他不厌其烦地扩展自己的联系。都城中的每一个公民他都能够称名道姓地表示问候。他向每一位求助者提供法庭上的帮助。虽然天赋未给予他多少演说才能，他的讲话十分枯燥，他的报告极其单调，他还患有重听，但是他具有顽强的性格，任何枯燥都无法将他吓退，任何享受都无法将他诱惑，这一性格使他克服了一切障碍。他从不未经准备地出现于法庭，从不发表即兴的讲话，因此成为一位时时受人欢迎和时时准备就绪的辩护人。他的优势在于，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不会变得过于糟糕，他不仅懂得通过言辞影响法官，而且还懂得利用他的诸种关系，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利用他的金钱。元老院的一半成员都欠克拉苏斯的债，他经常不取分毫利息地借钱给他的朋友，而且没有确定的归还日期，这使得许多颇具影响的人依附于他，更何况作为真正的商人，他毫不关心各党派之间的区别，与各派别都保持联系，并且愿意借钱给每个有支付能力或者有用的人。那些最无畏的派别首领敢于毫无顾忌地向各方发起攻击，但却避免与克拉苏斯发生冲突；他被比作牛群中的公牛，惹恼了他对谁来说都是不可取的。显而易见，一个有着这样的形象和地位的人不会追求低下的目标；与庞培不同，克拉苏斯像一个银行家一样确切地了解，他应该以何种手段与目的进行政治性投机。自罗马建立以来，资本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在这个时代中，金钱与武器一样，可以打开通向一切的大门。如果在变革时期资产者贵族可以设想推翻家族式的寡头政治，那么像克拉苏斯这样的人当然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更高处，而不是只盯着凯旋者的权标和刺绣的大氅。他暂时仍是苏拉派成员和元老院的拥护者，但是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生意人，绝不会投身于一个特定的政治派别或者去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克拉苏斯，这位全罗马最富有和最阴险的人，他不是一个吝啬鬼，而是一个无出其右的投机冒险

家，为什么他不可以也希冀染指那顶皇冠呢？或许他独自一人无力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他曾经完成过某些令人惊叹的协作性任务。这一次或许也会出现一位合适的参与者，这一点并非没有可能。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才干平平的军官和演说家，或者说一个政治家，他将自己的精力旺盛看作是能力超群，将自己的欲望看作是荣誉感，实质上他除了庞大的财产和拉拢关系的商人才能之外一无所有——这样一个人在各个团伙与密谋者的支持下，竟能自视为与第一流的统帅与国家领导者平起平坐，并且能与他们争夺向其政治荣誉感招手的最高荣耀，这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在真正的反对派中，变革的风暴以令人惊惧的彻底给自由保守派和民众派造成了一场浩劫。在前一派中唯一遗留下来的著名人物是盖尤斯·科塔（630 年至约 681 年），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与战友，因而于 663 年被放逐，后在苏拉的战争中被重新召回故乡。他是一位聪慧而且能干的辩护人，但是他的派别的分量和个人的影响使他只能胜任一个令人敬佩的配角。在民主派的年轻后辈中，二十四岁的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生于 651 年 7 月 12 日）吸引了众多友人与敌人的目光。恺撒与马利乌斯和秦那有姻亲关系——他的姑母是马利乌斯的妻子，他本人娶秦那之女为妻——在他尚未完全成人之际，就曾勇敢地拒绝按照统治者的意旨休掉他的年轻的妻子科尼利亚，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庞培却曾遵旨照办；恺撒大胆地坚持自己的祭司职位，这一职位是由马利乌斯为其指定的，后被苏拉所剥夺；在被剥夺法律保护期间他曾四处流离，这一威胁经其亲属的恳求才费尽辛劳得以消除；在米提莱纳和西里西亚作战时恺撒表现出他的勇敢，没有任何人料到这个受过温和的教育，几乎像妇女一样爱打扮的少年竟会如此勇敢。苏拉曾经警告说，“这个穿衬裙的小孩”将不止是一个马利乌斯。所有这一切在民主派看来都是一种推荐，但是在恺撒身上寄托的只是未来的希望；本来应该有一批人，由于他们的年龄和国家中的地位现在就有

义务去掌握本派和国家的命运，但是这批人全都已经去世或被剥夺了法律保护。因此，由于缺乏一位真正的胜任者，民主派的领导位置成为人人可得而居之，只要谁愿意以被压迫的民众自由的代表自居，就可以充当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权落到一个苏拉党人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杜斯手中，他转入民主派的阵营不仅仅是出于模棱两可的动机。他曾是一名热诚的元老，积极参与过拍卖被剥夺法律保护者的田产。在任西西里总督期间，他无情地掠夺这个行省，以致面临着被控告的危险，为了躲避这一危险，他投向了反对派。这对反对派来说虽然有裨益，但是其价值尚值得怀疑。反对派由此获得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姓氏，一个高贵的人，一个热情的市场演说者，但是雷必杜斯是一个无足轻重和急躁轻率的人，他在元老院和战场中都没有资格占据领先的地位。尽管如此，反对派依旧欢迎他，这位新的民主派领袖不仅成功地吓退了那些控告者，使他们不敢继续对他进行攻击，而且还成功地使自己被选为676年的执政官。在选举过程中，除了他在西西里榨取的财富之外，庞培的愚蠢追求亦起了促进作用，使他能够利用这一机会，让苏拉及其派别的成员看看他的能力。恰恰此时苏拉去世，反对派却找到雷必杜斯作为其新的首领，而且他们这位首领担任了国家的最高职务，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预见，在都城将很快爆发一场新的革命。

早在都城的民主派人士之前，民主派的流亡者就已在西班牙重新行动起来。这场运动的灵魂是昆图斯·塞多利乌斯。这位出色的塞多利乌斯出生于萨宾人的城市努尔西亚，他原本体格柔和，甚至是柔弱——他对他的母亲拉雅的几乎是狂热的爱展示了这一点——同时又具有极富骑士风格的勇敢。他从西布里、西班牙和意大利战争归来时带回了令人尊敬的疤痕，这些疤痕证实了他的勇敢。他虽然未曾受过任何演说的训练，但是他的讲话以自然的语流和恰当的沉着引起了老练的辩护人的赞赏。他具有超乎寻常的指

挥军事和治理国家的才能，尤其是在这场由民主派指挥的极其悲惨和混乱的变革战争中，他找到机会以证实自己的才能，从而与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众所公认，他懂得如何准备和指挥战争，是民主派中唯一具有这一才能的军官；他以治国之才的精力对付民主派中漫无目的的喧嚣与叫嚷，是民主派中唯一具有治国才干的人。他的西班牙士兵称他为新的汉尼拔，这不仅是由于他像汉尼拔一样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实际上他令人忆起那位伟大的腓尼基人有着诸多原因，他掌握灵活多变和勇敢无畏的作战方式，他具有通过战争来组织战争的罕见才能，他善于使陌生的民族认同他本人的利益，使之为自己服务，他在顺逆之境都能保持沉着审慎，他能够独具创造性地迅速利用自己的胜利，亦能防止失败造成的不利后果。罗马是否曾有哪个过去或现在的国家领导者能在各个方面与塞多利乌斯一比高低，这一点颇值怀疑。在苏拉的统帅们迫使他逃出西班牙之后，他在西班牙和非洲海滨过着动荡不定的冒险生活。在那里有扎下根的西里西亚海盗和利比亚游牧部落的首领们，他时而与他们结盟，时而又与他们交战。获胜的罗马复辟势力甚至一直追踪到这里。当他包围廷吉斯(丹吉尔)时，从被罗马占领的非洲部落赶来一个军团，救援该城的首领，率领军团的是帕西埃库斯，可是帕西埃库斯被塞多利乌斯彻底击败，廷吉斯也被他攻占。这位罗马流亡者的此类战争业绩在流传中享誉四方，为此卢西塔尼亚人派使者去非洲见塞多利乌斯。这时的卢西塔尼亚人表面上顺从罗马的最高统治，实际上仍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每年他们都在与远西班牙的罗马总督作战，他们想请塞多利乌斯去卢西塔尼亚，让他担任他们的武装组织的统帅。在二十年前塞多利乌斯曾跟随提图斯·狄第乌斯在西班牙效力，他了解西班牙的救助渠道，于是决定接受这一邀请。他在毛里塔尼亚海滨留下一个小小的据点之后乘船返回西班牙(674 年)。分隔非洲与西班牙的海峡被一支由科塔率领的罗马舰队所占据，溜过这一关卡绝无可能。于是塞

多利乌斯硬闯这一道封锁，幸运地抵达了卢西塔尼亚人的地区。这时他的麾下只有不多于二十个卢西塔尼亚城镇，在“罗马人”中他也只挑选出两千六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帕西埃库斯军中的归顺者和以罗马的方式武装起来的非洲人。塞多利乌斯认识到，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松散的游击群组所具有的一个坚定的核心，这个核心应是一支具有罗马式组织和纪律的部队。为了这一目的，他征召了四千名步兵和二百名骑兵，以充实他带来的军队，带着这样一个军团和西班牙志愿者组成的松散武装，他挥师迎击罗马人。在远西班牙指挥罗马军队的是卢西乌斯·福菲狄乌斯，他坚定地追随苏拉，在剥夺敌手的法律保护的行动中经受了考验，被从下级军官提升为代理行政官。在比提斯河他被塞多利乌斯彻底击败，两千名罗马人躺满了战场。紧急信使赶去召唤相邻的埃布罗的总督马尔库斯·多密提乌斯·卡尔文努斯，以阻止塞多利乌斯军队的挺进，很快地又出现了（675 年）经验丰富的统帅麦特鲁斯，苏拉派他来接替在西班牙南部的无用的福菲狄乌斯，但是这一切仍旧未能控制住这场暴动。在埃布罗行省，塞多利乌斯的部将财政官卢西乌斯·希尔图累乌斯不仅消灭了卡尔文努斯的军队和杀死了卡尔文努斯本人，而且当外高卢的总督卢西乌斯·曼利乌斯带着三个军团跨越比利牛斯山前来救援他的同事时，亦被同一位勇敢的将领彻底击败。曼利乌斯历尽艰辛率领少数部队逃到伊利尔塔，从那里再回到自己的行省，在撤退途中他遭到阿奎丹尼亚部落的袭击，损失了他的全部辎重。在远西班牙，麦特鲁斯挺进卢西塔尼亚地区，但是当他包围隆戈布利加（离塔霍河的入海口不远）时，塞多利乌斯成功地将阿奎努斯率领的一部分军队诱人埋伏圈，从而迫使麦特鲁斯不得不自动放弃包围，转而清扫卢西塔尼亚地区。塞多利乌斯紧随其后，在阿纳斯河（瓜迪亚纳河）畔袭击了托里乌斯率领的军团，而且在小规模的交锋中给敌方的最高统帅造成了难以言状的损失。麦特鲁斯，一位条理清晰和有点儿慢条斯理的战术家，对他的对手

感到绝望，因为他的对手坚决避免进行任何决战，但是却切断了他的补给线和联络线，从四面八方不停地纠缠着他。——塞多利乌斯在两个西班牙行省都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战绩，而且这些战绩不仅仅凭借武装获得，不仅仅具有军事意义，这就更显示了它们的重要性。拥有武装的军事流亡者并不可怕，卢西塔尼亚人在这个或那个外来指挥官指挥下取得一项项战绩亦无碍大局。但是塞多利乌斯表现出充满信心的政治性和爱国主义的策略，他尽其一切可能，不是作为反对罗马的卢西塔尼亚人请来的雇佣兵头领，而是作为罗马在西班牙的统帅和总督，他原来就曾经受过去的罗马掌权者的派遣，在西班牙担任这一职务。他开始[1]以流亡者的首领们组成一个元老院，其成员直增至三百人，他们以罗马的方式管理事务和任命官吏。他将其军队视作罗马式的军队，而且毫无例外地由罗马人担任军官职务。对西班牙人来说他是总督，他凭借他的职位在西班牙人中催索兵士和其他支援；当然他作为总督不是致力于惯常的专制统治，而是力图将外省人吸引到罗马和他自己的周围。他的骑士性格使他易于接受西班牙的惯有方式，并且在西班牙贵族中唤起对这位亲切奇异的外来者的极其炽烈的热情，如同当时的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在西班牙人中，也存在着自愿追随隶属某一主人的作战习俗，按照这一习俗数千名最高贵的西班牙人宣誓效忠于他们的罗马统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西班牙人中塞多利乌斯找到了自己的战友，这些人比他的同胞和同一派别的伙伴更加可靠。他甚至毫不鄙弃以尚未完全开化的西班牙部落的迷信形式为己所用，他将他的作战计划假诈是狄安娜的旨意，让这位女神的白色牝鹿悄悄地告诉自己。他所施行的完全是一种公正温和的统治，他的军队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至少在他可以亲自监督的范围

① 显然，这一组织至少在674年、675年、676年便已初具轮廓，而正式运行则无疑主要是后来才开始的。

内是这样;通常他在惩罚时是很宽容的,但是每当他的部下在友好地区犯下恶行时他就显示出冷酷无情。他注意到让行省居民的生活状况能有持续的改善;他降低纳贡金额,指示兵士自己建造越冬的营房,从而减去了军队驻营带来的沉重负担,堵住了无数弊端和折磨的源头。他在奥斯卡(韦斯卡)给西班牙贵族的子女设立了一所学院,他们在那里可以获得通常的罗马式教育。这是一种专为青年开设的较高程度的教育,他们学说罗马拉丁语和希腊语,学穿罗马式的长袍——这条奇异的措施是为了以尽可能和缓的方式从同盟者那里索取人质,这种索取人质的做法在西班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项措施绝不仅仅服务于这一目的,它首先是盖尤斯·格拉古斯和民主派的伟大思想的结果与升华,即渐渐地使诸行省罗马化。在这里塞多利乌斯首先开创了一个先例,他致力于使诸行省的居民自身罗马化,不再以灭绝原有居民的方式使意大利的流亡者取而代之,从而完成罗马化过程。罗马的元老们嘲笑这位悲惨的流亡者,这位意大利军队中的逃兵,卡尔博率领的强盗团伙中的最后一人,但是这可怜的嘲弄却落回到他们自己身上。当时与塞多利乌斯作战的兵力包括西班牙的后备军计有十二万名步兵,两千名射箭手和投掷手以及六千名骑兵。面对这一庞大的优势兵力,塞多利乌斯不仅在一连串幸运的交锋与胜利中巩固了自己,而且还将西班牙的绝大部分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远西班牙行省中,麦特鲁斯被限制在为其部队所直接占领的区域之内,这里的所有部族,只要有可能就都站在塞多利乌斯的一边。在近西班牙行省,自从希尔图累乌斯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已经不再有任何罗马军队。塞多利乌斯的密使遍访整个高卢地区,连这里的部落亦开始骚动起来,聚众结群的团伙使阿尔卑斯山的通道关隘变得不复安宁。最终连海洋也为暴乱者和合法政府所共有,因为暴动者的同盟者海盗在西班牙水域几乎已经可与罗马舰队相颉颃。在狄安娜海角(现在的巴伦西亚与阿利坎特之间的德尼亚),塞多利乌斯为海盗设立了一

个牢固的据点，海盗从这里一方面伏击给罗马海滨城市和军队运送补给的罗马船只，另一方面送取暴动者的货物，同时沟通他们与意大利和小亚细亚之间的联系。这个时刻整装待发的传递者从熊熊燃烧的地区将火种带向四面八方，这是极其令人担忧的，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中，此时在罗马这个国家的每一处都积满了待燃的干柴。

在这种情形下苏拉突然去世(676年)。只要这个人还活着，一支由久经沙场的忠诚老兵组成的队伍就会随时准备着响应他的号召。所以，虽然西班牙诸行省似乎是决定性地落入流亡者之手，同时反对派的首领在罗马被选为国家的最高官吏，但是这一切在寡头统治看来，必要时皆可看作暂时的厄运承受下来。他们相信，这一信心虽然显得颇为短视，但却并非全无道理，或者反对派不敢走向公开的抗争，或是当他们敢于抗争时，曾经两次挽救了寡头统治的人将第三次建立起这一统治。可是现在的情形却已经全然不同。都城中急躁的民主派分子早已对无尽的踌躇感到急不可耐，他们为西班牙传来的辉煌消息所激励，迫切要求放手行动。雷必杜斯掌握着此时的决定权，他以改换阵营者的全部热情和他本人特有的轻率着手采取行动。一时间点燃统治者身下的柴堆的火炬仿佛亦将点燃这场内战，但是庞培的影响和追随苏拉的老兵们的情绪迫使反对派让统治者的葬礼平安地进行。接踵而来的是更加公开地着手引发再一次革命。都城的市场上已经重又响起控诉的声音，控诉的矛头直指"漫画式的罗慕路斯"及其帮凶。早在这位强权者闭上双眼之前，雷必杜斯及其支持者就已经公开他们的宣传目的，他们要推翻苏拉的法律，重新恢复粮食配给，重新设置拥有原先权限的护民官，召回被违法驱逐的人，归还被没收的田产。这时反对派开始与被剥夺法律保护者建立联系；马尔库斯·佩彭那·秦那时期的西西里总督出现在都城。反对派设法联系的有苏拉时期叛国者的子嗣们，他们身负着复辟时期的法律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重

负，与他们一起还有比较知名的具有马利乌斯派思想的人，现在这些人都被要求参加到反对派的行列中来。其中不少人，如年轻的卢西乌斯·秦那加入进来，但是另一些人则效仿盖尤斯·恺撒的样子。恺撒在听到苏拉去世和雷必杜斯的计划后从亚洲归来，但在比较详细地了解了这位首领和这场运动的特点之后，他小心谨慎地退隐起来。都城中由雷必杜斯请客，许多人在酒馆和妓院中狂饮暴喝，做着宣传与招徕。最终，埃特鲁利亚的不满者开始策划一场针对新秩序的阴谋[①]。——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执政官卡图鲁斯和一些比较明智的元老要求立即进行坚决的干预，将暴动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慵懒的大多数元老无力做出开战的决定，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交易和让步来尽可能长久地欺骗自己。雷必杜斯起先也像元老们一样着手做着同样的事情。当有人建议将被剥夺的权限归还给护民官时，雷必杜斯与他的同事卡图鲁斯一样拒绝了这一难以接受的建议。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格拉古斯的粮食配给方案在有限的范围内被重新恢复。这一方案似乎不同于塞姆普罗尼乌斯法。按照这一方案，不是所有人，而是仅有一定数量的——约四万名——较贫困的市民可以获得早先由格拉古斯确定的粮食优惠配给，每月以 $6\frac{1}{3}$ 阿斯（$2\frac{3}{4}$ 格罗森）的价格得到五舍菲尔的粮食——这项规定使国库每年净损失至少 30 万塔勒。这一半推半就的让步并未使反对派感到满意，反而却更加坚定地鼓舞了他们，他们在都城以更加强硬和暴烈的形象出现。在埃特鲁利亚这个所有意大利无产者暴动的真正发源地，内战已经爆发：被剥夺了一切的腓苏勒居民武装起来，重新占据了他们失去的地产，许多由苏拉安排到此定居的老兵在骚乱中丧生。元老院听到这一消息后决定派遣两位执政官去埃特鲁利亚，以召集部队和镇压

① 下列叙述基本上以里西尼阿奴斯的报道为基础，尽管这份报道恰好在这一部分较多残缺，但是依然就雷必杜斯的暴动提供了重要的情况。

暴动[1]。简直没有比这一做法更没有头脑的了。元老院重新恢复粮食法，向暴动证实了自己的软弱与忧虑；它为了摆脱街头的喧嚣以重获安宁，交给尽人皆知的暴动首领一支军队；两位执政官立下设想中最庄严的誓言，誓言约束他们不得以委托给他们的武装兵戎相见，寡头统治的良知在这里表现魔鬼般的固执，只有它才会建起一座这样的堡垒，去抵御威胁性的暴动。不言而喻，雷必杜斯在埃特鲁利亚不是为元老院而武装，而是为暴动而武装，他嘲讽地宣布，他所立下的誓言只在当年对他有约束力。元老院开动预言机器，以做出让雷必杜斯回到都城的决定，并且委托他领导即将到来的执政官选举；但是雷必杜斯再三回避，在使者为此而往来奔波、传送着调解建议的过程中，雷必杜斯的执政官任期渐渐地临近结束，他的队伍亦扩充成一支军队。当元老院于第二年(677 年)年初最终向雷必杜斯发出确切的命令，要求他毫无延误地归来时，这位前执政官倔强地拒绝顺从，他要求恢复原先的护民官权力，要求将公民权与财产重新归还给被强行驱逐者，此外还要求将自己再次选为当年的执政官，这将意味着具有法律形式的僭主统治，由此宣告了战争的开始。元老院可以依靠苏拉的老兵，这些老兵们的平民生活受到雷必杜斯的威胁，除此之外还可以指望由前执政官卡图鲁斯召集到其麾下的军队。按照目光敏锐者、尤其是菲利普斯的紧切劝告，元老院委任卡图鲁斯负责保卫都城，抵御在埃特鲁利亚的民主派的主要力量，同时派出盖奈乌斯·庞培率领另一支军队，去从他过去的被保护者手中夺回波河各地。这一谷地当时为雷必杜斯的部将马尔库斯·布鲁图斯所占据，庞培迅速完成了他的任务，

---

[1] 从里西尼阿奴斯的报道残片中还可以得知，元老院做出决议："雷必杜斯和卡图鲁斯根据军事决议可以提前动身"——这一决议不应理解成执政官在任职到期之前被派往他们的前执政官行省。在这方面无任何理由，正确的理解应是被派往埃特鲁利亚去镇压起义的腓苏勒城居民，恰如在卡提林那战争中，执政官盖尤斯·安东尼乌斯亦曾被派往那里。

将敌方的统帅紧紧地包围在穆提那。这时雷必杜斯已经出现在都城的城前，打算像马利乌斯曾经做过的那样，以旋风般的铁手将都城攫入变革势力的掌握之中。台伯河的右岸完全为雷必杜斯所控制，他甚至可以跨越台伯河。在紧挨着城墙根的马尔斯广场，双方展开了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卡图鲁斯取得了胜利，雷必杜斯不得不逃往埃特鲁利亚，他的另一部分军队在其子西庇阿的带领下逃入阿尔巴要塞。这场暴动至此基本已告结束。穆提那城向庞培投降，布鲁图斯尽管得到了保证安全的允诺，但是后来仍按照庞培的命令被处死。与此相似，在经过长时间的围困之后，阿尔巴要塞亦因饥饿而被攻克，首领同样被处死。雷必杜斯遇到卡图鲁斯和庞培的两面夹击，在埃特鲁利亚海滨他再做一搏，但这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够顺利撤退。交锋之后他在科萨港登船驶向撒丁尼亚岛，他希望从那里切断都城的补给运输，建立与西班牙暴动者的联系。但是撒丁尼亚岛的总督进行了有力的抵抗，雷必杜斯在登陆后不久就死于肺结核，在撒丁尼亚岛的战争亦由此走向结束。他的一部分士兵四散而去，前任行政官马尔库斯·佩彭那带着暴动军队的核心和满满的钱箱前往利古里亚，并由那里前往西班牙，投奔塞多利乌斯的军队。

寡头统治战胜了雷必杜斯，但是与塞多利乌斯的战争出现了危险的转折，在这一转折的影响下，寡头统治意识到不得不做出让步，但是这一让步将在字面上和实质上损害苏拉的法律。这时迫切需要派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位能干的统帅去西班牙。庞培明确地表示，他希望得到这一任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求得到这一任务。这一要求已是属于过高的奢望。在雷必杜斯变革的压力之下，让庞培这个潜在的敌手重新获得了一项异乎寻常的指挥权，这本已是极其糟糕的事情，而现在则更令人担忧，苏拉曾给官吏的金字塔结构设立了一系列的规则，可是现在却要废弃所有的规则，让一个从未担任过公民职务的人出任最重要的正规行省总督之一，而

且在担任这项职务时不可能遵守法定的任职期限。寡头统治即便不考虑他们本应顾及的统帅麦特鲁斯，亦有理由严正地拒绝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的新尝试，防止他将自己的特殊地位长久化，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首先寡头统治缺少一位合适的人来担任艰巨困难的西班牙统帅之职。这一年在任的执政官都没有兴趣与塞多利乌斯一试高低，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卢西乌斯·菲利普斯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上所讲的，有所有知名的元老中，没有任何人愿意和能够在一场严肃的战争中承担指挥的任务。如果庞培仅仅是希望获得这一指挥权，而不是率领着一支军队来要求这一指挥权，那么元老们或许会对任命庞培的危险佯作不知，按照寡头统治的惯例，在找不到有能力的候选人时让一位临时代替者来填补空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卡图鲁斯指示他解散军队的命令他已经佯作未闻。元老院的指令能否得到较好的回复，这一点至少值得怀疑，而如果关系走向破裂，其后果无人能够逆料——如果一位著名将领的战剑落入天平的一端，则贵族的另一端很可能将高高地翘起。于是元老院中的大多数人决定做出让步。在任命一个从无官职的个人担任最高职务的时候，按照法律应该征询民众的意见，但是庞培不是从民众手中，而是从元老院手中得到了代理执政官的权力和在近西班牙的最高指挥权，获得任命后过了四十天，庞培于677年夏季越过阿尔卑斯山。

这位新上任的统帅首先在凯尔特人的地区遇到了必须处理的事情，这里虽然未曾爆发严格意义上的暴动，但是在许多地方原有的安宁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于是庞培剥夺了弗卡尔族的阿雷科米契人和赫尔维人两个聚居区的自立权，使它们从属于马西利亚。他还开辟了一条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新通道，该道路翻越科塔山（日内伏勒山），从而在波河谷地和凯尔特人的地区之间建立了一条更加接近的联系途径。由于这一工作庞培错过了最佳的季节，直至晚秋他才越过比利牛斯山。——塞多利乌斯在此期间并无大事庆

贺，他派希尔图累乌斯去远西班牙行省，牵制麦特鲁斯，他自己则努力扩大他在近西班牙行省取得的全面胜利，准备迎接庞培的来临。各个依旧忠于罗马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城市纷纷遭到攻击，被一个个地先后占领。在隆冬时节，坚固的康特累比亚（位于萨拉戈萨的东南方）亦最终宣告陷落。被围困的城市徒劳地向庞培派去一批又一批使者，任何请求都无法使他放弃其缓慢前进的习惯。这时只有海滨城市得到了罗马舰队的保护，还有西班牙东北角的英迪杰特斯人和拉累塔尼人，庞培最终越过比利牛斯山之后就驻扎在他们的聚居区内，他为了使他的未经战阵的部队适应紧张与劳累，让他们整整一个冬天露营于这一地区。除了上述地区之外，到677年年底塞多利乌斯通过协约或武力的方式使整个近西班牙行省臣服于他，自此以后，埃布罗河的上游与中游地区成为其力量的最坚实的支柱。当新到的罗马军队及其统帅的显赫声名在暴动者的军队中引起担忧时，甚至连这一担忧也对塞多利乌斯的力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尔库斯·佩彭那至此为止一直与塞多利乌斯平起平坐，他独自指挥由他从利古里亚带来的军队，当听到庞培到达西班牙的消息时，他不得不顺从他的士兵的要求，听命于他的更能干的同事，服从他的指挥。在678年的战役中，塞多利乌斯又使用希尔图累乌斯的军团对付麦特鲁斯，同时让佩彭那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屯扎在埃布罗河的下游，以阻止庞培渡过这条河流。如果庞培如预料的那样准备向南移动，企图与麦特鲁斯会合，同时为了便于获取部队的给养，打算沿海滨挺进，那么他必须跨过这条河流。首先是盖尤斯·赫勒尼乌斯的军团被指定为佩彭那的援助力量。塞多利乌斯自己则率军在埃布罗河上游地区向内陆挺进，前去继续征服各个倾向于罗马的地区，同时在那里随时做好准备，根据情况的变化赶去援救佩彭那或希尔图累乌斯。这一次他的意图仍是避免任何决战，他力图通过小规模的战斗和切断补给线的方法来消灭敌方。在此期间庞培在与佩彭那的对垒中强渡埃布罗河，在帕兰提

亚河畔的萨贡同附近扎下营地，这一位置离狄安娜海角不远，前文提到，从这一海角出发，塞多利乌斯与意大利和东方保持着联系。此刻正是塞多利乌斯自己出现的时候，他的对手拥有更具才干的士兵，但是塞多利乌斯可以运用他在兵力和指挥天才上的优势。塞多利乌斯包围了宣布支持庞培的城市劳罗（巴伦西亚以南胡卡尔河畔），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很长时间。庞培集中全力解除对这座城市的围困，但是在他的许多分队遭到袭击和被击溃之后，这位伟大的善战者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对手彻底地愚弄了。他原以为已经围住了塞多利乌斯的军队，并已邀请城中的被围困者看他如何捕俘围城的敌军，然而现在他为了不至于自身被围，不得不在他的军营中看着与己结盟的城市被占领和被焚毁。城中的居民被押往卢西塔尼亚——这一事件使一批摇摆不定的西班牙中部与东部的城市重新投向塞多利乌斯。在此期间麦特鲁斯却很幸运。在意大利卡附近（离塞维利亚不远）希尔图累乌斯冒失地与麦特鲁斯交锋，在作战中两位统帅亲自交手，希尔图累乌斯负伤，在这场激烈的交战中麦特鲁斯击垮了希尔图累乌斯，迫使他撤出原属罗马的地区，逃回卢西塔尼亚。这场胜利使麦特鲁斯能够与庞培兵汇一处。两位统帅将678年至679年的冬季营地扎在比利牛斯山麓。他们决定在679年的作战中共同进攻敌手在法伦西亚附近的驻地。但是在麦特鲁斯向他靠近时，庞培为了洗刷劳罗的耻辱，而且独自赢得他所希冀的桂冠，提前与敌军主力展开战斗。塞多利乌斯非常高兴利用这一时机，在麦特鲁斯到达之前与庞培决一胜负。在苏克罗河（胡卡尔河）畔两军展开交锋。经过激烈的交战之后，庞培的右翼被塞多利乌斯击溃，庞培本人亦身负重伤，被抬下战场。虽然阿夫拉尼乌斯率领左翼获得了胜利，占领了塞多利乌斯的军营，但是他在劫掠时遭到塞多利乌斯的突袭，不得不退避。如果塞多利乌斯能够在第二天继续作战，庞培的军队有可能遭受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是在此期间麦特鲁斯赶到，他冲垮了佩彭那面对

他展开的军团，夺取了他的军营，面对两支汇合到一起的罗马军队，已无可能重新开战。麦特鲁斯的战绩，敌对力量的会合和塞多利乌斯获胜后的突然按兵不动，这一切使得恐惧在塞多利乌斯的队伍中蔓延开来。于是像西班牙军队常有的那样，事情的转折导致塞多利乌斯的绝大部分士兵四散而去。但是这种沮丧的气氛来得快捷，去得也迅速，代表统帅的军事计划的白色牝鹿很快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它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受人欢迎。在极短的时间内，塞多利乌斯率领一支新的军队出现在罗马人的面前，地点仍是同一地区，即坚决忠实于罗马的萨贡同（穆维德罗）的南面。与此同时，塞多利乌斯的海盗们从海路阻挠罗马人的补给运输，使罗马军营中的补给匮乏已然达到昭然若揭的地步。在图利阿河（瓜达拉韦阿河）平原又一次爆发战斗，战斗在很长时间内呈胶着状态。庞培率领的骑兵为塞多利乌斯所击败，他的姻亲勇敢的财政官卢西乌斯·麦密乌斯被杀。与此同时麦特鲁斯战胜了佩彭那，他成功地击退了敌方主力向他发起的攻击，在作战中他亲临战阵，在格斗中负了一处伤。塞多利乌斯的军队在交锋之后又一次四散而去。盖尤斯·赫勒尼乌斯为塞多利乌斯占据的法伦西亚被攻占和拆毁。罗马一方似乎一时间陶醉于希望之中，庆幸终于将战胜这个顽强的对手。塞多利乌斯的军队杳无踪影，罗马部队直入内陆，将敌方统帅本人包围在杜罗河上游的克鲁尼亚要塞。但是当他们徒劳地包围着这座岩石城堡的时候，暴动诸城镇的兵源又在别的地方汇合起来。塞多利乌斯溜出城堡，在年底之前重又成为率领一支军队的统帅。于是罗马的统帅们不得不重又进驻各自的冬季营地，瞻望前景毫无慰藉可言，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开始那西叙福斯般的作战任务。他们甚至无法在法伦西亚驻扎过冬，虽然这里易于与意大利和东方保持联系，但是整个地区已遭到敌友双方的彻底毁坏。庞

培起初率军进入法斯科内斯人的地区[1]（比斯开），随后在法塞伊人的地区（瓦利阿多利德附近）过冬，麦特鲁斯甚至进入了高卢地区。

对塞多利乌斯的战争持续了五年，从任何一方都依旧难见走向结束的迹象。国家由于这场战争遭受了难以言述的磨难。在这场战争的消耗性劳顿之中，一代年华似火的意大利青年走向死亡。公共财政不仅缺少了来自西班牙的收入，而且为了支付在西班牙的军队的薪饷与给养，每年还需向西班牙拨去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简直让人不知到何处去筹措这笔资金。不言而喻，西班牙变得荒漠贫穷，曾在那里繁荣一时的罗马文明亦遭到沉重的一击，其原因在于这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暴动战争，双方的交战常常致使整个城镇遭到毁灭。即便有些城市倾向于在罗马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但是连它们也不得不忍受难言的困苦；位于海滨的城市能够借助于罗马舰队获得必需的物品，而位于内陆的忠诚城镇则几乎陷于绝望的境地。高卢地区亦遭受着同样的苦难，这些苦难一方面来自征调步骑兵组成的援军和征集军粮、钱款，另一方面则来自冬季驻营所造成的沉重负担，这一负担由于680年的歉收而达到难以令人忍受的地步。几乎所有城镇的财政机构都被迫向罗马的银行家寻求援助，结果使自己负起令人窒息的债务。统帅们与士兵们毫不情愿地进行着这场战争。统帅们遇到一位在才干上远胜于己的对手，一场令人生厌的顽强抵抗，一场具有致命危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费尽心力才能取得绝非辉煌耀眼的战绩。据称庞培正在设法让元老院将他从西班牙召回，并在别处交给他一项更能令其满意的指挥权。士兵们对这场战争同样未曾感到丝毫愉悦，在这场战争中

---

[1] 新近发现了萨鲁斯提乌斯关于公元前75年远征终结的描述残片，其中有下述有关文字：庞培的罗马军队由于粮食原因驻扎在法斯科内斯人的地区……塞多利乌斯亦是如此……他非常重视这一点，以防被封锁住通往亚洲和意大利的道路。

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有沉重的打击和毫无价值的战利品，而且支付给他们的薪饷亦根本没有按时发放。679 年年底庞培向元老院报告，两年以来士兵的薪饷始终拖欠着，整个军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罗马政府如果能够下定决心，不是如此懈怠地进行这场西班牙战争，这里暂且不说以比较良好的愿望去进行这场战争，那么它原本至少可以消除这些弊端中的很大一部分。像塞多利乌斯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天才，在一块对暴动者和海盗的作战都极其有利的土壤之上，面对敌方在数量上和军事上的优势，能够将这场小小的战争坚持了一年又一年，从根本上来说，这已不是罗马政府的罪责，亦不是统帅的过错。在这里看不到任何终结的痕迹，与此相反，塞多利乌斯的暴动似乎将与同时发生的其他暴动联合起来，从而增加其自身的危险性。在这个时期，罗马正在海上与海盗舰队处处展开厮杀，在意大利与起义的奴隶作战，在马其顿同多瑙河下游的诸部族交锋，同时东方的米特拉达梯斯国王亦为西班牙暴动的成就所影响，决定再次尝试运用武力的运气。塞多利乌斯至少与在意大利的马利乌斯派始终保持着来往，但是他是否与罗马在意大利和马其顿的敌人建立了联系，这一点尚无法得到确切的证实。与此相对比，他很早就与海盗建立了公开的同盟，还有本都斯的国王，塞多利乌斯很早就通过在国王宫廷逗留的罗马流亡者进行居中介绍，与国王保持默契。现在他与国王订立了真正的同盟条约，在条约中塞多利乌斯向国王转让小亚细亚诸被保护国，但是不包含罗马的亚细亚行省。此外，允诺给国王派去一位适合指挥其部队的军官和一批士兵，国王则主动划给塞多利乌斯四十艘船和 3000 塔连特(450 万塔勒)的钱款。都城中敏锐的政治家们联想起过去的时光，曾几何时，意大利遭到菲利普斯和汉尼拔从东西两个方面的威胁，现在不少人认为，这位新的汉尼拔像他的先驱一样，在用西班牙本身的力量征服西班牙之后，亦将效仿汉尼拔而率领西班牙的武装进入意大利。他甚至将很容易地赶在庞培之前抵达意大利，他

将像那位腓尼基人一样，将埃特鲁利亚人和萨姆尼人召到自己的麾下，一齐反抗罗马。

但是在这个比较中风趣多于确切。塞多利乌斯远没有强大到可以再现汉尼拔的壮举，他一旦离开西班牙，就将一败涂地，他所有的成就都依赖于这片土地及其民众的特性，而且即便在这里，他也不得不渐渐地放弃攻势。他那令人赞叹的指挥艺术却无法改变部队的素质，西班牙的后备军禀性难移，它像时涨时落的潮水和忽来忽去的风一样无法信赖。他们忽而聚集起多达十五万人之众，忽而又缩减到只剩下一小群；罗马的流亡者则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桀骜不驯，傲慢无礼和顽固执拗。某些兵种要求其军团较长时间地集中在一起，如比较突出的骑兵兵种，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兵种在塞多利乌斯的部队中远未达到足够的比例。他的最能干的军官和核心老兵在战争中渐渐地被损耗，最可靠的城镇面对罗马人带来的麻烦和塞多利乌斯的军官的虐待，开始感到厌倦，表现出毫无耐心和摇摆不定的征兆。值得注意的是，塞多利乌斯从未错误估计自己面临的毫无希望的处境，在这一点上他也与汉尼拔一样，他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和解，只要保证他能够在故乡安宁地生活，他随时准备放下手中的指挥权杖。但是政治正统派丝毫不懂得调和与谅解。塞多利乌斯无法后退，亦无法退到一旁，面对他从前选定的道路，尽管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令人眩晕，但是他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走下去。

庞培在罗马介绍了西班牙的情况，这一介绍由于米特拉达梯斯在东方的表现进一步得以突出，并且获得了成功。他获得了元老院拨来的必要款项和两个军团的增援力量。于是两位统帅于680年春季重又开始行动，他们重新渡过埃布罗河。由于胡卡尔河和瓜达拉韦阿河之战，罗马军队已将西班牙东部从塞多利乌斯派手中夺了过来。自此以后，战斗集中在埃布罗河的上中游地区，围绕着塞多利乌斯派的主要兵力集中地卡雷古里斯、奥斯卡和伊利尔塔

展开。正如在以往的征战中一样，总是麦特鲁斯干得最漂亮，这次又是他赢得了最重要的战果。迎战他的又是他的老对手希尔图累乌斯，在交战中希尔图累乌斯被彻底击败，他与他的兄弟一起阵亡——对塞多利乌斯派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当塞多利乌斯本人正准备向与他对峙的敌人发起攻击时，听到了这一不幸的消息，他将信使刺死，以免这一消息使他的部下丧失斗志，但是这一消息不可能长时间地被隐瞒。一座座城市相继屈服。麦特鲁斯占领了凯尔特伊比利亚的城市塞古布里加（托莱多和昆卡之间）和比尔比利斯（卡拉塔尤德附近）。庞培包围了帕兰提亚（瓦利阿多利德以北的帕伦西亚），但是塞多利乌斯为这座城市解了围，并迫使庞培向后撤退，寻求与麦特鲁斯会合。在卡雷古里斯（埃布罗河上游的卡拉奥腊）城前，两位统帅与躲入城中的塞多利乌斯展开交锋，遭受了明显的损失。即便如此，当他们前往各自的冬季营地的时候，仍然可以回顾自己取得的可观战绩。这一年庞培前往高卢，麦特鲁斯则去自己的行省。至此为止，大部分暴动者已经屈服或者被武力制服。——第二年（681 年）的征战以相似的方式进行，在这一年中庞培取得了主要的战绩，他缓慢而持续地缩小着暴动的区域。

军事失败对暴动者阵营中的情绪很快就产生了反弹影响。像汉尼拔一样，塞多利乌斯的战绩亦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小，众人开始怀疑他的军事才能，据传他已不再是原来的塞多利乌斯，他每日耗磨于美酒或美食之间，将金钱与时间看得粪土不值。逃兵数和背叛的城镇数不断地增加。不久，罗马流亡者策划谋害统帅的事情被告发到塞多利乌斯面前。这一告发听起来证据十足，因为暴动者军队中的某些军官，尤其是佩彭那，都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服从塞多利乌斯的最高指挥的。而且长久以来，罗马统帅们以赦免叛乱罪和一笔高额的赏金作为悬赏，授给能够刺杀敌方最高统帅的凶手。塞多利乌斯听到这一告发之后，撤销了他本人对罗马士兵的庇

护，并将他们交给选出来的西班牙人。对那些嫌疑者本人他表现出可怕的，但却是必要的严厉，他采取断然措施，不复像往常一样请教于元老们，而是直接将各个被指控者处以死刑。于是在心怀不满者的圈子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现在对朋友比对敌人更加危险。很快又揭发出第二次密谋，这次密谋就出现在塞多利乌斯的指挥部里，被告发者不得不走向逃亡或死亡，但是并不是所有参与者都被告发，余下的密谋者，其中尤其是佩彭那，在这次告发中所感觉到的只是必须加紧行动的推动力。这时他们正在处于奥斯卡的冬季营地。佩彭那按照自己的安排，派人向统帅谎称他的部队获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随后佩彭那举办了一席盛宴，以庆贺这一胜利，塞多利乌斯也出席了这场盛宴，随伴他的如往常一样是他的西班牙随从。与塞多利乌斯的大本营中的通常习惯大相径庭的是，这一庆贺很快成为一场狂欢的闹宴：粗言秽语四下飞溅，一些宾客似乎正在寻衅挑起一场口角，塞多利乌斯躺在他的坐榻上，似乎想闭耳不闻这嘈杂的声音。这时一只酒杯丁当一声跌落到地上：佩彭那发出了事先约定的信号。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塞多利乌斯的邻座，向塞多利乌斯刺出第一击，当被击中者转过身试图站起身来时，这个凶手扑到他身上，将他按倒，直至围坐在桌边的其余宾客，所有参与阴谋的人扑向两个搏斗者，将双臂被按住的手无寸铁的统帅刺死（682年）。与他一起同时被害的还有他忠实的随从。就这样一位可以跻身于伟人之列的人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即便不是罗马迄今为止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亦可称为一位伟人。在幸运的情况下他本可以成为为他的祖国开一代新风的变革者，正是由于那些卑鄙的流亡者团伙的叛卖，他才失去了生命，而由于命运的诅咒他曾不得不率领这些人去反对他的故乡。历史不喜欢科里奥利的征服者式的人物，即便是对这位所有人之中最高尚、最具天才、最令人悲叹的人，历史亦未网开一面。

凶手们企图继承被谋害者的遗产。在塞多利乌斯死后，佩彭那

作为西班牙军队中具有最高职位的罗马军官，要求掌握最高指挥权。人们顺从了他的意愿，但是表现出怀疑和反抗。无论在塞多利乌斯生前人们如何因对他不满而嘀嘀咕咕，死亡使这位英雄重又成为正义的一方。当公布塞多利乌斯的遗嘱时，在继承者的名单里念到了佩彭那的名字，于是士兵们爆发出强烈的不满。一部分士兵，尤其是来自卢西塔尼亚的士兵，自行散去，留下的士兵亦渐渐地感到，随着塞多利乌斯之死，灵魂与幸运亦离他们而去。在与庞培的第一次交锋中，这群指挥拙劣、斗志涣散的暴动者被彻底击溃，在被俘在押的军官中亦有佩彭那。这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交出了塞多利乌斯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将使意大利许多有威望的人面临颜面扫地的危险。佩彭那企图通过这一举动赎回自己的性命，但是，庞培下令不加阅读地焚毁所有信件，并将佩彭那像其余的暴动者首领一样送交刽子手。逃脱的逃亡者们四散而去，其中大部分进入毛里塔尼亚荒漠或者投奔海盗。此后不久，主要得力于年轻的恺撒的热情支持，通过了普罗提乌斯法，这一法律使一部分逃亡中的流亡者得以回归故乡。但是他们中间参与谋杀塞多利乌斯这一行动的人，除一例外全都未得善终。在近西班牙，奥斯卡和大多数忠于塞多利乌斯的城市现在主动向庞培敞开大门。只有乌克萨玛（奥斯玛）、克鲁尼亚和卡雷古里斯不得不用武力去征服。罗马对两个西班牙行省进行了重新安排：在远西班牙行省，麦特鲁斯提高了罪责最重的城镇的年贡金额；在近西班牙行省庞培奖罚兼施，比如卡雷克里斯失去了自立的地位，被置于奥斯卡的隶属之下。一群塞多利乌斯的士兵聚集在比利牛斯山中，庞培劝说他们归顺，并将他们迁居到比利牛斯山以北卢古杜努姆附近（上加龙区的圣贝特朗），将这一地区变成“聚居者”的城镇。在比利牛斯山的关隘处建起了罗马的胜利标志；683年年底麦特鲁斯和庞培率军穿过都城的街道，向卡皮托山上的罗马之父朱庇特呈献全体民族的感谢，感谢他保佑罗马人战胜了西班牙人。即便苏拉已在坟墓之中，但是他的幸

运似乎仍与他的缔造物同在。那些被指定保护这一缔造物的捍卫者过于无能和懈怠，尚不如苏拉的幸运更能庇护这一缔造物。意大利的反对派由于其首领的无能和仓促行事而自我溃散，流亡者亦由于内部纷争而自身崩溃。这些失败更多地是失败者自身的颠三倒四和心不在焉，而不是其对手的努力。尽管如此，这依旧是寡头统治的胜利。高级官员们的象牙椅再一次得到了巩固。

第二章

苏拉的复辟政权

复辟的元老院政府在镇压了威胁其生存的秦那变革之后，已有可能将目光转向国家的内部与外部安全，给予其必要的注意。这时的情况表明，必须毫不延搁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否则将损及最重要的利益，使面前出现的令人不快的事件发展成为未来的危险。除了在西班牙的严重纠纷之外，至少必须对其采取措施的有色雷斯和多瑙河地区的野蛮部族。苏拉在穿越马其顿的进军中只能对这些部族草草加以惩罚，现在则需要长期地将他们逐出这一地区，以军事手段来调整希腊半岛北部边界的混乱状况。此外，需对其采取措施的还有四处出没的海盗团伙。尤其是在东部海域，他们占据着统治地位，现在必须彻底制止他们的恶行。最后需采取措施的还有小亚细亚的不明局势，必须使之具有更加良好的秩序。670 年苏拉与本都斯国王米特拉达梯斯签订了和约，673 年穆莱那签订的和约实质上是这一条约的重复。苏拉的和约明显带有匆忙草就、应付一时的暂时性。罗马人与亚美尼亚国王提格累尼斯当时事实上仍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在这一和约中，罗马人与这位国王的关系根本没有提及。提格累尼斯有理由认为，他得到了默许、可以将罗马在亚洲的领地攫入自己的控制之中。如果不准备让这些领地处于被抛弃的状态，就必须以和善或武力的方式与这位新的亚洲众王之

工进行调解。在前一章中，我描述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生的事件，这一事件与民主派的活动密切相关，同时我也描写了这一事件为元老院政府所镇压的过程。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观察罗马的对外统治，观察苏拉建立的机构是如何进行这一统治的，或者说是如何忽略这一统治的。

在苏拉统治的最后时刻，元老院几乎是同时面对塞多利乌斯派、达尔马西亚人和色雷斯人以及西里西亚的海盗，它宣布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这些措施中仍能看到苏拉那强有力的手腕。对希腊—伊利里亚半岛的远征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使那些野蛮部落臣服和驯顺，这些部落漫游在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整个内陆，按照当时的传说，在他们中间贝西人（居于大巴尔干山脉之中）尤为恶名昭著，他们甚至在强盗中都享有强盗的恶名；另一方面是消灭海盗，特别是藏匿在达尔马西亚海滨的海盗。像通常一样，攻击同时从马其顿和达尔马西亚展开。在马其顿行省，为了这一远征专门集中了一支包括五个军团的部队。前行政官盖尤斯·科斯科尼乌斯在达尔马西亚负责指挥，他横扫整个地区，经过两年的围困攻占了萨罗那要塞。在马其顿，前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676年—678年）起先试图在马其顿与色雷斯的交界处，袭击卡拉苏河左岸的山区。作战双方都极其野蛮地进行着这场战争，色雷斯人摧毁被占领的城市，屠杀俘虏，罗马人则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但是未能取得重大的战果。罗马人行进艰难，在进军途中不断与众多勇敢的山地居民发生交锋，这使得军队遭受到毫无意义的损失，统帅本人亦患病去世。他的继任者盖尤斯·斯克利波尼乌斯·库里奥（679年—681年）受到某些阻碍，特别是遇到一次并非无足轻重的军队哗变，这一事件使得他取消了对色雷斯人的征讨，转向马其顿的北部边界。他在那里征服了比较弱小的达达尼亚人（位于塞尔维亚），直抵多瑙河畔。直至勇敢的马尔库斯·卢库鲁斯（682年，683年）上任，才重新向东挺进，将贝西人击败于他们的山

中，夺取了他们的都城乌斯库达玛(阿得里亚诺波尔)，迫使他们臣服于罗马的最高统治。奥德律斯人的国王萨达拉斯和东部海滨巴尔干山脉南北麓的希腊城市：伊斯特罗波利斯、托莫伊、卡拉提斯、奥德苏斯(在瓦尔纳附近)、麦新布里亚和其他城市都依附于罗马人。除了阿塔鲁斯国王遗赠的在刻索尼苏地的领地之外，罗马人迄今为止几乎从未拥有过色雷斯，现在色雷斯却成为了马其顿行省的一部分，当然是不太顺从的一部分。

色雷斯人和达达尼亚人的强盗活动，始终局限于整个国家中一个较小的地域。与此相比，逐步蔓延和渐渐巩固的海盗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了大得多的损害。整个地中海的航运交通为海盗所控制。意大利既无法运出自己的产品，亦无法从各个行省运进粮食，一边是挨饿的人群，另一边却由于销售停滞而致使农田罢耕。任何汇款和旅客都不再安全，国家财政遭受着极其明显的损失。许多有威望的罗马人被海盗捕获，不得不以巨款为自己赎身，有的时候，海盗们喜欢对被捕获者中的某位有威望者施以血腥的刑讯，在刑讯中显然还添入一些野蛮的幽默。商人们和受命前往东方的罗马军队各支队开始将航行日期主要定在不宜航行的季节，他们更怕海盗船，而不是冬季的狂风，当然即便在这个季节，海盗船也没有从海上全部消失。不过无论海上封锁多么令人敏感，与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岛屿和海滨相比，它还是比较容易忍受的。正如后来的诺曼底人时期，海盗舰队驶向海滨城市，或者强迫它们以巨款为自己赎得自由，或者以武力包围和攻占这些城市。在苏拉签订了与米特拉达梯斯的和约之后，海盗在他的眼皮底下洗劫了萨摩特拉斯、克雷佐门尼、萨摩斯和伊阿苏斯(670年)。由此可以想象，在四周既无罗马舰队也无罗马部队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希腊和小亚细亚沿岸所有富有的古老庙坛被依次洗劫，据传仅仅从萨摩特拉斯一地就被劫走了一笔高达1000塔连特(150万塔勒)的财富。一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罗马诗人写道，阿波罗神被海盗洗劫得一贫如洗，当燕

子去拜访他时，他倾其所有的宝藏，竟然连一丁点儿金子都拿不出来。据估计被海盗占据和洗劫的地区达四百处之多，其中有诸如尼杜斯、萨摩斯和科洛平之类的城市；在不少原先十分繁荣的岛屿和海滨地区，全体居民迁往他乡，以免被海盗所劫走。甚至居住在内陆也不能安全地避开海盗，海盗曾袭击过距海岸一至两天路程的地区。后来，希腊东部的所有城镇都背上了令人惊惧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大都来自这个灾难性的时期。这时的海盗组织一改它原有的特点。海盗们曾是大胆放肆的强盗，活动在塞勒尼和伯罗奔尼撒之间的克里特海域——这片海域在海盗的语言中被称为"金色海域"——向沟通意大利与东方之间的奴隶与奢侈品贸易的大规模船队征收贡金；他们亦曾是全副武装的捕捉奴隶者，同时兼营"战争、贸易与海盗业"，现在他们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团伙精神的海盗之国，它有一个十分令人钦佩的稳固组织，有一个自己的故乡，表现出城邦联盟的雏形，毫无疑问，它亦有确定的政治目标。海盗们自称是西里西亚人，其实在海盗船上汇聚着各个民族的绝望者和冒险家：克里特征兵场中被解聘的雇佣兵，意大利、西班牙和亚洲各被摧毁地区的公民，芬布利亚和塞多利乌斯军中的士兵和军官，总之，在这里汇聚着所有民族的沉沦分子，所有被镇压派别中的被追捕的逃犯，所有大胆可鄙之徒——而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哪里没有苦难与罪恶？这已不是一个臭味相投的偷盗团伙，而是一个封闭的士兵国家。在他们中间，遭到驱逐和虐待的共同命运构成了他们的共济会式的特点，这一特点取代了民族性，并维系着这个团体。在这个团体中，罪犯为了使自己免遭罪恶的侵扰，常常表现出高尚的团体意识。在一个放纵的时代里，懦弱胆怯和桀骜不驯已经使社会体系中的所有团伙变得虚弱不堪。但是，合法的公众组织可以在这个由危困和暴力构成的混血儿之国中找到一个典范，信守不渝的团结，战友与伙伴的意识，重视诺言，尊重自选的首领和勇敢机智这些优秀品质似乎都遁入到这个组织之中，而且也仅仅

存在于这里。如果这个海盗国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向有理或无理地将自己的成员逐出的公民社会复仇，那么有一点尚无定论，即这一口号是否比意大利的寡头统治和东方的苏丹式统治所提出的口号更加恶劣，而后两者看起来正在携手瓜分整个世界。海盗们至少觉得自己的组织与每个合法的国家平起平坐；某些真实的海盗故事非常有趣，而且显示出骑士般的强盗风格，证实了强盗的自尊、强盗的奢靡和强盗的幽默；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场面对整个世界的正义战争之中，并且以此为自豪；他们认为自己在战争中赢获的不是抢盗的财物，而是战利品；当被捉获的海盗在每个罗马的港口都被毫无疑义地钉上十字架时，海盗们也把可以处死每个被俘者视为自己的权利。自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以来，海盗们的军事-政治组织就已确定下来。他们的船只绝大多数是“耗子船”，即小型的敞篷快速三桅帆船，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是双层甲板船和三层甲板船。这些船只汇聚成舰队，由海军统帅率领定期出航，海军统帅的座船往往大多描金绘紫，闪光耀眼。即便是毫不相识，每位海盗船长也绝不会拒绝面临威胁的伙伴所提出的援助请求；与海盗组织的某一核心成员所签订的协约将得到整个海盗社会的绝对承认，而对海盗社会任何成员的每一次不公正的对待都将遭到所有成员的惩罚。海盗们的真正故乡是从赫拉克勒斯柱至叙利亚和埃及水域的广大海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四处漂泊的陆上之家需要避难之地。愿意向他们提供避难之地的有毛里塔尼亚和达尔马西亚海滨、克里特岛，然而最主要的是小亚细亚南部，这里海岸线参差崎岖，海角与海湾众多，控制着这个时期海上交通的主要干道，简直就是无主之地。那里的吕西亚城市同盟和旁菲利亚的城镇不起任何作用，自 652 年起在西里西亚建立起来的罗马机构根本无力控制广阔的海滨地区。叙利亚对西里西亚的控制始终只是名义上的，而且在不久之前，这一控制甚至为亚美尼亚所代替，而亚美尼亚的掌权者作为真正的众王之王根本不关心海洋，他甘愿放弃

海洋，听任西里西亚人的劫掠。因此海盗在这里比在任何地区都发展得更加旺盛，这一现象毫不奇怪。他们在这里不仅在海岸边到处拥有信号台和停泊站，而且还深入内陆。在吕西亚、旁非利亚和西里西亚那崎岖多山的内陆地带使他们拥有极其偏僻的藏身之处，在那里他们为自己修建岩石的宫殿。当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他们将妻儿和财宝藏在宫殿里，在危险的时期，他们自己亦在此觅到躲避之地。尤其是在荒凉的西里西亚，那里有大量诸如此类的海盗城堡，那里的森林在起到庇护作用的同时还给海盗提供了最佳的造船木材。因此海盗们最主要的造船基地和军械库亦坐落于这一地区。这个井然有序的军事国家在那些或多或少地达到了自立自治的希腊海滨城市中为自己培养了一批稳固的被保护者。这些城市以明确的协约为基础，如同与一个友好政权一样与海盗进行贸易往来，并且拒绝满足罗马总督的要求，拒绝向他提供与海盗作战之用的船只，这一现象已经不足为怪。例如并非无足轻重的西得，这座城市位于旁非利亚，它允许海盗在它的船厂建造船只，而且允许海盗在它的市政广场买卖被俘获的自由民。——这样的海盗集团是一种政治力量，自从叙利亚国王特律丰首先将其用作一种政治力量，并且将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以来，它就表现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且亦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力量。我们看到，海盗是本都斯国王米特拉达梯斯和流亡的罗马民主派人士的盟友，我们看到在东部、西部海域与苏拉的舰队交战。我们看到一个个统治着一系列重要的海滨地区的海盗首领。很难确切地断言，这个漂泊的国家在政治性的内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在这些组织中已经蕴含着一个海上王国的萌芽，这个王国已经开始扎下它的根基，在有利的情形下，这个王国显然将发展成为一个持久的国家。

这里谈到的内容在前面已经部分地得以描述，即罗马人在“他们的海洋”之上是如何维持秩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未曾

维持秩序的。罗马对各个行政区的保护性统治主要在于军事性的监护，在罗马人手中集中着海上与陆上的保卫力量，各个行省的居民为了这些保护措施向罗马人付钱或纳贡，但是显然从未有哪个监护人如同罗马寡头统治对待臣属城镇那样，如此无耻地欺骗他的被监护人。罗马没有建立一支共同的国家舰队并集中海上警察力量，元老院完全放弃了对海上警察的统一指挥，而没有这一指挥罗马在海上将一事无成。元老院在放弃指挥的同时，却让每位总督和每个被保护国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去抵御海盗。罗马并未像它曾自告奋勇地表示的那样，仅仅由它和拥有形式上的自立权的被保护国来承担舰队的物质与人员支出，它听任意大利的海军走向衰亡，而且学会了向各个商业城市征用船只以解燃眉之急，更常见的则是以到处组织起来的海岸卫队来救一时之急。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的费用和麻烦都落在了臣属者的身上。只要罗马总督真正将为了海滨防御而征收的款项用于这一目的，而不是私自侵吞，或者像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某位出身高贵的罗马人为海盗所俘时，指示行省居民为被俘者支付赎金，这些居民就将感到万分庆幸。任何初露端倪的明智之举，比如652年占领西里西亚的行动，在执行的过程中肯定半途而废。在这个时期里，如果有一位罗马人未曾完全囿于流俗，未曾在昏昏沉沉之中幻想着罗马民族的伟大，他必定希望能从集市的演讲台上扯去船艏的装饰，这样至少可以避免由于看到这一装饰而使自己不断地感到，它似乎总是让人忆起在以往的美好岁月中，罗马人曾赢得过一次次的海上胜利。——在对米特拉达梯斯的战争中，苏拉对此已经有了足够的确切感受，他认识到忽略舰队将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并且采取了各项措施，以认真地遏制这一祸端。他给由他委派的亚洲诸行省总督留下任务，要他们在各个海滨城市装备起一支对付海盗的舰队。但是，这一布置收效甚微，因为穆莱那更愿意与米特拉达梯斯开战，而西里西亚的总督盖奈乌斯·多拉培拉则表现得颇为无能。于是675年元老院做

出决定，派两位执政官中的一位前往西里西亚，这一命运落到能干的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的头上。他在一场浴血之战中击败了海盗舰队，随后转向摧毁海盗在小亚细亚南部海滨的诸座城市，这些城市给海盗提供了泊锚地和贸易场所。强大的海上之王参尼克特斯的要塞：吕西亚东部的奥林普斯、科里库斯、法塞利斯、旁菲利亚的阿塔累阿皆被攻破，参尼克特斯本人也在奥林普斯城堡的大火中丧生。接下来是对付伊沙利亚人。伊沙利亚人居住在荒凉的西里西亚西北角，陶鲁斯山的北坡。这里峰峦陡峭，岩缝密布，峡谷幽深，宛如一座迷宫，处处覆盖着茂密的橡树林——在这片土地上，至今尚充满着对强盗出没的那个古老时代的回忆。伊沙利亚人的岩石巢穴是海盗们最安全的避难地，为了攻克这一巢穴，塞维利乌斯首次率领罗马军队翻越了陶鲁斯山，击破敌方的要塞奥罗安达和伊沙拉。尤其是后者极为重要，它被视作理想的强盗之城，位于一座难以攀达的山脊之上，俯瞰和扼守着整个伊科尼翁城。这场战争679年方才告以结束，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从这场战争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带回了伊沙利库斯的别号，这场战争并非毫无成果，它使得大量海盗及其船只落入罗马人的手中，吕西亚、旁菲利亚和西里西亚的西部遭到严重的破坏，被毁城市的辖土被没收，借此扩展了西里西亚行省。但是毫无疑问，通过这场战争根本无法根除海盗，而仅仅是使他们迁往其他地区，其中尤其是迁往地中海海盗最古老的巢穴克里特岛。只有采取全面统一的镇压措施，更确切地说只有建立一支常设的海上警察力量，才能彻底弥补这一缺欠。

小亚细亚的陆上情况与这场海上之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陆上，罗马与本都斯和亚美尼亚国王之间的紧张关系未曾减缓，反而越来越渐趋尖锐。亚美尼亚国王提格累尼斯则肆无忌惮地向四周侵占地盘，扩展自己的势力。在这个时期，帕提亚人由于内部动乱使得国家四分五裂，遍地荒芜，他们在接连不断的自卫战争中

被远远地逐回亚洲的内陆。位于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之间的地区中，科都埃纳(库尔德斯坦北部)和阿特罗帕特的米提阿(阿塞拜疆)由帕提亚的封国变成亚美尼亚的封国，尼尼微王国(摩苏尔)和阿提阿贝纳，至少是暂时地，亦被迫成为亚美尼亚的被保护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在尼西比斯及其周围地区，也建立了亚美尼亚的统治；只有大多荒芜的南半部似乎未曾落入新的众王之王的牢牢掌握之中，尤其是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留西亚，这座城市似乎未曾臣服于他。提格累尼斯将埃得萨王国或者称作奥斯莱纳交给一支阿拉伯游牧部落，他将这一部落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迁到这里，并且让他们在这里定居，以便借助于他们来把守幼发拉底河渡口和这条主要的商贸通道[①]。不过提格累尼斯并未将他的侵占活动仅仅局限于幼发拉底河东岸。首先卡巴多西亚成为他的进攻目标，在与强大的邻国的交锋中，无力抵抗的卡巴多西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提格累尼斯从卡巴多西亚夺取了其东部的麦利特纳地区，将它与隔河相望的亚美尼亚行省索芬尼合并到一起，由此将幼发拉底河渡口连同重要的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商贸通道控制在手中。苏拉死后，亚美尼亚人甚至进入了真正的卡巴多西亚地区，将都城马萨·卡(后称塞萨利亚)和其他十一座希腊制城市的居民卷往亚美尼亚。处于完全分崩离析状态的塞留古斯家族王国面对这位新的众王之王，亦无力做出更多的反抗。在这个王国的南部，从埃及边境直至斯特拉顿塔(塞萨利亚)，犹太人的首领亚历山得罗斯·亚纳奥斯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与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诸邻国以及独立的城市国家的作战中，他逐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政

① 按照当地的编年史，埃得萨王国建于620年，在形成了一段时间之后，它才纳入后来在此出现的阿布卡洛斯和曼诺斯的阿拉伯王朝的统治。提格累尼斯大帝将许多阿拉伯人迁居到埃得萨、卡里洛和卡里地区显然与此有关；普鲁塔克亦曾在叙述中提及，提格累尼斯改变了阿拉伯人的习俗，让他们在靠近他的王国的地区定居，以图借助于他们来控制贸易。

权。较大的叙利亚城市加沙、斯特拉顿塔、托勒马伊斯和贝雷阿力图或是维持自己的自由城镇状态，或是在所谓的暴君的统治下维持自立的状态。这类城市中最突出的是都城安齐奥基亚，它完全如一座独立的城市。大马士革和黎巴嫩谷地臣服于那巴提安人首领佩特拉的阿勒塔斯。在西里西亚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海盗或罗马人。围绕这顶四分五裂的王冠，塞留古斯家族的王子们喋喋不休地争吵着，似乎成心想让整个王国成为所有人的笑柄和厌物，当这个如拉伊俄斯家族一样被诅咒永远纷争的姓氏遭到所有臣仆的背叛时，它居然提出要求，企图继承没有子嗣的亚历山大二世去世之后遗留下的埃及王位。面对这一状况，提格累尼斯国王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他极其轻松地征服了西里西亚的东部，索洛伊和其他城市的居民以及卡巴多西亚的居民被押往亚美尼亚。上叙利亚地区也同样为武力所征服，只有位于奥伦特河入海口的勇敢自卫的城市塞留西亚是一个例外。被武力征服的还有腓尼基的绝大部分：680年托勒马伊斯被亚美尼亚人所占领，犹太国也受到他们的严重威胁。塞留古斯家族的故都安齐奥齐亚成为众王之王的都城之一。自671年起，即苏拉与米特拉达梯斯签订和约的第二年，提格累尼斯就已经作为君王被记入叙利亚的年鉴之中，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成为亚美尼亚的总督管辖区，归众王之王的总督马加达特斯统治。尼尼微国王萨勒马纳沙和桑海利布的时代似乎重新出现：东方专制主义的沉重负担重又压到在叙利亚海滨从事贸易的居民的身上，恰如以往压迫着提罗和西顿城一样。内陆强国又一次扑向地中海地区，声称有五十万之众的亚洲军队重新占据了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海滨。正如萨勒马纳沙和纳布加尼察曾将犹太人押往巴比伦一样，现在，新帝国所有边境地区的居民亦遭到同样的命运，科都埃纳、阿提阿贝纳、亚述、西里西亚、卡巴多西亚的居民，尤其是希腊裔和半希腊裔的城市居民，都必须带着他们的全部财产迁往新的都城聚居。他们留下的任何东西都将被罚作充公之物，由此产生了

作为国都的庞大城市，这种城市与其说宣告了统治者的伟大，不如说显示了诸民族的渺小。在幼发拉底河流域，每一次最高统治者发生更迭之后，按照新的最高苏丹的意旨，这类城市总会从地下倏忽冒出。新的"提格累尼斯之城"提格累诺塞塔建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交界处，它被指定为亚美尼亚新扩区域的都城，这座城市成为一座像尼尼微和巴比伦一样的城市，它有五十英寸高的城墙和属于苏丹式统治的宫殿、园林和园囿设施。在其他方面这位众王之王也毫不掩饰：在处于永恒的童年的东方，国王总是被孩童般地想象成头带真正的金冠的人。这种想象从未消失，于是在公开露面时，提格累尼斯也展示出一个达累伊俄斯和克塞克斯的继承者的奢豪礼仪和华丽服饰，他外披紫色长袍，内着紫白相间的内袍和多褶的长裤，头系高高的缠头围巾和国王的饰带，他或走或站，总有四位"国王"奴仆般地随伴和伺候于左右两侧。——米特拉达梯斯国王露面时则俭朴得多。他在小亚细亚克制着自己的侵占之举，满足于在条约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巩固自己在黑海周围的统治，并且将分割博斯普鲁斯王国与他的本都斯王国的中间地区渐渐置于比较确定的附属地位，这时的博斯普鲁斯王国由他的儿子马查里斯统治，属于米特拉达梯斯国王统治下的附属国。但是，他同时也在倾其全力地恢复其海军与陆军，尤其是按照罗马模式装备和组织陆军。在这方面，许多逗留在米特拉达梯斯的宫廷的流亡者为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马人根本不打算更深地卷入东方事务。这一点在下述事件中表现得一清二楚，这时在罗马人面前出现了一个机会，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将埃及王国置于罗马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这一机会被元老院鄙夷地放弃了。托勒密·索特二世·拉提罗斯国王去世之后，苏拉将亚历山大一世国王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国王扶上埃及的王位，登基数日之后，这位国王就在一场都城的骚乱中被杀（673年），至此拉各斯之子托勒密的合法后裔告以终结。被杀的亚历山

大在遗嘱中将罗马城镇立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虽然有所争议，但是元老院接收了以已故国王的名义存放在提罗的钱款，以此承认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尽管如此，但是在涉及埃及王国时，元老院却允许两个尽人皆知的拉提罗斯国王的私生子在实际上占有这份遗产，其中一个是托勒密十一世，他被称为狄奥尼索斯或吹笛者，另一个是塞浦路斯的托勒密。前者占据了埃及，后者占据了塞浦路斯。他们虽然未曾得到元老院的明确承认，但是元老院也未曾向他们提出确定的要求，责令他们交出所占据的国家。元老院之所以听任这种含混不清的状态持续下去，没有最终以有约束力的方式完全放弃埃及与塞浦路斯，其原因无疑在于可观的年金，两位国王毫不费力就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了维持现状，他们不断地向罗马的帮派头领们支付着这笔年金。至于元老院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一诱人的囊中之物，其原因却不在于此。埃及由于它的独特位置和财政组织，使每一位在这里发号施令的总督都可以掌有一份财力和一支海上力量，归根结底是掌有一支独立的力量，这对于软弱多疑的寡头统治来说简直是难以容忍的。从这一立场出发，它放弃直接占有尼罗河流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元老院难以自辩的是，为什么没有直接插手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事务。罗马政府虽然不承认亚美尼亚占领者是卡巴多西亚和叙利亚的国王，但是，它亦未曾做出任何努力，逐退占领者。676年罗马政府迫不得已在西里西亚与海盗开战，尽管这场战争本来可以致使罗马政府对亚美尼亚采取行动，尤其是进兵叙利亚，但是它依旧未有任何举动。罗马政府接受了失去卡巴多西亚和叙利亚的事实，未对亚美尼亚宣战，结果它在事实上不仅放弃了它的被保护者，而且也放弃了构成其强权地位的最重要的基础。当罗马政府失去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希腊聚居区和国家时，它牺牲了构成其统治的前沿阵地，这一现象已经令人忧虑；而当它听任亚细亚人在罗马国家的政治基石地中海海滨扎下根基时，这已经不是爱好和平

的证明，而是坦白和承认。它承认寡头统治经过苏拉的复辟虽然更加具有寡头统治的特点，但是既未变得更加聪慧，也未变得更加有力，对强大的罗马来说，这是走向衰落的开端。——对峙的另一方也不希望战争。如果提格累尼斯可以在不发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得到罗马交出的所有盟友，那么他又何必祈求战争呢。米特拉达梯斯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苏丹，他曾有充分的机会，在过去的顺境逆境之中了解敌友的状况，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在第二次对抗罗马的战争中他很可能将与第一次一样，不得不孤军奋战，他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平静和从内部巩固自己的国家。他在与穆莱那的会面中充分地证实了他的和平声明是真心诚意的。他继续避免做出任何有失妥当的举动，以免迫使罗马政府从它的被动状态中摆脱出来。

但是，像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一样，当时双方实际上都不希望战争，可是战争依旧渐渐地揭开序幕。现在双方之间的利益对立也发展为彼此的敌意，由敌意又发展到相互的戒备措施，而这些戒备措施最终由于它们自身的惯性，导致了公开的破裂。长期以来，贯穿罗马政策的是对自身应变能力和备战意识的怀疑，因为缺乏常备军，统治阶层本身既不出色，也不团结，所以这一怀疑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怀疑使得下述准则几乎成为罗马政策中的一条公理：将每次战争不仅进行到战胜对手，而且直至消灭对手。因此在罗马许多人对苏拉的和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满意的，正像当年对西庇阿、阿夫拉尼乌斯给迦太基人提出的条件一样，那时许多人对那些条件亦十分不满。许多人忧虑重重，担心本都斯国王将发起第二次进攻，这一担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因为眼前的情形与十二年前极其相似。一场危险的内战又一次与米特拉达梯斯专心致志地加强军备叠合在一起，色雷斯人又一次拥进马其顿；海盗舰队又一次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密使们重又往来穿梭，如曾几何时在米特拉达梯斯和意大利之间一样，现在他们穿梭于西班牙和息诺普宫廷中的流亡者之间。早在677年年初元老院中就已有人

认为，米特拉达梯斯国王只是在等待时机，企图趁意大利内战之际袭击罗马的亚洲部分。在亚细亚和西里西亚行省的罗马军队得到了加强，以防可能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米特拉达梯斯也在日益担忧地注视着罗马政策的发展动向。他显然感觉到，无论软弱的元老院多么担忧恐惧，一场罗马人对提格累尼斯的战争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在所难免，而他则不可避免地将要参与这场战争。他试图从罗马元老院获得始终未得到的书面和平工具，但是这一尝试恰逢雷必杜斯变革之际的风云变幻，最终依旧是毫无结果。米特拉达梯斯由此发觉了一个征兆，这一征兆表明战斗即将重新开始。远征海盗似乎是重新开战的序幕，这次远征间接触及到与海盗结成盟友的东方诸国王。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罗马对埃及和塞浦路斯的悬而未决的要求，本都斯国王将自己的两个女儿米特拉达提斯和尼沙许配给两位元老院仍然拒绝承认的托勒密，这一点颇具意味。罗马的流亡者迫切要求立即动手开战，米特拉达梯斯以恰当的借口派遣使者前往庞培的大本营，打探塞多利乌斯在西班牙的状况。而恰恰在这一时刻，塞多利乌斯的状况的确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状况使国王看到了未来的前景，他将不会像在第一次战争中一样，与罗马的两个派别作战，而是将联合一方对另一方作战。简直不可能希冀比这更有利的时机，而且向他人宣战终究要比由他人向自己宣战要好。679年俾泰尼亚的尼科美德斯三世·斐罗巴托国王去世，他是他的家族的最后成员。因为一个由尼萨所生的儿子是或者据称是假冒的——于是他在遗嘱中将他的国家遗赠给罗马人，罗马人毫不迟疑地占据这片与罗马的行省相邻的国土，这里长期以来就遍布着罗马的官吏和商人。与此同时，自658年起就落入罗马人之手的塞勒尼也最终被设为行省，一位罗马总督被派往那里（679年）。联系到在这一时期前后在小亚细亚南部海滨对海盗的进攻，这些措施显然引起了本都斯国王的种种忧虑；尤其是在兼并俾泰尼亚之后，罗马人成为本都斯王国的直接邻居，这一事

件很可能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国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679 年至 680 年的冬季，米特拉达梯斯向罗马人宣战。

米特拉达梯斯原本十分希望不是独自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他最亲近的天然盟友是众王之王提格累尼斯，但是这个目光短浅的人拒绝了他的岳父的请求。于是只剩下暴动者和海盗与米特拉达梯斯并肩奋战。米特拉达梯斯对这一合作极其关心，派遣强大的舰队去西班牙和克里特岛，与暴动者和海盗建立联系。他与塞多利乌斯还签订了正式的协约，在这一协约中，罗马向本都斯国王割让俾泰尼亚、巴夫拉哥尼亚、加拉西亚和卡巴多西亚——当然是要依据战果，而这些战果必须在战场上才能终见分晓。更重要的是西班牙的统帅给本都斯国王提供的支持，他派遣罗马军官前去指挥国王的陆军和海军。在东方最活跃的流亡者卢西乌斯·马基乌斯和卢西乌斯·方尼乌斯被塞多利乌斯指定为他在息诺普宫廷的代表。海盗也提供了帮助，他们大批地出现在本都斯王国，看来正是借助于他们，本都斯国王才能够成功地在舰船数量与能力方面，建立起一支令人叹为观止的海上力量。本都斯国王自己的武装力量构成了作战的主要支柱，他希望在罗马人到达亚洲之前，能够凭借自己的武装力量夺取罗马人在亚洲的领地。而在这一时刻，亚细亚行省由于苏拉的战争税造成了财政危机，在俾泰尼亚新近开始的罗马统治引起了反感，在西里西亚和旁非利亚新近结束的毁灭性战争留下了待燃的干柴，这一切都向本都斯的入侵展示了有利的前景。供作战之用的补给储备亦毫不匮乏，在本都斯国王的仓库中贮存着二百万麦狄姆纳的粮食。舰船和兵士数量众多，训练有素，尤其是巴斯塔尼族的雇佣兵，他们是一群出类拔萃的士兵，甚至与意大利军团的士兵相比也不相上下。这一次也是由本都斯国王开始进攻。狄奥法托斯率领的一个军团进入卡巴多西亚，准备占领那里的要塞，以截住罗马人进攻本都斯王国的道路；塞多利乌斯派来的指挥官，前行政官马尔库斯·马利乌斯，与本都斯的军官攸马科

斯一起进军弗里济亚，以煽动罗马行省和陶鲁斯山区的居民起来暴动；本都斯的主力军队超过十万名兵士，连同1万六千名骑兵和一百辆月镰车，由塔克西勒斯和赫摩克拉特斯率领，听命于本都斯国王本人的最高指挥。此外还有由阿里斯多尼库斯指挥的作战舰队，它拥有四百艘帆船，这支舰队沿小亚细亚北部海滨行进，它的目标是占领巴夫拉哥尼亚和俾泰尼亚。罗马方面挑选680年的执政官卢西乌斯·卢库鲁斯担任第一线的作战指挥职务，他作为亚细亚和西里西亚行省的总督，将率领在西里西亚的四个军团和第五个由他从意大利带来的军团，他的任务是率领这支总计有三万名步兵和一千六百名骑兵的军队通过弗里济亚，攻入本都斯王国。他的同事马尔库斯·科塔率领舰队和另一个军团前往普洛蓬提斯海，保卫亚细亚和俾泰尼亚行省。罗马人终于开始着手布置对海岸的全面防卫，尤其是首先受到本都斯舰队威胁的色雷斯海岸，而且非同寻常地委任一名唯一的官吏，负责清剿所有海面与海岸的海盗及其本都斯的同伙，这一任命落到行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的身上，他的父亲在三十年前曾率先惩处了西里西亚的海盗。此外，元老院拿出一笔7200万塞斯特尔茨(550万塔勒)的款项供卢库鲁斯支配，使他能够借此建立起一支舰队，但是卢库鲁斯拒绝了这一建议。从上述一切措施中可以看出，罗马政府认识到忽视航海事业是弊端之源，并且在这方面尽其法令所能，采取认真的措施。

就这样，680年战争在所有的地点展开。对米特拉达梯斯来说，有一点颇为不幸，恰恰是在他宣战之时，塞多利乌斯的战争出现了转折，这样从一开始他的主要希望之一就宣告破灭，而罗马政府则有可能将其全部力量用于海上战争和小亚细亚战争。在小亚细亚，米特拉达梯斯获益于主动进攻和罗马人远离直接作战地点的优势。塞多利乌斯派来的前行政官率先挺进罗马的亚细亚行省，相当数量的小亚细亚城市向他敞开大门。如同在666年一样，这些城市将定居在城中的罗马家庭屠杀殆尽，庇西底亚人、伊沙利亚人

和西里西亚人拿起了反抗罗马的武器。罗马在这些受到威胁的地区一时还没有部队。零零星星的勇敢者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制止对各个行省的居民的唆使和煽动——一听到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年轻的盖尤斯·恺撒就离开了为学习而逗留在那里的罗得斯岛。他率领一群迅速集结起来的兵士迎击暴动者，但是，这类志愿者军团不可能有多么大的作为。如果聚居于佩西努斯城周围的凯尔特部族托利斯托波基人的首领、勇敢的狄奥泰鲁斯没有站在罗马人的一边而幸运地抗击了本都斯的诸位统帅的话，那么卢库鲁斯将不得不首先从敌方手中重新夺回罗马行省的纵深领地，以这一行动作为作战的开始。即便得到了狄奥泰鲁斯的帮助，他依旧在稳定这一地区和击退敌人的过程中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这一损失并未能通过骑兵赢得的微小胜利得到丝毫的补偿。对罗马人来说，比在弗里济亚更不利的是小亚细亚北部海滨的情形变化。在这里，庞大的本都斯军队和舰队完全侵占了俾泰尼亚，迫使罗马的执政官科塔率领他的人数较少的队伍和船只撤入卡尔切东的城内与港内，以寻求保护，于是米特拉达梯斯将他们围困在城中。但是，对罗马人来说，这一包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如果科塔在卡尔切东城前牵制住本都斯的军队，卢库鲁斯也转向卡尔切东，罗马的全部力量将在卡尔切东汇合，这样就可以在这里迫使对手决一胜负，而不必到更加遥远的崎岖难行的本都斯境内。卢库鲁斯确实选取了通向卡尔切东的道路，但是，科塔为了在同事赶到之前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出一番壮举，命令舰队首领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努都斯进行一次突围。这次突围不仅以罗马人的惨败而告终，而且使本都斯人得以乘机进攻港口，砸开封锁港口的链条，将停泊在港口里的所有罗马船只（总计有七十余艘），通通付之一炬。卢库鲁斯在桑加利乌斯河畔一听到这一意外之变的消息，立刻加快进军速度，这使他的兵士感到极其不满。按照兵士的看法，科塔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更愿意去劫掠一个无人防守的国家，而不愿

意来教他们的伙伴们如何取胜。卢库鲁斯的到达部分地弥补了罗马人遭到的种种挫折：本都斯国王撤去了对卡尔切东的包围，但是并未撤离本都斯，而是向南移动，进入许久以来一直属于罗马的行省。他在普洛蓬提斯海海滨和海勒斯蓬特海峡之畔展开队伍，占领拉姆普萨库斯，并且开始围困塞西库斯这座富裕的大城市。他越来越坚定地执著于他所选定的绝路，可是却没有考虑在与罗马人的较量中诱使罗马人远离本土，然后再与之做生死之搏，这是他唯一可以寄予胜利期望的选择。在塞西库斯，机智与能干这些古老的希腊式的品质像在少数其他地区一样，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这座城市的居民虽然在卡尔切东发生的不幸的海战与陆战中遭受了严重的船只和人员损失，但是他们依旧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塞西库斯位于与大陆遥遥相对的一座岛屿之上，通过一座桥梁与大陆相接。包围者占领了大陆之上绵延至桥边的山岭和位于这里的城市市郊，同时也占领了岛上著名的广狄蒙高地。在大陆和岛屿两个方向，希腊工程师们施展他们的所有才能，力图攻入这一城池。但是，终于被撕开的缺口到了夜间又被围困者封堵住，本都斯国王的军队做出几番努力，始终劳而无功。恰如本都斯国王本人的野蛮威胁一样，他曾威胁塞西库斯的居民，如果他们继续拒绝交出城市，他将在城前处死被俘的塞西库斯人。勇敢与幸运眷顾着的塞西库斯人继续着他们的抵抗，他们差一点儿在被围困期间捉住本都斯国王本人。在这一对峙期间，卢库鲁斯在本都斯军队的背后占据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位置，他虽然无法直接援救被攻打的塞西库斯城，但却可以切断敌方所有的陆上补给线路。就这样，米特拉达梯斯的庞大军队，连同辎重队合计有三十万之众，既无力攻击，亦无力行进，被夹在不可攻克的城市和巍然不动的罗马军队之间。他们所有的需求都唯有依靠海上运输，对本都斯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舰队完全控制着海面。但是，随着恶劣季节的来临，一场暴风雨摧毁了大部分用于围困城市的设置；食品，尤其是马匹饲料的匮乏

开始变得难以忍受。在本都斯骑兵主力的掩护下，驮畜和辎重被命令带离这个地方。这支队伍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溜过或冲过罗马人的封锁，但是，在塞西库斯以东的林达库斯河畔，卢库鲁斯追上了他们，并且将这支队伍彻底击溃。麦特罗芬尼斯和卢西乌斯·方尼乌斯率领的另一支骑兵分队在小亚细亚西部迷途了多日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塞西库斯城前的军营之中。饥饿与瘟疫在本都斯士兵中极其猖獗。当春季来临之际(681 年)，被围者加倍努力，夺回了位于丁狄蒙的堡垒；本都斯国王毫无办法，只得撤去包围，依靠舰队以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他自己随舰队前往海勒斯蓬特海峡，但是在启航和航途过程中由于风暴而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在赫麦欧斯和马利乌斯的率领下，本都斯陆军也启程朝同一个方向行进，以求抵达拉姆普萨库斯，在其城墙的庇护下登船启程。他们抛下了行李，还有伤员和病号，这些人被愤怒的塞西库斯人统统杀死。当本都斯军队在途中横渡埃塞普斯河和格拉尼科斯河时，卢库鲁斯又使他们遭受了明显的损失；但是他们还是抵达了他们的目标：本都斯的船只将这支大军的残余和拉姆普萨库斯的居民偷偷带出了罗马人的区域。卢库鲁斯周密审慎的作战方式不仅弥补了他的同事的错误，而且未曾进行任何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就消耗了敌军——据称有二十万名士兵的核心力量。假如卢库鲁斯手中还有在卡尔切东的港口里被焚毁的舰队，他便可以彻底歼灭全部敌军；可是现在这一摧毁之举却未能大功告成，他甚至不得不容忍下述事实：尽管在塞西库斯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但是本都斯的舰队依然在普洛蓬提斯海聚集起来，围困了欧洲一侧的佩林图斯和拜占庭，劫掠了亚洲一侧的普里阿波斯，本都斯国王的大本营也移往俾泰尼亚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一支由五十艘帆船组成的特选船队运载着一万名精心挑选的士兵，其中有马尔库斯·马利乌斯和罗马流亡者中的核心人物，竟然驶进了爱琴海。于是，流言四出。据说这支船队的目的是在意大利登陆，以图在那里重新挑起内

战。这时,卢库鲁斯在卡尔切东失败之后向亚洲各城镇索取的船只已经开始抵达,由此组成的一支船队启航出港,前去搜寻开往爱琴海的敌方舰队。卢库鲁斯自己作为久经战阵的舰队首领,亲自指挥这支船队。在阿加亚人的港口前,特洛亚海岸和特内多斯岛之间的海域上,伊西多洛斯率领十三艘本都斯的五排桨战船正前往雷姆诺斯岛,它们遭到卢库鲁斯的袭击,被全部击沉。随后,在雷姆诺斯岛和西洛斯岛之间的小岛纳埃,拥有三十二艘帆船的小型本都斯舰队找到一处人迹罕至之地,将船只拖上沙滩。卢库鲁斯在这里发现了他们,他同时向船只和分散在岛上的船员发起攻击,掳获了整个舰队。马尔库斯·马利乌斯和罗马流亡者中的最能干者在这场战斗中不是死于交战之中,就是后来死于刽子手的刀下。敌方的整个爱琴海舰队被卢库鲁斯全部歼灭。在此期间,科塔和卢库鲁斯的部将弗孔尼乌斯,盖尤斯·法累利乌斯·特里阿利乌斯和巴尔巴率领从意大利得到增援的军队和一支在亚洲聚集起来的舰队,继续进行着在俾泰尼亚的战争。巴尔巴占领了内陆的奥林普斯山麓的普鲁西阿斯和尼西亚,特里阿利乌斯占领了海滨的阿巴密亚(通常被称作米尔莱亚)和临海的普鲁西阿斯(通常称作齐奥斯)。然后,所有的将领们汇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对付在尼科米底亚的本都斯国王本人,但是本都斯国王未做任何交战的尝试就逃到他的船上,乘船归国。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受命封锁尼科米底亚港口的罗马舰队的首领弗孔尼乌斯到得太晚。虽然本都斯国王在归途中略有所获,重要的赫拉克里亚城被出卖给本都斯国王,并且被他攻占,但是这个海域的一场暴风刮沉了六十多艘国王的船只,吹散了其余的船只;本都斯国王几乎是独自一人回到了息诺普。米特拉达梯斯的进攻以本都斯海陆两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场失败绝不是一场值得荣耀的失败,对最高统帅来说更是如此。

现在该卢库鲁斯着手进攻了。特里阿利乌斯承担指挥舰队的任务,受命重点封锁海勒斯蓬特海峡,伏击从克里特岛和西班牙归

来的本都斯船只，科塔负责围困赫拉克里亚；艰难的补给事务被交托给忠诚积极的加拉西亚人首领们和卡巴多西亚的阿里俄巴赞尼斯国王；卢库鲁斯本人于681年秋季进军长久以来从未有过敌人踪迹的赐福之地本都斯。米特拉达梯斯现在决心进行极其严密的防守，他未交一战便从息诺普退至阿密索斯，又从阿密索斯退至位于伊利斯河支流吕库斯河畔的卡比拉（后来的新塞萨利亚，今天的尼克萨）。他满足于诱敌深入，使敌人尾随自己渐渐进入内陆深处，造成敌方补给与联络的困难。卢库鲁斯迅速地跟踪追击，将息诺普抛在一边。他跨过了标志罗马势力范围的古老边界哈利斯河，包围了重要城市阿密索斯、攸巴多利亚（伊利斯河畔）、特米西拉（特尔莫东河畔），直至冬季的来临。季节使进军告一段落，但是并未能终止对城市的包围。卢库鲁斯的士兵抱怨这种毫不停歇的进军，这使得他们无法去采摘他们的奋斗果实；他们还抱怨卢库鲁斯让他们设置长长的封锁线，这一任务在恶劣的冬季里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卢库鲁斯是绝不会去听这些抱怨的，682年初春他继续向卡比拉进发，同时在阿密索斯留下由卢西乌斯·穆莱那率领的两个军团。在冬季中，本都斯国王做了新的尝试，企图使亚美尼亚的众王之王加入到战争中来，这些尝试像过去的一样都是白费唇舌，或者只是得到一些空头的许愿。帕提亚人更没有兴趣参与这项失败的事业。但是几经努力，尤其是通过在西提亚人地区的招募，又有一支由狄奥法托斯和塔克西勒斯指挥的庞大的军队聚集在卡比拉附近。罗马军队仅仅还有三个军团，在骑兵人数方面明显地落后于本都斯人。他们不得不尽量避开平原，选择崎岖难行的小径，在不断的抱怨和损失中抵达卡比拉。在这座城市附近，两支军队长时间地彼此对峙，作战主要是围绕双方都十分匮乏的补给展开。为了这一作战目的，米特拉达梯斯以他的骑兵核心和一支精心挑选的步兵分队组成一个游动军团，由狄奥法托斯和塔克西勒斯率领，他们的任务是在吕库斯河和哈利斯河之间巡游，截断罗马军队的粮食运输，这

些粮食都来自卡巴多西亚。但是，掩护运输队伍的是卢库鲁斯的部将马尔库斯·法比乌斯·哈得良奴斯，他不仅彻底击败了埋伏在峡谷中准备袭击他的本都斯队伍，而且在得到来自卢库鲁斯营中的增援之后，还击败了狄奥法托斯和塔克西勒斯的军队，使之溃不成军。对本都斯国王来说，他唯一可以倚重的骑兵在这里彻底溃灭，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比卢库鲁斯得知获胜的消息更早就得知了这一坏消息，从由战场逃到卡比拉的人——颇具说服力的这个人正是被击败的将军本人——的口中得知这一恶讯，他决定立即后撤。本都斯国王的决定闪电般地在他的亲近者的圈子里传播开来。当士兵们看到国王的亲信们正在匆忙地收拾行装，他们也被惊慌和恐惧所攫住。任何人都不愿成为最后一个启程者。高贵之族与草芥之民争相奔逃，如受了惊吓的野兽一般；任何权威，甚至连国王的权威都无人理睬，国王本人亦被卷入这混乱的喧嚣之中。目睹这一混乱，卢库鲁斯就着手进攻，本都斯人在几乎毫无抵抗的状态下遭到了罗马人的血洗。如果罗马军团能够保持他们的纪律与秩序，压抑住他们抢掳战利品的欲望，便可以使一个敌人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而且连国王本人亦无疑将被俘获。米特拉达梯斯几经艰辛，率少数随从穿过山岭，到达科马那（离托卡特和伊利斯河河源不远）。但是不久之后，马尔库斯·庞培率领的一支罗马分队又将他从这里吓走，并且紧紧追踪他的逃跑踪迹，直至他在不足两千名骑兵的跟随下越过本都斯的国家边界，进入小亚美尼亚的塔劳拉。在众王之王的国家里，米特拉达梯斯找到了一处避难之地，但是这里亦已不再是避难之地（682 年末）。提格累尼斯虽然让人给予逃亡的岳父以国王式的尊敬，但是他根本不邀请他的岳父来自己的宫廷，而且让他留在他所停留的地方——偏僻的亚美尼亚边境地区，把他置于一种体面的拘禁之中。整个本都斯和亚美尼亚到处都是罗马的部队，上溯至特拉佩苏斯，整个平原地区毫无抵抗地向胜利者屈服。连掌管本都斯国王财宝的统领们也在经

过或长或短的犹豫之后表示归顺,交出宝库的收藏。在逃亡之前,本都斯国王命令他的一名宦者在法那赛亚(吉雷松)将无法逃走的后宫妇女全部杀死,其中有国王的姐妹,他的众多王后和嫔妃。只有一些城市仍在进行顽强的抵抗。虽然少数内陆城市(如卡比拉、阿马塞亚、攸巴多利亚)很快就落入了罗马人的控制之中,但是较大的海滨城市,如本都斯的阿密索斯和息诺普、巴夫拉哥尼亚的阿马斯特里斯、俾泰尼亚的提欧斯和属于本都斯的赫拉克利亚,都在进行绝望的抵抗。一方面它们为隶属于本都斯国王而感到鼓舞,为由本都斯国王所庇护的希腊式自由城市制度而鼓舞,另一方面也被本都斯国王召来的海盗团伙用暴力控制着。息诺普和赫拉克里亚甚至派船出港去攻击罗马人,息诺普船队俘虏了一支小型的罗马舰队,这支舰队从陶里人的半岛给卢库鲁斯运送粮食。在罗马船队切断了赫拉克里亚与陶里人的半岛上的希腊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在赫拉克里亚的守城部队里发生了叛变之后,这座被围困了两年之久的城市方告陷落。当阿密索斯被逼迫到最后关头时,守城的部队点燃了城市,在大火的掩护下登船离开。在息诺普指挥防御的是大胆无畏的海盗船长塞留古斯和本都斯国王的宦者巴克齐得斯,驻防息诺普的部队在临撤退前洗劫了各处房屋,将无法带走的船只付之一炬;虽然绝大部分的防守者都得以登船离开,但是据传在息诺普仍有八千名海盗被卢库鲁斯杀死。在卡比拉战役之后,对城市的围困持续了整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682 年至 684 年)。卢库鲁斯将这些围困任务大部分交由他的部将进行,他自己则着手处理亚细亚行省的事务,这里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同时亦得到了一次彻底的改革。本都斯的商业城市顽强地抵抗着胜利的罗马人,但是,无论这种抵抗在历史上是如何的奇特,一时间依然是无济于事;米特拉达梯斯国王的事业并未因此而稍有起色。众王之王显然绝不打算至少现在还不打算将他送回他的国家。在亚洲的罗马流亡者在爱琴海舰队的覆灭中损失了他们中间最优秀的分

子，在剩下的人中，不少人与卢库鲁斯达成和解，比如他们活跃的首领卢西乌斯·马基乌斯和卢西乌斯·方尼乌斯。在发生卡比拉战役这一年，塞多利乌斯被害，随着他的死，流亡者的最后一线希望亦告破灭。米特拉达梯斯自己的力量被彻底粉碎，支撑这一力量的其余支柱亦一个个地崩溃：一支拥有七十艘帆船的本都斯舰队从克里特岛和西班牙归来。这支舰队在特内多斯岛附近遭到特里阿利乌斯的袭击，被他全部歼灭；博斯普鲁斯王国的总督、本都斯国王自己的儿子马查里斯也背叛了本都斯国王。他作为陶里人的刻索尼苏斯地区的独立首领，自己做主，与罗马人订立和约和友好协议(684 年)。本都斯国王本人在进行了毫无值得夸耀的抵御之后，呆在一个偏僻的亚美尼亚山村里，成为一个离开自己国家的逃亡者，同时又差不多可以视作他女婿手中的一个囚犯。尽管海盗团伙仍然盘踞着克里特岛，从阿密索斯和息诺普逃出的本都斯残余力量在难以通行的黑海东岸投向萨尼根人和拉茨人。但是卢库鲁斯既表现出巧妙的作战手法，亦采取了明智的和缓措施。他毫不鄙弃地着手解决行省居民的正当怨诉，同时任命悔过自新的流亡者担任自己军队的军官。于是，他以较小的牺牲从敌人手中解放了小亚细亚，消灭了本都斯王国，使这个王国由一个罗马的附属国变成一个罗马的行省。现在迫切期待着元老院派来一个委员会，以便与最高统帅一起确定新的行省组织。

但是，罗马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关系尚未澄清。就其本身而言，罗马人有充分的理由向提格累尼斯宣战，同时亦有此必要，这一点已经在前面指出。卢库鲁斯比元老院的所有成员更贴近和更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情形，他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将亚美尼亚逐回底格里斯河彼岸，重建罗马在地中海的统治。在掌管亚洲事务的过程中，卢库鲁斯表现出他有资格成为他的师长与朋友苏拉的继承者。像当时少数罗马人一样，他是一个亲希腊者，他感受到罗马在继承亚历山大的事业的同时，亦承担了义务：成为希腊人在东方的盾与

剑。对卢库鲁斯来说，此中还有个人动机。他希望能在幼发拉底河的彼岸也摘取到胜利的桂冠，而且众王之王在致他的一封信中省去了他的大将军的头衔，他对此极为敏感，这一切显然有可能影响到卢库鲁斯的决定，但是，以卑微自私的动机来假定那些完全可以用履行义务来解释的举动，这是不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罗马政府的成员们怯懦疏忽、闭目塞听，尤其是始终为财政窘迫所困扰，所以永远无法期待他们会采取主动，进行一次规模宏大和耗资巨大的远征，除非他们面临直接的压力不得不这样做。682年塞留古斯王朝的合法代表、亚细亚的安齐奥科斯及其兄弟，看到了本都斯战争的有利转折，于是他们前往罗马，促使罗马干涉叙利亚事务，同时促使罗马承认他们对埃及的继承要求。虽然后一项要求不能满足，但是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有利的时机和缘由以开始早已必须进行的对提格累尼斯的战争。可是，元老院虽然承认两位王子是叙利亚的合法国王，但是亦无力做出决定，下令进行武装干涉。如果卢库鲁斯想利用这一有利机会，认真对付亚美尼亚，他必须在未经元老院正式授权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冒险开战；他如同苏拉一样，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虽然十分明显地符合现存政府的利益，可是却无法与政府一起将其付诸实施，而不得不违背政府的意旨。长期以来，罗马对亚美尼亚的关系一直介于战与和之间，模糊不定，这一点便于卢库鲁斯做出决定，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遮掩了他擅做主张的手法，亦使他不难找到表面的开战缘由。卡巴多西亚和叙利亚的状况提供了充足的起因，而且在追踪本都斯国王时罗马部队已经侵犯过众王之王的疆域。因为卢库鲁斯此时的使命是指挥对米特拉达梯斯的战争，他希望将下一步行动与此相连接，所以他做出抉择，派他的一名军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前往安齐奥基亚，拜访众王之王，要求他交出米特拉达梯斯。这一举动必将引起战争。这一决定是严峻的，尤其是面对罗马军队的状况。在远征亚美尼亚期间，不可避免地要留驻重兵把守辽阔的本都斯地域，否则

进入亚美尼亚的军队将失去与故乡的联系。此外可以预见，米特拉达梯斯将率军进入他原来的王国。显然，这支拥有约三万名兵士的罗马军队虽然在卢库鲁斯的率领下结束了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但是它不足以应付这一双重任务。在通常情形下，统帅会向政府请求增派第二支军队，并且获得这一援助。但是由于卢库鲁斯准备不顾政府的命令，自己进行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得到增援的打算。尽管他连原属本都斯国王的被俘的色雷斯雇佣兵都纳入了他的部队，但是仍旧只能率领不超过两个军团或者说不超过十五万名兵士的兵力，进行跨越幼发拉底河的战争。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已令人担忧，但是数量的弱小或许可以凭借军队本身久经沙场而磨练出来的勇敢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这支军队完全由清一色的老兵组成。比这更糟糕的是士兵们的情绪，可是卢库鲁斯由于他的贵族气质极少顾及这一方面。卢库鲁斯是一位能干的将军（按照贵族的标准）和一位正直善良的人，但是他极少受到士兵的爱戴。他不受人喜爱，因为他是寡头统治的坚定拥护者，在小亚细亚注重控制罗马资产者残酷的重利盘剥，苛求士兵们付出劳动与艰辛，并要求他的士兵要有严格的纪律，且竭力制止他的部下劫掠希腊城市，同时却为自己将东方的财宝装上车辆和骆驼，更由于他精美高贵和毫无战友之谊的希腊化生活方式，只要一有可能，他总是偏爱舒适奢华的生活。在他身上没有一丝魔力的痕迹，而正是那种魔力才能够在统帅与士兵之间编织起一条个人的纽带。最后还必须看到，他的大部分最出色的士兵有充足的理由，抱怨无限延长的服役期限。卢库鲁斯手中最好的两个军团正是弗拉库斯和芬布利亚于668年带到东方的，在不久前的卡比拉战役结束之后，他们已经完成了十三次远征，完全有权告别归乡，但是卢库鲁斯不顾当时自己对他们做出的允诺，现在又要率领他们跨过幼发拉底河，迎向一场难以逆料的新的战争。卡比拉之役的胜利者所受到的待遇似乎比卡奈之役的失败者所遭受的

还要严厉。一位统帅率领一支力量如此弱小、情绪如此低落的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严格地说是违法地开始一次远征。他将进入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那里河流湍急，山峦积雪，仅仅那辽阔的疆域就足以使每次轻率的进攻成为一次冒险。这样一次远征事实上已经不单单是一场冒险，因此卢库鲁斯的做法在罗马再三遭到非议并非没有理由，只是这些人在非议的时候本不应隐讳。首先是政府的错误才导致统帅采取这一冒险性的举动，虽然政府的错误无法使这一举动得以辩白，但是可以使这一举动得到谅解。

卢库鲁斯派遣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除了打算以外交手段促成战争的爆发之外，原本就有下述意图，即促使诸首领和诸城市拿起武器，其中尤其是叙利亚的首领们和各个城市，号召它们反抗众王之王，685年春正式进攻宣告开始。在冬季里卡巴多西亚的国王悄悄地准备了渡河的船只，罗马人乘船在麦利特纳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穿过陶鲁斯山脉的山间隘口，向底格里斯河进军。卢库鲁斯在阿米达（迪亚巴克尔）地区又跨过了底格里斯河，继续挺进，直逼亚美尼亚的重要干道。这条干道连接新建于亚美尼亚南部边境的第二座都城提格累诺塞塔和老都城阿塔克赛塔。众王之王正在新都城，由于与罗马人发生纠纷，他暂时推迟实施地中海海滨的占领计划，不久前才从叙利亚回来。他刚刚制定出计划，准备对包括西里西亚和吕卡欧尼亚的罗马小亚细亚地区进行一次袭击。此时他正在考虑罗马人是否会立刻退出亚洲，或者会在埃菲索斯先与他一试高低。这时传来消息，卢库鲁斯正在进逼，将要切断他与阿塔克赛塔之间的联系。他下令绞死信使，但是令人厌烦的现实丝毫未变；于是他离开新都城，前往亚美尼亚的内陆地区，以便在那片至今平静无事的地方武装军队以抵御罗马人。在此期间，由米特罗巴赞尼斯率领可供支配的部队和迅速征集起来的相邻的贝督因诸部落一起，与罗马人展开了周旋。但仅仅是罗马的先头部队就将米特罗巴赞尼斯的军团完全击溃，塞克斯提利乌斯率领的一支分

队则击溃了阿拉伯人。卢库鲁斯占领了从提格累诺塞塔通向阿塔克赛塔的要道，在底格里斯河右岸，一支罗马分队追踪向北撤离的众王之王，卢库鲁斯自己则渡河到达左岸，进兵至提格累诺塞塔城前。城中的守军向罗马军队射来永不枯竭的箭雨，围城的器械被石油点燃，这一切使罗马人感到，他们在这里陷入了像历次伊朗战争那样的新危险之中。勇敢的守军指挥官曼西奥斯坚守城池，等待援军。从辽阔的亚美尼亚帝国的各个地区和向亚美尼亚征兵者敞开的相邻地区最终聚集起一支属于亚美尼亚国王的庞大的解围军队。这支援军穿过东北方的山口，赶来解都城之围。在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中久经战阵的塔克西勒斯建议避免与罗马人交战，以骑兵将小小的罗马军队围起来，让他们饿死，但是，当亚美尼亚国王看到罗马的统帅决定在不撤销对提格累诺塞塔的包围的情况下与他交战，而且率领不超过一万人的队伍大胆地越过分开双方军队的河流，准备迎击强于他二十倍的兵力。当他看到一方是一小群罗马队伍（作为使者则人数过多，作为军队则人数太少），另一方则是他自己的庞大军队，在这支军队里，黑海与里海之滨的部族与地中海和波斯湾畔的部族彼此相遇，在他的军队中仅令人生畏的长矛铁甲骑兵就比卢库鲁斯整个军队的人数还多，而且亦不缺乏以罗马方式武装起来的步兵，这时他做出决定，毫不迟疑地开始了敌人渴求已久的交战。在亚美尼亚人尚在为开战而部署时，卢库鲁斯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亚美尼亚人忽略了一处高地，而这处高地控制着亚美尼亚人的整个骑兵阵地；他急忙率领两支步兵队前去占据这一高地，同时命令他的薄弱的骑兵以一次侧翼攻击将敌人的注意力从这一行动上引开。他一到达高地，就率领他的一小群部队从背后袭击敌方骑兵。敌方的骑兵被彻底击溃，逃向尚未完全部署完毕的步兵群，使得步兵尚未出击便溃败而逃。胜利者按照他的师长苏拉的风格撰写了战报，根据战报统计，共有十万名亚美尼亚人和五名罗马人阵亡、国王本人扔掉了他的缠头巾和束发带，毫不引

人注意地率少数骑兵疾驰而去。尽管如此，685 年 10 月 6 日在提格累诺塞塔城前赢得的这场胜利仍旧是罗马战争史中最辉煌的众星之一，它不仅辉煌夺目，而且成就显著。仅此一役，亚美尼亚人就在战略上失去了底格里斯河以南从帕提亚人和叙利亚人手中抢来的所有区域，这些区域绝大部分立即为获胜者所据有。新建造的第二座都城本身成为其中的首例。城中许多被强迫迁来的希腊居民奋起反抗驻军，给罗马军队打开了城门，整个城市遭到罗马士兵的洗劫。这座都城原本为新的大帝国所建，结果像新的大帝国一样被胜利者扼杀。亚美尼亚总督马加达特斯已经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撤出了全部军队，以增强提格累诺塞塔城前的解围力量。卢库鲁斯进入叙利亚最北部的科马基尼，攻占都城萨摩萨塔，他没有到达真正的叙利亚，但是南至红海的各个君主和城镇，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都派来使者，向成为新的最高统治者的罗马人表示效忠，甚至连位于提格累诺塞塔东面的科都埃纳的首领也来归顺。与此相反的是，众王之王的兄弟古拉斯在尼西比斯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他仍然在顽强地抵抗着。卢库鲁斯完全以希腊诸首领和居民团体的庇护者的形象出现，在科马基尼他将塞留古斯家族的一位王子安齐奥科斯扶上王位；亚细亚的安齐奥科斯在亚美尼亚人撤走之后回到安齐奥基亚，卢库鲁斯承认他为叙利亚国王，他还让被迫迁到提格累诺塞塔的居民重归故土。众王之王的无以计数的库存与财宝——罗马人缴获了三千万麦狄姆纳的粮食，仅在提格累诺塞塔就缴获了 8000 塔连特（1200 万塔勒）的金钱——使卢库鲁斯得以不费国库的一分一毫就支付了这场战争的费用，同时在向每个士兵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补给之外还奉赠每人 800 德纳尔（240 塔勒）。

众王之王感到十分气馁，他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处于顺境就趾高气昂，处于逆境则灰心丧气。如果没有年老的米特拉达梯斯，他很可能会与卢库鲁斯达成一项协议，并以可观的牺牲换取这份

协议；罗马统帅亦将在过得去的条件下同意这项协议，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必须这样做。米特拉达梯斯未曾参加争夺提格累诺塞塔的战役。由于众王之王与罗马人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他在被拘禁了二十个月之后于684年中期重获自由，他被派遣率领一万名亚美尼亚骑兵进入他原来的王国，以威胁敌人的联络线。当众王之王聚集他所有的力量以解他所建造的都城之围时，米特拉达梯斯亦被召回，以致他根本来不及在他原来的王国稍微略有作为。他在到达提格累诺塞塔城前时，已有一伙伙从战场上溃逃下来的士兵向他奔来。从众王之王到普通士兵，大家都觉得一切皆已丧失。但是，倘若提格累尼斯现在与罗马人议和，那么对米特拉达梯斯来说不仅失去了最后一线打回故国的希望，而且将他交给罗马人无疑将是议和的第一项条件。提格累尼斯对待他肯定不会异于曾几何时博库斯对待尤古尔塔。因此本都斯国王运用他的全部个人影响力，阻止局面发生转折，促使亚美尼亚宫廷继续这一战争。在这当中他不仅一无所失，而且将赢得一切。尽管米特拉达梯斯失去了王位，逃亡在外，但是他在亚美尼亚宫廷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仍是一个强壮魁梧的人，虽然已经年逾花甲，但是仍能身披全副铠甲跃上战马，在格斗中像最出色的战士一样经受得住考验。岁月与遭遇似乎磨练了他的精神：在过去的年代中他仅仅派遣军事首领，自己并不直接参加作战，而成为老人之后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在战役中亲临指挥和亲手搏杀。在五十年的统治过程中，他经历了无数闻所未闻的祸福奇变。在他看来，众王之王的事业丝毫未曾由于提格累诺塞塔之败而大势尽去。反之，卢库鲁斯的处境却困难重重，如果议和未能实现，战争继续在目的地进行下去，卢库鲁斯的处境甚至将变得岌岌可危。这位经验丰富的老者对于众王之王来说宛如一位父亲，现在他可以面对面地对众王之王施加影响，于是他以他的毅力压服这个软弱者，使他不仅下定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而且决定将他手中的政治与军事的领导权托付给米特拉达梯斯本人。

现在需要将一场由政府决定的战争变成一场亚洲各民族共同的民族战争，要使亚洲的各个国王和部族团结起来，反击高傲强大的西方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米特拉达梯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力图使亚美尼亚和帕提亚重新和解，共同抗击罗马。在米特拉达梯斯的督请下，提格累尼斯向阿尔萨西斯家族的弗拉阿特斯神王（自684年起开始统治）表示愿意归还被亚美尼亚占领的美索不达米亚、阿提阿贝纳和“大山谷群”，并且与他结成友好同盟。但是由于以往发生的事情，这一建议几乎不可能指望得到一个有利的答复。弗拉阿特斯更愿意与罗马人而不是亚美尼亚人签订一项协议，以保证自己的幼发拉底河边界。他乐意于旁观，看着可恶的邻国与令人不快的陌生者彼此消耗力量。与向国王们的呼吁相比，米特拉达梯斯向东方各部族的呼吁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将战争描绘成一场东方对西方的民族战争并不困难，因为它本身就是如此，它甚至还可能被当作一场宗教战争，并且散布传言，假称卢库鲁斯军队的目标是埃利马伊斯或今天洛雷斯坦地区属于波斯的那奈阿或阿纳提斯神庙，这是整个幼发拉底河流域最受人赞美和最富有的圣地。两位国王竖起大旗，号召亚洲人起来捍卫东方及其神祇，使之免遭邪恶的外来者的侵害，于是亚洲人成群结队地从远近八方纷纷赶来，聚集到这面旗帜之下。但是事实已经表明，将大批军队简单地聚拢到一起不仅毫无成效，而且如果把真正有进击和作战能力的队伍编入这支大军之中，那么连这一部分也会变得毫无起色，并且被卷入整体的溃败之中。米特拉达梯斯首先力图组织起骑兵兵种，这是西方人最薄弱的一环，却是亚洲人的最突出之处：在由他新组的军队中一半是骑马的兵卒。他从征募和自愿的新兵中仔细地挑选出有能力的人组成步兵，交给本都斯军官训练。于是，很快又在众王之王的旗帜下重聚起一支大军。这支大军不打算在一开始出现的有利战场上与罗马老兵进行较量，而仅局限于防御和小规模的交锋。在他的王国中进行最后决战时，米特拉达梯斯就曾不断退让，避免交

锋。这一次他将运用相似的策略，真正的亚美尼亚被定为交战的战场。这是从未有敌人染指的提格累尼斯的世袭领地，由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当地居民的爱国意识，它极其适宜于这种作战方式。686年卢库鲁斯处于一种日益令人担忧的困难处境。尽管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在罗马，许多人依旧对他十分不满。元老院觉得他做事擅做主张，还有敏感地受到他伤害的资产者派别运用所有的阴谋和贿赂手段，以图达到召回卢库鲁斯的目的。在都城的集市上每天都能听到公正与不公正的指责，指责这位统帅大胆贪婪，离经叛道。亦有人抱怨竟将如此无限的权力集中到这样一个人的手中(他担任着两个正式的总督职务，还拥有一项重要的非常指挥权)。对这一抱怨元老院做出了让步，它指定一位行政官去亚细亚行省，并将西里西亚行省连同三个新征募的军团交给执政官昆图斯·马西乌斯·雷克斯，从而将作为统帅的卢库鲁斯的指挥权局限于对米特拉达梯斯和提格累尼斯的作战。对统帅的抱怨声在伊罗马响起，这一抱怨声在伊利斯河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军营中引起了危险的回响；更有甚者，一些军官，其中包括统帅本人的连襟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亦从这一角度向士兵们施加影响。无疑是由这些人散布的谣言声称，卢库鲁斯现在打算在本都斯一亚美尼亚战争之后再远征帕提亚人，这一谣言滋长了士兵的愤怒。政府与士兵的恶劣情绪对常胜的统帅来说意味着调离和哗变的危险，但是他本人像一个绝望的赌徒一样，继续加快他的投入与冒险。他虽然不向帕提亚人进军，但是当提格累尼斯既未表现出议和的愿望，亦不像卢库鲁斯所希望的那样进行第二次决战时，卢库鲁斯决定从提格累诺塞塔出发，穿过凡湖东岸的崎岖山地，进入幼发拉底河东侧的谷地(或称阿尔萨尼亚河谷地，今天的木腊特河谷地)，由此再进入阿拉斯河谷地，在这片谷地中的阿拉腊特山北坡坐落着真正的亚美尼亚都城阿塔克赛塔，这里有亚美尼亚国王世袭的宫殿及其嫔妃。卢库鲁斯希望以威胁其祖居都城的方式迫使亚美尼亚

国王在半途或至少在阿塔克赛塔城前决一雌雄。显然他必须在提格累诺塞塔留下一支分队。由于进攻部队已经无法再削减，所以只能削弱在本都斯的军营，从那里调集部队来到提格累诺塞塔。最主要的困难是亚美尼亚夏季短暂，对军事行动来说这是颇为令人不快的。在海拔 5000 足高的亚美尼亚高原之上，作物的种子六月初才在埃尔祖鲁姆抽芽，而随着九月的收割、冬季亦宣告降临，这就是说罗马军队必须在至多四个月内赶到阿塔克赛塔，并结束这场远征。686 年盛夏，卢库鲁斯从提格累诺塞塔出发，无疑是穿过比特利斯山口，继续向西挺进，沿凡湖上溯至穆施高地，抵达幼发拉底河畔。在行进过程中，罗马军队不断与敌方骑兵发生极其令人厌烦的小规模冲突，尤其是与骑马的敌方弓箭手发生冲突，行进缓慢，但是并未遇到严重的阻碍，而且借助于一场幸运的交锋还渡过了亚美尼亚骑兵认真防御的幼发拉底河。亚美尼亚的步兵露面了，但是罗马人无法诱使它与自己交锋。罗马军队就这样抵达了真正的亚美尼亚高原，并且继续向这片陌生国土的纵深地带挺进。它没有遇到任何真正的挫折，但是地形的复杂和敌方骑兵的阻击给进军造成了不可更改的延误，仅此本身就已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缺陷。早在军队到达阿塔克赛塔之前，冬季就已降临。当意大利士兵看到身边的冰雪时，军事纪律——这根原本就已绷得过紧的弦被扯断了。一场真正的哗变迫使统帅安排撤退，他以他惯有的巧妙完成了这次撤退。在幸运地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之后，这里的季节还允许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卢库鲁斯越过底格里斯河，率领他的军队扑向这里剩下的最后一座亚美尼亚城市尼西比斯。众王之王从提格累诺塞塔城前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他让这座城市听任命运的安排；尽管尼西比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仍旧在一个阴晦的雨夜被围困者攻陷，卢库鲁斯的军队在这座城市中找到了丰富的战利品和舒适的冬季营地，毫不逊于前一年在提格累诺塞塔。不过在这期间敌方的主要进攻力量已经扑向留在本都斯和亚美尼亚的

弱小的罗马军团。在亚美尼亚，提格累尼斯迫使罗马的指挥官卢西乌斯·方尼乌斯——他原先是米特拉达梯斯和塞多利乌斯之间的联络人——逃入一座要塞，并将他围困在城中。在本都斯，米特拉达梯斯率领四千名亚美尼亚人和四千名自己的骑兵进入自己的国土，他作为解放者和复仇者号召他的民族起来反抗国家的敌人。一切都重又落入他的手中；四散奔逃的罗马士兵被到处追捕和杀戮。当驻扎在本都斯的罗马指挥官哈得良奴斯率部迎击本都斯国王时，他的军队中有原属本都斯国王的雇佣兵和众多作为奴隶随军的本都斯人与罗马的敌人沆瀣一气。这场力量悬殊的交战持续了两天，本都斯国王在交战中受了两处伤，不得不从战场上抬下去，只是这一事件才使罗马指挥官有可能中止这场已经完全失败的战役，率领一小群残余的士兵逃往卡比拉。另一位卢库鲁斯的部将坚定的特里阿利乌斯偶然来到这一地区，他又重新聚拢起一支部队，并与本都斯国王进行了一次幸运的交锋，但是他过于弱小，无力将米特拉达梯斯从本都斯的土地上逐走，所以不得不听任本都斯国王在科马那安扎下他的冬季营地。

就这样迎来了687年的春季。罗马军队在尼西比斯会合，享受着冬季驻营的闲暇。在此期间统帅卢库鲁斯经常外出不在，这一切更加剧了部队的桀骜不驯。他们不仅激烈要求统帅带领他们回乡，而且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如果统帅拒绝率领他们回乡，他们将自己启程开拔。由于贮备短缺，方尼乌斯和特里阿利乌斯处境艰难，他们极其急切地向最高统帅发出请求，请他迅速给予援助。卢库鲁斯心情沉重地做出决定，服从必然的抉择，放弃尼西比斯和提格累诺塞塔，放弃所有远征亚美尼亚的辉煌希望，回到幼发拉底河的右岸。方尼乌斯得到了解救，但是援救本都斯已经为时过晚。特里阿利乌斯的力量不足以与米特拉达梯斯交锋，他在加齐乌拉（托卡特以西伊利斯河畔的土耳克萨尔）附近占据了一个稳固的阵地，同时将辎重留在达达萨。当米特拉达梯斯围困达达萨时，罗马士兵

们担心自己的家当，他们迫使自己的首领放弃安全的阵地，在加齐乌拉和齐拉(齐勒)之间的斯科特高地与本都斯国王决一胜负。特里阿利乌斯预见到的事情果然发生：尽管罗马军队进行了极其顽强的反击，但是本都斯国王亲自率领的一翼冲破了罗马的阵线，将罗马步兵挤入一条粘土的山谷，在山谷中罗马士兵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向两侧移动，遭到了无情的杀戮。虽然一名罗马百夫长使本都斯国王受了致命之伤，并且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并未能够借此挽救彻底的失败。罗马的军营被占领，罗马步兵的核心，几乎所有的军官与士官铺满了交战之地；他们的尸体无人埋葬，静静地躺在战场上。当卢库鲁斯抵达幼发拉底河右岸的时候，他不是从他的步卒，而是从当地人的叙述中获知这一失败。随着这一失败接踵而至的是军中密谋的爆发。正在这时，从罗马传来消息，民众已经做出决定，允许法定服役期已满的士兵，即芬布利亚的士兵辞别归乡，并且委派一位当年的执政官执掌俾泰尼亚和本都斯的最高指挥权；卢库鲁斯的继任者、执政官马尼乌斯·阿齐利乌斯·格拉布里俄已经抵达小亚细亚。最勇敢和最不稳定的军团即将告别，最高统帅也将被召回，加之对齐拉之败的印象，在罗马军队中所有的权威都已经无法再约束士兵们，而此时却正值统帅最迫切地需要这些约束力。在亚美尼亚的塔劳拉，他正面对本都斯的军队。在提格累尼斯的女婿、米提阿的米特拉达梯斯的率领下，这支本都斯军队已经与罗马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骑兵战，众王之王的主力亦正从亚美尼亚开往这一方向。卢库鲁斯派遣使者去向新的西里西亚总督昆图斯·马西乌斯请求援助，这位总督率领着三个军团，正在前往他的行省的途中，刚好到达吕卡欧尼亚，但是这位总督声明，他的士兵拒绝前往亚美尼亚。卢库鲁斯派使者去格拉布里俄处，请他接过民众委付给他的最高指挥权，但是格拉布里俄对接受这一任务更是毫无兴趣，这一任务现在已经变得如此艰难和危险。卢库鲁斯不得不继续执掌最高指挥权，为了不至于在塔劳拉附近被迫同

时与亚美尼亚人和本都斯人作战，他命令军队开拔，前去迎击渐渐接近的亚美尼亚军队。士兵们听从了进军的命令，但是当他们到达分别通向亚美尼亚和卡巴多西亚的岔路口时，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选择了通向卡巴多西亚的道路，由此前往亚细亚行省。在亚细亚行省，芬布利亚的士兵们要求立即辞别。虽然在最高统帅和其余军团的恳求下他们未曾离开，但是他们坚持如果冬季来临时还未遇到一个敌人，他们就将散去。后来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米特拉达梯斯不仅重新占领了几乎整个本都斯王国，而且还指挥他的骑兵横卷整个卡巴多西亚，直至俾泰尼亚。阿里俄巴赞尼斯国王徒劳地向昆图斯·马西乌斯、卢库鲁斯和格拉布里俄请求援助。这场战争曾以如此荣耀的方式进行，可是却得到一种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罕见结局。如果仅仅关注战绩，几乎从未有一位罗马将军像卢库鲁斯一样，以如此微小的力量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苏拉的才干和幸运仿佛遗传和影响到他的这个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罗马军队不损一兵一卒地从亚美尼亚撤回小亚细亚，这是一个军事奇迹；按照我们的判断，这一奇迹远远超过了色诺芬的撤退，显然它主要应归功于罗马战争机制的坚实稳固和东方战争机制的无能，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奇迹使这次撤军的指挥官在第一流军事家的行列中稳居光耀的一席之地。假若说卢库鲁斯的名字通常未出现于这一行列之中，那么从一切迹象来看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关于卢库鲁斯的远征没有任何军事上哪怕是比较像样的报道流传下来，另一方面在所有领域，尤其是在战争领域中，最重要的只是最终的结局，而这次远征的结局恰恰是一次完全的失败。最后发生的不幸转折，尤其是士兵的哗变，使得八年战争的所有成就重又丧失殆尽；687 年—688 年冬季，罗马人重又回到 679 年—680 年曾呆过的地方。

对海盗的海战与对本都斯和亚美尼亚的陆战同时开始，两场战争始终极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海战的结局并不比陆战更出色。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元老院于 680 年做出明智的决定，委任行政官

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为唯一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海军统帅，由他负责将海盗从海上彻底清除。可是罗马一开始就在选择首领时做了完全错误的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措施本身虽很合理，但是这一措施的实施者未曾考虑到，在元老院中所有人事问题的决定都取决于塞提古斯的影响和与此相似的团伙利益。此外，这位被挑选出来的海军统帅面临着如此广泛的任务，而元老院却疏忽大意，未曾以与这一任务相称的方式给他配备金钱和船只，迫使他不得不大规模征收钱款和征用船只，结果给友好的行省带来了不亚于海盗的麻烦。他取得的战果正与此相应。在坎帕尼亚水域，安东尼乌斯的舰队俘获了一批海盗船只。在这一时期，克里特人与海盗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建立了同盟。当安东尼乌斯要求他们中止与海盗的合作时，遭到了生硬的拒绝，于是安东尼乌斯与克里特人交战。安东尼乌斯事先在船中备好锁链，准备用它捆绑被俘的海盗，但是克里特人的统帅拉斯提尼斯和帕那里斯在岛屿附近与罗马人展开海战，并且大获全胜。在返回西顿尼亚时，这些锁链却用于将财政官（原文如此——译者注）和其他罗马俘虏绑到被缴罗马船只的桅杆之上。安东尼乌斯在轻率大意的作战中耗费了无数钱财，最终一无所成，于683年死于克里特岛。安东尼乌斯之死事实上结束了这一征伐海盗的行动。在此之后，部分地由于这次征伐的惨败，部分地由于建造船队费用昂贵，亦部分地由于寡头统治不愿任何官吏权限过大，因此不再任命海军最高统帅，而是退回到原有的方式，让每位总督在行省中自行处理镇压海盗的事宜。比如卢库鲁斯曾建立舰队，在爱琴海中执行这一任务。只是在如何对待克里特人的事情上，连这一辈衰落的罗马人都认为只有以宣战来回答在西顿尼亚遭受到的那种耻辱。可是当克里特的使节于684年来到罗马，请求放回俘虏和重结旧盟时，他们几乎捞到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元老院决议。整个团体称之为耻辱的东西，每位元老却乐意拿它卖个悦耳的价钱。直到一项元老院的正式决议使克里特的使节能够

毫无困难地向罗马银行家借贷，也就是说在元老院自己认识到不可能拿到贿赂之后，一项法令才得以通过。根据这一法令，克里特城镇除了需向罗马人交出罗马的投诚者之外，还需交出西顿尼亚暴行的肇事者，克里特人的首领拉斯提尼斯和帕那里斯，听任罗马人给予恰当的惩罚，此外还要交出四排桨以上的所有大小船只，提供四百名人质，支付4000塔连特（合600万塔勒）的赔偿费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避免战争。当使节表示他们无权赞允这些条件时，第二年的执政官之一被指定在任职期满之后前往克里特岛，或是从那里得到所要求的一切，或是开战。根据这一命令685年前执政官昆图斯·麦特鲁斯出现在克里特水域。克里特岛上的城镇，尤其是哥尔提纳、诺苏斯、西顿尼亚这些较大的城市态度坚定，它们宁愿以武器自卫，亦不愿屈从这一过分的要求。克里特人是一个恶名昭著、习俗败坏的部族，海盗与他们的公众和私人生活内在地生长在一起，如同强盗与埃托利亚人城邦的关系一样。但是，正如他们在许多方面与埃托利亚人相似，在勇敢方面亦是如此，而且这两个希腊城镇也是仅有的两个勇敢光荣地为独立而战的城镇。在麦特鲁斯率领三个军团登陆的西顿尼亚附近，拉斯提尼斯和帕那里斯率领着一支两万四千人的克里特军队正严阵以待，在开阔的原野上双方展开了一场交锋，经过艰难的争夺之后，胜利落入罗马人之手。但是各座城市仍在城墙后面抗拒着罗马的统帅，麦特鲁斯不得不做出决定，将这些城市一座接一座地围困起来。最先被围困的是克里特败军残余遁入的西顿尼亚，经过长期的围困之后，帕那里斯在得到安全撤离的允诺的条件下自行放弃了这座城市。拉斯提尼斯从城中逃出后，又在诺苏斯遭到第二次围困，当这座要塞也即将陷落时，他毁去他的财宝，再一次溜向其他地区；在其他地区，比如吕克图斯、埃琉特尔纳和其他城市抵抗依旧在继续着。过了两年（686年—687年）之后，麦特鲁斯才成为整个岛屿的主人，至此自由希腊的最后一块土地亦落入强大的罗马人的控制之中。克里特

岛的城镇是希腊诸城镇中最早施行自由城邦制度和最早发展起海上力量的，在所有曾布满地中海的希腊航海国家中，它们也是最后一批屈服于罗马的大陆强权的。——所有的法律条件皆已完备，又可以举行一次场面宏大的凯旋仪式、麦特鲁斯家族可以以同样的权利在他们的马其顿、努米底亚、达尔马西亚和巴利阿里的头衔之外再加上克里特的新头衔，罗马又多了一个值得自豪的名字。尽管如此，形势依旧未曾有所变化和改善，罗马人在地中海的力量从未像这些年这样低落，海盗的力量从未像这些年这样高涨。这一时期在海上的西里西亚人和克里特人据称已拥有近千艘船只，他们显然可以嘲笑伊沙利亚人和克里特人及其微不足道的胜利。海盗如何深深地卷入米特拉达梯斯战争，本都斯海滨城市在顽强抵抗中如何吸引来自海盗之国的力量，并且以之构成核心，这一切已在前文中述及。与此同时，海盗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做出了毫不逊色的成就。685 年海盗阿特诺多洛斯几乎是在卢库鲁斯的舰队的眼皮底下袭击了提洛斯岛，摧毁了备受赞颂的圣迹和神庙，掳走了所有的公民，使他们全都沦为奴隶。西西里岛附近的里帕拉岛每年向海盗交纳一笔固定的贡金，以免遭到相似的袭击。另一个海盗船长赫拉克勒翁于 682 年摧毁了一支泊在西西里岛的罗马舰队，这支舰队是为了对付他而装备起来的，而且他大胆地率领四艘非武装船只驶入叙拉古斯港。两年之后，他的同行比尔加尼翁甚至在这个港口登陆，并且在此驻扎。他从这里派出巡逻队进入岛内，直至罗马总督迫使他重新登船离开。最后人们渐渐地变得习以为常，所有的行省都自己装备舰队和设立海滨防卫，或者为这两项措施征税，同时海盗却仍旧经常出现，像罗马总督一样洗掠各个行省。这些无耻的恶人现在连意大利的圣土也不复尊敬：他们从位于克罗吞的拉西尼翁地角的赫拉神庙掠走了神庙的财宝；他们在勃隆度辛、米塞浓、卡依大、埃特鲁利亚的港口，甚至在奥斯提亚登陆；他们掳走极其显贵的罗马军官作为俘虏，其中包括西里西亚军队的舰队首领

和两位行政官及其全部随从，连同那令人畏惧的斧杖和象征其尊严的所有标志；他们从米塞浓附近的一座别墅中拐走了奉命剿灭海盗的海军统帅安东尼乌斯的亲姐妹；他们在奥斯提亚港歼灭了一支由一位执政官指挥的罗马作战舰队，这支舰队原本是为了对付海盗而装备的。拉丁农民、阿庇乌斯大道上的旅行者，在巴耶这个人间天堂的显贵浴客从此以后没有一刻不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担忧。所有的贸易和交通都停顿下来，最可怕的涨价之潮笼罩着意大利，尤其是依赖于海外粮食的都城。同时代者与后来的历史都曾不吝言辞地抱怨某种难以忍受的危急状态，以这一称呼来形容此时的意大利也许是恰如其分的。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苏拉重建的元老院是如何守卫马其顿的边界，如何为小亚细亚诸属国的国王们制定秩序，如何最终在海上运用警察力量。任何一方面的后果都无法令人感到愉悦。政府在另一项或许是更为紧迫的事件中亦未取得更好的成果，即监管各个行省的无产者，其中尤其是意大利的无产者。奴隶无产者这一癌肿咬啮着每个古代国家的脊髓，一个国家越是繁荣强大，这一咬啮就越是厉害，因为在现存的条件下，国家的强大和富裕总是不断地导致奴隶数目的非比例增长。由于这一原因，罗马自然比其他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更严重地遭受着这一痛苦。早在六世纪，罗马政府就不得不派兵追剿由来自牧场与农田的逃亡奴隶组成的团伙。在意大利的投机者中，种植园经济日益蔓延，这种现象使得奴隶数目不断增长，这一危险的弊端达到无限的极点。在格拉古斯和马利乌斯危机时期，罗马各地发生了与这两次危机密切相关的奴隶起义，在西西里岛这类起义甚至发展成两场浴血之战（619 年—622 年和 652 年—654 年）。苏拉去世之后由复辟势力统治的这十年不仅对海上的海盗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而且对陆上与海盗相似的团伙亦是如此，尤其是在迄今为止尚且治理得较好的意大利半岛。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毫无安宁可言。在意大利的都城和居民

较少的地区天天都有抢劫，时常发生谋杀。为了制止抢劫他人的奴隶和自由人——或许是在这一时期——颁布了一项民众制定的特别决议；为了制止以暴力掠夺地产，在这个时期前后第一次实施了一项涵括式的特有起诉种类。这些罪行虽然通常是无产者所为，但是显贵阶层作为道德上的肇源者和赢利上的参与者亦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同谋者的作用，因此这些罪行就显得特别危险。尤其是抢掠人口和耕地的罪行，它们常常是在一些大庄园总管的唆使下，由集中在庄园里的奴隶团伙来实施的。这些团伙往往是全副武装，甚至连某些威望极高的人也毫不鄙弃。由他的某个勤于事务的奴隶总管以这种方式为他捞取的田产与奴隶，恰如靡非斯特为浮士德获取菲勒蒙的菩提树。当时的状况可以由下述事实看出，即对武装团伙抢劫财产的罪行实行了更加严厉的处罚。这项处罚措施是由一位比较正直的元老马尔库斯·卢库鲁斯于676年前后颁布的[①]，当时他是都城的司法官员，这项措施具有明确的意图，即督促拥有大批奴隶的拥有者更加着力地监管奴隶，否则将面临被剥夺所有奴隶的危险。当奴隶和无产者们受显贵阶层之命去掠夺和谋杀时，他们很容易产生一个念头，为自己去干相似的勾当。只需有一点火星，就能够将这可怕的干柴变成熊熊烈焰，将无产者变成一支暴动的大军。导火索很快就出现了。——此时角斗士竞技在意大利的大众娱乐中已经占据了首要位置，这一现象促使人们建起许多设施，尤其是在卡普亚及其周围地区。在这些设施中，一些奴隶一方面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也得到训练，他们被指定以相互残杀来供自由大众消遣——当然其中大部分是勇敢的战俘，他们未曾忘记在战场上与罗马人兵刃相见。这些绝望者中有一批人冲出一座卡普亚的角斗士学校（681年），奔向维苏威火山。他们的首领是两位凯

① 从这些规定中，抢劫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罪行概念，较早的法律则将抢劫列入盗窃罪之中。

尔特人，他们的奴隶名字分别叫作克利克苏斯和恩诺马斯，还有一位首领是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斯巴达克斯或许是高贵的斯巴托库斯家族的后裔，这一家族在他的故乡色雷斯以及蓬提卡彼翁甚至曾享受过国王的荣耀。斯巴达克斯曾在罗马军中的色雷斯后备部队里服役，后来逃人山中成为强盗。在山中他被再一次捉获，并被派定进行竞技角斗。这一小群角斗士最初只有七十四人，但是很快便由于周围地区众人争相投奔而迅速壮大，他们的侵袭很快就使富裕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居民感到麻烦，这些居民起初试图自行抵抗，但是劳而无功，于是向罗马发出镇压这些角斗士的请求。一支三千人的分队迅速召集起来，在克劳狄乌斯·格拉伯的率领下出现在这里，他们占据了通向维苏威火山的上山之路，以求饿死这群奴隶。但是强盗们虽然人数微少，武器简陋，却大胆地从陡峭的山壁攀援而下，袭击罗马人的岗哨。当那些可怜的后备军士兵看到这一小群绝望者出其不意地向他们扑来时，他们立即拔腿就跑，四散而逃。第一次胜利使强盗们得到了武器，亦引来了更多的投奔者。虽然当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旧只拿着削尖的棍棒，但是当更强大的新的后备军分队、行政官普布利乌斯·法利尼乌斯率领的两个军团从罗马开到坎帕尼亚时，他们看到在平原上等候着他们的敌手几乎如一支作战的军队。法利尼乌斯处境艰难。他的后备军士兵不得不与敌人对峙，露天宿营，潮湿的秋季气候以及由此产生的疾病严重地折磨着他们。比瘟疫更恶劣的是，胆怯恐惧和桀骜不驯使士兵队伍日益稀疏。刚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的一支分队就四散而去，逃散者不是回到主力军团，而是直接逃回各自家中。当他下令攻击敌方的防御阵势时，军中的绝大多数人拒绝服从这一命令。尽管如此，法利尼乌斯仍旧率领余下经受住考验的士兵向强盗团伙进攻，但是他在强盗们原先呆的地方没有找到他们。强盗们已经悄然无声地暗暗动身，向南转向匹塞齐亚（阿马尔非附近的维琴察），法利尼乌斯虽然在那里追上他们，但是无法阻止他们退过西

拉鲁斯河，进入卢坎尼亚的纵深之地，这里是牧人和强盗的天堂。法尼利乌斯追踪他们来到卢坎尼亚，在这里，遭到蔑视的敌人终于摆队迎战。开战时所有的情形都对罗马人不利，士兵们虽然不久前还激烈地请战，但是打得依旧不尽如人意。法利尼乌斯被彻底击败，他的马匹和象征其职位荣耀的物品连同罗马军营全都落入敌人之手。意大利南部的奴隶，尤其是半野蛮的剽悍牧人成群成批地拥到这位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眼前的拯救者的旗帜之下。根据估计适中的报告，武装暴动者的人数升至四万人。刚刚扫清强盗的坎帕尼亚很快又被占领，法利尼乌斯的财政官盖尤斯·托拉尼乌斯率领的留在坎帕尼亚的罗马军团亦被击溃和歼灭。在意大利的整个南部和西南部，毫无设防的地区都落入获胜的强盗首领们的手中，甚至连一些著名的城市，如布鲁提乌姆地区的康孙提亚，卢坎尼亚的图立伊和麦达蓬图，坎帕尼亚的诺拉和努塞里亚，亦都被他们攻占，并遭到蹂躏。获胜的野蛮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摆脱了束缚的奴隶对他们原来的主人竭其所能施以一切暴行。遗憾的是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像这样一场战争毫无法律秩序可言，它更多地是一场屠杀，而不是一场战争：主人们按照律法将每一个捉到的奴隶钉上十字架；奴隶们自然也杀掉他们的俘虏，或者进行更具讥讽意义的报复，他们迫使作战被俘的罗马人在竞技角斗中相互杀戮。后来在为一个阵亡的强盗首领举行的葬礼上，三百名罗马人被迫相互搏杀。罗马有理由为这场日益蔓延的毁灭性大火感到担忧。元老院做出决定，于第二年(682 年)派遣两位执政官去对付可怕的强盗团伙头领。执政官卢西乌斯·基利乌斯的部将，行政官昆图斯·阿里乌斯确实成功地在阿普利亚的加尔加奴斯山区截住凯尔特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在克利克苏斯的率领下从强盗武装的主力中分离出来，独自洗掠城镇，昆图斯·阿里乌斯将这支队伍全部消灭。然而斯巴达克斯却在亚平宁山中和意大利北部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误以为围住和将擒住强盗的执政官盖奈乌斯·林都鲁斯，然

后是他的同事基利乌斯和刚刚大获全胜的行政官阿里乌斯，最后在穆提那再加上内高卢的总督盖尤斯·卡西乌斯(681 年执政官)和行政官盖奈乌斯·曼利乌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斯巴达克斯的打击。几乎毫无武装的奴隶之众成为罗马军团畏惧的对象，一连串的失败令人忆起汉尼拔战争的开始时期。如果不是逃跑的角斗士奴隶，而是来自奥弗涅地区或巴尔干山区的部族国王率领这群常胜的暴动者，结局如何将很难逆料，正像以往的暴动一样，这场暴动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仍旧是一场强盗的暴动，它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身的分歧和毫无目的，而不是源于对手的强大。在早期的西西里奴隶战争中，反对共同敌人的一致性极其显著，然而在意大利奴隶战争中这种一致性却荡然无存。这一现象的原因显然是由于共同的叙利亚—希腊文化传统，西西里奴隶具有一个宛如民族性一样的统一基点，而意大利的奴隶却分成希腊未开化部族和凯尔特—日耳曼部族两个部分。凯尔特人克利克苏斯和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恩诺马斯在最初的一场交战中就已阵亡)之间的分裂和类似的争吵，使暴动者未能及时利用所取得的成就，反而让罗马人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不过比凯尔特—日耳曼人的桀骜不驯有害得多的是缺乏一个固定的计划和目标。根据我们对斯巴达克斯这位非凡者的寥寥无几的了解，他在这方面显然远远超出他的派别。除了战略才能之外，他还显露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组织才干，同时他具备了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公正。他公正地统率他的队伍和分配战利品，这种公正至少像他的勇敢一样将众人的目光吸引到他的身上。为了消除在骑兵和武器方面的敏感缺陷，他试图用在意大利掠获的马群训练出一支骑兵部队，使之具有纪律性。当图立伊港落入他的手中后，他又试图从那里为自己弄来铁与铜的原料，在这方面他无疑借助于海盗的帮助。但是在重要事件上，他也无法引导他率领的犷悍之徒奔向固定的终极目标。他十分希望能阻止强盗们在被占城市中粗野地放纵狂饮。没有任何意大利城市

愿意与暴动者协力合作，这些行为是主要原因，但是随着胜利的取得，这位强盗首领在作战中见到的顺从已从部下的身上消失了，他的劝戒与请求完全是白费唇舌。682年在亚平宁山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之后，对这支奴隶军队来说，通向四方的道路都已畅通无阻。据说斯巴达克斯本人的意图是翻过阿尔卑斯山，以便自己和部下们回到凯尔特或色雷斯的故乡。如果这一记述确有其事，那么它显示出这位胜利者并未高估自己的成就与力量。因为整个队伍拒绝如此迅速地离开富裕的意大利，斯巴达克斯选择了通向罗马之路，据说他的想法是围困都城。这一行动的开端虽然颇显绝望，但是不乏计划性。可是这群暴动者对这一开端也不感兴趣，他们迫使他们的首领依旧做强盗头领，而不是如他所愿地去充当统帅，他们迫使他继续率领队伍在意大利四处劫掠。罗马可以为此而暗自庆幸，但是即使如此也难以觅到一个好主意来对付这场暴动。罗马缺乏熟练的兵士和久经沙场的统帅。昆图斯·麦特鲁斯和盖奈乌斯·庞培在西班牙，马尔库斯·卢库鲁斯在色雷斯，卢西乌斯·卢库鲁斯在小亚细亚，可供调遣的只有手脚生疏的后备军士兵和至多也只是才干平平的军官。于是行政官马尔库斯·克拉苏斯被赋予非同常规的最高指挥权，这一指挥权以意大利为范围，克拉苏斯虽然并不是著名的统帅，但是他曾在苏拉麾下光荣地战斗过，他至少具有坚强的性格。在赋予他权力的同时，还将一支达八个军团之众的军队交给他指挥，这支军队虽然在质量上无甚突出，但是在数量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新上任的最高统帅就将面对强盗扔掉武器逃跑的第一个支队，按照极其严酷的作战法规予以处理，他从每十人中抽出一人处以死刑。自此之后各个军团确实重又稍有振作。斯巴达克斯在随后的一场交锋中遭到失败，于是他向后撤退，试图经卢坎尼亚前往雷吉翁。在这一时期，海盗不仅控制着西西里水域，而且连叙拉古斯港也控制在他们手中。斯巴达克斯想借助海盗的船只将一个军团运到西西里，那里的奴隶只是等待着最初的火

星，一有机会马上就会第三次起来暴动。斯巴达克斯成功地抵达雷吉翁，但是海盗们或许是畏惧行政官盖尤斯·维勒斯在西西里岛设置的海滨守卫，或许是为罗马人所收买，他们从斯巴达克斯手中收取了议定的报酬，却没有为此向他提供相应的酬答。在此期间，克拉苏斯追踪强盗军队直至克拉提斯河口，后来由于兵士们不愿像他们所应做的那样进攻敌人，克拉苏斯便如西庇阿在努曼齐亚城前所做的一样，让兵士们修造一条宛如要塞的防御墙，全长七德里。这道墙将布鲁提乌姆半岛与意大利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阻断从雷吉翁掉转头来的暴动军队的去路，并且切断他们的补给线。但是在一个黑暗的冬夜，斯巴达克斯冲破敌方的阵地，683 年[①] 春他重又出现在卢坎尼亚。这项艰巨的工程结果是徒劳无功。克拉苏斯开始对能否完成使命感到绝望，他请求元老院征召在马其顿由马尔库斯·卢库鲁斯和在近西班牙由盖奈乌斯·庞培指挥的两支罗马军队，让他们回到意大利来支援他。但是其实并不需要这一极端的紧急步骤，强盗队伍中的不和与狂傲就足以使他们的所有成就重又归于虚无。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又一次脱离了以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为首脑和灵魂的同盟，在他们自己民族的首领加尼库斯和卡斯图斯的率领下，他们独自落入罗马人的刀斧之下。有一次在卢坎尼亚湖边，斯巴达克斯的及时出现挽救了他们。他们虽然在斯巴达克斯的近旁扎下营寨，但是克拉苏斯依旧成功地以骑兵牵制住斯巴达克斯，同时包围了凯尔特人的队伍，迫使他们与自己进行单独的交锋。在这次战斗中，所有的凯尔特人，据称有一万两千三百人，全部英勇战死，所有的人都倒在战场之上，伤口都在身前。斯巴达克斯试图率领他的队伍撤进佩特里亚（在卡拉布里亚地区的斯特隆戈里附近）周围的山区，在撤退中他给予追击撤退者的罗

① 克拉苏斯在 682 年（公元前 72 年）就担任了最高指挥官，这可以从两位执政官被击败之事推导出来；两支军队于 682 年—683 年冬季在布鲁提乌姆墙边度过，这一点可以从“雪夜”的描述中推导出来。

马先头部队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胜利给战胜者带来的不幸比给战败者带来的更大。强盗们为这一胜利所陶醉，拒绝继续撤退。他们迫使他们的统帅带领他们经卢坎尼亚前往阿普利亚，去迎接最后的决战。在交战之前，斯巴达克斯刺倒了他的战马，他始终与他的部下坚守在一起，忠诚地与他们同甘共苦。现在他以这一举动向他的部下们表明，在这场战斗中他与所有的人一样，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交战中他同样以狮子般的勇敢向前拼杀：两名百夫长死在他的手中；在受伤之后他跪倒在地，却依然举矛刺向拥来的敌人。就这样这位伟大的强盗首领及其最出色的伙伴像一个自由人和忠诚的士兵一样战死（683 年）。在获得这场价代昂贵的胜利之后，获胜的部队和战胜塞多利乌斯之后从西班牙赶来的庞培的部队，在整个阿普利亚和卢坎尼亚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肆搜捕，以扑熄这场熊熊烈焰的最后一颗火星。虽然真正的和平尚未在意大利南部出现，例如 683 年小城坦普萨为一群强盗所占，同时在深受苏拉的没收充公政策之害的埃特鲁利亚也毫无和平的踪影，但是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和平已经在意大利得到了恢复。至少罗马人又重新夺回了曾经耻辱地丢掉的鹰标，这是罗马军团的标志——仅仅在战胜凯尔特人之后罗马人就夺回了五个这样的标志。沿着从卡普亚通向罗马的道路，竖起了六千个钉着被俘奴隶的十字架，它们证实着重新恢复的秩序，证实着公认的法律对活生生的反叛个体的又一次胜利。

让我们回顾一番苏拉复辟后的十年内所发生的事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国内外的风云变幻中，没有一件是就其自身而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以致不可避免地触及民族的命脉。这种危险既未曾出现于雷必杜斯暴动，亦未曾出现于西班牙流亡者的活动；既未见于色雷斯—马其顿战争和小亚细亚战争，亦未见于海盗与奴隶起义。尽管如此，在所有的战斗中罗马国家却似乎总是在做生死之搏。这是由于当某项任务能够轻松地加以解决时，几乎总是听任这

一任务悬而未决;忽视最简单的防范措施而造成了最可怕的弊端和不幸,它使得附属的阶层和软弱的国王成为与罗马旗鼓相当的对手。虽然罗马政府战胜了民主以及奴隶暴动,但是像这样的胜利既无法使战胜者从内心中得到提高,亦无法使之在外部得到加强。两位属于政府一方的备受称颂的将军在一场长达八年的征战之中败多胜少,未能制服暴动者首领塞多利乌斯及其西班牙的游击武装组织,直到塞多利乌斯的朋友们谋杀了塞多利乌斯,才使塞多利乌斯战争发生了有利于合法政府的决定性变化,这对政府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荣耀的事情。战胜奴隶们更远远不是什么荣耀,而更多地是一种耻辱。因为罗马人在长达数年的征战中竟与他们相互对峙,彼此难分高低。自汉尼拔战争以来过去了不到百年的时光,如果想想自那个伟大的时代以来,罗马民族迅速得可怕的衰退,正直的罗马人一定会感到脸庞发烧。那时意大利的奴隶们像一堵坚墙一样抗御着汉尼拔的老兵们,而现在面对逃亡奴隶们的棍棒,意大利的后备军像谷壳一样闻风而去,四散奔逃。那时在紧急的情况下,每位普通的上校(原文如此——译者注)都承担起统帅的职责,他们虽然常常未能得到幸运的眷顾,但是仍旧光荣地奋勇作战,而现在于所有显贵的军官中亦难找出一位具有寻常之才的首领。那时政府宁愿让最后一位农民放下手中的犁铧,也不愿放弃占领希腊和西班牙。而现在罗马政府却准备重新放弃两块早已拥有的土地,究其原因,只是为了能够在家中抵御起义的奴仆。斯巴达克斯像汉尼拔一样,率领他的武装从波河直至西西里海峡,横扫整个意大利,击败两位执政官,使罗马面临被围困的威胁;对付过去的罗马曾需要古代最伟大的统帅,而对付现在的罗马却只需一个大胆的强盗首领就能做到。这些镇压暴动者和强盗首领而取得的胜利并未使新的生命力得以萌发,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对外战争揭示出一个更加令人不快的结论。色雷斯—马其顿战争虽然并未取得和昂贵的人力与田地消耗相称的结果,但是这一结果并非

完全不利。与此相反，在小亚细亚战争和海盗战争中政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前者的结局是失去了八年浴血征战所占领的所有土地，后者则以罗马人被彻底逐出“他们的海洋”而告终。曾几何时，罗马对自己的不可战胜的陆军充满信心，并且将这一不可战胜的优势扩展到第二元素——水之上。而现在这个强大的国家在海上已经软弱无力，而且看来正在失去它的统治权，至少是对亚洲大陆的统治权。对在罗马国家中融为一体的所有民族来说，罗马国家的存在原本给它们带来物质性的利益：边境的稳定、毫无干扰的和平交往、法律的保护和井然有序的管理，这一切现在都已开始消失。降福于罗马的众神似乎都已回到奥林普斯山，听任这片痛苦的土地遭受委以职务或自告奋勇的劫掠者或蹂躏者的支配。那些拥有政治权利和公民意识的人已经感觉到国家的衰落，并且将这一衰落视为一种公众的不幸。无产者的暴动和令人忆起那不勒斯的腓迪南德时代的强盗与海盗之乱，将这一衰落的感觉带到意大利最偏僻的山谷和最低陋的窝棚，使每一个往来经商的人，每一个只购买一舍菲尔粮食的人都感到这一衰落，并且感到这一衰落便意味着他们自己亦面临着危困之境。——如果要追究是谁造成了这一不可救治的空前苦痛，在此不难证据确凿地指责许多人。一心想着钱袋的奴隶主、桀骜不驯的兵士，时而胆怯、时而无能、时而蛮勇的将军们，常常蛊惑大众走向错误极端的集市煽动家，这些人都负有罪责。或者更进一步来探究，谁未曾参与这一罪责？直觉告诉我们，这一痛苦，这一耻辱，这一堕落过于巨大，它不可能是某个单个人的大作。正如罗马国家的伟大不是某个杰出个人的创造，而是一个能干地组织起来的公民整体的创造。同样，这一庞大建筑的衰落也不是由于某个单个人的破坏性天才，而是由于普遍的组织崩溃。公民整体中的绝大多数一无所能，每一块朽坏的砖石都在朽腐，它们共同导致整座大厦沦为一片废墟，整个民族都负有罪责的事情将使整个民族付出代价。如果因为政府是国家可触可感的最终象征，

就让它为国家的所有顽疾，无论是可治愈和不可治愈的，都承担责任，这是不公正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政府已深深地卷入到这一普遍的罪责之中。比如在小亚细亚战争中，没有任何一位居于指挥地位的先生出现明显的失误，卢库鲁斯甚至做出了颇具才干或者说极其辉煌的表现，至少在军事方面是这样。在这种情形下就显得更加明显，失败的罪责在于体制和政府本身。在这一事例中，罪责主要在于起初懈怠地放弃了卡巴多西亚和叙利亚，亦在于有才干的统帅与无力决断的政府全体成员之间的扭曲关系。在海上警察一事中亦是如此，元老院曾经制订出正确的计划，全面逐击海盗，这一计划直至付诸实施时才遭到破坏，后来被完全放弃，于是元老院又根据愚蠢的古老体制派军团去制服海上的烈马。按照这一体制，塞维利乌斯和马西乌斯远征西里西亚，麦特鲁斯远征克里特；按照这一体制特里阿利乌斯用一道墙将提洛斯岛环绕起来，以抵御海盗的侵袭。罗马以这些尝试来保证自己的海上霸权，这使人忆起那位波斯大帝，他令人鞭笞大海，使之臣服于自己。罗马民族显然有充足的理由将他们的败落首先归罪于政府。每次重建寡头统治之后，总是出现一种相似的无能之治，在推翻格拉古斯、推翻马利乌斯和萨图尼乌斯之后皆是如此。但是像这次寡头政治这样强暴，同时又这样懈怠、这样腐败和危险，还是从未有过的。如果一个政府无力进行统治，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任何人只要有力量，就有权利推翻这一政府。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一个软弱无能和罪行累累的政府确实能够长期地践踏国家的幸福和荣耀，直至有人能够和打算挥起由这个政府自己铸造的可怕武器，奋起反抗这一政府，并以有才干者的道德愤怒和大多数人的危困处境为契机，唤起合法的革命。如果说以各民族的幸福为对象的游戏，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且它显然能够不受干扰地长期进行下去，那么它也是一场阴险的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在进行的同时亦吞噬着游戏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人将斧子向挂满这类果实的

树根砍去，没有人会谴责这柄斧子。对罗马寡头统治来说这一时刻已经来临。本都斯--亚美尼亚战争和海盗之乱是最切近的原因，它们将导致苏拉体制被推翻和革命性军事专制统治的产生。

第 三 章

寡头政治的垮台和庞培的统治

苏拉创立的宪法的地位依然牢不可破,此外,还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雷必杜斯和塞多利乌斯胆敢发起的进攻。然而,政府却没有借创始人强大的精神力量,一鼓作气地完成这一未完成的伟大业绩。具体表现在:政府既没有分割苏拉决定分割的土地,也没有放弃对这些土地的领土要求;没有整顿土地的所有权,而是未加整顿地容忍从前的土地所有者继续占有土地,政府甚至按照古老的、格拉古斯改革已经从法律和事实上废除了的占有制度,让某些个人随意占有尚未划分的苏拉留下的国有土地。政府毫无顾忌地对苏拉统治时期让元老们感到无所谓或不舒服的各种条例,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则宣布规定无效。比如,苏拉取消的整个城镇的国家公民权;又比如,苏拉禁止毁坏新耕地的禁令;又如某些由苏拉颁布的给各个城镇的农奴的释放令。当然,政府不会把这些地区缴纳的赦免费退还给他们。然而,不管政府本身如何违背苏拉的规定来动摇其大厦的根基,但是塞姆普罗尼乌斯法从根本上已被废除。

当然,打算重振格拉古斯法制的也大有人在,而且还见诸于方案,按照法律改革的方式逐步实施了雷必杜斯和塞多利乌斯的革命主张。苏拉尸骨未寒,政府便迫于雷必杜斯煽动的压力,同意在一定范围内重新设立粮食配给法,并尽可能在该问题上顺从城市

无产者的意愿，因为他们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尽管如此，罗马的粮价仍然高得让人吃惊，海上抢劫活动抬高了粮价。679 年，罗马终于爆发了激烈的街头冲突。这时候，国家不得不出钱大批购买西西里的粮食以解燃眉之急。681 年，执政官颁布新粮食法以解决日后购买西西里粮食的问题，当然是由各行省向政府交钱，以便后者有资金能够更好地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除此之外，一些非物质的分歧，比如重新建立护民官的权力，撤消元老院法庭等也仍就是煽动广大群众的题目，政府方面对此采取了强有力的反抗。678 年，雷必杜斯失败之后，护民官卢西乌斯·西西尼乌斯重新掀起一场建立护民官权力的斗争。西西尼乌斯或许是四百年前创建护民官并首任罗马护民官的西西尼乌斯的同名后裔。斗争遭到活跃的执政官盖尤斯·库里奥的抵抗而失败。680 年，卢西乌斯·昆提乌斯继续进行关于重建护民官权力的宣传，却在执政官卢西乌斯·卢库鲁斯权力的威慑下半途而废。翌年，盖尤斯·里西尼乌斯·马其尔以昆提乌斯为榜样，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宣传工作之中。马其尔把他对文献的研究宣讲于公众生活，并像他在史书上读到的那样，鼓动公民拒绝征兵，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的特征。——很快，关于元老院陪审员们滥用司法权的抱怨声四起，且都有根有据：什么稍有名气的人都不会受到判决，原因在于同事对同事、过去和未来的被告对现在可怜的罪犯抱有合乎情理的同情。此外，收买陪审员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在法庭上指出并证实许多元老院议员犯有上述罪行，同时还对同样有此罪行者进行了公开谴责。一些德高望重的元老，比如昆图斯·卡图鲁斯在元老院会议上公开承认人们的抱怨是有根据的。个别尤其明显的事件曾多次迫使元老院表明态度。比如，在 680 年，元老院曾讨论惩罚被收买的陪审员，当然，也只是为了平息公众的喧哗。在劫掠和虐待外省人方面，这一司法形式的恶果尤其显而易见。和此相比，迄今为止的所有罪恶都是可以忍受和合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偷盗和抢劫简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而且也因此成为合理：敲诈团伙居然可以作为一种机构，向从辖区回来的元老们征税，以犒劳留在家里的同事。然而，当一位有名望的希腊血统的西西里人不愿意协同总督一起犯罪，而被总督以缺席判以死刑时；当各行省的普通的罗马公民拿不准罗马总督何时行使处罚之时；当罗马民主最古老的成果——身体的安全和生活的稳定开始遭到寡头统治者们的践踏之时，公众开始在罗马广场上听到对行省总督的怨诉，亦有对那些在道义上支持了这些恶行的不公正法官的怨诉。反对派当然不会错过时机，在唯一属于他们领域的法律上向对手发起攻击。比如，年轻的盖尤斯·恺撒曾积极参与了恢复护民官权力的宣传活动，在677年，在年龄允许的情况下向德高望重的苏拉党人士、执政官盖奈乌斯·多拉培拉提出诉讼。次年，又对苏拉的军官盖尤斯·安东尼乌斯提出诉讼。684年，马尔库斯·西塞罗向法院起诉了苏拉最可耻的走狗、外省人最残酷的剥削者盖尤斯·维勒斯。法不为法的那段黑暗时期的景象，各行省忍受的巨大痛苦以及罗马刑法的可耻现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华丽的意大利演讲术和无情的意大利式的嘲讽暴露在公众面前，死去的苏拉和他的活着的刽子手们遇到了毫不留情的讽刺。民众派的发言人每天都在大声疾呼，他们要求恢复护民官的全部权力，仿佛有一种古老神圣的魔力把民众城镇的自由、权力和幸福都托付给护民官。他们要求恢复由骑士等级构成的"严格"的法庭、重新建立被苏拉取缔了的监察官职务，以清除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中腐朽、有害的因素。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人们往前迈进一步。丑闻与喧闹倒是不断，但是通过辱骂政府，不管是骂得在理，还是过分，都没有达到真正的胜利。只要不进行军事干涉，那么事实性的政权会始终攥在首都的公民阶层手中。而那些拥向罗马的大街小道，在集市广场上选举官员、制定法律的"民众"并不比执政的元老院高明；虽然政府在涉及到大众切身利益的方面必须顺从大众，这就是要修正塞姆普

罗尼乌斯的粮食法的缘由。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公民阶层会为了某个主张或者某种有目的的改革就去认认真真地办事。如果要描述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可以用德摩斯梯尼评论雅典人的话：当人们聚集在演讲台周围，倾听有关改革的建议时，他们总是热情高涨。可是当他们回到家中之后，便没有人再去接着思索在广场上听到的一切。即使那些民主的宣传者煽起了火焰也无济于事，因为缺乏燃料。政府知道这一点，因而在一切重要的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最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允许对一部分跟随雷必杜斯逃之国外的人实行大赦。(682 年)在政府做出的这些让步中，民主派的逼迫所起的作用并不比温和派贵族的调解大多少。但是该党派仅存的一位领袖盖尤斯·科塔在他执政期(679 年)所推行的两项法律中，有一项有关法庭的在次年就被取消了。另一项法律，则废除了苏拉的法令中关于担任过护民官的人不得从事高级官员之职的规定，却让其余的一些限制保留了下来，这样就如同多项半途而止的法规一样引起了两个党派的不满。有改革倾向的保守派在其最著名的领袖科塔早逝的情形之下(约 681 年)，气势渐渐地减弱，最终被两端的越来越强硬的激进主义者所压倒。但是在两派激进者中，政府派虽然同以前一样腐败、软弱无能，可是与同样软弱无能的反对派相比，它仍然占着上风。

然而这种有利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政府同其派别某些成员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尖锐化，这些成员已不满足于元老院的荣誉席位及贵族的乡间别墅，而是有更高的目标。其中盖奈乌斯·庞培最为突出。庞培原先也是苏拉派的人物，我们在前面已提到。他在自己的派别中并不感到亲切熟悉，尽管他被官方视作为罗马显贵的盾与剑，然而他的出身、他的过去以及他的愿望总是将他同显贵们分开。这原有的裂痕在这位统帅带兵进军西班牙期间(677 年—683 年)就已经不可愈合地越来越深。政府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将他派给政府派的真正代表昆图斯·麦特鲁斯，与之

并肩作战;此外他指责元老院,不管它的疏忽是由于不负责任或是出于恶意,它都应对西班牙军队的失败负责任,是它将这次远征的命运孤注一掷的。如今他作为一个打败了公开以及隐蔽的敌人的胜利者回来了,位居一支善战的、并且完全忠实于他的军队之首。他要求给他的士兵分配土地,为自己举行凯旋仪式并担任执政官。他的最后一个要求与法律抵触。虽然庞培曾经多次非正规地行使过最高职权,可仍旧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务,甚至没有得到过财政官的职位,并且也不是元老院的成员;而要想成为执政官,必须一步步地跨过由许多较小的正规官职组成的等级,举行凯旋仪式也只能是为曾经担任过正规最高官员的人。当庞培试图谋求执政官的职位时,元老院在法律上有权要求他先争取当上财政官。当他请求为自己举行凯旋仪式时,元老院便提醒他回想当初伟大的西庇阿,西庇阿在相同的情况下放弃了试图为攻占西班牙而举行的凯旋仪式的愿望。此外,庞培曾许诺给他的士兵国有土地,根据宪法也取决于元老院有没有这个好的意图。由于元老院的软弱,甚至在其恼怒中也不难想象它会做出让步。也许它会做出让步,也许会看在这位常胜的统帅为镇压民主派首领而取得的帮凶之功的份上,答应为他举行凯旋仪式,让他当执政官,并分给他的士兵土地。然而在元老式的淡漠中,光荣地废除这一切命令,并置身于元老院中安度岁月的大将军之列,则是寡头政治能够给予这位三十六岁的统帅的最有利的一张命运之签。可是庞培真正想得到的是经过元老院的主动批准,在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中担任指挥权,而这却是他永远得不到的;在涉及他们本身应当注意的利益中,寡头政治不容许庞培再给自己在非洲和欧洲的胜利之外再增添第三大陆的战利品。在东方可以舒舒服服地摘到的众多桂冠无论如何是属于贵族阶层的。但是如果庞培,这位被称颂的将军的种种打算在执政的寡头政治那里不能得以实现,那么对于他来说,除了同民主派一道共事以外别无选择,因为要建立一种纯个人的、有极其明显的君主特征的

政治的话，时间和庞培的所有素质都还不成熟。苏拉的宪法与他自身的利益毫无关系：在一种比较民主的宪法之内他同样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民主派那里得到。那些积极的、精明能干的民主派领袖愿意，也有能力拿过这位不太灵活，甚至有点笨拙的军队统帅颇感艰难的政治领导权。然而他们的力量太小了，不能也不愿否认这位被称颂的英雄作为头号人物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领导权。即使是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盖尤斯·恺撒，也只不过是个靠着冒险的旅行和高筑的债台而出名的年轻人，而不是凭着他激昂的宣扬民主的口才。对于恺撒来说，如果某位闻名世界的大元帅同意让他做自己的政治副官，他就已经感到非常荣幸了。像庞培之类欲望比能力更大的人(虽然他们自己不愿承认)，实际上对盛名看得很重。这位年轻的将领在最大程度上将会享受到盛名，而他的加人会给原本已没希望的民主事业带来胜利。于是他为自己及其士兵要求的赏赐也兑现了。如果寡头政治被推翻，又缺少其他反对派首领的话，那么庞培完全可以决定自己今后的地位。毫无疑问的是，这位从西班牙凯旋而归、在意大利保持完整军队的统帅，他加人反对派是促成现存统治秩序走向崩溃的重要因素。政府与反对派同样地毫无能力。当反对派不再只是高谈阔论，同时有胜利而归的统帅的剑随时准备的时候，政府肯定就会垮台，甚至不需要斗争。

因此人们看到双方都有组成联盟的需要。个人的反感在双方都不会缺少。胜利的统帅不可能喜欢街头的演讲家，而这些人也不会欣然接受像卡尔博和布鲁图斯的刽子手作为他们的领导。在这期间，至少是眼下，政治的必要性超过了所有的道德上的顾虑。但是不仅仅是由民主派和庞培组成了他们的同盟。此外，马尔库斯·克拉苏斯的境况也与庞培相差无几。尽管他也曾是苏拉派的人，然而他的政策与庞培的一样，是代表自己的，完全不是寡头政治的那一套。同样，他在意大利也位居一支强大的常胜军之首，他用这支

军队镇压了奴隶起义。如今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和寡头政治一起对抗新结成的同盟，要么就加入同盟。他选择了后者，同时毫无疑问地选择了较保险的一条路。鉴于他的巨大财产及对首都诸团体的影响，他的确是一个十分值得考虑发展加入同盟的对象。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能把元老院唯一可以利用来对抗庞培的力量争取到进攻的一方，那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收获。此外，那些与势力强大的统帅结盟时心情不悦的民主派也不是不愿意看到，克拉苏斯的加入使联盟有了一份平衡的力量，在未来也给庞培设置了一位极有可能的竞争对手。这样在683年第一次同盟正式成立，即民主派与两位原苏拉派的将军盖奈乌斯·庞培和马尔库斯·克拉苏斯。这两位都将民主派的党纲为己所有，为此他们得到保证于次年当选执政官，此外为庞培举行凯旋仪式，他的士兵也将得到土地。克拉苏斯因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有功，因而将被允许当他的军队开进首都时举行欢迎仪式。对这两支意大利军队的气势庞大的金融力量及民主派结成的推翻苏拉宪法的同盟，元老院除了拥有第二支由昆图斯·麦特鲁斯·庇护率领的出征西班牙的军队之外，便毫无对策了。苏拉的预言是正确的，他所做的一切不会再次发生：本来就无心卷入内战旋涡的麦特鲁斯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就将他的士兵解散了。因此寡头政治不得不宣告它的失败，接受不可避免的结局。元老院同意免除两位担任执政官和举行凯旋仪式所需的某些义务。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庞培与克拉苏斯当选为684年的执政官。与此同时，他们的军队还在城外等着，借口是等候凯旋仪式的举行。在就职前，庞培还在护民官马尔库斯·罗利乌斯·帕利卡努斯主持的民众大会上表明自己拥护民主派的纲领。改变宪法的主张原则上就通过了。

如今最重要的就是清除苏拉设置的机构。首先护民官获得了他原先的职权。庞培作为执政官提出了一项法律，它重新给予护民官传统的权力，其中重要的是动议权——这对于一个比任何人都

要苛刻地剥夺了城镇的古有特权的人来说，实在是罕见的了。在关于陪审法官的地位方面，苏拉原先的法规、即元老院元老的名单应作为陪审法官的名单被取消了；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重新建立格拉古斯骑士法官制度。新的奥勒利乌斯法律规定，以后陪审人员中只能有三分之一由元老院成员组成，三分之二由担任骑士阶层的人员组成，而在这三分之二中应有一半的人担任过行政区首领或所谓的财政护民官。最后的这项革新也是向民主派作出的让步，根据这点，刑事陪审员组成的第三部分可间接由各行政区的选举产生。相反，如果元老院的势力没有最终从法院清除的话，那么原因之一在于克拉苏斯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原因就是元老院的中间派加入了联盟，此外还可能与此有关，即中间派前不久去世的领袖的兄弟行政官卢西乌斯·科塔提出了这项法律。另外，取消苏拉对亚洲制定的税收制度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这项法令的取消可能亦在这一年。亚细亚行省当时的总督卢西乌斯·卢库鲁斯被指示重新建立盖尤斯·格拉古斯实行过的租佃制度，从而重新为显贵的金融势力提供了钱财与权力的源泉——最终又重新设立了监察官。在由刚任职的新执政官确定的选举中，682 年的两位执政官盖奈乌斯·林都鲁斯·克罗狄阿奴斯和卢西乌斯·基利乌斯当选，仿佛是对元老院的公开嘲讽。这两位执政官因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不利而被元老院剥夺了指挥权，于是这两位执政官自然要利用他们现拥有的重要职位所能够支配的一切手段，赞美新上任的当权者，并对付元老院。至少有八分之一，即六十四位元老院成员被从名单上划去了，这是一个空前的数字。在这些人中有从前被盖尤斯·恺撒控告过、但没取得任何结果的盖尤斯·安东尼乌斯及 683 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林都鲁斯·苏腊，另外可能还有不少令人憎恶的苏拉党徒。

这样，684 年罗马人民又重新回到了在苏拉复辟之前的制度上了。都城的大众重又由各行省养活，护民官的权力又开始使每位

煽动家享有颠覆国家制度的法律自由；金钱贵族作为租赁地产的所有人及对总督进行法律监控的人，在政府之外从未如此地高昂着他们的头；在骑士阶层的陪审人员作出的裁决面前，在监察官的训斥面前，元老院又要发抖了。建立在对商业贵族及宣传煽动采取政治上的镇压、由罗马显贵独揽大权的基础上的苏拉政治体系从而完全被推翻了。除了个别后来才废除的从属性规定，比如重新给予祭司阶层自我补充的权利。在苏拉实行的普遍法规中，只剩下一部分由苏拉本人对反对派作出了让步的规定，其中主要是承认包括所有印度日耳曼人的罗马公民法，一部分连明智的民主派都无法指责的无明显党派倾向的规定，比如对被释放者的限制，对官员权限的调整及刑事法规上的变化。——然而在能引起国家的彻底变革的个人问题上，联盟却不能像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当然，民主派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对他们纲领的普遍承认，而是要求实行符合他们意愿的复辟：恢复纪念他们中的捐躯者，惩办凶手，重新召回那些被放逐的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解除对其子女的政治歧视，归还被苏拉没收的财物，从独裁者的继承人及帮凶的财产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对他们的损失补偿。这些都是从民主派的胜利中可获得的理所当然的结果，但是联盟在683年取得的胜利远不是这样的胜利。民主派提供了名称，并制定了纲领，而改入另一党派的军官，尤其是庞培提供了力量，并使之完成。可对于那些不仅动摇现存统治基础、而且最终走向反对这些军官的反应，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人们还记忆犹新，庞培的剑下曾流淌过谁的鲜血，克拉苏斯如何为他的巨额财产奠定了基础，这样就说明而且也暴露了当时民主派的弱点。683年的联盟在为民主派提供复仇及复辟的机会中没有尽一点微薄之力。至于后来监察官林都鲁斯在一项特殊公告中，规定要求支付购买充公财产时拖欠的款项和被苏拉所免除的买主的钱款，也都算不上什么例外之举。即使有不少苏拉派的人为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然而这些措施本身也就是对苏

拉实行的充公制度的一个证明。

苏拉苦心经营的一切遭到了破坏，至于它们将会成为什么样子还是个问题，一切尚未成为定局。为破坏复辟计划而组成的联盟在目的达到之后就解散了，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是事实上它已经自行解散了。现在的问题是权力的重心首先应该落在何处，看样子已经有了一个迅速且又充满暴力色彩的解决方式。庞培和克拉苏斯的军队仍旧驻扎在几个城门外。虽然庞培答应在胜利之后(683年12月)遣散他的士兵，可一开始他并没有这样做，目的是想利用西班牙军队给全城和元老院施加压力，以便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完成国家的变革。克拉苏斯的军队也如法炮制。如今这样做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可是他们的军队仍就没有解散。要是他们两个——与民主派结成联盟的统帅——其中的一个实行军事独裁，把寡头政治家同民主派置于一条锁链之中的话，事情就将出现转折。而这个人只可能是庞培。克拉苏斯在缔结联盟伊始就扮演着次要角色，他还不得不做出心甘情愿的样子，并把他被当选为执政官一事主要归功于庞培的大力支持。庞培要比他强大得多，很显然是庞培主宰着整个形势。如果庞培采取行动，势必会成为人们在心目中为他塑造的形象：一个权力无边的统帅，统治着文明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这位未来独裁者的身边挤满了谄媚阿谀之人。这时候，力量薄弱的对手正在一个新的联盟中寻求最后的帮助。克拉苏斯非常妒嫉这位比他年轻、又胜过他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向元老院靠拢，试图通过尚无先例的捐款把首都的一大批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似乎由他亲自参与破坏的寡头政治机器，以及那帮忘恩负义的乌合之众真的能够抵御得住西班牙军队老兵们的进攻。在这一短暂的时刻，首都城外庞培和克拉苏斯的军队好像要打起来了。民主派的明智和随机应变及时制止了这场灾难。要让庞培不实行独裁，这对民主派来说，如同对元老院和克拉苏斯一样，是最为关键的。民主派的领袖们正视了自己的薄弱环节，摸清了这个强大对手的性

格，于是想利用善意规劝的方式。登上君主的宝座对庞培而言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帝王般的勇气。以前我们曾经把这个人描述过一番，描述过他的奋斗，这使他成为一名忠诚的共和派分子，同时也成为罗马的主宰；描述过他不甚清晰的思维和薄弱的意志，也描述过他隐藏在独断专行作风之下的顺从性格。

这一次是厄运对他进行的第一次较大的考验，可是他没有经受住考验。庞培拒绝遣散部队有其借口，他说他不信任克拉苏斯，因此无法率先遣散士兵。这样一来，民主派指使克拉苏斯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完全迎合的态度，即为了和平，在大庭广众之下向自己的同僚握手言和。他们一起缠住庞培，希望他在业已取得的两项功绩之上（即打败敌人），同各个党派和解，再建第三项丰功，那就是维护国内和平，消除发生内战的威胁。凡是能够打动一个自命不凡、不甚灵活且又靠不住的人的外交吹捧之术和慷慨激昂的戏剧手段通通都派上了用场，为的是达到预期的目标。可最主要的是，由于克拉苏斯及时表现出来的顺从使事情发展到了逼庞培作出选择的地步，要么做罗马的独裁者，要么就下野。最后他让步了，而且愿意遣散军队。在庞培于684年当选为执政官时，他曾经充满自信地期望得到米特拉达梯斯之战的指挥权，可如今他不能对此抱任何希望了，因卢库鲁斯似乎早在683年就率领远征军结束了这场战争。为维护个人的尊严，庞培未曾接受元老院按照塞姆普罗尼乌斯法分给他的省份，克拉苏斯则仿效其事。庞培遣散了部队，在684年的最后一天辞去了执政官的职务，他首先不再料理任何公共事务，并且宣布自己将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平平静静地生活。他的做法曾给人的感觉是：他必须问鼎王位，可他现在又不想这么做，于是他便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除了听天由命的王位候选人之外他什么也不是。

根据局势来看，庞培的下野是件头等大事，它在政治舞台上又导致了一场党派之间的地位之争，这在格拉古斯和马利乌斯时代

早已有了先例。苏拉只是替元老院巩固了统治,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统治大权,所以在苏拉建立起的堡垒再一次倒塌之后,统治大权依然落到了元老院手中,这个时候的宪法,主要指的是重新制定的格拉古斯宪法,已经渗入一种反寡头政治的精神。民主派为重新制定格拉古斯宪法出了力,但是,没有一位新的格拉古斯,就等于是这部宪法光有身子没有头,这一点是明确的,而且通过最近的形势发展愈加明晰起来。作为反对派的民主派不得不在缺少一位舵手的情况下,暂且满足于处处给当权者制造障碍,惹他们生气。处于寡头政治派和民主派之间的资产者政党获得了新的声望,它曾经在最近发生的危机中同民主派结成联盟,而寡头政治派竭力想把它拉过去,使其成为对付民主派的一支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大亨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有利的时机,他们要求得到一项特权,这也是他们唯一尚未收回的老特权,即剧院为骑士阶层保留的十四个座位,于是,通过全民公决(687 年)他们重新获得了这一权利。他们在没有与民主派闹僵的同时,越来越向政府靠拢。元老院同克拉苏斯及其追随者的关系与此有牵连,而最主要的是元老院同金钱贵族之间似乎由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这些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资产者的强烈要求下,元老院在 686 年撤消了元老派中最有才干的军官卢西乌斯·卢库鲁斯对极其重要的亚细亚行省的管理权。

罗马的各个党派在老问题上争吵不休,而且从未就此达到一致意见,就在这时,一系列厄运般的事件相继在东方发生,正如我们前面已描述过的,它们使首都优柔寡断的政府陷入了危机。那里的陆战与海战都出现了不利的转折。687 年初罗马在本都斯的部队遭到了歼灭,亚美尼亚部队在撤退时全部解散,占领地区通通失去,海洋被海盗控制,因此意大利的谷物价格猛涨,人们担心饥荒将要发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统帅们的错误决断,尤其是海军统帅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的无能,一向以能干著称的卢西乌斯·卢库鲁斯的鲁莽,都要为这种危急状态担负一部分责任,而亚美尼亚部队的解散主要是由民主派的

煽动引起的。而现在自然是由政府承担对此的全部责任，愤怒的饥民们渴望着跟元老院算账的时机。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危机。尽管寡头政治派遭到鄙视，并失去了武器，但并没有被推翻，公共事务的领导权仍就掌握在元老院手中。但是，如果反对派能够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夺到手的话，元老院也就垮台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当有关另选一位更好的海陆之战的统帅的建议提交民众大会由公民表决时，元老院已无力事先阻止了。公民们插手最高管理权问题实际上就意味着废黜元老院，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反对派领袖。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使庞培重新掌握了决定大权。两年多来，这位备受赞颂的统帅靠着自己的财产在首都生活。无论是在市政厅还是在市场上都极少听到他的声音。他不愿意在那里被人看见，他也没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各党派的极力怂恿也有所顾忌。但是，只要他露面，身边总是围了一群高贵与低贱的追随者，他郑重其事的隐退博得了大家的称颂。在他过去辉煌成就之上的光环尚未消退之前，他自荐开赴东方，毫无疑问，公民们欣然授予他所要求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全权。这样做对寡头政治派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从政治性的军事独裁上看到了自己的末日，而自683年联盟建立以来，庞培一直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就连民主派在此事上亦未感到高兴。他们期望由自己亲手结束元老院的统治，然而就此看来，与其说是他们派别的胜利，还不如说是他们强大的联盟伙伴个人的胜利。而这个人很可能成为民主派的对手，他比元老院更危险。如果庞培当上了东方军队的统帅，那么几年前以遣散西班牙军队和让庞培下野为代价避免的危险将以更大的规模再现。

这一次庞培是要动手了，或者说至少另外一些人准备替他动手了。687年提出了两项有关法律方面的建议：一项是长期以来民主派要求遣散的亚洲方面军队中的服役期满的士兵，除此之外，下令罢免最高统帅卢西乌斯·卢库鲁斯的职务，并由当年罗马执政

官之一的盖尤斯·庇索或者马尼乌斯·格拉布里俄取而代之；另一项则是将七年前由元老院提出的肃清海盗的计划重新接受下来并予以扩充。元老院应该从执政官中提出唯一的一名统帅人选，使其在海上独自统辖从赫拉库拉斯石柱到本都斯及叙利亚海岸的地中海海城，而在陆上则从整个海岸线起纵深十德里的内陆地区与有关的罗马总督相互竞争，目的是要掌管最高指挥权。三年之中这位统帅的职位应予以保障。他的总参谋部应力量雄厚，为罗马所未曾见过：二十五名元老级别的指挥官，全部佩带罗马行政官的标志，拥有相应的权力；两名下级司库，可行使财政官的权力，他们通通是根据最高统帅的意志挑选出来的。这位统帅将获准建立一支由十二万名步兵，五千名骑兵和五百艘战舰组成的军队，而且，直至战争结束，他仍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各行省和各属国的物质；另外，现存的战舰连同人数可观的部队将立刻归其管辖。首都、行省以及附属地方的国库全部为他敞开，即便是有财政困难的也要立即从国库中拨出 7.1 亿塔勒(92.9 亿塞斯特尔茨)给他。——显而易见，那些有关法律方面的建议，尤其是远征海盗那一项建议将会推翻元老院的统治。由公民任命的正式的最高官员本身也是名正言顺的城镇的统帅，根据严格的法规，那些非正规的官员要当上统帅至少需要得到公民的一致承认才行，但是根据国家宪法，城镇无权影响各项指挥职务的任命，而民众大会也只有在元老院或者某位具有统帅资格的官员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偶尔参政，并授予特殊的权限。自从有了一个自由的罗马国家以来，元老院在这方面就具有决定权，这一权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得到了承认。虽然民主派已经动摇了这方面的基石，不过在处理最令人忧虑的事情上，比如 647 年将非洲的指挥权委任于盖尤斯·马利乌斯一事上，仍然是按照宪法的规定，由公民来决定一位具有统帅资格的官员，并委之以一项远征的任务。但是，现在公民不仅要给一位任意选出的人一份非同寻常的最高职权，而且还要授予他一项由其规定的权限。

元老院把这个人从执政官中挑选出来，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而已。因为挑选谁交给元老院，都根本算不上是挑选。面对群情激愤的大众，元老院只能把对海洋和海岸的最高指挥权交给庞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但是设立一个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几乎具有无限权力的职务，比起对元老院的原则性否定则更加令人忧虑。统帅职位通常限定在一年的期限，一个固定的行省以及严格使用一定的军事、财政物资。而新设立的这个非同寻常的职位一开始就保障三年的期限，自然也不排除延长的可能性，而且一部分行省也归其管辖，甚至包括意大利。可它本来是不受军事权力管制的，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士兵、战舰和国库都受其支配了。就连曾经提到的罗马共和国最古老的基本法则——即在没有公民参政的情况下不能授予最高的军事性和公民性权利——亦为了讨好新的最高统帅而遭到了践踏：事先在法律上授予由最高统帅任命的二十五名下级指挥官行政官的头衔和权力。[1] 而罗马共和国最高的职务不得不听命于一个新设立的职位了，给它安一个合适的名称还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包含了君主专制的因素在里面。它彻底变革了现有的制度，而这项法律建议为这一变革奠定了基石。

庞培动摇不定的态度和弱点曾是有目共睹的，但现在这个人强有力的措施让人十分吃惊。这是明摆着的，庞培这一次行事要比他当执政官时更加坚定、谨慎。他现在做的不是马上建立起君主专制，而是首先通过一项军事的特别规定，为君主专制的建立作准

① 根据罗马的国家法律，非正规职权（代理执政官，代理行政官，代理财政官）只能通过三种方式产生。首先是从适用于非城市性的职务活动的规则出发，规定职务本身到法定的最后期限结束，而职权可以行使到接替人上任为止。这是最为古老、简单和常见的情况，或者是逐渐产生这种非正规职权。那些处理机构，尤其是公民大会，后来又加上元老院，任命一位从未列入体制程序的高级官员，尽管他同正式官员平起平坐，但为了突出其职务的非正规性，只称他“代理行政官”或者“代理执政官”。这里也包括了通过正常途径任命的财政官，以及以非正规的方式赋予其行政官大权或者执政官大权代理行政官或执政官的财政官。

备。这项规定就其本质来讲，无论如何革命仍能在目前宪法的种种形式中得以贯彻。庞培一开始就依靠这项特别规定来实现他以前的目标，掌握讨伐米特拉达梯斯和提格累尼斯的指挥权。而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军权从元老院手中夺过来。庞培不会忘记几年前根据相同的规定制定的镇压海盗的计划是由于元老院的错误执行遭到了失败；另外由于元老院方面忽视军队以及其不完善的财政致使西班牙之战曾面临失败的危险；而且他也不会看不到，元老院的大多数贵族是如何反对他这个不忠的苏拉党人的。当他作为一名政府的统帅，带着一般的权力被派往东部时，他面临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因此可以理解他把独立于元老院的职位看作是接管指挥权的首要条件，公民也会乐意接受它的。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庞培受了他周围的人的影响，进而积极地采取了行动，而那些人对他两年前的退缩是大为光火的。有关罢免卢库鲁斯和远征海盗的建议是由护民官奥鲁斯·加宾尼乌斯提出的，他是个破落潦倒、道德败坏的人，但同时也是圆滑世故的调停人、直言不讳的演说家和勇敢的战士。尽管对于庞培的声明不能太认真，但他说他根本不期望在海盗大战中掌握指挥权，他只是期待着家园的宁静，但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加宾尼乌斯这个厚颜无耻、头脑灵活的人追随着庞培，他同庞培本人及他的私人圈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善于洞察人情事故，于是在很大程度上擅自替目光短浅和反应迟钝的保护人作了决定。

不论民主派的领袖们私下里多么不满，但是他们不能公开起来反对这项法律建议。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是绝对无法阻止这项建议通过的。如果他们反对，则很有可能与庞培公开决裂，使庞培或者倒向寡头政治，或是同两派对立，肆无忌惮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对民主派而言，除了同庞培结成同盟外别无选择，无论这一同盟多么薄弱，这一次他们下定决心要抓住机会，至少是把元老院彻底推翻，使自己从反对派的地位一跃上升为统治者。至于其他的事情留

待以后听任未来和庞培那尽人皆知的性格弱点去安排。于是两位民主派的领袖：一位是行政官卢西乌斯·昆提乌斯，七年前他曾致力于重建护民官的权力，另一位是前任财政官盖尤斯·恺撒，就这样拥护起加宾尼乌斯的建议来了。——特权阶层怒气冲天，不光是罗马的显贵们，还有商人贵族感到通过国家发生的彻底变革，他们的特权已经受到威胁，于是又在元老院找到了他们名副其实的保护人。当护民官加宾尼乌斯提交了他的申请而出现在元老院时，他差一点没有被这帮元老们亲手活活扼死，他们在气头上没有考虑到这种论理的方式会带来多大的损失。护民官逃到市场上，呼吁大众去推翻市政厅，而这时正好是宣布散会的时候。执政官庇索、寡头政治的开路先锋，碰巧落到了群众手里，要不是加宾尼乌斯从旁劝阻，他早就成了民众怒火的牺牲品。加宾尼乌斯不愿让这种时机未到的恶行把他业已取得的一点成功毁于一旦，于是就放了执政官。这时候民众的愤慨没有丝毫减弱，在粮价问题上一再掀起新的怒火，而且谣言四起，有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比如有人传卢西乌斯·卢库鲁斯把拨给打仗的钱一部分用来在罗马放利，一部分用来贿赂行政官昆提乌斯，试图使其疏远民众，也有人传言元老院准备让“第二个罗慕路斯”，也就是庞培，重蹈第一个的命运，而且比他更惨①。表决的日子来到了。整个市场上挤得水泄不通，所有房子的屋顶都站满了人，从那儿望得见演讲台。加宾尼乌斯的同僚们已经答应元老院，替他们否决这一建议。可是，当他们面对情绪高昂的民众时，个个都缄默不语，直到卢西乌斯·特累贝利乌斯一个人站出来，他是向自己和元老院发过誓的，宁死也不退缩。当他开始否决时，加宾尼乌斯马上就中断正在进行的对他提出的法律建议的表决，并且要求集会群众一起对付其唱反调的同僚，就像曾经在表决提贝利乌斯·格拉古斯的申请时对付屋大维一样，也就

① 据传说罗慕路斯大帝被元老院的元老们撕成了碎片。

是说建议立即撤消他的职务。表决之后开始宣读选票，首先读的是十七个管辖区的选票，他们投的是赞成票，接下来读的赞成票使这一建议赢得了多数，这时，特累贝利乌斯忘记了他发的誓，怯懦地退缩了。护民官奥托徒劳无益地想保持一下罗马官职中的共事性规则，即选了两位统帅，而不是一位。元老院中最为德高望重的昆图斯·卡图鲁斯竭尽全力想让军队部将不由最高统帅任命，而是从人民选举产生，可他的努力也白费了。人群的喧闹声淹没了奥托的声音，由于加宾尼乌斯的殷勤友好，才使得民众在静穆之中听到卡图鲁斯这位老者的讲话，但是这些话没有任何作用。这一建议连同其所有条款不仅仅是完好无损地成了法律，而且连庞培后来提的要求也逐一地立即得到同意。

人们满怀急切的希望注视着两位统帅——庞培和格拉布里俄向他们的指定地点出发了。在通过加宾尼乌斯法律之后，谷物价格马上回到了普通售价。这就证明了，人们对这次伟大的远征以及他们至尊无上的领袖抱有何等的期望。正如史书后来所记载的，这些期望不仅仅变成了现实，而且还超过了期望；三个月之内完成了清除海盗的任务。自从汉尼拔之战以来，罗马政府还没有这样神气过呢。面对寡头政治昏聩无能的统治，民主—军事的反对派作出最佳姿态，表示他们要牢牢地抓住和控制这个国家的缰绳。执政官庇索试图给庞培在那波高卢镇压海盗的部署设置一点小障碍，可是他这种既无爱国心又笨拙的举动只是增加了市民阶层对寡头政治家的愤怒，从而使他们更加拥戴庞培。在庞培的亲自干涉下阻止了事态的发展：使民众大会没有撤消执政官的职务。——在此期间，亚洲大陆的骚乱愈演愈烈。格拉布里俄本应接替卢库鲁斯去讨伐米特拉达梯斯和提格累尼斯，但他却滞留于亚洲的西部边缘，尽管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宣言鼓动士兵反对卢库鲁斯，但是由于他未接过最高指挥权，所以不得不让卢库鲁斯本人继续指挥。讨伐米特拉达梯斯的行动自然没有什么结果，本都斯的骑兵在俾泰尼亚和卡巴

多西亚肆无忌惮地烧杀掠夺。经过海盗之战以后，庞培奉命率领部队前往小亚细亚。很久以来庞培就期望能获得本都斯—亚美尼亚之战的最高指挥权，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动心了。可罗马的民主派当然没有他们将军的这些愿望，他们只是提防着在这件事情不要采取主动。很有可能是他们指使加宾尼乌斯，没有一开始就将讨伐米特拉达梯斯跟肃清海盗的任务一并交给庞培，而是将前者交给了格拉布里俄；而现在他们绝对不能把享有全权的统帅的特殊地位提高，并使之长久保持下去了。庞培照例作出忍受的样子，如果没有发生令所有党派都始料不及的意外事件，庞培很有可能在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之后返回。某个叫盖尤斯·马尼利乌斯的护民官是一个非常无足轻重的人物，他提出的拙劣建议曾同时得罪了贵族阶层和民主派。他希望能为庞培弄到人人都知道的他正热切渴望的东西，那样他就可以躲在强大的统帅的羽翼下受到保护。但是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要求，于是他向公民递交了一份申请，希望调离俾泰尼亚和本都斯的总督格拉布里俄和西里西亚的马西乌斯·雷克斯，而且将这些职务连同东方战场上的指挥权一并交给统领海洋及海岸的前任执政官，在他看来这些职务没有确定的时间限制，而且绝对可以用最自由的方式缔约联盟和签署和平协议（688年初）。这一下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立法权一方面就倡议而言掌握在每个如此渺小的煽动者手里，就决定而言交给一大群未成熟的人，另一方面立法权扩展到最重要的行政问题上去了，由此可见罗马的宪法机器已遭到何等的损害。马尼利乌斯的建议未受到任何党派的欢迎，可是也没有谁站出来反对它。民主派的领袖已经被迫容忍加宾尼乌斯法，他们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敢跟马尼利乌斯法唱反调。他们把反感和忧虑埋在心里，嘴上公开支持民主派的统帅。温和的元老派拥护马尼利乌斯的建议，因为根据加宾尼乌斯法，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而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当时就已经看到对元老院最有利的政策是：尽可能接近庞培，在庞培即将同民主派

分裂之时把庞培拉到他们这一边来。见风使舵的人赞美这一天，因为这时他们似乎都有了自己的观点，能够表现出坚定的立场，而不必为这些同任何一个党派搞僵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斯·西塞罗首先是以马尼利乌斯的捍卫者的姿态登上政治家的演说台的。以昆图斯·卡图鲁斯为首的严格的元老派，是唯一表态反对马尼利乌斯的提议的。自然，这项提议在大多数人的一致同意下变成了法律。于是庞培除以前的权力之外还拥有对最重要的小亚细亚行省的管理权。这样一来，在辽阔的罗马疆域里没有一块地方不对其俯首称臣，同时他获得了指挥一场战争的权力，这场战争如同亚历山大的远征，可以说出它何时何地开战，却无法说它何时何地结束。自从罗马存在以来，还没有谁像庞培一样，集如此大的权力于一身。

加宾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提案结束了元老院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六十七年前的塞姆普罗尼乌斯法而起。塞姆普罗尼乌斯法最初把变革派确定为反对派，而它却借助于加宾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从反对派的地位一跃上升为执政派；由于屋大维的否决毫无收获，致使现行的宪法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这真是个伟大的时刻！随着特累贝利乌斯的下野，元老院统治的最后一座堡垒也坍塌了，这不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瞬间。这一点从两方面都能感受到，垂头丧气的元老们在这场生死斗争中拼命挣扎，而有关宪法的论战也以与开始时迥然不同的、甚至是更为可怜的方式结束了。一位真正的贵族青年宣布了这场革命的开始，可是结束它的却是最低劣的冒险的阴谋家和煽动家。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在变革的伊始这帮元老们主张温和的反抗只是决心认真捍卫失去的职位的话，那么到后来他们主动使用武力、说空洞的大话以及违背誓言的举动则导致了革命的终止。唯一实现的就是一度被视为狂妄自大的梦想：元老院结束其统治。当那些既经历过最初的变革风暴，又倾听过格拉古斯兄弟讲话的老人们把眼下同那个时代一比

较，就会发现这期间一切都起了变化：国土和民众，国法和战规，还有生活和习俗，谁要是把格拉古斯时代的理想同现实的情况一比较，就只会惨淡一笑。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了。无论是对现实还是未来而言，推翻贵族的统治已成为事实。寡头政治家们就好像一支完全解散的军队，其溃不成军的小支队也许还可以壮大另一支部队，但他们自己却无法坚守阵地，连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也不敢进行了。在旧的斗争接近尾声之时，新的斗争已在酝酿之中了：那是为推翻贵族统治而结成联盟的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即作为反对党的公民民主派和正在崛起的、日益强大的军事强权派之间的斗争。继加宾尼乌斯法，更确切地是马尼利乌斯法颁布之后，庞培的特殊地位就与一个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不相称了。正如当时反对者理由充足地指出：加宾尼乌斯不是让庞培成为海军统帅，而是成了帝国的摄政者。在一个谙熟东方局势的希腊人看来，可称他为"众王之王"，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他将来满载荣誉、财富，率领着骁勇善战的部队从东方凯旋而归，想要问鼎王位的话——谁还会加以阻挡呢？为了抵抗当时的第一统帅和其久经考验的部队，执政官昆图斯·卡图鲁斯应该召募那些元老们吗？或者由当选营造官的盖尤斯·恺撒出面召募市民？他们曾经为他的三百二十对用银制铠甲装备起来的击剑手陶醉不已。卡图鲁斯呼叫着说，为了拯救自由，大家不久将不得不再次逃到卡皮托山的岩崖上去。如果这场风暴不是如这位预言家所想的来自东方，而是按照命运的安排数年之后从凯尔特人的土地上刮来了毁灭性的风暴，那么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他的话以他自己难以预料的方式逐一得到了验证。

第　四　章

庞培和东方

前面已经讲到，在687年年初，当庞培接受几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全权平定海盗的暴乱之时，罗马在东部陆上及海上的情形是如何糟糕。他着手把他管辖之下的大面积海面划分为十三个区，把每个区分配给他手下的副将负责，让他们在那里扩军备战，守卫海岸，俘获海盗船只，并且相互监督制衡。他自己则率领现有的战舰中的精锐部分——其中罗得斯岛的舰船这一次又有出色表现——在早春时节出兵海上，首先肃清了西西里岛、非洲和撒丁尼亚水域的海盗，使得这几个行省向意大利纳粮的渠道重新畅通。与此同时，他的副将着手平定西班牙和高卢的海盗。这时，执政官盖尤斯·庇索从罗马企图限制庞培的副将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依据加宾尼乌斯法案在那波省进行的扩军活动。为了制止这一不甚明智的举动，同时为了控制事态发展，把民众对于执政官的可以理解的愤怒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庞培再次来到罗马。十四天以后，地中海西部水域航运疏通。庞培率领他的六十条精锐舰船继续向东部水域行进，首先到达海盗的巢穴和他们的主要集结地吕西亚和西里西亚的海面。罗马舰队迫近的消息传来，不仅海盗船从海面上销声匿迹，就连吕西亚的两个坚固堡垒安提克拉古斯和克拉古斯也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就投降了。固若金汤的海上城堡的大门打开

了，这不是因为他们畏惧庞培，而是由于庞培善待俘虏。他的前任把俘获的每一个海盗都送上了十字架，而庞培则毫不犹豫地给他们以安身之地。他对待被俘的海盗船上的普通桨手尤为宽厚。只有勇猛的吕西亚的海上皇帝们还斗胆以武力对抗罗马舰队，试图至少保住自己的水域。他们把家眷和财宝藏到陶鲁斯山脉的山中城堡之后，便在西里西亚西部边界的科拉塞西翁的高处严阵以待。然而，庞培那人员充足、装备精良的船队在这里大获全胜。他们毫不费力地在这里登陆，向海盗的城堡发起进攻，攻陷了城堡。庞培向他们提出，只要投降，便可保住性命，获得自由。不久，多数海盗放弃了继续在山中和城堡里做无望的抵抗的念头，向庞培投降。庞培到达东部海面四十九天之后，西里西亚人投降，战争结束。他如此神速地使海盗就范，使罗马轻松了许多，但这还算不上伟迹。罗马军队从政府得到充足的给养和帮助，这一点海盗是望尘莫及的，就像大城市的一个盗窃团伙无论如何不能与组织严密的警察机构抗衡一样。如果把这样一次大规模的警察式缉捕活动当作胜利来欢呼，未免有些幼稚。然而，由于海盗这一祸患长期存在并且日益扩张的过去，这次出奇迅速地平定可怕的海盗暴乱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非常自然的。尤其是这次出征是由一人集中统率的军队初试锋芒，各派对此拭目以待，要看看它与联合统率之下的军队孰优孰劣。四百条海盗船，其中包括九十艘真正的战船，有些被庞培俘获，有些归于他的控制之下。总计有一千三百艘海盗船被击溃。除此之外，海盗团伙的储备丰富的军械库和工厂被焚毁，大约一万名海盗丧命，二万多名海盗被生擒。与此同时，驻扎在西里西亚的罗马舰队的首领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以及其他许多落入海盗之手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在故乡被认为早已命归西天——通过庞培重新获得了自由。687年夏，远征开始的三个月后，贸易往来恢复。意大利原来面临饥荒的威胁，现在变得富足起来。

在此期间，克里特岛上一件令人恼火的意外事件使罗马军队

这个可喜的成果受到影响。麦特鲁斯在这个小岛上的第二年，他致力于完成唾手可得的对海岛的征服大业。这时庞培出兵东部海域，一场冲突看来不可避免。因为根据加宾尼乌斯法案，庞培的势力涉及这个狭长的每处宽不过二十德里的小岛，与麦特鲁斯形成竞争之势。但是庞培行事非常谨慎，他没有把这个岛交给任何一个部将。然而，克里特岛上还在顽抗的部族看到业已被麦特鲁斯降服的同胞受到他的惩罚，同时耳闻庞培对待小亚细亚南部降服于他的地区甚为宽厚，因此，他们更愿意共同向庞培投降。庞培当时正在旁非利亚，在那里他接见了他们派来的使节，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并把他们归在部下卢西乌斯·屋大维的麾下，把签约之事告知麦特鲁斯，接管了城市。自然，这个过程并不是平等而友好的。麦特鲁斯完全不顾这些城市与签订的和约，继续视之如仇敌。这样，从形式上看，正义完全在庞培一边，麦特鲁斯处于明显的劣势。屋大维抗议无效。由于他没有带军队来，便调集驻扎在阿加亚的庞培手下的卢西乌斯·西升那的军队前来，但也于事无补。麦特鲁斯毫不理会屋大维，也不在乎西升那，他包围了埃琉特尔纳，攻陷了拉帕，在那里生擒屋大维本人，把他痛骂一顿后放走，而把与屋大维同时被俘的克里特人杀死。这样，西升那的军队与麦特鲁斯的军队之间爆发了正式的战争。西升那死后，屋大维成为首领。甚至在西升那的军队被召回阿加亚之后，他还联合克里特人阿里斯齐翁继续作战。两军在希拉皮特纳对峙。麦特鲁斯经过顽强不懈的抵抗才攻入城池。事实上，这位孜孜以求的元老麦特鲁斯以此正式与民主的统帅们对抗，挑起内战。这场内战导致两员大将间的尖锐的矛盾。这说明罗马政局已遭受到无法形容的破坏。几年以后，他们握手言和，并且“友好”地并肩坐在元老院里。

在此期间，庞培在西里西亚为第二年征讨克里特人或者说是讨伐麦特鲁斯做准备。事实上，他期待着一个暗示，以授权他干涉混乱一片的小亚细亚局势，卢库鲁斯的军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之

后、芬布利亚的军团也离去，余下部队无所事事地驻扎在本都斯边境的特洛克默人地区的哈利斯河畔。当时，军队的大权还掌握在卢库鲁斯手中，因为他的后任格拉布里俄虽已被指派至此，但他还在亚欧的交界处犹豫不决。驻扎在西里西亚的三支由昆图斯·马西乌斯和雷克斯统率的军队也是无所事事，本都斯重又落入米特拉达梯斯手中。他对业已归顺罗马的个人和地区，例如攸巴多利亚城，都让他们因背叛而受到惩罚。东方诸王并不真想进攻罗马，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心无此念，也许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庞培在西里西亚登陆，东方的国王米特拉达梯斯和提格累尼斯放弃了进一步打算。马尼利乌斯法案使庞培心中暗怀的希望得以实现——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快：格拉布里俄和雷克斯被罢免，本都斯——俾泰尼亚和西里西亚连同其驻扎军的统治及统率大权、本都斯和亚美尼亚战争的统率权全部由庞培一人掌握。他还有权凭自己的判断与东方的统治者宣战、媾和抑或结盟，因为有希望获得此等殊荣，赢得如此丰厚的战利品，于是庞培情愿把对付情绪恶劣的元老的打算置之脑后——这位元老妒意十足地保护着自己可怜巴巴的月桂枝——放弃了对克里特岛的远征以及对海盗的进一步追踪，并让他的舰队支援他所筹划的对本都斯和亚美尼亚的战争。但他丝毫没有因为这次陆战而完全忽略一再企图重新抬头的海盗势力。离开小亚细亚之前，691 年，他在本都斯部署了必要的船只以防备海盗。鉴于他的请求，第二年，罗马又在意大利采取类似的措施，并由元老院提供所需的资金、骑兵和小型舰队以继续在海岸巡逻。尽管罗马人并未完全控制住海盗，如后面将提到的于 696 年对塞浦路斯和 699 年对埃及的远征所证实的。但是，自庞培出兵之后，无论罗马兴盛、衰微还是危机四伏，这股海盗势力再也没有重新抬头，并把罗马的势力完全逐出海面，就像在腐朽的寡头政治的统治下所发生的那样。

这位新统帅把出征小亚细亚前的几个月用来作外交上和军事

上的繁忙的准备工作。他派遣使节到米特拉达梯斯处。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寻求结盟,不如说是为探听虚实。本都斯朝廷希望盟军挫败罗马军队的最后几次重要的胜利会促使帕提亚国王弗拉阿特斯加入本都斯与亚美尼亚的联盟。为了与之抗衡,罗马也派使节来到克特西丰朝廷。这时,亚美尼亚统治集团的内讧使罗马使节坐收其利。提格累尼斯大帝的与他同名的儿子起来反对父亲,也许因为他等不及老父亲寿终正寝,也许因为父亲的疑心已使几个兄弟丧命,因而他认为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公开反叛。然而被父亲战胜之后,他携同一部分亚美尼亚贵族逃到阿尔萨西斯家族的宫廷,在那里他阴谋反对父亲。弗拉阿特斯面对双方引诱他结盟的条件——许诺给他的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他更愿意从罗马人手中得到这块地方,甚至着手与庞培重新订立他与卢库鲁斯就有关幼发拉底河边界问题所签订的条约。这其中就有年轻的提格累尼斯的作用。对米特拉达梯斯和提格累尼斯来说,年轻的提格累尼斯给他们带来的更大的损害是他的叛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分裂。提格累尼斯大帝暗中怀疑岳丈在他的外孙的反叛活动中染指——年轻的提格累尼斯的母亲是米特拉达梯斯的女儿。虽然这并没有造成公开的分裂,但是正当两个王朝最为迫切地需要同心合力对敌之时,他们的这种同盟却遭到了破坏。——这时庞培正极力扩军,并要求小亚细亚各邦及各属区履行条约规定派兵从征。他发布公告,要求业已解甲的身经百战的老兵们作为志愿人员重返军中。动听的诺言和庞培的大名吸引了一大批老兵响应庞培的号召,一时间,集结在庞培麾下的兵力连同民间的增援力量约达四五万人。

688 年春,庞培出征加拉西亚,为的是接管卢库鲁斯军队的大权,率领他们挺进本都斯。西里西亚的部队也受命跟随他作战。两军将领在特洛克默的一个名叫达那拉的地方见面,双方的朋友希望在此和解,结果没有成功。起初的礼貌变成了激烈的讨论和争执,两人不欢而散,比来时更加沮丧。卢库鲁斯继续向贵族赠送礼

物，封授土地，就像依然大权在握一样。于是庞培宣布自他到任之日起，他的前任的所作所为一律无效。从形式上看，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不能指望他对待这样一个建有功勋而备受侮辱的对手有丝毫道义上的分寸，一俟季节允许，罗马军队就越过本都斯边界。米特拉达梯斯率领三万步兵和五千骑兵迎战罗马军队。米特拉达梯斯失去了盟军，在罗马军队愈加猛烈的攻势下，试图与罗马媾和，但他不愿意接受庞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即使作战失败也未见得会比这更糟糕。为了不使他的军队，主要是步兵和骑兵遭受罗马大军的致命打击，他慢慢率军后撤，迫使罗马军队沿着他的曲曲弯弯的行军路线追踪。一有机会，他便以优势的骑兵兵力狙击罗马人，截断他们的给养，给他们造成困难。最后庞培终于不耐烦地放弃追踪，放手本都斯国王采取以下措施使这个国家降服：他进军并穿过幼发拉底河地区，占领本都斯东部的行省。但米特拉达梯斯沿幼发拉底河左岸亦追踪至此，到达阿纳提斯或者阿西利森地区，利用坚固的四面环水的达斯特伊拉城堡阻断了罗马人的道路，派轻骑兵占领了原野。庞培仍然缺少西里西亚的劲旅，力量不足以战胜米特拉达梯斯，因此他不得不渡过幼发拉底河，撤退到本都斯的沟壑纵横、丛林覆盖的亚美尼亚地区，以躲避米特拉达梯斯的骑兵和射手。直到西里西亚部队的到来，他能够以优势兵力反攻之时才重新行动。他包围了本都斯国王的营地，部署哨兵达四德里，把国王完全封锁起来。同时，罗马的小分队遍布整个地区。本都斯军营给养匮乏。他们屠杀了驮畜，困守了四十五天之后，国王下令由自己人把伤病人员杀死，因为他既不能救助他们，也不愿让他们落入敌手，然后他在深夜的寂静中向东突围而逃。在米特拉达梯斯快要到达他与提格累尼斯的国界时，罗马统帅看到米特拉达梯斯不想在他的国土范围内决战，而企图把罗马军队引向漫漫无际的东方，他决定不让米特拉达梯斯得逞。两军对垒。罗马军队趁午休时间起身，不惊动敌人，绕过敌营，占领了位于前方敌人行

军的必经之路上的狭窄的要塞，在要塞这一制高点上他们可以按兵不动。这个要塞在吕库斯河的南岸（叶西尔·伊尔马克），离现在的恩得勒斯不远，后来这里建起了尼科波里斯城。第二天清晨，本都斯人像往常一样起身，仍然认为罗马人远在身后。经过一天的行军之后，本都斯人在山谷安营。罗马军队就埋伏在这个山谷的上方。突然在寂静的夜里，四面传来可怕的呐喊声，箭从四面八方射来，小亚细亚的士兵、军士、战马和骆驼顿时乱作一团，他们乱挤乱撞，所以尽管夜黑，敌军也是箭无虚发。待投射完毕，他们从山上冲下来。这时月已东升，他们借着月光冲向束手待毙的本都斯士兵，没有死在罗马兵器之下的，也在可怕的混乱拥挤中被马蹄和车轮碾作肉泥。这是年迈的本都斯国王与罗马人之间最后一次较量。本都斯国王带领三个人——两个骑兵和一个惯于身着男装跟随他征战南北的嫔妾——逃向息诺利亚要塞。他的一部分卫队也到了那里。本都斯国王过去在此保藏了大量财宝，计 6000 塔连特黄金（900 万塔勒）。他赏赐跟随他逃跑的人，然后率领他仅有的兵力逃往幼发拉底河上游，以求与他的盟友亚美尼亚的众王之王联合。

但是这个希望也成了泡影，促使米特拉达梯斯满怀希望地踏上去往亚美尼亚之路的这一同盟早已不复存在。在上面讲述的米特拉达梯斯与庞培大战期间，帕提亚国王经不住罗马人以及流亡在此的亚美尼亚王子的逼迫，已率军侵入提格累尼斯的国土，迫使提格累尼斯大帝退守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侵略军甚至开始包围首都阿塔克赛塔，不过由于这一行动旷日持久，弗拉阿特斯率领大部分军队离开了这片国土。随后，提格累尼斯打败了剩下的帕提亚军队和由他的儿子率领的亚美尼亚逃亡者的队伍，在整个国家恢复了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提格累尼斯当然不希望与重新取得胜利的罗马人作战，尤其不愿意为米特拉达梯斯做出牺牲。自从他听说反叛了他的儿子有意托庇于外祖父时，他比从前更不信任米特拉达梯斯了。因此他与罗马人接触，商谈签订和约之事。他不

等和约签订就撕毁了与米特拉达梯斯所订立的条约。米特拉达梯斯到达亚美尼亚边境时，听到了提格累尼斯悬赏100塔连特（15万塔勒）要他的人头，并扣押他派去的使节，把他们交给罗马人的消息。米特拉达梯斯看到自己的王国已落人敌手，而同盟者欲与敌人和解，继续作战已是不可能了。他想逃往黑海的东部和北部，也许能够把他那勾结罗马的逆子马查里斯赶出博斯普鲁斯王国，在亚速海畔再作筹谋。于是他向北进发。当米特拉达梯斯在逃跑的路上穿过小亚细亚的旧界法希斯河时，庞培暂时中止了对他的追击。他没有到幼发拉底河源头，而是转向一侧，来到阿拉斯河地区，欲与提格累尼斯作一了结。他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到达阿塔克赛塔（距埃里温不远），在距城三德里的地方安营。众王之王的儿子来谒见。他满心希望他的父亲垮台之后可以从罗马人手中接管亚美尼亚的王冠，所以他极力阻挠罗马人与他的父亲签约。而众王之王越发坚决地行事，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他未着紫袍，但头戴君王的额带和君王的头巾，骑马来到罗马军营门前，求见罗马统帅。按照罗马军规，他交出战马和战剑，依照蛮族人的礼节，匍匐在代理执政官庞培的面前，把王冠和头饰献给庞培，作为自己无条件投降的标志。庞培为这个不费吹灰之力而获得的胜利感到大喜过望。他扶起屈辱的众王之王，重新为他佩戴上代表其威严的饰物，表示愿意媾和。提格累尼斯拿出900万塔勒（6000塔连特）作为战争赔款，又送给庞培军队的每个士兵50德纳尔（15塔勒）。除此之外，他还放弃了所有征服的土地，不仅包括腓尼基、叙利亚、西里西亚和卡巴多西亚的土地，还有幼发拉底河右岸的索芬尼和科都埃纳。这样一来，他的势力就局限于原来的亚美尼亚地区，众王之王的辉煌自然成为过去。庞培仅用一次战役就彻底制服了本都斯和亚美尼亚的两个强大的国王。688年初，罗马的旧有土地的另一侧再也没有罗马士兵。从这以后，米特拉达梯斯国王从本土逃亡，成了高加索山谷的孤家寡人，而提格累尼斯虽然还在亚美尼亚

王国的宝座之上，但也不再是昔日的“众王之王”，而只是罗马的一个封侯而已。幼发拉底河以西所有小亚细亚的土地完全在罗马的控制之下。冬天，战无不胜的军队就驻扎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亚美尼亚的土地上，从幼发拉底河上游直到库尔河的广大地区。过去意大利人曾经在这条河里饮马。

但是，罗马的新占领区开始对抗罗马。高加索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并不欢迎遥远的西方人在这里驻扎。在今天叫做格鲁吉亚富饶的水源丰富的高原上居住着伊伯里亚人，这是一个勇敢的组织严密的农耕部落。他们的聚居区由最年长者领导，按集体制耕作农田，个人没有私产，军民合一。身居高职的有些是统治家族，他们中年纪最长的做国王，稍次之的做法官和将领；有些是特殊的教士家族，他们主要负责与其他部族缔结条约，并监督条约的遵守和执行；大量的非自由人是国王的农奴。他们的东邻是阿尔巴尼人，或者叫做阿拉尼人，他们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伊伯里亚人。这个民族生活在库尔河下游直至黑海地区，以游牧为主，在今天的施尔万一带的静静的草原上，骑着马或徒步放牧牲畜，用不带铁犁头的犁耕作着为数不多的农田。他们还不懂得使用硬币，超过100的数目就不再数了。他们由二十六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和自己的方言。阿尔巴尼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伊伯里亚人，但在勇猛方面却相形见绌。两个民族作战的方式大体相同：多用箭镞和轻的投掷物，像印第安人那样借助森林的掩护，从树后或从树梢上向敌人投掷。阿尔巴尼人还有部分按照米提阿—亚美尼亚方式装备起来的带胸镜和护甲的重骑兵。自古以来，两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活在自己的农田和牧场上。高加索山仿佛是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的天然屏障，阻挡住民族的迁徙；塞洛斯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都止步于此。现在，这座分界的屏障的居民开始凭借它对付罗马人。罗马统帅决定在第二年春天越过高山，在高加索的另一面继续追踪本都斯国王的消息传来——因为有人猜想米特拉达梯斯在黑海

边的狄奥斯库里阿斯(伊斯库里阿,在黑海边的苏呼姆·卡勒和阿纳克利阿之间)过冬——人们惊恐万分。阿尔巴尼人首先在酋长奥罗伊西斯的率领下在688年到699年的冬天渡过库尔河,向罗马军队进攻。此时,罗马军队由于给养不足,于是改编为三个较大的军团,分别由昆图斯·麦特鲁斯·塞勒,卢西乌勒·弗拉库斯和庞培统领。这次进攻切中塞勒的军团。他勇敢地抵抗了进攻。庞培在解决了进攻他的军队后,继续追击已被击溃的蛮人直到库尔河。伊伯里亚国王阿多西斯按兵不动,但求和平共处。只是庞培听说国王正暗中扩军,打算在罗马人经过高加索要塞的时候发动袭击,所以庞培于689年春,在追踪米特拉达梯斯之前,率军来到相距不过半个德里的两个要塞哈摩齐卡(霍隆齐希或阿马齐)和沙埃萨摩拉(楚马尔)跟前。这两个要塞在今天的上第比利斯,它们控制着库尔河及其支流阿拉瓜河的河谷,因此控制着从亚美尼亚通向伊伯里亚的唯一要道。阿多西斯尚未准备好迎敌,就遭到了袭击。他匆忙烧毁了库尔河桥,撤退到内地,与罗马人谈判。庞培占领了要塞,追击伊伯里亚人直至库尔河的另一岸,企图迫使伊伯里亚人马上投降,但是阿多西斯向内地越逃越远。当他最终在佩罗鲁斯河停下脚时,他并没有投降,而是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但是伊伯里亚士兵抵挡不住罗马人的进攻,当阿多西斯看到罗马人占领了佩罗鲁斯河时,便终于接受了胜利者提出的条件,把孩子交出去做人质。现在庞培按照原定计划穿过库尔河流域的萨拉帕那关隘,来到法希斯河流域,再从那里顺流而下,到达黑海。在这里,塞维利乌斯率领的舰队在科尔基斯海岸已迎候多时了。所要实现的是一个毫无把握的想法,一个空洞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军队与舰队才来到一片富于童话色彩的科尔基斯海滨。军队刚刚跋涉过大多为敌对的民族所占据的异族的土地时已疲惫不堪,而前面的路更是不堪设想。即使他们真的能够从法希斯河口把军队带到克里米亚,经过贫穷而善战的野蛮人部落,穿过不为人知的贫瘠的水域,沿着时有山峦跌

向大海的海岸行进，必要时还要乘船而行——那么这样一次或许远比亚历山大大帝和汉尼拔所进行的远征更困难的行动所获得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他们能获得与这种艰辛和危险相应的报偿吗？自然，只要米特拉达梯斯活在世上一天，战事就要延续一天，但谁又能保证这史无前例的征讨一定能够捉拿住米特拉达梯斯呢？放弃这样一次利少弊多的追踪难道不是更好吗？哪怕冒着米特拉达梯斯再次在小亚细亚崛起的危险。来自军中以及更多的来自都城的声音传到统帅耳中，要他不屈不挠、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远征。持这种论调的有些是不顾一切的热脑筋，有些则是阴险的朋友——他们希望威力无比的统帅被困在毫无出头之日的东方事务之中。庞培是位颇有经验而行事谨慎的将领，他不会拿自己的荣誉和军队开玩笑而一味执拗地坚持这次不明智的远征。这时，罗马军队身后的阿尔巴尼人起义，这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借口，可以停止追踪米特拉达梯斯的远征，班师回府。舰队受命巡逻海上，防御小亚细亚北部海岸的敌人，对西默里人的博斯普鲁斯实行严密封锁。若有商船胆敢冲破封锁线，一律严惩不贷。庞培率领步兵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穿过科尔基斯和亚美尼亚地区，到达库尔河的下游，渡河进入阿尔巴尼平原。罗马军队不得不在灼人的热气中、在缺水的平原上连续行军几天而遇不到任何敌人，只在阿巴斯河的左岸（大约以前被称为阿拉佐尼奥斯河，现在叫做阿拉桑河）遭遇到一股由奥罗伊西斯国王之弟科西斯率领的反对罗马军队的兵力。他们联合高加索山另一侧的草原上的居民，兵力计六千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如果不是错以为罗马军队仅限于骑兵，他们是不敢作战的。罗马的骑兵走在前面，他们退下去，才出现隐藏其后的步兵队伍。短兵相接之后，野蛮人的队伍向森林逃窜。庞培命令包围这片森林并放火焚烧，阿尔巴尼人只得求和。一旦比较强大的民族签订了和约，库尔河和黑海之间的所有民族纷纷仿效其榜样，也与罗马人订立了和约。阿尔巴尼人、伊伯里亚人以及在高加索南部及山脚下居

住的民族都至少暂时地成为罗马的臣民。如果我们把法希斯河和麦欧提斯河之间的居民，包括科尔基斯人、索阿尼人、赫尼奥基人、齐基人、阿加亚人甚至还有巴斯塔尼人也归于降服于庞培的民族之列，那么我们对于“投降”这一概念并未过分严密地追究。高加索山又一次证明了它的历史意义：像波斯人和希腊人一样，罗马的征服也到此止步。

这样，米特拉达梯斯的命运就完全落在自己及造化的手中。从前他的祖辈，本都斯王国的缔造者，首先进入他未来的王国，而后为逃脱安提戈诺斯的捕探，身边只带着六个骑兵逃亡出来。现在他的后人又一次跨过他的王国的国界，向自己及祖先征服的土地告别。造化给息诺普的苏丹掷的比给其他任何人都更变化无常。他一会儿给他最高的荣誉，一会儿带给他最惨痛的失败。东方的局势瞬息万变，不可捉摸。也许米特拉达梯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接受了每一个新的事故变迁。怀着这样的念头，即他只是在为新的转变做准备：无常中唯一不变的正是命运的永恒更迭。对于东方人来说，罗马的统治从根本上是无法忍受的。米特拉达梯斯无论从好的意义上还是坏的意义上都是东方最大的首领。这时，罗马元老院对各行省的管理松懈，罗马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争执日烈，内战随时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能够等待时机，完全有可能第三次东山再起。也正因为他怀着这样的希望，抱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天，便对罗马构成一天的威胁。只要他活着，那么即便他是逃亡在外的年迈之人，也同样可以像当年率领千军万马一样，从罗马人手中夺取希腊和马其顿。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于689年从狄奥斯库里阿斯出发，忍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从陆上和海上攻入蓬提卡彼翁王国，依仗他的声誉和他强有力的随从队伍，把背叛他的儿子从王位上赶下来，逼迫他自杀。在这里他试图再一次与罗马人谈判。他请求把祖辈的王国还给他，表示愿意承认罗马的统治权，愿意作为封侯向罗马进奉年息。无奈庞培拒绝给国王以

职位，唯恐他故伎重演。他坚持必须要国王亲自前来投降，但是米特拉达梯斯不想落入敌手。他筹划了一个更加新奇的方案，利用他所救出的财宝和他的王国所能提供给他的全部钱财，集结了一支新的包括奴隶在内的计三万六千人的队伍，按照罗马的方式进行装备和训练，还组织了一支舰队。据传他想穿过色雷斯、马其顿和帕诺尼亚向西行进，把萨马提亚草原的西提亚人、多瑙河边的凯尔特人作为盟军一并带走，以进军意大利。人们也许觉得这一计划很伟大，并把它与汉尼拔的远征相媲美，但是，这个计划出自一个天才的头脑非同一般，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则纯属愚蠢的妄想。东方人进军意大利的筹划是非常可笑的，它不过是一种不明智的绝望的幻想而已。由于统帅的谨慎和冷静，罗马军队没有去追踪冒险行事的敌人，到遥远的克里米亚与敌人作战，敌人即使不自取灭亡，也会在阿尔卑斯山脚与他相遇。事实上，庞培丝毫不在乎神志不清的巨人对他形成的威胁，他着手治理被征服地区。与此同时，用不着他花费气力，年迈国王的命运便在偏远的北方应验了。米特拉达梯斯在博斯普鲁斯疯狂地装备武器，他命令把房子拉倒，把牛从犁上解下杀掉，为的是把房檩和牛腱用来制造机器。这在博斯普鲁斯引起强烈不满。士兵们也无心进行毫无希望的对意大利的远征。怀疑和背叛时刻包围着米特拉达梯斯，他没有能力唤起部下的爱和忠诚。早年他的一名优秀统帅阿基拉奥斯被迫到罗马阵营中寻求庇护。在对卢库鲁斯的战争中，他的几名亲信狄奥克勒斯、菲尼克斯，甚至有名的罗马流亡者最终也倒戈变成了他的敌人。现在，这位年老多病、痛苦不堪的苏丹只能接触到身边的宦官，所以背叛他的人越来越多。防守法那哥利亚要塞（在小亚细亚海岸凯尔赤的对面）的指挥官卡斯托首先发动起义。他发布公告，宣布城市独立，把在要塞中的米特拉达梯斯的儿子交给罗马人。起义在博斯普鲁斯王国各城市间迅速蔓延。离塞瓦斯托波尔不远的刻索尼苏斯、托埃多西亚（卡法）等几个城市加入法那哥利亚起义军的阵营后，国王

的多疑越发不可收拾。他听信宦官的谗言，把自己的亲信送上绞刑架。连他自己的儿子们也痛切地感到朝不保夕。其中一个儿子叫做法那西斯，他深受父亲喜爱，有可能被指定为继承人。他决定做叛军的首领，米特拉达梯斯派去捉拿他的捕探和降服他的军队都向他投诚。米特拉达梯斯军队中最能干的一部分是从意大利叛逃而来的队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最不愿意远征意大利。他的一部分军队宣誓效忠王子。其余的部队及舰队纷纷仿效其榜样。国王众叛亲离，最后连首都蓬提卡彼翁也向叛军敞开了大门，把锁居于深宫之中的老国王也交到他们手中。老国王在他城堡的高墙之上乞求他的儿子至少留他一命，手上不要沾上父亲的鲜血。这一请求出自这样一个嗜杀成性的人之口，他曾经亲手杀死母亲，又刚刚杀死无辜的儿子克西法勒斯——听起来让人觉得恶心。法那西斯比父亲更加冷酷和不近人情。既然必死，国王决定要死得如生前一样。他饮毒之前，他的众多的妻妾、女儿，包括已许给埃及和塞浦路斯国王做新娘的两个女儿，都必须先饮入毒酒，忍受死亡的痛苦。而后，由于毒酒效力不够迅速，国王把脖子伸给一名凯尔特士兵以求一死。这样在691年，米特拉达梯斯·攸巴托在与罗马较量了二十六年之后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在位五十七年。法那西斯把国王的尸体交给庞培，以表示自己的功绩和忠诚。庞培把国王安葬在息诺普诸国王的陵墓中。米特拉达梯斯之死于罗马不啻是一个胜利。信使头戴桂冠，好似传播一个喜讯似的来到耶利科城前的罗马战营，把这个灾难告知罗马统帅。一个劲敌、一个比罗马在疲软的东部所遇到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更为强大的敌人随之被埋葬了。众人凭着各自的直觉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像当年西庇阿欢庆对汉尼拔的胜利远甚于战胜迦太基的胜利一样，与米特拉达梯斯之死相比，庞培征服东方数不胜数的部落和战胜提格累尼斯大帝的战绩简直不值一提。在庞培隆重的凯旋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描绘米特拉达梯斯如何逃跑以及死在女儿们尸体之间的图画。不管人们

如何评价这位国王的功过，他确是一个真正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人物。他不是一个天才人物，也许没有能力统治一个王国，但是他具有一种可敬的品质即仇恨。他以这种仇恨发动了无与伦比的反对强大的敌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历时半个世纪。尽管他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仍很光荣，超过他作为个人的意义的是历史赋予他的地位。他作为东方对抗西方的民族反对派的先驱，揭开了东方反对西方的新的篇章。不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有这种感觉：他的死并非意味着结束，而是意味着开始。

庞培于689年发动对高加索的居民的战争之后，率军回到本都斯王国。在那里，为了遏制海盗，许多城堡被拆毁，城堡中的泉水也因大量石块的投入而废弃不用。庞培使最后几个仍在负隅顽抗的城堡就范。然后于690年夏向叙利亚进军，当时叙利亚境内的情况很难形象地描述出来。尽管在卢库鲁斯进攻叙利亚之后，亚美尼亚总督马加达特斯于685年退出这几个行省，尽管托勒密们很想重复他们祖先的尝试，把叙利亚的海岸并入自己的版图，但是他们不敢擅自占领叙利亚，害怕招惹罗马人。尤其因为罗马政府甚至不曾扶正他们统治埃及的令人怀疑的头衔。叙利亚国王的儿子们多次恳求罗马承认他们作为业已消亡的拉各斯家族的合法继承人的权利。尽管一时间几个大国纷纷插手叙利亚事务，但这个国家的酋长、骑士和城市之间无休止、无意义的争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当时，塞留古斯王国真正的统治者是贝督因人、犹太人和那巴提安人。这片沙漠是贫瘠的水源匮乏的不毛之地。它从阿拉伯半岛向西延伸直至幼发拉底河，并继续伸展至叙利亚山地及其狭长的海岸，东到底格里斯河的洼地和幼发拉底河下游。这片亚洲的撒哈拉是伊斯梅尔（亚伯拉罕之子，阿拉伯北方部族的祖先——译注）之子的故乡。自从有传说以来，就有“沙漠之子”——“贝达温”在这里搭起帐篷，放牧骆驼，骑着骆驼或快马追击部落的敌人或行脚商人。早年提格累尼斯国王

利用他们为自己的贸易政治计划服务，推动了他们的发展。后来由于叙利亚王国常年无君，沙漠之子就在北叙利亚广布开来；其中有些部族因为毗邻已开化的叙利亚人便接受了最初的有秩序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政治上几乎已居首要地位，这些部族的埃米尔中最有名的是阿拉伯马达尼亚人部族的酋长阿布卡洛斯。提格累尼斯因为埃得萨和卡里的缘故把他迁移到上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西岸的萨普西塞拉摩斯是统治位于大马士革和安齐奥基亚之间的赫梅萨（霍姆斯）的阿拉伯人的酋长，他还控制着阿勒杜萨要塞；在同一地区纵马驰骋的另一个部族的酋长阿齐佐斯；兰姆贝尔人的酋长阿尔考多尼欧斯，他与卢库鲁斯早就有联系。如此等等。除了这几个贝督因首领外，还有遍地的大胆歹徒，他们在拦路抢劫方面并不比沙漠之子逊色，甚至比之略胜一筹。他们是：托勒密·梅纳奥斯的儿子，他也许是叙利亚这些马上强盗中最为强大的一个，也是当时的首富之一。他统治着伊都利亚人的地区即今天的德鲁兹人的地区、黎巴嫩山谷和海岸以及向北伸出的马西阿斯平原包括赫利乌玻利斯（巴勒贝克）和卡尔西斯两座城市，还统率着 8000 名骑兵；狄奥尼西奥斯和西尼拉斯，他们是海上城市特利波里斯（塔拉布鲁斯）和毕布鲁斯（在塔拉布鲁斯和贝鲁特之间）之王；此外还有统治里西阿斯的犹太人西拉斯。这是距奥伦特河不远的阿巴密亚地区的一个要塞。而在叙利亚南部，各个犹太部族趋向于联合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受到叙利亚国王所推行的强硬的希腊化政策威胁时，人们虔诚而勇敢地起来捍卫自己民族的古老的民族崇拜。在此过程中，哈斯莫尼家族或称马加比家族逐渐成为世袭的首领，而且获得了国王的荣誉。首领化了的高级祭司也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向东、向南扩张。在勇敢的亚纳奥斯·亚历山得罗斯去世的 675 年，犹太王国向南扩张到整个非利斯特人的地区直到埃及边界，向东南到达佩特拉统治的那巴提安王国。亚纳奥斯曾经从这里夺取了约旦河和死海右岸的大片土地，向北越过萨马勒亚和德

卡波利斯直到基内撒莱特湖。他准备占领托勒马伊斯(阿科),以优势击溃伊都利亚人的进犯。从卡美尔山区到里诺科鲁拉的海岸包括重要的加沙地段统统属于犹太人管辖,只有阿斯卡隆还是自由城。这样,以前犹太人的被大海割断开来的土地现在也成了海盗的避难所。亚美尼亚大军迫近约旦边界之时,由于卢库鲁斯的干涉阻挠而撤离了这片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是这个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征服而得的祭司王国由于内部分裂而将其势力扩张抑制于萌芽状态的话,那么哈斯莫尼家族天才的统治者极有可能继续挥戈作战。宗教信仰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强有力的统一促成了马加比王朝的建立。此时这两种力量迅速分离,并且相互对抗。犹太正教或者所谓法利赛人的教义满足于实行宗教自由,无论这一自由是如何从叙利亚统治者手中夺来的,它的实际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不同于世俗政权的、由来自五湖四海的正统教派组成的犹太团体。这些教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即每一个正直的犹太人都须向耶路撒冷的圣殿纳税;都要上宗教课,进行精神审判。这种正教不同于政府组织,它越来越向宗教的无思想和极端重视宗教礼拜仪式的僵化模式发展。与这种正教对立的是民族独立派,他们在有利的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继而提出重建犹太王国的思想。他们代表古老的大部族萨都该人的利益,他们中有些是信奉教条者,只承认《圣经》,对犹太教经师只承认其权威性,而不以他们为圣徒。这是宗教教规派的传统[①];有些则主要有着政治目标。他们宣扬不能宿命地等待主的军队来拯救这个民族,而必须在现世拿起武器,在辉煌的马加比时代重建大卫王国,加强其内政外交。第一种正教势力在教士和民众中有影响。他们否认哈斯莫尼家族担任

① 这样萨都该人背弃了天使、神和死而复生的教义。法利赛人与萨都该人流传故事中的分歧在于一些次要的圣礼仪式、法律和日期上的问题。取胜的法利赛人把他们在个别的争执上占上风和把异教徒逐出最高监理会的日子定为民族的纪念日和庆祝日,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高级祭司的合法权，不遗余力、毫不留情地攻击邪恶的异教徒。虔诚的人总是这样为了世俗的利益进行斗争。政府教派以受希腊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主，还包括有许多庇西底亚和西里西亚士兵服役的军队。此外，与教会势力抗争的比较有为的国王也在此列。就像一千年后霍恩施陶费尔王朝与教皇斗争一样，亚纳奥斯采取强硬措施压制教士。他的两个儿子相互残杀，发动了内战(685年)。法利赛人对抗比自己强大的亚里斯多布鲁斯，企图在他兄弟、善良而怯弱的希尔卡诺斯有名无实的统治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兄弟不和不仅使征服犹太人的事业陷于停顿，而且给了外族以干涉的机会，并因此使外族在叙利亚南部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些外族中首先是那巴提安人。这个奇特的民族常常与东邻纵横驰骋的阿拉伯人混为一谈。其实那巴提安人更接近于阿拉梅伊人，而不是伊斯梅尔的真正的后代。这个阿拉梅伊或者被西方称为叙利亚的部族在很多年以前为了发展贸易，从他们古老的居住地巴比伦地区迁移到阿拉伯海湾的北端，建起了一个殖民区，这就是那巴提安人。他们居住在苏伊士和艾拉海湾之间的西奈半岛和佩特拉地区(穆萨河地区)。在他们的港湾内，地中海和印度的商人交换货物，互通有无。南部的沙漠商队的通行之路从加沙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河口和波斯湾，经过那巴提安王国的首府佩特拉。在那里至今还存留着庄严雄伟的石砌宫殿和陵墓。比起那些逸失殆尽的传说来，它们是那巴提安文明更为有力的证据。法利赛人的首领按照祭司的方式，为了争取自己宗派的胜利不惜以丧失独立和王国的完整为代价。他们请求那巴提安国王阿勒塔斯协助他进攻亚里斯多布鲁斯，作为条件，他们答应把亚纳奥斯从他们手中夺取的土地如数奉还。这样，阿勒塔斯率领号称五万人马的大军开进了犹太人的土地。法利赛人加入之后，队伍更加庞大，把亚里斯多布鲁斯王包围在他的都城之内。——当时整个叙利亚地区盛行自卫权。这样，当然首先是比较大的城市遭殃。像在安齐奥基亚、塞留西亚和大马士革这样

的城市,农耕、海上贸易和商业贸易均陷于瘫痪。毕布鲁斯和贝利托斯(贝鲁特)无力保卫自己的农田和船只免受伊都里亚人的破坏。伊都里亚人从山堡和海堡威胁着他们陆上及海上的安全。大马士革归顺了更远一些的那巴提安人或者犹太人的国王,以此对抗伊都里亚和托勒密的进攻。萨普西塞拉摩斯和阿齐佐斯插手安齐奥基亚市民的内部争斗,希腊的大城市这时险些沦为阿拉伯埃米尔的占领地。这种情形很像德意志中世纪的皇帝空位时期。那时,纽伦堡和奥古斯堡得不到皇帝的法律的保护,只能以高墙自卫。叙利亚的商人望眼欲穿地期待着一个强大的军队的到来以重新带给他们和平和交通往来的安全。叙利亚并不缺少合法的皇帝,恰恰相反,皇帝甚至多达两三个。塞留古斯家族的一个叫做安齐奥科斯的王子被卢库鲁斯任命为叙利亚最北部行省科马基尼的总督。亚细亚的安齐奥科斯继承叙利亚王位的权利得到元老院和卢库鲁斯的承认,亚美尼亚人撤走以后,他在安齐奥基亚被接受,并被尊为王。马上有另一个塞留古斯家族的王子菲利普斯与他抗衡。几乎像亚历山大里亚居民一样活跃而喜欢与人作对的安齐奥基亚市民以及各个毗邻的阿拉伯的埃米尔全都参加了这场家庭的内战。这个家庭的冲突与塞留古斯家族的统治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合法性在居民眼中变得可笑而令人作呕。所谓的合法的国王在国家中还不如小小的酋长和强盗骑士,这已不足为怪。

要在这种混乱中重新建立起秩序,既不需要天才的设想,也不需要运用强大的权力,而只需要看清罗马及其臣属的利益,需要有策略地建立起必要的机构并很好地维持下去。元老院的"合法化政策"出卖了自己。反对派派到军队中的将领丝毫不必顾念朝廷的利益,他们只须注意将来不要由于对王位的争夺或者邻国的觊觎使罗马丧失掉对叙利亚王国的统治。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唯一的途径便是在这地方派驻总督,以加强罗马对其属区的管理。很久以来,不是由于外在的意外事件,而是由于统治者本人的过失,政府手中

的缰绳的确放松了许多。庞培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亚细亚的安齐奥科斯请求他承认自己作为叙利亚统治者后裔的统治地位，庞培回复说：对于一个既不能够保卫国家、又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君主，他不会因为他的臣下的请求，更不会因为他们的某些愿望把一个王国交还给他。罗马代执政官的这一回执剥夺了塞留古斯王族延续了二百五十年之久的统治。不久，安齐奥科斯本人也丧了命。这完全是由于赫梅萨的埃米尔萨普西塞拉摩斯的阴谋。他是安齐奥基亚的属官。从此以后，这个影子皇帝以及他的要求再也无人提起了。恰恰相反，为了组建新的罗马军队，在混乱棘手的境况下建立起码的秩序，还需要派兵进入叙利亚，镇压在4年的王朝统治期间所有扰乱和平秩序的人。在对本都斯王国和高加索作战的同时，庞培也关注着叙利亚。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向叙利亚派驻代表和分队予以干预。把庞培派往东方的罗马护民官奥鲁斯·加宾尼乌斯在689年到达底格里斯河，而后穿过叙利亚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以调解犹太王国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固若金汤的大马士革城也是这样被罗利乌斯和麦特鲁斯占领的。此后不久，庞培的另一名副将马尔库斯·斯考鲁斯到达约旦，调解那里此起彼伏的争斗。卢西乌斯·阿夫拉尼乌斯在庞培远征高加索期间曾任驻亚美尼亚的罗马军队的司令官。他也从科都埃纳（库尔德斯坦北部）进入上美索不达米亚，在卡里的希腊人的大力协助下成功地穿过艰险的沙漠之路以后，征服了奥斯莱纳的阿拉伯人。690年底，庞培本人到了叙利亚[①]，在那里呆到第二年夏天。他坚决地、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整顿了那里的形势。他参照塞留古斯王国盛世的状况，铲除了所有谋求篡权的势力，勒令强盗首领交出他们的城堡。阿拉伯的酋长们被重

---

① 689年至690年的冬天，庞培是在里海附近度过的。690年，他首先制服了本都斯王国中最后几个还在顽抗的城堡，然后慢慢地一面整顿各地的秩序，一面向南行进。庞培于690年开始整顿叙利亚。由此可以证明：叙利亚行省在这一年发起暴动。

新限定在他们的沙漠地区之内，每个部族的内部关系也做了明确的调整。罗马大军俯首听命，为掌权者所有。这些措施被证明是十分必要的，对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强盗骑士尤其如此。里西阿斯的首领西拉斯，特利波里斯的首领狄奥尼西奥斯和毕布鲁斯的首领西尼拉斯在他们的城堡内被生擒并绞死。伊都利亚人的山上和海上的城堡被攻陷。卡尔西斯之主托勒密·梅纳奥斯之子被迫交纳1000塔连特(150万塔勒)的赎金换取自己的自由和统治权。这个新的掌权者的命令大多被不加抵抗地执行了，只有犹太人还在瞻前顾后。以前由庞培派来的调解人加宾尼乌斯和斯考鲁斯据传都接受了大量贿赂。他们在希尔卡诺斯与亚里斯多布鲁斯兄弟之争中支持后者，并迫使那巴提安王阿勒塔斯解除了包围耶路撒冷的命令，返回故土。阿勒塔斯在归途中被亚里斯多布鲁斯击溃。庞培到叙利亚上任之后，取消了他的下属所做的规定。他命令犹太人重新实行早在593年就被元老院承认的高级祭司宪法。他下达命令，迫使酋长们放弃所有由哈斯莫尼族酋长所征服的土地。法利赛人派遣一支由二百名德高望重的人组成的使团到罗马统帅那里，在他们的请求下，罗马剥夺了叙利亚王的统治权。法利赛人的这种做法有损于自己民族的尊严而有利于罗马。庞培这样做自然顾及到塞留古斯王族的旧有权利，同时罗马也不能容忍像亚纳奥斯这样具有征服力的势力在自己的王国内存在。亚里斯多布鲁斯还在犹豫，不知应该默默忍受不可避免的结局还是应当奋起自卫，听凭命运的决断。他忽而决定归顺庞培，忽而决定呼吁犹太人中的民族派起来反对罗马人。当罗马大军最终兵临城下，他不得不向敌人投降的时候，他的军队中的一部分比较坚定或者说比较狂热的人拒绝执行他这个不自由皇帝的命令。首都投降，狂热分子以死抗争，坚守在陡峭的圣殿山上达三个月之久，直到最后包围他们的罗马军队趁着犹太人的安息日进攻而强占了圣地为止。这场无望的抵抗运动的发起人没有死在罗马军队的刀剑之下的，也被送到罗马权

杖的斧下。这样，罗马的新占领区的抵抗活动到此结束。

由卢库鲁斯开始的大业由庞培最后完成。迄今为止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俾泰尼亚、本都斯和叙利亚并入罗马版图，一百多年来被认为是必要的想法即以直接控制重要的附属国代替疲软的属国制度终于付诸实施。元老院被推翻，格拉古斯派执掌大权。罗马在东方有了新的边界、新的邻国和新的友好和敌对的关系。亚美尼亚王国和高加索酋长管地刚刚归于罗马的间接统治区之列。西默里人的博斯普鲁斯——米特拉达梯斯·攸巴托所征服的广阔土地中很小的剩余部分，现由他的儿子和谋害者法那西斯统治，成为罗马的一个属国。只有法那哥利亚城由于长官发出起义的信号被罗马承认其独立和自由，那巴提安人却没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尽管阿勒塔斯满足了罗马的贪欲，退出了犹太王国，但大马士革还在他手中。那巴提安王国还从来没有让一个罗马士兵跨进过。为了使它降服，至少让阿拉伯领土上的新的邻国知道，现在奥伦特河畔和约旦河畔的土地是在罗马的鹰统治之下。叙利亚的土地作为无主的财富任人劫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庞培于691年开始了对佩特拉的征伐。由于受阻于犹太人在此期间发起的暴动，庞培并非毫不情愿地让他的后任斯考鲁斯去处理远在沙漠之中的那巴提安城的棘手的事情。事实上，斯考鲁斯不久也被迫半途而废。他只能在约旦河左岸的荒漠中与那巴提安人作战，他可以进攻犹太人，却无法取得大的胜利。最后伊都里亚的能言善辩的犹太大臣安提帕特罗斯说服阿勒塔斯向罗马总督交纳一笔款项，以换取对方对自己的全部领土包括大马士革的保障。阿勒塔斯王手牵骆驼，匍匐在罗马人面前，献给他橄榄枝。这就是加在斯考鲁斯头上被极力称颂的和平。较之以罗马与亚美尼亚人、伊伯里亚人、博斯普鲁斯人和那巴提安人所建立的新关系，它通过占领叙利亚与帕提亚王国建立起来的新的毗邻关系则更为成功。当本都斯和亚美尼亚两个王国还存在的时候，罗马运用灵活多变的外交手

腕对待弗拉阿特斯，卢库鲁斯和庞培当初都十分愿意把幼发拉底河另一岸的土地交给他统治，而现在，阿尔萨西斯家族的新邻却变得如此强硬。如果说王权统治的艺术可以允许他忘记自己所犯的过错的话，那么弗拉阿特斯这时或许会想起米特拉达梯斯的警戒之言，即帕提亚如果与西方结盟而反对与自己同族的王国，那必将导致这些王国的灭亡，而后是自身的毁灭。罗马与帕提亚结盟把亚美尼亚王国置于死地。一旦大敌已灭，罗马便故伎重演，更换角色，转而开始庇护被侮辱的敌人而不惜损害过于强大的盟友的利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父亲提格累尼斯在庞培那里受到引人瞩目的厚遇，他的儿子、帕提亚王的盟友和女婿提格累尼斯则望尘莫及。此后不久，庞培下令把年轻的提格累尼斯关进监牢，任凭弗拉阿特斯在这位颇有交情的统帅面前为女儿女婿说情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直接的侮辱。更有甚者，弗拉阿特斯和提格累尼斯都觊觎科都埃纳这块宝地，庞培命令军队为后者夺取了这个地方，还把科都埃纳境内的帕提亚人全部驱逐出去，进击他们直至阿提阿贝纳的阿尔贝拉。而克特西丰政府事先竟没有得到一点消息（689 年）。最令人担忧的是，罗马似乎并不尊重条约明确规定的幼发拉底河界。罗马从亚美尼亚派往叙利亚的小分队多次横穿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的埃米尔奥斯莱纳的阿布卡洛斯在明显的优厚条件下被收为罗马的藩属。奥鲁罗斯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在尼西比斯和底格里斯河之间，大约在科马基尼的幼发拉底河口以东五十德里处。它被看作是罗马统治的最东点，大约是间接的最东点，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更加广阔、更加富饶的北部如同科都埃纳一样被罗马人划归亚美尼亚王国管辖。这样，罗马人与帕提亚人间的边界就不再是幼发拉底河而变成了广阔的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即使这一界限也只是暂时的。帕提亚使节请求罗马遵守看来只是口头订立的有关幼发拉底河边界的条约。庞培给予他这样一个含糊的回答：罗马的土地像它的权力一样广大，罗马最高统帅

与统辖米提亚地区以及偏远的埃利马伊斯行省(位于苏西阿纳、米提阿和波斯之间，在今天的洛雷斯坦)的总督们之间令人瞩目的往来就是对这个回答的注解[1]。埃利马伊斯是个偏远的多山的战乱频繁的地方，这里的总督早就试图获得一种不受众王之王支配的地位。庞培接受了这些君主奉献给他的敬意，这对帕提亚政府来说不啻是一种更大的伤害和威胁。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有：帕提亚国王一向享有"众王之王"的荣誉，这在迄今为止与罗马的交往中也得到了对方的承认，现在突然间这个头衔被罗马人换成了"国王"。这与其说是外交礼节上的冒犯毋宁说是一种威胁。罗马继承了塞留古斯王族的王位之后，看上去几乎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再回复到那个古老的时代，那时整个伊朗和图兰地区由安齐奥基亚统治，帕提亚王国还不存在，只有帕提亚总督。克特西丰宫廷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向罗马开战，这是690年由于疆界问题向亚美尼亚发动战争的前奏。但是，正当令人闻风丧胆的将军率领强军压境之时，弗拉阿特斯终究没有勇气与罗马公开决裂。当庞培派遣代理人调解帕提亚与亚美尼亚的纠纷时，弗拉阿特斯顺从地接受了罗马的强制性调解，容忍调解人把科都埃纳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判给亚美尼亚。此后不久，他的女儿、儿子和女婿也成为罗马统帅的战利品。在罗马无比强大的力量面前，帕提亚人也瑟瑟发抖。如果说他们没有像本都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在罗马的武力面前屈服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经受这样的战斗。

统帅还有能力整顿新征服地区的内部秩序，尽可能地消除长达十三年之久的毁灭性的战争留下的痕迹。庞培完成了卢库鲁斯及其使节在小亚细亚和麦特鲁斯在克里特岛进行的管理活动。至此，亚细亚行省包括米西亚、吕底亚、弗里济亚和卡里亚，由一个边

---

[1] 这种观点是以普鲁塔克的描述为基础提出的，并在斯特拉波尼马斯对埃利马伊斯地方总督的地位的描述中得以肯定。将米提阿及其国王达勒伊俄斯归入被庞培征服的王国及其国王之列，是从中引发的一个细节。

界行省变成了中心行省。新设行省俾泰尼亚和本都斯，管辖以前由尼科米德斯统治的全部国土和以前的本都斯王国的西部直至哈利斯及其河上的广大地区；西里西亚行省，尽管它由来已久，但至此才名副其实地扩大疆域，进行管理，并把旁非利亚和伊沙利亚包容进来；还有叙利亚行省和克里特行省。当然，不能从现在的概念的意义上来看待罗马领土上的这些国家。政府的形式还大体保留旧制，只是以现在的罗马的属区代替了以前的君王统治。亚细亚地区像从前一样由王室领地、真正自治或在法律意义上自治的城区、酋长制和祭司制的统治区和王国组成。所有这些形式在内政方面都或多或少地保持独立，而在其他方面则时松时紧地受制于罗马政府及其代执政官，就像以前隶属于众王之王及其地方长官一样。附属国的君王中，按照等级来看，占首要地位的是卡巴多西亚的一个国王。他从卢库鲁斯那里接受了麦利特纳的封地（在马拉提亚附近），把疆域扩展到幼发拉底河，而后，在西部边界，庞培授予他从西里西亚夺取的几个地区，使他的疆土达到从卡斯塔巴拉直到伊科尼翁附近的德尔伯地区。在东部边界，庞培把位于幼发拉底河左岸、麦利特纳对面，起初要划给亚美尼亚王子提格累尼斯的索芬尼地区交给他管理。这样，整个幼发拉底河走廊就全部归由这个酋长统辖。叙利亚和卡巴多西亚之间的小块土地科马基尼以萨摩萨塔（萨姆萨特）为都，是上面提到的塞留古斯家族安齐奥科斯的附属国。安齐奥科斯还得到了重要的、控制着幼发拉底河的要塞塞留西亚（在比拉狄克附近）和紧靠幼发拉底河左岸的地带。这样，就保证了穿过幼发拉底河的两条主要通道连同河东岸一个合适的区域，由两个隶属于罗马的君王管理。除了卡巴多西亚国王和科马基尼国王之外，小亚细亚还有实权在握并且力量远在两人之上的新王狄奥泰鲁斯。狄奥泰鲁斯是居住在佩西努斯附近的凯尔特人的一支托利斯托波基人的四首领之一，他受卢库鲁斯和庞培之召和其他小的罗马藩属一起随罗马大军出征。与其他弱小的东方部族不

同，狄奥泰鲁斯在作战中出色地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和可靠性。因此，在他世袭的加拉西亚地区和阿密索斯与哈利斯河口之间的富饶的领地之外，罗马统帅还赏赐给他以前本都斯王国的东半部连同海上城市法那赛亚和特拉佩苏斯、本都斯的亚美尼亚地区直到科尔基斯和大亚美尼亚的边界，称之为小亚美尼亚王国。此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扩张了业已可观的领土，占领了凯尔特的特洛克默人的地区，驱逐了那里的四首领。这样，他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封臣变成了小亚细亚最强大的君主之一，守卫着王国边界的重要的一部分。地位次之的领主是其他为数众多的加拉西亚四首领。其中特洛克默人的酋长博果狄阿塔鲁斯由于在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中表现出色而被庞培授予从前本都斯的边城米特拉达茨永作为奖赏；帕夫拉哥尼亚的酋长阿塔鲁斯，他率领他的部族回到皮莱麦纳斯家族的旧统治区；科尔基斯地区的阿里斯塔库斯以及其他小的领主塔孔提摩托斯，他统治着西里西亚的阿马诺斯山谷；托勒密·梅纳奥斯是黎巴嫩山边卡尔西斯之主；那巴提安国王阿勒塔斯是大马士革之主；最后还有幼发拉底河两岸的阿拉伯埃米尔、奥斯莱纳的阿布卡洛斯，罗马人为了把他作为对付帕提亚人的前哨而尽力争取他；赫梅萨的埃米尔萨普西塞拉摩斯；兰姆贝尔人的埃米尔阿尔考多尼欧斯。除此之外，宗教首领在东方像世俗的君主一样统治着国家和人民，他们在狂热主义的故乡有着根深蒂固的权威性，罗马人很明智地没有触犯他们，甚至没有劫掠圣殿中的宝物。他们是佩西努斯的地母之神的高级祭司：卡巴多西亚的科马那（在上萨洛斯）和与其同名的本都斯的城市（托卡特附近的居美纳克）的女神玛的两位高级祭司。他们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享有仅次于国王的权力，多年后他们拥有广阔的地产和独立的司法权，并占有六千圣殿奴隶。从米特拉达梯斯手下投奔庞培的阿基拉奥斯的与其同名的儿子被庞培授予本都斯的高级祭司的职务。在卡巴多西亚的莫利梅纳，担任维纳西乌斯的宙斯的高级祭

司年收入可达 22500 塔勒（15 塔连特）。在强盗之邦西里西亚，在艾阿之子道埃克鲁斯为宙斯建立了神庙的地区，其“大祭司和领主”依据继承权由其后代继续担任。庞培拆除了犹太首都的城墙，毁掉了国土内国王珍藏财宝的城堡和堡垒，把统治这个民族的权力交还给犹太人的“大祭司和民族之主”，并使它郑重保证与罗马和平相处，不再征服和扩张。除了世俗的和宗教的掌权者外，城镇也起着一定作用。其中部分城镇结成更大的同盟而各自保持相当的独立，比如由吕西亚的二十三个城镇组成的组织严密的同盟，他们始终不参与海盗的乱七八糟的活动。与此相反，为数众多的各自分散的城镇，尽管自治权得到了书面确认，但实际上还处于罗马地方长官的控制之下。罗马人认识到为了维护希腊化主义，在东方保卫和扩大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土，必须首先促进城市的发展。因为如果城市普遍成为文明的载体的话，那么东西方的对抗从根本上来说便在于东方军事独裁的分封等级制与古希腊和意大利式的从事手工业和贸易的城市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尽管卢库鲁斯和庞培于其他方面意不在使东方与西方拉平，尽管庞培在细节问题上倾向于改进和修改他的前任所做的规定，但在全力发展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城市这一基本原则上两人却不谋而合。塞西库斯城在上一次战争的最初的激战阶段曾奋力抵抗，卢库鲁斯因此大大扩展了它的地盘，本都斯的赫拉克里亚城尽管曾经顽强地对抗过罗马，但罗马还是收回了它的土地和港口。科塔对这个不幸的城市怒气冲天，因此受到元老院的严厉指责。卢库鲁斯极力抱怨自己时运不济，没有能够保护息诺普和阿密索斯两座城市免受本都斯和当地士兵的破坏。他竭尽全力重建这两座城市，扩展了它们的领土，还邀请原来土地上的居民大批返回故土，同时还把一些希腊人迁移过去成为那里的新居民，被摧毁的建筑物也重新建立起来。庞培以更大的规模做着同样的事。平定海盗之后，他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把二万多名俘虏送上绞刑架，而是给他们以安身

之所，他把其中一部分移民迁徙到西里西亚。西里西亚平原上业已荒芜的城市马洛斯、阿达那、埃皮法纳亚等等有了新的居民。索洛伊城从此以后被称为庞培城（庞培攸波利斯）。另一部分俘虏则被安置在阿加亚的提默和塔伦特城。给海盗建立居民区的做法受到很多责难[1]，这样做似乎是给犯罪以奖赏。事实上，这种做法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伦理上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海盗行为与强盗抢劫并不相同，而且按照战争惯例，俘虏理应得到善待。不管怎样，罗马的新的行省内的城市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本都斯王国城市寥寥无几，这一点早已说明。卡巴多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在一百年以后还没有城市出现而只有城堡要塞作为农耕居民战时的藏身之地。在整个小亚细亚的东部，除了海岸边人烟稀少的希腊居民区以外，当时的情况基本如此。庞培在这些地区所建的城市，包括西里西亚移民区在内，共有三十九座，其中有几座城市发展得颇为繁荣。在以前的本都斯王国的土地上发展起几座城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尼科波利斯即"胜利之城"，它就建在庞培遭受最后一次重大失败的地方——这是常胜将军最好的胜利纪念碑。麦加罗波利斯，它以庞培的别名命名，位于卡巴多西亚和亚美尼亚之间，即后来的塞巴斯特亚城（现在的西瓦斯）、齐拉城；庞培曾在这里打过败仗，城市以阿纳提斯的神庙为中心，直到那时还由当地的高级祭司统治，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地区。庞培赋予它城市的形式和城市的法律。狄奥波利斯，以前称为卡比拉，后称新塞萨利亚（尼克萨），同样也是上一次战争中的战场之一。麦加罗波利斯或称庞培攸波利斯，位于吕库斯河和伊利斯河的汇合处，是重建起来的攸巴多利亚。城市最初由米特拉达梯斯建立，后来由于它的背叛又被他本人毁掉。纳奥波利斯，又称法泽蒙，在

---

[1] 这里指的大概是西塞罗提出的责难。庞培在为海盗建立居民区的同时免除了他们的赋税，而众所周知，依附于罗马的行省一般都要缴纳贡赋。

阿马塞亚和哈里斯河之间。多数城市的建立不是通过移民，而是毁坏乡村，把乡村的居民迁入城市的高墙之内实现的。只是在尼科波利斯，庞培把军中的伤病人员和年老体弱的士兵安置下来。这些士兵宁愿立即建立一个新的故乡也不愿意多年以后重返意大利。在庞培的指示下，也出现了古希腊化文明的热点。在帕夫拉哥尼亚即666年米特拉达梯斯大败俾泰尼亚人的地方建起了第三座庞培城。在遭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卡巴多西亚行省，庞培重建马萨卡都城（后称塞萨利亚，现称恺撒利亚）和另外七座城市，还在西里西亚和科伊勒叙利亚建立了二十座城市。在原犹太地区，根据庞培的命令从废墟中重建了德卡波利斯的加达拉，并且建起了塞留西斯城，亚细亚大陆上庞培管辖之下的领土的绝大部分成了新的居民点。庞培不太关心或者根本不关心克里特岛的事情，这里还有相当广阔的罗马国有领地。——他像对建立新城一样热衷于管理和促进现存的城镇。他全力制止了蔓延一时的种种恶习，粉碎了篡权的阴谋。他为不同的行省仔细地设计了详尽的城市管理制度，进行市政管理。一系列有名的城市被赋予特权。奥伦特河畔的安齐奥基亚获得自治。它是罗马统辖下亚细亚土地上最重要的城市，稍逊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古代的巴格达城和帕提亚王国的塞留西亚城。获得自治权的城市还有：安齐奥基亚的邻城、波斯的塞留西亚城，这是它英勇地对抗提格累尼斯获得的奖赏。加沙以及所有从犹太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城市，亚细亚前沿的米提莱纳和黑海边的法那哥利亚城也获得了自治权。

这样，罗马在亚细亚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它包括附属国国王、封建领主、祭司首领和一系列完全或部分自由的城市，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极其相似。从其所克服的困难以及达到的结果看，这无论如何不能算一件奇功伟迹，也不是靠罗马贵族为了卢库鲁斯和平民为赞誉庞培所用的天花乱坠的大话实现的。庞培让人为他庆功，自己也大肆庆祝，他这样做，以至于人们可

以把他看作一个比他实际上更傻的傻瓜。米提莱纳人为他树起一座画柱，尊他为城市的拯救者和缔造者，敬他为从海上和陆上结束了波及整个世界的战争的人。这样的敬意对于一个肃清了海盗并征服了东方王国的人来说并不为过。庞培自己的凯旋式的碑文上计有一千二百万俘虏、一千五百三十八个被征服的城市和城堡——好像要以数量代替质量一样——把他取得胜利的范围从亚速海推广到里海，又从这里延伸至红海。而庞培本人从未亲眼见过这三个海，尽管他自己不直说，却也让公众们这样认为，即叙利亚的并人——这本不是英雄伟业——使得整个东方直到巴克特里亚的印度地区并入罗马版图。在他的陈述中，在那模糊的远方，他的东方征服地的界限也变得含混不清了。民主的奴性一向与宫廷的奴性竞争，他们也热心参与这些庸俗的事情。他们在593年9月28日和29日——庞培的四十六岁生日——为他组织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游行队伍穿过罗马的街巷，队伍中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而且还有米特拉达梯斯王的王冠和亚细亚三个强大的国王米特拉达梯斯、提格累尼斯和弗拉阿特斯的孩子。不仅如此，他们还奖赏他们的战胜了二十二个国王的将军，授予他君王的称号、一顶金冠和终身高级职位的标志。为向他表示敬意而打制的硬币上，位于从世界的三个部分捧回的三顶桂冠之间是地球，地球的上方悬浮着市民们向征服了阿非利加、西班牙和小亚细亚凯旋而归的统帅敬献的金制桂冠。在这样幼稚可笑的敬意面前，无怪乎相反的声音充耳可闻了。罗马贵族中纷纷传说东方的臣服实际上应归功于卢库鲁斯，庞培到东方不过是为了赶走卢库鲁斯，从别人手中夺来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这两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被派到东方代替卢库鲁斯的不是庞培，而是格拉布里俄。尽管卢库鲁斯作战勇敢，但事实上，当庞培接管统率大权时，罗马已丧失了原来的战果，不再占有本都斯的一寸土地。首都人的嘲讽倒还切中要害。他们用征服了世界的胜利者的手下败将的名字作为绰

号来称呼这位胜利者，一会儿称他“撒冷（耶路撒冷的别名——译者注）的胜利者”，一会儿称他“阿拉伯的埃米尔（埃及税吏）”，一会儿又把他叫做“罗马的萨普西塞拉摩斯”。毫无成见的判断者不会参与那种过分的吹捧，也不会苟同于这种贬低人的说法。卢库鲁斯和庞培征服并整顿了小亚细亚。他们证明自己是明智的、强有力的将领和总督，而不是英雄和国家缔造者。作为统帅，卢库鲁斯具有非同一般的天才和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庞培则具有军事判断力和一种罕见的谨慎。很少有统帅像庞培一样在拥有如此的兵力和不受限制的权位的情况下在东方这样保持谨慎。灿烂夺目的征服的功迹几乎是自动地从四面八方落到他的手中。他本可以向西默里人的博斯普鲁斯及红海的方向进军。他有机会向帕提亚发动战争。埃及地区此起彼伏地爆发起义，他本可以把不被罗马承认的托勒密国王赶下台去，实现亚历山大大帝的遗愿，但是他没有进军蓬提卡彼翁，没有进攻佩特拉，也没有向克特西丰和亚历山大西亚宣战。他只采摘自动落到他手中的果实，横扫一切的海战也是这样完成的。假如他采取这种适可而止的做法是为了严格遵守下达给他的命令，像他所说的那样，或者由于他认识到罗马的征服总会达到极限，新增的版图未必对政府有利，那么这位极具天才的军官理应获得比历史所给予他的评价更高的赞扬。不过庞培的谨慎无疑是他特有的缺乏自信和创造性的结果，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缺乏比他前任的突出更有利于国家。卢库鲁斯和庞培两人也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卢库鲁斯轻率行动使胜利的成果得而复失，算是自食其果；庞培对待帕提亚人的错误政策的后果则由他的后任承担了。如果他有信心，就可以向帕提亚人宣战，但他太怯懦；如果他信守诺言，承认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他可以与他们媾和，但对这种做法他又太虚荣。因此他筹划出这样一种阴谋，即以无节制的侵犯来破坏克特西丰宫廷所希望并由他们单方面实行的睦邻关系，但是他允许对方选择冲突和报仇的时

间。作为小亚细亚的管理者，卢库鲁斯所拥有的财产超过了酋长，庞培从卡巴多西亚，从富足的城市安齐奥基亚，从其他酋长和城镇那里获得大笔现金以及更为可观的债券转让证书作为他进行管理活动的酬劳。诸如此类的敲诈在此期间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贡税。两位统帅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可以被收买。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向与罗马利益一致的党派要求很高的报酬。尽管如此，这并不妨害两人对东部的管理首先以罗马的利益为重，这是相当值得称赞的。把藩属变成臣仆，对东部边境进行更好的管理，建立一支统一的强大的军队，这些措施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大有裨益。罗马在财政方面的收益也是无法估量的。除了几个以特殊的方式被征服的区域外，所有酋长、祭司和城市都必须向罗马缴纳贡赋，这使罗马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一半，而小亚细亚当然备受其苦。庞培从钱财中拿出 1500 万塔勒（2 亿塞斯特尔茨）交给国库，另外拿出 2400 万塔勒（16000 塔连特）分赏给他手下的官兵。我们如果计算一下由卢库鲁斯带来的可观的钱财、非官方的罗马军队的敲诈所得、战争赔款，便可想而知国家财富已被搜刮殆尽了。小亚细亚向罗马缴纳的贡税就其本身而言，也许并不比向以前的统治者所缴纳的多，但是，这些贡税自此流入国外，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被用于小亚细亚。这样一来，贡税成了更为沉重的负担。贡税建立在为了罗马的利益对旧有的行省和新征服的土地的广泛的剥削上，但是，这个责任不应归于统帅个人，而应归于罗马的党派，他们理应顾及到这一点。卢库鲁斯甚至曾经极力争取限制罗马资产者在亚细亚地区牟取暴利的活动，这也是导致他垮台的主要原因。在没有任何党派政策束缚他们手脚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尤其是对小亚细亚城市的救济帮助证明两位统帅是非常认真地复兴败落的地区的。尽管几个世纪以后，小亚细亚的许多村庄还遍布着废墟，让人想起伟大的战争的时代，但是，息诺普在卢库鲁斯手中重建起来的那一年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几乎所有本都斯王国的城市都要感谢庞培，他是他们的缔造者。在卢库鲁斯手中建立起来的罗马在小亚细亚的统治，尽管有许多无可否认的缺陷，但总的来说是明智的，值得称赞的；尽管它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弊端，但是受尽苦难的小亚细亚人也许会因为它伴随着他们在痛苦中长久企盼的内外的和平一起到来而对它表示欢迎。

东部基本保持和平，直到庞培以其特有的胆怯对稍稍的暗示就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并入罗马版图的想法不幸被罗马执掌大权的新三巨头果断地接受为止。此后，内战把东部的行省连同所有其他行省一起卷进了它灾难性的漩涡之中。在此期间，西里西亚的地方长官与阿马诺斯的山民作战，叙利亚的总督在同沙漠中的部族、尤其是在对贝都因人的战争中损失了一些兵力，但这些没有太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坚忍的犹太民族顽强地抵抗征服者的斗争。由被废的阿里斯多布鲁斯国王的儿子亚历山大发动和由成功地逃脱牢笼的阿里斯多布鲁斯本人领导，在奥鲁斯·加宾尼乌斯总督统治期间（697 年 700 年）犹太人发动了三次起义。对此，由罗马指派的高级祭司希尔卡诺斯的政府无能为力。犹太人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反抗罗马，他们的反抗完全出于东方人不可战胜的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的一种抗拒心理。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起义的爆发以埃及出现危机和叙利亚军队撤走为契机。起义以杀戮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罗马人开始。能干的地方总督费尽力气才使少数人逃脱这种厄运。暂时藏身于加利齐姆山的罗马人从团团包围着他们的起义军当中突围出来。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和长时间的围剿，起义才被镇压下去。由于这个原因，高级祭司的政权被解除，犹太国土像从前的马其顿王国一样被分为五个独立的由管理完善的合议式政府统治的区域组成。罗马还重建了萨马勒亚和其他已被犹太人毁坏的城市，使之形成与耶路撒冷抗衡之势。最后，罗马终于对犹太人征收比其他叙利

亚地区的臣属国更重的人头税。

我们再来看一看埃及王国和与之毗邻的美丽的塞浦路斯岛——这是拉各斯家族广阔的征服地之中最后的土地。至此，埃及是东方唯一的至少在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希腊化国家。像从前波斯人在地中海的东半部定居时，埃及是他们的最后的征服地一样，西方的强大的征服者在入侵这块富饶而独特的土地之时，犹豫的时间也最长。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其原因并不在于罗马害怕埃及反抗，也不在于缺乏合适的借口。埃及几乎同叙利亚一样不堪一击。根据罗马城镇法，早在673年，埃及王国就已灭亡。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宫廷控制之下的皇家卫戍军队中的宫廷卫队可以任命或罢免官吏，还可以拥立或废黜国王。他们为所欲为，如果提高军饷的要求被拒绝，他们就把国王包围在宫中。他们在国家中，尤其是在首都——居住着农奴的农村根本不值一提——不受欢迎。至少有一个党派希望罗马军队进入埃及，甚至邀请罗马军队入境。但是，埃及的国王越是不想以武力与罗马抗衡，埃及的财政就越是能够自卫而与罗马的再统一计划相抵触。由于埃及的国民经济的独特的公社制的独裁集权制特征，使得亚历山大里亚宫廷的收入相当可观。罗马政府的收入即使经庞培之手大量增加之后也不过与埃及宫廷的收入大体相当。还有一个原因是寡头统治的猜忌和不信任使他们不愿让征服和统治埃及的荣誉落入一人之手。执掌埃及和塞浦路斯实权的人通过贿赂元老院的头面人物，不仅保住了自己摇摇欲坠的宝座，稳住了统治地位，而且换取了元老院对自己的国王头衔的承认。不过这样做还没有达到目的——正式的国家法律要求罗马公民决议，但在此之前，托勒密的命运取决于每一个民主派的掌权者的好恶。所以托勒密还须向罗马的另一个党派发射糖衣炮弹。这一个党派更加强大，所以所需的贿金也更高——结局有所不同。696年，民众即民主派的领袖宣布吞并塞浦路斯。采取这一行动的公开的理由是塞浦路斯支持海盗行

为。马尔库斯·伽图被他的对手授权实施这一惩处塞浦路斯的计划。他只身来到岛上，而他也无须军队的帮助，国王服毒自尽。民众未作抵抗便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被归于西里西亚总督的统治之下。国王的价值 7000 塔连特（大约 1050 万塔勒）的财宝落入罗马人手中，充实了国库，使罗马如愿以偿。国王终于没有拿这笔钱作为保住自己的王冠所需的贿赂金，而他的统治着埃及的兄弟却成功地通过公民决议在 695 年从罗马的新主手中换取了罗马的认可。赎金计 6000 塔连特（900 万塔勒），而市民早就对托勒密的花言巧语和腐败统治深恶痛绝，现在由于塞浦路斯的沦丧和当局为了用金钱从罗马手中换取宝座而无限制地提高税款（696 年），市民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把他赶出埃及王国。他发觉手中的商品失去了价值，便转而求助于卖主。卖主认识到作为一个诚实可靠的商人有责任帮助托勒密重新建立起他的统治。但是罗马各派对派遣谁率领军队帮助托勒密并获取期望之中的酬金意见不一，直到在卢卡的协议会上三巨头重新加强了团结，而托勒密也表示同意再缴纳 1 万塔连特（1．5 亿塔勒）时，事情才有了眉目。叙利亚总督奥鲁斯·加宾尼乌斯授命采取措施护送国王回国。在此期间，亚历山大里亚的市民已拥立被逐的国王的长女贝雷尼克为王，并让她与罗马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的一名神职人员科马那的高级祭司阿基拉奥斯结婚。阿基拉奥斯雄心勃勃地积极为登上拉各斯家族的宝座而努力，他先是讨好罗马掌权者，不成，便毫不畏惧地打算凭借自己的力量以武力对抗罗马，保卫自己的新王国。加宾尼乌斯虽然没有对埃及作战的全权，但在掌权者的授意下，以埃及支持海盗和阿基拉奥斯创建舰队为借口即刻发兵进攻埃及国界（699 年）。以前的许多次对埃及的远征都是在行军穿过加沙与佩鲁西翁的沙漠时失败。这次，加宾尼乌斯成功地率军穿过沙漠，这要归功于安东尼乌斯对骑兵部队的迅捷而巧妙的引导。就连边塞重镇佩鲁西翁也未经抵抗就由当地驻防的犹太军队

拱手让给罗马人。罗马军队在城市前方遭遇到埃及人并击溃了他们。安东尼乌斯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又很出色。罗马的先头部队到达尼罗河，埃及的步兵和舰队全部出动，准备决一死战，但是又一次被罗马人战胜了。阿基拉奥斯和他的许多部下阵亡。经过这次战役后，埃及首都马上投降。就此，所有抵抗力量销声匿迹。这个不幸的国家落到了它的法律上的专制暴君手中。如果没有安东尼乌斯的干涉，托勒密可能早就在佩鲁西翁大肆绞杀、砍头，以庆祝自己重新建立的统治了。现在，他肆无忌惮地开始了屠杀，无辜的女儿首先被父亲送上了绞架。与罗马当政者谈妥的报酬不能如约支付，哪怕榨尽这个可怜的民族的最后所有，这个被榨干的国家也还是无力偿付。但至少留驻首都的占领军（包括罗马步兵、凯尔特和德意志的骑兵部队）接替当地的皇家卫队，负责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定。至此，罗马由控制埃及变为直接的军事占领。名义上的当地的王权继续维持下去，但这并不是国家的意愿，而是双重的负担。

第 五 章

庞培不在时的党派斗争

首都各党派的地位随加宾尼乌斯法的实施而相应改变。自从民主派当选的统帅大权在握，该派及其拥护者也随即在都城得势。虽然罗马显贵仍团结一致，从民众大会这一机构中产生出的一如既往的只有那些执政官，按民主派的说法，他们担任执政官尚在襁褓中就已指定好；即使当权者也无力左右选举、消除古老家族在此处的影响。遗憾的是，尽管“新人”已被成功地排斥在执政官范围之外，但是执政官这一职务却开始在新升起的军事强力巨星面前黯然失色。对此贵族们虽然不肯承认，却都已感觉到，他们对自己不再抱有希望。昆图斯·卡图鲁斯，以令人钦佩的顽强坚守其并不令人愉快的岗位，充当一个失败政党的先锋斗士，直至到死（694 年）。除他以外，罗马显贵的最上层中再也无人可称为元老，并像他那样有勇气和毅力代表贵族派的利益。他们那些最有才能、最受欢迎的人，如昆图斯·麦特鲁斯和卢西乌斯·卢库鲁斯，事实已经隐退，各自以恰当的方式回到他们的别墅，寄情于花园和书屋、鸟房和鱼池，以此来尽力忘却广场和市政厅。此风在贵族年轻一代中自然更甚，他们或完全沉湎于奢华和文学，或朝向初升的太阳。这些年轻人中唯有一人例外：这便是马尔库斯·波西乌斯·伽图（生于 659 年），一位具有最良好愿望和罕见

献身精神的人，也是这段政治漫画人物纷呈迭见时期中最令人不快的现象之一。他真诚、坚定，思想行为严肃认真，无限忠诚于祖国和世代相传的宪法，但是头脑迟缓，既无感性狂热也无道义热诚，这本是块过得去的政府财员的料。不幸的是他早早陷于空谈的威力，由于一方面受到当时上流社会中流行的抽象空洞、乏味滞涩的斯多噶派言谈方式的影响，一方面以其曾祖父为榜样，把再现他的风范作为自己的特殊使命。他开始作为模范公民和美德之镜在罪孽深重的都城四处奔走，像老伽图一样抨击时弊，不用车驾而代以步行，不收取利息，拒绝士兵勋章，效仿罗慕路斯国王不着衬衣，以此来重树优良的古风。他的先祖，那位鹤发老农，仇恨和愤怒使他成为演说家，既懂得耕犁也擅于挥剑，他偏狭然而本真、健康的理智往往击中事物的要害。这位年轻、冷静的学者是他的一幅奇怪漫画，嘴上挂着好为人师者的格言警句，总是见他手里拿着书坐着，是位既不懂引兵用武之道，也不懂其他任何手艺的哲人，而是一位抽象道德王国中的云游客。尽管如此，他还是赢得了道义上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在一个彻底无耻、卑鄙的时代，他的勇气和消极的德行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有追随者，有几个人——当然在以后——他们模仿这一生动的哲人形象，再一次把他作为漫画。他的政治影响出于同一原因。因为他是唯一有名的保守派，虽无才能和远见卓识，却正直且有勇气，不管有无必要，随时准备牺牲一切。因此，尽管其年龄、地位和才智都不足以使他担于此任，但他仍然很快成为元老派中公认的领袖。当单独一位坚决的人坚持下去就能决定大局时，他往往能获得成功，在细节问题上，尤其在财务方面，他常常能进行有效的干预。如此这般他从未在元老院会议中失败过，事实上，他已以财政官的职务造就了一个时代，在有生之年，他全面管理公共预算，自然也因此同纳税承租人产生持久的冲突。除此以外，他作为政治家再无建树。他既不能仅止于理解一种政治

目的，也不能辨清各种政治关系；他的全部策略是，反对在他看来有违贵族传统道德政治观的一切事物，因此，他帮对手和帮自己人的时候自然同样多。这位贵族派中的唐·吉诃德，他用自己的品质和行为证明，那时无论如何尚存在一种贵族气派，不过贵族政治却仅仅只是一种妄想而已。

同贵族派的继续斗争并没有带来多大荣誉，民主派当然没有因此停止攻击被打倒的敌人。平民暴徒像随军脚夫冲向攻陷的营垒一样冲向瓦解的罗马显贵，至少政治的浮面被这种鼓动掀向高潮。尤其当盖尤斯·恺撒通过豪华奢靡的娱乐游戏来娱悦民众时（689 年），他们更加愿意一起行动。游戏中的所有器具，甚至野兽的笼子，似乎都是用银块做成，因此根本上说是一种慷慨大度的方式，由于这种慷慨完全是用债务堆砌起来，因而愈发显得气派。攻击罗马显贵的方式多种多样。贵族统治中的滥用职权便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自由派或貌似自由派的官员或代言人，如盖尤斯·科尼利乌斯、奥鲁斯·加宾尼乌斯、马尔库斯·西塞罗等，继续系统地揭露元老管理中极端令人气愤、最卑鄙无耻的方面，同时针锋相对提出各种法案。元老院被指定在确定的天日接见外交使节，以此限制通常对接见的拖延。外国使者在罗马借的贷款要毫无怨言地给予，因为这是真正能控制元老院在议事日程中受贿的唯一手段（687 年）。元老院在个别情况下享受法律豁免的权利受到限制（687 年）；同样受限制的还有一项滥用的职权，即在行省经营私业的每位罗马贵族均可由元老院赋予罗马公使的权力（691 年）。人们加强对收买选票和选举阴谋的处罚（687 年，691 年），被逐出元老院的那几个家伙试图通过再次选举重返元老院，后一种情况尤为猖獗。领主有义务按照他以罗马方式在就职之初立下的标准来进行审判（687 年），这在法律上已得以确定，在此之前仅是约定俗成。——人们首先致力于完善民主复兴运动，用符合时代的形式来实现格拉古斯时代的主要思想。由民众大会选举祭

司的方式于691年由护民官提图斯·拉宾努斯的一项法令确定下来，这种选举方式最初由盖奈乌斯·多密提乌斯提出，后被苏拉废除。这里要指出，重新实施塞姆普罗尼乌斯粮食法的各项内容尚缺乏诸多因素；随后还要指出，在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全权罗马公民的数量增多的紧迫形势下，重新实施该法已完全不可能。在波河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地带，人们积极进行政治鼓动，要求与意大利人在政治上平等。686年盖尤斯·恺撒已经为此走遍该地区；689年马尔库斯·克拉苏斯作为监察官准备将该地居民直接写入公民册，由于同僚的反对而失败。后几任监察官似乎都在有步骤地重复这一努力。正如格拉古斯和弗拉库斯曾作为拉丁族的庇护人一样，现在的民主派首领也以波河以北居民的保护人自居，盖尤斯·庇索（687年执政官）不得不深深后悔，他竟然冒犯了恺撒和克拉苏斯的当事人之一。然而在给予被释放奴隶以政治平等权这一点上，两位首领显然并无赞同之意。护民官盖尤斯·马尼利乌斯曾在一次参加者很少的大会上恢复了有关被释放奴隶投票权的苏尔皮西乌斯法（687年12月31日），于是很快被民主派的领头人抛弃，经他们同意，该法令在通过的第二天便被元老院宣布无效。同样地，在689年通过公民决定，所有既无罗马也无拉丁公民权的外来人全部被逐出都城。人们看到，既考虑到被排斥者争取进入特权阶层的努力，又考虑到享有特权的人对其特权的竭力维护，这种格拉古斯政策的内在矛盾性便同样落在其后继者身上：一方面恺撒及其同仁允许给波河以北的居民以公民权，另一方面他们又赞同继续歧视被释放的奴隶，粗暴地排斥在意大利的希腊人和东方居民与意大利本国人之间进行竞争。民主派对待古老的民众大会刑事审判权的方式也具有这种特点。苏拉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这一权力，但事实上已由受理谋反案和谋杀案的陪审团来代理。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想到去认真恢复这种古老的、早在苏拉之前就已毫无实际意义的审理程序。但是，人民主权原

则这一观念似乎要求至少从原则上承认公民的刑事审判权，因此护民官提图斯·拉宾努斯于691年将三十八年前杀死或据称杀死护民官卢西乌斯·萨图尼努斯的那位老人送上了这一刻板的死罪法庭。如果编年史记载正确的话，这一审理是参照了国王图鲁斯赦免杀姐凶手霍拉提乌斯的案例的。被告就是盖尤斯·拉比利乌斯，他即使不是杀死萨图尼努斯的凶手，至少也举着此人被砍下的头颅在达官显贵中示众游行。此外，在阿普利亚的大地主中他还因滥抓无辜和血腥行径而臭名昭著。即使不是原告本人，也是他幕后更聪明的人，其意根本不在于把这个可鄙的家伙送上十字架处死；起初指控形式被元老院大人削弱，其后，为判决罪犯而召集的公民大会被反对党借故解散，由此整个诉讼程序被取消，人们并非不愿意让事件这样发生。无论如何用这种方式将罗马自由的两位守护神——公民的上诉权和护民官的不可侵犯性——再次定为实用法律，民主的法制基础得以重整——民主派以更大的激情在各种人身问题上展开攻击，只要能够并且允许。他们很聪明，不去强调把苏拉没收的财产归还原主，以免分裂自己的同盟者，同时避免与物质利益派发生冲突，这是派系政治绝少能应付的。召回流亡者的问题与财产问题唇齿相依，因而同样显得不可取。人们于是竭尽努力，把被剥夺的政治权力归还给那些流放者的后代(691年)，不断对元老院的顶层人物展开人身攻击。盖尤斯·麦密乌斯便于688年强加给马尔库斯·卢库鲁斯一次有倾向性的诉讼案。他那位更有名的兄弟因此在都城门前等候了三年，才得到应有的凯旋仪式（680年—691年)。昆图斯·雷克斯和克里特岛的征服者昆图斯·麦特鲁斯也遭到同样的攻击。更为轰动的是，在691年竞选最高祭司职位时，民主派年轻的领袖盖尤斯·恺撒不仅敢于同罗马显贵中两位最有声望的人物昆图斯·卡图鲁斯和战胜伊沙利亚的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展开竞争，甚至还在公民中胜过他们。苏拉的后代，主要是他的儿子法奥斯图斯，一直面

临被起诉的威胁，他被要求偿还那笔据称是被那位君主侵吞的公款。依据法利乌斯法，人们甚至谈论重新受理664年被驳回的民主派提出的控告。当然至关紧要的是依法逮捕参与苏拉时期审讯的那几个家伙。当时，财政官马尔库斯·伽图出于迂腐的正直，首先主动向他们索讨收取的谋杀酬金。这笔钱被看作是非法流失的国家财产（689年），因此便不足为奇。恺撒于次年（690年）作为审理谋杀案法庭的长官断然宣布苏拉制度中的附加条款无效——此条款判杀害被流放的人为无罪，并且将苏拉的刽子手卢西乌斯·卡提林那、卢西乌斯·贝林努斯、卢西乌斯·卢斯西乌斯送交陪审员，让部分人受到审判。现在人们终于开始提起长久以来为人所唾弃的民主派英雄和殉难者的名字，开展纪念他们的活动。已经提到过的有萨图尼努斯，杀害他的凶手受到审判，他因此得以恢复名誉。然而盖尤斯·马利乌斯的名字尚未恢复名誉，曾经一度，当大家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心脏都怦怦作跳；很巧的是，这位使意大利从北方蛮族中得救而人们要感谢他的人，同时也是民主派现在这位领袖的叔父。当686年盖尤斯·恺撒违反禁令，冒险在举行马利乌斯遗孀葬礼的广场上公开宣讲这位英雄令人可敬的品质时，民众高声欢呼起来。三年后（689年）的一天早上，马利乌斯树立在元老院城堡上、后被苏拉命人拆掉的凯旋标志，出人意料地重又在原来的位置上耀眼生辉，上面的黄金和大理石焕然一新，这时非洲战争和西布里战争中的伤残者泪水盈眶地拥到他们爱戴的统帅的塑像四周。面对欢呼的人群，元老院不敢强占这个战利品，它是这批勇敢的人不顾一切法令重新夺得的。

然而所有这些冲突和争执，尽管沸沸扬扬，但从政治角度看却不具备主要意义。寡头政治被推翻，民主派上台掌权。普通人以及最下层的人赶紧过来向倒在地上的敌人再踏上一脚；民主派也有了自己的法制基础和信奉的原则；他们的空论家也未闲着，直至其党徒重新获得全部特权。因此有时弄得十分可笑，像正统派

惯有的那样——这一切既可以理解，又无关紧要。总的看来，政治鼓动没有目的性，其发动者看起来处境尴尬，他们为了有所行动而找到一个对象，忙碌的几乎全是些已经解决或无足轻重的事。其实也只能如此。民主派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成为胜利者；然而他们获得的不只是胜利，还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并非与眼前的敌人进行清算，而是同极为强大的同盟者较量。他们在同贵族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主要归功于这位同盟者，他们现在把前所未有的军政大权向他拱手相送，因为他们不敢拒绝。这位东方和海上的统帅还在忙于废黜和扶立国君，他为此还要多长时间，何时宣布停止战事，除他自己以外，没人能说定，因为和所有其他事一样，他返回意大利的时间这一决定权在他自己手中。罗马各党派在此期间坐以待观。相对而言，元老们自然较为安心地迎候这位令人生畏的统帅。分裂的一天对庞培和民主派来讲不可避免会来临，果真如此的话，元老们不会有所失，而只会有所得。相反，民主派则惶惶不安地等着，试图趁庞培不在之机，采取对策以对付这一迫在眉睫的爆发。为此，他们再次和克拉苏斯靠拢，此人为了对付那位令人嫉恨的对手，除了较以往更加紧密地和民主派结成联盟以外，再无计可施。早在第一次联手之时，作为势力较小的两位，恺撒和克拉苏斯靠得尤为紧密。现在，共同的利害关系把罗马最为富有和负债最高的两人系成了紧密的联盟。民主派表面上把不在场的统帅奉为该党的领袖和骄傲，似乎把所有的箭头都对准贵族派，然而背地里却在为反对庞培进行装备。民主派试图摆脱军事独裁的威胁，这种尝试的历史意义远远高于反对罗马显贵的政治鼓动，那种活动虽沸沸扬扬，然而大部分仅作为面具来使用。当然，他们是在暗处活动，我们对此仅略知一二；因为不仅是当时，连后世也给这些活动的起因罩上了面纱。不过总体而言，无论是这些活动的经过还是目的都十分清楚。一种军事强力只有通过另一种军事强力才能被有效制约。民主派意在效仿

马利乌斯和秦那，加强对政府的控制权，然后把征服埃及的使命或是西班牙的总督职位、或者类似的正、副职委托给他们中的一位领袖，让他和他的军队与庞培及其军队进行抗衡。为此他们需要一次革命，首先要推翻有名无实的政府，事实上不是反对指定的君主而是反对庞培[1]。为了发动这次革命，从颁布加宾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到庞培回归（688年—692年）这段时间，罗马的谋反持续不断。首都处在紧张不安之中，富人们情绪低沉，支付停顿，破产频频发生，一切都是酝酿中的变革的先兆，同时也表明必然引起各党派地位的全新变化。民主派越过元老院对准庞培的一击，在二者之间起到缓和作用。民主派试图用一位他们更满意的人来对付庞培的独裁，也就从他们一方明确承认了军事统治，这实际上是召魔驱鬼；在他们那里原则问题变成了个人问题。

民主派的领袖们制定的第一步革命行动，是由民主派的谋反者在罗马策动一场暴乱以推翻现政府。首都社会最底层以及最上层的道德状况为此提供了令人遗憾的丰富材料。首都的自由无产者和奴隶情况又是如何，无须在此重述。只有穷人才能够代表穷人，当时已经可以听到这句代表性的话——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思想：穷苦大众可以毫不逊色地像富人的寡头政治一样作为独立的力量组织起来，不是去受人压制，而是自己充当统治者的角色，并且类似的思想在贵族青年中也同样引起共鸣。首都的时尚生活耗掉的不只是财产，还有肉体和精神的力量，那种上流社会充斥着香气袭人的发卷、时髦的大胡子和硬袖口，还有舞会、齐特尔琴会或是早、晚的酒会也进行得有声有色。这一切都掩盖不住道义上和经济上衰落的恐怖深渊，以及掩饰得或好或坏的绝望和各种荒唐无耻的决定。这些人毫不掩饰地渴望大肆查抄、流放和销毁

[1] 如果谁明察这段时期政治关系的总局势，无需特别证明便可看出，民主派阴谋的最终目的自688年以后不在于推翻元老院，而是打倒庞培。

债簿的秦那时代。有一大批人，其中不少人并非平常出身和一般家境，他们就等着号令一下，像盗匪一样扑向市民社会，把挥霍掉的财产重新抢夺到手。成群结伙的地方，绝不乏打头人；这里也很快出现可以担当强盗头目的人，曾为审判官的卢西乌斯·卡提林那和财政官盖奈乌斯·庇索并不只是以他们显贵的出身和较高的职位在同伙中出类拔萃。他们切断后路，破釜沉舟，同时以他们的厚颜无耻和聪明才智赢得同谋者的钦佩。卡提林那尤其是这一罪恶时期的最罪大恶极的一个。他的卑鄙行径不属于历史而纯属犯罪；他苍白的面容，疯狂的眼神，忽而迟钝、忽而迅捷的行动，这一切已暴露出他阴森可怕的过去。他极具一个强盗头目所必须的性格特征：享受一切和抛弃一切的能力以及勇气、军事才能、鉴别人的能力和罪犯的力量，还有那种可怕的教唆术，擅于把弱者拉入圈套，把中圈套者训练成罪犯——由这些家伙去实现推翻现行秩序的阴谋，且不会让既有财力又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感到麻烦。像卡提林那、庇索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计划，只要可以让他们进行放逐、销毁债簿。此外，这些人还尤为仇视贵族，因为他们反对那些堕落和危险的人竞选执政官。正像那个曾经作为苏拉的刽子手率领凯尔特人追杀被放逐者并且还亲手杀死自己年事已高的内兄的人一样，他现在同样乐于答应替反对党效力。一个秘密团体建立起来。招募的成员超过四百之众；其下属组织遍布意大利各乡村和城镇。此外，一次将废除债务这样合乎时宜的纲领写上大旗的暴动，自然会有成群的浪荡青年不召而至，加入新兵阵营。

688年12月——据述——这个团体的头目认为找到了开战的合适理由。两位689年当选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尼利乌斯·苏拉和普布利乌斯·奥特罗尼乌斯·培都斯不久因选举行贿而受审，依据法律规定，他们被判失去最高职位的候补资格。两人因此加盟该团体，谋反者决定用武力夺取政权，并以此占据国

家最高统治地位。他们计划在 689 年 1 月 1 日这一天，当新任执政官就职之时，由武装力量强占元老院，杀死新任执政官和通常称为牺牲品的人，在废除剥夺苏拉和培都斯权力的法律判决之后，宣布他们为执政官。然后由克拉苏斯独裁执政，恺撒接任骑兵统帅之职，这毫无疑问是趁庞培远在高加索忙碌之时，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军官和士兵已经雇佣，并做好了安排。卡提林那在约定的那一天等候在市政厅附近，约定的信号由克拉苏斯指示，恺撒向他发出。然而他白白等候一番，克拉苏斯在元老院这次关键的会议中失败，计划好的暴动因此流产。此后，类似的、更加周密的谋杀计划定在 2 月 5 日。然而这一次又失败了，因为卡提林那在雇来的强盗尚未准备到位时，过早地发出暗号。秘密因此败露。政府尽管不敢冒险公开对抗谋反，但仍然对暂时受到威胁的执政官们采取保护措施，由政府雇佣人来对付这伙谋反分子。为了调开庇索，他被提名为财政官，派往近西班牙行使行政官之权；克拉苏斯接受了这项提案，并且期望通过庇索能为暴动赢得这一重要行省的支持。进一步的提议被护民官阻止。——这是传闻，仅反映了政府周围流行的说法，其可靠性必然由于缺乏查证而不能确定。就主要事实而言，即恺撒和克拉苏斯的参与，他们的政敌尚无足够证据，但是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公开行为显然和关于他们秘密行动的传闻是一致的。克拉苏斯在这一年作为监察官试图把波河以北的居民写入公民册，这已经是革命的开端。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拉苏斯同时还准备将埃及和塞浦路斯纳人罗马领地的版图，恺撒在同一时期（689 或 690 年）通过护民官在公民中提出派他前往埃及的提案，以重新扶植被亚历山大里亚人赶走的国王托勒密。这些图谋与反对派提出的指控令人可疑地相吻合。这里无法确凿无误地查证，然而克拉苏斯和恺撒制定计划，趁庞培不在之机加强军事统治，把埃及选为民主派军事力量的根据地。最后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策动了 689 年暴动，卡提林那和庇索因此

成为克拉苏斯和恺撒手中的工具，这些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时间谋反受挫。690 年选举开始，克拉苏斯和恺撒再次掌握执政官权力的努力又告失败。或许有所助益的是，民主派首领的一位亲戚卢西乌斯·恺撒这一次当选为执政官，他是一位懦弱的人，多次被他的族友当作工具加以利用。其间来自亚洲的消息急速逼来。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的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尽管民主派的战略家清楚论证，米特拉达梯斯战争只有捕获国王才算结束，因此有必要开始逐鹿黑海沿岸，并且首先要避开叙利亚——庞培却毫不理会这些废话，于 690 年春从亚美尼亚开拔，进军叙利亚。如果埃及真的被选为民主派的主要营地，那么已刻不容缓，否则进驻埃及的将会是庞培而非恺撒。688 年谋反根本没有被软弱、恐怖的镇压措施所瓦解，当 691 年执政官选举来临之际又死灰复燃。主要参与人员可能还是同一批人，计划也只是稍作改动。运动的领袖再次藏身幕后。他们这次提出的执政官候选人是卡提林那本人和盖尤斯·安东尼乌斯，那位演说家的次子、那位由于克里特岛之役而恶名昭著的统帅的兄弟。人们对卡提林那抱有信心。安东尼乌斯，原本和卡提林那一样是苏拉党人，同样在几年前被民主派送上法庭、逐出元老院，是一位软弱、无足轻重，无论哪方面都够不上领袖资格、彻底破产的人，为了执政官权力和与此相联的好处而自愿投入民主派怀中充当工具。谋反领袖企图通过执政官来夺取政权，把庞培留在都城的孩子抓起来作为人质，在意大利和各行省进行反对庞培的武装准备。近西班牙的总督盖奈乌斯·庇索要在首都开火的消息传到之时树起反叛大旗。由于庞培控制着海域，不能和他从海路进行联系，于是指望民主派的老当事人。波河以北的居民，他们中也酝酿着强烈不满，自然期望立即获得公民权，此外还可指望各个凯尔特族。这种联系一直到达毛里塔尼亚。谋反者中有一人，即努塞利亚的罗马巨商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他因经济纠纷被迫离开意大利，在当地和西

班牙武装起一支由走投无路的人组成的队伍，他自己任首领，率领这支志愿军开往西非，那里有他生意上的老关系。——民主派竭尽全力争取竞选成功。克拉苏斯和恺撒倾囊而出——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并且动用各种关系，为卡提林那和安东尼乌斯当选执政创造条件。卡提林那的同党为把他送上台，绷紧了每一根神经，此人许给他们各种官位和祭司之职，还有对手的宅院和田产，并且答应首先勾销他们的债务。对此人们知道，他一定会信守诺言。贵族派的处境非常困难，主要因为他们根本提不出候选人。显然，这样的人要冒掉脑袋的危险；而危险境况吸引公民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即使是雄心勃勃，也因恐惧而缄默不语。因此罗马显贵浅尝辄止，仅颁布一项关于收买投票权的新法令来控制选举作弊——却因一位护民官的否决而失败——于是他们将选票投在一位尽管不招人喜欢却至少无危害的候选人身上。这便是马尔库斯·西塞罗，尽人皆知的政治骑墙派，他时而与民主派、时而与庞培、时而又从稍远处与贵族派眉来眼去，为每位举足轻重的被告，不论其人品与派别——连卡提林那也属他的当事人之列——进行辩护，根本无所谓党派或者是物质利益派，两者实属一回事。这类人主宰法庭，乐于充当巧舌如簧的辩护人和彬彬有礼、诙谐风趣的清客。他在都城和各地联系甚广，足以与民主派提出的候选人一争高低。因为罗马显贵一致投票，尽管不是十分乐意，加之庞培党人都投票选他，所以他以明显优势当选了。两位民主派所得的票数相去不远，安东尼乌斯因其家庭比其他竞争者显赫，得票稍多。这种意外阻挠了卡提林那的选举，把罗马从秦那第二手中挽救出来。在此之前不久，庇索在西班牙被他本土的卫队杀死，据说此事为他的政敌兼私敌庞培所指使。仅有执政官安东尼乌斯不能成就任何事情，西塞罗在他们二人尚未就职之前，便挣断了把他和谋反连在一起的松散纽带，他放弃理应得到的行省权，把有利可图的马其顿总督职位转让给负债累累

的同僚，于是这次行动丧失掉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间东方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威胁到民主派。叙利亚很快进入安定状态。埃及人已经提出请求，要庞培进驻埃及，把这个国家纳入罗马，人们担心不久肯定会听到庞培本人占据尼罗河谷的消息。正因为如此，恺撒才试图让公民派遣他到埃及，帮助国王反对叛乱的下民，他失败的原因显然在于上下一致反对做出任何有损于庞培利益的事。庞培的回归以及随之而来的明显灾难渐渐迫近，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都城里骚动不安；运动领袖频繁集会，这暗示着又将发生什么事情。会是什么，即将见分晓。当新任护民官就职之时（690 年 12 月 10 日），其中的一位，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鲁路斯随即提出一项耕作法，把民主派领袖置于和庞培同加宾利乌斯—马尼利乌斯提案所处的相同位置。名义上的目的是在意大利建立殖民地，不是通过没收来获得土地——而是保证所有现存的私有权，甚至把最初违法强占的土地也转化为私人全权所有。只有出租的农用领地才分成小块进行移民垦殖。此外，政府一般只有通过购买的方式才能获得这种用于分配的土地。为了筹集这笔必要的资金，要将意大利的其余领地，主要是所有意大利本土之外的领地成功地卖出去，其中包括马其顿、色雷斯的刻索尼斯、俾泰尼亚、本都斯、塞勒尼等前代国王享有的地产，以及根据战争法在西班牙、非洲、西西里、希腊、西里西亚据为己有的城市。同时要变卖的还有政府自 666 年以来购置的、在此之前尚未动用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主要指埃及和塞浦路斯。除具有拉丁权的城市和其他自由城市以外，全部领属地均为了这同一目标负担起高额地租和什一税。同样，新收的行省税款，从 692 年起计，以及变卖所有尚未合法化的掠夺物所得的进款，最后全被指定用于这桩购置上。这些安排涉及到庞培在东方新开辟的税源以及庞培和苏拉后人手中的公共财产。为了实施这一措施，需任命 10 位有自主司法权和自己领地的人，任期五年，

领导二百名骑士阶层的下属官员。选举十人时只考虑亲自申请的候选人，方式与祭司选举相同，从三十五位中抽签选出十七位，派往指定地区。不难发现，此举意在从十人团体中培养起类似庞培、然而少一些军事多一些民主色彩的权力。为主要解决埃及问题需要司法权，为反对庞培而进行装备需要兵权；附加条款禁止不在场者参加选举，将庞培排除在外。减少有投票权的地区以及操纵抽签，这些都会利于民主派控制选举。——然而这种努力完全没有奏效。民众认为在罗马大厦的荫护下从公共仓库中分得粮食，比自己满头大汗去耕种要舒服得多，他们已经毫不在意地接受了这一提案。可是不久他们便意识到，庞培绝不会听任这样一个无论在哪方面都有损于他的决定。与一个在极度恐惧中勉强想出如此荒唐招数的党派站在一起，这恐怕并不妥当。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否决这一提案并非难事。新任执政官西塞罗抓住这一机会，欲施展其才能而在此一定乾坤。尚在护民官准备否决之前，发起人便自动收回了这一建议（691 年 1 月 1 日）。民主派除了令人不快的教训之外一无所获。多数民众，或爱或惧，始终站在庞培一边，无论何种提案，只要公众认为有损庞培，必定通不过。

卡提林那被所有这些徒劳的颠覆活动和毫无结果的计划搞得精疲力竭，决定进行最后决战，一了百了。为发动内战，他在夏季期间行动起来。埃特鲁利亚云集着叛乱分子，腓索勒是它一座非常坚固的城市，十五年前便是雷必杜斯起义的策源地，现在再次被选为叛乱的根据地。大量钱款涌向那里，主要是首都那些与叛乱有瓜葛的贵妇在提供物资；武器和士兵聚集在那里；一位苏拉派的老军官盖尤斯·马利乌斯，他如同雇佣兵般骁勇、果断，暂时执掌最高统率权。意大利的其他地点也在进行相同的、规模较小的武装准备。波河以北的居民情绪激昂，似乎就等着开战的信号。在布鲁提乌姆地区、意大利的东海岸和卡普亚，到处聚集着成群的奴隶，似乎酝酿着类似斯巴达克斯的第二次奴隶起义。即

使首都也酝酿着事端，谁若是看到被索债的负债人出现在城市审判官面前这种固执行为，就会想起谋杀阿塞里奥之前的情景。大商巨贾们莫名惊恐、惶惶不安；形势表明有必要加强黄金白银外运的禁令，严密监视各大港口。谋反分子的计划定于692年执政官选举之际，卡提林那再次参加竞选，届时将主持选举的执政官和不顺眼的竞争者干脆利落地除掉，不惜一切代价让卡提林那当选，必要时将腓苏勒和其他据点的武装部队开往首都，以此摧毁反对势力。——西塞罗，他一直通过手下的男女密探迅速全面地了解到叛乱分子的行动，在指定选举的那一天（10月20日），当着元老院全体成员和谋反分子最主要头目的面告发了谋反。卡提林那并不否认，他顽固地回答，大党巨龙无首，小党由无能的领袖领导，如果他当选执政官，大党反对小党就不会再缺领袖。由于没有密谋的确凿证据，惊慌失措的元老院只有像通常一样，事先准予对官员采取合乎目的的例外措施，此外一无所获（10月21日）。选举之战由此拉开，这一次更像战役而不是选举，因为西塞罗也组建了一支由主要来自商人阶层的年轻人武装起来的卫队。元老院将选举推迟到10月28日。这一天，西塞罗的卫队把会场包围控制起来。叛乱分子既未能杀死主持选举的执政官，也未能按他们的意图左右选举。——然而内战已在其间爆发。10月27日，盖尤斯·马利乌斯在腓苏勒人中举起军团的鹰徽，要反叛的军队集结在其周围——这是西布里战争中马利乌斯军中的一面鹰徽——无论绿林盗匪还是农民都被号召起来与他结成联盟。他继承平民派的古老传统，宣布要把人们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下解放出来，减轻债务诉讼，当然某人如果负债额超过其实际财产时，仍然要被依法剥夺自由。首都这群无赖之徒，以古老的农民无产者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在西布里战争声名卓著的鹰徽的带领下展开战斗。这样做似乎玷污的不仅是罗马的现在，还有罗马的过去。然而这一树帜之举势单力孤，在其他集结地，谋反行动仅限于收藏

武器和举行秘密集会的范围，因为到处缺乏果断的领袖人物，这对政府是一种幸运。尽管眼前的内战已宣告爆发多时，然而锈迹斑斑的政府机器却犹疑不决，行动迟缓，未能采取任何军备行动。直到此时，战备人员才召集起来，镇压管区内暴乱的命令才传达到各地区的高级军官那里，同时将角斗士逐出都城，设置巡逻队以防恐怖的纵火行为。卡提林那处境不妙。按照他的打算应在执政官选举时在都城和埃特鲁利亚两地同时开火，前者的失败和后者的爆发不仅危及到他本人，也殃及他事业的全部成就。他在腓苏勒的同党一朝举起武器反对政府之后，他便再也不能留在罗马。因此他所关注的，不仅是现在迅速确定在首都开始叛乱，而且必须在他离开罗马之前行动——因为他太了解他的副手，不能将此事托付给他们。同谋分子中较有声望的有普布利乌斯·林都鲁斯·苏腊，683年执政官，后被逐出元老院，现在为了重返元老院而成为行政官，还有两位前行政官普布利乌斯·奥特罗尼乌斯和卢西乌斯·卡西乌斯，他们全是无能之辈。林都鲁斯是一个只会说大话、苛求讲究，然而思维迟钝、行动犹疑的平庸贵族；奥特罗尼乌斯除了一副尖嗓子，别无长处；至于卢西乌斯·卡西乌斯，人们简直不明白这样一个肥胖臃肿、头脑简单的人何以混迹叛乱分子之中。而稍有才能的参与者，如年轻的元老盖尤斯·塞提古斯和骑士卢西乌斯·斯塔提利乌斯和普布利乌斯·加宾尼乌斯·卡皮托等，卡提林那又不敢把他们提拔到上面来，因为传统的等级制度即使在谋反分子中也占据一席之地，连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如果没有一位执政官或至少行政官处在最高位置，便不可能取得胜利。尽管叛乱军队一再迫切请求他们的统帅，尽管起义爆发后再羁留在政府中十分不利，但卡提林那仍然暂时留在罗马。他习惯于以自己极端的自负令胆小的对手钦佩不已。他常常在广场上、市政厅露面，反击向他逼来的威胁。于是人们避免把他激怒起来：狗急也会跳墙。事实上无论私人抑或官方都不敢贸然伸手去碰这

位危险人物，如果一位年轻贵族用暴力罪将他送上法庭，这简直毫无意义，因为在这场诉讼可以结束之前，可能早已另行判决。然而卡提林那的计划全盘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密探打入谋反分子中，获悉密谋的详尽而准确的报告。例如，当叛乱分子出现在坚固的普莱奈斯特城前时（11 月 1 日），本指望突袭占领该地，却发现居民已有所警戒和武装，所有计划遭到类似的挫折。尽管卡提林那极为大胆，还是觉得此时已到最后关头，他把动身的日子定在最近的某一天；在此之前，谋反分子在他的竭力催促下，于 11 月 6 日到 7 日夜间的最后一次集会上决定，在他们的领袖动身离开之前，干掉执政官西塞罗这位反对势力的主要领导人，并且为了抢在任何泄密之先，即刻实施这一决定。11 月 7 日清晨，选派的杀手敲响执政官的府门，但是他们看到警卫加强，便自动退缩——这一次政府的密探又胜过谋反分子一筹。第二天（11 月 8 日）西塞罗召集众元老。直到此时卡提林那仍敢露面，执政官当面揭露他最近几天来的活动，他面对执政官的愤怒攻击仍试图进行辩护，但是人们不再听信他，在他就座的位置附近空出一片凳子。他离开会场，如约前往埃特鲁利亚，毫无疑问，即使没有这段插曲他也会走这一步。他在那里自封为执政官，坐以观望，待首都暴动的消息一传到，便拉起军队与其对抗。政府宣布，剥夺卡提林那和马利乌斯两位头目及同党中到指定时日仍不缴械投降者的公民权，并招募新的民兵；然而被任命为讨伐卡提林那的军队统帅却是执政官盖尤斯·安东尼乌斯。尽人皆知，此人与谋反有瓜葛，他究竟是率军反对卡提林那还是投奔于他，这完全取决于偶然。人们似乎有意要让安东尼乌斯成为雷必杜斯第二。尽管人人公开指责谋反分子，尽管谋反分子并没有放弃在都城暴动的计划，而是在卡提林那动身离开罗马之前就已制定好，但是仍未对留在都城的谋反领袖采取措施。塞提古斯的意见是，让一位护民官以召集民众大会的方式发出信号。第二天夜里由塞提古斯除

掉执政官西塞罗，加宾尼乌斯和斯塔提利乌斯同时在十二处将都城点燃，并与其间赶来的卡提林那的部队尽可能快地取得联系。假如这一紧急意见可以实现，假如林都鲁斯，这位在卡提林那离开之后被提拔的谋反领袖，能决定迅速开火，谋反到此时尚能成功。然而密谋者本身与他们的对手一样无能、胆怯，几周过去也没有任何决断。

最终导致对手采取决断措施。林都鲁斯行事喜欢绕圈子，用制定长远计划的躲避方式来应付眼前的紧急情况。罗马城中某个凯尔特聚居区阿罗布洛基斯人的代表，其属区已完全遭到破坏，自身也负债累累。林都鲁斯与他们往来，并试图把他们拉入谋反，在他们启程时让他们把消息和信件带到亲信手中。阿罗布洛基斯人离开罗马，却在 12 月 2 日至 3 日的夜里被罗马当局阻截在城门前，从他们身上搜出信件。显然，阿罗布洛基斯人的代表投靠了罗马政府的密探，这一幕的发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向罗马政府交出他们希望得到的指控谋反头目的证据。西塞罗不动声色地下令逮捕最危险的密谋头子，林都鲁斯、塞提古斯、加宾尼乌斯和斯塔提利乌斯被抓获，其余的人则逃之夭夭。不论在押犯或是在逃犯，其罪昭然。搜走的信件在逮捕完毕后即呈送到元老院，被抓获的人无法否认上面的印章和手迹，犯人和证人受到审讯。其余可作佐证的事实、谋反者家中藏匿的武器以及他们讲过的威胁性言辞随即也都被供认出来，谋反被判决为全部属实。在西塞罗的安排下，谋反的主要事实被立刻用传单公布出来。——人们普遍对无政府主义的谋反感到愤慨。尽管寡头派很想利用这次大暴露的机会与民主派、尤其是恺撒算账，然而他们实在垮得太彻底，不能如愿以偿像先前置两位格拉古斯和萨图尼努斯于死地那样结果他，他们对此力不从心。首都的民众主要为谋反者的纵火计划所激怒，在这场负债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战斗中，商人和整个物质利益派当然认识到，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他们的年轻人手

持利剑、义愤填膺地拥到市政厅周围，拔剑对准公开的和秘密的卡提林那党徒。事实上，谋反此刻已陷入瘫痪，虽然最终策划者尚逍遥在外，但全体受委托实施计划的谋反人员却被抓或者在逃。若没有都城的谋反配合，腓苏勒的乌合之众不可能成大气候。

在一个稍有组织性的国家内，事情到此便应在政治上画句号，下面的事该由军队和法庭来处理。然而在罗马，事态已发展到政府无力逮捕一些有声望的贵族。林都鲁斯和其他几名被抓获的人，他们的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骚动起来。据说，已制定计划要用武力把他们从受禁的私人宅院中营救出来。由于几年来无政府主义活动频繁，罗马不乏强盗头目，他们按一定的价码达成协议去搞非法集会和暴力活动。卡提林那终于得到此事的通报，就要率领军队来一次大胆袭击。这种说法有几成真实，谁也不能肯定，然而担心却不无道理。因为宪法规定，政府在首都既不能支配军队也不能调动令人敬畏的警察力量，事实上这已放任了所有的盗匪集团。于是他们想用立即处决囚犯的方法来防止任何可能的营救计划。依据宪法这是行不通的。对公民的死刑判决只能由全体公民来下达而不能通过其他任何机构，这是古老神圣的上诉权。自从公民法庭自身成为古董以后，再也没有判决过死刑。西塞罗本想驳回这种无理要求，虽然此法律问题本身对这位律师来讲无关紧要，然而他十分清楚，标榜自由对他是多么有用，他感到用血腥的方式和民主派永远决裂，这并不十分令人愉快。但是他周围的人，主要是他尊贵的夫人，敦促他为了祖国而迈出这勇敢的一步，完成他的功业。和所有的懦夫一样，这位执政官尽量避免露出胆怯之态，然而在这样可怕的责任面前仍不免心惊胆战。困境中他召集元老院，把这四位囚犯的生死权交给元老院。后者自然毫无主张，因为依据宪法，元老院对此类裁决权甚至远远小于执政官，因此全部责任又合法地落回到西塞罗身上。然而胆怯什么时候坚定过呢？恺撒呼吁所有人救援被抓获的人，他的话潜含威胁，示意民主派将来不可避免会进行报复，给人留下

十分深刻的印象。尽管执政官和元老们多数已同意执行死刑，以西塞罗为首的大部分人现在似乎又倾向于维护法律的效力范围。唯有当伽图用讼棍的方式怀疑持温和意见的辩护者知情密谋，指出街上的闹事有可能为营救囚犯作准备时，才将摇摆不定者重又抛入另一种恐惧，为立即处决罪犯赢得多数票。负责执行的自然是提出此项决定的执政官。12月5日深夜，人们将囚犯从他们当时居住的地方提押出来，穿过一直熙熙攘攘的广场，带到通常囚禁死刑犯人的监狱。这是位于元老院城堡脚下的一座十二英尺深的拱顶地窖，以前曾是酿酒作坊。执政官自己带着林都鲁斯，行政官们领着其余几位强壮的卫兵相随左右，并没有发生人们所期待的营救行动。没有人知道，囚犯究竟是被带到了可靠的关押地还是被送到刑场。在牢房门口，他们被移交给三个执行死刑的人，随即便被绞死在火炬辉映的拱顶地窖中。执政官在门口等候直至行刑完毕，随后用他那熟悉的大嗓门越过广场向静候的人群高喊道："他们死啦！"直到深夜人群仍奔拥在街上，欢呼着向执政官致意，他们认为多亏了他，他们的房屋财产才得以保全。元老院组织公开答谢庆祝会，罗马显贵的头面人物马尔库斯·伽图和昆图斯·卡图鲁斯用祖国父亲——这一首次听闻的称谓——向倡议死刑的人致意。——然而这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并且由于此事在全体民众看来既伟大又值得付出如此代价，因而越发可怕。从没有一个政治集团像罗马这样蹩脚地宣布过破产：四名政治犯按法律当定罪受罚，却绝不至于丢掉性命；该政府的多数人却冷酷地作出决定，仓皇处决这几个人，并且还得到公共舆论的认可；因为人们不相信监狱的可靠性，并且没有足够的警察！这一最残忍的暴行得由全罗马政客中最不沉着冷静、最为胆小怕事的那位执政官来执行，这"第一位民主的执政官"被选中去破坏罗马全体居民自由的守护神——上诉权，这是何等滑稽可笑，历史性悲剧中每每不乏这种滑稽性。

都城的谋反尚未爆发就已被扼杀，此后尚待完成的是结束埃

特鲁利亚的暴动。那支由大约二千人组成、以卡提林那为首的队伍，由于大量新兵蜂拥而至，几乎增至五倍，构成了两个人员充足的军团，当然其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员装备齐整。卡提林那率领他们进入山中，避免和安东尼乌斯的军队作战，以便组织好队伍，等候罗马谋反的爆发。然而这次失败的消息瓦解了暴乱军队：处境稍好的人重返家园。余下的坚定分子毋宁说是绝望分子试图突破亚平宁山脉的关隘去高卢。然而当这支小部队到达庇斯多利亚（庇斯多亚）附近的山脚时，发现被两支军队夹在中间。他们前面是从拉文那和阿里米努姆赶来，为占据亚平宁山脉北坡的昆图斯·麦特鲁斯的军队；后面是安东尼乌斯的军队，在军官们的催促下，他终于让步，勉强同意进行一次远征。卡提林那腹背受敌，粮草行将耗尽，他走投无路，只有向关系较为密切的敌人、即安东尼乌斯出击。在一个四面环壁的狭窄山谷里，战斗在暴乱分子和安东尼乌斯的军队之间展开。当天，安东尼乌斯托词把此事交给军中一位勇敢的老将马尔库斯·佩特雷依乌斯，这样至少避免了亲手去对付他旧日的盟友。战场处于此般状态中，政府军便无优势可言。卡提林那和佩特雷依乌斯把他们的亲兵信勇派遣到最前方，营垒既未丢失也未被攻克。战斗长时间相持不下，双方都有许多勇敢的战士阵亡。卡提林那在战斗打响前便把自己和所有军官的马匹都送了回去。在这一天里证明了他生来就是为了做非同凡俗的事情，他不仅懂得怎样作为一名统帅去指挥军队，还懂得怎样作为一名士兵去拼杀撕斗。终于，佩特雷依乌斯率军冲破敌人的中心阵地，此后便从内部缚住了敌方双翼，由此决定了最后胜利。卡提林那党人——大约有三千人——仿佛是排成整齐的序列尸横疆场。军官们和统帅本人因大势已去，都冲向敌人以求一死，最后全部阵亡（692 年初）。安东尼乌斯因为这次胜利被元老院封为大将军，所举行的答谢庆祝会表明，政府和臣民开始对内战感到习以为常。

不论在首都还是意大利各地，无政府主义分子的阴谋都已被血腥镇压下去，只有这个被打败的团体的下属组织在埃特鲁利亚各城和首都的猖獗犯罪活动以及层出不穷的意大利盗匪集团（例如其中一支产生于斯巴达克斯和卡提林那的余部，于694年在图立依地区被武力摧毁），才会使人重又想起那次阴谋。更重要的是应注意到，这次打击不只是针对那些在京城密谋纵火，在庇斯多利亚厮斗的纯无政府主义分子，还有整个民主派。该派尤其是克拉苏斯和恺撒也在此处插手，完全同688年的密谋一样，这可以看作是非法律判定，但却符合历史的事实。虽然卡图鲁斯和其他元老派的领袖指责那位民主派的领袖知悉无政府主义的阴谋，虽然这一位民主派领袖作为元老曾投票反对寡头派意图实施的残酷死刑，但元老派却只能在党派争斗中提出来，作为他参与卡提林那计划的证据。不过还有其他一系列事实更具说服力。确凿无疑、不容辩驳的证据表明，主要是克拉苏斯和恺撒在支持卡提林那争夺执政官之权。当恺撒于690年将苏拉的刽子手送上死罪法庭时，他让其余人都受到了审判，唯有他们中罪大恶极的卡提林那获释。虽然在揭发12月3日事件时，西塞罗提到的被告发的谋反分子的名字中并没有那两位颇有影响的人物。显然，告密者供出的不只是后来受审的那几位，还有许多“无辜者”，执政官西塞罗认为最好把这些人的名字从名册上抹去。许多年后，当他认为没有必要再歪曲真相时，在知情人中有人明确提到恺撒的名字。还有一个非直接、却是不言自喻的指控：12月3日被捕的四人中两名最危险分子斯塔提利乌斯和加宾尼乌斯被交给元老恺撒和克拉苏斯看守。很明显，无论怎样他们都会丢丑：他们若把犯人放走，会被公众看作是同谋；若确实看牢，又会被他们的同党认为不忠。这种情形最典型的是下面发生在元老院的一幕。在拘捕林都鲁斯及其同党后不久，一名由京城的谋反分子派往卡提林那的信使被政府的密探抓获。此人在得到无罪的承诺后，决定在元老院全体人

会上全盘招供。然而当他供认到可疑的部分，尤其是说出他的委托人是克拉苏斯时，便被元老们打断。在西塞罗的建议下，没有继续调查便宣布所有供词无效，并且无视已经承诺的赦免，把招供者关押起来，直到他不仅收回供词，而且还坦白出是谁指使他作出这种伪证！这里清楚表明，不只是那位熟知内情、回答受人指使攻击克拉苏斯的人无意激怒那位兽群中的公牛，而且以西塞罗为首的大多数人也达成统一，不让内情泄出一定界限。公众却并不这样左右为难，那些曾拿起武器抵抗烧杀犯的年轻人从未有对任何人像对恺撒那样感到过愤怒。12 月 5 日，当他离开元老院时，他们向他当胸一剑，他差一点立地横尸，17 年后正是在这同一地点他受到致命的一击。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再踏进元老院。如果谁不存任何偏见来思考这次谋反的全过程，便难于摆脱这样的猜疑：自始至终，卡提林那幕后有更为强大的人物，他们凭借法律上缺乏充分的证据，利用元老们的动摇胆怯，对内情一知半解、一有借口便放弃行动的弱点；他们十分懂得阻碍官方反对谋反的每一严肃步骤，让那位暴乱分子的头目自由脱身，甚至在向暴乱宣战和派遣军队一事上进行干预，以致派出的几乎是一支救援部队。虽然事件过程本身证明卡提林那党人的阴谋牵涉的远远不止于林都鲁斯和卡提林那。然而还有一事仍值得注意，即很久以后，当恺撒成功地获取政府最高位置时，他和唯一尚在的卡提林那党人、毛里塔尼亚的志愿军首领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完全按照马利乌斯公告中所要求的那样减轻债务法——所有这些已显现得足够清楚。如果还不够，那么对实施加宾利乌斯-马尼利乌斯法以来在他们身边兴起的较之以往更为凶险的军事强力，民主派所处的绝境本身便已决定他们最后要借助于阴谋和与无政府主义的结盟，正如通常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那样。情况与秦那时代十分相似。如果庞培在东方所处的位置与那时的苏拉类似，那么正如马利乌斯和秦那曾拥有兵力一样，克拉苏斯和恺

撒也试图在意大利组织起一支军队与庞培抗衡，并要尽量比这两人更好地使用这支军队。成功的道路依然是暴力和无政府主义，卡提林那无疑是铺平这条道路的最佳人选。这种情势下，更有声望的民主派首领自然尽可能地居于幕后，把不光彩的勾当交给不光彩的同僚去做，希望以后将他们的政治成果据为己有。更有甚者，当行动失败以后，高一级的参与者全部转过身来掩盖他们参与其中的事实。即使在后来，当先前的某位阴谋家自己成为政治阴谋的标靶时，遮掩在这位伟人生平中的这段阴暗岁月上的面纱却只是因此裹得更紧，甚至有人为此给他书写特别的辩护词[1]。

五年以来，庞培在东方统领他的水陆大军；五年以来，民主派在本土阴谋策划推翻他。其结果令人沮丧。人们付出巨大努力，不仅毫无所获，而且在道义上和经济上均损失惨重。683 年联盟可能已使纯民主派成员心怀不满，虽然当时民主派只是结交了两位反对党中有声望的人物，让他们参与到计划中来。然而现在，民主派和一群几乎全是从贵族阵营里投奔过来的破落户搞在一起，还暂时接受了这帮人的计划，即秦那式的暴力专政。683 年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物质利益派因此脱离民主派，暂时倾向于元老们，实质上是倾向于任何一种希望并且能够抵抗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尽管城市大众并不反对街市暴动，但仍然对自家房屋着火感到不悦，因此多少有些畏缩。奇怪的是，正巧在这一年（691 年）开始恢复塞姆普罗尼乌斯粮食配给制，并且是由伽图提议、元老院方面主持。显然，民主派领袖与无政府主义的结盟在他们和城市公民之间打下楔子。寡头派试图加深这一裂痕，把民众拉到

[1] 萨鲁斯提乌斯的《卡提林那阴谋篇》便是这样一篇辩护词。作者显然是位恺撒党人，出版时间在 708 年以后，或是在恺撒独裁期间，或者更可能是在他的后继者三巨头的执政期内。显然，作为有政治倾向性的文章，它竭力颂扬罗马帝国之根基——民主派，要将人们对恺撒怀念中的污点清洗干净，同时尽可能为三巨头之一的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的伯父洗刷清白。

自已这边来，至少这产生了暂时的效果。盖奈乌斯·庞培最后终于对这些阴谋诡计一方面警觉，一方面恼怒起来。民主派几乎撕断了把他们与庞培拴在一起的纽带，当这一切发生之后，便再也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指望从他那里轻易得到像 684 年那样的好处，那时他承诺绝不亲手破坏与他相生相息的民主力量。民主派于是威信倒地，力量削弱；尤其当他们的无助和软弱被无情揭露以后，更是十分可笑。只要是羞辱被推翻的统治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他们便崇高伟大、坚强有力；然而每当他们试图真正成就某种政治目的时，却每每失败。他们和庞培的关系既错误又可悲。他们一面向他抛去赞美、颂扬之词，一面接二连三阴谋反对他，同时这些阴谋一个接一个地像肥皂泡一样破灭。那位东方和海上的统帅在远处进行防卫，似乎毫未觉察到这些颠覆活动就已赢得胜利，如同赫拉库斯斯一样，于不知不觉间已战胜皮格迈伊的矮人。煽动内战的企图可耻地失败。如果无政府主义派能够发挥哪怕些许之力，纯民主派或许会懂得对这群乌合之众进行利用，而不是去领导他们，营救他们甚至与他们同归于尽。就连老朽垂死的寡头派也得以将这次革命的尝试镇压下去，以此又赢得了反民主派的最后胜利。这是由于群众从民主派的行列里投奔过来，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的利益和庞培显然一致，力量得到加强。其间米特拉达梯斯国王去世，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事务安排妥当，庞培返回意大利之期指日可待。决战的时刻即在眼前。然而事实上，一方是归来的统帅，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赫、强大；一方是蒙受奇耻大辱、一蹶不振的民主派，这是否还谈得上两者间的决战？克拉苏斯准备将家人和金银送上船，在东方某地找一处避难所。连恺撒这样一位应变力强、能量大的人物也似乎打算放弃计划。这一年（691 年）他开始竞争大祭司的职位。选举日这天早上，他离开家门时说，如果这次他仍旧落选，将不再迈进自家的门槛。

第　六　章

庞培的退却和觊觎王位者的联合

庞培完成了他身负的事务，把目光重新转向故乡，这时他发现王冠已经第二次送上门来。很久以来，罗马社会的发展便趋向于这样一种灾难；每一个自由人都很清楚，而且千百次有人断言，假如结束贵族统治，那么取而代之的非君主制莫属。目前元老院已经同时被市民阶级、自由反对派和军人暴力摧垮了，为了建立新秩序，只能把某些人物、姓名以及形式确定下来，而这一切已经在实现变迁所必须的部分民主、部分军事的要素中得到了相当清楚的暗示。过去五年中的世事风云好像给这个集体行将到来的变革打上了最终的印迹。新近建立的亚细亚行省极其景仰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位后继者，并且把受他优待的获释奴隶当作王子来对待。在这些行省当中，庞培确定了自己统治的基础，同时找到了自己——未来罗马国家的公侯所需要的财宝、军队以及威望。但是在首都无政府主义者施展阴谋，挑起了内战，这一异常严峻的现实向每一个怀有政治野心或者仅仅是物质欲望的人阐明：一种像元老院那样既无权威又无军事实力的统治，使国家备受了政治巨头的既可笑又可怖的暴政的摧残。要想使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变革宪法，以使武力和统治紧密结合。统治者就这样将出现在东部，帝王宝座就这样将在意大利建立起来；一切迹象都表明，692 年是共和国的末年，是帝

国的元年。

虽然不存在障碍，这个目标仍然难以实现。这部宪法历五百年不衰，使台伯河畔那座微不足道的城市发展成一座无与伦比的宏伟壮丽的都市，这部宪法已经把自己的根系——何以至此，人们不得而知——深深地扎进土地。完全无法预料，企图颠覆它将何等深刻地激怒市民社会。在一场朝向这一伟大目标的赛跑中，许多对手都被庞培击败了，只是并未被根除。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彼此相联的，至于推翻新的当权者，至于庞培自以为和马尔库斯·克拉苏斯、盖尤斯·恺撒以及提图斯·拉宾努斯是一致反对昆图斯·卡图鲁斯和马尔库斯·伽图的，这些都在预料之中。斗争是在所难免的，无疑也是严峻的，但是即便条件再有利，也不能轻举妄动。卡提林那起义仍历历在目，因而全体中间党派，首先是汲汲于物质利益的商贾阶层，但也不乏大部分贵族，他们很有可能不惜以和平为代价，去对一个给百姓以秩序和安全的专制统治俯首帖耳，这个贵族阶层的内部支离破碎，政治上毫无希望，必须及早与诸侯进行交涉来确保自己的财产、官衔以及影响，以此获得满足。民主派前不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或许他们的一部分人甚至将会满足于翘首等待一个由他们推举为领袖的军事首领部分地实现他们的要求。但是无论党派之间关系如何，针对庞培和他那百战不殆的军队，至少现在还无需依赖意大利境内的党派。二十年前，当苏拉和米特拉达梯斯达成暂时的和平之后，他便能够面对多年来一直进行着大规模武装准备的全体自由党派——上至温和派贵族以及自由的商界，下至无政府主义者，以自己的五个军团实现违背自然发展的复辟了。庞培的任务则远没有这么重大。当他完全彻底而又尽职尽责地了结了海上和陆地的各种事务以后，他返回来了。他有希望遇到各个极端政党的反对派，而非其他反对派。每一个极端党派根本不能单独有所作为，其整体虽说是联合而成的，但却只不过是一种刚刚还在彼此大动干戈、内部基本上分裂了的各帮派之间的联合。

假如没有军队和头领,没有意大利境内的组织机构,没有行省的后援,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一位统帅,这些党派根本谈不上什么装备。在它们的行列中几乎没有一个著名的军人,更不用说一个可能敢于号召市民起来反抗庞培的军官。至于这座七十年来不知疲倦地熊熊燃烧而又被自己的烈焰消耗得精疲力竭的革命的火山,它的可望爆发而又开始自行熄灭,也在意料之中。能否做到秦那和卡尔博尚能完成的事情,即为了党派利益来武装意大利人,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假如庞培采取了行动,他怎么可能实现不了政体的变革呢?况且罗马集体的机构发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这种变革的必然性。

庞培接受了前往东方的使命,因而他便抓住了时机,看来他想继续前进了。691 年秋天,昆图斯·麦特鲁斯·纳波斯走出庞培的军营,进入首都,以护民官候选人的身份出现了。他此行怀着明显的用意,即作为护民官使庞培获得 693 年的执政官职位并且首先通过特殊的全民公决,使他得到针对卡提林那的战争的指挥权。罗马全城哗然。毫无疑问,纳波斯是受庞培直接或间接的委托行事的,庞培想方设法以意大利统帅的身份出现在亚细亚各地区的最顶层,并在那里同时左右至高的军事强权和至高的民事强权。这些努力都被归结为他在通往宝座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而派遣纳波斯则被归结为半官方的通告帝国的到来。——一切都取决于两大政治派系针对这些预兆所采取的行动,他们将来的地位以及民族的未来都有赖于此。然而纳波斯所受到的接待本身又取决于当时这两个派系与庞培之间的独特关系。庞培是作为民主派的领袖前往东方的。他有充分的理由对恺撒及其追随者表示不满,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明显的破裂。庞培远在他方忙于其他事物,而且他又完全缺乏倾向于政治的天资禀赋,他甚至在当时都很可能根本没有看穿民主派针对他所设下的阴谋圈套具有何种规模与联系,也许他竟然以他那大胆但却短见的方式对此置以傲慢、蔑视这种鸡零

狗碎的勾当。此外民主派从未忘记对这位伟人表示表面的敬意，就连此刻（691 年）还按照他的喜好主动地通过特殊的全民公决，给予他闻所未闻的荣誉和勋章。鉴于庞培所特有的性格，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便一切并非如此，至少表面上装作一贯支持民众党，这也是庞培受到正确理解的个人兴趣之所在；民主派与帝制有着如此紧密的亲合力，以至于庞培为了攫取宝座只能别无选择地自称为民权的先驱，至今亦然。人事原因和政治原因一同发挥作用，不顾一切地保持了庞培与民主派领袖之间的现有联系。同样，在对立的一面也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能够弥合那道自从他转入民主派阵营便把他和他的苏拉党派同仁隔开的鸿沟。他与麦特鲁斯和卢库鲁斯之间的私人冲突，转移成为他们的规模扩大而富于影响的朋党之间的冲突。元老院的反对派陪伴着他整个的统帅生涯，这一派目光短浅，也正因为这一点它在一个如此心胸狭窄的人看来就越发可恶了。元老院丝毫没有表示要对这位与众不同的人物进行他当之无愧的、与众不同的赞誉，他对此忍痛承受了。终于再也不能无视某些事情了：贵族派正陶醉于新的胜利，民主派遭受了奇耻大辱；贵族派被固执己见而又愚蠢的伽图所领导，而民主派则听命于狡猾的阴谋大师恺撒。——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庞培派遣来的密使不失时机地出现了。贵族派不仅把这位密使从庞培的利益出发所提出的建议视为对当前宪法的宣战，而且公开把那些动议作为这种宣战来对待，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忧虑和忿懑：马尔库斯·伽图使自己和纳波斯一同人选护民官并且又一次冷酷无情地拒绝了庞培想和他密切私交的要求。很显然，这是存心驳斥那些动议。可以理解，在此之后纳波斯并没有找到理由去保护贵族派，相反，当民主党人顺应潮流，宁愿像承认执政官一样承认意大利的统帅，而不愿以武力相要挟的时候，他越发心甘情愿地与他们为伍了。由衷的认同很快便表现出来。691 年 12 月民主派曾指出，此前不久由元老院的多数通过的裁决是违背宪法的，是由于错误的审判而作

出的死刑判决。纳波斯对这一观点公开地表示拥护，而他的主帅和首长亦对此不持异议，这证明了一点：他对于西塞罗递交给他的长篇累牍的辩护文本表示沉默，具有至关重要的含义。另一方面，由于昆图斯·卡图鲁斯在重建国会宫时侵吞款项，因而恺撒追究他的责任并把建设任务转交给庞培去完成，这些都是他为自己开创声威的第一步行动。这真可谓大家风范了。卡图鲁斯的宫殿建筑已进入第十六个年头，看来他正兴致盎然，下定决心或生或死都要保住国会建筑的最高监督者这一身份。辱没一项众所周知的使命，这种行为无法得到掩盖，除非这位体面的受命者德高望重。事实上，对这种行为给予打击是完全有理有据而又大快人心的。庞培的前途之所以有望，是因为他能够在天下第一城里最令人自豪的所在，抹掉卡图鲁斯的名字并埋葬其下属，由此可以说他被赋予的正是最令他心驰神往而又无伤民主派的东西——热情洋溢而又空洞无物的荣誉。这也就同时以最可恶的方式把贵族派和庞培敌对地纠缠在了一起，因为贵族派不可能放弃卡图鲁斯他们这位最优秀的男子。——在此期间，纳波斯向全体市民宣布了他的有关庞培的建议。在表决之日，伽图和他的朋友以及伙伴昆图斯·米努西乌斯从中调停。由于纳波斯不管不顾地继续宣读他的动议，便导致了一场肉搏：伽图和米努西乌斯扑向他们的伙伴，迫使他突然中断宣读；一伙全副武装的人赶来解救了他并把贵族派从场内赶走。尽管如此，伽图和米努西乌斯还是卷土重来了，这一次他们也随身带来一伙武装者，并最终宣布战场归政府所有。元老院由于战胜了对手而欢欣鼓舞，于是责令护民官纳波斯和行政官恺撒暂时停职，因为在提出那项法律的时候恺撒曾全力支持过元老院的对手；元老院提出的免职动议受到了伽图的阻止，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那种动议失之偏颇，而是因为那违反了宪法。恺撒对这个决定不以为然，继续行使他的职权，直到元老院对他动用武力为止。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同样家喻户晓的是在他的府门前出现一大群人，准备

随时听他调遣；不管是开始街垒战还是在此时重新采纳麦特鲁斯提出的建议，在意大利境内给予庞培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指挥权，这些本应由恺撒一人做主，可这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因而他遣散了这群人，元老院也便随即取消了对他的惩罚。纳波斯被停职后立刻独自离开了这座城市，乘船前往小亚细亚，去向庞培禀报他出使成功的消息。

庞培完全有理由对自己在此事上使用的招数感到满意。现在要开辟通向王位的道路，非通过内战不可了。而他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发动内战则要归功于伽图犯下的无可挽回的错误。在卡提林那的追随者受到违法的判决以后，在护民官麦特鲁斯遭受了闻所未闻的暴行以后，庞培已经能够作为罗马的城镇自由的捍卫者，委任权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护民官之职的捍卫者，以及反对卡提林那团伙的程序党派的先驱战士来左右伽图了。看来庞培不大可能放弃这种权力而眼睁睁地第二次陷入窘境。684年他的军队解散曾使他处境维艰，多亏加宾尼乌斯法解救了他。然而尽管这一次的行动会导致往他头上系白色缠巾的后果，尽管他的灵魂迫切地渴望着，可是当一切就绪只待下手之际，他却又一次心慈手软了。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平淡无奇，唯独在资历上出类拔萃。只要无需背离法律便能够采取行动，他也才可能乐于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他在小亚细亚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就已经引起了人们这样的猜测。其实如果愿意的话，他完全可能在692年1月就带领舰队到达勃隆度辛的港口，在那里迎接纳波斯了。但691年—692年的整个冬季他却一直在小亚细亚举棋不定，这首先造成的一个不利结果就是贵族派——他们当然竭力促进反对卡提林那的远征——在此期间已经具备了对付卡提林那团伙的能力。这样一来庞培便失去了在意大利聚集起小亚细亚军团的最聪明的借口。庞培缺乏自信，对自己的星象也毫无信心，他在公共生活中死死抱住官方法律不放，在他看来，重要的是要有借口和理由。对于这样一种人来说，目前的

形势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他想要进一步声明，即使他解散军队，也不会对军队完全撒手不管，在必要时刻，他还能像其他任何党派头领一样征募一支机敏善战的军队。他说民主派将会低声下气地期待他的暗示，就算没有军队他也能对付顽固不化的元老院；他还声称这些深思熟虑中不乏真知灼见，足以使那自欺欺人的元老院心悦诚服。毫无疑问，这些思虑都是庞培自己禀性的结果。他属于那种对倒行逆施力所能及但却无力揭竿而起的人，无论是在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意义上讲，他都越来越近乎一个军人了。他把法律当作道德的必然，把普通法当作因袭的日常准则来顶礼膜拜。正因如此，军事秩序才像用了魔法一样把每一个不完全自信的人禁锢起来，在这种军事秩序中，法律以习惯的面目出现要甚于在其他任何地方。即使一名军人下定决心背叛上司，可是一旦要求他唯命是从，他仍然会不由自主地重新循规蹈矩，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正是这种感觉使拉法耶特和杜莫里茨（法国大革命中的军队将领——译注）在最后的时刻面临背叛的关头当断不断，一事无成。庞培恰恰也未能摆脱这种感觉。——692 年秋天庞培乘船前往意大利。当首都中一切都在为迎接新君主而进行准备之际，却传来了消息，说庞培还没等在勃隆度辛靠岸就解散了他的军团，带着少数随从踏上了前往首都的旅程。如果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王冠是一种运气的话，那么这种运气从未对一个凡人有过像对庞培那样的恩惠，但是天神的一切宠爱和馈赠在这个懦夫身上却白白浪费了。

两个党派都长出了一口气。庞培第二次退却了，那些被打败的对手能够再一次开始竞赛，而其中最奇特的，恐怕是庞培重又一同参加了。693 年 1 月他来到罗马。他态度暧昧，在两个党派之间摇摆不定，结果人们给了他一个诨名，叫盖奈乌斯·西塞罗。他把人都得罪尽了。无政府主义者视他为死敌，民主党人视他为令人生厌的朋友，马尔库斯·克拉苏斯视他为对手，富有的阶级视他为不可靠的保护者，贵族派视他为仇人或许他仍旧是一国之中无与伦比

的巨人;他散布于意大利的军事追随者,他在各行省,特别是东部行省中的影响,他的军事声望以及他的巨大财富都给了他得天独厚的重要地位,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的却是冷若冰霜的接待。对于他提出的要求,人们表现得就更为冷漠了。他的要求和他通过纳波斯所提出的建议同出一辙,就是担任第二任执政官,此外确认他在东部所做的部署,兑现向他的士兵所许下的诺言,此外还要给他们大片地产。元老院中也出现了庞培的反对派,不过这是蓄谋已久的,形成这个反对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卢库鲁斯和麦特卢斯·克雷提库斯的私忿、克拉苏斯的旧怨以及伽图的某种程度上的愚蠢。担任第二任执政官是庞培的希望所系,可他很快遭到了毫不委婉的拒绝。这位归乡的统帅向元老院所提的第一个请求,即把693年的执政官大选推迟到他到达首都之后,这遭到了回绝。这样就更加难以设想让元老院免除苏拉关于再选举的法律了。当然庞培只是大体上要求确认他在东部行省所做的部署,卢库鲁斯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对每一项指令都得特殊对待并且要进行表决。这样一来,一系列的繁文缛节和不计其数的挫折就在所难免了。向小亚细亚军队的士兵分发田产的许诺虽然大体上得到了元老院的批准,但同时却又扩大到麦特卢斯的克里特岛各军团,更糟糕的是这种许诺没能兑现,因为城镇的开支已经亏空而元老院并不打算为了这个目的动用自己的领地。对于这个顽固而又阴险的议会反对派,庞培已经彻底失去了驾驭它的信心,他转向了公民阶层。可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就更难以行得通了。民主派的头领虽然不公然反对他,但也根本没有理由把他的利益看得太重,他们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庞培自己的工具呢,例如借助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借助他的钱财当选为执政官的马尔库斯·普皮乌斯·庇索和卢西乌斯·阿夫拉尼乌斯,则先后在693年和694年证明了自己的笨拙和无用。最后,向庞培的老兵们分配土地的建议通过护民官卢西乌斯·弗拉维乌斯以一项普通土地法的形式提交给

了全体公民。这时候，这项在民主派那里得不到支持，又受到贵族派公开反对的建议陷入了孤立的境地(694 年初)。现在这位至高无上的统帅几乎低声下气地向人民大众乞求厚爱了，难怪意大利的关税在他的推动下通过一项由总督麦特卢斯·纳波斯提出的法律而被取消了(694 年)。但是他却扮演了一个既没有手腕又不走运的煽动者的角色，他的声誉深受其害，他无法达到自己的愿望。他完全把自己紧紧地束缚住了。他的一个反对者这样总结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他忙于"缄口不言地保存他那袭织好了的凯旋之袍"。实际上除了愤愤然以外他一无所能。

一种新的联合呈现出来了。民主党派的领袖已经把当权者退却之后，暂时出现于政治上的风平浪静拿来积极地用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了。当庞培从小亚细亚返回的时候，恺撒的处境并不比卡提林那强多少：一位领导着一个几乎要退化为阴谋策划者俱乐部的党派头目，一个无力还债者。但是从这时起他接管了远西班牙的总督职权(692 年)，借此找到了办法，一方面了结债务，一方面奠定自己的军事威望。他的老朋友、也是盟友的克拉苏斯在他前往这个行省之前就决定将他从沉重的负债中解救出来，克拉苏斯受着下述希望的支配，他希望现在开始在恺撒身上重新找到了他在庇索身上所失去的反对庞培的支持。恺撒自己充分地利用了在那里的短暂停留。694 年他作为大将军带着充足的钱财和必胜的信念从西班牙返回，以下一年的执政官竞争者的身份出现了。由于元老院不允许他申请参加执政官的选举，他为此毫不迟疑地牺牲了胜利的荣光。民主派多年来一直汲汲于为他们中的一员在最高职位中谋得一席之地，以便在这个桥梁上攫取自己的一份军事权力。长期以来各党派中的明智者都很清楚，党派纷争不能通过市民阶层的斗争，只能通过武力才能得到解决。但是结束元老院统治的民主派与强大的军事头目之间的联合过程却尖锐无情地表明，每一种诸如此类的联盟最终必将导致市民因素从属于军事因素，民众党想

要真正掌握统治，决不能与本来和他们陌生甚至敌对的首脑联合，而是必须把他们自己的领袖推为首脑。卡提林那曾经为此日的想方设法选出执政官，在西班牙或者埃及获得武力支援，可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了。现在民众党的面前呈现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为他们最最重要的人物谋得执政官一职并使他获得执政官行省，同时通过建立一个民主的封建贵族领地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独立于那位可疑而又危险的联盟伙伴庞培。——但是民主派越趋向于去开辟这条真正成功的、最有利的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所呈现给他们的道路，他们也就越有可能遭到政敌的坚决反对。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在此会遇到谁。贵族派的分裂并不可怕，卡提林那事件已经表明，当他们得到物质利益至上者以及庞培的追随者经常的或多或少的支持时，还能发挥出一点别的作用。他们曾经屡屡挫败卡提林那谋求执政官一职的企图，如果要对恺撒如法行事，以他们的能力肯定也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即便他们从中作梗，恺撒仍有可能当选。不过单纯依靠选举还很不够，他至少还需要若干年，在意大利境外不受搅扰地去赢得一个稳固的军事地位。而在这个准备期内，罗马的显贵们也必定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去打乱他的计划。人们很可能设想，能否像683年—684年那样，一方面在民主派及其盟友克拉苏斯之间，另一方面在庞培与那位金融寡头之间建立起以集体优势为牢固根基的联盟，从而再一次孤立贵族派。然而对于庞培来说，这样的联盟却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到目前为止，他在国内之所以举足轻重，是由于他是唯一的党派头领，统辖着各个军团。现在军团虽然已经解体，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仍旧是支配者。民主派的计划恰恰在于掠夺他的优势，并且推出一个他们自己的领导来和他分庭抗礼。因而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倒霉了，他不可能使自己获得最高统帅之位，不过他至少可以对一个像恺撒那样、已经作为唯一的政治煽动家给他制造了足够的麻烦、已经在西班牙亮出了证明自己军事权威的最辉煌

夺日的王牌的人助上一臂之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元老院的反对以及众人对庞培及其愿望的漠不关心，他的地位，特别是他面对他的老兵，都变得异常窘迫，极具侮辱性，甚至鉴于他的性格，如果以把他救出窘境作为交换，就很有希望迫使他加入这样一个联盟。至于所谓的骑士党派，凡有权力的地方，它无所不至，而且当它看到庞培与民主派重新郑重联合的时候，它是不会让人家等待自己过久的，这一点不言自明。此外，由于伽图对纳税承租人表现出值得称道的严格，金融寡头便趁此时机再次同元老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于是 624 年(原文如此，疑为 694 年——译注)夏天第二个联盟缔结了。恺撒得到了当选次年执政官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允诺。庞培在东部发布的指令得到了批准，还允许他向小亚细亚的军队士兵分配田产。恺撒向骑士阶层许下诺言，通过公民阶层使他们获得元老院所拒绝给予的一切权益。终于，克拉苏斯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至少可以加人同盟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加入联盟而得到某种许诺。在 683 年秋和 684 年夏，结成联盟的恰恰是同样的因素、同样的人物，但是为什么当时和现在的党派竟如此大相径庭呢？那时的民主派只不过是一个政党，它的同盟者都是高居军队之上的常胜统帅。而今民主派的领袖本身成了一位头顶胜利冠冕，满怀宏伟的战略蓝图的大将军，从前曾是联盟伙伴的大将们却失去了军队。当年民主派在原则问题上获得了胜利，然而其代价是把最高的国家公职让给了它的两个盟友。现在民主派变得较为现实了，把最高的民事和军事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相反，仅仅在从属的事情上才对盟友妥协，甚至连庞培早已提出的第二任执政官的要求都未予以考虑，这足以说明问题了。从前民主派容忍自己的盟友，而今这些同盟者不得不信任民主派。所有的情况都发生了彻底改变，而变化最大的主要还是民主派自身。虽然民主派自它彻底成为民主派之日起，骨子里便含有君主制的因素，但是宪法理想——正如它在自己最优秀的头领面前或清晰或模糊地浮现出来的一般

——所坚持的却一直是一个公民制的政体，一种伯利克里式的国家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诸侯权力存在的基础，就是诸侯以最高尚、最完美的形式代表着全体市民。全体市民中最崇高、最完美的一部分能够在贵族身上找到他们真正的代言人。就连恺撒也是以这些观点为出发点的。然而现在的理想却不同了，虽然它影响着现实，但却根本无法实现。不管是像盖尤斯·格拉古斯所拥有的那种单纯的民事权力，还是像民主党派的秦那以不完备的方式所尝试的穷兵黩武，都无法在罗马的政治集体中保持自己持久的重要性。不是为一个党派而是为一个统帅而搏斗的军队机器、雇佣兵粗野的强权，这一切在为了复辟的目的而初次登上舞台以后，便立刻显得胜过了所有政治党派。就连恺撒也不得不在实际的党务中对此表示信服。于是，使这个军队机器服务于自己的理想，并通过雇佣军的暴力建立起自己想象中的政治集体，这一充满灾难的决定在他心中酝酿成熟了。出于这种打算，他在683年与反对党的首脑结成了同盟。虽然这些首脑接受了民主派的纲领，但是这个同盟却把民主派和恺撒本人引向了衰亡的边缘。出于同样的打算，十一年以后他亲自作为雇佣兵出现了。两种情况的发生都伴有某种程度的天真，伴有对于能够以自己而非外人的刀剑建立一个自由政体的十足信心。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够看清，这个信心是一种欺骗，任何人都不会拿邪恶的灵魂做自己的奴仆，而又不使自己变成奴仆，但最伟大的人却不是失误最少的人。如果几千年之后我们还满怀敬畏地俯首于恺撒当年的所愿所为的话，那么其理由不在于他曾经争取并且获得过一顶王冠，那种经历和那顶王冠本身一样并没有什么伟大可言，相反其理由在于，他那强大的一人统治之下的自由政体从未离开过他，并把他当作最高统治者加以提携，使他免于堕入粗野的帝制。

695年执政官的选举由恺撒的联盟党顺利地完成了。贵族派一定在为那笔选票交易——即便是在这种腐败已极的时代，那笔

交易都是相当轰动的—— 而洋洋自得呢。为了这笔买卖整个贵族阶层集思广议，把马尔库斯·比布鲁斯本人交给恺撒做伴。此人狭隘的固执己见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被视为保守派力量，而且，如果那些有教养的老爷们不能收回他们支付的爱国主义的垫款，那至少不应归咎于他的良好意愿。—— 首先，恺撒作为执政官开始处理盟友们的要求了，其中绝对重要的，是向亚细亚军队的老兵分配田产。恺撒为此目的起草了土地法，大体上坚持一年前根据庞培委托而提出但又流产了的法律草案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只有意大利的国有领地被选为待分配的田产，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卡普亚地区。如果这块领地不够，还有用东部行省的利润，按监察官的清单上所登记的估价购进的其他意大利田产。因而，全部现存的财产以及遗产所有权都未受到触动。零零星星的小块地皮毕竟微不足道。法律规定，接受土地的人必须是赤贫的市民，至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完成兵役即可要求得到地产的这一条令人疑虑的准则并未制定出来，相反只是像历朝历代一样，花了少许的钱将那些老兵以及不少有待驱逐的临时租户首先介绍给从事土地分配者优先考虑。而分配的任务则转交给一个二十人的委员会去完成。恺撒决然声明，不愿人选该委员会。—— 针对这个建议，反对派处境艰难。理智地讲，不能否认在本都斯和叙利亚行省建立后，国家财政已经完全能够做到舍弃坎帕尼亚地区的租金了；不能否认禁止意大利境内一个最优美而又恰好适合小块地产的地区进行私下交易是不负责任的；不能否认在整个意大利普及人权的今天还拒绝给予卡普亚地区以自治权是既有失正义又滑稽可笑的。整个建议都带有克制、诚实、团结的印迹，而民主派则极为巧妙地把自己的特征与这些印迹相结合。因为正是这种特征在本质上导致了曾经建立于马利乌斯时代、又由苏拉撤销的卡普亚殖民地的重建。恺撒关注着每一种可能的利益，哪怕仅仅是在形式上关注。恺撒搬出了土地法草案，一并搬出的还有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批准的庞培在东部制定的法令的

建议以及纳税租户提出的降低三分之一租金的申请，供元老院鉴定，同时声明自己做好了接受和讨论变革建议的准备。现在元老院终于有机会使自己相信，当初拒绝庞培和骑士党派的这些愿望而把他们推向了对手的怀抱是多么的愚蠢。或许正是恺撒的这种心平气和的感觉，迫使这些门第高贵的老爷们发出无比尖厉的表示对抗的狂吠声，这与恺撒被打断了的出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土地法被他们干脆不加讨论地驳回了。关于庞培在小亚细亚所建机构做出的决定，也没有得到他们更多的慈悲。伽图想方设法根据罗马议会制那不足称道的传统，去否决针对纳税租户所提出的动议，也就是说要继续编造他的说辞，直到会议制定出最终行使决定权的法律为止。当恺撒表示要命人逮捕这个一意孤行的人物时，就连那项动议也被彻底驳回了。——现在全部的建议只好都转向全体公民了。恺撒可以实事求是地向人们指出，元老院所粗暴地驳回的建议，是最明智的、最不可缺少的，并且是以最恭敬的方式向它提出的；之所以被驳回，只是因为这些建议来自于民主派的执政官。如果恺撒再补充一句，指出贵族们为了对驳回这些建议施加影响而策划了一个阴谋的话，那也决不是凭空捏造。他有理由要求全体公民、特别是庞培本人及其老兵们站在自己一边，反对阴谋诡计和武装暴力。贵族派，尤其是固执己见的蠢物比布鲁斯和死心塌地拘泥于原则的白痴伽图，事实上是不得不随波逐流，被迫采用暴力的。庞培受到恺撒的诱导，开始对模棱两可的问题表态了，他一反常态，直截了当地声明道，如果谁胆敢剑拔弩张，那么他也会以牙还牙的，而且一定会带上盾牌。克拉苏斯也是这样说的。庞培的老兵得到指示，在首先关于他们而进行的投票表决之日暗中携带大量武器在投票场上出现。——贵族阶层为了阻挠恺撒的建议，使尽了浑身解数。在恺撒出现于民众面前的每一天，他的伙伴比布鲁斯都做了政治性的气候观察，这是众所周知的，以此阻断了所有公共事务。恺撒是不关心老天的，而是继续经营他地上的买卖。护民官

的否决被正式提出来，但恺撒却无意于此。比布鲁斯和伽图跳上讲台，对群众训话并引起了司空见惯的骚动。恺撒叫法庭差役把他们从讲台拖走并且叮嘱不要伤害他们——使政治闹剧保持其本来面目，这也是他的兴趣之所在。贵族派的一切无理取闹和一切喧嚷吵闹都无人理睬，土地法、批准在亚细亚建立组织机构以及为纳税租户减租都得到了公民的采纳。公民选出了二十人委员会，使之开始工作，委员会的头目是庞培和克拉苏斯。贵族派的一切苦心经营所换来的，无非是他们那盲目而又带敌意的违法行径，把联盟的成员们更紧密地推到了一起。而他们自己的精力——不久后他们在更为重要的事情上恰恰需要这种精力——则在这些压根无足轻重的事件中消耗殆尽了。人们互相祝贺着，因为各自的英雄气概都得到了证实。至于比布鲁斯声明宁死不屈，伽图在法庭差役的手里还继续强词夺理，也都是爱国之举。顺便不妨提一下，人终究还是会听天由命的。执政官比布鲁斯把自己关在家里来度过这一年余下的时日，同时他公开宣布，他怀有善良虔诚的愿望，要在这一年中所有适合于召开民众大会的日子里守候黄道十二宫的到来。他的伙伴们于是便重新景仰起这位伟人来，用老法比乌斯说埃尼乌斯的话来说，是一个"以踌躇不决挽救了国家的人"。他的同伴们也开始步他的后尘了：其中大多数人，包括伽图，不再在元老院露面，而是孤坐四壁之内，帮助他们的执政官愤愤不平，因为世界历史竟然不顾政治天文学而继续着。可是对于公众来说，执政官的这种消极态度以及天文学就像政治上的弃权一样，是一文不值的。而联盟则当然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人们简直就听任他们自由自在地继续下一步的行动。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恺撒未来的统治地位。对于元老院来说，在选举执政官以前它有责任确定下一个执政年的各种权限。因此，元老院预见到恺撒当选之后，会选中两个行省作为696年前执政官的管辖区。而对这两个行省的地方行政长官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修建街道和开展诸如此类的公益事业。情况当然不可

能一成不变，盟友们已经相互约定通过民众公决让恺撒得到一份按照加宾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的模式裁剪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指挥权。然而恺撒却公开声明不愿意提出任何利己的建议，于是便由护民官普布利乌斯·法提尼乌斯承担起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动议的任务，公民大会自然无条件地服从了。于是恺撒获得了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高卢总督职务以及对当地三支军团的最高指挥权。那三支军团已经在卢西乌斯·阿夫拉尼乌斯领导的边界战争中经受过考验。接着恺撒又为自己的副官们谋得了像庞培的副官们曾经拥有的代理行政官的官衔。如果一个统帅的任期比从前任何一个统帅的有限任期都长，而被定为五年之久的话，那么他的职位便有了保障。构成恺撒的总督权力之核心的，是波河以北的居民。多年来罗马民主派的属民，特别是恺撒的属民们就盼望着公民权。恺撒的主管教区向南一直延伸到阿努斯河和鲁比科河，包括卢卡和拉文那在内。事后元老院又根据庞培的建议把那波行省连同一个当地军团加进了恺撒的管辖区，这样至少能避免眼睁睁地看着这份指挥权也通过特殊的公民大会决议落到恺撒手里。恺撒如愿以偿了。因为根据宪法不得在意大利本土驻军，所以这位意大利北部以及高卢军团的指挥官便在以后的五年内同时对意大利和罗马进行统治。谁统治长达五年，他也便成了终生的统治者。恺撒在执政期内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显然，新的当权者们不会再错过机会，和颜悦色地以五花八门的杂耍和玩笑去博取民众，他们无疑会抓住一切时机中饱私囊。无独有偶，就像承认埃及国王为合法统治者的民众公决被联盟以高昂的价码出卖给了这位国王一样，其他的王公们以及各个城镇也同样乘机攫取了特许状和特权。

就连那些有关联的机构的持久性仿佛也得到了充分保障。至少第二年的执政官职位已经托付给了可靠的人选。公众一开始便认为此职务非庞培和克拉苏斯莫属；然而当权者却把它交给了他的党派中两个处于从属地位但却可靠的人物——奥鲁斯·加宾尼

乌斯，这是庞培的副官中最出色的一个，还有卢西乌斯·庇索，他略为逊色，但却是恺撒的老岳父。他们两个入选了696年的执政官。庞培亲自接过了守卫意大利的任务，他在意大利高居二十人委员会之首，贯彻着土地法，在卡普亚境内把土地分给两万名市民，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他的军队的老兵。恺撒的意大利北部军团充当他的支持者，对抗首都之内的反对派。当权者内部至少暂时还不可能出现分裂。对于恺撒作为执政官颁布的法律，庞培至少是和恺撒一样恪守的。这些法律必然使庞培和贵族派之间继续存在隔阂。贵族派的头目们，特别是伽图，继续无视这些法律，无视联盟的存在。不仅如此，他们的头目之间的私人纽带也拉得更为紧密了。恺撒对自己的盟友履行了诺言，表现得正派可靠。他在诺言中对盟友毫不吝啬，也不向他们无理取闹，特别是他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把根据庞培的建议制定的土地法尽心尽力而又头脑精明地贯彻到底。庞培对正义的举措和善意的忠诚并非无动于衷，对那些曾经帮助他一举摆脱他所扮演了三年之久的可怜虫的角色的人，他是和蔼可亲的。他与恺撒这位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的人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是经常而又可靠的，它继而把利益的联盟转化成友谊的联盟。这种友谊的结果和证据，便是庞培与恺撒唯一的年方三十二岁的千金结成的姻缘，不过这同时也是一种公开的不容误解的宣告，宣告新的联手统治建立起来了。尤丽娅继承了父亲的魅力，与年长自己一倍的夫君共度着幸福的家庭生活，而历经磨难和危机，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安宁与秩序的全体市民，则在这个婚姻联盟中看到了一个和平而又繁荣兴旺的未来的保障。——庞培和恺撒的联盟越是稳固和亲密，贵族派的事业也就越是无望。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头顶上的刀光剑影，而且他们也深深地了解恺撒，因此丝毫不怀疑，在必要的时候，恺撒会断然地动用刀剑。“我们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他们当中有人这样写道，“由于怕死或者怕被驱逐，我们已经放弃了‘和平’；人人都长吁短叹，没有一个敢于说话”。盟友

们还要求什么呢。但是尽管贵族派的大多数都处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之中，然而他们中却仍不乏某些冒失鬼，这也是很自然的。恺撒的执政期刚一中断，贵族派中最易动怒的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和盖尤斯·麦密乌斯等人便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中提出了废除尤利乌斯法的建议。不过这无异于一个愚蠢的举动，只能导致优势转向联盟一边。现在恺撒执意要元老院研究那些遭到反对的法律的实效性，因此元老院不得不表面上承认这些法规的合法性。但是不难理解，当权者们针对这一点还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对最有名气的最爱多嘴多舌的反对者惩一儆百，以此来确保其余的人继续他们那实用的叹息和缄默。开始的时候，人们希望土地法的条款会迫使最激烈的反对者通过拒绝向这项新法律宣誓而自动退出，像当初麦特鲁斯·努米狄库斯一样。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显得这么知趣，就连最有尊严的伽图也勉强宣了誓，他的唱诗班随声附和。还有一个不太正当的尝试，就是以策划谋杀庞培为由对贵族派的头目提起刑事诉讼，以此迫使他们走上被驱逐之路。这个尝试由于手段不得力而受挫。告密者是一个叫维提乌斯的人，他对自己大吹大擂可又自相矛盾，显得非常可疑。然而调遣肮脏武器的护民官法提尼乌斯却明确表示赞成这位维提乌斯，这就使得人们认为把维提乌斯投入囹圄，让此事收场乃是妥当之举。在此期间，人们已经对贵族派的彻底解体和那些体面的老爷们的无边的恐惧深信不疑了。就连卢西乌斯·卢库鲁斯这样的人物都亲自匍匐在恺撒的脚下，并且公开声明，自己由于年事已高不得不退出公共生活了。最终人们还是满足于几个小人物的牺牲。现在疏远伽图正是时候，因为他毫不讳言地表示深信全部尤利乌斯法没有效力，他是个一意孤行的人。不过马尔库斯·西塞罗可不是这种人，人们不必害怕他。可是联盟中的头把交椅民主派却不可能对691年12月5日的那场政治谋杀放任不管，他们曾经大张旗鼓而又理直气壮地粉碎过那起阴谋并取得了胜利。假如想追究这起阴谋的真正策划者，就

绝不能抓住那个愚蠢的执政官不放，而应当抓住严厉的贵族派党团，是这个党团强迫那个胆小鬼进行的谋杀。但是根据官方法律，责任不该归于执政官的出谋划策者，相反，应归咎于执政官本人，而且最柔和的方法首先就是仅仅追究执政官的责任而完全不牵连元老院成员，因为从针对西塞罗提出的建议——元老院借助这个建议部署了判决——的起因来看，也完全可以认为元老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便针对西塞罗，当权者也本想避免采用会引起轰动的过激步骤，但是西塞罗却克制不了自己，他既没有对当权者做出他们所要求的保证，也没有搬出一个巧妙的借口离开罗马。虽然那个借口已经多次送上门来，他甚至连默不作声都做不到。虽然他也怀有避免每一个冲突的最良好的愿望和最正当的恐惧，但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小心翼翼的态度。如果一个饶有兴趣的玩笑逗得他兴奋不已，或者由于诸多高贵老爷们的溢美之词使他变得几乎神志不清，而自我意识中充满平民律师的华彩乐章的话，那么他的话就会禁不住脱口而出。完成处理伽图和西塞罗的任务落到了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身上。此人轻浮、放浪但又聪明，最重要的是大胆，他多年来与西塞罗势不两立，而且为了取悦当权者，也为了以鼓动者的身份发挥作用，他在恺撒的执政期内急急忙忙地收养了平民之子，从而由一个罗马贵族摇身变成了庶民，继而被选为696年的护民官。前执政官恺撒作为克罗狄乌斯的支持者逗留在紧挨首都的地方，直到那两个牺牲者遭到当头一棒为止。根据指令，克罗狄乌斯建议公民大会委派伽图去调整拜占庭盘根错节的城镇关系，吞并塞浦路斯王国。在罗马人看来，这个王国和埃及一样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的宣言而出现的，与埃及不同的是这个王国粉碎了罗马人的侵略，而且国王从前还亲自侮辱过克罗狄乌斯。克罗狄乌斯针对西塞罗草拟了一项法律，规定不经审判、不依照法律就对公民进行处决是犯罪行为，应受惩罚，并且要被驱逐。于是伽图被人以一种荣耀的遣送方式赶走了，西塞罗至少被判以尽可

能轻微的惩罚，除此之外，建议中并未对他指名道姓。可是当权者是不会拒绝这种享受的，即一方面对一个犹豫不决、尽人皆知的政治晴雨表式的人物进行惩罚，因为他的举动证明他是保守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公民大会的决议，以这个顽固反对市议会侵犯行政管理、反对特殊指挥权的对手所反对的方式派遣他执行使命。针对伽图所提出的建议，是以同样幽默的方式，用此人非同寻常的美德得到解释的。这种美德使他在每一个外人面前，都显得适合去完成一项去获得那顶高贵的塞浦路斯的宝贝王冠那样棘手的任务，而不会监守自盗。这两个建议无论如何都包含着毕恭毕敬而又冷嘲热讽的特点，这一特点充分体现了恺撒对元老院的态度。两个建议均未受到反驳。至于元老院的大多数为了不择手段地反抗曾在卡提林那事件中对他们的决定所进行的嘲弄和谴责，便当众做出一副悲伤的假象，或者西塞罗本人——其实为时已晚——在庞培面前卑躬屈膝地乞求慈悲，这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条法律已经对他关闭了故乡的大门，他早该在它通行无阻之前就自动离开的(696 年 4 月)。同样，伽图也没有冒险拒绝这项交给他的任务，因为他也不想挑动对方采取更为刻薄的措施。于是他接受了使命，乘船驶向东方。第二步已经完成，为了投身更为庄严的使命，就连恺撒也是可能离开意大利的。

第　七　章

征服西部

假如历史的进程能从那可怜的老一套的导致在元老院和大街小巷发生争战的政治偏私，转向比追究第一位罗马君主名为盖奈乌斯还是盖尤斯或是马尔库斯更为重要的事情上来，那么也许在那至今仍支配着世界命运的事件发生之初，人们还有可能对周围稍事环顾并描述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罗马人对今日的法兰西的侵略及其与德意志和大不列颠居民的最初接触。——凭借着一条法则：发展成国家的民族融合那些政治上未成年的邻邦，文明化的民族融合那些精神上未成年的邻国——这条法则普遍适用并且如同重力法则一样堪称为自然法则。根据它，曾经把高度发展的政治与高度的文明相结合，虽然终究难免采取了不甚完美的外部方式。意大利民族受命臣服了那些行将灭亡的东部希腊诸国，并以其移民驱逐了西部那些文化落后的民族——利比亚人、伊伯利亚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正如英国曾经以同样的权利，在亚洲征服过一个实力相当但政治上软弱的文明国度；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把广大的蛮族打上自己的民族印迹，并使之高贵化而且仍然在继续着此举。统一意大利这一任务的先决条件已由罗马的贵族提供了，但罗马贵族并未完成这一任务本身，而是始终把在意大利以外的侵略作为必然的灾祸，或者一个国

界以外的进项来看待。正是罗马民主派或者说罗马帝国——二者乃巧合——正确理解并实现了那种至高无上的支配。这种局势的不可违逆的强大力量借助了违背自己的意志而确定着未来罗马在东西方统治之基础的元老院所进行的一切准备，和后来罗马向外省的流亡者所搞的本能的把戏——这种流亡虽然给诸行省带来痛苦，但在西部地区却扮演着一种高级文化之先驱的角色——所有这些都是由罗马民主的创造者盖尤斯·格拉古斯以政治家的清醒与自信认定并开始实行了。新政有两个基本思想：罗马的所有势力范围，只要是希腊的就实行联合；只要不是希腊的，就进行侵略。这两个基本思想随着阿塔鲁斯的王国被吞并以及弗拉库斯对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被占领，而在盖尤斯时代就得到了实际上的认可，但是胜利的反响使之重又萎顿下去。罗马的版图支离而荒凉，没有确切的占领，没有应有的边界；几乎连其海岸线都不隶属于罗马人的广阔地域把西班牙和希腊--小亚细亚的领地同本土隔开，在非洲的北部海岸只零零星星地占有迦太基和塞勒尼的土地。大片即使是臣服的地区，尤其是在西班牙，也只是名义上从属于罗马人。从执政方面来看，在统治的集中与合并方面无任何成就可言，而舰队的衰败也似乎斩断了与远方领地间最后的纽带。民主派只要重新抬头，大概就会想方设法用盖尤斯的精神去体现对外政策，特别是像马利乌斯所盘算的那样。但是民主派并非永远拥有权力，因而这还只是停留在设想之上。当民主派随着684年苏拉宪法的破产而真正获得统治权时，在这方面才出现了一个骤变。首先复出的是在地中海的统治，对于一个像罗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向东通过吞并本都斯及叙利亚地区，使幼发拉底河边界得以巩固。同时西部、北部以及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罗马地域有待封闭，还有待从希腊文明那里，即从那尚未枯竭的意大利之本源的生命力中赢得一块净土。盖尤斯·恺撒承担了这一使命。假如把高卢看成是恺撒用来训练自身及其军团以应付迫在眉睫的内战

的练兵场的话，那就不仅是一个误会，而且是对那种历史上强大而又神圣的精神的一种亵渎了。恺撒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战争中，奠定了他后来的支配地位，从这一点看，征服西部对他来说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手段本身重新成为目的，却是这位天才政治家的特权。恺撒之所以需要军事权力，或许是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然而他并不是作为一个党派成员占领高卢的。首先，对于罗马来说，它就已经面临着不断构成威胁的德意志入侵的政治必然性，需要在那里设一道防线，来保证罗马区域的和平。然而高卢被恺撒所占据并不是出于这一最高和最终目的。当从前的家园对于罗马市民来说变得逼仄不堪，当他们面临衰亡的危险关头，是意大利元老院的占领政策力挽狂澜，拯救了他们。如今意大利的家园又变得逼仄不堪了，这个国家因患了旧病而以相同的方式憔悴下去，只不过社会的弊病是在更大的背景下重复罢了。引导恺撒翻过阿尔卑斯山的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一个宏伟的期望：他打定主意并且踌躇满志，要在那里为他的国人赢得一片新的没有限界的家园并以此重振这个国家，使之建立在更为广阔的根基之上。

在某种程度上，693年恺撒远征西班牙已经被看成一种旨在征服西部的行动了。不管西班牙对罗马人俯首帖耳已有多久，然而它的西海岸在德西姆斯·布鲁图斯针对卡雷克尔人的远征结束之后也还仍然根本上独立于罗马人，北部沿海地区也完全未经罗马人染指。那里恭顺的地区感到自己不断遭受着劫掠，那些强盗行径对于西班牙的文明进程以及罗马化进程乃有百害而无一利。与此相反，恺撒的军队则把目标对准了西海岸。他越过了北接塔霍河的赫尔米尼乌斯山脉（埃什特雷拉山），在此之前，他先打败了当地居民并且部分移入平原。他征服了杜罗河两边的地区，直抵半岛西北角，在那里他借一支从加得斯调过来的浅水舰队的帮助占领了不列冈提乌姆（拉科鲁尼亚）。这样，大西洋沿岸的居民卢西塔尼亚人和卡雷克尔人便被迫承认罗马的最高权力，而与此同时，战胜者则

忙于通过降低应向罗马缴纳的贡金和调整经济形势以保证臣民享有上好的处境。——然而，尽管早在这位大统帅大政治家的既是军事的又是行政的首次登场中就已经闪烁出天才和领袖思想的光芒——和他以后在更大的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模一样——但他对伊伯利亚半岛的作用却还是太短暂了，没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在那里特有的自然条件及民族状况之下，只要一个行动所持续的时间再长一点，它就能产生持久的作用。

那片于比利牛斯山脉与莱茵河之间，于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纵横绵延的地区，在西部的罗马化进程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不言自明的。那一地区自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就与凯尔特的名字——高卢相伴随了，虽然确切地说凯尔特时而地域狭小，时而广泛拓殖，而那一地区却从未形成过统一的民族，在奥古斯都之前也没有建立过政治上的统一。正因如此，对恺撒696年到达那里时所遇到的种种情况提纲挈领地做一番生动描绘不是轻而易举的。——在地中海沿岸，西据罗讷朗格多克，东辖多菲内和普罗旺斯的那一片地区，六十年来一直是罗马的行省。自从那场席卷过该地的西布里人的进攻过后，很少有罗马人在那里厉兵秣马。664年盖尤斯·西利乌斯曾同萨利伊人为争夺阿克瓦·塞克斯提阿城进行战斗，674年盖尤斯·弗拉库斯曾在前往西班牙的征途上同其他凯尔特人的部落交战。在塞多利乌斯战争中，总督卢西乌斯·马利乌斯不得不赶去援助比利牛斯山脉那边的伙伴，结果吃了败仗，被从伊利尔塔（莱里达）赶了回来；在归乡途中被罗马行省的西部邻居阿奎丹尼亚人再次击溃（约676年）。因此，似乎是这件事引起了一场比利牛斯山脉与罗讷河之间的行省的普遍暴动，似乎就连罗讷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那些行省的暴动也是因此而被唤起的。庞培不得不凭借宝剑，穿过愤怒的高卢杀出一条通往西班牙的道路，并为了惩罚暴乱把弗尔卡族的阿雷科米契人和赫尔维提人的边区（加尔和阿尔代什省）赠送给马西利亚人。总督马尼乌斯·封特伊乌斯（678

年—680年)完成了这些指令,并且由于征服了弗孔提人(德龙省),保护马西利亚不受暴乱者侵犯,重新解放了遭受暴乱者围攻的罗马都城那波,从而在这个行省中恢复了安宁。然而西班牙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罗马人官方和非官方的压榨勒索,给高卢占领区带来的绝望和经济上的毁灭却使那里不得安宁,特别是在离那波最远的阿罗布洛基斯的征兵区中不断酝酿着不满情绪。688年盖尤斯·庇索在那里建立的"和平基金会"以及罗马的阿罗布洛基斯公使馆针对691年无政府主义分子的阴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这种不满的证明。不久之后(693年),这种怨声载道爆发成一场公开的起义。阿罗布洛基斯人的首领卡图克那图斯在这场绝望的战争伊始并非出师不利,但后来在索洛尼乌姆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之后被总督盖尤斯·庞普提努斯击败了。——尽管发动了这一系列战争,但罗马地域的疆界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扩展。庞培曾把残余的塞多利乌斯军队移居至卢古杜努姆·康维纳卢姆,这里连同托洛萨、维也纳以及日内瓦都仍然是朝向西部和北部的最边远的罗马之地。但是对于本土来说,这一片高卢领地的意义却变得日益重要。与意大利相仿的宜人气候、肥沃的土壤、广大而又富庶的腹地都促进着贸易活动,还有直抵不列颠的商路、与本土之间便利的陆路和海上交通,这一切赋予了南方的凯尔特地区一种对意大利人来说举足轻重的经济意义;而这一点是诸多老牌领地,例如在西班牙的领地中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达到过的。那些政治上遭遇失意和不幸的罗马人,在这一时期首先在马西利亚寻找着避难所,并且在那里重新找到了譬如意大利式的奢侈的意大利文化,同样,出于自愿的移民也纷纷从意大利迁至罗讷河畔和加龙河边。对于"高卢行省",早在恺撒驾到以前十年时就有一份草稿这样写道,"商人遍布,罗马居民密集。没有罗马人从中相助,任何一个高卢人也做不成生意;在高卢流通的每一分钱都经过罗马市民的账簿。"从这篇草稿还得知,除了那波来的移民以外,还有大量的罗马农夫和畜

牧者逗留在高卢。同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大部分被罗马人占据的行省土地却掌握在居住于意大利的上层贵族手中，正如最初英国在北美的大部分领地一样。而组成那些农夫和畜牧者的则大多是贵族的经管人、奴隶或者获释的奴隶。在如此条件下，土著人中间的文明化与罗马化得以迅速普及便不足为奇了。这些凯尔特人不喜农耕，他们的新主子却强迫他们以犁易剑。毫无疑问，阿罗布洛基斯人的愤怒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样的一些指令所引发的。在早些时代，古希腊文化也曾对这些地区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统治。对于这些地区来说，他们高度文明的基本特点、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倡议，使用文字[1]以及铸币的倡议都是来自马西利亚。同样是罗马人排挤了这里的希腊文化。马西利亚从希腊文化所获得的熏陶比它所失去的要多。就是在罗马时代，希腊的医生和雄辩家也以城镇的名义受到雇佣。但是在南部的凯尔特地区，希腊文化却是通过罗马人而获得了与在意大利同样的特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典型的希腊文化让位于不久便诱使大批人改变信仰的拉丁—希腊的混合文化。"长裤高卢人"同意大利北部的"着长袍的高卢人"相反，是对凯尔特南部的居民的称呼，他们虽未像前者那样业已彻底地罗马化，但是却已经把自己和那些尚未受制于人的北方地区的"长发高卢人"甚为显著地区分开来。在他们那里，趋于流行的另一半文化虽然提供了足够嘲弄其野蛮的拉丁语的素材，并且人们总是对有凯尔特出身之嫌的人提起他那穿长裤的亲戚，但是这拙劣的拉丁语竟然促成了哪怕是偏远的阿罗布洛基斯人同罗马官员间的商业往来，甚至无需翻译就能在罗马的法庭上作证。——如果说这些地区的凯尔特居民和利古里亚居民行将丧失他们的民族，并且由那些无望的起义充分证明，是不可忍受的政治

---

[1] 例如在维松的沃孔提行政区内发现过一处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凯尔特语碑文（无人知晓碑文的内容）。

和经济的压迫使它趋于虚弱和衰亡的话，那么这些土著居民的覆亡，却是伴随着这一时期在意大利所发现的那种高级文化的流行而发生的。阿克瓦·塞克斯提阿（今埃克斯——译注）以及那波或许是除贝内文图和卡普亚以外堪称规模可观的所在了；马西利亚是所有依附于罗马的希腊城市中最有秩序、最自由、最牢不可破、最强大的一个。在罗马严格的被保守派像对待一部优秀的城市宪法那样加以推崇的贵族统治下，拥有了一个重要的且被罗马人扩大得更为可观的区域以及一项拓展了的贸易的马西利亚矗立在拉丁城市雷吉翁和纳奥波利斯近旁，就像矗立在意大利的卡普亚和贝内文图近旁一般。

越过意大利的边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南部地区，开始为意大利的移殖所压迫的大凯尔特民族，在塞文山脉以北却仍然活动在传统的自由当中。这个民族我们已不是初次听说了，在台伯河畔、波河岸边、在卡斯提利和克恩滕的山地，乃至深入到小亚细亚的腹地，印度的日耳曼人已经和这个可怕部族的分支及前哨发生过战斗，部族主干的核心之地遍布战乱则是由此时开始的。凯尔特族迁至中欧的时候就首先拥到了河谷富饶和风景优美的今天法国的丘陵地带，还包括德国和瑞士的西部地区，并从那里出发，把英格兰南部或许当时已经把整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都据为己有了[1]。凯尔特族在此地，胜过在其他任何地方，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广阔的，地理上封闭的民族整体。虽然在这片广大的地区之内，语言和风俗的差异不可避免，但是似乎一种亲密的你来我往，一种集体的精神之谊却把从罗讷河、加龙河直到莱茵河以及泰晤

---

[1] 泰晤士河两岸的英吉利部族从贝尔及地区借用的名字表明了贝尔及的凯尔特人曾长期持续地向不列颠移民，正像阿德莱巴德斯人、贝尔及人，特别是不列颠人本身一样，后者似乎是来自居住在索姆河边亚眠下面的布列东人。他们首先到达英吉利的一个地区，继而转到了整个岛上。就连英国铸造金币的技术也是从贝尔及发展来的，而且起初就和贝尔及的技术毫无二致。

上河的各个部族连结在了一起。与此相反，这些部族同西班牙以及今天奥地利境内的凯尔特人虽然在地域上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但是一方面由于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构成了庞大的分界岭，一方面由于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侵略同样影响着这里，使得同宗部族间的交往和精神上的联系中断了。这种中断与狭窄的海峡在大陆与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之间造成的中断是截然不同的。遗憾的是，我们无幸对这个奇异民族在这些主要居住地中的精神发展历程进行逐级的探究了；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对它的文化史以及政治的状况——就像在恺撒时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进行起码的概述。

根据古人的报告，高卢的人口比较密集。有个别报告表明，在贝尔及的地区中，每平方英里有大约九百人——这个比例大致和今天瓦莱州及里夫兰州的相当——在赫尔维提人的征兵区大约为一千一百人；在那些较贝尔及地区更文明、而又不像赫尔维提地区那样多山的地方，数字还要高。例如在比杜利格斯人、阿尔维尼人和爱杜依人的地区。在高卢很可能已经有了农耕，施泥炭质肥的习俗已经引起了恺撒同时代的莱茵地区人们的注意，而且凯尔特人用大麦制造啤酒（麦酒）的古老习俗也表明农艺很早就广泛传播了，只是农耕没有受到重视。就连在比较文明的南部，对于自由的凯尔特人来说，扶犁耕作还是不体面的营生。畜牧在凯尔特人那里则高尚得多。罗马的大地主为此不但乐于使用凯尔特人的畜圈，更主要的是乐于起用那些勇敢、善骑而又谙熟动物饲养的凯尔特奴隶[1]。尤其是在北方的凯尔特地区，畜牧占绝对优势。布列塔尼在

---

[1] “在意大利特别是高卢，公牛拥有好的圈，因为它们要干农活；相反，利古里亚公牛则没有这个福气。”这里所指的虽然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高卢，但是毫无疑问，那里的畜牧业却可以追溯到凯尔特时代。普劳图斯就回忆过“高卢的骟马”。并非每一个种族都精通畜牧之道，巴斯图利人和图尔杜利人（皆在安达卢西亚）都不适合畜牧，最好的是凯尔特人，特别善养骑乘和驮载的动物。

恺撒时代是一个谷物贫乏的地区。在它的东北部延伸着茂密的森林，与阿登山脉的中心毗连，从北海几乎不曾中断地一直到莱茵河。在那片今天如此得天独厚的佛兰德和洛林的牧场上，当年麦奈比和特莱维里族的牧人在无法通过的松林中放牧着他们半驯化的野猪。在波河谷地区，羊毛生产和谷物种植是通过罗马人取代了凯尔特人的橡实猪饲料，同样，谢尔德河及马斯河平原上的牧羊业和农业也起源于他们。在不列颠，谷物收割还完全没有普及，在更北部的那些地区则彻底终止了农耕，土地仅仅服务于畜牧。种植葡萄、橄榄给马西利亚人带来丰硕的收成，而在恺撒时期，塞文山脉的另一侧则无人致力于此。——高卢人喜欢走出房舍共同栖居，敞开的村落比比皆是，仅赫尔维提征兵区在696年的计算就达四百个，一批零星的农家还不包括在内。但是也不乏有围墙的城市，桁架式的城墙不但以其实用性，而且以彼此间通过方木和石块形成的精美的接合引起了罗马人的注目，然而此时即使在阿罗布洛基斯人的城市中所呈现的也只是单一的木结构建筑。前面提到那样的城市赫尔维提人和苏埃西翁内斯人都有十二座，与此相反，在偏北一些的地区，例如在纳尔维人那里，固然也有城市，但战时居民们借以寻求庇护的却是沼泽地和森林而非城墙；而在泰晤士河彼岸砍伐森林形成的天然防御完全取代了城市，它是战争中人畜唯一的避难所。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发展紧密相连，陆路和水路交通也方便了。到处都有街道和桥梁。罗讷河、加龙河、卢瓦尔河以及塞纳河等河流所促成的内河航运有着巨大的规模和作用。但是更引人注目的还要数凯尔特人的海上航运。从种种迹象来看，凯尔特人是一个最早的经常航行于大西洋的民族，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了他们不容忽视的造船工艺和航行技术。地中海各民族的航运在较长的时期里一直占支配地位，这与他们航行所至的其他水域一样，是显而易见的：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战船都是橹舰，上面的帆只用来附带地加强船桨；在发达的古代文明时期只有商船

是真正的帆船。高卢人在恺撒时代以及之后很长时间在海峡上使用一种可以搬运的皮筏，现在看来那只是一般的划艇。在高卢的西海岸，首选是维内提人，还有桑东尼人和匹克东内斯人用庞大的、造型笨拙的船只航行，这些船不用划桨驱动，而是装有皮帆和铁锚链，不仅用于同不列颠的贸易往来，而且用于海战。可见我们在此不仅第一次接触了广阔海洋上的航行，而且帆船也第一次取代了划子——这是一个进步。然而不善变通的古代社会却不懂得加以利用，还是我们这个经过更新的文化时代正着手渐渐地吸取其不容忽视的成果。——鉴于不列颠与高卢海岸之间这种有规律的海上交往，海峡两岸居民之间极其紧密的政治联系也就像兴旺的海上贸易和渔业一样易于说明了。是凯尔特人，特别是布列塔尼的凯尔特人，把康沃尔矿井中的锡从英格兰拿来并在凯尔特通往那波和马西利亚的河道及公路上把它耗光了。从恺撒时代有零星的民族以鱼和鸟卵为生的报告中可以推知，这里的海洋渔业和海鸟卵的采集是在很广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在理解我们所有的那些零零散散而又寥寥无几的关于凯尔特的贸易和交通报告的想象中加以补充，人们就会明白，在每一个征兵区中，例如在爱杜依人和维内提人的征兵区中，河埠和海港的关税在预算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另外其主神对于这个民族来说，乃是公路和贸易的庇护者，同时是行会的创始人。与此相适应，凯尔特人的工业也就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了。难怪连恺撒也强调要模仿凯尔特人的伶俐和他们每一件模子所特有的灵巧，要有令必行。行会在大多数部门似乎未曾超越过通常的规范。可以证实，晚些时候在中、北高卢繁荣兴旺的亚麻布和羊毛生产还是通过罗马人才建立起来的。金属加工是一个例外，而且据我们所知是唯一的例外。那些见诸于凯尔特地区墓穴，通常是做工精美、今天仍然柔韧有弹性的铜器，以及那些经过细致检验的阿尔维尼金币是凯尔特铜匠和金匠心灵手巧的活生生的见证。古人关于罗马人向比杜里格斯学习镀锡，向阿来西亚人学习镀

银的报告很可能与之相符——这是两项发明，其中的第一项通过锡的贸易而近在眼前，并且两项发明很可能早在凯尔特人尚属自由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金属加工已经达到了熟练程度，相应地还出现了如何开采金属的技术问题。这种技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卢瓦尔河畔的铁矿中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矿工的水准，以至于在矿山被围困时矿工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那一时期，罗马人普遍认为高卢是黄金富甲天下的国家之一，但众所周知的地质情况以及凯尔特墓穴里的文物储量却驳斥了这一观点。在那些墓穴里金子非常稀少，远比在黄金真正的故乡中同样的发掘物里稀少得多。引起这种观念也可能只是由于希腊的旅行者和罗马士兵善于向他们的同胞讲述阿尔维尼皇帝的光荣以及托洛萨神殿的财宝。毫无疑问，是不免夸张渲染之辞的了，但是这些讲述者也并非凭空杜撰。可以确信，在那些源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河流以及岸边淘金和寻金，是蛮荒时代人们大规模从事的营生。用今天的劳动力价值来衡量，那是收益其微的。此外，高卢的贸易情况与那些半开化民族的情况相仿，可能对积累贵重金属的闲置资本曾经有所益助。——值得注意的是，造型艺术水平低下，与金属加工技巧之灵活相比尤为突出。对色泽艳丽、溢彩流光的装饰物的偏爱，表明了他们在美感上的贫乏。高卢的钱币设计得时而简陋，时而离奇，但往往都很幼稚，而且毫无例外地都是粗制滥造以致无法比拟的，这一切又提供了一种令人生厌的证明。一种经过几个世纪而变得技巧成熟的铸币技术主要局限于对两三个希腊印模的反反复复而又越来越走样的再切割，这种情况大概是空前的。相反，诗艺却受到了凯尔特人的高度重视，并且与这个民族的宗教甚至政治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发现了全盛时期的宗教诗以及宫廷诗和乞丐诗。凯尔特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爱好自然科学和哲学，虽然是与地方神学相关联并以它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当他们面临希腊的人道主义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它。文字知识至少在祭司们那里是普遍

的。恺撒时期，在自由的高卢，人们绝大部分使用希腊文，正如赫尔维提人一样；只是在高卢最南边的那些地区，由于同罗马化的凯尔特人之间的交往，拉丁文在当时已经占据了优势，就像我们在这一时期的阿尔维尼钱币上所见到的那样。

凯尔特民族政治上的发展也呈现出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他们那里，国家的宪法也像在所有地方一样是着眼于贵族的宗族行政区，着眼于首脑们的委员会以及有能力服兵役的自由男人们的城镇。然而他们对行政区的宪法从未有过僭妄之举，这是他们的独特之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环形围墙很早就作为政治统一的基础取代了行政区；同处一墙之内的两个行政区聚集一起，融合为一个共同体。如果全体市民向他们中的一部分指定一处新的环墙，那么一个仅仅通过虔诚的纽带和至多是全体当事人的关系而与母区相联结的新国家便由此有规律地出现了。相反，凯尔特人的"全体市民"却在任何时代都保持着部族的面貌，贵族和委员会主管着行政区，但不是任何一个城市，总的行政区议会是一国之内最后的主管当局。和东方国家一样，城市只具有商业和战略意义，而无政治意义；难怪就连高卢的那些像维也纳和日内瓦一样有城墙而又规模很大的地方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也不过是小村庄而已。恺撒时期在岛居的凯尔特人那里以及大陆北部的行政区中，最初的部族宪法基本上仍旧没有改动：地方城镇保持最高权威；在重要问题上，贵族受到地方城镇的决议的约束；城市委员会为数众多——每个部族中有六百名成员——但是已经显得不再像罗马帝制下的元老院那么重要了。反之，在较为活跃的南部，在恺撒以前的三五十年——末代皇帝的子嗣还生活在他的时代——至少在较大的部族中，在阿尔维尼人，爱杜依人，塞广尼人，赫尔维提人那里出现过一场彻底变革，皇帝统治被推翻，权力回到了贵族的手中。与政治发展相对立的一端，骑士制度，在凯尔特人的部族宪法中占有绝对优势，这只是凯尔特人城市共同体的上述全部缺陷的不利的一面。——

切迹象表明，凯尔特的最高阶层是高高在上的贵族，绝大部分可能是皇族或从前的皇族成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部族当中相对立的党派首领往往属于同宗。这些大家族把经济、战争以及政治霸权揽在自己手中。他们垄断了国家的实权，他们迫使赋税压迫下的城镇自由民向他们借债，迫使他们先是作为实际的负债人，继而按照法律作为依附农民放弃自己的自由。他们自行发展起一种随从制，也就是指贵族用一批享有薪金的、武装起来的奴仆，即所谓"安巴克特恩"[1] 簇拥着自己，从而建立起国中之国的特权；依靠这些自己人的支撑，他们蔑视合法当局以及城镇的征召令，并且实际上打破了城镇体制。假如在一个约有八万壮丁的部族中，每一个贵族能够带着一万个奴仆——依附农民和负债人不算在内——出现在地方议会上的话，那么很显然，与其说这样一个贵族是他那个部族中的一个公民，不如说他是一个独立的君主。另外，不同部族的高贵家族彼此在内部互相关联并借助通婚和特殊协议建立起一个各部族无力对付的封闭的同盟。因此城镇无力维持地方和平，封建贵族动用武力的权力占了上风。只有依附者尚能在其主子那里得到保护，义务和利害关系迫使这些君主去惩罚使他的随从所蒙受冤情的人；国家丧失了遮庇自由人的强权，因此这些人纷纷把自己作为依附者赠与强权。城镇会议失去了其政治意义，就连本该控制贵族僭越之举的凯尔特侯国也像在拉丁姆一样屈从了强权。皇帝被"立法者"或称"法律编纂者"[2] 所取代，他的任期像罗马的执政官一样仅有一年。只要行政区还不是一盘散沙，它就受城镇委员会领导，当然贵族的首领们攫取了委员会中的统治权。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形下，每一个部族中都酝酿着不满，其方式正如不满情绪曾经在拉丁姆、在驱逐了皇帝之后酝酿了几世纪之久：正当不同城镇

① 这个古怪的词汇早在罗马的六世纪就在波河谷地中的凯尔特人那里通用了。
② 来自凯尔特语。

中的贵族阶层结成一个与城镇权力敌对的特殊同盟之际，大众并未停止他们再造君主制的渴望，某个杰出的高贵人也没少想方设法，企图在行政区成员们的支持下，去粉碎他的同等级人的权力，并为一己之利把皇冠重新搬回他的法律中去，正如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在罗马的所作所为。——假如各个行政区皆久病不愈而无可救药的话，那么同时便会在民族内部流露出一种强大的统一的情感，它试图通过某些方式具体化并赢得支持。所有凯尔特贵族的那种联合与各个行政区团体相反，摧毁的虽然是事物的现有秩序，但同时也唤起并滋养了休戚相关的民族意识。外族发动进攻，土地在与邻国的战争中不断缩小，这些都对民族意识产生了影响。像与波斯人作战的希腊人，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凯尔特人作战的意大利人一样，与罗马人作战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人仿佛已经意识到了民族统一的存在与力量。在彼此抗衡的部族之间的口角中，在所有那些封建主义的争吵中，那些人的声音却引起了注目，他们甘愿以各个行政区的自制为代价，甚至以给骑士阶层领主权为代价来换取民族独立。对异族统治的反抗受到多么一致的欢迎，已被恺撒的战争所证明。针对恺撒，凯尔特的爱国者党派所采取的姿态恰似德国的爱国者针对拿破仑；单单是他们互通消息的速度不亚于电报机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的范围和组织。——如果说面临着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凯尔特人不是长期以来就在宗教甚至神学上集中统一的话，那么凯尔特人普遍而强大的民族意识就将不可解释。凯尔特的神职体系，用当地的名称即僧侣社团，必定包括大不列颠岛和整个高卢，或许还有其他的有着共同宗教和民族纽带的凯尔特地区。这一社团有一个僧侣们自己选举的首领，他们拥有自己的学校，在那里传播着颇具规模的传统；拥有自己的特权，尤其是摆脱赋税和兵役，这一点为每一个部族所羡慕；拥有据文献记载是在“凯尔特之地的中心”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会议，而在这一切之前首先拥有的是一个笃信的城镇，其对于当地僧侣的那

种令人难堪的虔诚和盲从仿佛不亚于今天的爱尔兰人。可以理解，这样的神职阶层还想方设法去攫取并且部分程度上已经攫取了世俗统治权：在实行一年任期君主制的地方，它趁空位期引导选举；它成功地运用权力，把单个的人以及整个城镇从宗教的共同体中，也势必从世俗的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它善于把最重要的民事案件，特别是边界和遗产诉讼拉到自己身边，仰仗着拒人于城镇之外的权力，或许还借助于先拿罪犯作人命牺牲的地方习俗，开创了一种与国王及立法者的刑事审判权相抗衡的僧侣的刑事审判权，它甚至主宰战争与和平。这与一个有着教皇和会议，有着豁免权和褫夺教权的禁令以及宗教法庭的教会国家已经相去不远，只是这个教会国家不像近现代的教会国家那样脱离了民族，相反它首先是民族的。——假如凯尔特部族间休戚与共的感情在被唤起之时就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话，那么尽管如此这个民族仍然无法得到一个像意大利人在罗马的市议会，希腊人和日耳曼人在马其顿和法兰克国王那里找到的政治中心化的支撑点。凯尔特的神职阶层和贵族阶层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并联结着民族，但是一方面由于等级割据的利益，他们对民族统一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因他们力量的强大，足以禁止任何一个国王和行政区完成统一大业。这种情况不乏征兆，有行政区宪法助一臂之力，他们走上了霸权体系的道路。强大的征兵区规定，居领导地位的城镇对外全权代表其他城镇，并在国家条约中代他们协商，反之从属的行政区的义务则是服从招募，大概还有缴纳贡金，使得弱小的征兵区以这种形式向他们屈服。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特殊联盟：一个代表整个凯尔特地区的领袖式行政区，一个即便是很松散的全民族联盟却不存在。已经提到过，当罗马人开始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侵略时，在当地的北部遇到了一个苏埃西翁内斯人领导下的不列颠——贝尔及同盟，在中部和南部高卢遇到了阿尔维尼人联盟，爱杜伊人和自己弱小的属区一同与后者抗衡。我们发现，在恺撒时代，生活在塞纳河

与莱茵河之间的东北部高卢的贝尔及人，仍旧生活在一个如我们所见并未向不列颠继续延伸的社会中。除他们以外，在今天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还出现了阿雷莫里卡的行政区即海上行政区的联盟。在中部或者说本来的高卢，像从前一样有两个派系正在争夺霸权，在霸权的顶端，一边是爱杜依人，当阿尔维尼人由于和罗马的战争而衰弱退却以后，另一边成了塞广尼人。这些各种各样的联盟彼此独立并存。在中部的高卢，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看起来从未把它们的属区延伸到东北部，而且大概真的也并未延伸到西北部。在这些行政区联盟中，这个民族对自由的渴望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还不够。全体代表在和平时期由于联盟议会，在战争时期由于大公[①] 而变得空洞之极。只有贝尔及的联盟显得牢固一些，可能是民族的繁荣使它受益匪浅吧，西布里人有利的防守就来自这种繁荣。对霸权的争夺在每个联盟中都造成了一条裂痕，时间没有将它弥合相反却扩大了，因为无论哪一个竞争者获胜，都将给予其对手以政治上的生存并听任它往后重新挑起斗争，虽然它曾经屈从于这个目前的胜利者。较强大的行政区之间的竞争不仅分裂了联盟，而且由于每个人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党派，于是竞争便在每一个附属部族、每一个村庄甚至经常是每一个家庭中继续。希腊在雅典同斯巴达的斗争中并没有像在每一附属城镇甚至雅典中亲雅典和拉西代莫（即斯巴达——译注）的帮派之间的内部纷争中那样精疲力竭；阿尔维尼人和爱杜依人以微小的而且越来越小的比例重现了历史，他们的竞争也同样毁灭了凯尔特民族。

民族的英勇善战性已意识到了这种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倒退。骑兵是凯尔特军队的主要武器，此外在贝尔及人那里以及不列颠诸岛上还出现了完善得令人瞩目的古民族战车。这伙为数众多而

① 对维辛哲托里克斯的叛国行为提起的诉讼，表明这样一位联盟统帅面对他的人民所持的态度。

又善战的马上和车上斗士是由贵族及其忠诚的追随者们组成的。这些贵族也确有骑士风范，在狗和马身上都能找到乐趣，为此他们不惜重金地购买外国种的高贵骏马。至于这些贵族的精神面貌和作战方式，可以从这些事情上窥见一斑——征招令一颁布，他们中间只要是能骑马的，哪怕年迈的老翁也一同上马；在准备开始和一个为他们所不齿的敌人交战之际，他们一个一个地对天盟誓，如果他们没有至少两次突破敌人防线，他们宁愿舍弃全部家产。在这些受雇的侍臣中间，盛行着一种持矛奴仆的风气及其非道德而又空虚的对他人和自己生命的漠然——这证明了人们所讲述的那种值盛宴击剑以博一乐，以及偶尔进行生死攸关的格斗的凯尔特习惯，虽然这种讲述受到了轶事般的渲染；还证明了那里流行的，比罗马的剑术表演更加高超的习俗——以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者若干桶葡萄酒出卖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伸开四肢躺在盾牌上，自愿去承受那致命的一击。——与这些重装的骑兵相比，步兵退居次要地位。他们基本上还似那伙与罗马人和西班牙人战斗过的凯尔特人。大盾牌和当年一样是最主要的防御工具，现在却相反，在诸多武器中长矛代替剑承担起首要角色。在很多行政区联合作战的地方，各部族当然是彼此相向驻扎而彼此交战。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表明各行政区的招募曾有过军事上的划分，或者人们曾经建立过小型的较为正规的战略部门。一支长长的辎重车队一直跟在凯尔特军队后面拖着行李；看来发挥作用的不是那种罗马人每夜都在构筑的营地，而仍旧是可怜的代用物车营。在各个行政区中，例如在纳尔维人当中，步兵的善战例外地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毫无骑士风范的正是他们，也许他们连一个凯尔特部族都不是，而是一个移居而来的德意志部落。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凯尔特步兵像是一股温和而又迟缓的陆地风暴。主要在南部地区，连同野蛮一起渐渐消失的还有勇武。用恺撒的话来说，凯尔特人在战斗中不敢注视日耳曼人的眼睛；罗马的统帅则以比这个评价还要尖刻的方式批评了

凯尔特的步兵。他指出，当他在第一次远征中认识他们以后，就再也没有把他们同罗马步兵一起使用过。

如果我们纵观凯尔特人的总体情况，就像恺撒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所发现的那样，那么，同我们所遇到的在这之前一个半世纪波河河谷的凯尔特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比较，我们就不能对文明史上的一个进步视而不见。那时候，军队中占优势的完全是那种以自己的方式出众的战时后备军，而今骑士阶层却占据了头把交椅；那时候凯尔特人住在不设防的地块中，而今牢固相接的墙垣包围着他们的地域。就连伦巴第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在铜器和玻璃器皿方面也远远不及北部凯尔特地区。也许民族的休戚与共之情才是文化进步的最可靠的尺度，不管这种感情在那些发生在今天伦巴第领土上的凯尔特战斗中流露得怎样少，但它在反抗恺撒的斗争中却显得生机盎然。看来当恺撒面对凯尔特民族时，它的文化已经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凯尔特人在恺撒时代的文明，为我们这些对它报告得很不完全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方面；不仅在一个方面，他们同现代文明有着比同希腊与罗马文明更加密切的联系，理由是他们有帆船，有骑士制，有教会宪法。最重要的是，他们进行过不以城市为基础，而是以种族和更高程度的民族为基础而建立国家的尝试，虽然这种尝试很不完善。但是正因为我们在此所遇到的凯尔特民族正处于其发展的顶峰，所以它低下的道德方面的天赋，或者说它低下的文化水平便更加确定无疑地突出。从自身它既无法创造出一种民族艺术，也无法创造出一个民族国家，至多只能成就一种民族的神学和一个自己的贵族阶层。那最初的天真的勇敢已荡然无存，那种以高度的道德及合理的秩序为支柱的、作为高度文明之后果出现的军事勇气，仅仅曾以非常衰颓的状态在骑士阶层中出现过。大概是原来的野蛮状态已被克服，那种在凯尔特地区，把最肥的后臀尖分给宾客中的最勇敢者，听任每一个自认为因

此受到伤害的客人向那个领受者提出挑战的时代，以及那种把最忠诚的随从和他们死去的头目一块焚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人祭却仍然在继续。规定不准刑讯自由的男人，但却允许像拷问奴隶一样拷问自由的妇女的法律规定把一束令人生厌的光芒投在了凯尔特的女性在其甚至还很文明的时代中所处的地位上。凯尔特人丧失了那些为各民族的蒙昧时期所特有的优越性，却没有获得那些当文明从内部完完全全渗入一个民族时与文明相伴而来的优点。

凯尔特民族的内部情况就是如此。此外还要阐述它同邻邦的外部关系，并描绘它在这一时刻于激烈的诸民族的赛跑和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种竞争中，到处都证明坚持比赢得还要艰难。比利牛斯山脉近旁的民族关系曾经长期平稳和睦，凯尔特人在此地困扰伊伯利亚人亦即巴斯克土著居民、并部分地驱逐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比利牛斯山谷地、贝亚恩省的丛山、加斯科涅湾（比斯开湾）以及加龙河南面的沿岸草原，在恺撒时代毫无争议地为阿奎丹尼亚人所有，他们是一大批很小的彼此很少接触、与外国更少交往的源于伊伯利亚人的部族。在那里，只有加龙河口本身连同重要港口布迪迦拉（波尔多）掌握在一个凯尔特部落即比杜利格斯—维维斯克人手里。——凯尔特民族与罗马民族以及德意志人的接触有着重大的意义。前面讲过罗马人如何在缓慢地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渐渐压退了凯尔特人，最终连夹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沿海地带也占为己有，并借此把它们同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地中海隔离开来。而早在几百年前，希腊就在罗讷河口设置了堡垒，那时就已经为这个灾难作好了准备。这些情况不应再赘述，但是我们必须在此回忆一下，不仅罗马的武器优势困扰着凯尔特人，而且还有罗马的文化优势，凯尔特地区的希腊文明那些可观的开端也同样在最末阶段，使罗马文化受益匪浅。即使在这方面，贸易和交往也为侵略开辟了道路。凯尔特人按照北方的方式喜爱烈性饮料。他

们像西提亚人一样饮用不掺假的上等葡萄酒并且直到喝醉，引起了中庸有节的南方人的惊诧和厌恶，但是商人却并非不愿意同这种主顾打交道。于是对意大利商人来说，同凯尔特地区的贸易很快成了一个金矿，在那里以一个奴隶对换一罐葡萄酒已非罕事。其他一些奢侈品，例如意大利马在凯尔特地区也非常抢手。甚至罗马边界那边的罗马市民，也已经购进地产并以意大利的方式加以利用，就像我们在 673 年已经提到过的塞占西阿维人（在里昂附近）的征兵区内的罗马田产。毫无疑问，因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即使在自由的高卢，罗马语言也已经早在入侵之前就为人所知了（例如在阿尔维尼人那里）。虽然这种知识可能还只限于少数人，虽然爱杜依人即使同结盟行政区的那些有教养的人交往也不得不借助于翻译。和那些贩卖烧酒的商人以及擅自定居者开始侵占北美一样，这些罗马的葡萄酒商和地主也把未来的高卢侵略者招引了进来。无论人们站在相反的一边如何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都表明了由一个干练的凯尔特地区的部落，纳尔维人的行政区，像各个德意志部族一样针对同罗马人的贸易往来而颁发的那项禁令的必要性。——罗马人把德意志人从波罗的海以及北海排挤下来还远不如把他们从地中海挤走那样粗暴。德意志人是一个来自庞大东方民族策源地的年轻部族，他以血气方刚的力量，当然还有那血气方刚的野蛮在它的兄长们旁边为自己辟出了地盘。虽然这个部族的紧靠莱茵河居住的部落的乌西彼得斯人、坦克德里人、苏刚布里人、乌皮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了文明化，至少不再任意更换住地，但是所有信息都一致表明，进一步深入内陆以后，农耕是无足轻重的，而且各个部族几乎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居住地。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那个时期西面的邻国几乎不会根据行政区的名字来称呼德意志内陆的任何一个民族，而是使用普遍的苏埃皮人的名称，这是那些漫游者、游牧民的名称，是马可曼尼人的名称，是战时

后备军的名称[①]——这些名称在恺撒时代还很难说是行政区名。虽然在罗马人看来已经如此，而且以后也更多地成为行政区名。这个伟大民族最为强烈的冲击伤害了凯尔特人。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可能是德意志人为了莱茵河以东地区的地产同凯尔特人进行的战斗。我们只能断定，在罗马的七世纪末，凯尔特人已经丧失了直到莱茵河的全部土地。可能曾经居住在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的博伊人也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从前赫尔维提人居住过的黑森林虽然尚未被毗邻的德意志部族占领，但至少也成了荒僻的边疆战地——估计那时候这里就已经成为后来所说的赫尔维提荒漠了。德意志人借助邻国设置的荒野以阻挡敌人的突袭，保证自身安全的野蛮策略仿佛在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但是德意志人并没有停留在莱茵河畔。那支本质上是由德意志部族的西布里人和条顿人组合而成的、五十年前曾气势汹汹地越过帕诺尼亚、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行军队伍，似乎不过是做作的侦察。各个德意志部族都已经从莱茵河以西即该河下游地区找到了自己栖居的场所；作为不请自到的侵略者，这些移民继续从他们的高卢邻居那里，就像从臣仆那里一样掠夺人质并征缴年贡金。其中包括阿杜亚都契人，他们是由西布里人主体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一个可观的行政区的，还包括另外一部分后来在列日地区的马斯河边，以图恩格里为名称联合起来的部落。甚至还有特莱维里人（在特里尔附近），以及纳尔维人（在赫内高），他们是这一地区的两个最大最有势力的部落，简直就像日耳曼人一样代表着可敬的权威。这些叙述是否完全可信必然是难以确定的，正像塔西陀在这些地区里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两个民族所看到的那样，出身于德意志血统而并不归属于那为人所不齿的凯尔特民族，则被视为一种荣耀，但是谢尔德河、

① 恺撒所指的苏埃皮人可能是卡提人，但是这个名称肯定在罗马时代以及还要晚得多的时候，就为其他可以称作有规律的漫游者的德意志部族所知了。

马斯河以及摩泽尔河地区的居民却似乎曾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德意志的基本特点相混合或者竟然把自己置于德意志的影响之下。德意志的移殖本身或许是微不足道的，可它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在那混乱的黑暗中——我们于其中目睹了这一时期前后，莱茵河右岸的部落时而非同小可，时而人微言轻的情形——人们注意到，更伟大的德意志民众正准备循着那些先驱的足迹去跨越莱茵河。由于两面受到异族统治的威胁并且境内支离破碎，因而无法指望不幸的凯尔特民族还会奋发向上、自力更生拯救自身。他们到此为止的历史就是分崩离析以及分崩离析中的衰亡。一个从没有过类似于马拉松和萨拉米斯、阿里奇亚和劳狄乌斯平原所拥有过的荣光的民族，一个即便在其蓬勃时期也从未尝试过团结一致去毁灭马西利亚的民族，在日薄西山的今天又该如何抵御如此可怕的敌人呢？

凯尔特人越是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日耳曼人相抗衡，罗马人便越有理由严密监视存在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纠纷。虽然那些由此发生的运动至今未曾直接触及他们，但是这些运动在其结束之际却与他们最重要的利益相牵连。可以理解，凯尔特民族的对内立场同它的对外关系已经迅速而又持续地交织在一起。在希腊，拉西代莫（即斯巴达——译注）党为了对付雅典人而与波斯人联合，同样罗马人从他们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首次亮相起便为了霸权，为了对付当时南部凯尔特人中的领导力量阿尔维尼人，竟在他们的近邻爱杜依人的身上找到了支持。在这些新的"罗马民族的兄弟"的帮助下，罗马人不仅征服了阿罗布洛基斯人以及阿尔维尼人的大部分偏远地区，而且通过自己的影响促使霸权从阿尔维尼人过渡到爱杜依人手中。但是如果说希腊的民族只受到一方面的威胁，那么凯尔特人则感到自己同时受到两个民族敌人的胁迫，当他们面临其中一个时还在抵御着另一个。另外，如果一个凯尔特人党与罗马人结盟，其对手则反之与德意志人建立联盟。这些都很自然。

对于凯尔特人来说这是最明显的原因。凯尔特人通过邻里关系以及多种的融和已经接近了莱茵河彼岸的德意志人，而且鉴于他们落后的文化，他们很可能自我感觉与异族的苏埃皮人，至少像与有教养的阿罗布洛基斯人或者赫尔维尼人的同胞一样亲近。但是就连南部的凯尔特人——现在的塞广尼人（在贝藏松附近）的可观的行政区，正同他们一起，位于和罗马人敌对的党派的顶端。这一点已经提过——也完全有理由就在此刻把德意志人召唤过来，以对付暂时威胁他们的罗马人。元老院漫不经心的统治以及正在罗马酝酿着的革命的前兆——凯尔特人对这种革命并不陌生——使得摆脱罗马影响，并首先羞辱其属民爱杜依人的时机恰好在此刻显得成熟了。在把爱杜依人地区同塞广尼人地区隔开的索恩河的关税问题上，这两个行政区之间发生了分裂。683年左右，德意志贵族阿里俄维斯塔带领大约一万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作为塞广尼人的雇佣兵越过了莱茵河。这场战争在胜负交替中持续了数年。总的结果对爱杜依人不利。他们的统帅埃博莱多利克斯最后把全部属民征招人伍，然后又以惊人的优势出发。这些人顽固地拒绝作战并把自己隐藏在沼泽和森林中。但是当这些部族疲于等待而开始暴露并且卸去盔甲的时候，德意志人出现在旷野上，于是他们在阿德马格托布利加附近作战，在这场战役里爱杜依骑士血洒疆场。由于这次失败，爱杜依人被迫接受胜利者提出的讲和条件，他们不得不放弃了霸权带着全部随从忍辱负重去做塞广尼人的属民，还不得不自告奋勇向塞广尼人或者不如说向阿里俄维斯塔纳贡，并把他们最有教养的贵族的子弟作为人质交出去，还得信誓旦旦地保证，既不再索要这些人质也不去祈求罗马人的干预。看起来，这种和平在693年前后便达成了。荣誉和利害关系要求罗马人对此挺身而出。那位高贵的爱杜依人狄维提阿库斯，本是他那个部族中的罗马派头目，但因此被同胞们所驱逐，于是他亲自前往罗马，去请求此间在那里逗留。一个更严峻的警告便是塞广尼人的邻居阿罗

布洛基斯人在693年的起义，而塞广尼人毫无疑问是与这样的结果相关的。实际上高卢的地方长官们已经得到了支持爱杜依人的命令。人们谈论着把执政官及其军队送到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去的事情，但是首先决策这些事务的元老院，最终也只好以微小的行动为自己的大话锦上添花：阿罗布洛基斯人的暴动被以武力镇压了，而对于爱杜依人来说呢，并非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相反，甚至连阿里俄维斯塔也在695年被写进了与罗马人通好的国王的名单中[①]。这位德意志的战争贵族自然便因此认为，罗马人放弃了那不为他们所占有的凯尔特地区。这些贵族在此地把家布置得舒舒服服并开始在高卢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德意志贵族阶层。他打算把随身带来的为数众多的雇佣军支队，还有为数更加众多的应他的召唤随后从故乡赶来的——有人估计到696年为止约有一百二十万德意志人越过莱茵河——所有这些穿过一度打开的船闸急流般涌过美丽的西部的德意志民族的强劲有力的移入者都定居在这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对凯尔特地区的统治。那些由他在莱茵河左岸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殖民地的规模难以确定。毫无疑问，范围所及甚广，而他的构思还要广泛得多。凯尔特人被他作为一个大体上已被征服的民族来对待，而且在各个行政区之间不做任何区分。阿里俄维斯塔曾作为塞广尼人雇来的陆军统帅越过莱茵河，可是就连这些塞广尼人好像也成了被打败的敌人，也不得不为了他的人把三分之一的边区转让出去——估计就是后来特里伯契人所居住的，阿里俄维斯塔和他的部下一直在那里安家的上阿尔萨斯。可就是这样好像也不够，于是又为那些后来的哈鲁德人向塞广尼人索要了三分之一的边区。阿里俄维斯塔仿佛在凯尔特国接替了马其

---

① 为了不发现这些事情经过的可疑之处或者说为了给这些事情的经过加上像政治家的无知与惰性一样更为深入的主题，人们也许就要去想象那种轻率的，一个像西塞罗一样体面的元老院议员在他的通讯报道中，用来详细评述这些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要事的口气。

顿的菲利普斯的角色，并且乐于在那些思想倾向于日耳曼的凯尔特人面前，摆出一副绝不亚于在罗马人的追随者面前所摆出的老爷派头。——强大的德意志贵族如此咄咄逼人地出现在眼前，这必然唤起了罗马人最为严肃的忧虑，特别是这些贵族绝非彼此孤立，那么情况就更加岌岌可危了。就连居住在莱茵河右岸的乌西彼德斯人，坦克德里人也厌倦了放肆的苏埃皮部族对他们土地没完没了的蹂躏。在恺撒进入高卢(695年)前一年，他们从原来的所在地出发，到莱茵河口去寻找别的所在。他们已经在那里夺取了麦奈比人位于右岸的那部分地区，可以预见，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去左岸落脚。在科隆和美茵茨之间进一步聚集着苏埃皮人的雇佣军支队，恐怕在对面的特莱维里人的凯尔特行政区中，他们要被看成不速之客了。最后就连凯尔特人最东边的部族，即好战而为数众多的赫尔维提人的地区，也受到了日耳曼人日益凌厉的侵袭，致使赫尔维提人由于阿里俄维斯塔在塞广尼人地区颁布的规定，而面临着从他们的部族伙伴中完全孤立出来的境地。其实由于他们的垦殖者从莱恩河北的失地重新拥回到这里，他们就已经深受居民过剩之苦了。他们做出了无望的决定，自愿把眼下的地盘腾给日耳曼人，然后再到汝拉山脉以西去争取更广阔更富饶的居住地，同时尽可能获得高卢内部的霸权——这个计划早在西布里人入侵之际就已经由他们的几个地区制定出来并想方设法地去执行了。土地(巴塞尔以及南阿尔萨斯)受到同样威胁的劳拉希人，还有很早就被日耳曼人所逼迫而背井离乡而今流离失所的博伊人的余部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部族，都与赫尔维提人联合起来了。他们的一群巡逻队早在693年就已经越过汝拉山脉直抵罗马的行省，起义本身已经无法再延迟下去。随后日耳曼的垦殖者便不可避免地向其防守者所放弃的博登湖和日内瓦湖之间的重地推进。从莱茵河源头到大西洋岸边所有德意志部落都行动起来了，整个莱茵河航线都受到他们的威胁。这是一个正如当时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向没落的恺撒

帝国冲击的时刻，同样，现在正应该采取行动对付凯尔特人，采取五百年后成功地对付了罗马人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总督盖尤斯·恺撒于696年春天到达了那波的高卢，这一行省已经作为一种补充，通过元老院公决，为他本来已包括了内高卢连同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西亚在内的总督权限锦上添花。起初他被授职五年（直到700年末），然后又于699年延长五年（直到705年末），这个职位赋予他权力，可以任命十名代理行政官级的部将，而且——至少根据他的布置——可以任意从听命于他的地区的众多居民中——尤其是内高卢——抽出人员来补充他的军团或者建立新的军团。他在这两个行省中接管的这支队伍的常备步兵，是由四支受过训打过仗的军团，即第七、第八、第九以及第十军团或者说由最多二万四千人组成的。此外，还要援例加上臣仆兵员。除此之外骑兵和轻装兵由西班牙骑士以及努米底亚人、克里特人和巴利阿里人的弓箭手及投掷者所代替。恺撒的指挥部，首都的民主之精华，除了不少无用但有教养的年轻人外，还包括若干有才能的军官，如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他是恺撒的政治老盟友的少公子，又如提图斯·拉宾努斯，他从罗马城镇的广场到战场都作为一名忠诚的副官跟随着民主领袖。恺撒没有接到确定的任务。对于智勇双全者来说，任务取决于形势。即便是在这里，恺撒也要弥补元老院的失误，并首先要遏阻德意志民族迁徙的潮流。就在此刻与德意志人的侵略紧密交织，并且已准备多年的赫尔维提人的侵略开始了。为了不让被他们离弃的丘陵落在日耳曼人手里，也为了断绝自己的退路，赫尔维提人烧毁了自己的城市和村庄。他们长长的连队满载着妇女、儿童以及大部分辎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日内瓦的莱芒湖畔，他们和伙伴们曾于这一年的3月28

日[1]在那里会合过。根据他们自己的计算，整个队伍共有三十六万八千人，能打动武器的大约是其中的四分之一。汝拉山脉从莱茵河一直延伸到罗讷河，几乎完全隔绝了朝西的赫尔维提之地，狭窄的隘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此首领们决定从南面绕过这条山脉，并在位于罗讷河的汝拉山脉的西南部分的最高峰与萨瓦山之间今天的船闸工事处冲破这条山脉的地方，打通朝西的道路。但是这里右岸的山崖和深谷紧紧迫近河流，以至于只剩下一条狭窄的轻易就可切断的溪流，使得这一岸的所有者塞广尼人能够易如反掌地截住赫尔维提人的去路。因此他们宁愿在罗讷河的缺口上方转到阿罗布洛基斯一边的左岸，以便继续顺流而上，在罗讷河进入平原的地方再次夺得右岸，然后继续向平坦的西高卢进发。在那里，大西洋沿岸(圣东基、夏朗德地区的峡谷)的桑东尼人的富饶的征兵区被这些漫游者选中为自己的新住地。当这次远征的步伐踏上罗讷河左岸时，它穿行了罗马的土地。本来就不想容忍赫尔维提人这种决定的恺撒下定决心，不许他们通行。但是他的四支军团中有三支远在阿奎莱亚，虽然他赶忙招募了阿尔卑斯山以北行省的民兵，但看起来几乎不可能以这么少的人马，从凯尔特人的出发地日内瓦的莱芒湖赶到他们的突破口，在绵延三德里以上的范围内阻止不计其数的凯尔特人越过罗讷河。但是恺撒却通过与本该乐于以和平方式越过河流，穿过阿罗布洛基斯地区的赫尔维提人的谈判争取到了十五天的期限，用来拆除日内瓦的罗讷河桥，并通过一段几乎四德里长的防御工事来阻断敌人通往罗讷河南岸的去路——这是首次使用这种后来被罗马人在广大的范围内推行的体系：借助单个的通过墙垣和壕沟彼此相连接的防御工事的链条，把帝国的边界进行军事封锁。赫尔维提人欲乘舢舨或者借助各处的

[1] 根据未加修订的日历所记载是3月28日。根据通用的然而并非以充分可靠的日期为依据的校正来看，这一天应该是儒略历的4月16日。

河中浅滩夺得对岸的企图，在这些线路上都被罗马人有力地挫败了，于是他们不得不离罗讷河远远地站着。相反，高卢境内希望借助赫尔维提人之力获得进一步加强的反罗马人的党派，尤其是爱杜依人杜诺里克斯，狄维提阿库斯的兄弟——后者处在罗马党派的最顶层——却允许他们通过汝拉山隘口继续行进，并把塞广尼人的土地分与他们。罗马人并没有法律根据以对此进行禁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除了赫尔维提人的远征以外，比罗马地区的正式统一的问题更高的利益正面临着危险——要保全这种利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恺撒高居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的最顶层，去跨越目前为止的帝国边界，而不是像元老院中所有总督，甚至不像马利乌斯所做的那样，把自己局限于巡视边防的微不足道的任务之中。恺撒不是元老院的头领，而是国家的统帅，他从不动摇。他从日内瓦一出发便亲自奔赴意大利，并以他特有的迅速，把那里的三支正在屯兵、两支新成立的新兵军团带领过来。他把这支部队同驻扎日内瓦的军团联合起来，集中力量跨越了罗讷河。他在爱杜依人地区的意外出现，使他很快在那里把罗马党派推上了统治地位，由于军饷的原因，这一点并非无关痛痒。他发现赫尔维提人正忙着越过索恩河，从塞广尼人的地区进入爱杜依人的地盘。他们中间那些仍旧停留在索恩河左岸的人，首先是提格里尼人的军团，被迅疾逼近的罗马人捕获并消灭了。然而这支队伍的主力却已经渡到了河流的右岸，恺撒追击着他们，并用了二十四个小时努力完成了幸存下来的赫尔维提人军队二十天之内没能完成的渡河行动。由于罗马军队这次渡河成功，使赫尔维提人向西面的继续行进受阻，于是他们选择了向北的方向。毫无疑问，这一行动的前提是恺撒不敢进一步向高卢内部去追击他们，而且他们的目的在于：假如恺撒不纠缠他们，他们则转回自己的本来目标上去。罗马军队跟在敌军后面行进了半月，用与他们保持约一德里的距离跟踪着他们，期待着有利时机，在胸有成竹的条件下对他们发起进攻并一举歼灭。然而这样的

时机迟迟不来，虽然赫尔维提人的队伍前进非常迟缓，但其首领却善于防止突袭的发生，并显得物资装备丰富的样子，而且通过他们的奸细极其详尽地了解到罗马军营中的每一细节。相反罗马人却开始遭受缺少必备品之苦，特别是当赫尔维提人远离索恩河而去，河运中断以后。爱杜依人许诺下的供应物资迟迟不到是这一困苦的主要起因，它引起了疑虑，特别是当两军仍旧在他们的地盘上来来回回，逡巡不定的时候。此外，拥有几乎四千匹骏马的上等罗马骑兵却显得根本不可靠了——这毕竟不难解释，因为这支骑兵几乎完全是由凯尔特的骑士阶层，特别是由家喻户晓的罗马敌人杜诺里克斯麾下的爱杜依人骑士组成的，而且恺撒对待他们，与其说像对待士兵还不如说像对待人质。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从远为虚弱的赫尔维提骑兵那里遭到的失败是他们自己招致的，也是由于他们，敌人才获悉了罗马军营中的全部情况。恺撒的处境令人忧虑。使人不愉快的是，凯尔特人的爱国者党派即便在爱杜依人的地盘上也可能做到的事情已经昭然若揭，虽然他们有和罗马缔结的官方同盟以及这个行政区倾向于罗马的特殊利害关系。假如人们有胆量深入这个酝酿着不满的地方，并且越来越远离与外界的联系，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军队刚刚以适中的距离经过爱杜依人的都城比布拉克德（奥图），恺撒便决定在继续向内陆进发以前用武力夺取这个重地，假如他非要放弃进一步的追击而把部队安扎在比布拉克德，那也很有可能。但是由于他停止跟踪而转向了比布拉克德，赫尔维提人便以为罗马人正在布置逃跑，于是现在轮到他们发动进攻了。这是恺撒始料不及的。两军在两条平行的丘陵带上排开阵势，凯尔特人先发制人，冲散了进入平原的罗马先遣骑兵，撞上了安置在丘陵斜坡上的罗马军团，在这里他们却不得不躲避恺撒的身经百战的老兵了。随即罗马人乘优势冲下平原，正当此时凯尔特人再次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时一支被挡住的凯尔特军团也从侧翼向他们进攻。罗马进攻纵队和后备军奉命对付后者，他们

把敌人从主力部队驱离，赶到行李和军营的所在地，在那里他们歼灭了敌人。最后就连赫尔维提军队的主力也被迫退却，不得不朝着与他们的初衷相反的方向——东面撤退。这一天挫败了赫尔维提人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新居住地的计划，并使赫尔维提人面临着胜利者的肆虐之举。然而对于胜利者来说，那同样是炎热的一天。恺撒有理由不绝对信任他的军官团，于是他为了向部下澄清经受住考验的必要性，一开始就把所有军官的马匹都打发走了。事实上，假如罗马人在这次战役中失利，那么罗马的军队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罗马军队已筋疲力竭，无法再强有力地追击那些败军了。但是由于恺撒宣布，谁支持赫尔维提人，必将同赫尔维提人一样作为罗马人的仇敌受到制裁。因而败军所到之处得不到任何支援，所有的物资和行李都被抱走，并被不能打仗的辎重队所拖累，他们负担重重，于是也就只好屈服了这位罗马统帅。命运对失败者已经相当温和了。爱杜依人得到指令，在他们的地盘上把住所让给无家可归的博伊人。失败之敌在这个最强大的凯尔特行政区内的这种移殖，几乎行使着一个罗马殖民地的职责。残留下来的赫尔维提人和劳拉希人是出征队伍的三分之一强，他们自然而然被遣送回自己从前的地区。而那个地区则被并入了罗马的行省，但是为了以罗马的尊严在上莱茵河沿岸保卫毗邻德国的边界，则同意居民们在有利的条件下加入与罗马的联盟。只有赫尔维提行政区的西南角被罗马人直接占领，后来在莱芒湖那美丽的岸边，旧的凯尔特城诺维奥杜努姆(今尼翁)则变成了罗马的一座边界城堡，即尤利乌斯骑士移民地。

上莱茵河畔德意志人的入侵迫在眉睫，同时凯尔特人的反罗马人党派受到了侮辱。莱茵河的中游，德意志人几年前就已经越过那里，高卢境内与罗马分庭抗礼的阿里俄维斯塔的力量日益扩大，现在必须在那里采取措施，而且谈判决裂的诱因轻易便找到了。对于这里大多数的凯尔特人来说，比起威胁着他们或者说已经施加

于他们的、来自阿里俄维斯塔的桎梏，罗马至高无上的权力似乎只是较小的祸害了。对罗马怀有坚决仇恨的少数派至少该沉默了。一个在罗马影响之下召开的中部高卢各凯尔特部族的会议，以凯尔特民族的名义，请求罗马的统帅帮助对付德意志人。恺撒接受了请求。在他的策动下，爱杜依人停止支付根据条约应向阿里俄维斯塔缴纳的贡金，并且要求放回在押的人质。但是由于阿里俄维斯塔针对这种毁约行为，向罗马的属民发动了进攻，恺撒便由此抓住了把柄，要和他展开直接谈判，除了释放人质以及给爱杜依人以承诺外，还要维持和平，特别要求阿里俄维斯塔自告奋勇地保证，决不再把德意志人迁过莱茵河。这位德意志的统帅满怀着对自己势均力敌的权力的信心答复了罗马统帅。对于他来说，根据战争法规，北高卢已经臣服于他，正如南高卢之于罗马人。如果他不阻止罗马人从阿罗布洛基斯人那里收缴贡金，那么罗马人也不许妨碍他向自己的臣民征税。根据后来的秘密透露，这位王公对罗马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提到了罗马向他发出的干掉恺撒的要求。并且主动提出，假如恺撒愿意把北高卢转交给他的话，他将会反过来助他一臂之力取得意大利的统治权——如果说凯尔特民族的党派纷争曾经为他打通进军高卢的入口，那么此时他则正在期待意大利的党派纷争带给他巩固的统治。这种完全针锋相对、生硬而毫无顾及地表达着自己独立性力量的语言，几百年来一直无人使用，正如人们现在从这位德意志的一军之主那里听到它的时候那样：当在臣属贵族面前举行的演习结束后，罗马元帅要求他亲自站到他面前时，他断然拒绝前往。雷厉风行已经越发必要了：恺撒很快就向阿里俄维斯塔发动了进攻。他的部队陷入了深深的惶恐，特别是他的军官们，当奉命与那伙十四年来未曾停止战斗的德意志的核心力量进行较量的时候，他们惶恐不安。看来罗马的那种衰落已极的道德风纪和战争纪律也想在恺撒的军营中找到用武之地，并且挑唆官兵开小差和造反。但是由于统帅声明道，在必要之时只带上第十军团

向敌人出击，因而他不仅通过这种荣誉的提醒而且通过尚武的热情，把他的所有军团统统系缚在天鹰之上（天鹰，罗马军团的标志——译注），并以自己的力量为军队注入了生机。不给他们以考虑的时间，恺撒便带领他们迅速地继续行进，而且幸运地赶在阿里俄维斯塔前面到达了塞广尼都城维索齐奥（贝藏松）的领地。看起来应阿里俄维斯塔要求举行的两位统帅的私人会晤，仅仅是掩饰一个针对恺撒本人的企图。在这两位高卢巨头之间，唯有武力能够一分高下。战争暂时停止了。在下阿尔萨斯，大约在缪尔豪森地区离莱茵河 1 德里的地方[1]，这两支军队相去不远地安营扎寨，直到阿里俄维斯塔成功地以他压倒优势的实力绕过罗马军营，从背后进行突然袭击，并截断了罗马人与基地的联系和物资供给。恺撒企图以一场战斗摆脱困境，然而阿里俄维斯塔却不接受。于是这位罗马的统帅别无办法，只好不顾自己微弱的实力去步敌人的后尘，让两支军团绕过敌人，在德意志人军营的那边建立一个阵地，而在这边的军营中则留下四支军团，以这种方式重新建立起联系。阿里俄维斯塔由于看到罗马人已经分散，便企图偷袭他们一个较小的营地，但是罗马人击退了他。在这种成功的兆头当中，整个罗马军队准备发动攻势。德意志人也摆好阵势，排开了长列，每个部族独立成列，前后顺次排开，为了给逃跑制造困难，军中载有行李和妇女的手推车也排列起来。由恺撒亲自指挥的罗马人的右翼迅猛地扑向敌人，将之逐退；德意志人的右翼也取得了相同的战果。天秤仍旧是均衡的，但是后备军的策略却决定了这场针对日耳曼人的战斗，像其他

① 葛勒尔（恺撒的《高卢战记》）认为在离缪尔豪森不远处发现了塞尔内战役的战场，这大体上与拿破仑简史所估计的在贝尔福地区的战场位置相符。这种估计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是却同环境相适应，因为恺撒从贝藏松到达那里的短短一段路程需要 7 天的行军时间，这一点他自己提到过，他指出，为了避免走山路，他绕了 10 多德里的弯路。而且流传下来的具有同等权威性的资料中关于那次追击一直继续到莱茵河边并且显然并未持续多日，而是在战役当天就结束的全部叙述都可以断定那次战役是距离莱茵河 5000 步而非 5 万步进行的。

一些针对蛮族的战斗一样，是有利于罗马人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及时地派来支援他们的第三条战线，在左翼重新发起了战斗，于是胜利已成定局。追击一直继续到莱茵河岸边，只有少数人，其中包括国王，逃到了对岸(696年)。——罗马的统治异常荣耀地向这条气势磅礴的大河，这条意大利士兵初次见到的河流，昭示着自己的来临。仅仅通过一场顺利的战斗便获得了莱茵航线。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移民区的命运掌握在恺撒手里，胜利者可以将它毁灭，然而胜利者并没有这样做。邻近的各凯尔特行政区，塞广尼人、劳埃西人、麦狄欧马特里契人，既不善战又不可靠。迁移来的德意志人则许下诺言，不仅要成为勇敢的边防卫士，而且还要成为罗马更优秀的奴仆，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把他们同凯尔特人区分开来。对于保卫新获得的居住地的利益使他们同莱茵河对岸的同胞分离开来，因为他们势单力薄，不得不攀附最高权力。在此恺撒偏爱那些被他征服的敌人胜过那些靠不住的朋友，就像在所有地方一样。他给予那些从前跟随阿里俄维斯塔沿莱茵河移居的日耳曼人、斯特拉斯堡周围的特里伯契人、施佩耶尔周围的纳梅提人和沃尔姆斯周围的凡吉欧尼人以新的居住地，并托付他们去监视对着他们的同胞的莱茵河边界[①]——但是在莱茵河中游威胁着特莱维里地区的苏埃皮人，在获悉阿里俄维斯塔败北的消息后，却重新迁回了德意志内地，在途中由于邻近部落的关系而消耗了巨大的财力与物力。

这一次远征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几千年之后仍然可以感到它的影响。莱茵河成了罗马帝国与德意志人的分界线。高卢再也不能够自作主张、发号施令了。在这里，迄今一直是罗马人统治着南部沿岸地区。不久以来德意志人也试图继续顺流而上来安家落

① 这似乎是关于这些日耳曼殖民区起源的最简单的估计。阿里俄维斯塔使那些民族在莱茵河中游定居的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他的军队里作战(《恺撒》)，而且在此之前未曾出现过。

户。以上情况已经表明，高卢必然全部而非部分受制于罗马最高权力，而且这条滔滔大河所形成的天然边界也必将成为国界。元老院在其旺盛时期从未停闲下来，直到罗马的统治势力达到意大利的天然边界，阿尔卑斯山脉、地中海及其附近岛屿。扩张的帝国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军事上的拼零为整，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却听其自然，至多只是考虑到能够使边界受到保护，但又无需由他们直接加以保护。人们已经感觉到目前正有另一个幽灵，另一只手臂开始驾驭罗马的命运了。

未来建筑物的墙基矗立起来，但是为了扩建它，为了完全赢得高卢人对罗马统治的认可以及德意志人对莱茵边界的承认，所缺少的还很多很多。虽然从罗马边界向上直到夏特勒和特里尔的整个中高卢，都不声不响地甘心顺从这位新的当权者，而且在莱茵河上、中游暂时也不必担忧德意志人来侵袭，但是北部地区，不仅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阿雷莫里卡行政区，而且还有贝尔及人较为强大的联盟都没有受到中部高卢战争的打击，他们找不出理由去服从阿里俄维斯塔的战胜者。另外，我们已经提到过，在贝尔及人与莱茵河对岸的德意志人之间有一种异常密切的关系，而且日耳曼各部落也在莱茵河口处做好了跨越莱茵河的准备。鉴于这些原因，恺撒率领着他的目前扩大到八个军团的部队于697年春向着贝尔及的行政区出发了。心中牢记着五十年前，他们在边界上齐心协力对西布里人进行的那场勇敢而顺利的抵抗。在众多的从中部高卢逃奔他们的爱国者的鞭策下，贝尔及人的联盟派出了他们的第一批共同兵员，苏埃西翁内斯人的国王加尔巴率领着三十万武装士兵，向他们的南端边界进发，去那里迎战恺撒。唯独一个行政区，即强大的雷米人的行政区（在兰斯附近），在这场异族人侵中，看出了摆脱邻国苏埃西翁内斯人的统治的时机，于是便准备在北部承担起爱杜依人曾经在中高卢扮演过的角色。罗马军队和贝尔及军队几乎同时到达了他们的地域。恺撒并没有给这个勇敢的、实力六倍

于自己的敌人提供战机。在埃纳河以北，距离今天的兰斯和拉昂之间的蓬塔维尔不远处，他把营地设在一个部分借助埃纳河以及沼泽，部分借助壕沟和棱堡从四面八方显得牢不可破的高地之上，并且洋洋自得于自己的计划，即通过防御性措施，去挫败贝尔及人越过埃纳河，以切断他与外界联系的企图。如果他指望这个联盟在自己的困境中土崩瓦解的话，那么他估计对了。加尔巴国王是一个正直而受到普遍尊敬的人，但是在敌人的地盘上统率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他却无法胜任。人们停滞不前，储备消耗殆尽，不满和分裂开始在联盟的军营里酝酿。与苏埃西翁内斯人实力相当的贝洛瓦契人，已经由于得不到盟军支援而情绪低落了，自从传来爱杜依人作为罗马人的盟友正准备进驻贝洛瓦契人地区的消息，他们便首先难以维持下去了。人们决定卸下戎装返回故乡。如果说所有的行政区出于耻辱而同时订立了齐心合力赶去帮助最先受到侵袭的行政区的协议，那么这种无法执行的协议，只能为那可怜巴巴的四散奔逃的联盟做一点可怜巴巴的粉饰而已。这是一场灾难，它活灵活现地使人想起1792年几乎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现的另一场灾难。在香槟地区的失败也恰似这场远征，仅仅因为这失败并未通过战斗便已注定，它才更显得惨重。这支撤退的军队中拙劣的领导，给了恺撒以机会去追击他们——仿佛他们是一支败军——并且去歼灭他们中坚持到最后的兵员的一部分。然而胜利的结果并不限于此。当恺撒开进贝尔及人的西部各征兵区时，它们一个接一个几乎毫无抵抗地投降了：不管是强大的苏埃西翁内斯人（在苏瓦松附近），还是他们的竞争者贝洛瓦契人（在博韦附近）和安比阿尼人（在亚眠附近）。城市敞开了大门，因为城门前出现了异样的攻城武器——向城墙滚来的攻城塔车。不愿意听命于外国主人的都设法逃奔了大海彼岸的大不列颠。但是，在东部各征兵区中却迸发出较为强烈的民族感情。维罗曼杜埃人（在阿拉斯附近）、阿德莱巴德斯人（在圣康坦附近）、德意志的阿杜亚都契人（在那慕尔附近），不过

首先是纳尔维人(在赫内高内)同他们为数不少的属民结成了第二次更加紧密的联盟，在桑布尔河上游沿岸聚集起他们的队伍。他们在数量上不亚于苏埃西翁内斯人和贝洛瓦契人，在勇气和祖国意识上也远远胜过他们。凯尔特的奸细向他们传递了关于罗马军队动向的最准确的情报，他们自己的地方情报以及高高的栅栏——在这些地方到处都设置这种栅栏，为的是阻断时常来侵袭的马上强盗团伙的道路——使得联盟者们自己的行动尽可能避开了罗马人的耳目。罗马人到达了桑布尔河畔的巴维附近，各军团正忙着在河的左岸堤面上建立营地，骑兵和轻步兵忙于侦察对岸的高地。就在这时候，骑兵和轻步兵突然遭到了敌方全体战时后备军的袭击，士兵们被冲散，纷纷摔下河里。刹那间敌人便跨过河来，以视死如归的决心冲上了左岸的高地。正在修筑工事的军团士兵几乎来不及把铲锹换成刀剑；很多士兵身无片甲寸铁也不得不原地搏斗，没有战线，没有计划，没有真正的指挥；闪电般的突袭和被高耸的栅栏隔开的地块使各个步兵分队彼此完全失去了联系。不是战役，而是相当数量的彼此毫不相关的搏斗逐渐展开了。拉宾努斯带领左翼赶跑了阿德莱巴德斯人，并且一直把他们追击到河的对岸。罗马的中路军把维罗曼杜埃人赶下了堤坡。然而统帅所在的右翼却轻易就输给了兵多将广的纳尔维人，特别是当中路军为胜利所牵引让出了旁边的地盘以后，情况就更糟了。完工一半的营地也被纳尔维人给占领了，这两支军团各自紧紧地聚缩成一团，前沿和两侧受到袭击，大部分军官和最精良的士兵丧失殆尽，看起来他们行将被驱散被消灭。罗马的辎重队和联盟军已经四散而逃，凯尔特骑兵中的各分队也在溃逃，就像特莱维里人的兵员一样，放开缰绳纷纷奔突，为的是亲自跑回老家去报告战场上惨遭失败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一切都处在危急关头。统帅亲自手执盾牌，身先士卒；他的榜样，他那即使在此时此刻也仍然鼓舞人心的呐喊，使这一行摇摆不定的人重新稳住了阵脚。士兵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

喘息，而且当救援队伍到来之时他们至少已经同该翼的两支军团重新建立起联系：救援队伍一部分是从河堤上下来的，他们是携带行李的罗马后卫部队，刚刚赶到河堤上；另一部分是从河对岸过来的，因为其间拉宾努斯已经推进到敌营边缘并夺取了敌营，现在终于发觉了威胁着右翼的险情，于是便把战绩卓著的第十军团派来支援他的统帅了。与联盟者断绝了联系并且腹背受敌的纳尔维人，在此时此刻当幸运转向了反面之际，却表现出了同他们自信是胜家的时候一样的英雄气概。他们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但却战斗到最后一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报告，这一天内他们六百名议员中只有三人幸存下来。大概在这场毁灭性的失败之后，纳尔维人、阿德莱巴德斯人以及维罗曼杜埃人就不得不承认了罗马至高无上的权力。阿杜亚都契人姗姗来迟，未能参加桑布尔河畔的战斗，他们尽管试图坚守在自己最坚固的城市中（在胡伊附近马斯河畔的法尔希泽山上），但是也很快就投降了。在投降以后，他们还在城市前面对罗马军营进行了一次失败的突袭，这种背叛之举受到了罗马人可怕的严厉制裁。由居住在马斯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厄勃隆尼斯人，以及其他邻近的小部族组成的阿杜亚都契人的属民、被罗马人宣布为独立自主而被俘的阿杜亚都契人，却被大批地拍卖了，这样做是为了罗马资源的利益。看来西布里人所遭受过的灾难仍然在伴随着西布里人这最后的余部。恺撒把其余被征服的部族普遍解除了武装，还关押了人质，对此他洋洋自得。雷米人的行政区自然而然地成了贝尔及高卢中居领导地位的行政区，就像爱杜依人之于中高卢一样。甚至在中高卢有一些与爱杜依人敌对的部落也宁可前往雷米人的属区。只有莫里尼人（在阿杜依斯）和麦奈比人（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偏远的沿海征兵区、由德意志人居住的莱茵河与谢尔德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次还算是幸免于罗马人的侵略，拥有着他们自古以来的自由。

现在轮到阿雷莫里卡人的各行政区了。早在697年的秋季，普

布利乌斯·克拉苏斯就奉命带领一支罗马军团到达过那里。由于他的影响，作为今天的莫尔比昂各港口以及一支庞大舰队的主人，在所有凯尔特行政区中拥有航海和贸易第一把交椅的维内提人以及位于卢瓦尔河与塞纳河之间的沿岸地区，都拜倒在罗马人的脚下，并向他们提交人质。然而没有多久他们便后悔起来。当罗马的军官于次年冬天(697—698年冬)来到这些地区，并张贴告示宣布粮食供给之时，便被维内提人当作人质逮捕了。迅速效法这一先例的，不仅有阿雷莫里卡人的征兵区，还有贝尔及人的尚属自由的沿海征兵区。在某些地方，如诺曼底的一些行政区内，众人推翻了不赞成暴动的城镇议会，并且带着双倍的热情投身于民族事业。从卢瓦尔河口到莱茵河口的整个沿海地区都奋起反抗罗马，所有凯尔特行政区的最坚定的爱国者都奔赴那里，去为解放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人们已经料到了整个贝尔及联盟的暴动，料到了来自不列颠的支援，料到了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的进驻。——恺撒派遣拉宾努斯带领全部骑兵前往莱茵河畔，去镇压怨忿四伏的贝尔及地区，并且在必要时阻止德意志人过河；他的另一名副将，昆图斯·提图利乌斯·萨宾努斯则带领三支军团前往暴乱者的主力所聚集的诺曼底。然而暴乱真正的策动者却是强大而又智慧的维内提人，陆地和海上的主攻目标都对准了罗马人。那只部分由臣服的凯尔特行政区的船只组成，部分由一些在卢瓦尔河上迅速建造的、载着来自那波行省的划手的罗马橹舰组成的船队，在副帅德西姆斯·布鲁图斯的带领下来到这里。恺撒本人则率其步兵的核心力量开进了维内提人的境内。但是那里的人们已经做好准备，并且灵活而果断地利用了地处布列塔尼以及拥有大规模海上力量的有利条件。布列塔尼的地形断断续续，粮产贫乏，大多数城市都坐落在山崖和沙嘴之上，要想从陆路到达这里，只能走难以通行的北海浅滩；对于陆路进攻的军队来说，获得给养和进行围攻同样艰难，而凯尔特人却能够利用他们的船只，轻而易举地给城市以全部必要

的装备，并且能在危急关头撤离城市。各个军团在围攻维内提人地区的过程中，不惜花费时间和力量，为的是看到敌船上实质性的胜利果实有朝一日化为乌有。罗马的舰队在卢瓦尔河口长久地为风暴所阻，最后终于从那里到达了布列塔尼的海岸，这时它奉命以一场海战来决定这场斗争的胜负。凯尔特人清楚自己在海战上的优势，于是搬出了自己的舰队，去迎击布鲁图斯指挥的罗马舰队。凯尔特人的舰队拥有二百二十艘帆船，不仅如此，还远远多于罗马人所可能筹措到的数目。他们的带有平坦甲板的坚固的高舷帆船，也远比罗马人的那些带有突兀的龙骨翼板的、草草嵌合的低矮橹舰更适合于在大西洋滔天的海浪中航行。不管是罗马人的标枪还是登船跳板，都够不着敌船那高高的甲板，铁的鸟嘴形船头撞到它坚实的栎木舱板也会弹回来。但是罗马船员用固定在长杆上的镰刀，割断了将横桁固定在船桅上的缆绳，横桁和船帆便翻倒下来。由于人们不善于补救，帆船因此也就变成了一只作废的残骸，就像今天由于桅杆倒掉所造成的后果一样。这样罗马的小艇轻而易举地就掌握了敌人瘫痪的船只。当高卢人注意到这一诡计的时候，便千方百计离开他们与罗马人战斗过的岸边，试图驶往远洋。因为罗马的橹舰无法跟随他们到达那里，但是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海上突然平静得没有一丝风，于是这支巨大的、海上行政区倾注了全部力量装备起来的舰队在罗马军队的攻击下几乎全军覆没。就这样这场海战——如果历史资料充分的话，这是大西洋上最早的海战——恰似二百年前在米雷的交锋，虽然形势不利，但却通过一个急中生智的成功发明，以罗马人的胜利而告终。由布鲁图斯赢得的胜利的结果，是维内提人以及整个布列塔尼的归降。这与其说是为了在屡次证明了对臣民的怀柔态度以后而今想树立一个对付顽固的反抗者的可怕的严惩榜样而给凯尔特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还不如说是为了惩罚对罗马官员做出违约和逮捕行为的凯尔特人。恺撒命人处决全体城镇议会议员并把维内提行政区的全体市民一个不剩

地卖为奴隶。由于这种可怕的命运，也由于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爱国主义，维内提人比任何其他的凯尔特部落都更有权要求后世的同情。在此期间，萨宾奴斯对在海峡沿岸聚集起来的沿海国家的兵员采取了与恺撒在前一年用以战胜埃纳河岸边的战时后备军同样的策略；他做出保护者的姿态，直到焦虑和匮乏开始在敌人的队伍中蔓延，然后他通过隐瞒自己军队的情绪和实力，最主要的是通过自己的焦躁，吸引敌人对自己的军营进行意外袭击从而打击敌人，然后那些兵员便纷纷溃散，这块地方就臣服于他了。——只有莫里尼人和麦奈比人坚决不肯承认罗马的至上权威。为了强迫他们承认，恺撒出现在他们的边界；但是吃一堑，长一智，同胞的经历使他们变得精明了，他们为了避免在边界作战而退到当时从阿登山脉向北海不断绵延的森林里去了。罗马人企图用斧头开辟出一条通过森林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两旁，伐倒的树木被垒了起来，作为阻断敌人的突袭的屏障，于是就连一贯大胆的恺撒在几天的疲惫行军后也发现有必要——特别是冬季在迫近——安排撤退了，虽然他只征服了莫里尼人的一小部分，而强大的麦奈比人还根本未被触及。第二年(699 年)，当恺撒本人在不列颠忙忙碌碌之际，这支军队的绝大部分已经被重新派往这些部族，但是这次远征基本上还是一事无成。虽然如此，第二次远征还是几乎完全使高卢屈服于罗马人的统治了。如果说中部高卢不加抵抗地就屈服了罗马人的话，那么贝尔及行政区以及海上行政区则是被 697 年和 698 年两次的远征，这样的武力方式所逼迫才承认罗马的统治的。凯尔特人借以开始第二次远征的雄心勃勃的希望从未实现过。无论德意志人还是不列颠人都没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拉宾努斯在贝尔及的出现已经足以防止前一年战火的复燃了。

因此，当恺撒用武力把西部的罗马领土构成一个封闭的整体时，他并没有忘记为新征服的、被指定用以填补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间出现的空地建立同意大利本土及西班牙行省的往来联系。不过

高卢同意大利之间的联系，主要还是通过庞培在677年修建的越过日内伏勒山的军用公路而方便起来的。但是自从整个高卢归属罗马人以来，人们就急需一条从波河谷地并非向西，而是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山脊，在意大利和中部高卢之间建立起一个较短联系的公路。很久以来，那条越过大伯恩哈特山脉进入瓦莱并伸向日内瓦湖的道路就服务于商旅了。为了控制这条公路，恺撒早在697年秋天就通过塞维乌斯·加尔巴占领了奥克多杜卢姆，并把瓦莱的居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当然这一切由于那些山民勇敢的抵抗受到了耽搁，但却并未受到阻止。为了进一步建立同西班牙的联系，次年(698年)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被派往阿奎丹尼亚，他肩负的使命是强迫居住在那里的伊伯利亚部落承认罗马统治。这一任务完成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伊伯利亚人要比凯尔特人团结得紧密，也更善于向敌人学习。比利牛斯山那边的部落，尤其是精干善战的康达布里人为他们受到威胁的同胞派去了援军。随后曾在塞多利乌斯率领下受过罗马化训练的经验丰富的军官也赶到了，他们把罗马的战争艺术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安营扎寨的技巧加以引进，为原来就因数量和勇猛著称的阿奎丹尼亚兵员锦上添花。但是率领罗马人的那位优秀的军官却克服了千难万险，在几场艰苦但都幸好取胜的陆路战役之后，成功地迫使从加龙河到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民族统统屈服了这位新主人。

如果说恺撒给自己定下的这个征服高卢的目标归根到底是通过刀剑实现的，那么这一目标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当然并不排除一些不值一提的例外。但是这项由恺撒开创的事业的另一半却还远未完成，德意志人还没有普遍承认莱茵河为边界。就在眼下，698年—699年的冬天，在罗马人尚未进驻的莱茵河下游又一次出现了越界行为。乌西彼得斯人和坦克德里人的德意志部落(已经提到过，他们曾准备在麦奈比人的境内跨越莱茵河)通过假装的撤退麻痹了敌人的警惕，终于乘着麦奈比人的船只渡过了河去——这浩

浩荡荡的一群人连妇女和儿童在内据说有四十三万人之多。看来他们仍然驻扎在内伊梅根和克累弗一带，但是据说他们的意图在于响应凯尔特爱国者的呼声向高卢腹地进发，而且由于他们的骑兵已经越过了特莱维里人的边界，因此这种传闻就更厉害了。当恺撒率领军团到达他们面前时，这些备受折磨的流动者仿佛并不渴望新的战斗，而是愿意从罗马人那里接受土地，并在罗马人的至高权威之下安宁地进行耕种。当一切如此顺利的时候，罗马统帅的心中萌发起疑念，莫非德意志人只是想赢得时间，以待他们派出的骑兵再次赶来。这种怀疑是否有根据还很难说，因为敌人虽然停战但却以一支部队向他的先头部队发动过一次进攻，这一点更加深了他的怀疑，而且进攻造成的重大损失激怒了恺撒，于是他确信自己有理由无视一切国际法上的考虑。当第二天德意志的诸侯和首脑们出现在罗马军营里，对那次事先未告知他们就发动的攻击进行道歉的时候，失去了将帅而一无所知的士兵遭到了罗马军队的突然袭击。那与其说是一场战斗，勿宁说是猎捕活人，所有未在罗马人宝剑下扑倒的都淹没在莱茵河中。只有在突袭发生之际已被遣离的各分队幸免于这场血洗，渡过莱茵河返回了苏刚布里人在自己的境内——似乎是在利珀河畔——为他们提供的避难所。恺撒对这些德意志移民所采取的方法在元老院中受到了义正辞严的谴责，尽管这种方法难以得到谅解，但它毕竟使德意志人的侵犯受到了令人震惊的坚决的遏制。恺撒认为有必要继续下一步行动，并且要把军团拉到莱茵河对岸。在与莱茵河对岸的联系方面，他应有尽有。处在当时的文化水准上的德意志人则不具备任何的民族共识，他们政治上的精神涣散不亚于凯尔特人，虽然原因有别。德意志部落中最开化的乌皮人（在齐格河与拉恩河畔）不久前被内陆区的一个苏埃皮行政区征服并被迫纳贡。他们早在697年就曾乘船去请求恺撒把他们连同高卢人一起从苏埃皮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恺撒的意图不是顺应这种将把他卷入无休止的行动中的无理要求，

但是为了阻止日耳曼人的武装出现在莱茵河这边，至少表现一下罗马武装已经存在于莱茵河那边，这恐怕还是必要的。逃跑的乌西彼得斯人和坦克德里人在苏刚布里人那里得到保护不失为一个合适的借口。在科布伦茨和安德纳赫地区的莱茵河上，恺撒架起了独木桥，并把他的军团从特莱维里人境内拉到乌皮人之地。几个较小的行政区递交了投降书。但是这次远征的首要目标，即苏刚布里人却在罗马军队挺进过来的时候，带领着受他们保护的人向内地撤退了。威胁着乌皮人的强大的苏埃皮行政区——也许就是那个后来以卡提人的名义出现的行政区——用同样的方式让和乌皮人的地域暂时接壤的各区腾出地方，使不善作战的民族获得托庇；与此同时，所有能打仗的民族都得到了在这个行政区的核心地带集合的指示。对此应战，罗马的统帅既无理由亦无兴趣，他的目的是一边进行侦察，一边通过跨越莱茵河的远征，有可能的话好好地教训一下德意志人，但至少是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凯尔特人及其同胞。这一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在莱茵河右岸停留了八天之后，恺撒重返高卢并拆除了那道莱茵河桥(699年)。

岛居凯尔特人仍旧存在。鉴于他们与本土上的凯尔特人，特别是海上行政区之间的联系，不难理解，他们至少也怀着恻隐之心参加过那次民族反抗，对那些爱国者虽未给予武力援助，但至少在他们有海洋保护的岛屿上为每一个无家可归者提供了一处光荣的避难所。不过危机仍然存在，即使不是现在，也会在将来。看来即使不亲自去侵占该岛，也得在这里进行攻击性的防御，并通过登岸行动让岛民们清楚，罗马人的手臂已经伸过了海峡。罗马的第一位进入布列塔尼的军官，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早就从那里出发向英格兰西端的"锡群岛"(锡利群岛)航行过(697年)。699年夏天恺撒

仅率两支军团从海峡最狭窄处[①]渡海。他发现海岸上敌军密布，于是率船继续航行。但是不列颠在陆地上的战车走得和海上的罗马橹舰一样快，而罗马士兵费很大力气才面对着敌人，在借助投掷器和弓箭手扫清海岸的战船的保护下，一半靠跋涉，一半靠划小船赢得了海岸。邻近的村庄见状吓得马上投降，但是岛民们很快发觉了敌人是何等弱小，何等没有勇气离开岸边。于是土著人便躲向腹地，只有为了威胁敌营才返回来。那些被搁在海上的舰队在第一次风暴袭来时便遭到了致命的损伤。他们真该为此感到庆幸，因为在勉强修复船只以前，他们就打退了蛮族的进攻，而且赶在最糟糕的季节到来之前乘着这些船返回了高卢海岸——恺撒本人对这次轻率而且不太充分的远征的结果大为不满，于是他立刻(699 年—700 年冬天)命人组建了一支有八百艘帆船的运输舰队，在 700 年的春天第二次扬帆驶向肯特海岸。这一次他带了五支军团和二千名骑兵。在这支强大的舰队面前，聚集在海边的不列颠人这次依旧没敢打一仗就撤退了。恺撒立刻引兵深入内陆，在几场出色的战斗之后跨过了斯多尔河，但是他不得不违心地保持非常的克制，因为停泊在海上的舰队差点再度被海峡风暴摧毁。人们把船只拖上了海岸，并为修复它们采取了大规模的防御措施，在此之前，一个宝贵的时机溜掉了，但是凯尔特人却聪明地利用了它。勇敢而又慎重的诸侯卡西维劳努斯曾经统治今天的米得尔塞克斯以及附近地区，此外他还威震泰晤士河以南的凯尔特人地区，现在他成了全民族的保护人和先锋，登上了陆地防御军的首席。他很快认识到，以凯尔特的步兵对付罗马步兵将毫无建树，而且这些既难供养又难控制的战时后备军只会对防御造成障碍。于是他解散了战时后备军，只保留了战车，他把其中的四千辆集中起来，战车上的士兵善

---

① 恺撒沿着从加莱港到布洛涅港海岸的码头向肯特的海岸所做的航行和恺撒本人清清楚楚的报告都说明了这一件事的实质。进一步支配该地的企图曾多次表现出来，但未能成功。

于跳下车来徒步作战，像古罗马的市民骑兵一样可以车地两用。当恺撒重整旗鼓准备续继前进时，却发现不知该向何处去了。然而这时不列颠的战车却不断向罗马军队迫近，对该地的清理由于城市不多而进行得比较顺利，并且任何的调兵遣将和联络行为都受到了阻止和恐吓。泰晤士河——看起来穿流于伦敦上方的金斯顿和布伦特福德之间——已经被罗马人跨过。军队向前走，但却没有真正地向前推进；统帅没有获胜，士兵没有任何战利品，唯一真正的成果——征服了住在今天埃塞克斯的特里诺巴滕人——与其说是对罗马人恐惧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该行政区对卡西维劳努斯深深的敌视。每前进一步，危险都在增加，肯特的诸侯根据加西维劳努斯的部署对罗马船营进行的袭击虽然被打退了，但却是对返回的紧急敦促。罗马人攻克了不列颠的一个大后方，在那里大量的牲畜落到他们手里。这次攻击的成功给了这种漫无目的前进一个勉强的了结，也为返回找到了可以接受的借口。就连卡西维劳努斯也非常清楚，不能把这个危险的敌人逼到极端。按照恺撒的要求，他保证不打扰特里诺巴滕人，保证缴纳捐税并递交人质。至于移交武器和留下一支罗马卫戍部队是根本谈不上的，就连那些许诺——只要是涉及未来的——也没得到无论是许诺者还是承诺者的严肃对待。恺撒接受了人质以后便回到船营，从那里返回了高卢。如果说他曾经希望过以这一次的攻击占领不列颠，那么这项计划则一半由于卡西维劳努斯灵活的防御系统，一半则首先是由于意大利橹舰队的无能而在北海的水域彻底失败，因为议定的贡金是从来也不会兑现的。不过下一个目标——动摇这些岛居凯尔特人牢固的安全感，并诱使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赶快把他们的岛献出来，作为本土移民的场地——看来已经达到了，至少以后没再听到有人抗议这种施加保护的措施。

反击日耳曼人的入侵以及征服本土上的凯尔特人的事业已大功告成，但是统治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往往不如征服一个自由的民

族来得容易。罗马人的占领在某种程度上平息了被占者对霸权的争夺，因为占领者独占了霸权，而争夺霸权给凯尔特人带来的毁灭远远甚于罗马人的进攻所造成的毁灭。凯尔特人不再提特殊的利害关系，在共同的压力下他们反而感觉到他们又是一个民族了，而从前因为拥有而漫不经心地失去的一切，自由和民族，其无边的价值现在——因为为时已晚——则只能从无边的渴望中得到衡量了。但是真的太晚了吗？他们又恼又羞地承认，一个至少拥有一百万能打仗的男人的民族，一个早就以尚武而著称的民族被最多不过五万的罗马人套上了牲轭。中高卢的盟友连一仗都没打就被征服了，而贝尔及人则连打一仗的愿望都没有就被征服了；相反纳尔维人和维内提人悲壮的灭亡，莫里尼人和卡西维劳努斯统率的不列颠人机智而又出色的反抗——曾经相继被疏忽而又被履行的一切，失败而又成功的一切——又一次激起所有爱国志士的激情，鞭策他们重新进行可能更团结更有成果的努力。特别是在凯尔特贵族中间，酝酿着一种似乎随时都将爆发为一场起义的不满情绪。早在700年春天的第二次远征之前，恺撒就看到了亲自去对付特莱维里人的必要性。特莱维里人自从697年在纳尔维战役中丢了面子以后，便再也没有出席过普遍地方议会，而且又和莱茵河对岸的德意志人建立了甚为可疑的联系。恺撒当时满足于带领爱国者党派中最著名的人物，特别是英杜提欧马卢斯，作为特莱维里人的兵员前往不列颠。恺撒尽可能对密谋策划视而不见，以避免由于采取严厉的措施而引起他们暴动。但是当那个名义上作为骑兵军官，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夹在奉命前往不列颠的军队中的爱杜依人杜诺里克斯坚决拒绝登船，而是策马回家的时候，恺撒忍无可忍地命人把他当作逃兵进行追捕。他被后派来的部队抓住了，又因为他的反抗而被击倒（700年）。对于整个凯尔特贵族阶层来说，这个最强大而且依赖性最小的凯尔特行政区中最有名望的骑士被罗马人杀掉，这乃是一个晴天霹雳。每一个意识到这种想法的人——这种想法

占绝大多数——在每一次灾难中都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如果说是爱国主义和绝望迫使凯尔特贵族的头目进行密谋策划的话，那么现在则是恐惧和紧急自卫把这种密谋逼到了开火的地步。在700年—701年冬天，全体罗马军队除去一个进入布列塔尼和一个进入卡尔努德斯人（在夏特勒）的行政区的军团以外的六个军团，势不可挡地在贝尔及地区扎下营来。由于粮食储备非常勉强，恺撒便考虑把部队——就像他一向所做的那样——继续分散开来，并迁入六个不同的在贝洛瓦契人、安比阿尼人、莫里尼人、纳尔维人、雷米人以及厄勃隆尼斯人的行政区内建立的营地。这个在厄勃隆尼斯人境内、大概离后来的阿杜亚都契，即今天的通格尔不远的地方朝东建立起来的最边远也是所有军营中最强大的军营，是由一支在恺撒的一位最有威望的师团长昆图斯·提图利乌斯·萨宾努斯领导下的军团以及在勇猛的卢西乌斯·奥隆库勒尤斯·科塔领导下加在一起构成半个军团实力的各分遣队组成的[①]，这支军营突然发现自己被厄勃隆尼斯人之王安皮奥列克斯和卡图沃尔库斯率领的战时后备军包围了。袭击来得如此意外，以至于刚刚离开军营的部队还没集合起来就被敌人给捕获了。除此之外，危险暂时还不大，因为储备充足，而且厄勃隆尼斯人企图发动的突然袭击被罗马的防御工事抵挡了回去，变得毫无威力。但是国王安皮奥列克斯向罗马的指挥者透露，说同一天内高卢境内的罗马军营都遭到了同样的袭击，如果各军团不迅速动身互相联合起来的话，罗马人毫无疑问将遭到失败。还说连莱茵河对岸的德意志人都已经在进攻途中了，所以萨宾努斯更有理由抓紧行动了；又说他本人会出于对罗

---

① 虽然科塔不是萨宾努斯的副统帅，而同样也是个副将，但是这位更加年轻而威望稍稍逊色的军官，在发生争端的情况下被指定做出让步，这一点不仅仅是源于萨宾努斯从前的战绩，更由于在所有将他们两人相提并论的地方萨宾努斯都略胜他一筹，而在叙述这场灾难本身时也是这样做的。除此之外，人们就无法接受恺撒在一个军营中任命两个有同等权限的军官，而在意见发生分歧的情况下则一筹莫展的事实了。

马人的友谊而保证他们向附近的距离这里只有两日行程的罗马军营自动撤退云云。其中的某些言论并非杜撰，至于说厄勃隆尼斯人的那个受到罗马人特殊宠爱的小行政区接过了进攻的任务，事实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且和别的相距遥远的军营建立联系则困难重重。鉴于这一点决不可以小看那种遭到全体暴动者袭击，并且被分别歼灭的危险。虽然如此，不容置疑的却是，不仅荣誉，还有机智都要求罗马指挥官拒绝敌人所提出的投降条约，并把这个受人委托的职务坚持到底。就连在作战会议中也有众多的呼声代表这种看法，尤其是举足轻重的卢西乌斯·奥隆库勒尤斯·科塔的呼声。然而指挥官还是决定接受安皮奥列克斯的建议。于是罗马军队于次日便撤退了。但是当到达一个离营地不足半英里的峡谷中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厄勃隆尼斯人包围了，而且所有的出路都被堵住。他们试图以武力开辟道路，但是厄勃隆尼斯人拒不进行任何短兵相接的战斗，而是从他们攻击不着的位置上向罗马军队的人群投掷标枪。萨宾努斯茫然无措，仿佛向出卖者请求免于被出卖的命运似的，与安皮奥列克斯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得到了安全的保障：他连同陪伴他的军官先是被缴了械，然后遭到了屠杀。在这位指挥者倒下之后，厄勃隆尼斯人同时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扑向精疲力竭而又绝望的罗马人，冲散了他们的行列：大多数人在这场袭击中送了命，其中包括先前已经负伤的科塔；一小部分人重新找到了废弃的军营，在第二天夜里拔剑自尽。罗马军队全军覆没。——这个战果连暴动者自己都不曾指望过，它大大加剧了凯尔特爱国者中酝酿的不满情绪，结果除了爱杜依人和雷米人以外，罗马再也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地区了，起义随即在各个地点爆发。厄勃隆尼斯人不顾一切地乘胜追击。他们得到了乐于借此机会对恺撒所施加的苦难进行报复的阿杜亚都契人以及强大而又自由的麦奈比人的兵员，从而变得越发强大。他们一出现在纳尔维人的境内，纳尔维人就立刻表示同意。于是这支猛增到六万人的队伍向着

位于纳尔维行政区的罗马军营挺进了。在此任指挥的昆图斯·西塞罗由于头脑迟钝而处境艰难，特别是当包围者师敌之技修建起罗马式的围墙和濠沟、保护棚和活动塔，并且朝着盖茅草的营棚扔火焰投掷器和火矛的时候，他处境尤艰。此时恺撒正率三支军团逗留在离亚眠不太远的地方，被围者的一线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但是——这是证明凯尔特地区总气氛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证据——这位最高统帅经过很长时间也没看出任何暗示着萨宾努斯将大祸临头或者暗示着西塞罗处境危险的蛛丝马迹。终于有一个凯尔特骑兵从西塞罗的军营出发绕过敌军溜到了恺撒跟前。接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恺撒出发了，他只带了两支弱小的军团，总共七千多人，四百骑兵；虽然如此，恺撒挺进的消息仍然足以迫使暴动者解除围困。时候已经到了，西塞罗的军中没有负伤的人寥寥无几。叛军的矛头转向了恺撒，恺撒则以其曾多次奏效的方法对敌人隐瞒了自己的实力，在不利的条件下叛军冒险突袭罗马军营而吃了败仗。如此战果累累，如此不断扩大的暴动，由于这样一次失利的战役，或者说是由于恺撒在战场上的亲自出现便于突然之间可悲地半途而废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是对于凯尔特民族来说却很富有代表性。纳尔维人、麦奈比人、阿杜亚都契人以及厄勃隆尼斯人都返回了家园。海上行政区的人也如法行事，准备给布列塔尼的那支军团当头一棒。厄勃隆尼斯人主要是通过相邻的特莱维里人的强大行政区的首领英杜提欧马卢斯取得了那次突袭的胜利。特莱维里人得知阿杜亚都卡发生了灾难的消息后，曾经抄起武器闯进雷米人境内，去进攻那支拉宾努斯指挥下在那里屯兵的军团。现在就连他们也停止了战斗。恺撒很不情愿地把针对叛乱区所制定的措施推迟到春季，为的是不让他那精疲力竭的军队再遭受高卢严冬的折磨，尤其是考虑到，假如三十支新步兵队中被摧垮的那十五支通过部署好的征召，以惊人的方式得到弥补的话，他便能重返沙场。在此期间，暴乱仍旧充满紧张气氛，虽然干戈暂时平息了。暴

乱在中高卢的主要所在地，一部分是卡尔弩德斯人和邻近的塞诺内斯人(在桑斯附近)的区域，后者把恺撒任命的国王赶出了国境；一部分是特莱维里人的地方，他们教促所有凯尔特移民以及莱茵河对岸的德意志人参加已经近在眼前的民族战争，并且招募了整支部队，以便随着冬去春来第二次挺进罗马人的境内，歼灭拉宾努斯的军团，与塞纳河及罗讷河畔的起义者建立联系。这三个行政区的议员没有出席恺撒在中高卢规定召开的地方议会会议，他们以此公开宣战，正如贝尔及行政区的一部分通过对萨宾努斯的军营和西塞罗发动进攻所做的那样。冬季已近尾声，这时恺撒率领着他那支在此期间大大加强了的军队向暴乱者出发了。特莱维里人要把暴动集中进行的企图未能实现；由于罗马军队的进入，怨声载道的地区受到了安抚，而怒气冲天的地区则逐个遭到了打击。纳尔维人是最先被恺撒亲自赶走的。塞诺内斯人和卡尔弩德斯人遭到了同样的待遇。就连麦奈比人，唯一从未屈服过罗马人的行政区，也因遭到三面同时发起的联合进攻而被迫放弃了他们那保持了很久的自由。在此期间，拉宾努斯给特莱维里人造成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第一次进攻之所以陷于瘫痪，一半是由于毗邻而居的德意志部落拒绝提供雇佣军，一半是由于这场运动的灵魂英杜提欧马卢斯在与拉宾努斯的骑兵发生的小交锋中阵亡了。但是暴动者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计划。他们带着全部兵员出现在拉宾努斯面前，并且期待着后继的德意志众兵，因为他们前去招募士兵的人在德意志腹地中黩武的民族那里——如事实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得到了比在莱茵区居民那里更好的对待。但是由于拉宾努斯有意要避开德意志人而赶忙出发了。特莱维里人便只好赶在德意志人到达之前，在这个不利的地方对罗马人发动了进攻，结果大败。德意志人赶来得太迟了，别无他法只好返回。特莱维里行政区则只好投降，那里的统治权重又落到了罗马党派头目的手中，落到了英杜提欧马卢斯的女婿维辛哲托里克斯手中。当恺撒对麦奈比人和拉宾

努斯对特莱维里人的远征结束后，整个罗马军队在特莱维里人的境内重新汇合了。为了败德意志人卷土重来之兴，恺撒又一次渡过莱茵河，为尽可能地给这个讨厌的邻居一次坚决的打击。但是，卡提人恪守他们久经考验的战术，没有留在西部边界而是远远地深入腹地，在哈尔茨山脉旁结集起来准备抵御。恺撒马上班师返回，他认为在莱茵河桥旁留下一支卫戍部队就足够了。这样恺撒便跟所有参加过暴动的民族都算清了账。唯有厄勃隆尼斯人被忽略了，但是并没有被忘记。恺撒自从获悉了阿杜亚都卡发生的灾难便装出一副悲伤相，并且发誓，不为他那些并非在正义的战争中阵亡而是遭到凶残谋杀的士卒报仇雪恨，就决不摘下这副面具。厄勃隆尼斯人一筹莫展而又无所事事地坐在自己的小屋中，看着邻近的行政区如何接二连三地屈服于罗马人，直到罗马骑兵从特莱维里人的地域出发，并穿过阿登山脉闯进他们的国土。他们对这种突然袭击毫无准备，连国王都险些在家中被活捉；当他的下属为他作出牺牲的时候，他则死里逃生跑进了附近的树林。继这些骑兵之后很快又来了十支罗马军团。同时罗马人向居住在附近的民族提出了要求，要他们和罗马士兵齐心协力，去追逐被放逐的厄勃隆尼斯人并洗劫其国土。听从这一召唤的人为数不少，甚至还有来自莱茵河彼岸的一伙鲁莽的苏刚布里人的骑兵。顺便提一下，他们对待罗马人不比对待厄勃隆尼斯人好多少，而且差一点就通过一次大胆的奇袭，给阿杜亚都卡的罗马军营当头一棒。厄勃隆尼斯人的命运是悲惨的。虽然他们藏身于森林和沼泽中，但是猎人比野兽还要多。有些人，像年迈的王公卡图沃尔库斯，已自寻短见；只有个别人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和自由，这少数人中就有罗马人首先在追捕的人——贵族安比奥列克斯：他只带着四名骑兵逃过了莱茵河。这个与所有其他行政区相比罪大恶极的行政区受到了处决。其他各地应声附和，以谋反罪对各个行政区进行了审判。怀柔的时候过去了。根据罗马前任执政官的判词，受人尊敬的卡尔弩德斯骑士阿科

被罗马卫兵斩首(701 年),权杖和斧头也借此而首次正式被使用了。反对派鸦雀无声;到处是寂静。恺撒按惯例于 701 年秋季越过阿尔卑斯山,为的是用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从近处观察首都之中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情况。

聪明的算计者这一次失算了。火焰虽然受到了抑制,但是并没有熄灭。使阿科头颅坠地的那一刀触动了整个凯尔特贵族阶层。此时此刻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上一年冬季的暴动之所以失败,仅仅是因为恺撒本人在战场上的出现。而今他却远在他方,被迫在眉睫的内战牢牢地拴在波河岸边,而高卢的军队则聚集在塞纳河上游沿岸,与那位令人生畏的统帅相隔遥远。如果这时候在中部高卢爆发出一场总叛乱的话,就可能包抄罗马军队,淹没这个几乎不设防的古罗马行省,而恺撒尚不能赶回阿尔卑斯山以北,即使意大利发生的纠葛并不妨碍他进一步去关心高卢。中部高卢所有行政区的阴谋都汇合在了一处。卡尔弩德斯人自告奋勇做先锋,因为处死阿科首先触怒了他们。701 年—702 年冬季,卡尔弩德斯的骑士古特卢阿图斯和康克奈托杜姆弩斯于既定的这一天在塞纳布姆(奥尔良)发出了起义信号,并全歼出没在那里的罗马人。整个大凯尔特地区都卷进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爱国者到处活动。没有什么比阿尔维尼人的揭竿而起对这个民族的影响更为深刻的了。这个城镇在其国王们的统治下,曾经在南部高卢首屈一指,而且在它由于对罗马发动战争失利而丧失了优先权以后也仍然是整个高卢中最富裕、最有教养、最强大的城镇之一。它的统治者至今坚定不渝地忠于罗马。爱国者党派即便是眼下在掌权的城镇议会中也只占少数,所以向议会提出加人暴动的要求实属枉然。于是爱国者把进攻目标指向了城镇议会以及现行宪法本身,特别是由于宪法的变更——这种变更使城镇议会在阿尔维尼人那里代替了诸侯发生在罗马人获胜之后,而且很可能正是这种胜利的结果。阿尔维尼爱国者的领袖维辛哲托里克斯属于我们在凯尔特人中遇到的那种

贵族，他在行政区内外都拥有不亚于王族的声望，此外他还是一个魁伟、勇敢而又机智的人。他离开首都，去号召那些如同敌视罗马人一样反对独裁统治的国民一齐重建阿尔维尼王国，并对罗马人作战。他迅速地成了民心所向的中心，重建卢埃利乌斯以及贝杜伊图斯的宝座同时就是反对罗马的民族战争的宣言。以往要卸掉民族外来枷锁的一切努力都是由于缺少统一的支柱遭到了失败，现在他们在这位新的毛遂自荐的阿尔维尼人之王身上找到了中流砥柱。维辛哲托里克斯对大陆的凯尔特人，如同卡西维劳努斯对于岛居的凯尔特人。民众们感到，拯救民族的事业非他莫属。暴动覆盖了从加龙河口到塞纳河口之间的西部地区，维辛哲托里克斯被所有行政区公认为最高统帅。城镇议会在哪里处境艰难，他便在哪里鼓动民众加入运动。只有少数行政区，例如比图利格斯人的行政区，是被迫参加的，不过这也许只是表面现象。起义者在上卢瓦尔河以东的地区遇到了较为不利的情况。在那里一切都取决于爱杜依人，而他们却摇摆不定。这一行政区中的爱国者党派实力雄厚，但是他们对居于领导地位的阿尔维尼人所怀的敌对情绪却抑制了这种影响——这是最不利于暴动的，因为东部征兵区的联合，特别是塞广尼人和赫尔维提人的征兵区，取决于爱杜依人的参与，这一部分高卢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在于他们。于是起义者一边努力说服还在犹豫的征兵区，首先是爱杜依人，参加起义，一边夺取那波——他们的领袖之一，冒失的卢克特利乌斯已经在这个紧挨塔尔纳河的古老行省境内露面了。——与此同时，出乎朋友和敌人的意料，在严冬里，罗马的最高统帅突如其来地出现在阿尔卑斯山这边。他不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保护这个古老行省的必要部署，而且派一伙人越过白雪皑皑的塞文山脉进入了阿尔维尼境内。但他却不在此停留，因为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可能由于爱杜依人加入高卢联盟而把他同自己驻扎在桑斯和朗格勒的军队切断。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维也纳，从那里出发，只随身带了少数

骑兵经过爱杜依人的地盘到达了自己的军中。促使密谋暴发成起义的希望化成了泡影。意大利仍旧一片安宁，恺撒又一次站在了他的军队的最高位置上。——但是如何开始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武力来解决是愚蠢的，因为武力已经完成了最后的裁决。不管现在把凯尔特人聚集成浩浩荡荡的大军，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放弃行政区都无济于事，因为试图以凯尔特军队去打击罗马军团无异于以卵击石。维辛哲托里克斯不再攻打罗马人了。他采取了一种和卡西维劳努斯用以挽救岛居凯尔特人的战争体系相仿的体系。罗马的步兵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恺撒的骑兵却几乎完全由凯尔特贵族的援军组成，而且由于成员的普遍背离实际上已经解散了。而暴动又恰恰主要是由这些凯尔特贵族组成的，因此可以发挥一下这个法宝的优越性，即他们能够使国家遍地荒无人烟、烧毁城市和村落、破坏物资储备、危及敌人的给养和联系而敌人又不能对此加以严肃的阻止。于是维辛哲托里克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扩大骑兵和根据当时的作战方式通常用来配合骑兵的徒步弓箭手身上。他没有把那些为数众多而又陷于瘫痪的阵地民兵赶回老家，也没有把他们摆在敌人眼前，而是设法使他们逐渐学会筑工事，学会行军，能灵活地服从调遣，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对士兵的要求不单单是打架斗殴。他师敌之技，特别是罗马的军营体系，这是罗马战略优势的全部秘诀的基础，罗马军团正是凭借这个把城堡卫戍部队同进攻部队两者的全部优势结合起来的。不过那种对城市稀少的不列颠及其勇猛坚决而又团结一致的居民完全适用的体系，不一定能适用于卢瓦尔河畔的富庶之地及其陷入了彻底的政治解体[①]中软弱无力的居民。维辛哲托里克斯至少使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企

---

① 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进攻兵器主要是近身肉搏之用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在现代战争指挥中，正如拿破仑一世所精辟概括过的，这种体系毫无用武之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进攻兵器从远处发挥作用，那么展开的阵势必然优越于集中的阵势。在恺撒时代情况正好相反。

图保全每一座城市，结果连一座都未曾能保住。他们一致同意在进攻到来以前，毁掉那些无力抵御的地方而齐心协力地保卫强大的城堡。此外，这位阿尔维尼人之王用冷酷无情把唯唯诺诺和马马虎虎者、用请求和劝诫把摇摆不定者、用金钱把贪得无厌者、用强迫把顽固的反对者等等，统统系缚在祖国的事业之上。为了给高尚的流氓施加少许爱国热情或者从卑劣的流氓那里骗取少许的爱国热情，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没等冬天过去他就扑向了被恺撒迁人爱杜依人境内的博伊人，企图在恺撒赶到以前毁灭罗马的几乎唯一可靠的盟友。这条进攻的消息也迫使恺撒把行李和两支军团留在阿格丁库姆（桑斯）的冬季营地。他比平素行动得都早，一得到消息他便立刻向暴乱者挺进了。他用渐渐争取过来的德意志雇佣军弥补了罗马骑兵和轻步兵不足的明显缺陷。这些德意志雇佣军配有一半是购买进来、一半是从军官那里没收来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战马，以此代替了罗马骑兵那又矮小又羸弱的老马。恺撒在中途把卡尔努德斯的都城塞纳布姆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然后便渡过卢瓦尔河开进了比杜利格斯人的境内。他通过这一行动，使得维辛哲托里克斯放弃了对博伊人这座城市的围攻转而开向比杜利格斯人。在这里，新型战争必将经受考验。按照维辛哲托里克斯的指令，比杜利格斯人的二十多个地方在一天之内全都化为灰烬。这位统帅对邻近的行政区实行了同样的自行毁灭措施，只要这些地方有可能被罗马军队染指。按维辛哲托里克斯的意图，就连比杜利格斯人的富裕而又坚固的首都阿瓦历古姆（布尔日）都得蒙受同样的命运。但是参谋会议的大多数成员对比杜利格斯官员低声下气的请求做了让步，决定还是重点守护这座城市。于是战争的中心暂时转向了阿瓦历古姆。维辛哲托里克斯把他的步兵安置在城市旁边沼泽地中央的一处难以接近的地方。这样一来，即使没有骑兵的保护，他们也无需害怕罗马军团的进攻了。凯尔特骑兵遍布大街小巷，阻断了一切联系。这座城市被强有力地占据着城市和城墙前的

军队之间保持着直接联系。恺撒的处境非常艰难。要求凯尔特步兵开战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守着自己难以攻克的战线不肯出来。尽管恺撒的士卒在城市前面勇敢地修筑工事、进行战斗，但被他们包围的敌人在创造力和胆量方面完全和他们势均力敌，那些被围者还差点把他们的围攻用具烧毁。同时，为一支大约六万人的军队提供生活物资的任务日益艰难了，况且这支军队所处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荒无人烟，并且遭受过优势显著的大队骑兵的蹂躏。博伊人的少量储备很快就用光了，爱杜依人答应供应的物资还没到来；粮食已经吃光，士兵们仅以肉食为生。尽管卫戍部队进行着视死如归的战斗，但城市陷落之日已经迫近。此时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在敌人攻占之前趁夜间把部队撤出，将城市毁掉。维辛哲托里克斯正是这样部署的，但是撤军之际留下的妇女和儿童发出的哀嚎声惊动了罗马人，撤退没有成功。阴雨绵绵的第二天，罗马人翻过城墙，由于遭到顽固的反抗，他们在这座陷落之城里不分老幼地大肆屠杀。凯尔特人堆放在城中的丰富的物资使饥饿之极的恺撒士兵大大获益。随着对阿瓦历古姆的占领（702 年春），罗马人取得了对暴乱的第一个胜利。根据以往的经验，恺撒大概正在期待暴乱能就此瓦解，而他只需把各个行政区一个个地赶走就行了。于是他先带领全军出现在爱杜依人的行政区，以这种气壮山河的示威迫使当地的充满怨忿的爱国者党派至少暂时保持安静。然后他把军队分成两部，派拉宾努斯回到阿格丁库姆，去联合留守当地的四个军团中领头的军队，一同首先去镇压这一次再度揭竿而起的卡尔努德斯人和塞诺内斯人境内的运动，自己则带领其余的六支军团转向南部，准备把战火引向维辛哲托里克斯自己的地盘，阿尔维尼山区中去。——拉宾努斯从阿格丁库姆出发开上了塞纳河左岸，为的是强占那座位于塞纳河中一座岛上的巴黎人的城市卢德几亚（巴黎），然后再从这个安全可靠的位于起义地区中心的地点出发，去征服其他起义的地区。但是在麦罗杜努姆（默伦）后面，他发现道路

被暴乱者的全体军队挡住了，这支军队由曾经待在难以攻击的沼泽地中心的卡姆罗格弩斯率领。拉宾努斯后退了一段距离，在麦罗杜努姆渡过了塞纳河，并沿河的右岸畅行无阻地向卢德几亚进军。卡姆罗格弩斯命人烧毁了这座城市并拆除了通向左岸的桥梁，在拉宾努斯面前摆开了阵势，使他既无法引自己开战也无法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过河。——罗马的主力军则在阿利埃河畔冲进了阿尔维尼行政区。维辛哲托里克斯企图阻止他们过河前往阿利埃河左岸，但是恺撒智胜了他，几天以后就出现在阿尔维尼首都日尔哥维亚[①]面前。在此期间，维辛哲托里克斯——毫无疑问早在他于阿利埃河畔遇到恺撒之时——已经把充足的储备运进了日尔哥维亚，并下令在这座位于一个高耸的小丘顶部的城市的城墙前面，为他的军队建立起一个围有坚固石墙的营地；而且由于他占有充分的优势，于是他在恺撒之前到达了日尔哥维亚，在城堡围墙保护之下的牢不可破的军营里等待着敌人的进攻。恺撒的军队相对弱小，不但不能真正地围困这个地方，就连充分封锁都做不到。恺撒把营地建在维辛哲托里克斯所占领的高地下方，而且迫不得已只好和对手一样按兵不动。恺撒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脚步在塞纳河畔以及阿利埃河畔突然停滞下来，这对于暴乱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胜利。而这种停滞对于恺撒来说则无异于一种失败。至此，一直还在摇摆不定的爱杜依人现在郑重地打算加入爱国者党派了。恺撒召往日尔哥维亚的军队已经奉军官之命开始声明支持暴动者，同时征兵区中已经开始了对住在那里的罗马人的劫掠和屠杀。恺撒带领其封锁军的三分之二赶到了爱杜依人的那支向日尔哥维亚靠近的军团跟前，以自己的突然出现使他们名义上再度变得顺从起来。但是这种关系比任何时候都空洞而且脆弱，它的继续存在是通过留在日

---

① 这个地方是在阿尔维尼都城纳梅图姆，今天的克莱蒙南面一小时以远的一座高地上被发现的，至今还被称作日尔哥埃。

尔哥维亚城前的两支军团所面临的巨大危险这样高昂的代价来换取的。因为维辛哲托里克斯已经迅速而果断地利用了恺撒的撤退，即趁恺撒不在之机对这两支军团发动过一次进攻。那次进攻差一点就征服了这两支军团并摧毁罗马的军营。只是恺撒那不可比拟的速度才避免了像在阿杜亚都卡那样的第二次灾难在此发生。尽管爱杜依人现在又好言好语起来，但还是可以预见，如果封锁毫无成果地继续下去的话，他们会公然站到暴动者一边。这样一来恺撒就不得不歼灭他们，因为他们的加入会中断恺撒与拉宾努斯之间的联系，特别会使后者遭受被孤立的巨大危险。恺撒下定决心，不让这种事发生。不管一无所获地撤出日尔哥维亚有多么痛苦多么艰险，如果必须如此的话，他宁愿立刻出发，开进爱杜依人的行政区，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他们改变立场。在开始这次不太符合他那求速而又求稳的性格的撤退之前，他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即通过一个辉煌的胜利去摆脱痛苦的窘境。正当日尔哥维亚的卫戍部队忙于在预料会发生突袭的一面修筑工事的时候，罗马统帅看准了时机，准备突袭另一面地势不很有利但目前却无人驻守的坡道。实际上罗马突击队已翻过了营墙并且占领了紧邻这个军营的一处驻地。但是整个卫戍部队也已经得到了警报，而且鉴于距离太近，恺撒认为冒险向城墙发动第二次突击是不妥当的。他示意撤退，然而最前面的军团正陶醉于胜利的激情，他们没有听见或者是不愿去听从这一指令，于是不断前进直抵城墙脚下，个别人甚至闯进城去。但是越集越密的人群扑向了这些入侵者，最前面的倒下了，突击队停下脚步；百人队和军团以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徒劳地战斗，冲锋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被赶出城市，赶下山去。在山下，恺撒布置在平原上的军队接纳了他们，防止了更大的不幸发生。本来他们希望占领日尔哥维亚，结果却吃了败仗。在人员伤亡方面的巨大损失——据计算有七百名士兵阵亡，其中有四十六名百人队长——只是这次所遭受的不测中最小的一部分。恺撒在高卢的显赫地位

主要是建立在他那胜利者的威名之上，而这威名开始退色了。争夺阿瓦历古姆城的战斗，恺撒强迫敌人参战的徒劳努力，该城坚决的抵御以及出于偶然对这座城市的征服，这一切都已经带上了不同于从前凯尔特战争的印迹，并且已经给予而不是夺走了凯尔特人对自身及其领袖的信心。战争的新型体系——在城堡的护卫下于设防的军营中给敌人迎头痛击已经在卢德几亚和日尔哥维亚进一步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恺撒本人第一次从凯尔特人那里遭到了失败，而这次失败使凯尔特人的成功达到了顶峰，并且同时发生了爆发第二次起义的信号。现在爱杜依人已正式同恺撒决裂，去联合维辛哲托里克斯了。他们那些尚留在恺撒军中的兵员不仅脱离了恺撒军队，而且还趁机在卢瓦尔河边的诺维欧奥努姆劫掠了恺撒的仓库。这样一来，金库和物资、大量新买的军马和交给恺撒的全部人质便统统落到了起义者手中。就连一直远离整个运动的贝尔及人得知消息后也开始行动起来，这一点至关重要。贝洛瓦契人的强大的行政区准备趁拉宾努斯的军团在卢德几亚面对附近的中高卢行政区颁布征兵令时，从背后打击他们。其他各区也都武装起来了，就连罗马的最坚决最优秀的党派成员也被爱国者的发展壮大所吸引，阿德来巴德斯人之王肩缪斯就是一例，过去由于尽职尽忠他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对他的城镇至关重要的优先权以及控制莫里尼人的霸权。起义的大旗一直开进到古罗马的行省中：起义者希望(也许并非毫无原因)能够促使阿罗布洛基斯人针对罗马人进人战备状态。实际上，现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整个凯尔特民族从比利牛斯山脉到莱茵河畔，都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进入了战备状态。唯一的例外是雷米人以及暂时依赖他们的苏埃西翁内斯人、劳埃西人、林恭内斯人的地区，他们的分治主义即使在这样普遍的狂热中也没有削弱；与此相反，非常奇怪的是，在以往战斗中一马当先的全部德意志城镇这一次却把自己变成了局外人，更有甚者，特莱维里人，好像还有麦奈比人由于和德意志人发生争执也未能积

极参加这场民族战争。从日尔哥维亚撤退以及在诺维奥杜努姆损兵折将以后，恺撒在主营地针对目前亟待制定的措施召开了作战会议，这是一个重大的富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有人主张越过塞文山脉回师古罗马行省，因为那里现在四面八方都对起义者敞开了大门，当然迫切需要军团的援助，罗马也确实暂时派出军团去保护那里了。但是恺撒拒绝了这项胆怯的策略，因为这一策略不是由事态的发展而是由统治者的指示以及惧怕承担责任的心理决定的。他宁愿在该行省中号召驻扎在那里的罗马战时后备军进入战备状态并通过他们，如果顺利的话，占领边界。相反，他自己向反方向出发，摆开强大的阵势向阿格丁库姆挺进，然后他命令拉宾努斯尽快撤回。凯尔特人当然想方设法地阻挠这两支罗马军队的结合。拉宾努斯本来有可能越过马恩河沿着塞纳河右岸向下游行进，然后到达存有他的后备军及行李的阿格丁库姆，但是他却不愿意让凯尔特人第二次看到罗马军队曾经演出过的撤退的一幕。于是他没有越过马恩河，而是在上了当的敌人的眼皮底下越过了塞纳河，在河的左岸向敌军开战了，他在这一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很多人战死疆场，其中还有凯尔特统帅本人老迈的卡姆罗格努斯。暴乱者同样也没有阻挡住卢瓦尔河畔的恺撒，恺撒没有给他们时间去聚集更多的人马，没费吹灰之力恺撒就冲散了他在那里所唯一遇到的爱杜依人的民兵。于是这两支军队成功地会师了。在此期间起义者针对爱杜依人的都城比布拉克特（奥图）的下一步战事进行了商议，商议的灵魂人物还是在日尔哥维亚大获全胜后全民族所狂热追随的维辛哲托里克斯。虽然如此，分治主义在此时却还没有沉默，爱杜依人在民族垂死挣扎之际还念念不忘他们的争霸要求。在地方会议上，他们提出要用他们中的一员代替维辛哲托里克斯。但是地方代表们不仅驳斥了这种要求，确认了维辛哲托里克斯的最高指挥权，而且全盘采纳了他的战争计划。这基本上就是他在阿瓦历古姆和日尔哥维亚所执行的那个计划。新阵地的核心选在了曼

杜比人坚固的城市阿来西亚(阿利塞圣雷内,在科多尔省的塞木尔)[1],并在城下又一次建起了带有防御工事的军营。这里堆起了大量的储备物资,日尔哥维亚的军队也被遣往这里。根据地方会议作出的决定,这支军队的战马增加到一万五千匹。恺撒在阿格丁库姆重新统一了全军以后,便率这支军队向维索齐欧的方向前进,以接近这个受了惊吓的行省并保护它免遭入侵。而此时暴乱者们事实上已经出现在塞文山脉南坡上的赫尔维人境内了。阿来西亚几乎位于恺撒的行军途中,维辛哲托里克斯打算使用的唯一法宝——凯尔特人的骑兵在中途袭击了恺撒,然而奇怪的是这支骑兵却败给了恺撒新成立的德意志骑兵连以及为支援前者建立的罗马步兵。维辛哲托里克斯更急于进入阿来西亚了,而且假如恺撒不愿意放弃进攻的话,他就只能在这次远征中,第三次对一支安扎在设备精良、粮饷充足的城堡之下而又配备了大量骑兵的部队,以相比之下无力得多的进攻手段采取行动了。但是如果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部分罗马军团在对付凯尔特人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恺撒的全部战斗力都集中在阿来西亚附近的战线上,这样一来维辛哲托里克斯就无法像他在阿瓦历古姆和日尔哥维亚做到的那样,把步兵置于城堡的庇护之下,通过骑兵保持与外界的联系畅通无阻,并切断敌人之间的联系。凯尔特的骑兵已经由于那一次输给了微不足道的敌人而变得垂头丧气,他们每每遭遇恺撒的德意志骑兵都要挨打。包围者的壁垒战线在两德里的范围内围住了整座城市,包括依傍着该城的军营在内。一场城墙下的战斗已经在维辛哲托里克斯的预料之中了,但是他却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围困——堆积起来的物资储备尽管规模可观,但是对于他那据称有八万步兵、一万五千骑兵的军队以及为数众多的市民来说还远远不够用。如果整个民

---

[1] 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即阿来西亚是否应该在阿莱塞(在贝藏松以南二十五公里的杜省),已经得到所有严谨的研究人员合理的否定。

族不赶来解救这位被困的统帅，那么维辛哲托里克斯则不得不承认，这一次是他的作战计划断送了他自己，他失败了。当罗马的壁垒合拢起来时，现有的生活必需品还够一个月之用，也许更长一段时间。在对骑兵来说道路至少还通畅的最后一刻，维辛哲托里克斯把他所有的骑兵都打发出去并同时向民族的领袖们发出指示，出动全部军队来解阿来西亚之围。他自己则坚决地准备亲自为由他起草而未能奏效的作战计划承担责任，于是他留在了城堡和自己的士兵们生死与共。然而恺撒却同时做好了围攻与被围的两手准备。为了防御，他在外围也建起了壁垒防线，还配备了供更长久之用的生活物资。时间在流逝，城堡里的人已经断粮，已经不得不驱赶那些不幸的城市居民了。结果这些居民夹在凯尔特人和罗马的防御工事之间，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怜悯而悲惨地送了命。在最后的时刻，恺撒防线的后面出现了凯尔特—贝尔及援军的一望无际的队伍，据说有二十五万步兵和八千骑兵。从(英吉利)海峡到塞文山脉，起义的行政区绷紧了每一根神经，为的是搭救他们的爱国者之核心，他们抉择之统帅。只有贝洛瓦契人回答说，他们虽然反对罗马人，但并不打算到境外去作战。阿来西亚的被围困者和外面的援军对罗马的双层防线发动了第一次夹击，但是被打退了。在一天的间歇之后，他们卷土重来。在一处壁垒防线越过山坡的地方，他们居高临下发动了进攻，把濠沟填平，把守军扔下墙去。被恺撒派遣到此的拉宾努斯集合起最后的步兵队，率领四支军团扑向敌人。这位统帅在最危急的关头出现了，在绝望中搏斗的冲锋者在他面前被赶了回去，与恺撒同来的骑兵在背后追捕他们，最终注定了他们的失败。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失败，对阿来西亚、对凯尔特民族来说它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一蹶不振的凯尔特军队从疆场直接跑回了家。本来维辛哲托里克斯在此时也许还有可能逃走，至少能通过其自由人的最后一手挽救自己，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作战会议中声明，由于他没能战胜异族统治，他甘愿牺牲自己，把民族

的毁灭加在他一人的头上。果然如此。凯尔特的军官把这位由全民族郑重选出的统帅交给了民族的敌人去进行应有的惩罚。这位阿尔维尼人的国王骑着马，全副武装地出现在罗马前任执政官面前，然后又骑马绕过了罗马法官席，接着他跳下马，卸下武器，在台阶上向恺撒脚前默默地跪下（702年）。五年之后他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拉过罗马首都的大街小巷，作为罗马民族的谋反犯在恺撒跟前掉了脑袋。因为正当罗马民族在古罗马城堡上向自己民族的天神表达庄严谢意之际，他居然企图谋反。阴霾过后，落山的太阳也可能破云而出，同样，命运也给予了那些行将衰亡的民族最后一位巨人。于是在腓尼基历史的末页上屹立着汉尼拔，在凯尔特历史的末页上屹立着维辛哲托里克斯。这两个人都没能把自己的民族从外族统治下拯救出来，但是他们却使民族免于最后的耻辱——不名誉的灭亡。维辛哲托里克斯也像那位迦太基人（指汉尼拔——译注）一样，除了必须与国家之敌进行斗争外，还首先要与受到伤害的个人主义者及被惊醒的胆小鬼进行斗争，因为他们的立场与民族利益相悖，往往伴随着蜕化的文明总会出现这类人物；即使他们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不是由于他们的战役和围攻，而是由于他们能够亲自给一个被压迫的在分治主义中颓废下去的民族提供一个中心和立足点。但是再没有比腓尼基商业之城的那位普普通通的市民与凯尔特的王公之间更为强烈的对比了，前者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以坚定不移的力量经过五十年而制定出宏筹伟略，后者的强有力的举措同时还有他的慷慨就义则在短短的一个夏季里便销声匿迹了。整个古典时期再也找不出一个内部本质和外在表现都更加富有骑士风范的人物了。然而这个人不应该是个骑士，至少应该是政治家。一个当民族存亡系于他一人而非成千上万猛士之身时，却对于径自离开阿来西亚的想法大为不齿的人，是骑士，不是英雄。一个慷慨地自我牺牲，而他的牺牲除了使民族当众丧失名誉，使民族在奄奄一息之时，还怯懦而又违心地把自己的垂死搏

斗称作对暴君的犯罪的人，是骑士，不是英雄。为什么在相同的处境中汉尼拔做出的是完全不同的举动呢！毫无历史同情心和毫无人类同情心地告别这位阿尔维尼人之王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凯尔特民族最伟大的人物只是一个骑士，那么这一点却正是这个民族的标志所在。

阿来西亚陷落了，被围在那里的军队投降了，这无疑是对凯尔特起义可怕的一击。民族虽然也受到了同样的打击，但是新的斗争重新被激起。然而失去了维辛哲托里克斯的遗憾却无法弥补。随着他的出现，统一降临到这个民族；随着他的消失，统一又从这个民族溜掉了。我们看不到起义者要努力把共同防御继续下去并选出新的最高统帅的迹象，爱国者联盟自行解散了，每一个部落都尽可以随便同罗马人打仗或者和解。当然和平的要求变得普遍重要。就连恺撒也乐于尽快收场。他十年的总督执政期已过去了七年，最后的一年又由于首都存在着政敌而难以保证。他能有少许把握加以指望的仅仅还有两个夏天，假如他出于利益和荣誉感要把新获得的土地在一种说得过去的、某种程度上是安宁的和平状态中传给后人的话，那么为了建设这样一种状态，他的执政期算起来就真的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所发的慈悲比失败者所需要的还多。他可以赞美他的星象了，因为那使他在半路上遇到了内部支离破碎而又本性轻浮的凯尔特人。在一个有一支强大的持罗马观念的党派存在的地方，例如爱杜依人和阿尔维尼人的两个最具规模的征兵区内，恺撒保证各地在阿来西亚陷落后，能够立刻完全恢复他们与罗马的旧有关系，而且他们的为数二万的俘虏也无需交纳赎金就获释了。其他部落的俘虏则遭受着大获全胜的军团士兵的残酷奴役。像爱杜依人和阿尔维尼人一样，高卢区中的绝大部分民族也屈从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并不作进一步反抗就去服从在所难免的惩罚了。但是，也有不少愚蠢或者麻木的地区，轻率或者绝望地坚持这项大势已去的事业，直到罗马远征军出现在他们的

境内。早在702年—703年冬天,罗马就向比杜利格斯人以及卡尔努德斯人发动过这样的远征。这一次贝洛瓦契人进行了较为严正的反抗,在这以前他们还是阿来西亚陷落的局外人。看起来他们想要证明自己在那一天之所以按兵不动,至少不是因为缺乏勇气和对自由的热爱。参加这场战斗的有阿德来巴德斯人、安比阿尼人、卡莱特斯人以及其他的贝尔及行政区。勇武的阿德来巴德斯人之王康缪斯——对于他参加起义,罗马人最是耿耿于怀,前不久拉宾努斯甚至还愚蠢地企图谋杀他,简直令人厌恶——率领五百名德意志骑兵开向贝洛瓦契人的地区,这些骑兵的价值已经为前一年的远征所证实。贝洛瓦契人科留斯坚决果断而又富有天才,他掌握着战争的最高指挥权,他就像维辛哲托里克斯一样指挥着战争,且战绩斐然。恺撒虽然渐渐把自己军队的绝大部分调动了起来,但却不能促使贝洛瓦契人的步兵应战,就连阻止他们针对恺撒的强化兵力采取其他更富于保护性的姿态都做不到。罗马的骑兵,特别是凯尔特兵员在各种各样的战斗中,吃尽了敌人骑兵尤其是康缪斯的德意志骑兵的苦头而明显失利。但是当科留斯在一次与罗马的征粮队的小冲突中阵亡以后,这里的反抗也被粉碎了。胜利者提出的条件还可以容忍,根据这些条件,贝洛瓦契人连同他们的盟友一齐臣服于罗马。特莱维里人被拉宾努斯重新驯服了,遭到唾弃的厄勃隆尼斯人的地域又一次被洗劫,变得一片荒芜。就这样,贝尔及同盟的最后一次反抗被粉碎了。海上行政区联合起它们的邻居,在卢瓦尔河边又进行了一次摆脱罗马统治的尝试。来自安德卡维人、卡尔努德斯人及附近其他行政区的起义者在卢瓦尔河下游沿岸集合起来,在莱蒙努姆(普瓦提埃)包围了匹克东内斯人的有罗马倾向的诸侯。但是那里很快就有一股大规模的罗马势力出现在他们面前,起义者放弃了围攻,为了以卢瓦尔河阻挡敌人,他们撤退了,但是却在途中遭截挨打。此后,卡尔努德斯人以及其余发动起义的征兵区,甚至还有海上行政区都发出了投降书。没等到有哪一个自

由民众的领袖把民族的旗帜插遍各地，反抗便到此结束了。当卢瓦尔河畔集合起来的那支军队解散后，勇敢的德拉皮斯和维辛哲托里克斯的忠实战友卢克特利乌斯把最坚定的人聚集起来，并率领着他们向坚不可摧的山城洛特河畔的乌克塞罗杜努姆[①] 挺进，他们战斗艰难而且屡屡失利，不过该城却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虽然卫戍部队丧失了头领——德拉皮斯被俘，卢克特利乌斯被赶出城去——但是仍然极力反抗。当恺撒亲临城外，而且根据他的安排把被围者饮用的泉水通过地下隧道引走以后，城堡才陷落。这是凯尔特民族最后的一座城堡。为了给自由事业的最后捍卫者留下特征，恺撒命令砍掉全体卫戍部队成员的手，然后打发他们回老家去。国王康缪斯仍然留在阿拉斯地区，并在那里同罗马军队一直打到 703 年—704 年冬天，恺撒同意与他讲和，甚至容忍了这个被激怒的有权满腹狐疑的人顽固地拒绝亲自前往罗马军营的行为，因为恺撒很重视在整个高卢为公开反抗树立起一个目标。恺撒很有可能为名义上征服了高卢西北部及东北部那些难以通达的地区而感到满足，或许已经为实际上只是暂时性的休战感到满足了。

就这样，高卢也就是西起莱茵河，北抵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土地经过仅仅八年的战斗(696 年 —703 年)就臣服于罗马人了。这片土地在平静了不足一年之后，705 年初内战终于在意大利爆发，罗马军队不得不被拉回到阿尔卑斯山以南，而留在凯尔特境内的最多不过几个软弱无力的新兵分队。尽管如此，凯尔特人也没有再次揭竿而起反抗异族的统治。当帝国所有的老行省中，人们都为反对恺撒而战的时候，唯独这个新占领区还始终保持着对其征服者的恭顺。就连德意志人在这关键的几年中，也放弃了他们为博取欢心而固守于莱茵河左岸的打算。在随之而来的危机中，高卢很少发生

① 人们通常认为该地在离菲热克不远的卡普德内克。葛勒尔新近声明，同意从前有人提出过的认为该地在卡奥尔以西的卢克采的看法。

新的民族起义，也没有德意志人的入侵，虽然危机已经为这一切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如果说在某些地方爆发过风波，例如708年贝洛瓦契人曾起来反抗罗马人，那么这些运动也只是非常零散孤立而且又毫不涉及意大利境内的纠葛，因而被罗马总督轻而易举地就给镇压了。不过这种和平状态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已，就像西班牙几百年的和平状态一样，是通过暂时允许那些最偏远、民族感情最蓬勃的地区——布列塔尼、谢尔德区、比利牛斯地区以或多或少的确定方式，实际地脱离罗马管制而换取的。正因如此，才证明了恺撒的大厦在这场血与火的考验中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尽管要他在其他的暂时更为紧迫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都很勉强，尽管他工作未完成就不得不中断而离去，但他还是打退了德意志人，征服了凯尔特人。——在最高管理部门中，被那波高卢的总督所占领的地区暂时和那波行省融为一体。当恺撒移交这一职务的时候(710年)，才从被他征服的地区——高卢本土和贝尔及卡产生出两个新的总督辖区。各行政区之所以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是由于它们被征服了。他们对罗马城镇普遍负有纳税的义务，但是他们的赋税体系当然不是那高贵的管理财政的贵族阶层用以压榨小亚细亚的那一种，而是和西班牙一样，向每个独立的城镇摊派固定的捐税，听任其自行征税。通过这种办法每年都有4000万塞斯特尔茨(等于300万塔勒)从高卢流进罗马的国库，而这些钱统统用于莱茵河边界的防务了。此外神庙里和大人物宝库中堆起来的黄金也由于战争而来到了罗马，这一点不言而喻。如果恺撒把他从高卢得来的黄金在罗马帝国全国拍卖，从而把这些黄金引入金融市场，使黄金对白银的比率下降二十五个百分点的话，那么就可以估算出高卢由于这场战争损失了多少数目的金钱。现行的各行政区的宪法以及世袭君主，或者封建寡头政治的特权阶层甚至在被征服后还基本上存在着，就连规定各弱小征兵区依赖于各强大征兵区的从属制度也没有被取消，尽管随着国家独立的丧失其势头已经遭到打击。

恺撒只想利用现存的王朝的、封建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的分裂，制定出有利于罗马的社会秩序，并在各地任命为外族统治所青睐的人物做领导者。为了在高卢建立一个罗马党派，恺撒不辞辛劳，他赐给追随者们大量的金钱，特别是把没收来的地产分配给他们作为报酬。不仅如此，他们还借助他的影响在城镇议会中获得了位置，并且拥有了第一批城镇官职。某些行政区中有着足够强大、足够可靠的罗马党派，例如雷米人、林恭内斯人以及爱杜依人的行政区，它们由于得到了一部更为自由的地方宪法——所谓的联盟法——，还由于在调整霸权事业的过程中受到优待而发展起来。而民族崇拜主义及其宣扬者则似乎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恺撒尽可能的保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恺撒对他们曾采取过诸如晚些时候罗马的当权者对巫术活动所采取的那些措施，而且恺撒的高卢战争，就我们所见的而言，绝对不带有像以后在不列颠战争中确实表现显著的那种宗教战争的特点。这两点恐怕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恺撒向这个被征服的民族表示了应有的一切关照，并在与罗马的征服行动相一致的范围内，保护了他们民族的政治和宗教机构的话，那么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要放弃他征服的基本思想，亦即高卢的罗马化，而是为了尽可能以保护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思想。他并不满足于让这种已经使南方行省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化的社会状况在北方同样发挥作用，相反，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促进了自上而下合乎规律的发展，尽量缩短了往往很尴尬的过渡期。他把一部分有声望的凯尔特人吸收进罗马市民联盟，个别的甚至还进入了罗马的元老院，如果对这些事情避而不谈的话，那么对于恺撒，这位在高卢、甚至在各行政区境内以拉丁语代替当地语言而把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加以推广——尽管也有一定的限制——，用罗马的币制代替当地的币制加以采纳的人来说，情况恐怕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只有罗马官员有资格铸造金币和银币；相反辅币则只是为了在那些行政区境内流通而由各行政区铸造，不过却

还得按照罗马人规定的尺寸。人们大概在嘲笑那艰涩难懂的拉丁语，而卢瓦尔河以及塞纳河畔的居民却孜孜不倦而又毫无条理地学习它[1]；这些毫无条理的语病当中确实比首都的标准拉丁语中包含着更大的前途。如果说凯尔特地区的行政区宪法到后来显得更接近于意大利的城市宪法，行政区首府和城镇议会在宪法中的地位都比在原来的凯尔特规章中更为突出的话，那么这或许也能追溯到恺撒吧。恐怕再没有人像这位盖尤斯·格拉古斯和马利乌斯的政治继承人这样体会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建立一系列的殖民区作为新统治的支撑点和新文明的出发点，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是多么令人想往的了。如果说虽然如此，他还是局限于把他的凯尔特或者德意志骑兵迁人诺维奥杜努姆，局限于把博伊人迁人爱杜依人行政区的话——其中后一个移民区在对维辛哲托里克斯的战争中已经完全行使了一个罗马殖民地的职责——那么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下一步计划还不允许他代替刀剑而赋予他的军团以犁锄。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他在这方面为这个古罗马行省做了哪些事情，将在其他地方加以阐述。恺撒之所以没能把相同的措施推广到那些他新征服的地区，大概只是因为缺乏时间。凯尔特民族结束了。这个民族的政治解体是通过恺撒而彻底成为事实的，其民族的解体是通过恺撒开始的，并且包含在有规律的步骤当中。尽管灭亡给那些有能力发展的民族造成了灾难，但是灭亡并非偶然，而是一个自己导致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无论从大体上还是从细节上考察，上一场战争的过程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异族统治声称即将建立的时候，只有个别的地区，而且大多是德意志或半德意志的地区进行过反抗。当异族统治建立起

---

① 在一枚爱杜依人最高首领下令铸造的金币上，我们看到了如下字样：

Cisiambos Cattos vercobreto；simissos（如此）publicos Lixovio。这种每每难以阅读的文字及硬币上那粗鄙不堪的印纹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他们的拉丁文处于诘屈聱牙之状态。

来的时候，人们或者毫无头脑地进行过一些推翻它的尝试，或者这些尝试仅仅是个别优秀贵族的作品，也正因如此，随着英杜提欧马卢斯、卡姆罗格努斯、维辛哲托里克斯以及科留斯的身亡或被俘而彻底结束了。在包围战和小型战争中，民族战争的全部道义上的深度得到了拓展。然而这种特征在这场凯尔特战争中却表现得微乎其微，这一点是很说明问题的。有少数罗马人懂得不应轻视所谓的蛮族，他们曾说过一句尖锐的话，说凯尔特人大胆地向未来的危险挑战，但面对现实的危险却丧失了勇气。凯尔特历史的每一页都证实了这句话。在毫不留情地将所有不像钢铁那样坚硬却像钢铁那样易折的民族捣碎的凶猛的历史旋涡中，这样的一个民族是无法长期自处的。大陆上的凯尔特人对罗马人所赋予的命运逆来顺受，这种命运和他们住在爱尔兰岛上的部落同胞时至今日仍然忍受的萨克森人所赋予的命运毫无二致：即作为未来发展之酵素溶进一个政治上优越的民族的命运中去。在与这个奇特的民族作别之际，请允许我们再作一次回忆，在古人关于卢瓦尔河以及塞纳河畔的凯尔特人的报告中，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我们用以辨别爱尔兰人的特征。一切都再现一遍：耕种田地时的漫不经心；豪饮和斗殴的嗜好；自我吹嘘——我们想起了那柄恺撒的宝剑，在日尔哥维亚胜利以后，它悬挂在阿尔维尼人的圣林当中，它所谓的从前的主人曾在此圣址望着它开怀而笑，并命人精心保护这件圣物——充满譬喻和夸张，充满影射和巴洛克式短语的讲话；诙谐的幽默——有这样一条规则不失为精彩的例子。如果有人插话打断了一个当众演说的人，那么这个捣乱者的裤子就要被警察不客气地剪一个豁亮可见的洞出来——歌咏和谈论远古英雄业绩的由衷欢乐以及最重要的演讲与吟诗作赋的天才；好奇心——商人在马路上必须讲述他所知道和所不知道的新鲜见闻方能通行——还有根据这些新闻行事的轻信态度。正因如此，在那些秩序较好的征兵区内，人们用严厉的惩罚禁止巡游者们冒充公职人员传播不可靠

的消息；把牧师看成父亲而万事都向他请教的儿童般的天真；空前深切的民族感情以及同仇敌忾的手足般的团结；在随便哪一位领袖的领导下都会起来反抗以及喜爱成帮结伙的倾向，但此外还有充分的保持稳重的既不鲁莽也不怯懦的勇气的能力，适时等待适时出击的能力，接受或者去忍受任何一种组织，任何固定的军事或政治原则的能力。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过而且仍然有着这种腐朽而又诗意，怯懦而又真挚，好奇、轻信、可爱、聪明但政治上却渐渐无用的民族，正因如此，其命运也就注定永远是一样的。——但是至于这个伟大民族由于恺撒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发动了一场战争而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倒还不是那一壮举最重要的结果，其积极的方面远远胜于消极的方面。不容置疑，假如元老院把自己徒有虚名的存在再延长几代的话，那么所谓的民族迁移就会提前四百年，出现在一个意大利文明既没有在高卢，也没有在多瑙河畔或者非洲和西班牙安家落户的时代。罗马的这位伟大的统帅和政治家以准确无误的目光，在德意志各部落中看出了罗马-希腊社会的劲敌，他以强有力的手臂建立起详细周密的进攻性防御的新体系，并教人以河流或者人工壁垒守卫帝国的边境，教人沿着边界侵略邻近的蛮族部落以抵御远处的部落，教人从敌国招兵买马补充罗马军队，通过这一切手段他为希腊—意大利文化赢得了用以教化西部的时间，使之像东部一样变得文明。凡人只看自己行为的结果，而天才播撒的种子则慢慢发芽。人们用了几百年的工夫才认识到，亚历山大不仅是在东方建立过一个转瞬即逝的帝国，而且还把希腊文明传到了小亚细亚；用又了几百年的工夫才认识到，恺撒不只为罗马征服过一个新的行省，而且为西部地区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至于那些向不列颠和德意志发动的军事上轻率而暂时又无成果的远征，也是后人才从中看出其意义之所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圈，到那时为止不管航海者还是商人还几乎未曾对它的存在和状况报告过什么，哪怕是杜撰的情况，然而这个圈子却被罗马—希腊

社会的那些远征给打开了。“每天，”一份 698 年 5 月的罗马文件讲道，“都有信件和消息传来，向我们报告至今尚属陌生的民族、行政区和地方的名字。”通过恺撒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远征，实现了历史地平线的扩展，这正如欧洲人勘探美洲一样，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成果。中欧和北欧的民族，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居民迈进了地中海国家的狭窄的圈子，一个新的社会迈进了旧的社会领域，从此以后两者互相制约。阿里俄维斯塔差一点就完成了后来哥特人特奥德里希所达到的那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文明是很难与罗马—希腊文化保持一种比同印度文明或者亚述文明更为内在的联系的。在希腊和意大利的业已消逝的辉煌壮丽的文明与新的世界历史的更为骄傲的大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西欧的罗马化和日耳曼欧洲的古典主义化，特米斯托克勒斯和西庇阿的名字听起来与阿索卡和萨勒马纳沙的名字有着不同的感觉，荷马和索福克勒斯不像吠陀和卡里达萨那样只吸引爱好文学的植物学家，而是在我们自己的花园中向我们盛开，这一切都是恺撒的杰作。而且，如果说他的伟大先辈在东部所创造的一切都被中世纪的狂潮巨浪摧毁了的话，那么恺撒的大厦则经历了几千年之久，这几千年的时间改变了人类的宗教和政治，把文明的重心转移到恺撒的大厦之上，并且这座大厦代表着我们所谓永恒的东西。

为了完满地描述罗马与此时的北部民族之间的关系，还要对意大利和希腊半岛以北的从莱茵河源头延续到黑海的地区略作一瞥。虽然如此，历史的火炬还是无法照及在那里也可能汹涌一时的巨大的民族骚乱，而且即使有零星的光线射到那里，也只能令人迷惑，而不能照亮视野。尽管指出民族史书中的漏洞是纂史者应尽的义务，但是他不该除了恺撒的伟大的防御体系之外，还要记录那些可怜巴巴的元老院的统帅们自以为能保护帝国边界的部署。——阿尔卑斯山的民族一直都可以进攻过意大利东北部。695 年驻扎在阿奎莱亚的强大的罗马军队以及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高卢总督

卢西乌斯·阿夫拉尼乌斯的胜利，可以令人推断出在此时发动一场进军阿尔卑斯山脉的远征。这场远征可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很快会发现罗马人与诺里库姆人的一位国王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意大利在此之后也并没有从这一边得到安全保障，这一点可以通过 702 年阿尔卑斯地区的蛮族发动的突然袭击得到证明。当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暴乱迫使恺撒把北意大利的军队全部调出——就连那些从内部占有伊利里亚海岸线的不安生的民族也迫使罗马军队忙碌不休。达尔马西亚人早就是该地区最具规模的一个民族，他们通过把邻邦纳入自己的联盟而显著壮大。居民点从二十个增加到八十个。当他们拒不交出从利布尔尼亚人那里抢夺来的城市普罗英纳（离凯尔卡河不远）的时候，恺撒下令在法萨鲁斯战役结束后向他们进军。但是罗马人在这一役中暂时败北，因而有一段时间达尔马西亚人就得到了恺撒反对派一伙人的帮助，恺撒的统帅们也因此遭到了当地居民和庞培的追随者以及海盗共同发动的陆海并举的强有力反抗。——马其顿，最后还有埃壁鲁斯和希腊变得比罗马帝国中任何一部分都要荒凉和衰败。提尔哈基翁、特萨洛尼卡、拜占庭还拥有少许的贸易往来。雅典凭借自己的名声和哲学院吸引着旅行者和大学生，但从大体上看，希腊那一度人口密集的城邦和熙熙攘攘的港口都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可是一旦希腊人无声无息了，那些住在难以通达的马其顿山区的居民，就会反过来按着老办法继续他们的强盗行径和挑衅行为。就像阿格里亚内斯人以及多罗比人在 697 年—698 年左右洗劫埃托利亚的城市，居住在德林谷中的庇卢斯塔埃人在 700 年洗劫南伊利里亚那样。希腊附近的居民也是这样做的。北部边境的达达尼亚人和东部的色雷斯人虽然在那场从 676 年—683 年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中受到了罗马人的侮辱，但是色雷斯诸侯中最有权力的人，古老的奥德律斯帝国的一国之主科提斯却从此成了罗马被保护国国王的一员。可是尽管如此，这个安定下来的国家还是深受来自北部

和东部的入侵之苦。总督盖尤斯·安东尼乌斯被达尔达尼斯人和居住在今天多布罗加的部落打发回家，他们在从多瑙河左岸调来的那些可怕的巴斯塔尼人的帮助下给了这位总督致命的一击。战斗是在伊斯特罗波利斯（高库斯坦德斯凯不远的伊斯特拉）进行的（692 年—693 年）。幸好盖尤斯·屋大维向贝西人和色雷斯入发起了攻势（694 年）。而马尔库斯·庇索（697 年—698 年）却正相反，他又一次作为最高统帅坏了大事，这也难怪，因为他为了钱对什么人都会有求必应。色雷斯的登特莱提人（在斯特里默河畔）在其任行省总督期间大肆洗劫了马其顿，并且在那条从提尔略基翁伸向特萨洛尼卡的军用公路上部置了自己的岗哨，于是特萨洛尼卡的人便做好了忍受他们围困的准备。与此同时，强大的罗马军队也出现在那里，仿佛是为了要好好看看这些山民和邻族是如何蹂躏那些和平的罗马臣民的。——不过罗马的强权不能容许同样的进攻发生，那早就已经不是耻辱的事情了。但是正值此时、多瑙河对岸却有一个民族在达西亚的荒原上开始了政治分立。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看来确实不同于贝西人和登特莱提人。在基提人或者达西亚人那里，远古时代曾有过一个叫萨尔莫克西斯的圣人，他帮助过这个民族的国王。他在遥远的异地旅行，了解到天神的本领和神奇，还特别研究了埃及祭司以及希腊毕达哥拉斯学者的智慧，然后返回故乡。为了作为虔诚的遁世者终了此生，他在“圣山”的一个洞穴里苦修。只有那位国王和他的侍者能够见到他，他把神谕献给国王并通过国王传达给臣民，作为每一件要事的开端。起初他在同胞的心目中是天神的传教者，最后他自己成了他们心中的天神，就像摩西和亚伦中所说的，主指派亚伦去做先知，指派摩西去做这位先知的神。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持久的任命：由于正义这位基提人之王得到了神的帮助，国王的一切命令仿佛都是出自这位神之口。这种独特的宪法赋予了基提人的国王们相对于其臣民的一种地位——看来神权政治的思想是通过这种地位服务

于绝对王权的 — 大约就像哈里发之于阿拉伯人，其结果就是基提人的国王布莱比斯塔斯和天神德凯尼奥斯在这一时期执行了神奇的民族宗教和政治改革。这个民族已经由于空前的贪得无厌而在道德和政治上彻底衰败了，现在通过新的宣扬节制和勇气的福音而焕然一新起来。国王布莱比斯塔斯带领着他的所谓受过清教徒式的训诫和鼓舞的众人在短短几年中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领地扩大到多瑙河两岸，向南一直深入到色雷斯、伊利里亚以及北部地区。他们还没有同罗马人进行过直接的接触，很难断言这个特殊的、令人联想起伊斯兰教的萌芽的国家前景如何，但是人们大概无需是先知就能预言，像安东尼乌斯和庞索这样的执政官决没有得到过与天神作战的神谕。

第 八 章

庞培与恺撒共同执政

自从恺撒执政以来，民主派领袖就作为所谓国家的共同统治者、“三人”统治集团而得到官方的承认。其中，庞培由于公众的支持稳获第一把交椅。对元老们来说，庞培意即个人独裁者。在他面前，西塞罗的跪拜只是徒劳；比布鲁斯大书墙上标语，对他极尽挖苦之能事，反对派也在沙龙讲话中，用尽毒言恶语来攻击他。这一切都很正常。根据既存事实，庞培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佳统帅，恺撒则是精明的政党领袖，党的演说者，具有无可置疑的天才，但也因其女人一般的温和而声名狼藉。长久以来便流行着这样的评判。人们不能期待高贵的暴徒关注事物的本质，期待他因塔霍河畔那不明不白的英雄壮举而放弃既定的陈词滥调。显而易见，恺撒在这一联盟中只起着一个副官的作用，为他的首领做些弗拉维乌斯、阿夫拉尼乌斯和其他能力稍差的工具尝试去做却未能完成的事情。甚至他那总督的职权也似乎没有改变这一情况。不久以前，阿夫拉尼乌斯也占据了一个非常相似的位置，但这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个行省同时反复隶属于一个总督，而且常常是远不只四个军团统一于一人之手；由于阿尔卑斯山那一边重归平静，阿里俄维斯塔首领被罗马人作为朋友和邻居而得到承认，所以毫无希望进行一场起任何决定作用的战争。此时，通过

加宾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登上显位的庞培和通过法提尼乌斯法获得职位的恺撒，便要对他们的地位进行比较了。但是这一比较对恺撒来说毫无优势可言。庞培几乎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恺撒则只有两个行省。士兵和国库几乎不加限制地听由庞培支配，恺撒只能动用归他支配的款项，只有一支二万四千人的军队。庞培可以自己决定何时退位。恺撒的指挥权虽有长久的保证，但毕竟是有期限的。庞培最终被委以海陆重任；恺撒则被遣往北方，以便从上意大利保卫首都，而且保证庞培不受任何干扰地对这个城市进行统治。

但当庞培被联盟任命为首都统治者时，他所承担的远远超出了他力之所及的范围。庞培所理解的统治无非是可以概括为口号和命令的东西。城市喧闹之波由于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而低沉下去了。要想不用任何武装力量来统治这个在各方面都可与十九世纪的巴黎比拟的城市，真比登天还难，而对于那些笨拙的高贵的模范战士来说，这简直是无法解决的。很快，对庞培来说一样讨厌的朋友和敌人都能够为了他的缘故做他们喜欢的事。恺撒离开罗马后，联盟也许还控制着世界的命运，但却控制不了首都的大街小巷。连那个拥有某种有名无实的统治权的元老院，也任由首都自行发展，尽其所能，随其所愿。这种局面的产生部分是因为这一组织中由联盟统治的一派缺乏掌权者的教导，部分是因为恼怒的反对派出于冷漠或消极情绪袖手旁观，而主要的原因却是整个上层贵族组织已开始感觉到他们彻底的软弱无能，如果说他们还没有理解这一点的话。这样，罗马暂时还没有一个地方出现针对任何统治的反抗力量，没有一个地方存在真正的权威，人们生活在间于已被摧毁的贵族统治和正在成长中的军事统治之中的空位时期。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罗马国家，不同于新旧时代的其他国家而完美标准地体现了所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功能和组织特征，那么它也同样存在着政治混乱，一种无政府状态，其鲜明程度并不值得羡慕。而奇怪的是，当恺撒在阿尔卑斯山那边，为了名垂千古而建功立业的时

候，罗马演出了一场世界历史舞台上所未曾有过的、最为惊人的政治荒诞剧。国家的新摄政者不事统治，反而自闭家中，暗自发尽牢骚。而先前的那个濒临垮台的政府也同样不理政事，只是一味地叹息，时而独自在别墅那令人伤心的圈子里发出阵阵哀声，时而聚在元老院里齐声作叹。而那些仍心想着自由和秩序的市民，则受够了这种混乱局面所带来的痛苦。但他们群龙无首，不知所措地固守着毫无意义的怠惰，不仅回避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只要还可以忍受，连政治罪恶本身都要回避。与之相反，形形色色的流氓恶棍却有了好得不能再好的时日，他们所得到的游戏场地和乐趣简直是无以复加。而渺小的大人物们则数量众多。蛊惑煽动成了手艺，这门手艺倒也不乏工具：褴褛的大衣，蓬乱的胡须，飘然的长发，深沉的男低音；而且毫不稀奇，这手艺也自有黄金地。对于站立吼叫行动，剧院人员那久经考验的喉咙是为人渴求的东西[1]；希腊人、犹太人，还有获得自由的人和奴隶，在公众聚会中是最有秩序的观众，也是声音最响的呐喊者；甚至在投票时，根据宪法拥有选举权的市民，往往只占投票者中的一小部分。在一封出自这一时期的信中这样写着：我们可以期待，很快，我们的奴仆就会投票取消赎金。时下，真正的强力是那些结为一体的武装团伙，这是由高贵的冒险者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其成员来自惯于战斗的奴隶和流浪汉。这些团伙的所有者本来大部分都属民众派，但自从善于独自给民主政体以深刻印象并对其进行控制的恺撒离去后，民主政体失去了所有的原则，每个党派的人都各随其愿地搞起政治。当然，这些人现在仍最愿意在自由的旗帜下战斗。但准确地说，他们既没有民主的，也没有反民主的意向，而是在那倒下的、曾一度不可缺少的旗帜上，一会儿书上人民之名，一会儿又写上元老院或一个党派首领的名字。比如说，像克罗狄乌斯就曾先后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政

① 这意思是：集会是靠歌手的叫喊来进行的。

体、为元老院和克拉苏斯战斗，或者曾假托为此战斗过。那些团伙领导者只有在无情地追捕其私敌时——克罗狄乌斯对西赛罗，米罗对克罗狄乌斯——才会保持本色，而与此相反，党的地位对他们来说，只是为这种个人敌对服务的一着棋。人们似乎可以把不协调的音乐放入乐谱，同样会愿意写下这段喧闹政治的历史；也不必列举所有的凶杀，围困民宅，纵火和其他发生在一个世界名城中的强盗行径，也不必推算那些台阶经历了多少次从嘘声至唾骂与践踏，而此后又发展为石飞剑拔的过程。在这个政治流氓的舞台上，主角是那个叫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的，前面已提到过他。他被掌权者利用来反对伽图和西塞罗。这个颇有影响，富有天赋、坚决果敢而且在他这一行中实际堪称楷模的党徒，在任护民官（696 年）时，随心所欲地推行起激进民主政治，免费发给市民粮食，限制监察官挑剔指责无教养的市民的权力，禁止官员通过宗教惯例阻碍民众大会机器的运行；取消不久以前（690 年）为了遏制帮派势力而确立的下层人集会结社的禁令，重建当时取消的“街巷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无非是全首都自由或奴隶爱国者组织，严格按街巷划分，几乎像军队一样。如果再加上克罗狄乌斯同样已拟定并意欲作为 702 年行政官引人的另外一项法规，即给予获得自由的及事实上自由生活着的奴隶与生来就是自由的人一样的政治权利，那么，所有这些颇为大胆的宪法改良的发起者就可以宣布大功告成。作为第二个自由与平等的努玛（即庞培），邀请首都可爱的贱民到帕拉丁山边的自由神庙——这些神庙是他在自己的一处炭窖上建起的——来看他为庆祝民主一千周年的到来而举行的大弥撒。当然，这些争取自由的努力并没有通过市民决议来排斥肮脏的交易，正如恺撒为其同胞提供总督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职位，为卑躬屈膝的国王和城市提供国家的崇高权力作为交易条件。庞培冷眼旁观着这一切，没有表露任何态度。如果他自己没有感觉到，他将为此名誉大损，而他的对手却认识到了这一点。克罗狄乌斯变得越发放肆，

竟为了送回一位亚美尼亚王子这样无关紧要的问题，和罗马摄政者吵将起来。这场口角很快演变为正式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庞培充分表现出他彻底的无奈。这个国家首脑只知用这个党徒自己所运用的武器来对付他，只是远不如他机灵。如果庞培为了亚美尼亚王子的缘故受到克罗狄乌斯的无端挑剔，那么，当他把克罗狄乌斯最为仇视的西塞罗从流放中解脱出来，就会再次激怒克罗狄乌斯，因为是克罗狄乌斯把西塞罗放逐的。这样，庞培就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把对手变成了一个势不两立的敌人。如果克罗狄乌斯及其帮派使街巷充满危险，那个常胜统帅便也同样命令奴隶和角斗士开步前去。当然，在与民众头领的扭打中，将军要一败涂地，不但在街上挨打，还几乎不断地被克罗狄乌斯及其爪牙围困在他的花园里。这出怪诞的戏剧有一个并非最不奇怪的特征：在他们的论争中，摄政者和骗子双方都争相向已被推翻的政府讨取欢心。庞培允许自己召回西塞罗，部分也是为了帮元老院的忙，而克罗狄乌斯则宣布尤利乌斯法无效，传唤马尔库斯·比布鲁斯公开证明这项法令是违反宪法规定而通过的。从这压抑的激情迷雾中自然产生不了积极的结果，其最为本质的特征则正是它令人厌恶的可爱的无目的性。即是一个拥有恺撒的天才的人也应该体会到，这种民主活动已不能再继续，甚至通往王位的路，也不再是靠煽动就行得通的。如果现在在这段共和国和帝国间的空位时期中，随便一个出色的家伙，再次装备起恺撒自己放弃的斗篷和权杖，怀着被滑稽地曲解了的盖尤斯·格拉古斯伟大的理想，再次走过舞台，那也无非是一个历史性的填补空位者。那进行民主煽动的所谓的党，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致在后来的决战中连个角色也没分到。当然，这并不能断言，这一混乱状态会在那些政治上很冷淡的人中，有效地激起建立一个基于军事力量的强大政府的愿望。一方面，这些中立的市民主要不在罗马城市内，而且没有直接受到首都骚乱的触动，除此以外，那些完全能受如此动机支配的人，已通过以往的经验，主要

是卡提林那阴谋，完全信奉起权威原则。但对那些真正的胆小鬼来说，与颠覆宪法密不可分的巨大危机要远比这种从根本上来说非常表面化的首都混乱更有深刻的影响。这一混乱唯一历史的得以考虑的结果便是：克罗狄乌斯派人的进攻使庞培陷入了尴尬境地，这同时显著地影响了庞培下一步的行动。

尽管庞培丝毫不喜欢也不理解积极主动性，但这次境遇的变更，无论是面对克罗狄乌斯，还是面对恺撒，都迫使他走出他保持至今的消极状态。克罗狄乌斯使他陷入的、这种令人颇伤脑筋而且又重损声誉的局面，长久下去，自会将其怠惰的天性激发为仇恨与愤怒。但远比这更重要的是，他和恺撒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如果在这两个结盟的掌权者中，庞培在他接受的工作中彻底失败的话，那么恺撒则知道怎样充分利用他的职权，远非斤斤计较和忧心万种所能企及。没有过多询问是否许可，恺撒便在他南方的行省——那里住着的大部分是罗马市民——招募士兵，使他的队伍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他带着这支队伍，不再从北意大利守卫罗马，而是翻越阿尔卑斯山，将西布里人的又一次入侵扼杀在摇篮里。在两年内(696 年，697 年)，把罗马的武装部队推进到莱茵河和海峡边。面对这样的事实，贵族的漠然与轻视策略彻底破产了。那个常常被当作是娇生惯养的、受尽溺爱的人，现在成了军队的偶像，为人赞美的战绩卓著的英雄，他那光鲜的桂冠比庞培那些枯萎的要明艳得多，甚至在 697 年，元老院就授予恺撒胜利后应获的敬礼，其规模比庞培所得到的要更为宏大。庞培站在他过去的副官一边，根据加宾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此人曾和他面向而立。现在恺撒是时代的英雄，罗马最强大的军队的统帅，庞培则是一度著名的前将军。虽然岳父与女婿间还没产生什么矛盾，这层关系表面上没有罩上阴霾，但如果参加者的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每个政治联盟都会从内部自行瓦解。如果和克罗狄乌斯的争吵只是使人不愉快，那么恺撒地位的改变对庞培则构成了严重威胁：就像恺撒及其同盟曾反对

他一样，庞培现在也觉得有必要寻找一个军事后盾来对付恺撒。他带着无职可司的骄傲，以一个职位谋求者的身份出现，任何不同寻常的官职都可以，只要这一职位能使他以同等的、或以更占优势的力量与两个高卢的总督并驾齐驱。不管他的境况如何，他的策略完全和在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中的恺撒一样。为了获得一个相似的指挥权来抵偿优越的、但仍很遥远的对手的军事力量，庞培首先需要官方的统治机器，这在一年半以前，必然是要听从他支配的。当时掌权者不但利用那些把他们作为街巷之主来服从的民众大会，而且利用深受恺撒恐吓的元老院；作为罗马联盟的代表及其公认的首脑，庞培无疑可以从元老院和市民那儿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决议、即便那是不利于恺撒的。单是和克罗狄乌斯的那场不太聪明的争执，就使庞培失去了街巷统治权，为此他难以指望在群众社团中通过一项有利于自己的提案。而在元老院，事情对他还不完全是这么不利；但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庞培在摆脱长期的、后果严重的消极状态后，是否仍牢牢地掌握着多数派，以此促成他所需要的一项决议。

与此同时，元老院或更确切地说就是罗马贵族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正从卑辱中汲取新的力量。在694年结盟中各种不敢曝光的事情暴露了出来。伽图和西塞罗的解职，尽管幕后的当权者对此表现出克制态度，甚至流露出惋惜的神情，但公众舆论仍以准确无误的言辞，指责此事真正的发端者。这件事再加上庞培与恺撒结为姻亲，令人不快地清楚地忆起君主式的驱逐法令和家族联盟。而更多的公众本来与政治事件保持着距离，现在也开始关注那越来越明显的未来帝国的基础。当公众领会到恺撒之所为并不是为了修改共和政体的宪法，而是事关共和国的存在或消亡，于是许多迄今为止身属民众派、并尊恺撒为其首领的出色人物便跨入与之对立的一面去了。在执政贵族的沙龙和乡村别墅中，所听到的就不再是“三位摄政者”和“三巨魔”了。人们紧拥着倾听恺撒的执政

官讲话，却没有欢呼和喝彩。当这位民主政体的执政官步入剧场时，没有一个人鼓掌。但当执政者的一个工具公开露面时，人们倒很可能会发出一片嘘声，当演员说出一句反帝国的名言或影射庞培的话，连稳重老练的男人都会鼓掌响应。当西塞罗要被驱逐时，许多——据称二万人——市民，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层阶级，也按元老院所作的示范穿起了丧衣。一封来自这个时期的信中写道：现在没有什么能比民众派的仇恨更为流行。当权者暗示出，这种对立容易使骑士丧失他们在剧院中新获的特殊地位，普通人则要失去面包。于是，人们勉强对此多加注意，但舆论依然如旧。而物质利益杠杆的投入则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恺撒的金钱滚滚流去。经济受损而借口颇丰的，影响甚广而陷入金钱窘境的贵妇人，负债累累的年轻贵族，处于困境的商人和银行主，他们或者自行前往高卢直接去汲取泉源，或者求助于恺撒在首都的代理人。一个外表正派的男人——恺撒回避和那些完全无可救药的流氓交往——在那里或这里都不会轻易被拒绝。此外，恺撒还自己投资，在首都大兴土木，这使上至执政官，下至搬运工的难以计数的各阶层人士，都找到了赚钱的机会。同时，他也为公众娱乐花费了巨款。庞培也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使首都有了第一座石造剧场，其落成典礼异常壮观，盛况空前。不言而喻，如此地捐赠使许多持反对意见者——主要是在首都——同事物的新秩序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和解。可是这种行贿体系却触及不到反对派的核心。情况越来越明了，现行宪法在公众中已根深蒂固，特别是那些远离直接的党派活动的人的圈子，主要是小城市，很少倾向于帝国，或者哪怕只是准备忍受它。如果罗马有过一部民意宪法，允许市民可以在选举中，通过发表自己的见解，找到发泄不满的、自然的表达方式的话，那么他们的不满就会加重。在现有情况下，那些忠于宪法的人则别无选择，只能隶属于元老院，虽然它已下台，但仍是作为合法的共和国代言人和捍卫者出现。这样，当庞培在强力与荣光中推翻格拉

古斯兄弟、借苏拉的军事庇护复辟了国家时，这个已被推翻的元老院便突然拥有了一支可观的、非常庄严的忠诚部队。贵族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重又开始行动。恰在这时，当权者允许马尔库斯·西塞罗回来了。西塞罗向当权者作出承诺：结交元老院内的恭顺者，不但不持丝毫反对意见，而且要尽力为当权者工作。尽管庞培就此只是顺便对寡头政治作了一次让步，而且首先是为了戏弄克罗狄乌斯，其次是想在已发表了演讲的执政官那里，获得一个经过千锤百炼而制成的最为柔韧灵活的工具。人们已注意到这一时机，正如西塞罗的流放表明了对元老院的反抗，人们利用他的返回作为民主政体的一次示威行动，以一种尽可能郑重的方式。另外有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相助抵抗克罗狄乌斯派，于是两个执政官便根据先行的元老院决议，向市民提议允许执政官西塞罗返回。元老院也号召所有忠于宪法的市民出席表决。在表决那一天（697年8月4日），罗马真的聚集了特别是来自小城市的异常众多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执政官要从勃隆度辛行至首都。这使公众有机会发表一系列真知灼见，彼此相似而且无一逊色。元老院和忠于宪法的市民之间的联盟，同样借此机会得到公开承认，而且对后者进行了一种大检阅，其惊人之好的结果对贵族派的重新振作起了不小的作用。庞培面对这些固执的示威行动表现出的无奈及其在克罗狄乌斯面前陷入的毫无尊严、几乎可笑的境地，使他和他的同盟丧失了信誉。元老院中这一同盟的追随者，由于庞培罕见的愚蠢而气馁而孤立无援、不知所措。他们难以阻止共和贵族派在全体人员中完全重占上风。共和贵族派的这场戏，事实上在当时——697年——对一个有勇有智的赌徒来说，还决不是无望的。此时它在人民中有了坚实的后盾，而这是一百年来不曾有过的；若它信任人民，相信自己，那它就能走上通向目标的最光荣的捷径。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抨击当权者？为什么身为元老院首脑的一个坚决果敢的著名人物不把超常权力作为违反宪法而取消？又为何不把意大

利所有的共和主义者召于战旗之下，去对抗专制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用这一方式或许可能再次复辟元老院的统治。不过这样共和主义者却是在进行一场高赌注的赌博。但也许在这里最有勇气的决定同时也是最聪明的，事情常常是这样。只是此时软弱的贵族无疑没有能力作出这样简单而勇敢的决定。但是，还有另外一条也许是更保险的途径，无论如何这一途径更适合这些忠于宪法的人的本性：他们可以力争分裂两个当权者，而且通过他们的分裂以达到最终自己执掌政权的目的。自从恺撒以绝对优势与庞培并立，且迫使他去争取新的权力地位之时起，那些国家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变化，而且松散起来。或许当庞培得到这一地位时，他们之间就会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发生决裂，进而展开斗争。如果庞培仍然孤立无援，那么他的失败将无可置疑。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派在战斗结束后将处于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如果罗马显贵运用恺撒用以取得迄今为止的胜利的那种手段，去对付恺撒，而且和较弱的对手结成联盟，那么胜利也许会属于有着庞培这样的统帅和忠于宪法者这样的大批人马的一方。而胜利后再去对付庞培，看来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任务，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他政治上的无能。

于是事情便转向在庞培和共和党派之间达成理解；而这种接近是否会实现，两个当权者和贵族派间变得完全暧昧的关系暂时究竟会怎样，这两个问题，在 697 年庞培前往元老院要求给他一份特殊职权之际，便得到了解决。庞培又以首都的面包价格为起点，11 年前他就以此建立了政权。同加宾尼乌斯法制定以前一样，此时面包的价格又涨至令人窒息的高度。而价格的暴涨是否应归咎于某人特别的阴谋诡计，还很难说。克罗狄乌斯把罪责一会儿推给庞培，一会儿又推给西塞罗，而二者也都在指责着他。另外，即使没有政治上的谷物高利贷者，就是海盗不断的抢劫，国家财富的倾尽，政府对粮食供应的监察松散无序，这在一个几乎光靠海外供应

的大城市里，足以导致面包价格上涨。庞培的计划是，让元老院给他在整个罗马国家范围内的粮食监察权，而且为了这个最终目的，部分地得到对罗马国库及海陆军的自由支配权，并且要得到一个不仅通行整个罗马国家，而且在每个行省其总督的权力都要屈从其下的指挥权。——简言之，他意欲对加宾尼乌斯法进行改进。随后，当时正悬而未决的埃及战争的领导权将会自行加入，正像当初小亚细亚战争的领导权并入对付海盗的缉捕行动一样。尽管新摄政者的反对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当697年9月在元老院进行协商之机到来时，其中大多数人仍迷于恺撒所引起的恐怖之中。他们原则上乖顺地接受建议，而且是应马尔库斯·西塞罗的要求。在此，西塞罗应对他在流放中所学会的温驯服从作出第一个证明，他也这样做了，只是在确定变更条目时，护民官盖尤斯·麦西乌斯呈上的初始计划就已被大段大段地砍杀下去了。庞培既没有得到对国库的自由支配权，也没有获得自己的军团和船队，更没有取得高于总督的权力。人们满足于为了首都的给养制度给他一笔可观的款项、十五个副手，在整个罗马地域内一切给养事务中，享有前执政官之权五年，而且人们将让市民批准这项法令。这种近乎拒绝的对原计划的改动，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果把庞培不仅置于其高卢同行之列，而且超乎其地位之上，那么那些最为胆怯的人一考虑到恺撒，便不得不对此抱有重重顾虑。另外便是庞培的死敌，也就是勉强与他结盟的克拉苏斯暗自和他对立。庞培首先把他的计划的失败归咎于克拉苏斯或者假托怪罪于他；元老院中主张共和的反对派憎恶任何扩大当权者权力的决议，无论是从事情本身来看，还是仅仅视其名目；一切都是由于庞培的无能。甚至在他本应行动之后，他也没能下定决心表明自己要作出举动，而是像往常一样，似乎化名通过他的朋友把他真实的意图表达出来，自己却以众人皆知的谦逊申明，即便所得更少，他也会满足。于是，并不奇怪，人们听信了他的话，而且给予他的更少。尽管如此，庞培依然很高

兴，至少他找到了一份重大的差使，尤其是觅到了一个巧妙的借口离开首都；他成功地给各行省配备丰富而便宜的供应，当然这些行省难免不对倒退有所感觉。但他却没能达到他本来的目的；他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他那在所有行省都有权使用的前执政官头衔就只能是徒有其名。因此他很快又向元老院提出要求，请求元老院派他把遭到驱逐的埃及国王送回到他的故乡，如果必要的话，便使用武力。只是当他对元老院的迫切需要越来越明显时，元老院便越来越不那么顺从，对他的请求所给予的考虑也越来越少了。首先，人们在西俾尔占卜书中发现，向埃及派遣罗马军队是目无上帝的行为；而后虔诚的元老院几乎众口一词地决定，放弃武装干涉。庞培已如此的低声下气，以至于即便没有军队他也会接受这项遣送任务。只因他的诡计毫无改进，而且他又仅仅让他的朋友来宣布此意，并为派遣另一个元老院议员去完成此项使命，说尽好话且表示赞同；元老院自然又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它将罪恶地付出一个对祖国如此宝贵的生命。这样，经过没完没了的协商，最终结果是，根本就不要去干涉埃及人(698 年 1 月)。

庞培屡次遭到元老院的回绝，更为严重的是，他不得不容忍，而不能与之进行清算。这些回绝，不管它是从哪一边而来，对广大公众来说，都是共和派的胜利，当权者的失败。共和派的反抗之潮也相应地不断上涨。而 698 年的选举就只是部分地按摄政者的意愿而告终的：恺撒的行政官候选人普布利乌斯·法提尼乌斯和盖尤斯·阿尔菲乌斯获得通过，与之相对，已垮政府的两个坚决的追随者，盖奈乌斯·林都鲁斯·马塞利努斯和盖奈乌斯·多密提乌斯·卡尔文努斯，一个被选为执政官，一个被选为行政官。但是 699 年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阿希诺巴布斯就以执政官谋求者的身份出现了，鉴于他在首都的影响和他巨大的财富，他的当选已很难阻止，而且他将不再满足于隐秘的反抗，这一点已是广为人知。民众大会造反了，元老院随声附和，并郑重地提出劝告，说他们

的意见是埃特鲁西亚拥有公认的智慧的占卜者应元老院的请求，通过某种符号和奇观给出的。这上天的启示宣告，上层的矛盾将导致军队及财富的统治权落入一个地方人物手中，国家将面临堕入不自由境地的危险。——看起来，众神首先是针对盖尤斯·麦西乌斯的提案的。很快，共和派便从天空中来到了地面上。关于卡普亚地区的法令和其他由恺撒作为执政官通过的法令，不断被他们宣布无效，697 年 12 月元老院中就有人表示，这些法令因其形式错误，有必要取消。698 年 4 月 6 日，执政官西塞罗在元老院全会中提出一项议案，把关于坎帕尼亚土地分配的协商列入 5 月 15 日的议事日程。这是正式的战争声明，面当它从这样一种男人的嘴里说出——他们只有在自认保险时，才会露出他们的本色——它就更为独特了。显然，贵族派认为战斗时刻已经到来，不是联合庞培对付恺撒，而完全是反抗独裁。接下去情形将会怎样已很明显。多密提乌斯毫不隐讳，作为执政官他打算在市民中建议，立即把恺撒从高卢召回。一次贵族的复辟活动就这样开始了。随着对殖民地卡普亚的进攻，罗马显贵对当权者发出了挑战。

尽管恺撒每天都能收到关于首都事件的详细报告，而且，如果出于军事考虑，不管怎样都允许他从他的南部行省，在尽可能近的地方，密切注视这些事件，然而至今为止，可以看出恺撒至少没有参与进去。但现在人们为他及其同事尤其是为他宣告了战争，他必须行动。于是他迅速地行动起来。他正位于近处。贵族派从不认为等待破裂之机——等待恺撒再一次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高卢——是一高明之术。698 年 4 月初，克拉苏斯离开首都，去和他更为强大的伙伴商定必要的事情，他在拉文那找到了恺撒。从拉文那两个人又来到卢卡。在这里，庞培也和他们聚首了。庞培是继克拉苏斯（4 月 11 日）走后不久，自称从撒丁岛和非洲运送粮食离开罗马的。当权者最为著名的追随者，像近西班牙的前执政官麦特鲁斯·纳波斯，撒丁岛的前行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和许多

其他的人跟随着他们。二百名元老院议员出席了这次大会，与共和派元老院相对，这次大会代表的是新的帝国元老院。在任何方面，恺撒都拥有决定权。他利用这一权力，在新的均匀分配权的基础上，重建现存的共同统治，而且要更加巩固。与两个高卢的总督相似，军事上极为重要的总督职位归于这两位同事：庞培负责两个西班牙，克拉苏斯负责叙利亚，通过公民决议，他们可任期五年（700年—704年），而且在军事上、财政上得到适当的配备。而恺撒要求他的指挥权——本应到700年为止——延至705年结束，允许他把他的军团扩大到十倍，由国库支付他擅自征召的部队的薪饷。此后，庞培和克拉苏斯又得到允诺，699年，在他们两人赴任行省总督之前，开始任第二次执政官，而恺撒则公开坚持，当他在706年结束总督任期时，第二次控制这一最高职位。那时，按照法律，两次任执政官期间应有的十年间隔，对他来说就已经过去了。当原本配给首都的恺撒的军团，现在难以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调开时，庞培和克拉苏斯便愈发需要用来调节首都关系的军事后盾，而他们在为西班牙和叙利亚军队新招的兵团中找到了支持。只有当他们觉得合适时，才会率领他们离开意大利，到预定的地方去。至此，主要问题已经解决，次要的事情亦不会存在太久，如确定对付首都反对派应遵循的策略，调整今后几年的竞选和许多类似的事情。伟大的调节能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平息了那些有碍同盟的个人纷争，并强迫互相抵触的分子彼此相容。在庞培和克拉苏斯之间，至少表面上重建了一种同事间的和谐。甚至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也被规定和他的暴徒们保持安宁，今后不要再给庞培添麻烦。——没有一个是强大的巫师制造的转瞬即逝的奇迹。——局势表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全部平息并不是各自独立、势均力敌地相互对抗的当权者妥协的结果，而仅仅是出于恺撒的好意。在卢卡，庞培处于一种失去权力的逃亡者的尴尬境地，以致来向他的对手请求救助。无论恺撒是拒绝他并宣布解除同盟，还是接收他、

让这联盟像过去一样继续存在、庞培都已在政治上毁灭了。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不和恺撒断交，他便是他的同盟者的无能的被保护者。如果与此相反，他和恺撒断交——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然后再建立和贵族派的同盟，那么对手和他情急之下在最后关头结下的联盟也不过只具有极其微弱的威慑力而已，恺撒几乎不可能出于阻止而勉强作出妥协。面对恺撒，克拉苏斯完全不可能作出真正的对抗。很难说有什么动机会使恺撒毫无困难地放弃他的优越地位，即便是在694年的同盟结成时，他都拒绝了他的对手。从那时起，恺撒的对手明显怀着准备对付恺撒的意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徒劳地反抗恺撒的意志，企图获得第二次执政官的任期和军权，现在恺撒自愿地把第二次执政官任期和军权交给庞培。自然不仅庞培位居军队之首，而且还有他的旧敌，恺撒多年的同盟者克拉苏斯。毫无疑问，克拉苏斯所得到的可观的军事地位，只是作为对抗庞培的新权力的平衡力量。尽管如此，当对手用一个重要的指挥权来换他至今为止的无权地位时，恺撒失去的就无可限量了。很可能是恺撒感觉到对士兵还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不能满怀信心地带他们去参加对抗国家正式权威的战争，因此，对他至关重要的是，现在已不会被从高卢召回而被迫参加内战；内战是否会爆发，更多地取决于首都的贵族，而不是庞培。这或许是恺撒之所以不公开和庞培决裂的原因之一。他不想为此而使反对派受到鼓舞，但也不想把庞培所给他的再次还给庞培。大概纯个人动机也在一起发挥作用，可能是恺撒回忆起，他曾一度以同样的无能面对着庞培，而且只是通过他的退位，当然更多地是由于他的无能而不是宽容，他才被从毁灭中解救出来。也许是恺撒害怕使他心爱的、真诚地爱着她的丈夫的女儿心碎——在他的灵魂中，除了政治家以外还给许多事情留有空间。不过最有决定性的原因，毫无疑问是出于对高卢的考虑。恺撒——与他的传记不同——并不把征服高卢看作对他获取皇冠有利的顺便的举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祖国外部的安

全，内部的改革。一句话，这决定着祖国的未来。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完成对高卢的征服，也是为了不必马上就接手意大利的混乱状况，他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优于对手的地位，给予庞培以足够的权力，以便对付元老院及其追随者。如果恺撒只是想尽快成为罗马皇帝，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失误。但是不同寻常的男人的雄心并不限于去获得皇冠这样一个目标。他敢于同时承担并完成两项同样惊人的工作：意大利内部形势的整顿和为意大利的文明征服确保一块新的有生命力的土地。当然，这些任务相互交错。征服高卢与其说是促进，倒不如说是更加阻碍了他通往皇位的道路。他没有在698年完成意大利革命，而是推到了706年，这给他造成了严重后果。作为政治家和统帅，恺撒是一个具有超人胆略的赌博者，他自信而蔑视敌手，总是让对手很多，而且有时会超越一切限度。

现在该由贵族派来下高昂的赌注了，要像他们曾果敢地宣战那样，勇敢地进行战斗。只是不会有比此更为悲惨的戏剧，懦弱者竟不幸地要作出一个勇敢的决定。人们对什么都没有留神，似乎没有人会认为，恺撒可能会进行自卫。没有人会想到，现在庞培和克拉苏斯将会重新和他团结一致，而且关系更为密切。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而当人们注意到，那些当时元老院中领导忠于宪法者的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时，便会领会这一切。伽图还未登场。此时，元老院中有影响的人是马尔库斯·比布鲁斯，消极反抗的英雄，是所有执政官中最顽固，最呆钝的一个。人们抓起武器，只是为了把它们伸出，正像对手只是击打剑鞘。光是卢卡会议的消息就足以消除任何真正反抗的想法，把众多怯懦者，就是说把元老院中非同寻常的多数派再次置入他们在不幸的时刻孤立无援的臣仆职责中。从已确定的协商到检验尤利乌斯法是否有效，已不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了。那些由恺撒自行组建的军团，通过元老院决议由国库接管了。在调节今后的执政官行省中，通过法令来取消恺撒的两个高卢

或其中的一个，这一企图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回绝(698 年 5 月末)。就这样，这一组织开始忏悔了。为寻求自身安宁，大人物的一个接一个地、秘密地单独前来，发誓绝对服从，他们都为自己的大胆而感到震惊。——没有人比马尔库斯·西塞罗跑得更快，他过迟地对他的背约行为感到后悔，而且由于最近的举止又自封了许多光荣称号。这些称号与其说是阿谀奉承，倒不如说中肯贴切。统治者自然很容易平静下来。每个人都得到了宽恕，因为没有谁值得让人花费气力把他当作例外。为了看清在卢卡决议公之于众之后，贵族派的口气转变得有多么突然，值得花些气力把不久以前西塞罗散发的小册子和古代那些推翻自己旧作的诗歌相比。他这样做，是为了公开申明他的悔过和决心。

这样，当权者就能称心地、而且比以前更彻底地整顿意大利局势。意大利和首都事实上得到了一支卫戍部队，尽管不是武装召集的，但其指挥者是当权者之一。在克拉苏斯和庞培为叙利亚、西班牙征召的部队中，克拉苏斯已向东方开进了。但是庞培让他的部将率领至今为止一直在那里的卫戍部队管理两个西班牙行省，而让新征的名义上开赴西班牙的军团放假，自己也和他们一起留在意大利。当人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当权者正致力于废除旧宪法，并尽可能小心翼翼地使现存的统治管理情况适应帝国的形式时，公众舆论的反抗便增强了。但是人们仍不得不听从命令。首先一切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所有涉及军事和外部局势的事物，都不再经过元老院，而是时而通过公民决议，时而仅仅凭统治者个人的感觉来解决。在卢卡达成的有关高卢的军事指挥协议，由克拉苏斯和庞培，涉及西班牙和叙利亚的协议则由护民官盖尤斯·特累波尼乌斯，直接传达给市民。其他较重要的总督职位常常通过公民决议来确定其占有者。当权者不需行政机关批准，便可以随意扩大自己的军队，这一点恺撒已充分地阐明。他们也毫无顾忌地相互借用军队，比如说，恺撒为高卢向庞培借，克拉苏斯为帕提亚战

争向恺撒借，互相接受这样的同事性支持。那些波河以北的居民，按现行宪法只享有拉丁人权利，而在恺撒统治时期，他们实际上是被按完全的罗马市民来对待的。如果新征服地区的建立已得到元老院委员会批准，那么恺撒就完全按自己的测度来组织扩展对高卢的征服规模。例如，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全权的情况下，建立市民殖民区，尤其是新科姆(科莫)有五百个殖民者。庞索在进行色雷斯战争，加宾尼乌斯战于埃及，克拉苏斯在帕提亚指挥作战，谁都没有征询元老院的意见，也没有哪怕只是按惯例向元老院报告。与此相似，凯旋仪式和其他光荣的显示得到批准并进行，却无须向元老院请示。显然，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疏忽。既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元老院根本不会有反抗意见，那么这种疏忽便愈发难以说明了。其实，这是出于周全考虑的，旨在把元老院从军事和高层政治领域内驱逐出去，将其统治参与限制在财政问题和内部事务上。连对手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尽其所能通过元老院决议和刑事起诉来抗议当权者这种行事方法。当权者一边在重要事物上排斥元老院，一边继续利用较少构成威胁的公众大会——并设法使街巷统治者不再给国家统治者制造困难——在此期间，人们在许多事情中都摆脱了空洞的陈规，而利用直言不讳的专横形式。

遭受屈辱的元老院好歹都得安于现状。顺从的多数派仍由马尔库斯·西塞罗统领。由于他具有律师的才能，可以用他来为一切行动找寻理由或以名言为证。而真正恺撒式的讽刺在于：这样一个被恺撒用作传声筒的人，却被贵族派借来进行他们的示威活动。因此，人们会原谅他短时间的反抗要求，但事先却要以各种方式对他的卑躬屈膝取得保证。为了作为人质为他作保，他的兄弟几乎不得不接任一个高卢军队中的军官职位。他自己则受庞培固请，作为位其之下的部将，这为随时得体地放逐他提供了可乘之机。虽然克罗狄乌斯受命继续让他安宁度日，但恺撒不能为了西塞罗让克罗狄乌斯垮台，同样也不能为了克罗狄乌斯让西塞罗倒台。伟大祖国的

救世主和同样伟大的自由人物，在萨马罗布里娃的总部中展开了一场谄媚的竞赛，要对此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可惜还缺一个罗马的阿里斯托芬。西塞罗不仅头上有晃动的鞭子，那曾有一次狠狠打中他的鞭子，还有一副金色镣铐。在他令人忧虑的、棘手的经济状况下，他非常乐于接受恺撒的无息贷款和对恺撒那些大量投入流通的建筑的共同监护权。在一些不朽的元老院演讲中，他一想到他的商务委托人恺撒时便窒息了，因为恺撒会在会议结束后，交给他一张汇票要求兑现。西塞罗决心将来不再询问权力和荣誉，而是尽力谋取当权者的欢心，像一只小耳垂一样地柔韧灵活。人们所利用的正是他所擅长的工作——律师。在这项工作中，他常常注定要按照上级命令捍卫他最恶毒的敌人，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他几乎总是作为王公的喉舌，提出一些别人可能赞同，自己却不以为然的提案。作为驯服者的多数派的领袖，他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人们用对待西塞罗那样的方式，对待其他那些可用恐吓、阿谀奉承或金子拉拢的统治委员会成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但还有一支反对派至少仍保持着本色，既吓不倒，也争取不过来。当权者确信，像对伽图和西塞罗一样地惩罚例外，这类事情只能是弊多而利少。也许，忍受这令人不快的主张共和的反对派，同将持反对意见者变成共和国的殉道者相比，是个较小之灾。于是，人们便任其发展了。(698 年末)伽图归来，并从那时起，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在元老院中，集市广场上，对当权者作出反抗。虽然这也许值得尊敬，但同时也很可笑。人们并不理会他借特累波尼乌斯提案之机，在广场上再次使事情发展到格斗，又在给元老院的提案中，要求把前执政官恺撒引渡给那些蛮族，因为他在对待乌西彼得斯人和坦克德里人的态度上，表现出了不忠行为。人们也容忍着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伽图的桑丘，在元老院决定由图库接管恺撒的军团之后，他跳到民众大会的门前，朝街巷中呼喊着："祖国正面临危机！"他又以古怪而可笑的方式，把庞培绑在伤腿上的白色绷带称为不适

当的冠冕。执政官林都鲁斯·马塞利努斯在人们为他鼓掌时，他向集会群众喊道，他要不辞辛苦地利用这一权力，说出他们的意见，因为现在还允许他这样做。护民官盖尤斯·阿特依乌斯·卡皮托，在克拉苏斯动身去叙利亚之际，公开按当时神学的所有形式对克拉苏斯进行诅咒。总的说来，这是愤懑的少数派虚荣的展示；作出这些举动的小党派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一方面为暗中酝酿着的主张共和的反对派提供了动力和口号，另一方面，它能偶尔拖着元老院多数派作出一个针对当权者的决议，因为这些人从根本上就对统治者怀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也感到，至少需要偶尔地，在次要事情上发泄出他们压抑着的愤怒；尤其是按那些勉强地阿谀奉承者的方式，把他们对大敌的愤怒至少向小敌发泄。在还可以忍受的情况下，当权者的工具被轻轻地踢了一脚：加宾尼乌斯(698 年)请求得到感谢庆典，却遭到拒绝。庇索被从行省召回，当护民官盖尤斯·伽图一再阻碍 699 年选举，直至属于拥护宪法派的执政官马塞利努斯退职时，元老院穿起了丧衣。甚至一直在当权者面前俯首屈膝的西塞罗，也散发起一种反对恺撒岳父的小册子，其言恶毒而又无趣。可是，元老院多数派微弱的反抗愿望，及少数派毫无结果的反抗行动，只是愈发清楚地表明，曾由市民转到元老院的统治权，现在又从元老院的手里移到当权者那里。元老院已经只是一个帝国的国家委员会，但还可以用它来消除反帝制分子。已垮政府的追随者抱怨道：除了那三个人以外，没人具有哪怕最微弱的影响。统治者是全权的，他们设法使所有人都对此有所感知。整个元老院面目全非，完全服从当权者。这一代将不会经历一场事物的骤变。人们不是在共和国里，而是在帝国中生活。

但是，如果说当权者对国家拥有无限的控制权，那么仍然存在一个由原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分离出去的政治领域，它易守难攻：正式官员选举和刑事陪审法庭。后者并不直属政治范畴，但不言而喻，它到处都由控制国家的英才共同管理，尤其是在罗马。但政府

官员的选举，根据法律，则属真正的国家政府职权范围之内；只因这一时期，国家政府显著地由特别官员或完全没有官衔的人来管理。即使是最高级的正式官员，如果他们属于反帝制党派，也不能以任何可感的方式，对国家机器发挥影响。这样，正式官员便越来越降为配角。他们中最持反对意见者，直率而完全有理地自称为无力的渺小人物。他们的选举也降为公众大会。这样，当反对派完全已被从原战场排挤出来时，敌对仍能在选举和诉讼中继续。当权者为了在这里仍然保持胜利，不惜大花气力。在选举方面，他们已在卢卡为今后几年而相互商定了候选人名单。为了能使在那里谈定的候选人通过选举，他们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首先，为了进行竞选宣传，他们慷慨地施舍金钱。每年，恺撒和庞培的军队中都会有大量士兵获准休假，以便到罗马参加表决。恺撒自己则从上意大利出来，在尽可能近的地方领导并监察选举活动。然而，这一目的很不圆满地达到了。根据卢卡协议，庞培和克拉苏斯被选为699年的执政官，而反对派唯一坚持到底的候选人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被排除出去了。这已是通过公开动用武力才通过的。在这一过程中，伽图受了伤，而且其他非常令人不快的争吵也都突然发生。在今后几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尽管当权者费尽心机，但多密提乌斯却真的当选为700年的执政官，而且伽图也在谋求行政官职位中获得胜利。一年前，恺撒的追随者法提尼乌斯击败了他，激起全体市民的不满。在为701年作出的选举中，反对派还得以在其他候选人中揭露那些当权者的候选人，并指斥他们进行了最为讨厌的阴谋活动，其情无可辩驳。这些造成丑闻的阴谋只能使他们垮台。摄政者在选举场上屡遭严重失败，或许部分应归因于那已不具统治能力的僵化的机构。竞选交易中难以预料的偶然事件，中层阶级的反抗意识，屡屡在此发生干预，它们常常怪异地挫败党派地位的私人考虑，但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这一时期的选举显著地受到各种俱乐部的控制。这些俱乐部是贵族派划分成的小组，他们以全面的标

准，有条不紊地组织着行贿活动。那些在元老院中作代表的贵族，也控制着选举。但如果他们在元老院中满怀愤怒地屈服，那么在这里他们则秘密地与之对立，而且，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他们都肯定绝对地抵抗统治者。针对这些俱乐部在竞选中所进行的阴谋活动，699 年的执政官克拉苏斯通过市民确立了法规，但这并没有消除罗马显贵在该领域的影响。这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在以后几年的选举中也得到了证明。　一同样，刑事陪审法庭也给当权者造成了很大困难。在它们目前的构成中，除了在这里也很有影响的元老贵族，在刑事陪审法庭里主要是中层阶级起着决定作用。通过一项由庞培在 699 年提出的法案，明确了具有高度权力的刑事陪审法庭财产状况。这就证明，当权者的反对派主要在真正的中层阶级中，而且，像所有地方一样，在这里证明了高级金融界人物比中产阶级更顺从。尽管如此，共和派在这里还没有失去所有依靠。他们乐此不疲地用政治刑事诉讼追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当权者本身，但很可能是他们出色的工具。而当元老院派青年进行控告时，这场诉讼战就愈发激烈了。可以理解，这些青年人比那些年纪较长的阶级同仁具有更多的共和派的热情、生气勃勃的天才和大胆的进攻性。不管怎样，法院是不得清闲的，如果当权者对此认真，他们就会像元老院一样不敢拒绝服从。而在对手中，没有一个人像法提尼乌斯这样受到反对派的追究，其仇恨如此深重，几乎已变得众人皆知。而法提尼乌斯绝对是恺撒较密切的追随者中，最勇敢、最肆无忌惮的一个。但他的头领一发出命令，他便在所有对他提出的诉讼中，被宣告无罪。然而，由于像盖尤斯・里西尼乌斯・卡尔伏斯和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俄这样的人，能舞雄辩之剑，善用嘲讽之鞭，他们的谴责即便归于无效，也仍会击中目标，而且会零星地取得一些预期效果。自然，大部分都是对次要的个别人物的胜利。可是，一个身居最高位且深受憎恨的摄政者的追随者、执政官加宾尼乌斯也是被用这种方法推倒的。自然，贵族派不会宽恕加宾尼乌斯

有关进行海盗战争的法令，也不会原谅他在任叙利亚总督时，对元老院所表现出的轻蔑态度。他们对加宾尼乌斯这种难以调和的仇恨和高级金融界人物的怒气汇聚到了一起，因为加宾尼乌斯在做叙利亚总督时，竟敢代表外省人的利益和他们作对。甚至克拉苏斯也深怀怒意，因为加宾尼乌斯在转交行省时，给他制造了许多琐屑事宜。这样，加宾尼乌斯唯一赖以对抗所有这些敌人的支持便是庞培，而庞培也有一切理由，不惜代价地捍卫他最能干，最忠诚的副官。但是，像在别处一样，庞培不知利用他的权力，就像恺撒支持他的追随者那样，来维护自己的追随者：700 年末，陪审法官发现加宾尼乌斯犯了敲诈罪，便把他放逐了。总的说来，在公众选举和刑事陪审法庭领域内，败北的是当权者。这里面的统治因素不那么明显，因此也就比政府和管理部门的直接喉舌更难恐吓或收买。在这里，尤其是在公民选举中，统治者遇上了寡头政治的坚韧力量，他们团结一致，以小集团的形式出现。即使推翻了寡头政治的统治，人们也还没有彻底战胜它，而它越隐蔽，也就越难以铲除。在这里，尤其是在刑事陪审法庭，他们又进一步遇到了中层阶级对新帝国统治的憎恶，而这种反感及源于其中的所有尴尬之事，他们都没有能力排除。当权者在这两个领域内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反对派在竞选中所取得的胜利，也只具有示威的意义。因为当权者拥有而且也利用一切手段，真的宣布取消每个不受欢迎的官员的职务，而反对派的刑事犯罪判决，却以一种敏感的方式使他们失去了对自己有用的帮助。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当权者既不能取消公民选举和刑事陪审法庭，也不能对其进行足够的控制。反对派虽然感到他们在这里受到束缚，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固守着这一战场。

事实表明，当反对派越来越被从直接的政治活动中排挤出来时，他们便越来越竭力转向一个领域，而要在这一领域中对付他们就愈发困难了。这一领域便是文学。其实，诉讼反抗同时就已经是，而且首先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反抗，因为演讲常常要发表，并作为政

治传单，而诗歌会更快更准地击中要害。在意大利的小城市中，活跃的高等贵族派青年，也许更有力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层阶级领导着传单和讽刺短诗战，这一行动充满热情，并卓有成效。在这一领域同时作战的有高贵的元老之子盖尤斯·里西尼乌斯·卡尔伏斯（672年—706年），一个令人畏惧的演讲家、传单作者和机智的诗人。还有克雷莫纳和维罗纳的市民马尔库斯·福里乌斯·比巴库鲁斯（652年—691年）和昆图斯·法果利乌斯·卡图鲁斯（667年—约700年）。他们机巧而辛辣的讽刺短诗像离弦之箭一般飞遍意大利，而且肯定能击中目标。那几年的文学中，完全是反对派的声音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文学中便充满了对"伟大的恺撒""唯一的统帅"，对"深情的岳父和女婿"的辛辣而又幽默的嘲讽。说他们要毁灭整个世界，以给他们堕落的宠儿一个机会，走遍罗马的大街小巷去炫耀长毛凯尔特人的战利品，用来自西方最偏远的岛上的猎获物，举办帝王般的盛宴，并作为挥金如土的竞争对手，使诚实的青年人在家里失去他们的情人的欢心。在卡图鲁斯的诗和其他这一时期的文学残迹中，都有那种私人与政治仇恨的天才的创作，放纵于强烈欲望，或严重的绝望中共和派的垂死挣扎。而这一切又以更有力的方式，出现在阿里斯托芬和德摩斯梯尼的创作中。至少三位统治者中最有洞察力的一个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同轻视反对派一样，通过权力指令去镇压他们也是不可能的。恺撒更愿意尽自己所能尝试着亲自去争取著名作家。西塞罗在文学上的名声，大部分要归功于恺撒给予他的特别关怀；但高卢总督也不拒绝，通过他本人认识的卡图鲁斯的父亲的介绍，和卡图鲁斯结下特别和约。这个年轻诗人对强大的将军极尽辛辣挖苦，大做人身攻击，但却受到将军其人的近乎谄媚的表彰。在对手的那个领域内，恺撒有足够的才能紧随其后。为对各种各样的攻击间接地作出反抗，恺撒发表了一份有关高卢战争的总报告。这份报告用幼稚而有利的假设向读者展示了他作战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唯有诗意的和创造性的

是必须的，而且仅仅只有自由才能创造。自由，而且仅是自由，能在低劣的漫画中，以其最后一息鼓舞获得新生。所有文学中的卓越因素都是，而且仍是反帝制的。若恺撒能够敢于涉足这一领域而不遭受失败，那么原因仅仅在于，就连他自己现在都怀有对自由国家的美好梦想，当然，他没有能力把这个美梦传给他的敌人，也不能授予他的追随者。与共和者对文学的控制相比，当权者对实用政治的控制并不是更绝对。

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必要对这一无能却越来越讨厌而放肆的反对派采取严厉的措施了。看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便是对加宾尼乌斯的判决（700 年末）。统治者一致同意，开始实行一段时期的专政，哪怕只是短期的。并借助于专政，通过新的强制惩罚，特别是对于选举和刑事陪审法庭。作为罗马和意大利的暂时负责人，庞培接过了执行这一决议的任务。但在这一工作中，他也明显表现出了他特有的拙劣决定与缓慢行动，甚至当他想要，而且也能发号施令时，他也表现出他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无能：居然不能表态。700 年末，元老院中就已暗示地，而且不是通过庞培自己，提出了专政的要求。其公开原因便是首都中俱乐部与帮伙活动的持续。他们通过行贿和暴力，自然对选举和刑事陪审法庭施加有害的压力，在那里不断引起骚动。人们必须承认，他们为当权者减轻了压力，使其不必为他们的例外惩处措施作出辩护。可以理解，甚至奴性十足的多数派，也不敢对未来独裁者的要求表示赞同，而他自己似乎也没有胆量公然提出这一要求。为 701 年执政官选举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宣传鼓动，造成了令人最为懊恼的惊人事件。选举又把规定的时间足足向后拖延了一年，直到经过七月之久的空位时期之后，才于 701 年 7 月开始进行。这时，庞培从中找到了符合理想的机会和理由——解不开的结便只有砍断——现在一定要向元老院说明专政的特征；只是依然得不到具有决定意义的命令。也许还会长时间地得不到命令，如果不是在 702 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主张共和的

反对派中最勇敢的党徒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作为竞选对手，坚决反对当权者的候选人昆图斯·麦特鲁斯·西庇阿和普布利乌斯·普劳提乌斯·希布塞乌斯的话。这两个人都很接近庞培，而且是完全乖顺的人。米罗拥有与生俱来的勇气，有一定的诡诈和欠债的天资，特别是具有天生已足，又加后天细心培训的厚颜无耻。他在当时政治上的产业骑士中成名。在他的手工业行会中，他是仅次于克罗狄乌斯的最有名气的人，自然也是克罗狄乌斯的竞争死敌。既然这个街巷阿喀琉斯（指克罗狄乌斯——译注）被当权者争取过去，并经其许可扮演极端民主的角色，那么街巷的赫克托耳当然就成了贵族的一员，米罗甘愿充做主张共和的反对派在任何暴动中的合法先锋。如果死去的卡提林那提出要求，主张共和的反对派甚至会和他结成联盟。事实上，他们在这一战斗领域内获得的若干胜利，便是米罗和他那些训练有素的角斗士帮的行动。反之，伽图及其部下也支持米罗谋取执政期，甚至西塞罗也不能不举荐他敌人的敌人，他长年的保卫者。又因米罗为了当权也不惜动用金钱与暴力，看来选举有了保证。对当权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新的重大失败，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可以预见，这个鲁莽大胆的党徒一旦做了执政官，就不会像多密提乌斯和其他正派的反对派人士那样容易革除。

这时，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在离首都不远的阿庇乌斯路上偶然相遇，于是两个帮派之间便爆发了劫掠事件。在混抢中，克罗狄乌斯肩上被刀砍了一下，被迫逃到邻近的一家。这事并不是米罗布置的，但事已至此，必须经受住这场风波。在米罗看来，彻底的犯罪要比不彻底的更值得追求，也更少危险：他命令他的人把克罗狄乌斯从其隐身处拉出来杀掉（702 年 1 月 13 日）。当权者派的街巷首领、护民官提图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昆图斯·庞培·鲁福斯和盖尤斯·萨鲁斯提乌斯·克利斯浦斯，在这一事件中看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可以用来为其主谋利，使米罗专政的阴谋破产，以

实现庞培专政。下等人中的败类，尤其是获释奴隶和奴隶，随着克罗狄乌斯的猝死而失去了他们的庇护者和未来的解救者；于是，必然的骚乱是很容易产生的。人们列队参观置于演讲台上的血迹斑斑的尸体，并为此发表演讲，之后，骚乱就这样开始了。焚烧伟大的解救者的柴堆安置在阴险的贵族派所在地；一伙人把尸体抬进议会，并点燃了大楼。此后，人群来到米罗房前，包围了他的家，直到米罗的帮伙放箭，才把进攻者驱散。接下去，是在庞培及其执政官候选人的房前，庞培被作为独裁者，候选人被作为执政官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从那儿又到了临时国王马尔库斯·雷必杜斯房前，他是执政官选举的负责人。怒吼的人群要求他立即组织竞选。出于职责的考虑，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他便被围困在家中，时间长达五天。——但是，这场骇人听闻的事件的雇主，却没有暴露他们的角色。固然，他们的主人和首领也决定利用这有利的事故，不仅铲除米罗，还要夺取专政，只是他不想从一群舞棍弄棒之人那里，而是从元老院中得到专政之权。庞培召来部队对笼罩着首都的、事实上到处都变得难以忍受的混乱状态加以镇压。他现在也开始发号施令了，这也正是他至今为止一直想得到的，而元老院也屈服了。在伽图和比布鲁斯的建议下，庞培在保留现任职务的条件下，被任命为"无同事的执政官"，而不是独裁者（702 年闰月 25 日[①]）。这一套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诡计——这一诡计容忍了一次具有双重的内在矛盾[②]的任命，只是为了避免简单地说明问题的任命。这强烈地使人想起消失了踪迹的贵族地主阶级的明智决断，不要给城市平民执政官职位，而只能给他们执政官的权力。——合法地拥有全权的庞培开始行动，坚决地朝着在俱乐部和刑事陪审法庭中力量强大的共和党派向前迈进。为使人牢记现行的选举规定，

① 这一年中 1 月 29 天、2 月 23 天，在 2 月之后便是闰月 28 天，闰月后是 3 月。
② 执政官意即同事，一个兼为前执政官的执政官既是真正的执政官也是代理执政官。

元老院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重申这一规定。另外，针对选举中的阴谋活动，元老院也颁布了一项法令，它对所有自684年以来，这一类的违法行为都有追溯效力，这便加重了至今为止对此所施加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这一指令：总督职权——即官吏职务中绝对重要的，特别是大为有利的部分——不再在退离执政官或行政官职位后立即授予执政官和行政官，而是在接下去的五年以后。当然，这一制度直到四年后才能建立起来。因此，这使得在下一段时期里，总督职权的获得，显著依赖于为调节这一空位而公布的元老院决议。事实上，是依赖于暂时统治元老院的个人或党团。虽然陪审法官委员会依然存在，但抗辩法受到了限制，也许更重要的是，法庭中的自由发言权被取消，不但减少了律师人数，而且分给每个人的说话时间，也通过对最多句子的规定而受到限制，那些蔓延的恶习：不但出具事实证明，而且还要提供有利于被告的人证，或者所谓的"致颂词者"，这一切都被禁止了。驯服的元老院进一步按庞培的指示宣布，阿庇乌斯路上的斗殴使祖国陷入危机。其后，元老院又通过一项例外法令，为所有与此相关的犯罪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其成员完全由庞培来任命。另外又尝试着使监察官重获重要地位，并借助监察官之职，肃清混在深受损害的市民中，品质最为恶劣的流氓。——所有这些惩罚都是在军刀的压力之下进行的。由于元老院声明，祖国已面临危险，于是庞培便在整个意大利召唤有服兵役义务的全体士兵，并让他们宣誓，以防万一。目前，一支合格而可靠的部队被移至卡皮托山（元老院所在地）。每一次反抗行动，庞培都以武装干预相威胁。在审理克罗狄乌斯被害案的过程中，他甚至违背一切惯例，在法院所在地设置岗哨。——恢复监察官的计划失败了，因为在奴性十足的元老院多数派中，没人有足够的道义上的勇气和威望，哪怕只是去谋求这样一个职位。与此相反，米罗受到陪审法官的判决（702年4月8日），伽图在谋求703年的执政期中受挫。他通过演讲和散发传单进行抗议，在新的诉讼

制度下他受到打击，再未恢复元气。他令人敬畏的诉讼口才也随之被从政治领域里驱逐出去，从此以后他受到帝国的管制。自然，反抗既未在广大的多数人中，也没有完全从公众的生活中消失——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公民选举、刑事陪审法庭和文学不仅仅是加以限制，而是要根除。正是庞培以其笨拙和错误所做的这些事情，使得那些共和派人物，甚至在他的专政下零星地取得对他来说是重大的胜利。统治者为巩固权力制定的倾向性惩罚措施，自然被官方说成是为保护公众安宁与秩序而作出的规定，每一个拒绝混乱的市民，都被称为是对此规定的赞同者。这一显而易见的杜撰，却被庞培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了调查上次的骚乱，他没有把更保险的工具，而是将所有党派中最重视的人物——伽图选入了特别委员会，并且把他对法庭的影响显著地转向对秩序的操纵。这样，这一时期在法庭中的大吵大闹，便使无论是他的追随者，还是他的对手都丢尽颜面。摄政者的这种中立态度，人们可以从特别法庭的判决中看出来。陪审法官们虽然不敢把米罗本人无罪释放，但主张共和的反对派的大多数次要被告都被放走了。与此同时，却对另外一些人作出了严厉判决，这些人在上次骚动中支持了克罗狄乌斯，就是说，站在了当权者一边。他们中有不少恺撒，甚至是庞培最信赖的朋友，乃至他的执政官候选人希布塞乌斯和护民官普兰库斯与鲁福斯。他们曾为了他的利益指挥了这场暴乱。如果庞培是为了显示自己无党派意识，而不阻止对这些人所作的判决，那么这就是他的愚蠢无聊之一了，之二便是，他确实又在全无所谓的事情上，为了他的朋友践踏自己的法律。譬如说，在审理普兰库斯一案时，他登堂作证，使几个跟他特别亲近的被告，如麦特卢斯·西庇阿免于判决。像往常一样，他在这里也想做截然对立的事情：他企图同时考虑无党派摄政者和党派首脑的职责，这样二者都不能履行。于是，他完全有理由在公众舆论中以独裁者的形象出现，同样有理由被他的追随者看作是一个既不能也不想保护他的自己人的首领。

尽管共和派仍在行动，甚至在这里或那里有个别的成功，当然主要是通过庞培的错误作法。通过这种方式共和派使自己得到充实，然而统治者在专政下所设的目标却全部实现了，缰绳被拉得更紧，共和派受到贬低，新帝国得以巩固，公众开始进入帝国。在庞培从一场大病中恢复后不久，整个意大利以必要的欢乐表示庆祝他的复元。在类似情况下作出欢乐的表示，这在帝国里是很普遍的。当权者表示很满意：在702年8月1日庞培停止了专政，开始和他的追随者麦特卢斯·西庇阿共同执政。

第　九　章

克拉苏斯之死　共同统治破裂

多年以来，马尔库斯·克拉苏斯一直被算在“三巨魔”首脑之中，但却没有真的算数。他是真正的当权者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平衡石，或者确切地说，他落在了恺撒的测量盘中，与庞培对抗。这一角色不是太光荣，但克拉苏斯从未让强烈的荣誉感妨碍他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他是一个商人，价格上他还可以商量。为他提供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既然不会得到更多，他也就接受了这一切，并试图通过在他面前越堆越高的金山来忘却那折磨人的虚荣心，忘却那接近权力，却又毫无权力的地位所带给他的烦恼。然而卢卡会议改变了他的这种境遇：为了在作出如此之大的妥协之后，仍能相对于庞培而处于优势，恺撒给了他的老同盟克拉苏斯一个机会，让他通过帕提亚战争开进叙利亚，以达到恺撒已借助高卢的凯尔特人达到的目的。很难说，是这些新的前景更多地激起了他对金子的贪馋，这对于他，一个已六十高龄的人来说，已成了第二天性，而且随着每一笔新获的百万钱财，这种贪馋便愈发变得不可理解。还是这些前景更多地激起了这位老人胸中的虚荣心，多年以来他吃力地克制着它，现在它终于又熊熊地燃烧起来。700 年初，克拉苏斯就已抵达叙利亚，他甚至没有等到执政官任期结束就启程了。他的心中充满了迫不及待的激情，仿佛要买下每一分钟来弥补他所耽搁的

时间，以把东方的财富加入到西方的宝物之中，并像恺撒一样迅速，如庞培一样不懈地追求统帅的权力和统帅的荣誉。

克拉苏斯发现帕提亚战争已初露端倪。庞培对帕提亚人的背弃行为，以前已有记述：他并不尊重条约所规定的幼发拉底河边界，而且为了已成为罗马附属国的亚美尼亚的利益，他从帕提亚帝国剥夺了大片的土地。国王弗拉阿特斯忍受了这一切。当他被自己的两个儿子米特拉达梯斯和奥罗德斯谋杀后，新国王米特拉达梯斯就立即向亚美尼亚国王，即不久以前去世的提格累尼斯的儿子阿塔瓦斯得斯宣战了（698年[1] 左右）。这同时也是对罗马的宣战。当那里的犹太人暴动被镇压下去后，精明勇武的叙利亚总督便率领军团渡过了幼发拉底河。然而，在此期间，帕提亚发生了一次暴力政变，以那位年轻、勇敢而富有天资的枢密大臣为领袖的帝国大人物，推翻了国王米特拉达梯斯，并将其弟扶上了宝座。因此，米特拉达梯斯便来到加宾尼乌斯的营垒，和罗马人齐谋共同事业。一切都预示着罗马总督的行动将获最大成功。这时，他意外地得到命令，用武力护送埃及国王回到亚历山大里亚。他不得不服从命令，但他的心里仍然抱有希望，认为自己很快就会返回。他唆使那些向他求助的、失势的帕提亚诸侯，在此期间自行发起战争。米特拉达梯斯这样做了，塞留西亚和巴比伦对此表示赞同。但自己第一个登上城堞的枢密大臣却抢占了塞留西亚。在巴比伦，为饥饿所迫的米特拉达梯斯不得不投降，随后奉其弟之命被处决。对罗马人来说，他的死是一明显的损失。但帕提亚帝国的骚动绝不会以此而告终，亚美尼亚战争仍在持续。加宾尼乌斯也意欲在埃及远征结束后，利用依然有利的机会，重新发起中断的帕提亚战争。而克拉苏斯到了叙利亚，同时受命接手前任的计划。满怀着雄心勃勃的希望，他无

[1] 提格累尼斯在698年2月时仍然活着，而阿塔瓦斯得斯在700年前就已开始统治。

视长征的艰难，对敌军的抵抗力量更是不加理会；他不仅充满信心地谈起帕提亚的臣服，而且在思想中已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帝国和印度帝国。

然而，这个新的亚历山大并不着急。他发现在着手实施如此庞大的计划之前，还不得不做些非常广泛、非常有益的事情。按克拉苏斯的命令，希拉波利斯·巴姆比克的叙利亚爱情女神狄尔塞多庙、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庙和其他叙利亚行省的富庶的圣塔，都被剥夺了财富，使它们不得不向臣仆征集援军或以金额代之。第一个夏季的军事行动集中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全面侦察：渡过幼发拉底河，在伊希奈（拉卡北部的贝里克附近），帕提亚的地方总督受击，邻近城市其中还有大城市尼科弗利翁（拉卡）被占领。人们在该地留下驻防部队之后，又回到了叙利亚。人们一直在犹豫，不知是经亚美尼亚绕路走，还是穿过美索不达米亚荒漠，直奔帕提亚更可取。第一条路径通过山区，而且那一地带归属可靠的联盟掌管。由于这条路线更安全，因此也就更可取。国王阿塔瓦斯得斯亲临罗马总部，以支持这一远征计划。但侦察结果却表明，应该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区，无数繁华的希腊和半希腊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塞留西亚，都厌恶帕提亚的统治者。就像从前卡里的市民一样，现在所有被罗马触及的希腊村庄都以行动证明，他们正准备推翻这难以忍受的异族统治，并把罗马人作为解救者，甚至近乎是作为同乡来接待了。阿拉伯首领阿布卡洛斯控制着埃得萨沙漠和卡里沙漠，并因此而管辖着从幼发拉底河至底格里斯河边的通道。他来到罗马人的军营中，向他们表明自己的忠诚。帕提亚人则表现出一副毫无准备的样子。罗马人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位于比拉狄克附近，701 年）。从那里到底格里斯河有两条路可供选择：或者部队沿幼发拉底河向下，直至塞留西亚的高地，在那里，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仅相距几里之遥；或者过河后取最短路径横穿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直达底格里斯河。第一条路直

接通往帕提亚首都克特西丰，这座城市隔底格里斯河与塞留西亚相对。作战会议上，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这一路线持赞同态度，特别是财政官盖尤斯·卡西乌斯，他指明了沙漠行军的困难，指出从幼发拉底河左岸的罗马驻守部队传出：帕提亚正在为战争作准备。这一消息不能不让人忧虑。但与之相对的是，阿拉伯首领阿布卡洛斯报告说，帕提亚人正忙于撤离其西部地区。他们已收拾好宝物，开始投奔希尔卡诺斯的部族和西提亚人，只有取捷径进行强行军，才会有可能赶上他们，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强行军，才有可能追上西拉西斯和大臣率领的大部队之后的后卫骑兵，并给他们一次突然袭击，以劫取丰厚的战利品。根据友好的贝督因人的报告，罗马人对行军方向作出了决定：由七个兵团，四千名骑兵，四千名投掷者和射手组成的罗马军队，离开了幼发拉底河，伸入北美索不达米亚贫瘠的平原，但四处不见一个敌人，似乎只有饥渴和无垠的沙漠在把守着东方的大门。经过四天的艰苦行军之后，终于在距罗马军队要渡过的第一条河巴利索斯河（贝里克河）不远处，出现了第一批敌方骑兵。阿布卡洛斯及其阿拉伯人被派出打探消息。帕提亚骑兵队退至河边，过了河便消失在远处，阿布卡洛斯及其部下紧随其后。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归来，期待着更准确的消息。克拉苏斯希望在这里能最终接近那永是后退的敌人。他那年轻勇敢的儿子普布利乌斯曾在高卢挥戈于恺撒旗下并获最高勋章。这次又受恺撒派遣，率领一支凯尔特骑兵队参加帕提亚战争。此时，为狂热的战争欲望所驱使他更是显得迫不及待。由于没有消息，人们决定碰碰运气，继续向前进发：启程信号发出，渡过巴利索斯河，部队在短暂的午休后，片刻不停地继续快速行进。突然，四周响起帕提亚人的定音鼓声，四处可见他们绣金的丝绸战旗迎风飘扬，他们的钢盔和铠甲在正午的骄阳下光亮耀目；在枢密大臣旁边立着阿布卡洛斯和他的贝督因人。

罗马人明白得太晚了，以致落入这样的网中。枢密大臣早已准

确地看清这场战争的危险，而且也看清了应付的手段。如果以东方步兵之力，是难以对付罗马正规步兵的。于是他摆脱了罗马军队，派遣国王奥罗德斯统率这些在战场上毫无用途的众兵，对抗亚美尼亚人，以阻止国王阿塔瓦斯得斯让他许下的一万重骑兵加入克拉苏斯的部队，而克拉苏斯此时正痛苦地想得到这些骑兵。与罗马人那以其方式而无与伦比的策略相对，枢密大臣自有一个完美而且截然不同的计策。他的部队只有骑兵，正规军组成了重骑兵，配有长矛，人马都护以金属鳞甲或皮甲及相似的护甲，大部分士兵都是配有坐骑的弓箭手，与之相对，拥有同样武器的罗马军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熟练程度上都处于劣势。他们的正规步兵，尽管在近战中无论是近距离标枪，还是用剑格斗都表现出色，但它却对付不了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部队。可以想象，如果发生格斗，在这长矛骑兵的铁硬队伍中，罗马人将发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如果对手不是更加优越的话。面对帕提亚人这样的部队，罗马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骑兵控制着联络；战术上则是任何近距离武器都要败于远距离武器。而对这种进攻，如果没有发展为肉搏战，那么罗马作战方式赖以为基础的集中阵地则更增大了危险性；罗马纵队集结越密，他们的突击就越不可抗拒，但远距离武器也越容易击中目标。在通常情况下，要守卫城市，而且要照顾到土地的障碍，那种仅仅运用骑兵对抗步兵的战术，从来没有完全地得以实施。但在美索不达米亚荒漠中，帕提亚军队几乎就像航行在海上的一艘船，多日的行军，既未遇到障碍，又未得战略上的依据，于是，这种作战方式就难以抗拒了，因为这里的境况允许它彻底地发展其纯粹性，也就是其全部的威力。这里，敌对的力量都团结在一起，使那些对抗本土骑兵的外来步行者陷入恶境。负载沉重的罗马步兵，艰难地走过沙漠或荒原，在那些无路可觅、泉眼相距甚遥且难以找寻的途中，因饥饿，而更多的是因干渴而垮了下来。而帕提亚骑手从幼年起就习惯于坐在而且几乎是生活在驰行的骏马或骆驼

上，他们轻松地在荒漠上飞驰而过。长久以来，他们学会了减轻沙漠给自己带来的不幸，还学会在不得已的时候去承受它。这里从不下雨，虽然雨水能减轻这难以忍受的酷热，能使敌方射手和投掷者的弓弦和投掷器上的皮带松弛。在这些深深的沙堆中，几乎不能弄出像样的沟壕和围墙以建营垒。就是想象也难以造成这样一种局势，即军事优势更多地归于一方，而劣势统属另一方。——至于在何种情况下，帕提亚人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新战术，即第一个依其正确的地理环境而明显优于罗马人的民族策略，对此我们只能猜测。在东方，长矛骑士和马上射手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已成了塞洛斯和达累伊俄斯军队中的核心，直到今天，这种武器只列于第二位，而且主要是用来遮挡那些完全无用的东方步兵。在这一点上，帕提亚军队与其他东方部队并无二致。应该说，这样的军队六分之五是由步兵组成的。相反，在克拉苏斯的远征中，骑兵第一次单独出现，于此，这一武器便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运用方法和一种迥然不同的意义。罗马步兵在近战中不可抗拒的优势，似乎在毫无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在同一时期，在世界不同地域，几乎同样成功地把罗马的敌人引到以骑兵和远战来对抗罗马人的路上。一切由卡西维劳努斯在不列颠彻底完成，由维辛哲托里克斯在高卢部分达到，由米特拉达梯斯在幼发拉底河已尝试到一定程度上的事情，都由奥罗德斯的枢密大臣以更高的标准和更彻底的方式完成了。只不过他在重骑兵中发现了组成纵队的方法，在东方民族，特别是从波斯地区那被出色地运用于射击艺术的弓箭中，看到一种有效的远距离武器；并于地方和民众的特性中，寻到了完美地实现自己的天才想法的可行性。在这里，罗马的近距离武器和密集体系第一次败给了远距离武器和展开分散的体系，军事革命由此而进入准备阶段，并以火枪的引入而彻底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于卡里(哈兰)南六里，即罗马驻防部队所在地，北近伊希奈的沙漠中心展开了罗马与帕提亚的第一次战斗。罗

马射手被派往前方，但帕提亚人弓箭的惊人数量和超于己方的张力和射程，迫使他们片刻就退了回来。尽管具有洞察力的军官提出，军团应尽可能分散地向敌人开进，但军团仍以十二支步兵队组成的密集的四方阵形分列各方。他们很快就被压住，可怕的箭支倾泻而下，即便不加瞄准也会击中人身，士兵们即便是还击也将会不知所措。而当他们看到那些载满箭矢的无数排驼队，便再也不必希望敌人会射光箭矢了。帕提亚人扩延得越来越广，为了不使敌人的优胜转为包围，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率一个由骑兵、射手和正规步兵组成的军团向前开进，发动进攻。事实上，敌人放弃了包围，在迅猛的罗马统帅的猛烈追击下退了回去。但当普布利乌斯的军团完全看不到大部队时，重骑兵却停在了他们面前，从四面八方拥来的帕提亚兵士，像网一样地绕在他们的周围。眼看着自己的士兵在马上射手的箭下密密层层纷纷倒在自己身边，普布利乌斯绝望地带着他未着护甲的凯尔特骑兵，冲向了敌人铁硬的长矛骑士。这些凯尔特骑兵或用手抓住长矛或跳下战马去刺倒敌人。但是，他们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敢终究毫无意义。军团的残余，包括被伤了持剑臂的统帅，都被挤到了一座小山上。在那里，他们真正地成了敌方射手最好的箭靶。那些熟悉地形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人，恳求克拉苏斯和他们一起离开此地，以图自救。但克拉苏斯拒绝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些勇敢的士兵的命运分开，他的蛮勇使他们走向了死亡。克拉苏斯让他的持盾者亲手刺穿了自己。和他一样，大多数仍幸存的军官都选择了自杀。近六千人组成的坚强的分队，只有不足五百人被俘而无一获救。在此期间，帕提亚对大部队的进攻有所减弱，人们只想休息了。当派出的军团终无消息而将大部队从这惑人的安宁中惊醒，并为寻找那个军团而接近那片战场时，普布里乌斯的头颅被用一根棍挑到了父亲马尔库斯·克拉苏斯面前。此时，帕提亚对大部队的第二次可怕战役开始了，以同样迅猛，同样令人无望的单调方式。人们既不能驱散长矛骑士，也接近不了射手，直到深夜，这

场大屠杀才终于了结。如果帕提亚人在战场上露营，罗马军队就很难有人逃脱。可是，帕提亚人习惯于骑马作战，为了免遭突袭，他们从不在靠近敌人的地方驻营；他们嘲弄地向罗马人喊道，他们送给统帅一夜时间来哭自己的儿子，随后便飞驰离去。明天，他们将会回来捕捉这只鲜血淋漓地倒在地上的野兽。自然，罗马人不会坐等天明。部将卡西乌斯和屋大维——克拉苏斯本人已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命令，留下所有——据称四千名——伤残者，还能行军的人立即尽可能安静地动身到卡里的城墙中寻求保护。次日，帕提亚人返回，他们首先开始寻找分散的余留人马，并对其进行大肆杀戮。而卡里的驻守部队和居民已经通过那些逃跑的人，提前知道了这场灾难，并尽可能快地开向了这支遭受重创的部队。于是罗马军队的残余便在面临似乎已无法避免的覆没之际获救了。帕提亚骑兵队不会想到去包围卡里。但是，罗马军队很快就主动离城开拔了，一方面是生活用品匮乏所迫，一方面则因统帅丧失勇气，操之过急。士兵们企图剥夺他的指挥权，由卡西乌斯取而代之，却终归徒劳。人们取道向亚美尼亚山区；屋大维带着五千人组成的支队，昼息夜行地来到要塞西那卡，从这里再走一天就会到达安全高地。这支队伍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解救了统帅。这位统帅被向导引入歧路，并被他献给了敌人。这时枢密大臣骑马来到罗马军营，以其国王的名义给予罗马人和平与友谊，并建议双方统帅会晤。这支堕落的罗马军队哀求并强迫他们的首领接受这些提议。枢密大臣以通常的礼节迎接了这位执政官及其参谋部，同时主动提出重新缔结友谊；只是他以恰当的愤懑忆起同卢库鲁斯和庞培在幼发拉底河边界方面所定的条约的命运，因而借此要求正式起草这份友谊和约。一顶装饰豪华的帐篷被带上前来。这是国王赠给罗马统帅的礼物。枢密大臣的侍从拥在克拉苏斯周围，卖力地将他抬上马。在罗马军官看来，人们要强捕统帅其人。毫无装备的屋大维从一个帕提亚人的剑鞘中抽出利剑，刺死了马仆。在由此而发生的冲突

中，所有罗马军官无一幸存，而白发苍苍的统帅也像他的叔父一样不愿活着做敌人的猎获物，他但求一死，于是遇难身亡。那些留在营中失去了首领的众兵，部分被俘虏，部分被驱散。始于卡里之日的事情，在西那卡一天便完结了（701 年 6 月 9 日），这两日均可与阿利亚卡奈和阿劳西奥的日期相提并论。再也没有幼发拉底军队了。只有在离开卡里时同大部队切断联系的盖尤斯·卡西乌斯骑兵队、其他一些分散的支队和零星的逃兵得以摆脱帕提亚人和贝督因人，单独返回叙利亚。在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四万多罗马军团士兵中，回来的不到四分之一；一半阵亡，近一万罗马俘虏被胜利者以帕提亚人的方式，作为有服役义务的农奴安置在帝国的最东部，在麦尔弗的绿洲上。自从鹰徽统领罗马军团以来，这一标志第一次成了异族的猎获物，在西方一支德意志部族和东方帕提亚人手中它同时又成了胜利的标志。至于罗马失利在东方所留下的印象，我们所知甚微，但它一定很深刻，而且经久犹存。正值国王奥罗德斯置办其子帕克罗斯和他新结盟的亚美尼亚国王的妹妹的婚礼之际，枢密大臣的胜利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同时人们还按东方习惯献上了克拉苏斯的脑袋。宴席已撤，一支漫游的小亚细亚演出队——那时这种演出队大量形成，它们带着希腊诗歌和希腊舞台艺术，一直深入东方——在为集聚堂前的宫廷臣仆表演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祭司》。剧中阿高俄在精神错乱的狂热中扯碎了自己的儿子，正用酒神的女祭司手中的神杖抬着他的头，从西泰隆回来。扮演阿高俄的演员调换了克拉苏斯血淋淋的头和孩子的头，在半希腊化的野蛮人观众那无尽的欢呼声中，他再次唱起了那支为人熟知的歌曲：

我们从山中
抬回家
极好的猎物

这只流血的野兽

这是自阿加梅尼斯时期以来，东方人对西方人取得的首次重要胜利，其中有着更深层的意义。为了庆祝胜利，西方世界最美的作品——希腊悲剧，在那些令人惊恐的怪诞描写中，通过它低下的代言人进行自嘲。罗马市民和希腊的天才同时开始套上苏丹主义的枷锁。

这场失败本身已是惊人的灾难，其后果似乎变得更为可怕，仿佛要动摇罗马在东方的权力基础。至少现在帕提亚人在幼发拉底河那一边，不受限制地行使着支配权。在克拉苏斯遇难之前，亚美尼亚就已脱离马罗联盟，在这之后，便完全转变为帕提亚的附属国。帕提亚为卡里配置的一个新首领，一个叫安德罗马库斯的，罗马人的背信弃义的指路人，使卡里的忠诚市民对西方人的忠实得到了严酷的回报。帕提亚人非常认真地准备从他们那一边越过幼发拉底河边界，以联合亚美尼亚和阿拉伯人，把罗马人赶出叙利亚。犹太人和其他东方人，在此更多地渴望着摆脱罗马统治，幼发拉底河的另一边的希腊人，一样迫不急待地期望着摆脱帕提亚人。在罗马，内战近在眼前，此时此地的进攻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使罗马感到幸运的是，双方都换了首领。苏丹奥罗德斯对那个先是给他戴上王冠，后又肃清敌人的英勇的臣属报有太多的感激，于是不得不尽快地通过刽子手来摆脱他。国王之子帕克罗斯填补了他在已定的入侵叙利亚军队中的位置，由于他年轻而缺少经验，不得不派首领奥萨西斯给他做军事顾问。另一方面，在叙利亚，临时由谨慎而果敢的财务官盖尤斯·卡西乌斯取代克拉苏斯，接管指挥权。这时，帕提亚像以前克拉苏斯一样，并不急于发动进攻，而是在701、702两年中，只派力量薄弱、轻易就会被打回的巡逻队越过幼发拉底河。这样，卡西乌斯就得到了时间，在一定程度上重组军队，在罗马的忠实追随者赫罗德斯·安提帕特罗斯的帮助下，再次驯

服那些因克拉苏斯占领神庙，怒而奋起的犹太人。罗马政府本来有足够时间派一支新征部队，去保卫面临威胁的边界，但因正在开展的革命所引起的惊厥，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终于，当 703 年大批帕提亚侵略军出现在幼发拉底河边时，卡西乌斯仍只能带着由克拉苏斯部队的残余兵将组成的两支弱小兵团，前去与之相抗。自然，他既不能阻止敌军过河，也难以保住行省。叙利亚被帕提亚人一举攻占，整个亚洲前沿都为之惊颤。只是帕提亚人不知包围城市。卡西乌斯带着他的部队进入安齐奥基亚，帕提亚人不仅事业未竟就撤了出来，而且在撤退过程中，在奥伦特河边被卡西乌斯的骑兵诱入埋伏圈而遭到罗马步兵的痛击，首领奥萨西斯也在阵亡之列。在这里，敌友都认识到，由一个普通统帅率领的，在普通阵地上作战的帕提亚军队，不比其他东方军队更有所建树。然而，进攻并未停止。在 703 年到 704 年的冬天，帕克罗斯就在幼发拉底河这一边的塞尔海斯提克安下营盘。叙利亚的新总督马尔库斯・比布鲁斯，一个无能的统帅和政治家，他只知龟缩在营垒中。人们普遍地期待着 704 年中的战争会以更新的强度爆发。只是帕克罗斯并未将武器对准罗马人，而是朝向自己的父亲，并因此而甚至与罗马总督达成一致。但罗马的荣誉并未因此而洗去污点，罗马在东方的威望也未得以重建，只是帕提亚在亚洲前沿的侵略结束了，至少暂时保住了幼发拉底河边界。

此间在罗马，革命那盘旋着的火山正施放着令人意志麻痹的烟云。人们开始不再用一兵一文来对抗国家敌人，不再为人民的命运费丝毫心机。这一时代最惊人的一个现象是，当时的政治家对卡里和西那卡的巨大国难不思不谈，倒是阿庇乌斯路上的严重骚乱引起了他们莫大的关注。克拉苏斯死后不久，帮派领袖克罗狄乌斯在这场骚乱中战死。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几乎是可以原谅的。很久以来，人们就感到两个当权者间的破裂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宣告他们即将破裂，现在它终以不可阻挡之势来临了。像古老的

希腊渔民传说一样，罗马乡镇的航船正处于相向游近的两块巨石之间，船上的人怀着无名的恐惧，注视着越来越高的旋起的激浪，等待着随时会撞击的巨响。它每时每刻的移动都吸引着千千万万的目光，在这样的环境中没人敢环顾左右。

在698年4月的卢卡会晤中，恺撒勉强对庞培作出可观的让步，从而使当权者明显摆平。此后，他们要保持关系长久，并不缺乏外部条件，倘若本身不可分割的帝国权力能够长久为他们所分享的话。另一个问题是，至少现在，当权者是否能决定团结一致，彼此毫无保留地承认权力平等。恺撒便是这样做的，因为他要以与庞培地位平等的代价来换取征服高卢的必要期限。这一点前面已阐明。但庞培在任何时候，即便只是暂时，也很难严肃对待同事之谊。他是一个狭隘而卑鄙的人，对他这样的人，宽怀大度是危险的：在他的狭隘意识中，聪明的戒律便是，一有机会就与那违心承认的竞争对手作梗。他卑鄙的灵魂渴望着时机到来，以报复因恺撒的宽容而使自己遭受到的屈辱。但是，如果说庞培以其迟钝而阴郁的天性，显然从未真正同意恺撒与己平起平坐，那么对庞培来说，粉碎联盟的意图只是逐渐在意识中变得清晰起来的。而通常说来，对庞培的意见和意图，广大公众要比他自己看得更为通透。人们不会不意识到，至少在美丽的尤利亚死后——700年秋她仍处青春之年便死了，随后，她唯一的儿子也跟进了坟墓——父亲和女婿间的私人关系便会解除。恺撒试图重结命运所割断的亲缘纽带，他向庞培唯一的女儿求爱，并表示愿意将自己此时最近的亲属，他的妹妹的孙女屋大维娅嫁给庞培；只是庞培把自己的女儿留给了她迄今为止的丈夫法奥斯图斯·苏拉，摄政者的儿子，自己则娶了昆图斯·麦特鲁斯·西庇阿的女儿。显而易见，私人关系已经破裂，是庞培主动收回了友好的手。人们等待的政治关系的破裂随后而至。但是人们错了：在公开事务中，他们暂时还保有同事的融洽。原因是在征服高卢成为既成事实之前，恺撒不想解除这种关系，庞培也不想这

样做，他要等到通过独裁将政府机关和意大利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之时才公开与恺撒决裂。于是当权者在这种情况下的互相支持便不足为怪。在700年冬的阿杜亚都卡灾难后，庞培将他的一支因放假而解散的意大利军团借给了恺撒；另一方面，恺撒也同意，并在道义上支持庞培，对扰人的主张共和的反对派进行镇压。直到庞培通过这一途径在702年初独任执政官，而且在首都有了完全超过恺撒的影响，同时在意大利服兵役的全部人员宣誓效忠之后，他才决定尽快与恺撒正式决裂。这一意图也足够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在阿庇乌斯道路骚动之后，法律对恺撒的共和派老同志毫不留情地予以追究，这也许还能以其愚笨勉强凑合过去。而反选举阴谋的新法律，则一直追究到684年，包括恺撒竞选执政官时的可疑过程，这该是不同于前一种情况的了，虽然不少恺撒派人士认为在此法中可见某种用意。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庞培并未如形势要求的那样，选他以前的岳父恺撒做他的执政同事，而是将完全依赖于他的新岳父西庇阿配为其右；人们更不能不看到，庞培同时将自己在两个西班牙的总督任期延长五年，直至709年，又从国库调拨一笔可观的固定金额，作为他的部队的军饷。与此同时，庞培不仅没有同样延长恺撒的指挥年限，批给他同样的金额，而且竟通过颁布一项关于总督权力分配的新条例，从远处力争在以前约定的日期之前，将恺撒调离其职。显而易见，庞培这样滥用职权，是计划着削弱恺撒的地位，继而将他推翻。如今时机已到。只是恺撒之所以在卢卡让给庞培许多，是因为克拉苏斯及其叙利亚军队如果和庞培关系破裂，必将落入恺撒一边的天平盘中；恺撒完全可以指望克拉苏斯，而且绝不会将他视为自己的敌人的联盟，因为克拉苏斯自苏拉时期就已和庞培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而和恺撒在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的结盟，则几乎已经历了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而且按他的特性来说，即使自己不能成为罗马国王，也会满足于做罗马新国王的银行家。在701年6月的灾难中，统帅及其

全军在叙利亚阵亡，这对恺撒来说是一次可怕的重击。几个月后，看似已完全征服的高卢爆发了比以往更为有力的民族起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与恺撒势均力敌的对手，阿尔维尼人的国王维辛哲托里克斯。命运又一次帮助了庞培：克拉苏斯死了，起义遍及高卢，庞培事实上成为了罗马独裁者和元老院的首领。——如果他现在不是从远处对恺撒大搞阴谋诡计，而是直接强迫市民或元老院，立即把恺撒从高卢召回，那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啊！　但庞培从不知抓住幸运的须发。他明确地预告要与恺撒决裂。702 年，他的行动就已让人对此无可置疑，703 年春他就直率地说出，要和恺撒决裂，但他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而是让时间白白溜走。

然而，尽管庞培在犹豫不决，危机却通过事物本身所具的重量，以不可阻挡之势缓缓前来。即将到来的不是一场共和国和帝国间的战斗——几年前就已对此作出了决定——而是庞培和恺撒争夺罗马王冠的战斗。但是没有一个要求帝位者能喊出正确的口号，用这一口号，他很可能会把那些希望继续保持共和国，而且相信有此可能的相当大一部分市民，推入对方的阵营中去。格拉古斯和德鲁苏斯，秦那和苏拉所订下的旧的战争口号，尽管已经用滥，而且毫无内容，但依然适于作为两个为独裁而决斗的将军的战场呼号；尽管庞培和恺撒现在都正式属于所谓的民众党，但是，毋庸置疑，恺撒将在自己的旗帜上书写民众和民主进步，庞培则是贵族和法定的宪法。恺撒没有选择。他从来就是一个严肃的民主主义者，他所理解的帝国和格拉古斯的民众统治的区别更多在于外表，而不是本质。他是一个太高尚、太深沉的政治家，因此难以掩饰自己的本色，而在另一个徽章下作战。当然，这种战场呼号并未给他带来多少直接的利益。在主要事务上，他仅限于借此避免直呼其王位，并用谴责的言辞让温和的大众和自己的追随者感到惊愕从而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自从格拉古斯的理想因克罗狄乌斯而变得可耻而可笑之后，民主旗帜几乎难以带来积极的赢利。现在除了波河以

北的居民以外，哪里还会有一个有点地位的圈子，会因这些民主口号而加入战斗呢？—— 因此，庞培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的角色已定，如果不是本就理所当然的话，他就不得不以合法的共和国的统帅身份出现在战斗中。如果大自然曾经做出过此类安排，那么它便是将庞培安排为贵族的一员，只是非常偶然，而且非常自私的动机使他从贵族阵营投奔到了民主营垒中。他现在重归于苏拉传统，不仅是事情所迫，而且在任何关系上都有重大好处。民主呼号已不再中用，但是，保守的口号如果由恰当的人发出，它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也许是多数派，但无论如何市民的核心属于那些忠于宪法派的人，他们数量众多，道义甚强，因而被号召起来，以有力的或者是以决定性的方式介入即将来临的，要求帝位者的战争。他们所缺的只是领袖。他们目前的首脑，马尔库斯·伽图，每日冒着生命危险，来履行他所理解的头领的职责，也许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他对职责的忠诚是值得重视的，但坚守失陷阵地对士兵来说，是值得称赞的，可对统帅来说却不是这样。对那支在意大利仿佛自发为垮台政府而成长的后备军，他既未加以组织，也没及时把它带入战场；直至一切都水到渠成了，他还出于很好的原因，从未使用过指挥权。如果撤掉这个既不会做党派首领，也不配做将军的人，代之以一个拥有庞培的政治军事地位的人，举起现行宪法的大旗，那么意大利市民必然会成功地拥向他。虽然不是为了国王庞培，但却是为反抗国王恺撒而随之作战。此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时刻到来了。以庞培的天性，即便他已作出决定，他也找不到执行其决定的途径。他或许懂得领导战争，却一定不知道如何进行宣战，而伽图的党派显然没有能力领导战斗，但却非常有能力，特别是非常愿意鼓励对抗正在形成的帝国的战争。按照庞培的意图，他要袖手旁观；按他的方式则是，时而说马上要动身到他的西班牙行省，时而又已准备启程，去接管幼发拉底河边的指挥权。与此同时，合法的政府机关，即元老院要和恺撒决裂，并向他宣战，元老们委托庞培

领导这场战争。而庞培则应普遍的要求，作为反对蛊惑性的帝国式的颠覆活动的宪法保护者，作为反对放荡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拥护现行制度的正直的男人和战士，作为反抗街巷将军的元老院地位优越的统帅而出现，并打算再次拯救祖国。于是，通过与保守派的联盟，庞培一方面除自己的追随者外，又得了一支军队，一方面他也有了合适的战争宣言。——这些都是他不惜与原则上的对手交锋的高昂代价所换取的优势。在合作的无数弊端中，暂时只发展着一个，而且已很严重的弊端，这就是庞培放手不管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对恺撒开火。在这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上，他依赖于偶然因素和贵族社团的情绪。

主张共和的反对派多年来不得不满足于观众这一角色，而且不敢吹口哨，现在由于当权者即将到来的决裂，他们又重新被拉回到政治舞台上。首先是以伽图为中心的共和派，他们决定在任何情况下，而且越早越好地参与支持共和国、反对帝国的战斗。698年的尝试所遭致的悲惨结局使他们明白，只靠他们自己，既不能进行战争，也难以挑起战争。尽人皆知，在元老院中，虽然除了少数例外，全部人员都厌恶帝国，但是，多数派只有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才愿意复辟寡头政治统治。当然这时间还很充裕。伽图派一方面面对当权者，另一方面面对软弱无力的元老院，他们首先而且是不惜代价地要求和平，他们厌恶任何决定性行动，最不愿与这个或那个当权者发生重大破裂。这样伽图派复辟昔日统治的可能性便在于，同不太危险的统治者联盟。如果庞培承认寡头政治宪法，而且自动为它同恺撒开战，那么主张共和的反对派便能够，而且必须承认他为自己的统帅，并且和他联合起来，强迫胆小如鼠的多数派宣战。人们都注意到，庞培对宪法的忠诚并非很认真。尽管他做任何事都不彻底，但他绝不会像恺撒那样清醒而准确地认识到，新帝国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彻底地最后清除寡头政治的破烂。无论如何，战争造就了一支真正的共和派军队和一个真正共和党的统帅。在战

胜恺撒后，能在更有力的前景中走向共和，不仅消灭一个君主，而且铲除正在成长中的帝国本身。寡头政治事业如此无望，庞培主动提出与之联盟，这对寡头政治来说便成了具有可能性的有利安排。

庞培和伽图党的联盟，相对来说极快地完成了。在庞培专政期间，两方就有了明显的接近。庞培在米罗危机中所表现出的全部行为，以及他断然拒绝独裁所提供给他的乌合之众，都坚决地声明了他只从元老院接受这一官职，并毫不留情地严厉打击以任何方式破坏安宁的人，尤其是极端民主党人。他还以引人注目的友好态度对待伽图及其同事，这一切看来是在计划着争取守秩序的人，而他们对民主党人恺撒来说，则是一种侮辱。另一方面，伽图及其忠实奴仆得到一份提出给予庞培独裁权力的议案，他们做了些不太重要的形式改变后，便将这份议案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而没有用习惯上的严肃来对此表示反对。在这之后，庞培从比布鲁斯和伽图手中接过完整的执政权。于是，702 年初，伽图派和庞培至少是沉默着融洽相处。在进行 703 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虽然伽图没有被选上，但除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元老院多数派的人以外，伽图的一个最坚决的追随者马尔库斯 · 克劳狄乌斯 · 马赛鲁斯当选。于是这一联盟便正式缔结了。马赛鲁斯不是一个激烈的狂热者，更不是一个天才，但他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严格的贵族派。若对恺撒的战争应该开始，他便是一个合适的宣战人选。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前不久为针对主张共和的反对派而制定的镇压惩罚条例，这次如此引人注目的选举，只能在获得统治者的同意，或至少是在其默许的情况下进行。庞培如他惯常的迟缓，但却不断地迈向这场决裂。

与之相反，恺撒还不想在这时候就和庞培闹翻。虽然他认真而持久地不愿与人分享统治权，而且最不愿意和庞培这样次要的人物共事，无疑，他早就决定在结束对高卢的征服后，要求独自统治，万不得已时便以武力相逼。但是，像恺撒这样的人，首先是个政治家，其次才是军官，他不会看不出，以武力调整国家机构，其结果将

沉重而且常常是永远动摇着国家机构，因而只要有可能就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或至少不经公开的内战，对这一混乱加以治理。即使是内战无法避免，他也不希望现在就被逼到这一步。此时，高卢的维辛哲托里克斯起义正使一切既得成就重新成为问题。从701—702年冬到702—703年冬，恺撒不停地忙于镇压起义，而庞培和基本上与恺撒为敌的宪法派，正控制着意大利。因此，恺撒企图保持和庞培的关系，如果可能，就以和平方式获得在卢卡就已许给他的706年的执政任期。如果他在按规定彻底解决凯尔特事件后成为国家首领，那么远胜于政治家庞培而不是统帅庞培的他，就只需弹指之力便可在元老院和广场论坛上战胜庞培。也许庞培会为这位笨拙糊涂而傲气凌人的竞争对手想到随便一个光荣而有影响的职位，在这一位置上，这位对手会满足于让自己渐渐消失。恺撒多次企图和庞培保持姻亲关系，似乎旨在促成这样一个解决方法，即通过延续后代，由竞争双方家族产生的孩子来最终平息这场持续多年的争执。如果这样的话，主张共和的反对派便会群龙无首，可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保持安宁，并使和平得以维持下去。如果不成，则须动用武力解决，这当然是可能的。那时，恺撒作为罗马的执政官而拥有温驯的元老院多数派，他们会给庞培派和共和党人的联盟制造困难。或许挫败其联盟，那样战争就会比他现在作为前执政官下令从高卢向元老院及其统帅开进，更得体更有利得多。当然，这一计划的实现需要庞培有此好心，能让恺撒得到在卢卡许给他的706年执政期。即便这一计划失败了，但不停地以事实证明自己最虔诚的恭顺，对恺撒来说仍然是很有利的。一方面，这会为他在凯尔特达到目的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对手便只剩下了令人厌恶的主动挑起决裂和发动内战的可能。这对恺撒来说，无论是面对元老院多数派还是物质利益党派，而且特别是面对自己的士兵都很重要。——于是他行动起来了。当然他要扩军备战：通过702—703年冬天征兵，他的军团，包括从庞培那儿借来的，增加到11

个。他明确公开赞同庞培专政期间的所作所为，赞同庞培重建的首都秩序，将热心朋友的警告当作毁谤予以回绝，计算着成功地推迟灾难的每一天。为了成功，忽视一切可忽视的，承受所有能承受的，只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一项有决定意义的要求，即在705年他的总督任期结束时，他要得到共和国宪法允许的，他的同事以条约承认的706年，也就是第二次执政期。

这一任期就成了现已开始的外交战争的战场。若恺撒被迫在705年12月以前卸任总督或者被延期到706年1月1日以后接受首都官职，他便在总督和执政官任职之间有一段无职时间，此时他将遭到刑事诉讼——根据罗马法律，这一诉讼只能针对没有官职的人进行——伽图又早已准备对他进行严厉追究，而庞培又是一个很靠不住的保护者，因此公众有足够的理由预言，他在这一事件中将落得类似米罗的命运。为达此目的，恺撒的对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每个竞选执政官的人都要在选举之前，即在就职前半年，自己到领导选举的官员处报名，将自己的名字正式登入候选人名单。而恺撒则可以免除这纯形式上，而且常常给候选人免去的义务，这在卢卡协议中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法令还没有发出，由于现在庞培拥有颁布法令的机器，恺撒在这方面便指靠着他的竞争对手大发善心了。不可理解的是，庞培主动放弃了这一完全保险的地位。在他专政期间(702年)，由他批准通过了一项护民官法，免除了恺撒亲自报名一项。然而此后不久就又颁布了新的选举制度，普遍地重复了候选人有义务亲自报名，没有附加任何对那些通过以前的公民决议得以免除该项义务的人有利的例外条款，按照形式法，为方便恺撒而颁布的特权，也通过这一更新的普遍法令被取消了。恺撒对此提出意见，附加条款被补进，但未经特别公民决议加以确认，这样通过纯粹的内插文字加在已公布法令之上的决定，法律上只能被视为无效。本能抓住的东西，庞培更喜欢先送出，然后再收回，而这收回终是以不忠的方

式加以掩饰的。——如果用这种办法只是间接地努力缩短恺撒的总督任期，那么与此相反，同时期颁布的对总督任期的调节法，则直指这一目的。最后，通过庞培自己和克拉苏斯共同提出的法令，恺撒的总督任期得到十年的保证。按对所常用的计算方法，这十年起自695年3月1日，终于705年2月底。此外，按照以前的方式，前执政官或前行政官有权在结束执政官或行政官任期后，直接进入划归他的行省。这样，恺撒的继任者不是从704年，而是从705年的城市官员中选出，因此恺撒不能在706年任职。就这点而言，恺撒在705年剩余的十个月中仍有指挥权。这不是根据庞培－里西尼乌斯法，而是根据一项老规定得到的，即有期限的指挥权也可以在到期后，延长到继任者到任之时。但是，现在按702年的新调节法，并不任命即将离职的执政官或行政官，而是委任五年前或更早就离职的执政官和行政官为总督。这便在公民职务和指挥权之间规定了一个间歇期，也就不像至今为止那样两相衔接。于是，每个法定空缺的总督职位，都被毫无妨碍地以另一种方式占据。在这种情况下，高卢行省的指挥权更换是在705年3月1日，而不是在706年1月1日。在这些活动中，庞培卑微的谋略和踌躇的诡计，同宪法派耐心细致的形式主义和宪法上的博学多知，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混合在了一起。在这一国家法律武器得以运用之前几年，人们便想好了它，并使之就座于宪法之中，部分原因是为了能在705年3月1日之前，即在庞培的法令给恺撒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通过派遣继任者迫使恺撒离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了能在706年进行的选举中，把写有他名字的选举牌按无效处理。恺撒无力阻挡这些招数，便沉默以待，任其发展。

渐渐地，这符合宪法规定的蜗牛步子继续前挪。按照惯例，元老院要在703年初讨论705年的总督之任，只要继任者轮到了过去的执政官。要是轮到以前的行政官，就在704年初对此进行讨论。703年的初步磋商第一次在元老院中对两个高卢的新总督的

任命进行讨论，同时在元老院中，由庞培推到前沿的宪法派和恺撒的代言人之间，也将产生冲突。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塞鲁斯提出，将迄今为止由前执政官盖尤斯·恺撒控制的两个总督职务从705年3月1日起，移交给被赋予705年总督权力的两个执政官。长期克制的怒火，一旦闸门打开便会滚滚泻出。在商谈中，伽图派对恺撒所持有的反对意见全部表露无遗。对他们来说，事实已定，例外法许给前执政官恺撒的权力，即无需自去报名参加执政官选举的便利，已通过后来的公民决议予以取消，而且在这一决议中，此项权力并没有以有效的方式得以保留。按照他们的意见，元老院应促使这一官员立即令服役期满的士兵退伍，因为高卢已被征服。而恺撒在上意大利授予市民权和建立殖民地，则被他们认为是违反宪法的，并视其无效。马塞鲁斯把对此进行深入说明的任务，交给了恺撒的殖民地科姆的一位有威望的市议员。即便是这个地方不应该得到罗马市民权，而只能得到拉丁权，这位议员也会被授权拥有罗马市民权，并享有只对非市民可行的施加鞭笞权。——恺撒当时的代言人中有盖尤斯·维比乌斯·潘萨，一个为苏拉排斥的人的儿子，但他却迈入了政治生涯，以前曾是恺撒军队中的将领，这一年任护民官，一位最为著名的人物。这些代言人提出，不仅是高卢的形势，而且公正也要求不仅不能提前召回恺撒，而且更应该除了执政官任期之外，还要留给他指挥权。他们毫无疑问地指出，几年前庞培也同样集西班牙总督权和执政官权力于一身，现在除了对首都给养事业颇为重要的监察之职，还在西班牙总督指挥权之外兼掌着意大利指挥权。他令意大利全部可服兵役的人对他宣誓效忠，至今仍未解除誓言。——破裂开始形成，但却因此而未能迅速发展。看到破裂到来的元老院多数派，几个月之久没有进行一次能够作出决定的会议。又是几个月的时间因庞培的郑重迟疑而溜走。终于，庞培打破了沉默，虽然仍保留了不确定的方式，但却足够明确地站在了宪法派一边，以反对他迄今为止的同盟。恺撒派提出

允许他们的首领以前执政官之职兼任执政官的请求，也遭到他粗暴地回绝。他以笨拙的粗鲁附言道，这一要求在他看来，并不比儿子提出棍击父亲的要求更好。马塞鲁斯的提议，他原则上赞同，但同时又声明，他不允许恺撒在前执政官期满后直接继任执政官。然而他在未加任何约束力的说明中又暗示到，万不得已时，也许会通过取消个人报名及把总督权限延长到705年11月13日，允许恺撒参加为706年进行的选举。这个不可救药的犹疑者同意将任命继任者延至704年2月底，这也正是恺撒的代言人所要求的。也许是庞培—里西尼乌斯法的一项附加条款，禁止了元老院在恺撒最后一年总督任期开始之前，对继任的任命进行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元老院的决议便被取消了（703年9月29日）。高卢总督的派任，被安排到704年3月1日的议事日程上来。但现在就像曾经通过公民决议处理卢库鲁斯的军队那样，开始遣散恺撒的部队，恺撒部队的遣散工作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即促使老兵就退役向元老院求助。虽然恺撒的代言人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护民官的否决取消了这些决议，但庞培非常肯定地说，官员有义务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否决和类似的过时的惯例，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此时，庞培已成为寡头政治派的喉舌。这一党派毫不含糊地泄露出，意欲在一次可能的胜利之后，按他们自己的心意来修改宪法，并铲除一切哪怕只是看似公民自由的东西。无疑地他们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对恺撒进行的攻击中停止利用民众大会。庞培和宪法派正式声明合作，显而易见，对恺撒的判决业已作出，只是推迟了公开的日期。为下一年进行的选举，普遍以反对他而结束。

在对手的备战式的党派演习中，恺撒成功地镇压了高卢起义，在整个征服领域里重建和平。703年夏天，一支高卢军团巧借防御边界之名开赴北意大利，但这显然是为了表明，在高卢，军团已开始不再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以前没有，现在无论如何恺撒也不得不认识到，他仍免不了与乡人操戈。尽管如此，他现在仍在犹豫，因为

好不容易才平息下来的高卢极需军团再留一段时间。他熟知元老院多数派极端热爱和平，因此寄希望于，他们能不顾庞培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而阻止宣战。为了不至于现在就和最高政府机关公开发生矛盾，他甚至不惜作出巨大牺牲。704 年春，元老院在庞培的鼓动下，请求庞培和恺撒为即将到来的帕提亚战争各抽出一个军团。遵循这一决议，庞培向恺撒要回了几年前借给他的那个军团，然后把他们用船载运到叙利亚。恺撒满足了这双重的要求，因为无论是元老院的决议，还是庞培的要求都无可争议。而且相对几千士兵，恺撒更重视法律以及形式上的奉公守法。两个军团毫不拖延地来到，听从政府的调配。但政府并没有把他们派往幼发拉底河，而是为了庞培将其留在卡普亚待命。公众又一次得以将恺撒为防止破裂的明显努力，同其对手阴险的战争准备作一比较。为了与元老院的谈判，恺撒不仅成功地收买了那一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的卢西乌斯·埃米利乌斯，而且还特别贿赂了护民官盖尤斯·库里奥，他可能是这一时代众多放荡天才中最卓越的一个：他的高雅、流畅而高明的讲话，他的阴谋手段，他的精力——这种精力在具有充沛活力但却堕落的人身上只会更有力地表现出来——这一切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混乱经营和借贷天资——人们估计他负债已达 6000 万塞斯特尔茨(450 万塔勒)——及道德上、政治上的无原则性也都是无可匹敌的。以前，恺撒就表示愿意出钱来换取这一切，但遭到了拒绝：他在对恺撒的攻击中所展示的才能，使得恺撒耿耿于怀地要将他收买到手——价钱很高，但货也值。库里奥在任护民官的最初几个月中，扮演了一个独立的共和派角色，并以此身份对恺撒和庞培进行猛烈的攻击。这给予他以看似非党派的地位，这一地位被他以罕见的精明加以利用，以便在 704 年 3 月元老院重新讨论关于下一年高卢总督之职的提案时，完全赞同这一决议，同时要求这项提案扩延到庞培及其特别指挥权。他认为合乎宪法的状况，只能通过消除一切特殊地位而获得。只被元老院委任为前执政官的

庞培将比恺撒更少拒绝服从元老院的命令，单方解除两位将军中的一个，只会加重对宪法的威胁。他的这些意见使政治上的半智半愚者和广大公众恍然大悟，而且库里奥声明：他打算通过符合宪法的否决阻止对恺撒所采取的任何单方面措施，这在元老院内外多次得到赞同。恺撒立即声明，同意库里奥的建议，并主动提出，随时都可应元老院的要求放弃总督职位和指挥权，如果庞培也这样做的话。他可以这样做，因为失去了意大利—西班牙指挥权的庞培不再可怕。与此相反，庞培正为此而不能不拒绝。他回答说，恺撒要先放权，他打算很快就以恺撒为榜样，但他连退职的具体日期也没有明确，这便使得他的答复更难以让人满意。抉择又一次中止了几月之久。认识到元老院多数派的意见引人忧虑，庞培和伽图派不敢把库里奥的提案送交元老院表决。恺撒利用这个夏天，查明他所征服的地区的和平状况，在谢尔德河畔他对他的部队进行检阅，并通过完全忠于他的北意大利总督举行一次凯旋仪式。秋天他在他的行省的南方边界城市拉文那，开始了难以再拖延下去的对库里奥提案的表决。庞培和伽图派全面失败。元老院以三百七十票对三十票决定，要求西班牙和高卢的前执政官同时放弃官职。罗马善良的市民听到库里奥拯危救难的喜讯，不禁欢呼雀跃。庞培并不比恺撒更轻松地被元老院解职。正当恺撒准备服从命令时，庞培坦率地拒绝服从。担任主持的执政官盖尤斯·马塞鲁斯——他和马尔库斯·马塞鲁斯是堂兄弟，两个同属伽图派——对元老院卑躬屈膝的多数派进行了严厉训斥。可恼的自然是在自己的营中遭打，而且是借助于胆怯的前沿方阵。但他们的首领庞培不是迅速而坚定地对元老院成员下达命令，而是在他的晚年，第二次去向一位演讲艺术教授讨教，以期用新润饰的口才与库里奥朝气蓬勃的卓越天资相抗。在这样一位首领统率下，胜利从何而来？

元老院中被击败的联盟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伽图派承担了把事情引向破裂，把元老院与自己推向前去的任务，然而现今却

至为恼火地看到他们的船搁浅在软弱无力的多数派这一片沙滩上了。他们的首领不得不在会议上倾听庞培极为严厉的谴责，他坚决有力而且理由充分地指出了虚假和平的危险。即便应该由他迅速采取行动割断这个结，他的同盟也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再也不可以对他抱有这个希望，还是应该像他们允诺的那样，由他们来作一了结。在捍卫宪法和元老院统治的先锋斗士早已宣布公民和护民官的合乎宪法的权利为空洞的形式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必然要以相似的方式对待元老院的合乎宪法的决定，因为合法的政府无意被人拯救，他们只能违背其愿意去挽救它。这并不新鲜，也不偶然。苏拉和卢库普斯曾像现在伽图及其部下这样，以完全相似的方式，不得不对超越政府作出每一个完全对其有利的果断决定。宪法机器已彻底失灵，像几百年以来的民众大会一样。现在元老院不过是一只无力的正在脱轨的轮子——据说(704 年 10 月)，恺撒已将四个军团从外高卢调到内高卢，安置在普拉森齐亚。尽管这一部队的调动本属总督权限之内，另外库里奥在元老院中也明确阐述了这纯属谣言，毫无根据，元老院也以多数驳回了执政官盖尤斯·马塞鲁斯的提案，即为此而命庞培向恺撒进军的提案，但是，前面已提到的执政官和两个为 705 年选出的同样属于伽图党派的执政官来到庞培这里。这三个人恳求这位将军凭借自己的绝对权力，以成为卡普亚常备军团之首领。根据判断，还可以把意大利防卫军征召入伍。很难想象出一个开始内战的违礼的全权，但人们已没有时间去顾虑如此无关紧要的事情：庞培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是战争的准备便开始进行了，首先便是征募兵员。为了亲自督促战备，庞培于 704 年 12 月离开了首都。

恺撒完全达到了目的，把内战的发起推到了对手身上。在自己坚定地立足于法律之上的同时，他强迫庞培宣布战争。而庞培不是作为合法权力的代表，而是作为公开革命的、对多数派施加恐吓的元老院少数派的统帅来宣战。这一成功不可低估，尽管任何时候广

大公众的直觉都不能弄错，也不会弄错。很清楚这场决战决不是为了形式上的法律问题，其中必然另有缘由。现在，战争已宣告开始，对恺撒来说开战越快越好。对手刚刚开始备战，首都甚至还空无防备。在十至十二天内，那里将聚集起一支三倍于恺撒在上意大利的后备军的部队；但还不是没有可能在毫无抵御的情况下奇袭罗马，或许可以通过一次迅猛的冬征占领整个意大利，在对手利用其最好的救命源泉之前，将它们一个个封死。头脑灵活、精力充沛的库里奥在离任护民官后（704 年 12 月 9 日），立即去拉文那找到了恺撒，热烈地向他的首领介绍了事情的发展状况。他费尽口舌极力想使恺撒相信，此时再拖延只会有害而无益。但由于恺撒不想给对手以抗议的时机，因而至今没有向拉文那调派军队，现在他只能对他的全部军团下令尽快起程，但必须等待至少是驻在上意大利的一个军团抵达拉文那。在此期间，他向罗马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这一通牒别无益处，倒也有利于他以最大限度的迁就，进一步使他的对手在公众舆论中丧失名誉，同时，由于他看似犹豫，也许会使对手的军备变得更慵散。在最后通牒中，恺撒取消了以前所有的对庞培提出的反要求，并主动表示，愿意在元老院规定的期限到来之时，不但放弃外高卢的总督权，还将解散属于他的十个军团中的八个。他声称，如果元老院能让他一直到 706 年进行的执政官选举结束而不是到接任执政官之时，那么他或者保留近高卢和伊利里亚的总督权及一个军团，或者只保留近高卢总督带两个军团，不管选择哪一个他都将很满足。他也接受了那些调解建议。在谈判初期阶段，元老派和庞培自已都曾声称，对这些建议很是满意。恺撒还表明，准备在执政官选举与到任期间保持私人身份。至于恺撒是否严肃地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妥协，而且敢于在作出这些让步的情况下，演完这出对抗庞培的戏剧，那就很难做出肯定的判断了。或者他已估计到另一边的人过于轻狂，以至在这些调解建议中，只能找到证据说明恺撒已自认失败。可能的是，恺撒宁可犯下过分大

胆游戏的错误，也不愿犯严肃的错误，即作出他无意履行的承诺。也可能是，如果他的建议不可思议地被接受了，那么他的言辞显然也安排得很得体。库里奥再次挺身为他的主人代言。三天内他便飞越了从拉文那到罗马的大道，当新执政官卢西乌斯·林都鲁斯和小[①] 盖尤斯·马塞鲁斯于 705 年 1 月 1 日第一次召开元老院会议时，库里奥向全会递交了统帅致元老院的公函。护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在城市的丑闻编年史中，他以库里奥的亲密朋友和其蠢行的同伙而为人熟知，但他在埃及和高卢远征中，又以出色的骑兵军官而著名。护民官昆图斯·卡西乌斯，庞培过去的财政官，他们两人现在代替库里奥在罗马办理恺撒的事情。他们强令立即宣读这份紧急公函。函中，恺撒以严肃而明确的语言，阐明了即将发生的内战，人们普遍对和平的渴望，庞培的目空一切以及他自己对真理那难以抗拒的力量的顺从。恺撒的调解建议，以其严缓适度令其追随者颇感惊讶。他肯定地声明，就此最后一次伸出和平的手。这一切都给人以至深的印象。尽管出于对大量拥入首都的庞培的兵士的畏惧，多数派的态度并不成问题，但人们不可以冒险让他们发表意见。关于恺撒修改的建议（即两位总督同时放弃各自的指挥权），关于他的公函中置人眼前的调解建议以及关于马尔库斯·西利乌斯·音福斯和马尔库斯·卡利狄乌斯的提议（即马上让庞培动身去西班牙），对这一切执政官们都拒绝进行表决，而这正是他们作为主持者允许做的。甚至一个最果敢的志同道合者，只不过不像他的党派那样的对眼前的军事状况视而不见的马尔库斯·马塞鲁斯的提案：延缓作出决议，直至意大利的战时后备军处于战备状态而且能保护元老院之际，也未获允许对其进行表决。庞培通过他平常的喉舌昆图斯·西庇阿声明，他决定或是不失时机

① 为与同名的 704 年的执政官相区分。此人是堂弟，705 年的执政官，他是 703 年的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塞鲁斯的兄弟。

或是永远不接手元老院的事务，如果人们还要长时间地犹豫下去，便将任其垮台。执政官林都鲁斯直截了当地说，这绝不取决于元老院的决议。如果元老院仍要一味地奴颜婢膝，他将自己行动，并联合他强有力的朋友进一步推动事情的发展。在如此的恐吓之下，多数派按照命令作出决定：恺撒要在不久的某一天，将远高卢交给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阿希诺巴布斯，近高卢交给马尔库斯·塞维利乌斯·诺尼阿努斯，还要把部队解散，否则他将被视为谋反犯。当恺撒派护民官利用他们的干涉权反对这一决定时，至少如他们声称，他们不仅在元老院中被庞培派来的兵士以剑相逼，为了活命被迫身着奴隶服装逃出首都，而且饱受惊吓的元老院像对待一次革命企图那样，采取他们形式上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的干预措施，宣布祖国面临危机，并以通常的形式征召全部市民入伍。率领一切武装者的是所有忠于宪法的官员（705 年 1 月 7 日）。

现在该收场了。那些逃到恺撒营中乞求保护的护民官，报告了恺撒的建议在首都所得到接受的情况。于是恺撒便召集了此间从特吉斯特（的里雅斯特）宿营地赶来的第十三军团士兵，向他们说明了事情的现状。他不仅是天才的知人心愿者和精神控制者，其出色的演讲在他和世界命运的震撼人心的转折点上高高闪耀，熊熊燃烧；不仅是慷慨大方的军队首领和充满必胜信心的统帅，在对着自己征召的而且八年以来怀着越来越高涨的热忱跟在他旗下的士兵发表讲话。讲话的首先是一位精力充沛，坚持不懈的政治家，二十九年以来，无论在幸与不幸的时代他都始终支持自由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而面对谋杀者的匕首，贵族的刽子手，德意志人的利剑和不知名的海洋的洪流，他都不曾后退，不曾动摇；他撕毁苏拉宪法，推翻元老院统治，庇护并保卫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战斗的手无寸铁、毫无抵抗能力的民主派；他所面对的，不是克罗狄乌斯派（其共和热情早已燃成灰烬），而是面对着来自北意大利城市与乡村的年轻队伍。这年轻的队伍认为公民自由的宏大思想仍清新而纯洁，

他们有能力为理想而战直至献出生命，他们甚至以革命的方式，为自己的地区从恺撒那里接受了政府拒绝给他们的公民权，如果恺撒垮台就会再度使他们遭受鞭笞斧斫，对此他们已有事实为证。他们清楚，寡头政治打算怎样无情地利用这些刑具来对付波河以北的居民。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这样一位演讲者阐明：贵族为征服高卢给予统帅和军队酬谢，民众大会被可鄙地解除，元老被施加恐吓。人们应当用握有武器的手保护五百年前由父辈们手握武器从贵族那里夺来的护民官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职责，坚守每个人代表自己和子子孙孙所发出的古老誓言，为担保城镇的论坛，前仆后继地战斗，直至最后一息。然后，这位民众党的首领和统帅号召公众的士兵，在竭尽善意的努力及屈从已至极限之时，跟随他对既可恨又可鄙，既阴险又无能，既可笑又无可救药的贵族展开最后的、无可避免的决定性的战斗。——此时没有一位军官，没有一个士兵会退缩不前。起程的命令业已发出，恺撒行在先头部队的最前面，越过了隔在他的行省和意大利之间的小溪。在溪水的那一边，宪法曾经驱逐了高卢的前执政官。当他在阔别九年之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同时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骰子已经掷出了。”

第　十　章

勃隆度辛，伊利尔塔，法萨鲁斯和塔普苏斯

迄今为止，共同统治罗马的两位统治者要用武力决定，谁来做罗马的第一个独裁者。在将要发生的恺撒与庞培之间的战争中，我们将会看到双方力量的对比情况。

恺撒的力量，首先是基于他在其党派内享有的无限权力。如果说这一党派融合了民主制和君主制的思想，那么，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组成、同时又可能偶然解体的联盟的产物，而是建立在没有代表性法典的民主制最深层的本质之上，所以，民主制和君主制同时在恺撒身上找到了它们最高的、也是最终的表现形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恺撒都绝对拥有第一裁决权和最后决定权。不论他给予每一件有用的工具以多么高的荣誉，然而工具终究是工具；恺撒在本党派内没有同志，他只是被他的一帮军政副手们包围着，而这些人，一般是从军队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被训练成军人，从不过问事情的原因和目的，而是无条件服从。所以，特别是在内战爆发的关键时刻，恺撒的全体士兵和军官中，只有一个人拒绝服从他。这只能证明，在恺撒与其追随者们的关系中，他的确是所有人的首领。提图斯·拉宾努斯曾同恺撒一起分担过那阴暗的卡提林那时代的所有艰难困苦，也分享过战胜高卢人的光荣。他经常独立发布命令，常常统率一半军队。毫无疑问，他是恺撒众多副手中最年长、最能干、

最忠诚的一个，同时，他的官职也最高、最受尊敬。704 年，恺撒还将内高卢地区的最高指挥权授予他，这一方面是要把这一重要职位交给可靠的人，另一方面是以此支持拉宾努斯获取执政官的职位。而恰恰在此时，拉宾努斯同敌对派结成了联盟。当 705 年双方开始敌对活动时，他没有站在恺撒阵营中，而是站到庞培一边，并且在整个内战期间，怀着无比的怨恨，同他的老友兼上司战斗。我们手中没有关于拉宾努斯的性格和关于他改换党派的具体材料，但是，这一事件无疑能够进一步证明，作为战争首领的恺撒，他的军官们要比元帅们可信赖得多。种种迹象表明，拉宾努斯是那种具有军事才能而毫无政治家能力的人，这种人如果想从政或不得不从政，就会患癫狂性头晕症，拿破仑手下的元帅中就有一些这种可悲而又可笑的例子。拉宾努斯肯定是要求保持他在民主派内仅次于恺撒的位置。当他的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投向了敌方阵营。由此第一次表现出恺撒对待其部下的态度之弊端所导致的全部严重后果。恺撒把他的军官们看成没有独立性的副手，因此阻碍了那些适合于掌握某些独立指挥权的人晋升，然而在他面临的那场显而易见将在帝国各行省内展开的战争中，他恰恰急需这种人。尽管如此，这一弊端还是能够被以此为代价、且只能以此为代价而获得的条件所弥补，这就是最高领导层的团结，这是赢得每一次胜利所必备的首要条件。

这一团结的领导层之所以能获得全部的权力，是因为所有的工具都性能良好、可用。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军队。恺撒的军队总计有九个步兵军团，或者说最多五万人，但是，这些部队都与敌人交过锋，其中三分之二的士兵还参加过同凯尔特人的全部战役。骑兵部队由德意志和诺里库姆雇佣兵组成，其战斗力和可靠性已在同维辛哲托里克斯的战争中得到检验。虽然凯尔特人在军事上远远不及意大利人，但他们英勇顽强，所以，同凯尔特人的八年战争充满了各种变化，这次战争使恺撒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设想去组织

他的军队。士兵的一切能力，都是以强健的体魄为前提的：恺撒征兵时，对新兵体格的强壮和身体的灵活性，看得比能力和道德更为重要。但是，军队同任何一架机器一样，其能力首先在于行动的敏捷和迅速：在随时能够立即采取行动和行军的速度方面，恺撒的士兵达到了罕见的、从未被超过的完美境地。勇敢当然是最重要的：恺撒运用无与伦比的技巧，激发起士兵在战争中的竞争心理和集体精神，使每个士兵、甚至那些地位低下的士兵都认识到，优待和奖赏个别士兵和分队，是体现勇敢程度的必要的等级制度。为了使士兵们克服恐惧心理，恺撒经常在不很危险的情况下，不告知士兵们将要发生战斗，让他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与敌人交锋。但是，与勇敢同等重要的是服从。恺撒要求士兵执行命令，而不去过问原因和意图；士兵常常要承担一些毫无目的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仅仅是为了训练他们的盲目服从性。军队的纪律很严格，但并不令人感到不快：战场上面对敌人时，要毫无保留地遵守纪律；但在其他时候，特别是胜利以后，所有的限制都放松了，如果一个一贯优秀的士兵愿意洒上香水或者用精致的武器及其他物品装饰自己，甚至他由于过火的暴行或违法行为而犯了罪，但只要他的行为没有危及到军事局势，那么，这事就会不了了之。恺撒对乡巴佬们的报怨充耳不闻。可是如果发生叛乱，那么不仅是主犯，就连协从也绝不会得到宽恕。然而，一个真正的士兵不仅应该英勇、服从，他还应该愿意或自愿接受这一切；只有那些天才们才有可能通过实例和希望，特别是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运用其才能，把他们所统治的那些有灵魂的机器，变成自觉自愿的服务工具。如果说作为军官，想要求士兵们勇敢，自己就必须同他们一起面对危险的话，那么，作为全军统帅的恺撒，也会像最勇猛的战士一样，抽出战剑冲上战场；涉及具体行动，哪怕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恺撒对自己的要求总是远远高于对士兵的要求。战争的胜利当然首先是给统帅带来好处，但是，恺撒一直努力，使士兵个人的希望也与胜利联系起

来。前面已经提到过，在那个平庸的时代所允许的范围内，恺撒懂得尽量激发士兵对民主事业的热情，他还把争取波河以北地区——那是他大部分士兵的故乡——与意大利本土的政治平等作为斗争的目标之一。当然，除此之外，物质奖励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既包括对出色的军事行动的特殊奖励，也包括给每个勇敢士兵的一般奖励；对军官是论功行赏，而士兵们都得到赏赐，恺撒还许诺，如果得胜，将有最奢华的馈赠。但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军队统帅，恺撒懂得，要让这一架庞大机器上的每一个无论大小的齿轮都感到，对它们的使用是有意义的。一般人是被用来达到一定目的的，但当他意识到，是一位大师在操纵他时，他就不会拒绝充当工具。无论何时何地，恺撒那犀利的目光总是统观全军，他绝对公正地进行奖励和处罚，为每个人的行动指明最佳道路，所以，哪怕是一滴血汗都不会被当作试验品或被无谓地浪费，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需要，就要求每个士兵无条件地献出一切，甚至生命。恺撒不让士兵们了解整个事件的全部情况，但却让他们充分认识政治和军事的联系，以便使他们认识到，恺撒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统帅，从而崇拜他。恺撒绝对不会把士兵看做和自己同样的人来对待，但是，他认为，士兵有权力要求知道事实真相，并有能力承受它，士兵必须相信统帅的诺言和保证，不能猜测它是不是欺骗，不能听信谣言；与恺撒多年共同作战、共享胜利的战友中，没有一个人他叫不出名字，也没有一个人在无数次征战中没有与统帅建立起或多或少的个人直接关系。对好同伴，他充满了信任，常与他们兴致勃勃地聊天；对被保护人，恺撒把报答他们的功劳和为他们报仇伸冤看作自己的神圣义务。或许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支如此完美的军队：这是一架能胜任其职责并顺从的机器，它掌握在一位大师手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到了机器上。恺撒的士兵们事实上的确能够以一当十，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有此能力；当然，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在当时以格斗、特别是短剑搏斗的战术为主的情况

下，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超过那些新手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作出的想象[1]。但是，比卓越的勇敢更使敌人感到气馁的是，恺撒的士兵们对他们的统帅怀有无法动摇的、令人感动的忠诚。当恺撒号召他的士兵们跟随他参加内战时，除了上面提到的拉宾努斯那个唯一的例外，没有一个罗马军官和士兵背叛他们的统帅，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敌人希望恺撒军队中开小差现象增多的愿望，如同他们以前企图瓦解卢库鲁斯的军队的尝试一样，可耻地落空了；尽管拉宾努斯投奔到庞培阵营中时，带去了一批凯尔特和德意志骑兵，但是却没有一个罗马士兵。那些罗马士兵似乎想告诉世人：战争不仅是统帅的事，同样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还私下商定，在战争结束以前，把军饷借贷给统帅——战争爆发时，恺撒曾许诺，把他们的军饷翻一番——在此期间，大家凑钱来帮助贫困的战友。此外，每个军士都自己出钱承担一个骑兵的装备和军饷。

如果恺撒只拥有下面两个必备条件中的一个：无限的政治、军事权力和一支英勇善战、足以信赖的军队，那么，他的势力相对来说，就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扩展。恺撒的势力主要在上意大利省。那里不仅是全意大利人口最多的地区，而且，他全力投入民主事业，将其看作自己的事。奥皮特吉乌姆（特雷维佐代表团中的奥德佐地区）一个新兵分队的举动足以证明该地区的气氛；战争爆发后不久，这支乘坐一只简陋的小竹筏的新兵分队，在伊利里亚水域被敌人的战舰包围。整整一天，他们忍受着敌军的乱箭射击，直至

[1] 恺撒第十军团的一个百人队队长被俘后对敌军指挥官说，他可以带领他的10名士兵，同敌人最优秀的一个步兵队（500人）较量。"按照古人的搏斗方式"，拿破仑一世说，"一场战斗全部是一对一的格斗；那位百人队队长所说的事实，如果由今天的士兵说出来，就是吹牛。"附于恺撒回忆录后的关于非洲战争和第二次西班牙战争的报道——非洲战报可能是一位上级军官写成的，第二次西班牙战争的报道的作者是一位毫无创见的军营记者——生动地证明了恺撒军队中的士气。

太阳落山，无一人投降。他们稍一摆脱箭雨，就在当天夜里，自己结束了生命。他们使世人明白，这样的民众具有怎样的承受力。他们曾给恺撒提供过资金，使他把原有的军队扩充了一倍多。内战爆发后，在大规模的紧急征兵中，大批新兵又踊跃应征入伍。但是，在意大利本土，恺撒的影响远不能与对手相比。尽管他运用巧妙的手段使伽图一派陷于非正义的境地，并且使所有想凭着一个借口，以便可以心安理得地保持中立者——像元老院大多数人那样——或是紧紧追随他这一派的人——如恺撒的士兵和波河以北地区的人——完全相信他是正义的。但是，民众并没有被他迷惑，尽管当时对孰是孰非还争论不休，可是，当恺撒作为高卢总督指挥着他的军团向罗马进军时，民众们仍认为，伽图和庞培是合法的共和制的捍卫者，恺撒则是民主派的篡权者。另外，人们普遍预测，作为马利乌斯的侄子、秦那的女婿和卡提林那的同盟，恺撒会重演当年马利乌斯—秦那式的恐怖屠杀，实现卡提林那提议的无政府主义的胜利狂欢。尽管恺撒也算是赢得了一些同盟者，大批政治流亡者马上投奔他，绝望的人们视他为救世主，城乡最下层民众听到他进军的消息后激动万分，但是，这些所谓的朋友，比敌人更危险。恺撒在各行省和附属国的影响比在意大利更小。阿尔卑斯山北部直到莱茵河和运河的高卢地区，尽管臣服于他，那波的移民和其他定居在那里的罗马公民也已向他投降。但是，仅在那波省，宪法派就有众多的追随者，而那些新近被征服的地区，在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中，与其说是恺撒的有利条件，不如说是压在他身上的沉重包袱。出于这种原因，他根本无法利用凯尔特步兵，凯尔特骑兵的用处也很小。在其余的行省和毗邻的半独立和独立的国家，恺撒也试图获得支持，他曾捐赠给那里的君主王侯们丰盛的礼物，在某些城市大兴土木，建造房屋，必要时，甚至向他们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可是，总体来说，这一切当然都未取得很大成效．他同莱茵河以及多瑙河地区的德意志和凯尔特君主们的关系，特别是同诺里库姆国王弗

西欧的关系——因为要从那里招募骑兵而尤其重要——对恺撒来说，显然是唯一具有一定意义的关系。

如果说恺撒仅仅是作为高卢总督参战的，那么他除了拥有一批能干的副手、一支忠诚的军队和一个忠于他的行省外，再无其他重要的辅助工具，而庞培作为罗马帝国的真正首脑，则掌握着大罗马帝国的合法政府所拥有的一切后备来源。但是，尽管他的地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远远强于恺撒，但它同样也是远远不够明确、不够稳固的。高级领导层的团结是由于恺撒的地位状况，自然而然地，并且非常必要地形成的，但这与联盟的本质是不相容的。尽管庞培也试图强迫联盟领导层团结——庞培身上的军人气质极强，所以他不可能不认识到这种团结的必要性——并使元老院任命他为陆海军唯一的、拥有至高权力的最高统帅。但是，元老院本身不能被取消，而且，也不能阻止它对高级政治领导层施加重要影响，并偶尔对军事指挥进行干预——正因为这种干预是偶尔的，所以就更加有害。庞培和元老院对当年庞培与宪法派之间长达二十年之久、两方都使用了毒辣武器的战争还记忆犹新，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但又努力忘记的是，战争胜利的第一个后果将是胜利者之间的反目；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互看不起，而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又多在贵族派一边，这使庞培感到不快。同时，几乎所有参与者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具有自卑心理，这一切，使恺撒的敌人们非常不情愿地、互不服气地结合起来。这与恺撒一方的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相比而显得极为惨淡——尽管恺撒的敌人组成的这一联盟内存在着极大的不利因素，但它仍拥有强大的势力。它完全控制着海域：所有港口、所有战船和全部的船队物资都掌握在它手中。两个西班牙行省是庞培的领地——如同两个高卢行省是恺撒的领地——它们绝对忠于其主人，并由精明可靠的人管理着。在其他行省，当然除了两个高卢，由于近几年庞培和元老院少数派施加了影响，总督和司令官的职位也都被他们信任的人所占据。附属国都坚

定地站在庞培一边反对恺撒。那些最重要的首领和城市，都处在庞培广泛影响的不同阶段，与他结下了最密切的关系——在同马里乌斯派的战争中，他同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国王曾是战友，并帮助重建了努米底亚帝国。在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中，他不仅解放了一大批宗教的和世俗的小侯国，还重建了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和卡巴多西亚三个王国，建立了狄奥泰鲁斯的加拉西亚王国。在他的策动下，才进行了埃及战争，并且，凭借他的副手们，拉各斯家族的统治才重新得以巩固。尽管恺撒行省内的城市马西利亚，要把它获得的某些好处归功于恺撒，但是，自塞多利乌斯战争以来，是庞培使该城的地盘不断扩大。此外，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与罗马统治政权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这种联合由于各种中间关系而得以巩固。但是，这种个人的利益与关系，以及庞培作为世界三大地区的胜利者的荣耀——这一荣耀在帝国的偏僻地区，使得高卢的征服者黯然失色——对恺撒造成的不利，也许还不及恺撒那已广为人知的观点和意图，即，他作为盖尤斯·格拉古斯的继承人，他指出了非独立国重新联盟的必要性和各行省殖民化的利益之所在。非独立国的君主中，没有人比努米底亚国王尤巴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威胁。他不仅早在他父亲希姆普萨尔在世时，就曾同恺撒本人发生过极其激烈的冲突，而且，就在不久以前，几乎在恺撒的副手中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库里奥，在罗马全民大会上提出了将努米底亚王国并入罗马帝国的提案。如果说现在终于到了要独立的邻国参与罗马内战的地步，那么，其中唯一确实强大的帕提亚国，通过帕克罗斯和比布鲁斯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与贵族派结成了同盟。而恺撒身上的罗马人性格太强烈了，他不愿为了本党派的利益而与打败自己朋友克拉苏斯的人混在一起。——至于意大利方面，如上所述，大多数民众反对恺撒，首先当然是全体贵族和他们为数众多的追随者，紧随其后的还有金融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进行国家体制的彻底改革，他们就不可能再保持偏袒他们的刑事

陪审法庭和进行敲诈勒索的垄断权。对民主派怀有敌意的还有小资本家、地主和所有会丧失自己利益的阶层。只不过在这些阶层中，一般来说，对最近的还息期限、播种和收获的关心超过了任何其他顾虑。——庞培掌握的军队主要是西班牙部队：七个善战且绝对可靠的军团，另外还有远在叙利亚、亚洲、马其顿、非洲、西西里岛等地的一些无疑不堪一击且非常散漫的分队。在意大利，一开始只有恺撒不久前刚交出的两个军团具有战斗能力，这两个军团的实际战斗兵力不足七千人，而且其可靠性还颇令人怀疑。因为士兵们都来自内高卢，曾是恺撒的老部下，他们对用卑鄙的诡计让他们换防极为不满，而且强烈地思念原来的统帅恺撒，恺撒早就许诺胜利后给每个士兵一份礼物，在他们这次开拔前，他就慷慨地把礼物预付给了他们。庞培的西班牙军团可以在春季由陆路穿过高卢，或者由海路到达意大利，除此之外，在意大利，还有 699 年那次征兵剩下的三个军团和 702 年招募的意大利士兵，可以把这些士兵从休假中召集回来。这样，除了七个西班牙军团和那些驻扎在其他行省的散漫的部队，仅在意大利，庞培手中的部队就有十个军团[1]，或者说约六万人，所以，庞培宣称，他只要跺跺脚，全副武装的士兵就会覆盖整个地面，这丝毫不夸张。当然，要把这些军队动员起来，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即便是很短的时间。各项准备工作和由于内战爆发而由元老院安排的新的征兵活动，已在各处开展起来。元老院决议通过以后（705 年 1 月 7 日），紧接着在寒冷的深冬，贵族中最有威望的人物便纷纷奔赴各地区，督促征募新兵和制造武器工作。最棘手的问题是缺少骑兵。因为在这个方面，以前一直习惯于完全依靠各行省，特别是凯尔特的出兵额。为了着手筹建骑兵部队，三百名本来属于恺撒的角斗士，被从卡普上角斗士学校

① 这些数字是庞培自己所说，这与他在意大利损失了 60 个步兵队，或者说 3 万人，并把 2.5 万人运送到希腊去的情况是相符的。

抽调出来，装备、训练成骑兵，但是，他们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与反抗，庞培不得已又解散了这支队伍。后来，从阿普利亚骑马放牧的奴隶中征募了三百人。　　照例，国库空虚，所以，又忙着从各地区的储蓄中，甚至从被罗马征用的地区的寺院财富中，调集资金，以补充欠缺的现金。

在这种形势下，战争于 705 年 1 月初开始了。恺撒手中的有行军能力的部队不超过一个军团，也就是说五千步兵和三百骑兵，驻扎在拉文那附近，它距罗马的公路距离为五十德里。庞培的两个孱弱的军团，即七千步兵和一支骑兵小分队，在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下，驻扎在卢塞利亚附近，卢塞利亚距离首都的公路也同样是五十德里。恺撒的其他部队——除了还在培训中的新兵分队——一半驻扎在索恩河与卢瓦尔河畔，一半在比利时，而庞培的意大利后备部队已从四面八方到达了各集结地。早在恺撒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大部队的先头部队能够开进意大利之前，那里肯定已经布置好了一支强大得多的庞培部队，准备对付它。看来，以一支仅具卡提林那实力的、且眼下不具备有效后援的队伍，去和一支由一位高明的统帅所指挥的、比自己强大的、而且时刻都在扩大的队伍对抗，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是，这是具有汉尼拔精神的愚蠢行为。如果这场战斗拖到春天再开始，那么，庞培的西班牙部队和意大利部队就会分别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和以南的高卢发动进攻。庞培作为策略家，要略胜恺撒一筹，而且经验也比恺撒丰富，所以，在一场按常规进行的战役中，他是个可怕的对手。而现在，习惯于用优于对手的兵力采取缓慢且保险的军事行动的庞培，可能是由于遭到突如其来的进攻而惊慌失措。但是，恺撒的第十三军团曾经历过高卢突袭和在贝洛瓦契地区的一月行动的严峻考验，不可能由于战争的突然爆发和冬季作战的艰辛而惊慌失措。相反，庞培那些由恺撒旧部或是素质低下的新兵组成的，还在训练中的部队，却因此而陷入混乱。——这样，恺撒开进了意大利。当时，有两条

公路从罗马人居住的地区通往南方:一条是埃米利乌斯—卡西乌斯公路,它从波诺尼亚经亚平宁山脉,通往阿雷提乌姆和罗马;另一条是波庇利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公路,它从亚得里亚海岸的拉文那通到法努姆,在那里又分为两支,一支往西,经过福尔罗关卡通向罗马,另一支往南,到安科纳,然后继续通到阿普利亚。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沿着第一条路,一直到达阿雷提乌姆;恺撒本人沿着第二条路挺进。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抵抗:那些曾不可一世的征兵军官都不是高级军官,大批的新兵也不是士兵,城乡居民们关心的只是不要围困他们。当库里奥率领一千五百名士兵向伊古维翁进军时,那里正聚集着由行政官昆图斯·米努西乌斯·德姆斯率领的几千名翁布里亚新兵。——德姆斯将军和士兵们只会根据所得到的有关库里奥前进情况的消息,在地图上计算他离这里的距离;在其他小的方面,也到处是类似的情况。恺撒当时有两种选择:或是向罗马进军——他在阿雷提乌姆的骑兵已经挺进到距罗马二十八德里处——或是向驻扎在卢塞利亚附近的军团进军。恺撒选择了后者。这大大出乎对手的意料。庞培得到的是恺撒向罗马进军的报告;开始,他似乎想保卫首都,但是,当恺撒开进匹塞浓地区,并在那里旗开得胜的消息传来后,庞培决定放弃首都,下令撤退。由于有谣传说城门外已经出现了恺撒的骑兵,这就更加重了本来已笼罩在上层社会中的混乱情绪。元老院的议员们被告知,每个留在首都的人都将被视为叛逆者恺撒的同谋,所以都成群结队地往城门外拥。连执政官也完全丧失了头脑,他们甚至没有把现金放到保险的地方,当庞培要求他们去补办时——当时还有足够的时间——他们却反驳他说,他们认为,如果庞培事先就占领了匹塞浓,那才更保险!大家都束手无策,于是,在西狄西尼亚的特阿农召开了战时委员会扩大会议(1 月 23 日),庞培、拉宾努斯和两个执政官出席了会议。首先,再次讨论了恺撒提出的和解建议:直至现在,恺撒还表示愿意马上让他的军队撤退,把他的行省移交给新任

命的继任，并以合法的方式谋求执政官的职位，但前提条件是，庞培退回西班牙，解除意大利的武装。委员会的答复是，如果恺撒马上撤回他的行省，委员会愿意按照程序，在首都通过一项元老院决议，以此促成解除意大利的武装和庞培的撤离。他们说，这不是拙劣的骗术，而是接受和解建议，但是，事实恰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恺撒希望同庞培进行私人会晤，但遭到庞培的拒绝，而且他必须拒绝，以免造成他将与恺撒重新结盟的假象，从而进一步刺激宪法派原本就对他怀有的猜疑。至于作战方面，特阿农会议一致同意，由庞培去接管指挥卢塞利亚附近的部队——尽管它不可靠，但所有希望都在它身上——然后率领这支队伍进入他和拉宾努斯的家乡匹塞浓，并尝试像三十五年前一样，号召当地的后备军拿起武器，以指挥这支忠诚的、善战的、原恺撒手下的匹塞浓步兵部队阻止敌人的前进。问题的关键是，匹塞浓地区能否坚持到庞培赶去保卫它。恺撒的军队在海岸公路汇合后，在恺撒的指挥下，已经经过安科纳，进入了该地区。这里也正忙于军备，就在匹塞浓地区最北部的城市奥克西姆，聚集着大批由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法鲁斯率领的新兵。但是，根据市政府的要求，在恺撒到来之前，法鲁斯率兵撤出了该城，之后，在离奥克西姆城不远的地方被恺撒的一小部分士兵追上，经过短暂的搏斗后，法鲁斯的部队被彻底击溃。——这是本次战争中的第一次交战。随后，盖尤斯·卢西利乌斯·希鲁斯率三千士兵也撤离卡美里浓，普布利乌斯·林都鲁斯·斯宾特率五千士兵撤出阿斯库隆。绝大部分忠于庞培的队伍，都自愿地置家园于不顾，跟随他们的将领越过世界；但是，当庞培派卢西乌斯·维布利乌斯·鲁福斯——他不是高贵的元老院议员，但却是一位精通作战的军官——到达匹塞浓地区临时负责防御时，该地区实际上已经丢掉了。令鲁福斯感到满足的是，他从那些无能的征兵军官那里接收了六七千名获救的新兵，并将他们送往最近的集结地——科斐尼乌姆，它是阿尔巴尼人、马尔西人和培

利尼人地区征兵活动的中心。这里聚集的约一千五百名新兵,是意大利最勇猛、最可靠地区的兵员份额,同时也是宪法派正在培训的部队的核心。当维布利乌斯到达这里时,恺撒距这里还有好几天的路程。当时没有任何情况能阻碍根据庞培的命令马上出发,将获救的匹塞浓新兵和聚集在科斐尼乌姆的新兵一起送到驻扎在阿普利亚的主力部队去。但是,坐镇科斐尼乌姆指挥的是已被选定作为恺撒的接班人出任外高卢总督的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他是贵族中目光最狭隘、头脑最固执的人之一。他不仅拒不执行庞培的命令,而且还阻止维布利乌斯把匹塞浓的部队带到阿普利亚去。他坚持认为,庞培只是由于固执而犹豫不决,后者有必要赶来增援,所以,多密提乌斯根本没有为城市被围做好准备,他甚至没有把已进驻周围城市的新兵调集到科斐尼乌姆来。庞培没有出现,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尽管他可以用那两个不可靠的军团,来增援匹塞浓的后备部队,但却不能单单依靠它们同恺撒交战。几天以后,恺撒来了(2 月 14 日)。在匹塞浓和科斐尼乌姆城外,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第十二和第八军团分别汇合进恺撒的部队,另外,由被俘的和自愿投诚的庞培的部队,以及从各地火速征集的新兵,又组建了三个军团,这样,在科斐尼乌姆城外,恺撒手中掌握的部队已达四万人,其中一半受过军事训练。多密提乌斯一边盼望着庞培的到来,一边指挥军队守卫城市。当庞培的来信最终使他失望后,他没有决定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坚守岗位——那样的话,他将为他那一派做出最大的贡献——也没有决定投降,而是一方面告诉士兵们援军马上就到,另一方面准备同高级军官们连夜逃走。但是,就连这么一个卑鄙的计划他都不会实施。他那混乱的举止泄漏了这个计划。一部分队伍开始哗变;而马尔西族新兵不相信他们的将领会有这种卑鄙的行为,所以想跟哗变者斗争;但是,他们最终也不得不相信了这一事实,于是,全体驻军逮捕了司令部人员,并将司令部、他们自己和城市都拱手交给了恺撒(2 月 20 日)。接着,恺撒的骑兵巡

逻队一出现，阿尔巴三千人之众的军团和聚集在塔拉西那的新兵便纷纷投降。第三部分是在苏尔莫的一支三千五百人的队伍，在此之前就已被迫投降了。——当恺撒刚刚攻占匹塞浓时，庞培就知道意大利完了，只不过，他想尽量拖延上船的时间，把能救走的队伍都救走。因此，他缓慢地向最近的港口勃隆度辛靠近。到达那里的有卢塞利亚的两个军团，庞培在人烟稀少的阿普利亚匆匆忙忙征集的新兵以及执政官和其他特使在坎帕尼亚招募到之后紧急运往勃隆度辛的新兵。来到这里的还有一大批政治流亡者，其中有最德高望众的元老院议员及其家属。开始上船了，但是，现有的船只不够把全部二万五千人一次运走。除了分两批走，没有别的办法。人数多的那部分先走(3 月 4 日)，庞培和剩下的约一千人在勃隆度辛等着船队回来。无论占据勃隆度辛对于今后有可能进行的收复意大利的尝试是多么重要，庞培都不敢在这里同恺撒长期对抗。这时，恺撒来到了勃隆度辛城外，包围开始了。首先，恺撒试图用堤坝和浮桥封锁港口的入海通道，把返回的船队拦截在外面。但是，庞培把停泊在港口内的商船都武装起来，在船队返回之前，阻止恺撒彻底封锁港口。尽管包围的部队日益扩大，而且城里居民的敌意越来越深，庞培还是运用巧妙的方法，使军队的所有人都安然撤出城外，离开恺撒的地盘，乘船到达希腊(3 月 17 日)。由于缺少一支船队，恺撒想继续追击的打算也像围城一样失败了。——在两个月的征战中，没有经过一次真正的交战，恺撒就把一支由十个军团组成的军队彻底击溃了，只有一小部分从海上仓皇逃走。整个意大利半岛，包括首都、国库和所有遗留下来的储备都落入胜利者手中。难怪被打败的一方抱怨“恶魔”恺撒那令人生畏的迅速行动、判断力和精力。

但问题是，征服意大利带给恺撒的是利多还是弊多。诚然，在军事方面，敌人的巨大后援被切断，并被恺撒据为己有。早在 705 年春，通过在各地的大规模征兵，恺撒的军队除了原有的九个军

团，就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的新兵军团。但是，另一方面，恺撒现在必须在意大利留下大批占领军，并由于海上实力强大的敌人对海上交通进行封锁，因而导致了特别是威胁首都的饥荒，对此，恺撒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恺撒原本就已经很棘手的军事任务变得更复杂了。重要的是财政方面，恺撒已幸运地掌握了首都的库存现金，但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特别是来自东方的赋税，却还在敌人手中。由于军队的需求越来越大，此外，还要解决首都居民的饥饿问题，因此，尽管找到了数额很大的资金，也还是很快就消耗完了。恺撒不得不立即呼吁私人贷款，但是凭借这种方法似乎也维持不了很长时间，那么，普遍认为，剩下的唯一辅助措施就是大规模没收私人财产来充公。——然而，恺撒征服意大利后出现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政治形势。有产阶级对于无政府状态的动荡深感忧虑。敌人和朋友都把恺撒看作第二个卡提林那。庞培认为，或者说他这样声称，恺撒是由于不能偿还债务才发动内战的。这当然是荒唐的。但是事实上，恺撒的负债确实令人不安，更令人不安的是他身边随从们的情况。最主要的是那些声名狼藉、臭名昭著的家伙，如昆图斯·霍特西乌斯，盖尤斯·库里奥，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此人是被西塞罗下令处死的、卡提林那手下的林都鲁斯的继子；那些甚至懒得算一算他们自己债务的人也被委以重任。人们看到，恺撒的官员们不仅供养舞女——这种事别人也干——而且公然与妓女出双入对。所以，连最严肃、无任何党派的人士都估计，恺撒会大赦逃亡国外的罪犯、销毁国家欠私人的债务账目，并且下达大规模没收私人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和谋杀的命令。他们甚至预计，罗马城将遭到高卢兵痞们的洗劫，这种情况难道奇怪吗？——但是，"恶魔"恺撒却使他的敌人和朋友的估计全都落空了。恺撒早在攻陷第一座意大利城池阿里米努姆时，就禁止普通士兵在城里佩带武器，不管那些城镇是友好的或是敌视的对待他，他都一律保护它们免受损害。当起义的守备部队在夜间交出科斐尼

乌姆城后，恺撒为了使市民们免遭他那些愤怒的士兵们夜间入城的骚扰，竟不顾一切军事禁忌，决定推迟至第二天清晨再入城。俘虏中的普通士兵，只要是政治上中立的，都被编入恺撒的军队；被俘的军官，不仅被全部恕罪，而且不需任何承诺，一律释放，甚至他们要求归还的私人财产，也没有对其申请的合理性进行严格的审查，就发还给了他们。恺撒也是这样对待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的，他甚至还把拉宾努斯遗留下的财物给后者补送至敌营。在财政最困难的情况下，恺撒都没有动用不管是留下的，还是已逃走的敌人的巨大财富。恺撒宁愿向朋友借贷，也不颁布土地税——尽管按规定是允许的，但实际上已经过时了——以免激起有产者来反对自己。作为胜利者，恺撒认为这次胜利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而且是不重要的那一半。他说，要想保证持久，只有无条件地赦免战败者，所以，甚至在从拉文那向勃隆度辛的进军途中，他都一直试图再次同庞培进行直接会晤，商讨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达成和解。但是，如果说贵族派以前就毫无和解之意的话，那么，目前这种出乎他们意料的、非常耻辱的流亡，则使他们恼羞成怒，所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战败者的疯狂复仇欲与胜利者的和解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流亡者们定期传给留在意大利的同党们的消息，都是关于没收恺撒一伙的财产并将之放逐的打算，还有元老院和国家的清洗计划，与之相比，苏拉的复辟就如同儿戏一般。但是，即便是温和的同党们听到这些计划，也感到万分震惊。软弱无能者的狂热和掌握权力者的温和明智发生了作用。那些把物质利益看得高于政治利益的人纷纷投靠恺撒。所有城镇都崇拜胜利者恺撒的"公正、适度和智慧"，就连他的对手也承认，人们是诚心诚意地表达对恺撒的敬意。自从宪法派的船只在意大利失事后，那些高级金融家、纳税者和陪审员便没有兴趣继续委身于原来的主子了，大量资金再次出现，富有的先生们又开始正常地记他们的利息账。就连元老院中的多数派，至少是从数目上说——因为这其中有威望有影

响的元老院成员却很少——也置庞培和执政官的命令于不顾而留在了意大利，甚至还有一部分人留在首都，并且接受了恺撒的统治。恺撒那看似过分、实则精心策划的怀柔政策达到了目的：有产阶层对危险的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对今后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同样危险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被消除，是今后改组国家体制的前提条件。但是目前对恺撒来说，实施怀柔政策比效仿秦那—卡提林那式的暴政更危险。因为，它不会把敌人变成朋友，而把朋友变成了敌人。追随恺撒的卡提林那派人不满的是，他们必须停止谋杀和抢劫；这帮鲁莽、绝望，却又有一定才能的家伙，最有可能发动叛乱。胜利者的宽容既没有改变形形色色共和派人的观点，也没能与他们达成和解。根据伽图派的信条，人们对所谓祖国的义务看得高于一切，为此可以免除任何顾虑。所以，即使是那些感谢恺撒赋予他们自由和生命的人，也有权利、有义务拿起武器反对恺撒，或者至少密谋反对他。宪法派中不太坚决的各党团，尽管表示愿意接受新君主的和平与保护，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停止从心底里对君主和君主制进行诅咒。随着对宪法的改动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在政治气氛较活跃、动荡的首都，还是在精力充沛的乡镇居民中，绝大多数公民头脑中的共和思想意识也越来越坚定。所以，留在罗马的宪法派不无道理地告诉他们流亡的同党，国内所有阶层、所有人都倾向于庞培。而且，由于流亡在外的那些坚定的重要人物不断向其地位低微、不太坚定的同党施加道德压力，各阶层中这种对恺撒不利的情绪也愈发强烈。正直的人为自己留在意大利而感到良心不安。半贵族们以为，自己不仅没有随多密提乌斯和麦特鲁斯一派流亡，甚至还坐到恺撒的由一群一文不名的人组成的元老院里去了，这是自己将自己混同于平民了。胜利者的宽容又使暗藏的反对派具有了更高的政治意义：由于恺撒禁止恐怖主义，所以，暗藏的敌人似乎不必冒太大的危险，就可以从事反对恺撒政府的活动。在这一方面恺撒

与元老院很快便产生了严重分歧。为了使受到恐吓的元老院摆脱施加压力的人，恺撒开始了斗争。行动开始了，恺撒希望元老院批准他获得继续进行战争的全权。为此，当恺撒出现在首都时(3 月底)，恺撒派的护民官为他召集了元老院会议(4 月 1 日)。与会者人数众多，但偏偏是那些最有名望的议员没有出席，其中甚至包括顺从恺撒的多数派前领袖马尔库斯·西塞罗和恺撒的岳父卢西乌斯·庇索；更严重的是，即使是与会者，也不同意恺撒的建议。当恺撒谈到要求全权继续进行战争时，出席会议的仅有的两名执政官之一塞维乌斯·苏尔皮西乌斯·鲁福斯——一个胆小之极的人，除了希望能够安静地在自己的床上死去，他别无所求，他认为，如果恺撒能放弃把战争扩展到希腊和西班牙的打算，那么他对祖国的功劳会更大。之后，当恺撒请求元老院至少把他的和解建议转达给庞培时，大家虽然没有反对，但是，由于惧怕流亡者对中立者的恐吓，甚至没有人愿意充当这一和平使者。由于贵族派拒绝帮助恺撒建立君主帝位，由于高层人士的软弱无能——而在不久之前，恺撒恰恰是利用这一点挫败了庞培要求正式任命自己为内战前线最高统帅的企图——现在，恺撒提出同样的要求，也遭到了同样的失败。此外，还有其他的障碍。恺撒为了调整一下自己的职位，希望被任命为独裁者。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根据宪法，独裁者只能由一名执政官委任，而收买执政官林都鲁斯的企图——鉴于他的财产遭到严重损害，所以曾很有希望成功——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此外，护民官卢西乌斯·麦特鲁斯对前执政官的所有措施提出了抗议，而且，当恺撒的人来要拿走国库的全部现金时，他表示要用自己的身躯保卫国库。在这种情况下，恺撒不得不下令，尽可能温和地将这个不可侵犯的人推到一边。另外，恺撒仍然禁止一切暴力措施。他向元老院声明——如同不久前宪法派所做的一样——尽管他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并借助最高当局的帮助来控制局势；但是，由于遭到拒绝，他也可以不用最高当局的帮助。恺撒不再考虑元老

院和国家法律惯例，他把首都的临时管理权交给了大法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杜斯，让后者做城市行政长官，并为管理归顺他的行省和继续战争颁布了必要的规定。但是，在大规模战争的咆哮声和恺撒作出种种承诺的诱人声音中，当首都的民众在他们自由的罗马城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君主作为一个君主在统治，看到国库的大门被他的士兵撞开时，他们感到万分震惊。然而，那种由民众的印象和情绪决定事物进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军队决定一切，至于人们感受到痛苦的多少，已不再重要。

恺撒又准备重新开始战争。他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胜利，都是因为采取了进攻战略，所以，他打算今后继续坚持这一战略。他的对手的情况很奇怪。庞培起初准备同时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向两个高卢省发动进攻，这一计划由于恺撒的进攻而破产后，庞培打算去西班牙。那里，他的势力非常强大。有七个军团的部队，其中一大部分是庞培手下身经百战的老兵，卢西塔尼亚山区的多年战斗锻炼了士兵和军官们。指挥官中，尽管马尔库斯·法罗只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忠实的追随者，但是卢西乌斯·阿夫拉尼乌斯却在东方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战斗中得到过嘉奖，马尔库斯·佩特雷依乌斯——打败卡提林那的人——同样也是一名英勇无畏、才能出众的军官。如果说恺撒由于曾任外高卢总督而在那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追随者的话，那么，这个更为重要的埃布罗省却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紧紧追随那个二十年前在这里指挥了塞多利乌斯战争、并在战争结束后重建了该省的著名将军庞培。经历了在意大利的灾难之后，庞培显然只能带领他的残余部队前往埃布罗，在那里，率领他的全部力量与恺撒对抗。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庞培想救出集结在科斐尼乌姆的部队，而在阿普利亚耽搁的时间太长，所以，他不得不放弃坎帕尼亚的港口而选择距离较近的勃隆度辛作为上船地点。可是为什么他，被称为海上和西西里之王的庞培，以后没有再提到他最初的计划？这是个难以下定论的问题。也许是贵族派

由于目光短浅和猜忌多疑而没有表示他们愿意信任西班牙军队和民众——总之,庞培留在了东部。恺撒可以选择,或是首先向在希腊的庞培亲自指挥的军队发动进攻,或是向西班牙境内庞培手下的军官所指挥的勇猛善战的部队发动首攻。恺撒选择了后者,意大利的战斗刚一结束,他就采取了一列系措施,以便将他最好的九个军团、六千骑兵——其中一部分是恺撒在凯尔特各区逐一选拔出来的,一部分是德意志雇佣兵——和一些伊伯利亚及利古里亚射手集结到罗讷河下游。——但是,恰恰是在那里,他的敌人们已经有所行动。那个被元老院任命去接替恺撒担任外高卢总督的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在被恺撒释放后,就带着他的侍从和庞培的心腹卢西乌斯·维布利乌斯·鲁福斯直奔马西利亚,并控制了该城,让它宣布支持庞培,拒绝恺撒的军队由此通过。在西班牙,那两个最不可信任的军团由法罗指挥而驻守在远西班牙行省;而其余五个最好的军团,又补充进四千名西班牙步兵,其中一部分是凯尔特——伊伯利亚常备步兵,还有一部分是卢西塔尼亚和其他地区的轻步兵。这五个军团按照维布利乌斯传达的庞培的命令,准备封锁比利牛斯山脉,阻止敌人通过。——为此,恺撒亲自来到高卢,由于当时刚开始包围马西利亚,恺撒无法脱身,所以,他立即派聚集在罗讷河边的绝大部分队伍——六个军团和全部骑兵——沿着经那波(纳博纳)通往罗得(罗萨斯)的公路前进,以便赶在敌人之前到达比利牛斯山。这一行动成功了。当阿夫拉尼乌斯和佩特雷依乌斯到达各关卡时,发现它们已被恺撒的人占领,比利牛斯山常备军也已被打败。于是,他们在比利牛斯山脉和埃布罗河之间的伊利尔塔城(莱里达)附近占据了一块阵地。该城位于埃布罗河以北四德里,一条名叫西格里斯(塞格雷)的支流的右岸,这条支流上,只有唯一一座坚固的桥直接通到伊利尔塔附近。伊利尔塔南面,沿着埃布罗河左岸走向的山脉延伸到距城很近的地方;西格里斯河两岸是向北延伸的平原,完全处于伊利尔塔城所在的山丘控制之

下。对一支必定被围攻的军队来说，这实在是一块再好不过的阵地。但是，在占领比利牛斯阵线的计划失败后，保卫西班牙的战斗只有在埃布罗河后面才能真正展开，可是由于伊利尔塔城和埃布罗河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而且埃布罗河上也无法架桥，因此无法充分保障能从临时防御阵地撤回真正的守地。恺撒的军队占据了伊利尔塔城上方、西格里斯河与辛加（辛卡）河冲击成的三角洲，这两条河在伊利尔塔城下方汇合。然而，真正的进攻是在恺撒到达阵地以后才开始的（6 月 23 日）。城墙下，双方进行了激烈、英勇的搏斗并各有胜负。恺撒的目的是：占据庞培的大本营与伊利尔塔城之间的地带，以便将西格里斯河上的那座石桥据为己有，但是，恺撒的部队没有成功，所以他们同高卢的联络只能依靠他们在西格里斯河上架起的两座桥，而且，由于在伊利尔塔附近的河上架桥太显眼，因此，他们不得不往上游走四五德里，匆匆忙忙将桥架起。紧接着，当冰雪消融、汛期到来时，这两座应急桥也被冲垮了。河流水位涨高亦缺乏能渡过的船只，而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马上重新修桥，于是，恺撒的部队被围困在辛卡河与西格里斯河之间的狭窄地带，几乎毫无抵抗地将西格里斯河左岸和他们赖以同高卢和意大利保持联络的道路拱手让给了庞培的军队。他们一部分是从石桥上过河的，另一部分是以卢西塔尼亚的方式，趴在救生囊上游过河的。当时正是收获季节前夕，原来储存的粮食几乎已经用尽，新粮食还没收上来，两条小河之间这条狭窄地带上可食的东西也很快被吃光了。军营里发生了真正的饥荒——一普鲁士舍菲尔麦子卖 300 德纳尔（合 90 塔勒）——并且开始蔓延各种危险的疾病；然而粮食和各种供给物资却大量运至河的左岸，此外还有各类部队：来自高卢的骑兵和步兵增援部队，正在休假的军官和士兵，返回的巡逻队，总共有六千人，他们遭到了庞培军队的进攻。由于敌军力量太强大，因而损失惨重，被赶进山里，而恺撒的军队却不得不毫无办法地在河右岸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军队之间的

联系被庞培所控制；意大利由于突然得不到来自西班牙的消息，开始流传各种令人担心的谣言，实际上，这些谣言与事实也相差无几。如果庞培的军队能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那么，他们不难把被挤在西格里斯河左岸、毫无抵抗能力的那部分恺撒的小股部队，或是加以制服，或是至少将其逐退回高卢，这样，庞培的军队就可以完全控制河的此岸，使没有人能未经许可而擅自过河。但是，这两点他们都未能做到；尽管恺撒那部分队伍损失惨重，被赶进山里，但是，他们既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彻底击退，而且庞培的军队主要是依靠河本身的天然屏障来阻止敌人渡河。于是，恺撒又开始了他的计划。他下令按照不列颠运河中船的样子，在军营中用轻的木架和藤条编织物做成轻便的小船——后来，这种样子的船在萨克森也很常见——然后用车运至原来那两座桥的旧址。就借助这种不堪一击的轻舟，恺撒的军队到达了对岸，由于敌人并没有防守，所以，他们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就又建起了桥。很快，那条用作联系的公路也被打通，盼望已久的供给物资运到了军营。恺撒这个绝妙的主意把军队从巨大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紧接着，恺撒那实力远远强大于敌人的骑兵开始横扫西格里斯河左岸地区。比利牛斯山脉和埃布罗河之间那些最重要的西班牙城镇奥斯卡、塔拉科和德尔塔索等，甚至埃布罗河以南的几个城镇，都转向恺撒一边。由于恺撒的巡逻部队的控制和附近各城镇的投降，庞培军队的物资越来越少。终于，他们决定撤回埃布罗河一线后面，并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在西格里斯河与埃布罗河汇合处的埃布罗河上建一座浮桥。恺撒打算切断敌人从埃布罗河上的退路，把他们围困在伊利尔塔。但是，只要敌人还占据着伊利尔塔附近的桥，而恺撒既没有控制着河中浅滩，也没有控制着桥，他就不能把自己的军队分到河的两岸，那么也就包围不了伊利尔塔。恺撒的士兵们夜以继日地挖沟，希望通过排水沟排走河里的水，使河水浅到步兵也可以通过。但是，庞培军队渡过埃布罗河的准备比恺撒军队包围伊利尔塔的

布置先一步完成了。当庞培的军队架好浮桥，在西格里斯河左岸开始向埃布罗河前进时，恺撒军队挖的排水沟还不够宽，不能排走足够的水，让步兵从浅河滩上过河；恺撒只派骑兵过河追击敌人，至少拦截并消耗敌人。当恺撒的军团在破晓时看到从深夜就开始撤退的敌军时，他们凭着身经百战的老兵的准确直觉，明白了这次撤退的战略意义，所以，他们必须深入无路可行、布满敌军的地区追击敌人。应士兵们的请求，统帅大胆地让步兵也渡河，尽管河水没到士兵们的肩膀，他们仍安然无恙地过了河。时间非常紧迫。如果庞培的军队穿过伊利尔塔城与埃布罗河周围山地之间那条狭长的平地，并进入山区，那么，恺撒就无法阻止他们向埃布罗河撤退了。尽管敌军骑兵的不断进攻大大影响了行军速度，庞培的军队距山区也只有一里地了，当时，由于连夜行军，他们已疲惫不堪，所以，他们放弃了原来打算当天穿过这块平地的计划，扎营休息了。而且，因为害怕恺撒骑兵的夜间进攻，庞培的部队不得不再次放弃原计划的夜间行军。于是，恺撒的步兵在这里赶上了他们，当晚与他们遥遥相对宿营。第二天，双方仍僵持不动，只是侦察地形。第三天清晨，恺撒的步兵开始穿过无路可通的山区，绕过敌人的阵地，到达主公路，以便切断敌人去往埃布罗河的道路。这次奇特的行军，一开始看上去，似乎是要回伊利尔塔城前的营地，所以，庞培的军官们没有马上看出其目的。当他们明白过来时，立即丢弃了营地和行装，带着武器向公路方向急行军，企图抢在恺撒的军队之前占领堤坝。但为时已晚。等他们赶到时，敌人的全体部队已恭候在大路上了。绝望中，庞培的军队试图翻过山区，寻找通往埃布罗河的其他道路，然而，恺撒的骑兵挫败了他们这一计划。恺撒的骑兵包围并歼灭了卢西塔尼亚的先遣部队。庞培的军队腹背受敌——后面是敌军骑兵，前面是敌军步兵——军心涣散。如果此时在庞培和恺撒之间进行一场战斗，那么不容置疑，恺撒必将取胜，而且，发起战斗的机会也很多；但是，恺撒并没有利用这些机会，他尽力控制

着充满必胜信心的士兵们那已按捺不住的参战欲望。无论如何，从战略上看，庞培的军队已经失败了。恺撒一方面要避免由于无益的流血而削弱自己的部队，另一方面，他不愿使原本就已很尖锐的敌对情绪更加激化。在成功地切断庞培军队通往埃布罗河道路的第二天，双方士兵就开始相互结拜兄弟，并就投降后交接事宜进行谈判。当佩特雷依乌斯带领他的由奴隶和西班牙人组成的卫队袭击了双方的秘密谈判者，下令将被逮捕的恺撒的人全部处死时，恺撒已经同意了庞培的部下提出的条件，特别是要求宽大处理军官的条件。恺撒丝毫没有伤害跑到他阵营里来的庞培的人，让他们都回去，他坚持要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法。伊利尔塔城还由庞培的军队占领着，并贮存有大量物资，现在庞培的这支部队要向伊利尔塔进军。但是，他们前方是敌人的军队，他们与据点之间是西格里斯河，所以，他们无法靠近目的地。他们的骑兵由于不断受到惊吓，现在不得不夹在步兵中间，而步兵军团被迫殿后。水和食物越来越难以搞到；因为缺乏饲料，不得不将驮载的牲畜杀掉。终于，这支走投无路的军队发现他们完全被包围了，背后是西格里斯河，前面是正在筑堤挖沟、包围他们的敌军。庞培的军队试图渡河，但是，恺撒的德意志骑兵和轻装步兵抢在他们前面占据了河对岸。所有的勇敢和忠诚都无法再继续阻止不可避免的投降（705 年 8 月 2 日）。恺撒不仅保障庞培的军官和士兵们的生命、自由和他们现有的财产，并让自己的士兵把从他们那里没收来的财产归还他们，由恺撒本人来补偿他自己士兵们的全部损失，而且，与在意大利的做法相反——当时，他强迫所有被俘的新兵加入他的军队——为了表示对庞培老部下的尊重，他向他们保证，不强迫任何人加入他的军队。他只要求所有人都上交武器，然后回各自的家乡。因此，约占军队三分之一的西班牙籍士兵马上被遣散，意大利士兵在内外高卢边境被解散。——随着这支军队的解散，近西班牙自然而然落入胜利者手中。在远西班牙，由马尔库斯 · 法罗代替庞培行使最高指挥

权。法罗听到伊利尔塔的灾难后，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奔赴岛城加得斯，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要把通过没收寺院和有名望的恺撒党人的财产而得到的巨额财宝，还有由他亲自组建的、非常重要的舰队和两个委托给他的军团都转移到那里。但是，仅仅一条关于恺撒到达的谣传，就使这个早已亲恺撒的省里的几个最重要的城市宣布支持恺撒，它们赶走庞培的驻军，或是限定他们马上撤离；这几个城市中包括科尔都巴、卡尔莫甚至还有加得斯。还有一个军团主动开赴希斯帕利斯，并和该城一起，马上投向恺撒一方。当最后连意大利卡也将法罗拒之城门外后，他决定投降。——大约同时，马西利亚也屈服了。在此之前，马西利亚不仅以罕见的毅力顶住了围困，而且坚守着海防，同恺撒对抗；海洋是他们熟悉的环境，他们本来希望能在海上得到庞培的强大援助，因为庞培完全掌握着制海权。但是，恺撒手下的一名军官，即曾打败维内提人，取得第一次海战胜利的、勇敢善战的德西姆斯·布鲁图斯，迅速组织了一支船队，尽管由马西利亚的阿尔比奥克雇佣兵和多密提乌斯牧奴组成的敌军舰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布鲁图斯从军团中选拔出来的勇敢的水兵们还是打败了比自己强大的马西利亚舰队，而且将大部分战舰击沉或缴获。之后，当卢西乌斯·纳西底乌斯率领庞培的一支小型舰队从东部经西西里岛和撒丁尼亚岛到达马西利亚港后，马西利亚人再一次装备了他们的海上力量，以纳西底乌斯的舰队向布鲁图斯发起了进攻。如果在这场于陶罗埃斯高地（马赛东部的拉西奥塔）上进行的交战中，纳西底乌斯的舰队能够拿出马西利亚舰队在同一天曾表现出的拼死精神，那么，这场海战将会是另一种结果。但是，纳西底乌斯的士兵们临阵脱逃，使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庞培舰队的残余逃往西班牙。被围者被从海上彻底赶了出去。陆上，由盖尤斯·特累波尼乌斯指挥围城。海战之后，马西利亚人还在陆上继续进行顽强抵抗；然而，尽管阿尔比奥克雇佣兵进行了多次突围，尽管被围者巧妙地运用城内储备的大批军火，但围

城者最终还是接近了城墙，并摧毁了一个碉堡。马西利亚人宣布，他们放弃抵抗，但希望同恺撒本人商定投降事宜，他们请求罗马指挥官，在恺撒到达之前停止围城活动。特累波尼乌斯曾得到恺撒的严格命令，要尽量保护城市，他同意了停火的请求。但是，马西利亚人却利用停火的机会，进行阴险的突围，他们将罗马人几乎未加看守的工事的一半彻底烧毁。于是，恺撒的军队带着更大的愤怒，重新开始了围城战。干练的罗马指挥官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被摧毁的堡垒和堤坝；很快，马西利亚人被再次彻底包围起来。当恺撒在征服西班牙后返回该城前时，他看到的状况是，在进攻、饥馑和瘟疫的困扰下，这座城市已经濒临崩溃，它愿意再次——这次是真的——无条件投降。只有多密提乌斯，由于曾无耻地滥用了胜利者对他的宽大，乘上一只小船，躲过罗马舰队溜走了，去为他那无法平息的恼怒寻找第三个战场。恺撒的大兵们曾发誓，要把这座背信弃义的城市里的所有男人都杀掉，现在，他们向统帅强烈要求洗劫该城。但是，恺撒考虑到自己的伟大任务是在西部建立古希腊一意大利文明，所以，不愿再被迫继续类似摧毁科林特城的行为。古爱尔尼奥航海民族曾有众多自由的、海上力量强大的城市，其中马西利亚是离故乡最远的、也几乎是最后一个还完好地保持着古希腊航海者生活方式的城市，同时，它还是最后一个打到海上的希腊城市。——尽管马西利亚不得不把它的武器和战舰储备交给战胜者，并丧失了一部分领土和特权，但它仍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和民族性，虽然它遇到物质上的缩减，但在精神上，在遥远的、如今获得了新的历史意义的凯尔特地区，它仍然是古希腊文化的中心。

在西部地区，战争在经历了一些令人忧虑的变化之后，最终转向对恺撒有利的一面，西班牙和马西利亚都投降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全部被俘。与此同时，在第二战场上——早在刚征服意大利之后，恺撒就认为必须在这里发动进攻——也展开了决战。——前

面已经提到过,庞培一方企图通过制造饥饿迫使意大利投降。他们手中还掌握着做到这一点的办法。他们完全掌握着制海权,并在各地——在加得斯·乌提卡、墨西拿,特别是在东方——紧急扩充舰队;另外,他们还控制着所有向首都提供生活资料的省份:撒丁尼亚岛和科西嘉由马尔库斯·科塔控制着,西西里岛在马尔库斯·伽图手中,非洲由自封为最高指挥官的提图斯·阿提乌斯·法鲁斯和他的盟友、努米底亚国王尤巴共同控制着。对恺撒来说,一定要粉碎敌人的计划,从敌人手中把产粮省夺回来。昆图斯·法累利乌斯率领一个军团被派往撒丁尼亚岛,强迫庞培的总督撤离该岛。从敌人手中夺取西西里岛和非洲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年轻的盖尤斯·库里奥,由干练的、作战经验丰富的盖尤斯·卡尼尼乌斯·雷比鲁斯辅佐他。终于不费一兵一剑,库里奥就占领了西西里岛;伽图没有真正的军队,他本人也不是勇士,他非常诚实地告诫西西里人,不要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于己不利的无效抵抗,之后,他撤离了该岛。为了守住这个对首都至关重要的岛屿,库里奥让一半军队留守在那里,他自己率其余的两个军团和五百骑兵,乘船前往非洲。这里,他将遇到比较强烈的抵抗:除了尤巴为数众多、并且相对勇猛的军队,总督法鲁斯还从在非洲定居的罗马人中征招了两个军团,组建了一支拥有十艘帆船的小型舰队。但是,库里奥凭借自己强大的舰队,毫不费力地在哈德鲁梅图(那里有敌人的一个军团和战船)与乌提卡(法鲁斯亲自带领另一个军团守在该城外)之间登陆了。库里奥向乌提卡进军,并在距乌提卡城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一个半世纪前,老西庇阿就是在这里建立了他在非洲的第一个冬季营地。恺撒因为要把核心部队集中到西班牙战争上,所以,出征西西里和非洲的部队大部分是由从敌军收编的军团,即科斐尼乌姆战俘组成的。在非洲的庞培军队的军官中,有一部分曾在科斐尼乌姆被打败的军团中任过职,现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试图使原来在他们手下,现在却同他们作战的士兵们重新效

忠他们。但是，恺撒没有选错他的副手。库里奥不仅会指挥军队和舰队的行动，而且还懂得对士兵们施加个人影响。军队的伙食非常丰盛，每次交战都无一例外地获胜。法鲁斯一直以为，库里奥的部队是没有机会投奔到他这一方来的，所以，为了给他们一个机会，他决定进行一场战斗，然而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库里奥的骑兵们被他们年轻的指挥官激昂的讲话所鼓舞，他们把敌人的骑兵打得四处逃窜，并在两军阵前，杀死了随骑兵出战的敌军轻步兵。由于这一胜利和库里奥本人表率的激励，他的各军团穿过两军阵线之间道路崎岖的山谷，投入进攻。这大大出乎庞培军队的意料，他们可耻地逃回营地，并在当天夜里撤走了。库里奥取得了彻底胜利，所以，他马上着手包围乌提卡。可是，当国王尤巴带领其全部军队正赶赴这里增援的消息传来时，库里奥决定——同西庇阿当初在西法克斯战役中的做法一样——停止围城，退回原西庇阿的大本营，等候来自西西里的增援部队赶到。紧接着，又传来第二条消息：国王尤巴遭到附近诸侯的进攻，被迫率主力部队退回，只给被围者派来由萨布拉率领的一个中等军团增援。库里奥生性好动，他只是出于无奈而非常不情愿地作出了休息的决定，现在，他又马上出发，准备在萨布拉与乌提卡的守军取得联系之前与之交战。他的骑兵已于傍晚先期出发，并成功地在当夜对驻扎在巴格拉达斯河边的萨布拉军团进行了突然袭击，给予其沉重打击。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后，库里奥加快了步兵的行军速度，打算通过步兵彻底打败敌人。不久，他们看到，在向巴格拉达斯河一侧倾斜的山丘的最后几个山坡上，萨布拉军团正与罗马骑兵交战；赶来的步兵军团帮助骑兵把萨布拉军团全部赶到了平原上。但是，在这里，战局发生了逆转。萨布拉并非如库里奥所想象的没有后援，其实，他离努米底亚主力部队不足一德里远。努米底亚步兵的骨干和两千名高卢、西班牙骑兵已经赶到战场支援萨布拉，国王本人率领大部队和十六只大象正向这边靠近。经过夜行军和一场激烈的战斗，罗马骑兵眼下

已不足二百人,他们和步兵都由于劳累和搏斗而疲惫不堪,他们全部被引诱到开阔的平原地带,被越聚越多的敌军包围起来。库里奥徒劳地试图与对手交战,但是,利比亚骑兵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做法:当一支罗马分队进攻时,他们避开,为的是等对方掉头回转时,再追击敌人。库里奥徒劳地试图夺回山丘,但它们已被敌军骑兵占领并封锁了。一切都完了。步兵已一个不剩地被杀尽。骑兵中有个别人冲出了包围。库里奥本来也可以冲出重围而得救,但是,他不能忍受丢了交给他的军队而独自去见统帅,于是拔剑自杀了。聚集在乌提卡城外大本营里的部队和舰队的全体人员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逃回西西里岛的,但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震惊了,在第二天就向法鲁斯投降了(705 年 8 月或 9 月)。——这样,恺撒计划的西西里—非洲远征结束了。由于占领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尼亚岛,首都紧迫的需求得到了缓解,在这个意义上,这次远征达到了其目的。但是,得胜的一方操之过急地想征服非洲的举动,却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尽管损失了两个不太可靠的军团并不让人痛心,但是,对恺撒,甚至对罗马来说,库里奥的死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恺撒把最重要的独立指挥权交给这个没有军事经验、生活放荡的年轻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上,闪耀着恺撒本人精神的火花。他同恺撒一样,享尽了生活的乐趣。同样,他成为政治家,也并非因为他是军官,而是他的政治活动使他掌握了权力。和恺撒一样,他的雄辩的口才也不是基于华丽的词藻,而是因为表达出深刻感受的思想;同样,他作战的方法也是以少数兵力,采取快速行动;他的本性也是轻松无虑——常常是轻率——举止优雅、心怀坦荡和及时行乐。如果说,按照他的统帅恺撒对他的评价,是年轻人的冲动和巨大勇气导致了他的不谨慎,如果说他是为了一个本来可以原谅的错误而不肯原谅自己,过分高傲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那么,恺撒的历史中也不乏这样不谨慎和高傲的时刻。令人惋惜的是,上天没有赐予这个才华横溢的天才以

机会，让他充分施展其才能，为毫无才能、陷入平庸的后代留下一些经验。

705 年的战事对庞培的全盘作战计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失掉了意大利之后，在庞培的作战计划中，西部那些重要的军团各充当什么角色，对此，人们只能猜测。至于说，庞培曾打算经过非洲和毛里塔尼亚去援助他在西班牙作战的陆军，则纯属是在伊利尔塔军营中流传的天方夜谭式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更有可能的是，庞培在失去意大利之后，仍然坚持他原来的计划，即从两个方向进攻在内外高卢的恺撒军队，并打算同时从西班牙和马其顿发动联合进攻。据推测，西班牙军队应该一直在比利牛斯山脉采取守势，直到正在组织中的马其顿军队能够同时出发；然后，两方同时开始行动，再根据情况，或是在罗讷河，或是在波河会合，海军也可能试图重新夺回意大利本土。在这种情况下，恺撒首先准备好了方案，以对付对意大利的进攻。恺撒最出色的军官之一、护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行使代理行政官的职权。在东南部几个有可能首先登陆的港口西普斯、勃隆度辛及塔伦特驻扎了三个军团。此外，昆图斯·霍特西乌斯——著名同名演说家不成器的儿子——和普布利乌斯·多拉培拉也分别在第勒尼安海和亚得里亚海集结了一支舰队，它们一方面是为了加强防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后渡海进军希腊。假如庞培试图从陆上攻入意大利，那么，马尔库斯·里西尼乌斯——恺撒的老友克拉苏斯之长子——和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的弟弟盖尤斯将分别指挥内高卢和伊利里亚的防卫。但是，人们预料中的进攻却迟迟未发动。直至同年盛夏，双方才在伊利里亚交战。这里，恺撒的总督盖尤斯·安东尼乌斯率领他的两个军团驻扎在库里克塔岛上（克万尼亚海湾中的克尔克岛），恺撒的海军统帅普布利乌斯·多拉培拉指挥着四十艘战舰守卫着该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峡。在亚得里亚海上，这支舰队遭到了庞培舰队指挥官们的进攻——马尔库斯·

屋大维和卢西乌斯·斯克利波尼乌斯·里波分别率领希腊和伊利里亚舰队——全部战舰被摧毁，安东尼乌斯在岛上被杀。为了救他，巴西鲁斯和萨鲁斯提乌斯带领一个军团从意大利、霍特西乌斯的一个中型舰队从第勒尼安海赶来。但是，他们都没能阻止住远远强大于自己的敌军舰队。安东尼乌斯的军团不得不听天由命。储备用完了，军队的处境非常困难，而且出现了叛乱。除了有个别分队乘竹排回到了大陆外，其余十五个步兵队全部投降，被里波用船运往马其顿，在那里被编入庞培的军队。与此同时，屋大维留在岛上，继续使还未被军队占领的伊利里亚海岸地区投降。当时在那个地区最强大的部族达尔马西亚人、重要的岛城伊萨（里萨）和其他地区都投向庞培一边。但是，在萨罗那（斯帕拉托）和里索斯（阿来西欧），恺撒的追随者仍然在坚持。在萨罗那，他们不仅勇敢地顶住了围困，而且，当他们忍无可忍时，进行了突围并获得成功，迫使屋大维停止围城，撤回提尔哈基翁过冬。——庞培舰队在伊利里亚取得的战绩，尽管就其本身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却影响不大。如果考虑到，在整个705年这个多事之秋，庞培指挥下的陆海军的战绩仅限于这一次军事行动，而东部，虽然统帅、元老院、第二支大规模军队、主力舰队、恺撒的敌人们的巨大军事储备和越来越多的资金已在那里联合起来，但却没有在必要的时候参与在西部进行的那场决定性战斗，那么，庞培这次胜利的意义就微乎其微了。他留在帝国东部的军队如一盘散沙，庞培除了凭借人数的优势来采取行动外别无它法；他迟钝笨拙，联盟内部思想不统一，这一切也许不能成为东部陆军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一现象。然而，以绝对优势控制着地中海的舰队，却无任何有助于战争进程的举动，根本没有为西班牙、为忠诚的马西利亚人、为保卫撒丁尼亚岛、西西里岛和非洲，为至少阻断意大利的供应——这里暂且不说重新占领意大利——采取任何行动，这一切都使我们难以想象。而只

有凭借丰富的想像力，我们才能设想出当时庞培阵营中的混乱状况。——这次战役的总结果也与此相符。恺撒对西班牙和西西里岛、非洲进行了双重进攻，前者取得了彻底胜利，后者至少也部分地成功了。相反，庞培企图通过饥困使意大利投降的计划，却由于西西里岛被夺去而基本上破产了，他的总体作战计划也由于西班牙军队被歼灭而彻底失败。恺撒在意大利仅动用了一小部分防御设施。尽管恺撒在非洲和伊利里亚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在战争的第一年，他显然仍是胜者。

由于东部没有为阻止恺撒征服西部采取任何重要行动，所以，他们至少利用这段非常不光彩地赢得的时间，来巩固政治、军事力量。马其顿是恺撒的敌人们的大聚集地。庞培本人和勃隆度辛的大批流亡者都去往那里，还有来自西部的其他流亡者：来自西西里岛的马尔库斯·伽图，来自马西利亚的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特别是来自西班牙的一批被遣散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军官和士兵，为首的是他们的指挥官阿夫拉尼乌斯和法罗。在意大利，流亡在贵族中不仅是一种荣誉，而且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特别是关于恺撒在伊利尔塔城外战况不利的消息传来后，流亡运动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渐渐地，一些不太坚定的同党和政治上的两面派，也来到马其顿。终于，连马尔库斯·西塞罗也确信，如果他仅仅写一篇关于和睦一致的论文，还远远没有尽到他的义务。罗马官方机构把特萨洛尼卡作为临时所在地，设在那里的流亡元老院已有约二百名成员，其中包括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人和几乎所有的执政官。他们当然都是流亡者。这个集汇地作为罗马的科布伦茨，也充分展示出罗马上流社会的苛刻要求和少得可怜的成绩，展示出他们不合时宜的对往事的缅怀和更不合时宜的相互指责、他们政治上的错误和财政上的拮据。至少，在旧的体制解体时，他们非常精心地试图把宪法中的每一道旧痕迹都保留下来。最后，当那些高贵的先生们为他们在神圣的罗马城土地之外还把自己的委员

会会议称作元老院感到良心不安，而谨慎地自称为“三百人会议”时[1]，或是以国家法律来详细考察，在罗马城墙以外，能否与如何依据法律来完成一种公民大会法的时候，这时事情就变得可笑了。更糟糕的是不坚定者的无所谓态度和激进分子的狭隘顽固。那些不坚定分子既不愿采取行动，也不愿保持沉默。如果要求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以某种方式行动起来，他们就会怀着弱者所特有的前后不一贯态度，把每一个这种建议都看成是出于恶意，是想让他们继续出丑，所以，对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干脆不执行，或三心二意地干。这样，他们当然就以马后炮式的自以为是和异常聪明而又无法实施的建议为借口，给行动者增加负担；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每一件事，无论大小，吹毛求疵，嘲讽讥笑，唉声叹气，用他们的懒散和绝望涣散别人的斗志。如果说人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懈怠，那么与之相反，激进分子身上则充分体现出高度紧张。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任何和平谈判，都要以取下恺撒的脑袋为前提；他们对恺撒至今还在不断重申的所有和平尝试，都不加考虑地断然拒绝，或者是利用这个机会，卑鄙地杀害敌方代表。不言而喻，所有公开声明支持恺撒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丧失了生命财产；就连那些多少保持中立的人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科斐尼乌姆的“英雄”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在战争委员会上郑重提议，由在庞培军队中战斗过的元老院议员，对那些中立的或是虽然流亡，但未加入庞培军队的议员进行表决，根据情况，对他们宣布无罪，或处以罚款，甚至处以死刑，没收财产。另一个激进分子因卢西乌斯·阿夫拉尼乌斯保卫西班牙不力，正式向庞培指控他受贿、背叛。对这批彻头彻尾的共和派人来说，他们的政治理论几乎具有了宗教信条的性

---

[1] 按照法律规定，“合法的委员会会议”以及“合法的法院审判”无疑都必须在罗马城内，或是在城市一里地的禁区内举行，所以，在非洲军队中代表元老院的会议被称为“三百人会议”这并非因为它有三百名成员，而是因为最早时，规定元老院有三百名议员。

质;他们甚至比恨公开的敌人更恨他们不坚定的同党和庞培及其亲信随从。他们这种愚昧的仇恨,正是顽固的神学家所特有的;对无数激烈的特殊争斗,他们负有主要责任,正是这些争斗使流亡军队和流亡元老院四分五裂。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马尔库斯·比布鲁斯、提图斯·拉宾努斯和其他激进分子把他们的理论付诸行动,他们大批屠杀落入他们手中的恺撒军队的军官和士兵;这当然不会动摇恺撒的军队,削弱其斗志。恺撒不在意大利期间,对宪法派有利的反革命活动,在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却没有爆发,据恺撒的明智些的敌人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普遍担心复辟成功后,共和派激进分子们难以抑制的暴行。庞培阵营中的仁人智士们对这种疯狂的行为深感绝望。庞培本人是个勇敢的战士,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和可能,他就宽大俘虏;但是,他太懦弱,态度暧昧,所以,他不能像一个最高统帅那样,对所有这种暴行进行阻止和警告。只有唯一的一个人,本着合乎道义的态度,极力试图与之作斗争,那便是马尔库斯·伽图。为了控制这种行为,他敦促流亡元老院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洗劫归顺的城市,不准像在战斗中那样杀害市民。精明能干的马尔库斯·马塞鲁斯也持同样的态度。但是,没有人比伽图和马塞鲁斯更明白,如果必要的话,激进派会置元老院的所有决定于不顾,继续他们的自救行动。即便在人们还必须遵循明智的考虑之时,激进派的怒气就已无法抑制,那么胜利之后,人们可能就要准备接受恐怖统治了,即便是当年的马利乌斯和苏拉,也会对此不寒而栗,从而避免这一情况。所以,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伽图自己承认,他害怕自己这一派的胜利甚于害怕失败。——马其顿营地中军事准备的领导权掌握在最高统帅庞培手中。由于705年的不幸事件,他那一直就很艰难、受到压制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了。他的同党们认为,他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这从许多方面说都是不公平的。他们所遭受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下级指挥官的失误和对抗,特别是执政官林都鲁斯和卢西乌斯·

多密提乌斯。庞培自从就任军队最高统帅起，他就巧妙、勇敢地指挥着军队，至少，他从那场海难中挽救出可观的部队。他无法与恺撒的为所有人公认的、超群的天才相匹敌，但公正地说，他不应为此受到责备。但是，一切都仅仅取决于成就。当初，由于信任庞培，宪法派才同恺撒决裂；现在，决裂的一切恶果都要算到庞培头上，虽然由于其他指挥官军事上极其无能，所以没有尝试撤换庞培的最高指挥权，但是对他的信任已经减弱了。除了战争失败的后患，还有流亡的不利影响。到来的难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勇敢的士兵和有才能的军官，特别是原西班牙军队。但是，真正来服务和战斗的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高级将军的数量之多，这些人和庞培一样，有充分的权利自称是代理执政官和大将军，此外还有许多高贵的绅士，他们或多或少是不情愿服兵役的。通过这些人，首都的生活方式被带入军营，这对军队没有丝毫好处：这些大老爷们的帐篷成了优雅的公寓，地上是优美的天然草坪，四壁爬着常春藤；桌上摆着全套的银质餐具，他们常常大白天就聚众狂饮作乐。这群高贵的士兵同恺撒的草芥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吃的粗面包使他们震惊，而且，由于缺少粗面包，恺撒的士兵们连树根都吃，但是，他们发誓，宁可啃树皮，也不放走敌人。此外，如果说庞培因为不可避免地要顾及到有一个团结的机构——这个机构对庞培已不感兴趣——而使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那么，当流亡元老院把院址几乎就设在总指挥部，并对流亡的一切怨恨都在元老院会议中得以发泄之后，庞培的处境则变得愈发困窘了。当时找不到一个重要人物有能力扭转这种局面。庞培本人太没有主见，他犹豫不决、愚笨、暧昧。本来马尔库斯·伽图至少具备必要的道义权威，并且也有支持庞培的愿望，但是，庞培不仅没有请他帮助自己，反而出于不信任和嫉妒冷淡他。例如，庞培宁肯把重要的海军最高指挥权交给各方面都无能的比布鲁斯，也不交给伽图。如果说庞培以他惯有的错误方法对待支持他的政治派别，从而使本来就

已恶化的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与此相反，他却以值得称赞的巨大热情致力于本党派重要的、但已涣散的军队的军事整编。军队的核心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部队，再加上伊利里亚的战俘和定居希腊的罗马人，共组成五个军团。另外三个军团来自东部：两个由克拉苏斯军队残余组成的叙利亚军团，一个由一直留在西里西亚的两个弱小军团合并成的军团。调动这些驻军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一方面庞培党人同帕提亚人相处甚好，而且，如果不是庞培愤怒地拒绝了对方提出的结盟条件——要求庞培放弃被他划入罗马帝国版图的叙利亚领土——双方有可能结盟；另一方面，恺撒打算派两个军团去叙利亚，并通过扣押在罗马的亚里斯多布鲁斯王子，再次迫使犹太人参加他的军队，这一计划由于各种原因和亚里斯多布鲁斯的死而告失败。此外，定居克里特和马其顿的退伍士兵组织了一个军团，小亚细亚的罗马人组织了两个新军团，另外，还有二千名来自西班牙主力部队余部和其他类似部队的志愿兵，最后，还有各臣属地的按出兵额派来的部队。和恺撒一样，庞培也曾拒绝从臣属地征调部队，只是为了把守海岸才征集了埃壁鲁斯、埃托利亚和色雷斯民兵，此外，轻型部队里还招收了三千名希腊、小亚细亚射手和一千二百名投掷手。相反，骑兵部队中，除了一支由罗马年轻贵族组成的华而不实、没有军事意义的显贵卫队和被庞培训练成骑兵的阿普利亚牧奴外，其余都是罗马臣属地和附属国的部队。核心是凯尔特骑兵，一部分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驻军，一部分是国王狄奥泰鲁斯派出的兵员，国王尽管年事已高，但还是亲自挂帅出征，其余的是加拉西亚王公们的部队。优秀的色雷斯骑兵也与他们联合起来，色雷斯骑兵中一部分是由首领萨达拉和拉斯科普利斯带来的，另一部分是庞培在马其顿招募的。此外还有卡巴多西亚骑兵、科马基尼的安齐奥科斯国王派来的骑兵射手、分别由塔克西勒斯和麦加巴特斯率领的幼发拉底河两岸的亚美尼亚骑兵、国王尤巴派来的努米底亚骑兵部队——骑兵部队总数达七千多骑。——

最后，庞培的海军舰队也很强大，其中一部分是从勃隆度辛带来的或后来建造的罗马船只，还有一部分是埃及国王、科尔基斯诸首领、西里西亚王公塔孔狄摩托斯的战舰以及提罗、罗得斯岛、雅典、克基拉等各城邦和所有小亚细亚及希腊各海国的战舰，共约五百艘，其中罗马船只占五分之一。提尔哈基翁储备了大量粮食和战备物资。由于庞培党人掌握着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并将他们所管范围内的各附属诸侯、德高望重的元老院议员、纳税者和全体罗马人及非罗马人的资金都据为己用，所以，他们的战争储金也很充足。凡是在非洲、埃及、马其顿、希腊、亚洲西部和叙利亚，利用合法政府的威望和庞培引以为荣的附属国王和附属民族所能做到的一切，都被用于保卫罗马共和国。如果说意大利到处在谈论，庞培把基提人、科尔基斯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武装起来反对罗马，如果说庞培在军营中是“众王之王”，那么这丝毫也不夸张。庞培统率的军队总共包括七千骑兵和十一个军团——当然，这十一个军团中最多只有五个可以说有作战经验——和一支有五百艘船的舰队。庞培非常关心士兵们的给养和军饷，并且保证，如果取得胜利，将给予他们巨额奖赏，所以士兵们的情绪普遍较好。在有些军团中，恰恰是那些英勇善战的军团，情绪更是高涨。但是，庞培军队中的一大部分是新招募来的队伍，要组织和训练他们，不管进行的速度多么快，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总而言之，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但同时也有些不均衡。

按照最高统帅庞培的意图，到705年—706年冬天，步兵和舰队应该基本上全部汇集到埃壁鲁斯水域及其沿岸。海军统帅比布鲁斯已经带领一百一十只战船到达克基拉的新指挥部。然而，陆军——它的夏季指挥所设在哈利亚克蒙河畔的贝尔呼阿——却落在了后面；部队在从特萨洛尼卡到西海岸的公路上缓慢行进，向未来的指挥所提尔哈基翁靠近。麦特鲁斯·西庇阿从叙利亚带来的两个军团甚至还停留在小亚细亚帕加玛附近的冬季营地，预计要到

春天才能到达欧洲。他们不着急。暂时，埃壁鲁斯各港口除了海军，都是由民兵和附近招募的部队守卫。—— 这样，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西班牙战争，恺撒仍然有可能在马其顿也发动进攻，至少，他毫不犹豫。恺撒早就安排了战船和运输船在勃隆度辛集中，并且在西班牙军队投降和马西利亚战斗结束后，立即把这两处的主力大部分调往勃隆度辛。但是，恺撒对士兵们的要求太高了，这种前所未闻的劳累比战斗带来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四个最老的军团之一的第九军团在行军路上经过普拉森齐亚时发动了叛乱，这是正在军队中蔓延的危险情绪的信号；但是恺撒的镇定和个人威望控制住了局势，所以，未对登船出征构成任何障碍。但是，705 年 3 月时，就是因为缺少船只而致使恺撒对庞培的追击失败，现在，同样的问题又威胁着这次远征。恺撒下令在高卢、西西里和意大利各港口建造的战船还未完成，或是还未运来。他在亚得里亚海的舰队于一年前在库里克塔岛附近被歼灭。恺撒在勃隆度辛附近的战船不超过十二只，而且没有足够的运输船，不能把他打算派到希腊去的部队——包括十二个军团和一千名骑兵　　的第三部分的人马一次运走。敌人强大的海军完全控制着亚得里亚海，特别是东海岸所有大陆港和岛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禁不住要问：恺撒为什么不放弃海路，转而选择穿过伊利里亚的陆路呢？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一切来自敌人海军的威胁，而且，对于他绝大部分来自高卢的部队来说，这条路比经过勃隆度辛的路要近得多。尽管伊利里亚地区极其荒凉贫困，但是，此后不久，就有别的军队穿过了这一地区，而在高卢的征服者看来，这一障碍似乎是无法逾越的。也许他担心，当他在伊利里亚地区艰难跋涉时，庞培会指挥他的全部军队渡过亚得里亚海，这样，双方的位置就会颠倒过来，会出现恺撒在马其顿，而庞培在意大利的局面。尽管恺撒愚笨的敌人根本不可能作出如此迅速的变动。也许当初，恺撒以为他的舰队能够在此期间达到令人刮目相看的水平，所以决定走水路。当他从西班牙回来，看到亚得

里亚海的真正局势，再想修改作战计划，已为时晚矣。或许，根据恺撒一贯喜欢迅速作出决定的性格，人们也许可以说，目前还未失去、而几天之后肯定会被敌军占领的埃壁鲁斯海岸对恺撒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所以，他打算通过一次大胆的行军，再次破坏敌人的全部计划。无论如何，706年1月4日[1]，恺撒率领由于疲劳和疾病而极大减员的六个军团和六百名骑兵，乘船从勃隆度辛出发，驶向埃壁鲁斯海岸。这次行动与那次大胆的不列颠远征交相辉映；但至少第一步是成功的。在阿克罗克劳努(奇玛拉)礁石中、在人迹罕至的帕雷阿萨(帕尔亚萨)停泊地，恺撒靠岸了。从奥利孔的港口(阿尔佛纳海湾)——那里停泊着庞培的一支十八艘船的舰队——和敌人设在克基拉附近的海军总指挥部，都能看到恺撒的运输船。但是，奥利孔的力量太弱，指挥部这边还未做好出航的准备，所以，恺撒的第一批部队未受到任何阻碍就登陆了。当船只马上返回去接第二批部队时，恺撒率领部队连夜登上了阿克罗克劳努的山顶。他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使敌人万分震惊。埃壁鲁斯守备军根本未作抵抗；重要的港口城市奥利孔、阿波罗尼亚和许多小村镇都被恺撒攻占；被庞培的军队选定为军备重地的提尔哈基翁，其守卫力量非常薄弱，该城连同其各种物资储备都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但是，战事并未按照这一辉煌的开局继续发展。之后不久，比布鲁斯通过加倍的努力，部分弥补了由于他的责任造成的疏忽。他不仅截获了约三十只返回的敌方运输船，并下令连人带船烧得片甲不留，而且沿着从萨松岛(萨希诺)到克基拉各港口之间被恺撒占领的海岸线，他都布置了最严密的巡逻。尽管当时气候寒冷，巡逻船的一切需求，甚至连木柴和水都要从克基拉运来，这一切，给巡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比布鲁斯的继任里波——他自己也很快领略了这种艰辛——包围了勃隆度辛港很长时间，驻守在勃隆度

[1] 根据修订过的日历是705年11月5日。

辛外的一座小岛上，直至因为缺水而被迫撤离。所以，恺撒的军官们无法给他们的统帅派去第二批部队。同样，恺撒在夺取提尔哈基翁方面也未取得进展。庞培从恺撒的一个和平使者那里得知，恺撒正准备渡海向埃壁鲁斯海岸行进，因此，庞培加快了行军速度，及时赶到了这一军事重地。恺撒的处境十分危急。尽管他凭借自己很少的部队在埃壁鲁斯取得了尽可能大的地盘，但是，他的军队的生活仍然很艰难、没有保障。而敌人，由于占据着提尔哈基翁的储备和海上优势，在各方面都很充足。恺撒不可能以自己不足两万人的军队，同至少是自己两倍的庞培军队交战，所以，当庞培非常谨慎地没有马上交战，而是在阿普索斯河右岸的提尔哈基翁和阿波罗尼亚之间，与左岸的恺撒遥遥相对，开始建立冬季营地，以便待开春等帕加玛的军团到达后再以绝对的优势一举歼灭敌人时，恺撒感到万分庆幸。这样，几个月很快过去了。如果有利的季节到来，敌人的援军大批抵达，并可以自由地使用舰队，而恺撒的处境又依然如故，那么，他和他弱小的部队将处在敌人强大的海军和三倍于自己的陆军的夹击中，被困在埃壁鲁斯的岩石间，恺撒就将失败。冬天很快就要过去了。恺撒所有的希望仍寄托在运输船队上：船队不可能溜过或冲过敌人的封锁。但是，由于有了第一次大胆的行动，所以，也有必要进行第二次尝试。由于船队还未到达，恺撒决定，仅仅凭借一只小渔船，渡过亚得里亚海，去勃隆度辛接自己的部队。这一决定表明，恺撒自己也意识到了处境已有多么危急。但是，因为没有船夫愿意进行这么冒险的航行，这一计划又破产了。不过，也用不着恺撒本人亲临指派，他忠实的、正在意大利指挥的军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便进行了援救统帅的最后一次尝试。他载着四个军团和八百名骑兵的船队再次驶离勃隆度辛港，幸运的是，他们借着一股强劲的南风驶过了里波的战船。但是，正是这股拯救了船队的风，使他们无法在阿波罗尼亚海岸登陆，他们被迫经过恺撒和庞培的营地，从提尔哈基翁向北，驶向里索斯，幸亏这

座城市是站在恺撒一边的。当他们驶过提尔哈基翁港时，罗得斯舰队出发追击他们。安东尼乌斯的舰队刚刚驶进里索斯港，敌舰也出现在港口外了。恰恰在这个时刻，风向转了，正在追击的敌舰又被刮回海上，一部分还被刮到礁石密布的岸边。由于这些绝妙的机遇，第二批部队的登陆成功了。尽管安东尼乌斯和恺撒之间还相距四天的路程，而且中间还隔着提尔哈基翁和全部敌军部队，但是，安东尼乌斯幸运地完成了绕过提尔哈基翁的行军，并通过格拉巴一巴尔干山脉的关卡，在阿普索斯河右岸和与他相向行进的恺撒相遇。庞培曾徒劳地试图阻止两部分敌军的汇合，并想迫使安东尼乌斯的部队单独与之交战。他在阿斯帕拉奇翁附近占据了一个新阵地，并驻守下来。阿斯帕拉奇翁位于基努萨斯（乌施科莫宾）河边，该河与阿普索斯河平行，处在阿普索斯河与提尔哈基翁城之间。恺撒觉得自己现在很强大，可以与敌军作战了；庞培却没有这种打算。所以，恺撒成功地蒙蔽了敌人，他突然带领行军能力较强的部队——与在伊利尔塔的做法相似——插进敌军阵地和敌人所依赖的提尔哈基翁堡垒之间。格拉巴一巴尔干山脉自东向西延伸，在亚得里亚海伸入狭窄的提尔哈基翁沙嘴，该山脉在提尔哈基翁东边三里处，向南伸出一个支脉，它也蜿蜒伸向海里，主脉和支脉之间包围着一小块以海滩礁岩为中心的平地。现在，庞培选择这里作他的营地，尽管他和提尔哈基翁之间的陆路已被恺撒的军队截断，但他凭借舰队，仍然与该城保持着联系，并能轻易地从那里得到足够的必需品。相反，在恺撒一方，虽然大批军队被调回后方，虽然恺撒作了种种努力，使运输正常进行，以保证正常的供应，但是，运来的食物还远远不够吃，肉、大麦甚至树根经常取代了通常所吃的小麦。由于冷静的敌人一直保持被动的姿态，恺撒占领了庞培营地周围的制高点，以便能观察到强于自己的敌军骑兵，和不受阻碍地对提尔哈基翁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有可能的话，迫使敌军交战或登船。恺撒军队中几乎一半已调回内地，用剩下的部队去包围

两倍于自己、驻扎集中的并有海和舰队可依赖的敌军，这似乎太冒险了。但是，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恺撒的身经百战的士兵们还是用一道三德里半的哨兵链包围了庞培的营地。之后，同在阿来西亚一样，在这条内圈防线外面，又增添了第二道外圈警戒线，以防备来自提尔哈基翁的进攻和防止敌人凭借舰队轻而易举地进行包围。庞培对这些工事进行了多次个别进攻，试图在恺撒的阵线上打开突破口，但他从未尝试通过战斗阻止敌人的包围行动，而是宁可在自己的营地周围也设置了一圈工事，用军队把它们联结起来。双方都尽可能向前推进工事，但是，由于不断交战，双方作业进展很慢。与此同时，在恺撒营地的对面，双方都在争着占领提尔哈基翁城外的地盘。由于获得了城堡内的默许，恺撒企图将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由于敌人舰队的阻挠而未成功。在不同的地点，不断进行着激战——甚至在最热的一天，六个地方同时交战——在这些交战中，一般都是恺撒的士兵们的勇敢占了上风。例如，有一次，恺撒的一个步兵队在战壕中顶着敌军四个军团的进攻，坚守了几个小时，直至援军赶到。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双方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包围所带来的后果，使庞培的军队越来越感到压抑。由于从山顶流入平地的所有溪流都被堵塞，迫使庞培的军队不得不使用量小、质差的井水。更严重的是缺少给驮畜和战马的饲料，船队也不能保证足够的供应；牲畜大量死去，通过船队把它们运到提尔哈基翁的做法也见效甚微，因为那里也没有足够的饲料。庞培不能再继续犹豫了，他必须马上同敌人开战，使自己摆脱困境。他从凯尔特叛徒嘴里得知，敌人忽略了用一道横堤，对其两个相距 600 步的工事链之间的沙滩进行把守，于是，庞培做好了他的计划。他一方面从营地向恺撒工事的内圈发动进攻，另一方面让驻扎在船上的轻型部队在敌人工事的另一侧登陆，攻击敌人的外圈工事，同时，他命令第三部分队伍插入敌人两圈工事之间，从背后袭击已疲于防守的敌人。距海最近的那个工事被攻占，守军仓皇逃跑；下一

个工事的指挥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费了很大劲，才守住了工事，并且暂时阻止住了庞培军队的挺进。但是，除了遭受到巨大的损失，最靠近海边的那个工事已落入庞培手中，战线被突破。所以，恺撒就愈发迫不及待地抓住不久之后得到的一个机会，用他的主力步兵去进攻一个由于疏忽而脱离了大部队的庞培军团。但是，这个军团进行了英勇抵抗，在一个曾多次被大小分队用作营地的、堤墙沟壕纵横交错的地带，经过交战，恺撒的右翼步兵和骑兵迷路了：他们没有去援助正进攻庞培军团的左翼部队，而是陷入了一条从一个旧阵地通向河边的交通壕。这样，带领五个军团急忙赶来增援的庞培看到，敌人的两翼已被隔开，其中一翼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恺撒的军队看到庞培赶来时，感到极度恐慌，狼狈问逃。如果说恺撒仅仅损失了一千名最优秀的士兵，而整个部队没有遭到彻底失败，那么，这只能感谢庞培，他没能在这片已被他切断的地区充分扩展，而且，由于担心这是一个军事策略，他开始时遏制着军队。但是，即使如此，对恺撒来说，这也是灾难性的日子。他不仅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他的工事、四个月艰巨工作的结果都被毁于一旦；经过最后几仗，他又被抛回到最初起点的位置。在海上，恺撒遭受的打击比别处更大：庞培的长子盖奈乌斯以一次大胆的进攻，把恺撒停泊在奥利孔港的为数不多的战船，一部分烧毁，一部分缴获，之后不久，又把留在里索斯的舰队同样全部烧毁。这样，恺撒失去了从勃隆度辛加强海上力量的一切可能性。摆脱了束缚的庞培骑兵部队，大批出现在周围，威胁着恺撒，要使一直就很困难的部队给养完全断绝。恺撒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向海上力量强大、有舰队可依的敌人发动攻势的冒险行动彻底失败了。在迄今为止的战争舞台上，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道无法战胜的防御，无论是对提尔哈基翁还是对敌人军队，他都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战斗。相反，现在一切都由庞培来决定，由他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向已受到缺乏生活资料的严重威胁的敌人发动进攻。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点

上。在此之前，根据所有现象，庞培在这场战争游戏中从未实施过自己的计划，只是根据敌人的每次进攻安排防御。但是，这无可指责，因为，由于拖延了战争，使庞培有机会加强新兵的战斗力，以便积蓄储备，进一步发展在亚得里亚海的海军优势。恺撒不仅战术上被打败了，而且战略上也失败了。这次失败尽管没有达到庞培不无道理地所希望的后果——恺撒的部下们凭借他们卓越的、军人的力量，没有让饥饿和哗变导致军队马上土崩瓦解——但是，看来一切只能取决于敌人，听任敌人有步骤地追击，让他们最后摘取彻底胜利的果实。

庞培方面可以发动进攻了，他作出了决定。他有三条不同的道路可以取得胜利。第一条、同时也是最简单的一条是，不放走已被打败的敌军，如果敌人逃跑，就追击。此外，庞培还可以让恺撒和恺撒的核心部队困在希腊，而他自己率领主力部队渡海回意大利，那里的民心都反对君主体制，并且，在恺撒最优秀的部队和勇敢、可靠的指挥官被派往希腊后，留在意大利的恺撒部队并不强大。最后，胜利者还可以转向内陆，把麦特鲁斯·西庇阿的军团并入自己的部队并尝试解散恺撒留在内陆的军队。早在第二批部队刚刚被运到恺撒那里之后，为了给部队搞到生活物资，恺撒就一面向埃托利亚和特萨利亚派遣了强大的特别分遣队，另一面派盖奈乌斯·多密提乌斯·卡尔文努斯率领一支两个军团的队伍，沿埃格纳提乌斯大路向马其顿进发，以便拦截从特萨洛尼卡出发、在同一条路上向这边靠近的西庇阿部队，如果有可能就单独消灭它。当卡尔文努斯和西庇阿行进到相距几里时，西庇阿突然调转回头，迅速渡过哈利亚克蒙河（伊季山旁的卡拉苏河）并在那里把物资留给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然后攻入特萨利亚，试图凭借己方的优势攻击由卢西乌斯·卡西乌斯·隆基尼乌斯率领的、正忙于该地受降事宜的恺撒新兵军团。但是，隆基尼乌斯却越过山岗，奔向安布拉奇亚，撤回到由盖奈乌斯·卡尔维希乌斯·萨宾努斯率领的、被恺撒派

往埃托利亚的特别分遣队中，西庇阿只能派他的色雷斯骑兵去追击，因为，他留在哈利亚克蒙河畔法沃尼乌斯处的物资受到了来自卡尔文努斯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是他曾想加之于隆基尼乌斯的。这样，卡尔文努斯和西庇阿在哈利亚克蒙河边又相遇了，并安营扎寨，对峙了相当长时间。——庞培可以在这些方案中任意选择。而恺撒则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性。在那次不幸的战役之后，他就开始向阿波罗尼亚撤退。庞培穷追不舍。从提尔哈基翁到阿波罗尼亚的道路被许多条河流隔断，所以，对一支战败了的、被敌人紧追其后的军队来说，这次行军并非易事。但是，统帅的巧妙指挥和士兵们非凡的行军能力，迫使庞培在追击了四天之后，不得不停止无益的追击。庞培现在要在出征意大利和向内陆进军之间作出选择。尽管前者看上去非常可取且有诱惑力，又有一些人支持，但是，庞培还是宁肯不放弃西庇阿的部队，而且，他还希望，通过这次征战俘获卡尔文努斯的部队。卡尔文努斯目前位于林塞斯泰人的赫拉克里亚附近的埃格纳提乌斯公路上，处于庞培和西庇阿之间，并且，在恺撒向阿波罗尼亚撤退之后，卡尔文努斯距恺撒比距庞培的大部队还远。尤其重要的是，他对提尔哈基翁的战况进展和他本人的危险处境一无所知，因为，在庞培取得了提尔哈基翁战役胜利之后，整个这一地区都站到了庞培一边，恺撒的信使到处被抓获。直到敌人的主力到达距卡尔文努斯只有几小时的路程时，他才从敌人前哨的讲述中知道了事情的现状。他马上动身往南向特萨利亚撤退，这使他在最后时刻免遭灭顶之灾。庞培感到满意的是使西庇阿脱离了危险境地。在此期间，恺撒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顺利到达阿波罗尼亚。在遭受了提尔哈基翁战败的灾难之后，他马上决定，只要有可能，就使战斗远离海岸，在内陆进行，以便使导致他前功尽弃的决定性因素——敌人的舰队，不再能起作用。向阿波罗尼亚——他的储备在那里——进军的唯一目的是，把伤员带到安全地带，并付给士兵们酬劳；在这些事情办完后，恺撒在阿波罗尼亚、

奥利孔和里索斯留下守军，就动身前往特萨利亚了。卡尔文努斯的部队也在去往特萨利亚的路上。昆图斯·科尼菲西乌斯率领两个军团的增援部队从意大利出发，正行进在伊利里亚的乡间公路上，向这边靠近，于是，比在埃壁鲁斯还容易，恺撒便把这支部队并入自己的队伍。沿着阿沃斯河谷的崎岖小路向上，翻过埃壁鲁斯和特萨利亚之间的山峦，他到达了佩内伊欧斯河畔。卡尔文努斯也恰恰行进到这里，于是，在那条最短的、受敌人威胁最小的路上，两支队伍汇合了。这次会师在埃奇尼翁附近，距佩内伊欧斯河的源头不远。汇合后的军队遇到的第一座特萨利亚城市是贡福阿，该城对他们关闭了城门。但它很快就被攻克并遭到洗劫，因此而惊恐万分的其他特萨利亚城市，一见到恺撒的军队来到城墙外，便纷纷投降。通过这些征战，凭借佩内伊欧斯河地区提供的尽管还称不上丰富的储备，对以往那些艰难不幸日子的回忆和痕迹渐渐消失了。——提尔哈基翁的胜利并没有给胜利者带来太多的直接的好处。庞培带领着行动迟缓的步兵和众多的骑兵，不可能进山追击行动敏捷的敌人。恺撒和卡尔文努斯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会师后安全地驻扎在特萨利亚。也许，现在最正确的做法是，庞培马上率领主力部队乘船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无疑会取得胜利。但是，只有一个海军分队奔赴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联盟阵营中普遍认为，经过提尔哈基翁的战斗，与恺撒之间的胜负已经很明了了，只等摘取胜利果实了，也就是说，需对战败的敌军穷追不舍。迄今为止，庞培一直采取了过分谨慎小心的行为，现在，他又转而采取更加不合时宜的过分自负的做法，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追击实际上已经失败了，而现在，他必须做好准备，在特萨利亚同一支完全恢复了的、重新组织过的军队遭遇，他也没有意识到，远离了海洋，没有了舰队的支持，随敌人来到由敌人选定的战场，是非常危险的。他还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同恺撒交战，所以要选择尽可能舒适的道路尽快接近恺撒。伽图接管了提尔哈基翁和克基拉岛的指挥权，在提尔哈基翁有

十八个步兵队的守军，在克基拉岛停泊着三百只战船；庞培和西庇阿出发了，庞培看来是沿着埃格纳提乌斯公路直到佩拉，然后挺上通往南方的大路，西庇阿从哈利亚克蒙河出发，经过奥林匹斯山的关卡，到达佩内伊欧斯河下游，最后，二者在拉里萨附近会合。恺撒位于拉里萨南面的平原上——这个平原处在基诺斯克发莱丘陵和奥特里斯山区之间，佩内伊欧斯河的支流埃尼佩乌斯河流过该平原——恺撒就在这条支流左岸、法萨鲁斯城附近。与恺撒遥遥相对，庞培在埃尼佩乌斯河右岸、基诺斯克发莱山坡上驻扎下来。庞培的军队已全部到齐，而恺撒还在等待以前被派往埃托利亚和特萨利亚的近两个军团的部队——现在，这支部队由昆图斯·福菲乌斯·卡雷努斯率领，正在希腊——以及后来被派去援助他的、经意大利公路已到达伊利里亚的两个科尼菲西乌斯军团。庞培的军队包括十一个军团或者说四万七千人和七千坐骑，他的步兵和骑兵分别是恺撒的两倍和七倍。而连续的劳累、征战使恺撒的军队大受损耗，他的八个军团中，有战斗力的不过二万二千人，大大低于正常状态的一半。胜利了的、拥有众多骑兵且装备精良的庞培部队有足够的粮食，而恺撒的部队只能忍饥挨饿，期待着不久后的粮食收获能改善供给状况。庞培的士兵们在上一次战役中认识了战争，学会了信任自己的统帅，目前，他们的情绪正处于巅峰状态。所有军事因素都对庞培有利，都说明既然现在已经在特萨利亚与恺撒对峙，就不应该再犹豫，应该马上进行决战；比这更重要的还有战争委员会中那些高级军官和随军人员作为流亡者的迫切心情。从提尔哈基翁胜利以来，他们就把自己一方的最后胜利看成是既定事实；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就接任恺撒的总祭司职位一事发生争执，并将委托书送往罗马，以便为将来大选时能在广场租订房子。所以，当庞培对主动渡过两军之间的河流——恺撒由于自己力量太弱而不敢渡河——表示出忧虑和迟疑时，在他的军队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说，庞培之所以犹豫着不开战，是想延长一些

他控制如此众多执政官和行政官的时间，想永久保持他的阿伽门农角色。庞培让步了；恺撒以为现在还不会开战，所以，他已经计划好避开敌人军队，正准备出发前往斯科图萨，当他看到庞培的军队准备渡河到他这岸时，马上组织军队应战。就在一百五十年前，罗马人就曾经在这个战场上确立了他们在东方的统治地位，现在，706 年 8 月 9 日，几乎就在同一战场，法萨鲁斯战役开始了。庞培派他的右翼到埃尼佩乌斯河畔，相应地，恺撒将自己的左翼派到该河边被分成两部分的平台地带；两军的另外两翼散布到平原上，双方都有骑兵和轻型部队的掩护。庞培的打算是，让他的步兵处于防御状态，而让骑兵去击溃对面的、按照德意志方式与轻型步兵混合的、弱小的恺撒骑兵部队，然后从背后攻击恺撒的右翼。庞培的步兵英勇地顶住了敌人步兵的第一次进攻后，这里的战斗停止了。拉宾努斯在遇到勇敢的、但短暂的抵抗之后，击溃了敌人的骑兵，然后转向左边，以避开步兵。但是，恺撒早已预料到自己的骑兵会失败，所以，他在骑兵的后面、在右翼受到威胁的那一侧布置了二千名最优秀的军团士兵。当敌人的骑兵正在战线四周追赶恺撒的骑兵时，突然碰上这群毫无畏惧地向他们逼近的核心步兵队而遭到了出乎意料的、异乎寻常的步兵攻击[①]，于是立即陷人混乱之中，并策马逃离战场。大获全胜的恺撒军团士兵狠狠打击了没来得及逃去的敌军射手，然后向敌人左翼逼近，开始包抄敌人。与此同时，恺撒开始了迄今为止一直试图避免的第三次交锋，并发动全线进攻。庞培军队中最优秀的兵种出人意料地失败，使敌人的士气大长，使自己的军队、特别是统帅庞培丧失了斗志。庞培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的步兵，当他看到连骑兵也被击退时，还没等恺撒下令发

---

① 这里，恺撒给他的士兵们下了一道著名的命令：刺敌人骑兵的脸。恺撒的步兵部队以极其不合常规的方式向敌骑兵进攻，但敌骑兵用马刀，难以对付。恺撒指示，步兵不应扔掉他们的投枪，而应将之用作矛，对付敌人骑兵，并且，为了更好地抵御他们，用投枪向敌人的上方刺。

起全面进攻，就立即撤离战场，策马逃回大本营。他的军团也开始动摇，接着就渡过河向大本营逃窜，因而损失惨重。现在，大势已去，不少优秀士兵阵亡，尽管如此，庞培的军队还是基本完整，庞培的处境比恺撒在提尔哈基翁战败后的处境要好得多。但是，如果说恺撒已通过自己的命运变化懂得，幸运会在瞬间抛弃它的宠儿们，以便使他们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再次取得成功。而庞培却把幸运看成是不变的女神，所以，当幸运女神离开他时，他就对自己、对幸运女神丧失了信心；如果说由于恺撒伟大的禀性，能使绝望转化为巨大的力量，那么，处于同样的压力之下，庞培那可怜的灵魂就会陷入无底的痛苦的深渊。当年，在同塞多利乌斯的战争中，庞培就曾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溜之大吉，现在，他又故技重演，当他看到各军团渡河回逃时，他也扔掉了他那倒霉的指挥官绶带，骑马奔上通往海边最近的路，试图在那里找到一艘船。他的军队已毫无斗志，且群龙无首——尽管庞培承认了西庇阿和他共同拥有最高指挥权，但后者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他们幻想着在大本营的壁垒后找到藏身之处。但是，恺撒却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罗马和色雷斯守军的顽固抵抗很快被压制住，他们被迫仓惶地退向克拉农和斯科图萨山顶——他们的大本营就设在山脚下。他们打算在山丘上继续向前行进，重新回到拉里萨。但是，恺撒的军队不顾损失和疲劳，沿着平坦的大路向平原前进，拦住了逃军的道路；当庞培的军队在夜间停止行军时，他们的追击者已经挖了一条战壕，封锁了逃军去往附近的唯一一条河道。这样，法萨鲁斯的一天结束了。敌军不仅被打败，而且被消灭了。战场上，敌人死伤达一万五千人，而恺撒的军队只损失了二百人；敌军余部约两万人，在战后第二天清晨放下武器投降了。只有一些小股部队，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军官们，试图逃往山里；十一个敌方军团标志中，已有九个被送到恺撒面前。恺撒在战斗开始时就已告诫自己的士兵们，不要忘记，敌人也是自己的同胞，他不像比布鲁斯和拉宾

努斯那样对待俘虏；可是，就连他也认为，现在必须采取严厉手段。普通士兵被编入他的军队，出身比较高贵的人被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被俘的元老院议员和著名骑士，除个别例外，都被处死。宽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无所顾忌、越不可调和。

706年8月9日的后果，过了一段时间才被完全认识到。最不容置疑的是，原来把法萨鲁斯的战败者作为强者来支持的各方，都转到恺撒一边；由于庞培的失败太彻底，因此，所有不愿意或认为没有必要再为大势已去的事业而战斗的人，都归顺了胜利者。所有以前曾经依附于庞培的国王、部族和城市，现在都纷纷招回他们的海军、陆军部队，并拒绝接纳战败一方的在逃部队——这其中包括埃及、塞勒尼和叙利亚、腓尼基、西里西亚及小亚细亚各城镇、罗得斯岛、雅典和整个东方。博斯普鲁斯国王法那西斯尤其积极，当他听到法萨鲁斯战役的消息后，不仅收回了几年前被庞培宣布独立的法那哥利亚城和被庞培批准为科尔基斯王公的领地，而且还占领了由庞培借给狄奥泰鲁斯国王的亚美尼亚王国。在普遍归顺的形势下，唯一的例外是小城迈加拉——该城被恺撒包围并攻破——和努米底亚国王尤巴，他早在战胜了库里奥之后，就更加肯定地预料到恺撒会吞并他的国家，所以，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不得不坚定地站在失败者一边。如同各附属地区投降法萨鲁斯战役的胜利者一样，宪法派的残余也纷纷归顺，所有半心半意地跟着庞培干的，或是马尔库斯·西塞罗之类，像魔怪之山周围的半妖一样围着贵族转的人，都来同新的独裁者达成和平，恺撒以一种藐视的宽容，非常乐意并礼貌地满足了这些请求者的愿望。但是贵族的本质却没有改变。贵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贵族们永远不会接受君主制，即便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揭示也是短暂的。曾是真实的宗教，会变成谎言；曾是美好的国家制度，会变成灾难。但是，就连已过时的福音也找得到拥护者，即使这种信仰不能像对真理的信仰

一样有移山的能力，但是直到衰落，它都会坚定不移，并且在它失去最后一位传教士和居民之前，在由一个新的、摆脱了那些过去的和过时的模式的种类来统治年轻化的世界之前，它是不会离开现实领域的。在罗马就是这种情况。现在落入堕落深渊的贵族统治，当初曾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制度，它曾经征服了意大利，战胜了汉尼拔的圣火，尽管现在变得昏暗、微弱，但是，只要还有罗马贵族存在，它就会继续在他们心中燃烧，这就使得旧统治制度的遗老遗少与新君主不可能达成相互的理解。宪法派的大部分人至少表面上是顺从的，因为他们接受了恺撒的宽恕，尽可能过着隐居的个人生活，所以也承认了君主制度。当然，他们这样做不是没有考虑的，他们内心里想的是，为将来发生巨变暂栖其身。这些人主要是不太重要的宪法派人。然而，就连曾与恺撒决裂的、精明能干的马尔库斯·马塞鲁斯，也非常明智地自愿流放到雷斯博斯去了。但是在真正的贵族多数派中，狂热却胜于冷静的思考。当然，这其中他们既自欺欺人地幻想还有可能取得胜利，同时也担心恺撒作为胜利者会不可避免地进行报复。没有人像伽图那样，能既不恐惧也不希望，而是痛切而清醒地判断形势。他深信，在伊利尔塔和法萨鲁斯战役之后，君主制已不可避免。而且，他在道义上足够坚强，能承认这一痛苦的事实，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曾有片刻的动摇，不知道宪法派是否还要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因为，对于一项失败了的事业来说，这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要求许多人作出牺牲，而且牺牲者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作出牺牲。当他最后决定继续同君主制作斗争时，他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一个更快、更光荣的毁灭。他试图尽量不把那些想在共和制灭亡中幸免于难、并甘心接受君主制的人牵扯到战争中来。他认为，在共和制受到威胁时，人们有权利有义务强迫所有不坚定和恶劣的公民参加战斗。但是，现在再去逼迫那些随着共和制的失败自己也堕落的人，已经没有意义，并且太残酷。他不仅放走了那些要求回到意大利的人，而且，当狂热的宪法

派中最狂热的分子、庞培之子盖奈乌斯强烈要求处死这些人、特别是西塞罗时，是伽图运用自己道义上的权威，予以制止。——庞培也不希望和平。如果他是一个无愧于他现在所处的位置的人，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他已经明白，谋取最高权力的人，不可能再回到普通的生存轨道上来，所以，在世界上没有失败者的位置。但是庞培可能并不把请求宽恕——宽容大度的胜利者也许不会拒绝他——看成很伟大的举动，相反，他很可能把它看得很卑贱。也许是庞培下不了决心相信恺撒，也许是法萨鲁斯灾难的直接印象逐渐消失后，庞培又以一贯的不明了、不确定的方式，重新开始获得希望。总之，庞培决定继续进行同恺撒的战争，并在法萨鲁斯之外，另找一个战场。

于是，尽管恺撒一直努力通过智慧和克制来平息敌人的怨恨，并减少自己敌人的数量，然而斗争还是不可改变地继续着。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曾参加过法萨鲁斯战役，除了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阿希诺巴布斯在逃亡中被杀死外，其他人均死里逃生。但他们被驱散到四面八方，所以不能一起商定一个继续作战的共同计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部分穿过荒芜的马其顿和伊利里亚山区，另一部分借助舰队——来到了克基拉，马尔库斯·伽图指挥着留守在那里的后备军。在那里，召开了一个由伽图主持的所谓战争委员会，出席的有麦特鲁斯·西庇阿、提图斯·拉宾努斯、卢西乌斯·阿夫拉尼乌斯、庞培之子盖奈乌斯和其他人。由于最高统帅不在场，而大家又不知道他命运如何，加之党派内部涣散，所以无法作出共同决定。最后，每个人都提出了对自己或对共同事业最适当的道路。事实上，要在这么多救命稻草中找出可以在水面上浮得时间最长的那根，这的确非常困难。法萨鲁斯一役丢失了马其顿和希腊。尽管伽图在获悉提尔哈基翁的失败后立即撤退，尽管他和鲁提利乌斯·卢普斯在一段时间内还分别为宪法派占据着克基拉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一段时间看来，庞培的军队似乎想在伯罗奔尼撒

半岛的帕特雷进行抵抗，但是，一条关于卡雷努斯正率军向他们靠近的消息，就使他们闻风而逃。同样，他们也没有对坚守克基拉作太大的努力。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海岸，提尔哈基翁胜利后被派到那里的庞培舰队，在对勃隆度辛、墨西拿和维博港的进攻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在墨西拿，他们烧毁了正在装备中的全部恺撒舰队。但是，在这里活动的战船，大多数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所以，在法萨鲁斯战役后都被各自的地区召回，这次出征也随之结束了。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两派目前都没有军队，只有一个例外是法那西斯的博斯普鲁斯军队，据称，它是为了恺撒而占领了恺撒敌人的领地。在埃及，尽管还有一支可观的罗马军队——它主要是由加宾尼乌斯当初留在那里的部队和之后从意大利流浪者及叙利亚或凯尔特强盗、流氓中征召的部队组成。——但是，在埃及战船被召回后，不言而喻，亚历山大里亚宫廷马上公开宣布，它绝对没有继续站在战败者一方的意图，也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军队提供给战败的一方使用。战败一方在西方的前景相对好一些。西班牙民众中同情庞培的势力很大，以致恺撒的军队被迫放弃他们打算从那里进攻非洲的计划，而且，一场暴动似乎不可避免，几乎迫使一名高级指挥官亲临西班牙半岛。而在非洲，从705年秋季以来，联盟，或更多地是当地的统治者、努米底亚国王尤巴，就不受干扰地扩军备战。如果说联盟在法萨鲁斯战役后失去了整个东方，那么，它在西班牙还有可能、在非洲则肯定可以体面地继续战争；因为，虽然借助早已臣服于罗马的努米底亚国王的帮助来对抗本国的革命者，对罗马人来说是奇耻大辱，但这绝不是卖国。在这场绝望的斗争中既不再拥有公理、也不再顾及荣誉的人，他们有可能置准则于不顾而建立强盗武装，或者与独立的邻国结盟，把国家的敌人牵扯进内部争斗，或者最后口头上承认君主制，却利用刺客的匕首进行复辟合法的共和制的活动。失败者自愿退出并拒绝新的君主制，这至少是他们绝望处境的自然的、正确的反映。山区、特别是海洋历

来就是所有罪行的避难所，也是深重的痛苦和被压制权力的避难所。显然，庞培党人和共和派人只能在山里和海上，同把他们赶出去的恺撒君主制继续作顽强的战争，特别是进一步以更大的规模、更一致的步调、更明确的目标进行海盗活动。即便是在来自东方的舰队被召回之后，他们仍拥有可观的、自己的海军，而恺撒的战船依然少得可怜。他们同达尔马西亚人的联系——达尔马西亚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反抗恺撒——以及他们对重要海域和港口的控制，使他们在海战中，特别是在小规模海战中，有希望占优势。当初苏拉对民主派人的迫害，由于塞多利乌斯领导的反抗而结束。那次反抗开始时只是强盗行为，后来是海盗活动，最终发展成真正的战争。如果伽图的贵族派中或庞培的追随者中也有当初马利乌斯民主派的精神和热情，如果他们当中有真正的海上之王，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占优势的海上建立一个独立于恺撒君主制的、并与之抗衡的国家。——无论如何，把一个独立的邻国扯人罗马内战、并通过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想法，遭到了激烈的指责；投敌者会比强盗们受到更强烈的法律和良心的谴责，强盗集团比投靠国家敌人的流亡者更容易退回到建立一个自由的、有秩序的国家的道路上去。另外，失败的一派几乎不可能通过联合别国的方式进行复辟活动。唯一一个能够向他们提供支持的国家是帕提亚国，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该国是否把庞培党人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而且，它绝不可能为此同恺撒对抗到底。——共和派人谋反的时机还未成熟。

失败一方的残余束手无策地听天由命，那些决心继续斗争的人，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如何继续进行斗争。这时，恺撒以他一贯的迅速决定、迅速行动的作风，决定把别的事务暂且放在一边，去追击庞培。在恺撒的敌人中，庞培是唯一一个作为军官赢得恺撒尊敬的，抓到他，有可能使一半的敌人、甚至是比较危险的那一半敌人就范。恺撒率领少量部队乘船渡过赫勒斯蓬特海峡——在这条

海峡中，他唯一的一只小船遇到一支被派往黑海的敌人舰队，这一舰队得知法萨鲁斯战役的消息后，如同瘫痪了一般，全部就擒——在作出了一系列最必要的安排后，恺撒继续向东紧追庞培。庞培在法萨鲁斯战役之后，来到雷斯博斯，从那里接了他的妻子和次子塞克斯图斯，然后继续绕过小亚细亚，到达西里西亚，再从那里乘船前往塞浦路斯。他本来可以去克基拉或非洲寻找他的同党，但是，出于对其贵族同伙的厌恶，也考虑到法萨鲁斯战役后，特别是在他可耻地逃跑之后，同党们的反应，于是他决定走自己的路，宁肯寻求帕提亚国王的保护，也不去伽图一伙那里。当庞培正忙于向塞浦路斯的佣农和商人们征收钱和奴隶，并武装起一支两千奴隶的队伍时，传来了安齐奥基亚宣布支持恺撒的消息。去往帕提亚的路不通了。于是，他改变计划，乘船前往埃及，那里的军队中有一批原来他手下的士兵，而且，该国的位置和丰富的辅助资源，可以为他提供时间和机会，以重新组织战争。在埃及，托勒密·奥勒特斯死后(703年5月)，他的孩子——十六岁的克娄巴特拉和十岁的托勒密·狄奥尼索斯，根据他们父亲的意愿，以夫妻的形式共同登基。但是不久，弟弟、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监护人波泰努斯，就把姐姐赶出了埃及，克娄巴特拉被迫逃往叙利亚寻求避难，在那里，她积极进行打回祖国的准备工作。当庞培准备在卡西乌姆海角靠岸，并派人向国王请求允许他登陆时，托勒密和波泰努斯为了对付克娄巴特拉，守住东部边界，正带领全部埃及军队驻守在佩鲁西翁附近。埃及宫廷早已听说了法萨鲁斯的灾难，所以准备拒绝庞培。但是，国王的宫廷教师特奥多图斯提出，如果拒绝庞培，他很可能利用他在埃及军队中的关系而唆使军队造反；更保险的、同时也顾及到恺撒的做法是，利用这个机会除掉庞培。类似的政治考虑，在古希腊世界的政治家们那里，是不会不起作用的。皇家军队的将领阿基拉斯和几个原庞培手下的士兵，乘一只小船靠近庞培的船，请他去见国王，并说，由于航道水太浅，请庞培上他们的小船。当庞培下船

时，军事护民官卢西乌斯·塞普提密乌斯从背后刺死了他，而且是当着庞培妻子和儿子的面。他们站在甲板上，眼睁睁地看着庞培被杀死，既不能救他，也无法报仇(706 年 9 月 28 日)。十三年前的这一天，庞培击败米特拉达梯斯，胜利进入首都，而十三年后的同一天，在卡西乌姆海滩的一个荒凉的沙丘上，这个一生中都是伟人的、统治了罗马多年的人，却死于自己的一个旧部的手下。可以说庞培是个优秀的军官，但却才智平庸，三十年来，命运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让庞培完成所有辉煌但却并不费力的任务，允许他窃取别人的成果，给他所有条件去夺取最高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在他身上，树立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虚假伟大的例子。在种种可耻的角色中，没有比拔高自己的庸才更可耻的了。由于在民众中，一千年也出不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国王，因此，君主制下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这种可耻的现象，这正是君主制的悲剧。如果说，表象与实质之间的不平衡从未像在庞培身上表现得那样突出，那么，人们可以严肃地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庞培开了罗马君主的先河。——当恺撒追踪庞培来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停泊地时，一切都已过去了。当凶手把庞培的头颅献到恺撒船上时，恺撒万分震惊地掉转头去。庞培是恺撒的女婿，并且是多年共同统治中的同志，为了活捉庞培，恺撒才来到埃及。如果庞培被活捉，恺撒将如何处置他？这个问题被操之过急的凶手的匕首所截断。但是，在恺撒伟大的胸怀中，除了雄心之外，还有人类的同情心，他的同情心要求他宽恕以前的朋友，另外，他自身的利益也要求他以别的方式处置庞培，而不是选择刽子手。庞培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曾是公认的罗马的统治者，这种根深蒂固的统治，不可能随着统治者的死去而消亡。庞培的死不仅没有使庞培党人解体，相反，在失去了一个年迈、无能、没用的首领之后，他们得到了庞培的两个儿子盖奈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做首领，两个人都年轻、精力旺盛，其中次子性格坚决果断。世袭王位继承制度立即像寄生虫一样附着在新建立的世

袭君主制上。非常值得怀疑的是，在这一人事变动中，恺撒失去的是否比得到的还要多。

在此期间，恺撒在埃及无事可做，罗马人和埃及人都希望他马上乘船返回，去处理非洲投降和胜利之后就亟待解决的繁杂的组织工作。但是，恺撒按照他的习惯，既然到了这个遥远的国度，就要立即亲自去彻底治理那里的事宜。他深信，罗马驻军和埃及宫廷都不会对此有任何异议。另外，他面临着急迫的财政危机，所以，他带领缩减到三千二百人的两个随身军团和八百名凯尔特和德意志骑兵，在亚历山大里亚登陆，在国王的城堡中安营扎寨，开始征收所需的钱款。他不理睬波泰努斯多管闲事的说法——恺撒不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耽误自己的大事——着手整顿埃及的王位继承顺序。他对埃及人采取了公正、宽厚的态度。尽管埃及人当初支持庞培，使恺撒有理由向他们征收军税，但是，这个财源已近枯竭的国家得到了宽恕，而且，那笔于695年商定的、至今只支付了一半的款项，其余部分都被免去，只要求埃及最后一次性支付1000万德纳尔(合300万塔勒)。进行战争的姐弟俩被命令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仲裁官恺撒邀请两人共同审理并判决此次争端。两人都表示服从。小国王当时就已在城堡中，克娄巴特拉赶赴那里。根据奥勒特斯的遗嘱，恺撒宣布埃及帝国归克娄巴特拉和托勒密·狄奥尼索斯姐弟夫妇共同所有。另外，他取消了以前收回塞浦路斯国的决定，自作主张地将塞浦路斯作为埃及的第二继承地交给奥勒特斯的两个幼子阿星纳和小托勒密。——但是，一场暴风骤雨正在暗中酝酿。亚历山大里亚同罗马一样，是个国际性城市，它的居民人数虽然远远不及意大利的首都，但其活跃的贸易思想、手工艺术、科学和艺术意识都远胜于罗马；城市居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如果还算不上政治意识的话，就姑且称为——不安分的精神因素，所以，他们像今天的巴黎人一样，经常积极举行街头暴动、骚乱，因此，当他们看到罗马统帅在拉各斯家族的官邸指手

画脚，而他们的国王们只能从恺撒的法庭得到权力时，他们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波泰努斯和小国王当然对催促他们限期偿还旧债极为不满，同时，他们对恺撒插手埃及的王位之争也不满意，因为其结果只能对克娄巴特拉有利，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为了满足罗马人的要求，他们故意大张旗鼓地把寺院的珍宝和国王的金餐具烧熔铸成钱币。而那些把他们闻名于世的富丽堂皇的王宫看成像自己的财产一样、并为之骄傲的虔诚信神的埃及人，看到他们的寺院四壁空空、他们国王的餐桌上摆着木制酒杯而深感愤怒。罗马占领军由于长期驻扎在埃及，并且许多士兵与当地埃及女子通婚，所以，也已经失去了很多民族性；另外，军队中有大批原庞培手下的老兵，还有在逃的意大利囚犯和奴隶。因为恺撒曾下令让占领军停止在叙利亚边境的行动，所以他们也对恺撒和他的一小撮傲慢的军团士兵心怀怨恨。早在罗马军队登陆时，埃及民众看见罗马的斩首刑具被抬进旧日的王宫，便发生了骚动。后来城里又发生了许多起对罗马士兵的暗杀活动，这些都使恺撒意识到，他和他为数不多的人马，面对着愤怒的埃及民众，处境十分危险。但是，由于这个季节正盛行西北风，使他们目前很难返航，而且，登船的尝试很容易成为引发暴乱的信号；最重要的是，逃避一件未完成的事，不是恺撒的本性。于是，尽管他立即下令从亚洲调集增援部队，但是，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他一直表现得非常沉着镇定。他的军营中，从未像现在在亚历山大里亚休整期间这样轻松快乐。如果说，美丽、机智的克娄巴特拉本来就不吝惜其魅力，或者说至少在她的法官恺撒面前大展她的万种风情，那么恺撒似乎也认为，在他所有的胜利中，征服漂亮女人的胜利是最大的一种。这是一场非常严肃的演出的一个轻松序幕。正如后来被证实的，根据国王和他的监护人的密令，阿基拉斯率领驻扎在埃及的罗马占领军，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亚历山大里亚；市民们一看出他们是来进攻恺撒的，就立即与士兵们联合起来，进行他们共同的事业，凭借着沉着果敢　　这种沉着

果敢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他以前的大胆行为是正确的——恺撒以最快的速度集中了他分散在各处的部队，扣押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在国王的城堡和相邻的剧院修筑防御工事，并且，由于已经没有时间把停泊在剧院前主港口的战舰转移到安全地带，于是恺撒下令烧毁战舰，并派小船占领了可以俯瞰控制港口的灯塔岛法罗斯。这样，至少赢得了一个有限的防御阵地，保证了增援部队进入埃及的道路通畅。同时，小亚细亚的指挥官和附近的臣属地区、叙利亚人和那巴提安人、克里特人和罗得斯人都接到了立即向埃及派遣军队和船只的命令。在此期间，以阿星纳公主和她的代理人、宦官加尼墨得斯为首的暴动已蔓延到整个埃及和首都的大部分地区。在首都的街道上，每天都发生战斗，结果是，恺撒未能自由扩展，突破到城后的马雷阿淡水湖——他本来可以从那里获得水和给养——亚历山大里亚人也未能制服被围者、夺去他们的所有饮用水。因为，尽管尼罗河流经恺撒占领的城区的那一河段由于被灌入海水而无法饮用，但是，在海滩上挖出的井里，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可饮用水。由于无法从陆上战胜恺撒，围攻者于是把重点放到消灭恺撒的舰队上，以便切断恺撒同海上的联系，因为恺撒的供给物资全部是从海上运到的。灯塔岛和连结该岛与大陆的大堤，把港口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部分通过大堤的两个拱形洞相互联系。恺撒控制着灯塔岛和港口东部，大堤和港口西部在市民手中。由于亚历山大里亚的舰队被烧毁了，恺撒的船只可以在海上畅通无阻。亚历山大里亚人曾徒劳地尝试从港口西部向东部派出火攻船，之后，他们用剩余的船只组成了一支小型舰队。当恺撒的船只引导一支满载着来自小亚细亚的军团的运输船队进港时，被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小型舰队挡住了去路。此时，恺撒优秀的罗得斯水兵战胜了敌人。但是此后不久，灯塔岛却被市民攻占，他们从岛上完全封锁了港口东部的大船赖以通行的那条狭窄的、布满暗礁的河口。恺撒的船队被迫停在港口东部外毫无遮掩的停泊地上，恺撒与海上的联系岌

岌可危。在这片停泊地，恺撒的船队多次遭到强于自己的敌人海军的进攻，他们既不能躲避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丢失了灯塔岛，使他们无法进入内港——也不能逃跑——如果再失去停泊地，恺撒回海上的联系将被彻底切断。尽管迄今为止，在机智的罗得斯水兵们的配合下，勇敢的军团士兵使所有战斗的结果都对罗马人有利，但是，亚历山大里亚人不懈地更新和增强他们的海军装备，只要包围者想打仗，被围者就不得不被迫应战，而且，被围者只要战败一次，恺撒就将被彻底包围，并很可能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尝试重新夺回灯塔岛。港口的小船和海上的战船同时发动了双重进攻，不仅小岛，而且大堤的下半部分也回到恺撒手中。直到大堤的第二个拱形洞，恺撒才下令停止前进，让士兵在这里建一道障壁，封锁大堤，以防止城里的进攻。但是，当士兵们正在这里热火朝天地抢修工事时，罗马军队对与小岛相连的大堤下半部分未加把守，埃及人的一个分队出人意料地突然在此登陆，从背后向正集中在大堤上修建障壁的罗马士兵和水兵发动进攻，使他们全部仓皇跳入海中逃命。其中一部分被罗马船只救起，大部分则被淹死。大约四百名士兵和更多的水兵成为这一天的牺牲品。统帅本人也经历了与他士兵们同样的遭遇，他先是被救到一艘自己的船上，后来，当这艘船因载人过多而沉没时，他又不得不自己游到另一只船上。尽管这次损失惨重，但还是重新夺回了灯塔岛。现在，小岛和大堤到第一个拱形洞部分都掌握在恺撒手中，这完全抵销了损失。盼望已久的援军终于到了。帕加玛的米特拉达梯斯是受过米特拉达梯斯·攸巴托式培训的一名机智勇敢的军人，他自称是后者的私生子，他在陆上从叙利亚带来一支人员繁杂的部队：黎巴嫩首领率领的伊都利亚人，萨普西塞拉摩斯之子伊阿布里修斯率领的贝督因人，安提帕特罗斯的大臣率领的犹太人，总之，包括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所有小酋长和各地区的出兵份额。米特拉达梯斯到达的当天，就成功地占领了佩鲁西翁，为了避开河流纵横的三

角洲地区，并在尼罗河分流点前渡河，他选择了通向孟菲斯的大路。在埃及的这个地区，聚居着许多犹太人，从他们那里，米特拉达梯斯的部队得到了同胞般的大力支持。埃及人现在的首领是小国王托勒密，当初，恺撒曾徒劳地希望通过他平息暴乱，所以把他释放了。他们派出一支部队到尼罗河上，试图把米特拉达梯斯堵截在尼罗河的另一岸。还在孟菲斯另一侧的所谓犹太人营地附近，在奥尼翁与赫利乌波利斯之间，这支部队就和敌人遭遇了。但是，米特拉达梯斯能够熟练地以罗马方式调动和驻扎军队，所以，他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夺取了孟菲斯附近的另一侧河岸。另一方面，恺撒一得到援军到达的消息，就立即率领一部分军队乘船前往亚历山大里亚西面马雷阿湖的另一端，然后绕过该湖，顺尼罗河往下行进，去接应逆流而上的米特拉达梯斯。敌人还没来得及阻止这一会合，他们就胜利会师了。然后，恺撒向三角洲挺进，埃及国王已经撤退到那里。尽管埃及部队前沿有深深的壕坎，但是恺撒在第一次冲锋中就击溃了埃及人的先头部队，紧接着又攻占了他们的大本营。埃及人的大本营位于尼罗河与一片难以通行的沼泽地之间的一座小山脚下，与尼罗河之间仅隔着一条窄路。恺撒下令从正面和侧面朝尼罗河边的小路同时向敌人的大本营发动进攻，与此同时，派第三支分队秘密登上大本营后面的山丘。恺撒取得了彻底胜利。大本营被攻占，那些没有死于敌人刀剑之下的埃及人，都在试图逃向尼罗河舰队时被淹死。那些载人过多的小船都沉入河中，小国王也随其中的一只永远消失在他祖国河流的波涛之中。恺撒直接从战场率领他的骑兵由陆路赶到被埃及人占领的首都。敌人身着丧服、手捧神像迎接恺撒，向他企求和平；拥护恺撒的人看到他从首都撤走后，现在又作为胜利者从另一边重新返回而向他热烈欢呼。这座曾狂妄地试图挫败世界的统治者恺撒的计划、并几乎导致他灭亡的城市，如今又落入了恺撒的手中。但是，恺撒是个君主，不是心胸狭隘之辈，他像当初对待马西利亚人一样对待亚历山大里亚人。恺撒

指出，这座变得荒芜的城市，在焚烧舰队时损失了粮仓、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和其他重要的公共建筑，他劝告市民们，今后要努力掌握和平的本领，治愈他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创伤。另外，他答应，保证在亚历山大里亚定居的犹太人享有与希腊市民同等的权利。他不再留用至少名义上已归顺了埃及国王的原罗马占领军，另派了一支正式的罗马驻军到亚历山大里亚，它包括两个曾被包围在该城的军团和随后从叙利亚赶来的第三个军团。恺撒亲自任命了这支驻军的指挥官，恺撒特地选用了一个其出身决定了他无法滥用职权的人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这就是鲁菲奥，一个智勇双全的士兵，但却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之子。在罗马的统治下，克娄巴特拉和她的小弟弟托勒密获得了埃及的治理权。为了避免给予埃及人——他们以东方的方式，忠顺于王朝，却对各个君主持无所谓的态度——再次举行暴乱的借口，阿星纳公主被押解到意大利。塞浦路斯再次成为罗马的西里西亚行省的一部分。

亚历山大里亚起义，其本身的意义微不足道，而且与在此期间罗马国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但是，它迫使恺撒，这位主宰一切、缺了他任何事情都无法进行和解决的人物，不得不从 706 年 10 月到 707 年 3 月，丢开自己本来的任务，和犹太人、贝督因人一起，同一群城市暴民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亚历山大里亚起义对罗马的事件产生了很大影响。个人统治的后果开始逐渐变得明显了。君主制虽然确立了，但是到处都混乱不堪，君主却不在。同庞培党人一样，目前恺撒党人也是群龙无首，所有事务都凭各个军官的能力、特别是偶然性来决定。

恺撒动身前往埃及时，小亚细亚没有他的敌人。在此期间，恺撒在当地的总督，勇敢的盖奈乌斯·多密提乌斯·卡尔文努斯得到命令，收回国王法那西斯擅自掠夺的庞培盟友的领地。因为国王像他父亲一样，是个固执、自负、独断的暴君，拒绝撤出亚美尼亚，所以，只能向他开战。卡尔文努斯手下所剩的三个由法萨鲁斯战俘

组成的军团中，有两个迫于形势已被派往埃及。为填补这个空缺，他以最快的速度，从定居在本都斯的罗马人中招募了一个军团，并用罗马方式训练了两个狄奥泰鲁斯军团，然后开进亚美尼亚。但是，事实证明，曾在与黑海附近居民的多次战斗中经受过考验的博斯普鲁斯军队比他的强大。在尼科波里斯附近的交战中，卡尔文努斯的本都斯军团被彻底击溃，加拉西亚军团四处逃散，只有一个由罗马人组成的老军团，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最终冲了出来。卡尔文努斯不仅未能征服亚美尼亚，而且不能阻止法那西斯重新夺取他的那些本都斯"世袭国"，并对当地居民，特别是不幸的阿密索斯的居民施加他作为苏丹的淫威(706 年冬至 707 年)。之后，恺撒亲自到达小亚细亚，派人转告法那西斯，鉴于他给帝国造成的灾难，当初他由于未给庞培提供支持而对恺撒的直接帮助将不予考虑。并命令他，无论进行任何谈判，都要首先撤离本都斯省，退还掠夺的财富。法那西斯尽管表面上表示服从，但他明白，恺撒正急于赶赴西部，所以他并未真正准备撤退。可是，他不了解，恺撒一向是言必行，行必果的。恺撒不再继续谈判，他集结了从亚历山大里亚带来的一个军团和卡尔文努斯、狄奥泰鲁斯的部队，并赴齐拉附近法那西斯的大本营。当博斯普鲁斯人看到恺撒的部队时，他们大胆地穿过那条遮掩着他们前沿的深深的山谷，向山上的罗马人发动进攻。恺撒的部队当时正忙于安营扎寨，因而在遭到攻击时，陷入片刻的慌乱，但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们马上回过神来，打出了一个转入正常进攻的漂亮战例，并大获全胜(707 年 8 月 2 日)。五天后，战役全部结束——在这个每一小时都很珍贵的时期，这的确是一件不可估量的幸事。恺撒把追捕经息诺普潜回国的国王的任务交给了法那西斯的非婚生兄弟、勇敢的帕加玛的米特拉达梯斯，作为对他在埃及的功绩的奖赏，米特拉达梯斯取代了法那西斯的位置，成为博斯普鲁斯国王。另外，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事态已经和平解决，自己的盟友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奖赏，庞培的盟友则受到罚款和警

告，被免去职务。只有庞培手下最得力的委托人狄奥泰鲁斯，又被限制到他那块狭小的老地方——托利斯托波基区。被取而代之的是，卡巴多西亚的阿里俄巴赞尼斯国王被封予亚美尼亚，被狄奥泰鲁斯强占的特洛克默人的地区封给了博斯普鲁斯的新国王，他的父系是本都斯的王族世家，母系是加拉西亚的一个王侯世家。

恺撒在埃及期间，伊利里亚也发生了严重的事件。几个世纪以来，达尔马西亚海岸一直是罗马统治中的一个敏感之处，自从争夺提尔哈基翁的斗争以来，当地居民就与恺撒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内陆还聚集着在特萨利亚战争中被击溃的庞培余部。但是，昆图斯·科尼菲西乌斯指挥从意大利赶来的军团，把当地人和流亡者团团包围起来，并在这片贫瘠的地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障了部队的供给。当勇猛善战的马尔库斯·屋大维——库里克塔战役的胜利者，率领庞培舰队的一部分，来到这一水域，准备从海上和陆地同时向恺撒的军队发动进攻时，科尼菲西乌斯凭借着战船和亚德斯提亚人的港口（萨拉港），不仅坚守，而且还亲自登上战船出海迎战敌舰，并在一些交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伊利里亚的新总督，被恺撒从流亡中召回的奥鲁斯·加宾尼乌斯，带领十五个步兵队和三千骑兵于706年至707年的冬天从陆路到达伊利里亚后，战局发生了变化。这位行为鲁莽的总督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把战斗控制在小规模上，他不顾当时正是贫瘠的季节而立即率领他的全体部队向山区出征。但是，不利的气候、部队供给的困难和达尔马西亚人勇敢的反抗，使部队损失惨重。加宾尼乌斯被迫撤退，却在撤退途中遭到达尔马西人的攻击，被打得一败涂地。他带领那曾经是庞大的部队的残余，艰难地到达萨罗那，之后不久即死去。于是，大部分伊利里亚沿海城市都向屋大维的舰队投降。那些依然忠于恺撒的城市，如萨罗那和埃皮道鲁斯（拉古萨·韦基亚），腹背受敌——海上是敌舰，陆上是野蛮人——形势十分危急。看来，被围在萨罗那城内的残余部队不久将会交出该城而投降。于是，勃隆

度辛的仓库指挥官普布利乌斯·法提尼乌斯，在缺少战船的情况下，果断下令，给普通小船装上鸟嘴形船头，并配备出院的士兵。他就指挥着这支临时拼凑的舰队，在陶里斯岛（莱里纳和库尔佐拉之间的托尔科拉岛）附近，同远远强大于自己的屋大维舰队进行了一场战斗。战斗中，指挥官和全体舰队士兵的勇敢弥补了船只的不足，恺撒的舰队大获全胜。马尔库斯·屋大维离开这片海域，前往非洲（707年春）。之后的几年中，达尔马西亚人尽管依然顽固抵抗，但毕竟只不过是些地区性的山地战。当恺撒从埃及返回时，他那果敢的副官已经平息了伊利里亚的危险事态。

非洲的局势更加严峻，自内战爆发之始，宪法派就在那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其势力也不断扩大。到法萨鲁斯战役之前，实际上是国王尤巴大权在握，他击败了库里奥，军队的力量主要是他的轻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步兵。庞培的总督法鲁斯对尤巴唯命是从，他甚至把那些投降他的原库里奥的士兵交给国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处死或被押解到努米底亚内地。这种状况在法萨鲁斯战役之后发生了变化。除庞培本人外，战败一方中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想到要逃亡到帕提亚人那里去。同样，也没有人试图凭借联合起来的力量在海上坚守。马尔库斯·屋大维在伊利里亚海域的战斗是极个别的现象，并且也没有取得持续性胜利。大多数共和派人和庞培党人都逃往非洲。看来，只有在非洲还有可能同篡权者进行体面的、合乎宪法的斗争。在那里，法萨鲁斯战役中被击溃的残余部队，提尔哈基翁、克基拉和伯罗奔尼撒的守军，以及伊利里亚舰队的余部逐渐汇合。第二统帅麦特鲁斯·西庇阿、庞培的两个儿子盖奈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共和派人的政治领袖马尔库斯·伽图、优秀的军官拉宾努斯、阿夫拉尼乌斯、佩特雷依乌斯、屋大维等人也到了那里。如果说，流亡者的力量有所减弱，那么，他们的狂热信仰却是有增无减。他们不仅继续处死俘虏，而且谋杀恺撒派来的谈判使者，更有甚者，集党员的怨恨和半野蛮人般的非洲人的愤怒于一身的国

王尤巴，提出了一条原则，即，如果某个村镇有同情敌人之嫌疑，那么全体居民必须被处死，城市也将被烧毁。他的确在一些地区，如哈德鲁梅附近不幸的法加，实施了这一原则。行省的首府、同以前的迦太基一样繁荣、并被努米底亚国王觊觎已久的乌提卡城，所幸没有遭到国王尤巴上述的暴行，而且，该城居民由于倾向于恺撒，当然被指控为有罪，但是，对此只采取了防备措施，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伽图的坚决反对和制止。——由于恺撒和他的总督们都未对非洲采取任何行动，从而使联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政治、军事上的重新组织。最重要的是，由于庞培死去而空缺的最高统帅职位必须有人承担。国王尤巴没有兴趣继续保持法萨鲁斯战役前他在非洲的地位，因为他不再是罗马人的被保护人，而是以平等的盟友、或者甚至是以罗马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例如，他狂妄地下令，在罗马的银币上印上他的名字和纹章，他甚至提出要单独拥有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无理地要求罗马指挥官放弃指挥权。此外，麦特鲁斯·西庇阿也要求最高统帅权，因为在特萨利亚战役中，庞培已经承认——更多地是由于翁婿关系，而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他拥有同等的权力。作为非洲总督（当然是自称的），法鲁斯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因为战争将在他的行省进行。最后，军队要求前行政官马尔库斯·伽图出任统帅。军队的要求显然是正确的。伽图是唯一具备承担这一艰巨职责所要求的献身精神、精力和威望的人。如果说伽图不是军人，那么，聘任一个虽不是军人，但懂得知足并会指挥下级军官行动的人做最高统帅，比委任一位像法鲁斯那样未被检验过是否有能力的军官，或者甚至像麦特鲁斯·西庇阿那样已被验证过没有能力的军官做最高统帅要好得多。但是，最终恰恰决定由这个西庇阿担任统帅，而伽图正是对此起了重要作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法胜任这一工作，也不是因为他出于虚荣而估计到自己落选比当选的可能性大，更不是因为他热爱或尊敬西庇阿，相反，他们两人是对头，而西庇阿尽管众所

周知的无能,但仅仅凭借着他岳父的关系,他却能爬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唯一的原因是,伽图顽固地遵循法律形式,宁愿让共和制依法灭亡,也不愿以不合常规的方式拯救它。当他在法萨鲁斯战役之后,在克基拉同西塞罗汇合后,就主动提出,依照法律规定,把克基拉的指挥权交给比自己官职高的西塞罗。西塞罗因为当时还担任西里西亚总督而拥有总指挥权。他的这一表示使得那位千百次诅咒自己的阿马诺斯的荣誉的律师几近绝望,也使所有还算得上明智的人大吃一惊。现在,在这个更加关键的时刻,伽图又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如同分配图斯库卢姆的耕地一样,他权衡了应该把最高统率权交给谁的问题,最后宣布把它交给西庇阿。这一决定使他本人和法鲁斯的竞选失败。同时也是他、并且只有他,坚决抵制了国王尤巴的要求,让后者明白,罗马贵族不会去请求他和帕提亚大公,以寻求保护者的支持。相反,罗马贵族以命令的方式要求臣仆提供帮助。鉴于在非洲的罗马军队目前的状况,尤巴不得不采取缓和措施,尽管如此,他还是使软弱无能的西庇阿同意,由罗马的财政负担他的部队的军饷,并保证胜利后将非洲行省割让给他。——支持新统帅的又是“三百人”元老院,元老院将乌提卡定为所在地,并通过接纳骑士阶层中最有名望、最富有的人而扩充了原来已人员稀少的元老院。——由于伽图的努力,扩军工作得到了最有力的推动,每个适合服兵役的男人,甚至包括被释放的奴隶和利比亚人,都被招入军队。但是,从事耕种的人因此而被抽走,造成一大部分耕地闲置。尽管如此,扩军工作仍取得了可观的成效。重步兵共有十四个军团,其中两个是原来法鲁斯的军团,八个由流亡者和从该省征集的新兵组成,另外四个是国王尤巴的由罗马武器装备的军团。重骑兵部队由随拉宾努斯到达凯尔特的德意志骑兵,以及所有被编入骑兵的人组成。不算尤巴手下罗马装备的骑兵队,共有一千六百人。轻型部队中有为数众多的骑无笼头和缰绳的马、仅配备有投枪的努米底亚人,还有一部分骑马的弓箭手和大批

步行的射手。此外还有尤巴的一百二十只大象和由普布利乌斯·法鲁斯及马尔库斯·屋大维指挥的由五十五艘船组成的舰队。元老院通过向自己征税,使严重的资金短缺有所缓解。当非洲最富有的资本家们也被安排进元老院后,征收的税款便愈来愈多了。大批粮食和其他储备物资都被集中到那些坚固的堡垒中,同时尽可能将储备从暴露的地方转移。由于恺撒当时不在非洲,而且他的军队中情绪低落,再加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不满情绪,使敌方的情绪高涨,法萨鲁斯战役的梦魇开始被胜利的希望所取代。——恺撒由于在埃及耽误了时间而得到了比任何时候都惨重的报应。假如他在庞培死后立刻赶赴非洲,那么,他见到的将是一支孱弱、混乱、惊慌失措的军队及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领导层;而现在,特别是由于伽图的努力,在非洲的这支军队,数量上同法萨鲁斯战败的军队相同,他们由著名的将领们指挥着,高级领导层也井然有序。

看来,恺撒的这次非洲远征似乎凶多吉少。早在他动身前往埃及之前,恺撒就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安排采取各种措施,为非洲之战做好准备。一切都无任何不祥之兆。根据恺撒的安排,南部行省的总督昆图斯·卡西乌斯应该从西班牙出发渡海前往非洲,把西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古德争取过来,一起进攻努米底亚和非洲。但是,被决定派往非洲的军队中包括一大批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和两个原庞培的军团,军队中和该省中都充满了对庞培一派的同情和好感,而恺撒的总督无能,暴虐,则没能缓和这种气氛。于是爆发了真正的起义。军队和城市分为支持和反对总督的两派,那些反对恺撒的总督的部队和城市,甚至公然插上了庞培的旗帜。为了利用这次有利的转机,庞培的长子盖奈乌斯乘船从非洲赶往西班牙,但正在这时,最有威望的恺撒党人已免去了总督的职务,北部行省的指挥官也采取了有力措施,起义已被及时镇压。盖奈乌斯·庞培由于在途中曾徒劳地尝试在毛里塔尼亚建立大本营而耽误了时间,所以当他到达西班牙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从东方回来就被恺撒派去西

班牙接替卡西乌斯的盖尤斯·特累波尼乌斯(707年秋),其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绝对的顺从。但是,由于这场混乱,当然就没有从西班牙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非洲的共和派人组织,甚至由于同隆基努斯纠缠在一起,就连站在恺撒一边、至少可以阻挠国王尤巴的西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古德和他的军队都被召回了西班牙。——恺撒曾命令部队在意大利南部集结,准备率领他们乘船前往非洲,如今军队中的情况令人担忧。这支部队中,绝大部分是曾在高卢、西班牙和特萨利亚为恺撒登上王位奠定基础的老军团。多次的胜利并未使这支部队的精神状况有所好转,相反,在意大利南部的长期休整使它的道德完全败坏了。统帅对他们提出了超乎寻常的过高要求——这些要求的后果在这支严重减员的队伍中显得非常刺目——这在那些铁汉子们心中留下了愤怒的催化剂,早晚会爆发。唯一一个让他们敬佩的人,已在一年前离开,至今下落不明,而他们的上级军官怕他们,比他们怕军官更甚,因而只有听任这些世界的征服者对驻地的居民施以暴行,并宽恕他们所有不守纪律的行为。所以,当军队接到乘船前往西西里的命令,士兵们必须放弃他们在坎帕尼亚的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第三次进行艰苦程度肯定不亚于西班牙和特萨利亚战役的征战,这时,因长期放松而突然被绷紧的缰绳断裂了。各军团都表示,在许诺给他们的礼物兑现前,他们拒绝服从命令,而且,他们还用嘲讽和扔石头将恺撒派来的军官赶了回去。恺撒试图用增加许诺赏赐的数量来平息刚刚开始的暴动,然而,这一尝试不仅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还使成批的士兵出发,去找统帅索取在首都兑现许诺的礼物。个别试图在半路上拦阻叛军的军官都惨遭毒手。情况万分危急。恺撒下令城里为数不多的士兵占据各城门,因为叛军极有可能洗劫城市,这样至少可以顶住他们的第一次冲击,而恺撒本人却突然出现在吵闹不休的叛军面前,问他们要求什么。他们嚷道:退伍。他们的要求马上得到了同意。恺撒还补充说,他们可以在恺撒和其他士兵凯旋的那一天来

找他，索取许诺给他们的礼物和尽管未曾许诺、但已决定给他们的土地。但是，由于他们已经退伍，所以当然不能参加胜利庆典。众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转折，因为他们坚信，恺撒要打非洲战役，就不能缺少他们，他们提出要退伍，只不过是为了在遭到恺撒拒绝后进一步提出他们的条件。现在，他们认为自己不可缺少的信念有些糊涂了，他们不知所措，不懂得马上转弯子，把已经走入死胡同的谈判再次引上正轨。作为人，他们在统帅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高尚面前感到羞愧，因为恺撒对背信弃义的士兵们仍坚守诺言，而且还许诺给他们比以前更多的好处；作为士兵，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统帅告诉他们，他们不得不作为百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们欢庆胜利。而且，统帅不再称他们为“战友”，而是“百姓”，这个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听起来非常陌生的称呼，像一记重棒，摧毁了他们作为士兵而感到骄傲的全部历史。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位不可抗拒的伟人的魔力下，完全丧失了反抗的力量——士兵们沉默着、犹豫着，最后、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呼声，要求统帅能再次宽恕他们，允许他们继续做恺撒的士兵。恺撒让他们请求够了之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对这次叛乱首领们的处罚是，减少胜利后赏赐礼物的三分之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心理战比这次更伟大、更成功。

无论如何，这次叛乱对非洲战役还是产生了消极影响，至少，它使非洲战役大大推迟了。当恺撒到达指定为出发渡海的港口里利贝翁时，被决定去非洲的十个军团还远远未到齐，特别是那些久经考验、可靠的老军团，差得更多。此间到达那里的部队仅有六个军团，其中五个是新组建的，所需的战船和运输船都已到齐。于是，恺撒率领这些部队出海了(旧历 707 年 12 月 25 日，儒略历约 10 月 8 日)。此时正盛行赤道风暴，所以，敌人的舰队全部缩回到迦太基海湾外埃基慕罗斯岛附近的海滩上，因而没有阻止恺撒的渡海。但是，这次赤道风暴也把恺撒的船队冲得四分五裂，当恺撒在离哈

德鲁梅(苏萨)不远的地方找到登陆的机会时,能够登陆的部队已不足三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兵,还有一百五十名骑兵。恺撒打算夺取敌人重兵把守的哈德鲁梅,未获成功。但恺撒占领了两个彼此相距不远的港口:鲁斯皮纳(苏萨附近的莫纳斯提尔)和小雷普提斯。他在这里修筑防御工事,可他的处境非常不安全,因此他让他的骑兵留在船上,让船只随时做好出海准备,并备好充足的水,以便一旦遭到强敌的进攻,就能立即登船出发。但这已经不必要了,因为那些被冲散的船只及时赶到了(708年1月3日)。由于庞培军队进行了准备和布置,因此恺撒的部队忍受着缺粮之苦。于是,第二天,恺撒率领三个军团向内陆进发,但在离鲁斯皮那不远处,在行军途中遭到了由拉宾努斯指挥的大队人马的攻击,他们企图把恺撒赶回海边。由于拉宾努斯的部队主部是骑兵和射手,而恺撒只有常备步兵,所以,恺撒的军团很快被包围起来,成了敌人的枪靶子,既无还手回击之力,也不能进行有效的进攻。尽管全军的抵抗使侧翼突破包围,勇猛的进攻拯救了部队的名誉,但撤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假如鲁斯皮纳不是离战场不远的话,那么,摩尔人的标枪也许会再现当初帕提亚人的弓箭在卡里之战中的行为。在这一天,恺撒明白了他面临的这场战争的艰巨性,他不愿意让自己毫无经验的、由于这种陌生的战斗方式而丧失勇气的士兵们再次遭受类似的攻击,所以,他静候老军团的到达,并利用这段时间,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追赶敌军在远程武器上的优势。船队中一些合适的士兵作为轻骑兵或射手被编入步兵,但这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成效比较大的是恺撒策划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他成功地使大阿特拉斯山脉南坡、向撒哈拉沙漠漫游的各个日图利亚游牧部族拿起武器反对尤巴;因为他们中间也包含着马利乌斯—苏拉时期的部族,当初,庞培强迫这些部族接受努米底亚国王的统治,所以,他们仇恨庞培,这使他们从本质上适合做马利乌斯的继承人。自尤古尔塔战役以来,马利乌斯就一直被当地人民怀念而活在他们心中。毛里

塔尼亚的国王们：廷吉斯的博古德，尤尔的博库斯，都是尤巴的死敌，而且有的早已同恺撒结盟。最后，在尤巴的王国和博库斯的王国之间的交界地带，还游荡着最后一个卡提林那党人，这就是努塞里亚的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十八年前，他从一个破产的意大利商人，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毛里塔尼亚志愿军领袖，从此，就在利比亚的殴斗中名声大噪，并有了自己的一批人马。博库斯和西提乌斯联合攻入努米底亚国内，并占领了重镇西尔塔。他们和日图利亚人的进攻，迫使国王尤巴把他的一部分军队调到南部和西部边界。尽管如此，恺撒的处境仍然很不乐观。他的军队全部被挤到一块面积仅一平方公里的地带，虽然船队运来了粮食，恺撒的骑兵仍然严重缺乏给养，就像当初庞培的部队在提尔哈基翁的情况一样。而且，尽管恺撒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敌方轻骑兵的数量仍占绝对优势，所以，即使是借助老兵，他也几乎没有向内陆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如果西庇阿现在撤走，放弃沿海城市，那么，他有可能取得像当初奥罗德斯的大臣战胜苏拉，尤巴战胜库里奥那样的胜利，至少，他可以使战争无限延续下去。最简单的考虑就能得出这种作战计划，就连伽图——虽然他作为一名战略家毫不逊色——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同时自告奋勇地要求带领一个军团渡海去意大利，号召那里的共和派人拿起武器。鉴于当时意大利的极度混乱状况，此举定会奏效。但是，伽图只能提建议，不能下命令。最高统帅西庇阿决定，战争要在沿海地区进行。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这样不仅放弃了一个有把握获胜的作战计划，而且所选定的战场是一个充满着危险的不满情绪的地区，而将与恺撒交战的军队中，大部分也有同样的危险情绪。可怕的拉壮丁，对储备物资的掠夺，对小村镇的摧毁，还有那种原本就觉得被迫成为一件与己无干、而且已经输定了的事情的牺牲品的感觉，使当地人极为愤怒。他们痛恨在非洲土地上进行垂死挣扎的罗马共和派人。此外，罗马共和派人对那些仅有漠不关心嫌疑的村镇居民们采取的恐怖手段，使原来的愤怒

上升为刻骨的仇恨。于是，所有能冒险的、自己作出决定的非洲城市，都宣布支持恺撒。在轻型部队甚至军团里占一大部分的日图利亚人和利比亚人中，开小差之风盛行。但是，西庇阿仍然愚昧、顽固地坚持他的计划，他率领全部军队，离开乌提卡，开到被恺撒占据的鲁斯皮纳和小雷普提斯城外，派重兵占领了北边的哈德鲁梅和南边的塔普苏斯（位于拉斯迪玛斯山麓），和尤巴一起——当时尤巴也率领除守卫边界以外的所有部队来到鲁斯皮纳城外——多次向敌人提出开战。但恺撒坚定地要等到他的老兵们到来。当老兵们陆续到达并出现在战场上时，西庇阿和尤巴已经没有兴趣冒险开战了。在敌人的轻骑兵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恺撒也没有办法强迫对手开战。这样，为了寻找鲁斯皮纳和塔普苏斯附近藏在地下的储备（贮仓）和扩大地盘，双方进行了多次行军和小规模战斗，两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恺撒迫于敌军骑兵的压力，不得不尽量守在山上，或者，用前线的防御工事来掩护他的侧翼。但是，在这场艰难、无望的战争中，他逐渐使自己的士兵们习惯了这种奇特的作战方式。在这位认真、仔细、经常亲自教导其部下要谨慎行事的作战大师身上，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再能找到原来那位迅猛敏捷的统帅的影子，他们被恺撒身上与果断同样杰出的犹豫搞糊涂了。终于，当恺撒迎来最后一批增援部队后，便开始从侧面向塔普苏斯发动进攻。前面已经提到过，西庇阿派了重兵把守这座城市，这样，他就犯了一个错误，即，他为对手提供了一个很容易抓住的进攻点。在这第一个错误之后，他紧接着又犯了第二个更加不可原谅的错误：为了解救塔普苏斯，他要在一片由前线步兵起决定作用的地带，挑起一场恺撒期望已久的、而他本人在此之前理所当然坚拒的野战。西庇阿和尤巴的军团集结到恺撒大本营对面的沙滩边，前沿部分已做好战斗准备，后方部分开始修筑防御工事。同时，塔普苏斯的守军也准备突围。恺撒的军营守卫队就足以阻止这次突围。他那些久经沙场的军团，已根据敌军毫无把握的阵容和粗劣拼凑的

队伍，对敌人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所以，在敌人还在忙于修筑工事时，不等恺撒发出进攻信号，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吹响了冲锋号，全线出击。冲在最前面的是恺撒本人，当他看到自己的士兵们已等不及他的命令出击时，立刻策马冲到部队的最前面，向敌人进攻。冲在最前边的右翼部队，用投掷器和箭吓退了他们对面的大象阵——这是最后一次运用了野兽的大型战役——使它们反过来攻击自己的部队。掩体中的敌兵都被杀死，敌军的左翼被冲散，整个前沿被从侧面攻占。由于败军的新营地还未筑成，旧营地又离得太远，所以，这次失败就更具有毁灭性。之后，这两个营地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先后被攻克。败军的士兵们放下武器，请求给他们宿营地。但是，恺撒的士兵们已不再是当年在伊利尔塔城外顺从地放弃了战斗的士兵，也不再是在法萨鲁斯高尚地宽恕了无抵抗能力的敌兵的士兵。内战的习惯和叛乱遗留下来的怨恨，在塔普苏斯战场上得到了可怕的宣泄。如果人们与之搏斗的九头蛇能不断长出新头，如果军队不断被从意大利抛到西班牙，从西班牙抛到马其顿，从马其顿又抛到非洲，而人们越来越渴望的安宁却迟迟不到来，那么，士兵们就不无道理地在恺撒那不合时宜的宽大中找原因。他们发誓要追回统帅耽误的一切，于是，他们对已经缴了械的同胞们的恳求、对恺撒和其他上级军官的命令充耳不闻。塔普苏斯战场上横尸五万，其中有不少恺撒的军官，被作为著名的新君主制的秘密反对者，也在这次战斗中被自己人打死。这一切表明，士兵们是如何实现安宁的。相反，获胜军队中的死者不超过五十名(708年4月6日)。

一年半以前，法萨鲁斯战败后，战斗就不再继续在东方进行，同样在塔普苏斯战役之后，这场战斗的继续也不在非洲进行。伽图作为乌提卡的指挥官，召集了元老院会议，说明了防御措施的现状，要求与会者作出决定，是投降还是坚守到最后一个人；同时又恳求他们，不要各人顾各人，而是大家作出一致的决定，采取一致

的行动。那种勇敢的意见赢得了一些议员的同意。有人申请，为了国家，释放有服役能力的奴隶，但是，这一建议被伽图视为对私有财产的非法侵犯而遭到拒绝，却又作为爱国号召向奴隶主提出。可是，很快地这个绝大多数是由非洲大商人组成的议会，则坚决否定了这个心血来潮的主意，大家一致决定投降。当摄政者苏拉之子法奥斯图斯·苏拉和卢西乌斯·阿夫拉尼乌斯带领一个强大的骑兵分队从战场来到乌提卡时，伽图还做了最后的努力，试图借助他们守住城市。但是，他们要求，首先让他们把不可靠的乌提卡市民全部杀掉。伽图愤怒地予以拒绝，他宁愿把共和派人的最后一座城堡拱手让给君主恺撒，也不愿让共和制的最后时刻遭到这种杀戮的亵渎。伽图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慷慨的捐赠，尽力制止了兵痞们对不幸的乌提卡市民的掠夺行径。对那些估计不会得到恺撒宽恕的人，只要他力所能及，他都为他们提供了逃跑的费用；对那些想留下来的人，他极其细心地为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投降。当伽图安排好这一切，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再给别人提供帮助后，他便解除了自己的指挥权，回到卧室，把剑刺入了自己的胸膛。那些逃走的骑兵中，逃脱的人也很少。从塔普苏斯逃出来的骑兵遇到了西提乌斯的部队，都被杀死或俘虏；他们的指挥官阿夫拉尼乌斯和法奥斯图斯被交给恺撒，由于恺撒没有下令马上处死他们，恺撒的老兵们于是蜂拥而上，将这二人打死。最高统帅麦特鲁斯·西庇阿和战败一方的舰队落入西提乌斯的巡逻舰只的控制下，因为别人要杀死西庇阿，所以他便自杀身亡。国王尤巴对这种结局已有所准备，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王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让人在他的城市萨马的集市广场上准备一个巨大的柴堆，这个柴堆的火焰将吞噬尤巴的身体、他所有的财宝和萨马城全体市民的躯体。但是，市民们不愿意成为这个非洲恶魔葬礼上的装饰品，所以，当尤巴带着马尔库斯·佩特雷依乌斯逃离战场来到萨马城外时，市民们关闭了城门。国王尤巴是那种在炫目的、傲慢的生活享

乐中变得放荡粗野的人，他甚至要把死亡变成一个狂喜的节目，于是，他带着同伴奔向他的一座别墅。他让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进餐结束后，他要求佩特雷依乌斯同他为死亡格斗。后者是当初战胜了卡提林那的人，现在，他被国王尤巴亲手刺死。之后，国王让他的一名奴隶把自己刺死了。少数逃脱了的重要人物，如拉宾努斯、塞克斯图斯·庞培等，都跟随塞克斯图斯的哥哥来到西班牙，像当初的塞多利乌斯一样，在这个至今仍半独立的地区的山区和水域，寻找他们最后的强盗和海盗的避难所。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恺撒就处理了非洲的事务。根据库里奥以前的提议，马西尼萨国被解体。东半部，或者说西提菲斯地区，与东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的王国合并，忠诚的廷吉斯国王博古德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为了安置雇佣兵队长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的那支半罗马部队，西提乌斯得到了西尔塔(君士坦丁)和周围地区，这些地区以前一直在尤巴的统治权下，归马西尼萨大公及其儿子阿拉比翁所有[①]；同时，这一区域及以前属努米底亚国的绝大部分最富饶的部分作为"新非洲"同原来的非洲行省合并，海岸地区对沙漠游牧部落——共和派曾把这些部落交给了一个委托国王——的防御任务，由新统治者和该国自己来承担。

庞培和共和派人向恺撒的君主制发动的战争，在持续了四年之后，以新君主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虽说君主制并不是在法萨鲁斯和塔普苏斯的战场上才得以确立的——早在庞培和恺撒联合建立他们的共同统治，推翻贵族宪法时，君主制的胜利就已经注定了——但是，正是706年8月9日和708年4月6日那两次血的洗礼，才消灭了与独裁统治本质相违背的共同统治，使新君主制能稳固、持久地实行，并得到了正式承认。试图篡夺王位的暴动和共

① 上述地区的许多碑文都留下了殖民化的痕迹。西提乌斯这一姓氏在当地非常之多。非洲村庄米莱弗作为一个罗马村庄，取了"萨努斯的殖民地"这个名字显然源于努塞里亚河神萨努斯。

和派人的阴谋活动，可能还会继续进行，甚至还可能引起动荡，以及新的革命和复辟。但是，五百年来从未中断过的自由共和制的连续性被割断了，并且，通过这一既成事实的合法性，君主制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被确立。就宪法所进行的斗争已经结束了。马尔库斯·伽图在乌提卡拔剑自杀时就已说过，斗争结束了。多年来，在合法的共和制的对敌斗争中，伽图一直是领袖，即使是在任何获胜的希望都破灭了之后，他仍然坚持斗争了很长时间。可是现在，斗争本身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建立的共和制灭亡了，并且再也不可能复活；共和派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财宝被掠夺了，岗哨也被取消了。如果他们回去，还有谁会责骂他们呢？伽图的死比他的生具有更多的高贵，特别是更多的理智。伽图无疑是个伟人，尽管短见、错误、枯燥的刻板和虚伪的空话，使他成为当时及后来那些没有头脑的共和派人的榜样，并为他们所喜爱，但伽图仍然是唯一一个在共和制已经崩溃时，还在做最后挣扎，并诚实、勇敢地维护这一制度的人。即使是在最简单的真理面前，最聪明的谎言也会感到心虚，而人类所有的高贵和尊严最终都不是建立在聪明之上，而是以诚实为基础的。所以，伽图在历史中，比许多才智上远胜于他的人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由于他本人是个愚人，这就更加深了他死亡的深刻的悲剧意义：如同唐·吉诃德是个傻瓜，所以他是个悲剧人物。令人震惊的是，在那个有许多大智大勇的伟人大显身手的世界舞台上，最后是由一个傻瓜来收场的。不过，他也不是死得毫无意义。这是共和制对君主制的一个强有力的抗议，因为第一个君主到来时，最后一个共和派人就不得不离开。这一抗议，使恺撒用以装饰他的君主制的所谓合乎宪法性，像一张蜘蛛网一样被撕得粉碎，并彻底揭露各党派和解的美丽谎言，而恺撒的统治正是在它的庇护下得以发展的。从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开始，到特拉西亚·培都斯和塔西陀以后，在几个世纪里，合法的共和制的幽灵同恺撒的君主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这场充满了阴谋、为文献所记载的斗争，是伽图以死遗赠给敌人的遗产。共和派反对党从伽图身上继承了全部高尚的、超越一切概念之上的、极为严格的、无望的、至死忠诚的行为。在这个生前屡遭他们嘲讽、厌恶的人死后，他们又立即开始把他奉为圣徒。但是，在对伽图的这些崇拜中，最高的敬意是恺撒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因为恺撒对他的敌人，不论是庞培党人还是共和派人，一贯采取蔑视的宽容态度，而唯独对伽图是个例外。在伽图进入坟墓之后，恺撒仍然表现出对他的强烈痛恨，这是务实的政治家对那些在思想领域的极其危险却又高不可攀的反对者的痛恨。

第　十　一　章

老共和国与新君主制

当影响深远的塔普苏斯之战取得最后一个胜利，将世界的命运交于恺撒手中之时，这位第一个统治整个罗马—希腊文明区域的罗马新君主已进入了生命的第五十六个年头（生于652年7月12日？）。他是罗马所造就的唯一一个，也是古代世界所产生的最后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直至他灭亡之日，古代世界都在沿着他的轨迹运行。他的家庭属拉丁最老的贵族世家，家谱可追溯到伊利亚特的英雄和罗马国王，甚至追溯到罗马、希腊两个民族共同的维纳斯——阿佛罗狄忒；作为这样一个家族的子孙，他像那个时代的其他贵族少年一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也同别人一样品尝了时髦生活的精华与糟粕。他吟诗诵词，出于消遣习文作诗，并尝试了各个文学种类；求教了当时的化装智慧，如：刮脸、理发、硬袖口衣穿着的所有奥秘。同时也探讨了更为神秘的只赊不买的艺术。而他的天性就像有韧性的钢一样，顶住了这一朝三暮四、无所事事的胡混，使他身心健康，思想精力免遭损害。无论是击剑还是骑马他都可以与他的任何一个士兵较量。他的游泳技术使他在亚历山大里亚死里逃生，他通常为争取时间而进行的夜行军的惊人速度使他的同代人惊叹不已，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与庞培的仪式队列式的缓慢行进速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精神状

态与他的身体状况是相同的：他非凡的洞察力表现在他命令的果断与可行上，即使在他不能身临其境而下达命令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他的记忆力无可比拟，他具有同时处理几项事物的能力。尽管他是绅士、天才和君主，但他也同样重感情，他在一生中都保持了对他的尊母奥勒利亚——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去世——的最纯洁的敬重；对他的女人、特别是对他的女儿尤丽亚，他献出了诚挚的爱，这对于他的政治状况，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与当时的有能力、有骨气的男子汉，无论其职位等级高低，他都按照各人的不同，忠诚友好地与之相处。他从来没有像庞培那样以无情小人的方式放弃过自己人，他坚定不移地与朋友们同甘共苦不只是出于个人的目的。因此，这些朋友中间也有一些人，如：奥鲁斯·希尔提乌斯和盖尤斯·马提乌斯，即使在他死后还以美好的明证保持了对他的追随。如果要在他那组织得如此和谐的天性中单独强调最典型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便是：他与意识形态和空想无缘。诚然，恺撒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因为没有激情便没有天才，但他的激情从来没有比他更强大。他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歌舞、爱情、美酒曾进入过他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情感，但却并未撞入他本质的核心。文学曾唤起过他长期、严肃的兴趣，但如果说荷马的阿喀琉斯曾让亚历山大不能入睡，那么恺撒在失眠之时考虑的却是拉丁文名词与动词的变格变位。他像当时所有的人一样也作诗，但他的诗却很差；与此相反，他对天文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颇感兴趣。如果说酒对亚历山大来说始终是消愁品，那么这位清醒的罗马人在狂热的青年时代之后却滴酒不沾。如同所有在青年时代沐浴过女性之爱的炽热光芒的人一样，在他身上也永不消失地留下了这一印迹：在晚年他还有过爱情经历并在女人那里获得了成功，同时他也保持了对外表仪容的一定讲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对自己男性美的喜悦意识。晚年他公开露面时，精心地用桂冠遮盖好让他感到是一种痛苦的秃头，无疑，如果能够重新得到他年轻时的长发，他一

定会拿出他取得的一些胜利来交换。作为君主，无论他怎样喜欢与女人交往，他都只是与她们玩玩而已，他从未允许她们对他施加影响。就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他与女王克娄巴特拉的关系也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政治地位中的弱点。恺撒更多地是个现实主义者，是个理智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由天才的冷静来支配的，这正是他最主要的内在特点；他不受回忆与期望的诱惑，而是更注重于眼前生活的能力。他每时每刻都可以投入全部的力量，即使是对最小的、最平凡的开始他也能倾注全部天才的能力；他能够掌握理智所能理解、意志所能征服的事物的多面性；他设计自己不同阶段的步骤、制定征战计划时一向自信轻松；无论在山穷水尽还是柳暗花明之时他都"豁达开朗"；他不允许他的情人、爱妾甚至他的朋友们来左右他完全的自立。正是出于这种清醒的理智，恺撒对命运的力量、对人的能力从不抱幻想。对他来说，掩盖人类缺陷的妩媚面纱已经揭开，无论他计划得怎样精明、对所有可能性考虑得如何周全，他的内心也从来没有摆脱过这样一种感觉，即：做一切事都需要幸运，也就是说，完美之事只能靠偶然完成。他常与命运打赌，以大胆的无所谓不断地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如同陷入纯粹赌博中的大多是明智的人一样，在恺撒的理性中也有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神秘主义相关联的东西。——这样一种天赋只能造就一个政治家。从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说，自少年时代起，恺撒就是一个政治家，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最高的目标：使自己沦陷的民族及与本民族有着紧密的姐妹联系的、但沦陷得更深的希腊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精神上、道德上获得新生。三十年来的艰苦经历改变了他对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看法，但他的目标始终如一，无论是在满怀希望的忍辱之时，还是在掌握无限权力之时；无论是作为采用黑暗手段悄悄接近这一目标的鼓动家与阴谋策划者，还是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之一，或是后来作为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在灿烂的阳光中创造自己大业的君主。所有在不同时期出自他手的长久性规

章，都是实现他的宏伟蓝图的组成部分，所以，不应该谈论他的个别的、具体的功绩，因为他所创造的也不是个别的、具体的。人们颂扬演说家恺撒使所有律师都相形见绌的雄辩讲演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讲演像纯火一样明亮温暖；人们欣赏作家恺撒的纯洁无瑕的美丽语言、难以效仿的简单结构同样是有道理的；历代最伟大的战将都赞扬将军恺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不受常规传统的影响，根据具体情况每每找到战胜敌人的正确作战方法，并通过准确的预感找到相应的手段；他像威廉·冯·奥拉尼恩一样，在失败后马上能重整旗鼓，并无一例外地以胜利结束战役。他对作战要点掌握得尽善尽美，快速运动重兵十分自如，这是军事天才区别于普通军官的重要标志。他不是依靠军队的数量，而是依靠其运动的速度；不是依靠长期的准备，而是依靠迅速大胆的行动作为胜利的保障，即使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能如此。而这一切对恺撒来说都是次要的，尽管他是出色的演说家、作家、军事家，但他更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首先，军人这个角色在他身上是次要的，他最主要的、区别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的特点之一是：他的政治生涯不是以军官，而是以鼓动者为起点的。他的最初计划是像伯里克利和盖尤斯·格拉古斯一样，以非武力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民众党的领袖，他十八年来一直周旋于政治计划与阴谋之间；到了四十岁之后，他才在极不情愿接受的政治需要军事后盾这一观点的情况下当了军队首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后来始终更多是政治家，而不是将军。这同克伦威尔的情况相似，他也是从反对党领袖转成了军事首领及共和国国王。无论这位拘谨的清教徒侯爵与潇洒的罗马人是多么的不相像，但就他的发展、目标与成就来看，他可能是在所有政治家中与恺撒最相似的人。即使在作战指挥中也能看出恺撒随机应变的能力。在拿破仑征战埃及和英国时，很难看出他是一位可以升为将军的炮兵少尉，而在类似的远征中却更能看出恺撒是一位转任将军的鼓动家。一

位训练有素的军官可能很难像恺撒那样，多次出于政治上并非完全急迫的考虑把在军事上极有道理的顾虑抛在一边，这一点在埃壁鲁斯登陆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他的某些具体做法从军事上来看是值得非议的，而将军失掉的却是政治家所得到的。恺撒这样一个政治家的任务正如他的天才一样，是包罗万象的：他所做的千头万绪、乃至各自互不相干的一切都毫无例外地服务于一个伟大的目标，他以无条件的忠诚与不懈的努力效力于这一目标。在他的多侧面、多方向的伟大事业中，他从未因重视其一而轻视其他。尽管他是军事艺术大师，但却出于政治家的考虑为避免内战作了最大的努力，即使在内战开始后，他也试图以最小的流血代价获取桂冠。尽管他是军事君主制的创建者，但他仍为阻止一个元帅等级制或禁卫队统治的产生作了史无前例的努力。如果要提及他的民事功绩的某个方面，那便是与军事相比他更为重视和平的科学与艺术。他的政治建树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他的完善与和谐，事实上他集中具备了创造人类最艰难业绩的所有条件。作为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不让历史的影响与宝贵的传统对他构成任何威胁：对他来说，在政治中唯一有价值的是活生生的当今现实及明智的法律，就如同他作为语法学家将古董的历史研究抛在一边，只承认活的语言使用和规范的标准一样。这位天生的统治者统治人心同轻风驾驭云彩一般，他把形形色色不同类型的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无论他们是平民百姓还是粗鲁的下级军官，无论是罗马的贵妇人还是埃及、毛里塔尼亚美丽的首领夫人，无论是名声显赫的骑兵将军还是精打细算的银行家。恺撒具有非凡的组织天才，从未有任何一个政治家像恺撒那样对待他的联合政府，也从未有任何一个将军像恺撒对待他的军团那样，把他的由笨拙的、相互抵触的成份构成的联盟和军队坚决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凝聚在一起。从未有任何一个君主以如此锐利的眼光来检测他的工具，并为每一个工具安排适当的位置。他是一个君主，但他从未摆过国王的架

子;即使作为享有无限权力的罗马之王,他仍是以党派领袖的身份出现。在交谈中,他非常柔韧灵活、舒适优雅,对每个人都非常殷勤,似乎并不想望比同仁之首更高的位置。恺撒完全避免了像许多可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把军事命令的口吻用在政治中的错误。他从未作出像"雾月十八"那样的残暴之举,尽管他与元老院的不快关系已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恺撒虽是君主,但他却从未陷入暴君的昏庸。他可能是在天主之下的巨人中,唯一一个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不是凭感情或情绪,而是无一例外地依照君主的义务来行事的人。如果他要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可能会对某些错误的计划感到遗憾,但却找不出因激情所导致的、并可为之后悔的错误。在恺撒的生平中没有任何一点[①]是可与那些诗意情感的冲动、克莱托斯谋杀案或焚烧波斯波利斯这些历史记载的他的伟大先驱在东方的所作所为作比较的。他可能是那些巨人中唯一一个直到生涯的最终,都保持了政治家对事物的可行与不可行的敏感的人,他从未失败于对所有伟人来说都是最艰巨的任务,即:在成就的顶峰也能认识到自然所筑的障碍。他做到了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但从未因为不可能的更好的而放弃了可能的好的,从未鄙视过至少用治标之药来减轻不治之症的痛苦。每当他认识到是命运的决定时,他总是服从。进军希帕尼斯的亚历山大和进攻莫斯科的拿破仑回头撤退是因为他们不得已才这样做,因而他们便抱怨命运:即使对他的宠儿也只给了有限的成功机会。而恺撒则自动撤出了泰晤士及莱茵河畔,在多瑙河及幼发拉底河畔他所想的不是不符合实际的征服世界的计划,而仅仅是实现深思熟虑的边界调整的构想。——单独描写这样一个人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而实际上却无比困难。他整个的人物清晰透明,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他的记载比

① 如果把著名的序言所讲述的恺撒与拉贝里乌斯所作的交易看作是暴君情绪发作的例证,那么便完全错误地认识了对当时情况与诗人的讽刺意味,且不谈那种把急于攫取稿酬的诗人视为牺牲者的天真看法。

古代世界任何一个与他同样的政治贵族都要详细和生动。对这样一位人物的看法可能或深或浅，但却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这一高大形象以同样的主线出现在每个未入歧途的研究者面前，但还没有人能够成功地让这一形象直观地再现。其奥秘在于这一形象的完美。无论是从为人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恺撒都处在扬弃生存大对立的融合点上。他既富有巨大的创造力而又不乏深沉透彻的理智，既有胸怀远大的抱负又有成功的造就，他年富而力不衰，既满怀共和理想又是天生的国王。在本质深处他是一个罗马人，但同时又有——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外而言——调和、结合罗马与希腊的发展的使命感。恺撒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因此，在他身上比在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身上都要缺少所谓的典型特征，因为典型特征实际上是对人的自然发展的偏离。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个性，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时代或民族的特性。如同他年轻时代的历险记也跟其他的与他同等的较聪明的同代人的经历相同一样，他那非诗意的、但极富逻辑的天性是典型的罗马人的天性。时间与地点对他的高度决定是他全部人性的一部分，因为绝对的人性是没有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脱离一个现存的民族特性、一个特定的文化特性而存在。恺撒之所以是一个完人，是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加入了时代的潮流，也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完善地拥有罗马民族的核心特性及务实的市民勤奋，他的希腊主义早已与意大利民族性紧密地融为一体。形象地描述恺撒的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性也正在于此。如同一个画家什么都可以画，但却不能画完善的美人一样，面对这样一个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完美人物，史学家们也只能是沉默。因为一个规则是可以说出的，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对毫无缺点的否定式想象，而自然在其最完美的披露中把一般与个性结合为一体的这一秘密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把观察到这一完美的人称为幸运者，只能从这一伟大天性所创造的不朽业绩的光辉反照中获取对这一完美

的预感，尽管在这些业绩上也打下了时代的烙印。这位罗马人与其年轻的希腊先驱不仅能力相当，而且比他更为优秀；只是世界已衰老了，其青年之光暗淡了。恺撒的活动已不再像亚历山大那样，兴高采烈地向广阔的天地进军，他是在废墟上建设，并满足于在确定的辽阔而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安排得安全舒适。各民族诗人的敏感未去关照这位无诗意的罗马人，而相反以诗的所有灿烂辉煌，以传说的所有彩虹去美化菲利普斯之子是有其道理的；而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国家生计反复追溯到恺撒所开拓的道路上来也同样是有道理的；拥有这个世界的人民今天还以他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最高君主，这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也是一个让人感到羞愧的提醒。

要想从无论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无可救药的遗留状况中解脱出来，使国家年轻化，就必须首先真正安抚国家，必须清理上次灾难遗留下来的、到处覆盖大地的废墟。对此恺撒所遵循的原则是调和现存党派之间的关系，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真正调解不可调和的对立是不可能的——他是以下列原则为出发点的，即：使到目前为止一直争斗的显贵和民众派双方放弃现在的战场，统一到新君主宪法的基础上来。首先对共和时代的所有老的争执作了结论，永不追究。恺撒一方面命令重建被首都平民在得到法萨鲁斯之战消息后所推倒的苏拉塑像碑，认为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只有历史才有权对之作出判决，另一方面他又消除了此前戒严状态所导致的、仍有影响的后果，召回了由于秦那和塞多利乌斯之乱而流放在外的人，恢复了被苏拉迫害的人的子女所失去的被选举权；同时也为那些在前次灾难的酝酿时期因受监察官指控或政治审判，特别是依照 702 年的特别法被控告而失去元老院席位与公民权利的人平了反。出于情理，只有那些为了金钱而杀害了被剥夺权利者的人仍被痛斥，元老院党派大胆的雇佣兵队长米罗未被普赦。——比整顿这些从整体上看来已经属于历史的问题要艰难得多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当前对立的党派：他们一方面是恺撒自己的民主派追随

者，另一方面是被推翻的贵族。对恺撒取胜后的做法及放弃旧党派立场的要求前者比后者可能更为不满是很自然的。恺撒想要做的，基本上是盖尤斯·格拉古斯所想的；只是恺撒派人士的目的已不同于格拉古斯派。罗马民众党被逼入了不断升级的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到无政府、从无政府到对财产宣战的运动之中，他们私下纪念恐怖政权，如同修饰格拉古斯派人士的坟墓一样，现在他们用鲜花、花环来修饰卡提林那的坟墓。他们现在聚集在恺撒的大旗下，为的是从他那里得到卡提林那无法给予他们的东西。但局势很快明了，恺撒根本无意做卡提林那遗嘱的实现者，负债人可期待的充其量是付债优惠或减轻诉讼，这时不满的呼声高了起来：大众党不是为了大众取得了胜利，又是为了谁呢？出于对政治上、经济上毫无结果的萨图尔努斯节般的狂欢所致的强烈不满，这类高贵的与低下的乌合之众开始与庞培派眉来眼去，甚至在恺撒不在意大利的两年间（706 年 1 月至 707 年秋）发动了内战中的内战。行政官马尔库斯·西利乌斯·鲁福斯是一个杰出的贵族人士，但却是个很差劲的还债者，他较有天赋，很有修养，是元老院中慷慨激昂、能说善辩的一员；在集市广场上是恺撒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他未经上级委托在民众中实行了一个为欠债者免息六年的延期清偿法，然后，当人们提出质疑时，他又实行了第二个法，这个法撤消了所有偿还贷款和日常房租的要求。因此恺撒的元老院便免了他的职。这正值法萨鲁斯战役前夕，而大战的趋势似乎对庞培派有利；鲁福斯与前元老院帮派头目米罗取得了联系并共同策划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们一方面把共和宪法、另一方面把取消债务清还和废除奴隶制作为纲领口号。米罗离开了他的流放地马西利亚，在图立依一带纠集了庞培派及游牧奴隶并对他们进行了武装；鲁福斯准备动用武装奴隶占领卡普亚市，而这一计划在执行前被发现并遭卡普亚市民武装挫败。昆图斯·佩迪乌斯率领他的军团进入图立依地区，驱散了驻扎在那里的帮派团伙，这两位团伙领袖的倒台结束了

这一丑闻(706 年)。尽管如此,次年(707 年)又出现了第二个蠢人,护民官普布利乌斯·多拉培拉,他与前者相同,也是负债者,但论聪明却比前者差得多,他再次实行债务与房租法并就此和他的同事卢西乌斯·特累贝利乌斯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展开煽动战;武装帮派双方展开了残酷的斗殴,街头巷尾喧嚣不已,直至意大利指挥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下令出兵及恺撒从东方返回罗马才使这一闹剧全部告终。恺撒对这种试图重新恢复卡提林那计划的拙劣之举并不在意,他甚至容忍多拉培拉留在意大利,时隔不久又对他进行了赦免。对付这些没有政治目的的、只是为了反对财产而战的乌合之众就像对付强盗团伙一样,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的存在就足够了。恺撒如此伟大、如此明智,他不会以意大利的胆小鬼们对当时这些共产者所感到的恐惧来做交易,并以此为他的君主制骗取错误的威望。——如果说恺撒能够让过去的民主派在其已经走向瓦解的道路上任意发展,那么他却不能通过软硬兼施的做法来使生命力颇强的前贵族党派解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他所能做的只是为此做准备、打基础。出于固有的本分恺撒避免以空洞的嘲讽来奚落被推翻的党派,并在战败的同胞前作出胜利者的姿态[①],在提到庞培时,他常常总是带着敬意;在修复大楼时,他下令把市政厅前被人民推倒的庞培纪念像在从前的显赫位置上重新树立起来。胜利后,恺撒把政治清查限定在最小范围,他没有对宪法派与名义上的恺撒派人士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行调查;他把在法萨鲁斯和塔普苏斯的敌人阵营中找到的大量材料不加过目就一烧了之,并且放弃对那些有谋反嫌疑的人进行政治诉讼,以便为自己与国家减轻负担。另外,对所有那些跟随罗马或各行省军官卷入反恺撒战争的一般士兵也未追究责任。受到惩

① 下面要讲述的蒙达战役后的凯旋姿态也仅是做给在战败军中服役的大量卢西塔尼亚人看的。

处的仅仅是那些在努米底亚国王尤巴的军队中服役的罗马市民，他们被判处叛国罪并被没收了财产。那些战败党派的军官也被恺撒在705年的西班牙远征开始之前无限制赦免。但恺撒又认为，这样做太过分，至少除掉几个头面人物也是不可避免的。从这时起，他的准则是，那些在伊利尔塔投降后在敌方军队中当过军官或在反对派元老院中做过成员的人，如果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便剥夺他们的财产及政治权利，并把他们终身驱逐出意大利；如果未能幸存下来，那么至少他们的财产要收归国有；其中那些以前曾受过恺撒的赦免，但又再次加入了敌人的营垒而被捕获的人便失去了生存权。但这些规章的执行却是非常从轻的，对那些重犯者所判的死刑仅有极少数真正得以执行。在没收战死者财产时，不仅大方地支付了他们为个别群体所担保的债务及遗孀的嫁妆财产，而且还为死者子女保留了部分父亲遗产。那些按照准则应被流放和被没收财产的人中有不少马上被完全赦免，或者正如那些被强迫成为乌提卡元老院成员的非洲大商人，仅仅是受到罚款而过了关。至于其余的人，只要他们能够不护面子地去恺撒处申请，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重新获得了自由与财产。有些拒绝这样做的人，如前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塞鲁斯未经申请也得到了赦免。最后在710年恺撒对那些还未被召回的人实行了大赦。——共和反对派虽然接受了赦免，但并无调和之意。对事物的新格局的不满及对不寻常的统治者的愤怒是普遍的。做公开的政治反抗的机会当然已经没有了，几乎不值一提的是，有几位反对派的护民官利用头衔问题，示威性地反对称恺撒为国王的人，以图得到共和派殉难者的桂冠。因而共和主义更强烈地表现为秘密策划串连式的观念对抗。帝王公开出场时无人举手欢呼，反对新君主制的小字报、讽刺诗、愤怒尖刻的大众化嘲讽铺天盖地而来。哪里有演员作出亲共和派的暗示，哪里就会响起最热烈的掌声。对伽图进行颂扬是反对派的小册子作家最时髦的题目，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找到加倍感激他们的读者，是因为

文学也失去了自由。恺撒在自己的领域内仍继续反对共和派,他本人及他的有能力的心腹也以反伽图文学来回击伽图文学。共和派的文人与恺撒派的文人对乌提卡这位死人的争论就如同特洛伊人与希腊人争夺帕特洛克罗斯的尸首一样。在这场由完全亲共和派的读者为法官的斗争中恺撒派自然是吃亏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对作家实行恐怖活动,因此,在流放者中那些在文学上知名的危险人物,如:普布利乌斯·尼基迪乌斯·菲古鲁斯和奥鲁斯·西西那,要想得到返回意大利的许可证却比别人要难得多。被容忍留在意大利的反对派作家确实遭到了新闻检查,由于所担心的惩罚尺度完全是专横任意的,所以这一检查的束缚更为严重。对被推翻的党派反对新君主制的策划与奔波另作别论则更为妥当,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觊觎王位派和共和派在罗马帝国内不间断地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暴动,时而由庞培派、时而由共和派点燃的内战之火到处熊熊燃烧,首都内暗杀统治者的阴谋企图接连不断,而恺撒并不因为这些暗杀活动让卫兵长期保护他,他通常满足于通过出告示的办法来把被揭穿的阴谋公布于众。无论恺撒怎样习惯以满不在乎的大胆来对待涉及他人身安全的问题,他却不能无视这些愤怒之众构成的严峻威胁,因为所涉及到的不仅是他本人,而且还有他的业绩。尽管如此,他仍不接受朋友们的警告与唆使。——当然也没有低估与那些即使被赦免的敌手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还是以非凡的冷静坚持原谅反对派中的大多数。这既不是出于骄傲的天性中那骑士风度的宽容,也不是出于软心肠的感情脆弱,而是出于政治家的正确的深思熟虑:在国内让国家溶化吸收战败的党派比对他们进行压制根除或者通过流放赶出国家要快得多,对国家的危害也要小得多。为了他远大的目标,恺撒不能缺少宪法派,因为他们不仅是贵族的代表,而且在他们身上还集中了意大利公民的所有自由与民族意识的成分。为了实现他的使衰老的国家年轻化的计划,他需要这一党派中大批的赋有天才、修养并通过继承或

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享有荣誉的人。可能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把对敌手的赦免称为是胜利对他的最佳奖赏。这样，战败党派的最高层人物被革除，但对那些二三流人物、特别是年轻一代彻底赦免且未作保留，但也并没有允许他们进行消极对抗，或有不满、抱怨，而是通过或多或少的轻微强迫，使他们参与新的行政管理并从中得到荣誉地位。就如同对亨利四世和威廉·冯·奥拉尼恩一样，对恺撒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在胜利之后。每个革命的胜利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他在战胜敌手后，不像秦那、苿拉那样继续留任党派领袖，而是像恺撒、亨利四世和威廉·冯·奥拉尼恩那样，以国家的繁荣事业来取代必然是片面的政党纲领，便会立即使所有党派和自己的党派以及被战败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新元首。他对自己的这一新职责理解得越伟大、越纯洁，就越是如此。宪法派朋友及庞培派人士虽然嘴上恭维恺撒，但对君主制或者至少对王朝却心怀不满。当衰落的民主派领悟到，恺撒的目的与他们的根本不同时，便进行公开动乱反对恺撒。即使是恺撒自己的追随者也开始产生怨言，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首领所建立的不是一个雇佣兵首领国家，而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公正君主制，他们应得的好处因战败者参与分配而被减少。由于所有党派都对这一国家秩序感到不快，所以恺撒不得不把它强加于敌手，同时也强加于自己的同志。在一定意义上，恺撒自己的地位所受到的威胁比胜利前要大得多，但他失去的却是国家所得到的。他在消除党派的同时不仅未伤害这些党派人士，而且让每个有天才或仅是出身高贵的人得到了职位，对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既往不咎。这样，恺撒不仅为他的宏伟建设蓝图赢得了国家现有的全部力量，而且通过让所有党派的人士都自愿或者不自愿地参加这一共同事业的建设不知不觉地把全民族引到了新开辟的道路之上。目前各党派之间的平衡只是表面上的，各党派的共同点不在于如何对待新的状况，而在于对恺撒的仇恨，这一点并没有迷惑恺撒。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对立可以在表面的联合中得

到削弱，作为政治家只能以这种方式赢得时间，而只有时间才能最终消除这种敌对的分歧，因为只有时间才能把老一辈送入坟墓。他更少关心的是，谁恨他或者谁想暗杀他；他像每个真正的政治家一样，为民众服务不是为了得到报酬，也不是为了获取爱戴，而是把同代人对他的宠爱奉献给未来的幸福，特别是奉献给命运安排的拯救民族、使国家年轻化的宏伟大业。

如果我们试图对老的状况向新轨道的过渡作一个具体的总结的话，那么，首先要提及的是，恺撒的出现不是开始，而是一种完成。一个新的、符合时代的政治计划是很早以前就由盖尤斯·格拉古斯设计的，他的追随者与继承者以或多或少的才智与幸运，毫无动摇地把这一计划坚持了下来。按继承法，恺撒从开始就是民众党的领袖，三十年来，他高举党的旗帜，从未改变或仅仅是掩盖其颜色。即使做了君主后也仍是民主派人。他毫无保留地继承了党的遗志，这当然不包括卡提林那和克罗狄乌斯的不轨行为。他对贵族及真正的贵族人士充满了刻骨的、个人的仇恨，一如既往地坚持了罗马民主派的基本思想：改善负债者的境况、开发海外殖民地，逐步缩小国民各阶级中存在的法律差异，把执政权从元老院中解放出来；同样，恺撒的君主制与民主理想也几乎没有任何矛盾，而后者更多是通过前者来得以完成与实现的，因为，这一君主制不是东方的、上帝恩赐的暴君制，而是盖尤斯·格拉古斯曾想建立、由伯里克利和克伦威尔建成了的君主制：民族由其最高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代理人来代表。从这种意义上讲，构成恺撒业绩基础的思想并不是一种独创。但无处不是最为重要的实现却是他的功劳，这一宏伟的实施是他的伟大功绩。即使是这一思想的天才设计者看到这一思想的实现也会感到惊讶。每一个亲身经历或在历史中接触到这一点的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历史时期，无论他带有何种政治色彩，他都会以对人类及伟大的历史人物的理解永远为之感动、并对之产生敬仰之情。——在这里显然需要史学家阐明他们到处默认

的前提，反对他们以简单而又狡诈的做法，把对历史的功过之评与实际情况脱离开来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来使用。在这里指的便是把对恺撒的评价作为对所谓恺撒主义的评价来理解。当然，过去世纪的历史应是当今世纪的教员，但并不是像在通俗理解的意义上那样，可以简单地在史书中翻阅到对当代状况的描述，并在其政治诊断及处方中找到当今症状及特效药；相反，历史的教育意义在于，对过去文化的观察揭示了文明的有机条件，揭示了到处都存在的同样的基本力量及其不同的组合，它并不是要引导、鼓舞人们去进行无主见的模仿，而更多的是进行独立的再创造。在此种意义上讲，恺撒的历史及罗马的恺撒主义（就其无与伦比的宏伟及历史必然性而言），实际上是对现代独裁的难以言述的尖刻批评。按照最小的机体也要比最完美的机器强无数倍这一自然法则，每一个再有缺陷的、但能给大多数公民留有自由自决权余地的宪法，都要比最天才的、最人道的专制主义强出无数倍。因为，前者是有发展能力的，也就是说，有生命的，而后者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死的。罗马的绝对军事君主制证实了这一自然的法则，它在其创建者的天才推动下，在与外国无任何重大纠葛的条件下，比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都建造得更纯洁、更自由，这样就更完全地证实了这一自然法则不可抗拒的力量。如同吉本早已阐示过、后来的史书仍要阐示的那样，从恺撒开始，罗马体系只是在外表上还联系在一起，只是机械地得到了扩展，而在内部则随着恺撒新体制的开始而干枯和死亡。如果说在独裁的初期，特别是在恺撒的心中还存有对自由的人民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相结合的梦幻，那么，尤利乌斯家族的高度聪明的皇帝的统治则以可怕的方式表现了水与火同存并处的后果。恺撒的建树是必要的、有益的，这并非是因为它带来了、或者仅仅是可能带来幸福，而是因为——就建于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完全背离了共和结构代表制的古代人民组织而言，就经过五百年的合法发展，逐步向寡头政治专制成熟的城市宪法而言——绝对军

事君主制是逻辑的和必要的最后一站，是最小的灾难。如果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的奴隶主贵族会像他们在苏拉式罗马的同路人那样走得那样远的话，那么，在历史面前，恺撒主义也会是合法的[1]；但如果新君主制在另一种发展条件下出现，它将会是一种假象，同时也是一种篡权行为。历史不会允许缩小真正的恺撒所应享的荣誉、仅因为上述格言会为假恺撒式的人物提供使幼稚者迷惑、使恶意者得以蛊惑人心的机会。历史也是一部圣经，如果说新君主制像圣经一样，不能制止蠢人来误解它，也不能阻止魔鬼来引用它的话，那么它也有能力来忍受这两者并为其作补偿。

新的国家元首的地位，至少最初看来，在形式上表现为独裁。恺撒最初是在705年从西班牙返回后接受了这一职位，但几天后又把其辞掉，他仅仅是作为执政官领导了706年的决定性远征——也正是这一职位构成了内战的导火线。但在法萨鲁斯战役后的同年秋天，他又重新担任独裁者，最初是无限期，但从709年1月1日起作为一年一任，然后在710年1月或2月间[2]定为终身，这样便明确放弃了过去所保留的辞职权利，并将这一职务的终身制以"终身独裁者"的新名称作了形式上的表达。这一独裁，无论是以前的暂任还是后来的长任，都不是旧宪法意义上的，而是仅仅在名称上与此有关的、在苏拉的章程的意义上的最高特别职位。这一职位的权限不是按照宪法对个别最高职位的规定，而是通过特别人民公决来确定的。其目的是，让任此职者在受托起草法律、治理国家时，得到法律上无限的、集共和式的多权分立为一体的职务权限。如果这一权力的拥有者还通过特别程序，得到不需与元老院

---

[1] 当1857年落笔写这段时，还未能知道，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战斗、最辉煌的胜利即将为其免除这一严峻的考验，并为其未来保证无条件的、不受任何地方恺撒主义长期阻碍的、自我控制的自由。

[2] 710年1月26日恺撒的名称还是独裁者四世，而同年2月15日已是终身独裁者。

或人民协商便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力、自由支配军队与财政及任命行省总督的权力，那么这仅是对一般权限的具体使用。从法律上来讲，恺撒甚至可以得到那些高级公职之外、乃至国家权力权限之外的职权。他放弃取代民众大会来任命高级官员的权力、而仅限于掌握对一部分行政官及低级官员的有效建议权，这在他看来似乎是他所作出的让步。另外，他还通过特别人民公决使自己得到了把在出身上无资格的人封为贵族的权力。

除了独裁者这一职位外，恺撒并无时间去任其他实际职务，他没有接管监察官这一职务[1]，但却行使了监察权，特别是充分使用了监察元老院成员的任命的这一重要权力。——除了独裁者这一职位外，他还经常担任执政官，甚至一度独任，但他并未长期把这职位与他个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没有接受这一职位对他提出的连任五年或甚至十年的要求。——监督祭礼的职位他无需担任，因为他已是最高祭司。他也被接纳为占卜会的成员，得到了无数新老荣誉及权利，如：祖国之父这一称号、把他的出生月份七月用他的名字命名为至今仍在沿用的尤利乌斯以及其他最后变为庸俗崇拜的、象征着皇家风格之始的表现，这些自然都是可想而知的。仅有以下两点是值得强调的：恺撒与护民官在个人的不可侵犯性上尤其享有同等的权利；帝王这一称号永久地与他本人联系在一起，除了其他职务称号外他把帝王引用为称号[2]。

对于明智者来说，恺撒为国家设置最高权力的意图是不需要证明的，这一最高权力不仅是数年的或者是像苏拉的暴政统治那样无限期的个人职位，而且也是作为根本的、长期的机构；他为这一新机构选用的相应的、简单的名称也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如

① 独裁这一提法似乎同时明确强调了"改善道德"这一点，但恺撒并未担任这样一个职务。

② 恺撒在引用帝王这一称呼时，从不用重叠数码，而总是把它放在名字后的第一位。

果说设置无实际内容的名称是个政治错误，那么，摆出无名称的大量实际权力也并非是小错。当然，对这一职务恺撒最终想用何种提法是难以判定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这一过渡时期暂时性的与长久性的建构还未能清楚地分开，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事者在恺撒的每个暗示之前已显出了殷勤的阿谀奉承，为主子颁发了大量的、无疑使他感到厌恶的信任法令及荣誉法律。新君主制根本不可能继续沿用执政官这一机构，这首先是由于与这一职位不可分割的集体性。很显然，恺撒为使这一迄今为止的最高职位降为空头衔作了努力，所以，当他后来担任这一职务时，任职还不满一年，就在期满前移交给了二流人物。实际上，独裁官一职出现得极为频繁、极为确切的原因可能只是恺撒想利用其从传统上看在宪法机制中所起过的作用，即克服特别危机的特别理事机构。但作为新君主制的基础它却是很不值得推荐的，因为这一职位很特别且不受欢迎，也不可能指望民主派的代表把这一以敌对党派的天才先驱为其目的所设置的形式选为长久性的组织形式。对表达君主制更为合适的是新帝王这一名称，首先因为这一用法[①]是新的，而且其引用找不到任何特定的外在原因。不能换汤不换药，这里新事物获得了新名称。这一名称更为明确地对民主派已在加宾尼乌斯法中为他们的领袖所制定的权限做了最精辟的总结：这一职务权力永久地集中掌握于一个独立于元老院的民众领袖手中。特别是在后期，印制带有恺撒头像的钱币上的称号除了独裁者之外主要是帝王，看来在恺撒颁布的政治犯罪法中，君主也是以这一称号出现的。后来尽管不是直接地，但还是把君主制与帝王名称联系在一起了。恺撒的意图可能是以这一称号把护民官的权力与最高祭司的权力彻底结合起来，以便给这一职位同时加上民主与宗教的色彩。——这一新

① 在共和时代，帝王或称大将军的名称用于获胜的统帅，战役结束后便不再使用，作为长久名称它最先用于恺撒。

的组织形式不仅仅限于其创建者终身，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一创建者却未能着手解决接班人这一问题，所以难以评说，他是否考虑过像存在于原始国王制中的那种接班人的选择，或像他的养子后来所宣称的那样，想在对这一最高职位实行终身制的同时也实行继承制①。他曾有过如同后来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在某种意义上把两种制度结合起来安排接班人的意图，这不是不可能的，即：由儿子来继承统治，如果统治者没有儿子或者认为儿子不适合做继承人，便通过收养了并经自由选举任命接班人。

从国家法上来看，新帝王职位是依据执政官及前执政官权限之外的地位而定的，这样，这一职位首先包括了军事指挥权，但同时也包括了最高司法权，因此也就包括了行政权力。帝王的权力实质上比执政官及前执政官优越，因为它不受时间及地域上的限制，而是终身的并且在首都也有效用②，因为执政官可能受到拥有同样权力的同事的牵制，而帝王却把这一可能排除在外。同时为帝王这一职位取消了所有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来的最高职权所设的限制，特别是允许上诉的义务及尊重元老院的建议等等。一句话，新的帝王职位是重建的古老国王制，因为，对权力在时间与地域上的限制、集体性及在特定情况下委员会或者团体的参与正是将执政官与国王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新君主制中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不可以在老君主制中找到：最高的军事、司法、行政权力集中在王

① 恺撒之子继承进行统治的有效法律称号的依据是，恺撒在世时已通过正式立法程序把帝王及最高祭司职位定为可由他的父系血统关系——亲生的或是间接收养——的亲属继承。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必须坚决驳回曾有过这一法律或者元老院的决议存在的说法；可能的是，恺撒曾有过颁布这样一种法律的意图。

② 当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采用恺撒的帝王制时，在地域上、在某种意义上也在时间上对其作了限制。皇帝的执政官式的权力即帝王的权力，不应在罗马及意大利使用。这一点正是恺撒帝王制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在原则上不完全而实际上更难以实现的那一限制则是这两个机构间现实的共同点。

侯一人手中，国家的宗教理事权，颁布有效规章的权力，把元老院降为国务院，恢复贵族等级制及城市长官衙署。比这些雷同更有说明力的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君主制与恺撒的君主制之间的内在同一性：如果说罗马的那些旧国王尽管有极大的权力，而仍是自由国家的主人，是平民反对贵族的保护人的话，那么恺撒的出现也并不是为了消除自由，而是为了实现它，首先是要砸碎难以忍受的贵族枷锁。恺撒活像一个政治古董收藏家，他退回到五百年前为他的新国家寻找模式，对此，人们不应感到诧异；由于罗马国家的最高职位在所有时代都曾是一个受一系列特别法所限制的国王制，所以国王制这一概念从根本上并没有消失。在共和国期间的不同时代、在十人权力委员会中、在苏拉以及恺撒自己的独裁中，人们实际上都从不同的方面回到了这一概念上来。与通常有限的帝王制相反，在所有需要特别权力的地方，都出现了逻辑上必然的无限帝王制，而这一帝王制与国王权力没有任何区别。最终，对外在因素的考虑也是回到以前的国王制的一个原因。人类进行新创造非常艰难，因而把已经发明的形式视为神圣遗产。所以恺撒出于成熟的考虑继承了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衣钵，就如同后来卡尔大帝继承了恺撒而拿破仑又试图继承卡尔大帝的衣钵一样。恺撒做这些并没有转弯抹角、神神秘秘，而是像后来那些人一样尽可能地光明正大，因为这一继承的目的是为新的国家找到一个明确的、具有民族性的、并受欢迎的提法。长久以来卡皮托山上树立着被常规罗马史习以引用的七位国王的塑像，恺撒下令为他自己建造第八个，并身着阿尔巴老国王的服装公开出场。他的新政治犯罪法与苏拉法的最主要区别是，把作为活生生的人民化身的帝王与国民相提并论。在用于政治宣誓的誓言中，除了罗马人民的朱庇特和家神外还加入了天才的帝王这一条款。按照整个古代流行的观点，君主制的外表标志是印在钱币上的君主头像：从710年起，出现在罗马国家钱币上的是恺撒的头像。这样，人们至少不能抱怨恺撒未让

民众明了他对自己的地位的看法。他尽可能确切地、正式地不仅以君主的身份出现，而且也以罗马国王的身份出现。甚至还有可能的是，他曾想用老国王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职务权力，而不是用新的帝王名称。当然这不一定符合史实，而且是极为次要的。恺撒在世时，他的许多敌人及朋友就认为，他有被明确任命为罗马国王的意图。他的一些忠实信徒曾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劝他戴上王冠，表现最明显的是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这位执政官在大庭广众之前向恺撒敬献王冠（710 年 2 月 15 日）。但恺撒却无一例外地拒绝了这一切申请。他同时也反对那些利用这些事件来进行共和派对抗的人，但并不因此而表明他拒绝这些申请不是真心实意。甚至有人猜测，要求给他加冕实际上是按他的旨意办的，以在民众中为罗马的国王加冕这一非凡剧作做准备；但这一猜测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恺撒要对付的持不同观念的反对派的巨大力量，他们不会由于恺撒公开承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作出更多的让步，相反，必然会扩大影响。有可能完全是恺撒的忠实信徒那未经授权的急迫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另一可能性是，恺撒之所以允许或导演了安东尼乌斯这一剧作，为的是以尽可能明确的方式来结束这一不愉快的议论，因而便当着市民的面宣布他对国王称号的拒绝并命令写人国历，以表示这一拒绝事实上的不可逆转。这一可能性也表明，恺撒既赞赏常用提法的价值又承认群众更多是对名称而不是对事物实质的反感，他决心避免采用使人联想到古老的、可憎的、对当时的罗马人更多是象征着东方暴君的、而不是他们的努玛和塞尔维乌斯的国王称号，而是在帝王这一称号下去获取国王制的实质。——不管对最终的称号如何设想，主人都已有了，因此王宫也就马上以其必有的华丽及乏味空虚的风格设置起来。恺撒公开出场时，穿的不是以紫条修饰的执政官服装，而是古代国王穿的全紫服装。他坐在金椅上，不加起身地接见庄严的元老院队列。为祝贺他的生日、胜利、宣誓所举办的庆典填满了日历。当恺撒来首都时，

他的高贵仆人成群结队、远道而来迎接他。与他接近有了重大意义，他所居住的城区的房租也跟着上涨。由于求见他的人非常之多，所以与他进行个别交谈也受到了限制，以致使恺撒甚至与他的心腹也不得不以书信方式来交流。那些最高贵的人也不得不数小时等候在前厅。恺撒明确地感到了他不喜欢看到的事情：他脱离民众了。一个君主式的贵族阶层产生了。值得注意的是，它既是新的又是老的，它产生的思想基础是以国王制的贵族取代寡头政治的贵族，以贵族取代显贵。贵族仍然存在，但只是作为严格的容克式帮会，它没有重要的等级特权。由于不能接纳新的家族，它便在几百年中逐渐消亡：到恺撒时代仅存的贵族家族不过十五六个。由于出身于这一阶层的恺撒通过人民决议获得了组建这一新贵族家族的权力，于是他建立了与共和派显贵相对立的新贵族。这一新贵族成功地集中了君主制贵族所要求的所有条件：老朽无用，完全依赖于政府，华丽而无意义。在各个方面它都表现了作为一个新的统治阶层的特征。

在一个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的君主的统治下，没有什么宪法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迄今为止的基于市民团体、元老院及每个官员间的法律合作之上的国家的继续。恺撒十分明确地继承了国王时代的传统：就像在国王时代那样，市民会议仍与国王并存，并与国王一起对自主的人民意志作最高、最终的表达。元老院又回到了初始的作用上，即：在君主需要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参议。这样，统治者最终将所有官员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就像在古代一样，除了国王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官员。

在立法方面这位民主君主坚持罗马国家法的古老条文：只有国王与由他召集的人民团体一起才有能力有机地治理国家事务，并经常通过人民公决来批准它的机构建设法规。这一时期的所谓民众大会当然不会重新获得它以前作为国民后备军表态时所具有的自由权力及代表道德与国家权威的权力；市民团体对于立法的

参与在老宪法中是非常受限制的，但却是实际存在，并且非常活跃，而在新宪法中它却只是一个无实质的影子，所以对民众大会也不需要采取特别的限制措施。多年的经验表明，对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自主体，任何一个政府，无论是寡头政治还是君主，都未遇到什么麻烦。由于民众大会是恺撒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因而它的作用在原则上坚持人民自主，坚决反对苏丹主义这一点上才有间接的实际意义。——此外，非常明显而且十分确凿的是，不只是恺撒的继承人，而是恺撒本人就已采用了最古老国家法中的另一条文：只要最高官员或者说唯一的官员在位，他的命令便有着无条件的效力；尽管立法是国王与市民团体的共同权利，但国王颁发的规章在他退位之前与法律有同等的效力。

如果说这位民主派国王至少在形式上给了人民团体参与主权的权利，那么，与迄今为止的政府，即：元老委员会分享权力绝不是他的本意。与后来的奥古斯都的元老院截然不同，恺撒的元老院仅是一个最高帝国议会，恺撒利用它来预商法律，由他或者至少以他的名义来颁发重要行政命令。当然也出现过以下的情况：元老们对已颁发的元老院决议一无所知，而他们的名字却被列在起草成员名单内。从形式上讲，重新恢复元老院在法律上未曾、而实际上已经失去的本来的参议职能，这没有什么大困难。相反，预防实际的反抗则是必要的，因为罗马元老院是反对恺撒的发源地，就如同阿提卡的最高法院是反对伯里克利的工具一样。主要是出于这一原因，恺撒对元老院元老的数量作了调整。其正常数量到目前为止最多是六百人，是由于前几次危机大大缩减了；现在通过特别增补，数量加到了九百人。同时，为了至少保持在这样一个数量上，将每年任命一次财政官，即：每年进入元老院的成员的数量从二十个提高到了四十个[1]。元老院的特别增补由君主独

① 按照前面所假设的概率计算元老院议员的平均总数为 1000－1200 人。

自决定。他还通过法律[1]保证了自己对正常增补的影响。这一法律规定，选举委员会必须把票投给前二十个持有君主推荐信的财政官申请者。另外，王位拥有者有权利把与财政官职位或其上级职位联系在一起的荣誉权利，主要是元老院席位，破格授予不符合条件的个人。特别增补选举当然主要涉及那些新秩序的追随者，除了有声望的骑士外，也有一些声誉欠佳的以及平民人士进入了上层社团：曾被监察官或经法律判决而被除名的元老院成员，来自西班牙及高卢的外国人，他们当中一些人在进入元老院之后才开始学习拉丁文。还有那些从未佩戴过骑士戒指的退役下级军官、被释放的奴隶的儿子、或从事不正当生意的人以及类似分子等等。元老院这一人事安排的改革当然使得罗马的上流人物极为恼火，他们认为，这是有意贬低元老院机构本身。恺撒不可能采用自我毁灭的治国艺术，他坚信这一议院本身的必要性，同时又决心不受他的这一机构的支配。而这些显贵们却没有正确认识到君主这一做法的意图，即改变元老院此前唯独代表寡头贵族的特点，恢复它在国王时代的职能：使它成为一个由出身低下的人在内的、即使是外国人也并非要排除在外的、最有聪明才智的人构成的、代表国民各阶级的帝国议院。正像最古老的国王让非市民进入了元老院一样，恺撒让非意大利人进入了他的议院。——这样，显贵的统治被铲除，他们的存在被瓦解，新形式的元老院只不过是君主手中的工具而已。同时在对国家的管理和统治中独裁急剧加强，所有执政权力都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当然，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是首先由帝王个人来决定。恺撒个人统治的范围之广、能力之大，是我们俗人难以想象的，这不仅是出于他的无可比拟的迅速果断的工作，而且也由于其他更为普遍性的原因。如果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恺撒、苏拉、盖尤斯·格拉古斯，或者说所有罗马政治家所做的、超出我们对人

---

[1] 但这一法律仅涉及711年和712年的选举。当然这一设置将成为长期的。

的工作能力的想象的事业，那么其原因并不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人的性质的改变，而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国家组织的变化。罗马的国家组织是一个机器，在这一机器中奴隶及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智力也成了统治者的力量源泉。这位统治者善于统治这些人，善于利用无数人的才智。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商业制所竭力追求的官僚集中制的理想，但这一追求却远远落在这一原始楷模的后面，就如同今天的资本统治落在古代奴隶制之后一样。恺撒懂得利用奴隶制的好处：只要其他条件允许，他通常把非常受信任的职位委派给他的奴隶——重获自由的奴隶及出身低下的当事人来担任。他的业绩在整体上表明，像他这样的组织天才是多么有能力让他的工具发挥作用。如果要问他这奇迹般的成就究竟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呢？对此我们不能作出圆满的回答——在这一点上，官僚机构与一个工厂是相同的，它所创造的产品所表现的不是个人的劳动，而是为其贴标签的工厂整体的成果。非常清楚的是，恺撒在创业过程中根本没有对他的业绩施加个人影响，也没有知晓他的整个计划的助手，他是唯一的师傅，而且他没有徒弟，有的只是小工。——具体些说，在实质性的政治问题上恺撒自然也尽量避免让别人来代理他；如果这种代理实在不可避免的话，比如恺撒经常离开罗马而完全需要一个高级机构来代理。他所决定的代理人不是君主的合法副手或市行政长官，而是没有官方承认权限的心腹，通常是他的银行家——这位来自加得斯的聪明、圆满的腓尼基商人卢西乌斯·科尼利乌斯·巴尔布斯。在行政管理上，恺撒主要注重重新收回在推翻国王制后被元老院据为已有并以此夺得财政管理权的国库钥匙，并把它交给那些以自己的生命无条件地向他负责的仆人。从产权上来看，君主的个人财产当然是与国家财产严格分开的，但恺撒却将国家整个财政金融的管理全部置入自己的手中，并以他及所有罗马大人物惯用的管理自己财产的方法来操持。未来的行省地租税的征收，特别是对货币业的领导也移交给了帝王的奴隶及获

得自由的奴隶来管理，元老院元老等级的人物被排除在外——这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步，它导致了后来的总管这一重要等级和“皇室”的产生。相反，把财政业务交于皇家税官之后，行省总督职务所掌管的就主要是军事指挥权了，其中只有埃及的指挥权被君主自己的人接管。由于独特的地理上的孤立、政治上的集权，尼罗河畔之乡比任何一个其他管区都更为适合在一个强有力的领袖领导下永久脱离罗马中央。在前几次危机中，处于困境的意大利党魁们多次尝试久居此地已足以证明这一点。可能还是出于这一考虑，恺撒才没有把此地正式宣布为行省，而是让没有构成威胁的拉各斯家族在此继续存在。同时肯定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未把驻扎在埃及的军团交给一个属于元老院，也就是说前政府的人来管理，而是把这一指挥权如同对待纳税官职位一样交于仆役。但总的来说，恺撒并未过多考虑像东方的国王一样，通过奴仆来指挥罗马的士兵。他的基本原则是，让以前的执政官来担任重要的行省总督职务，让以前的行政官来担任次要的行省总督。行省总督的上任时间很可能重新像以前那样，直接在市政任期结束之后，而不再需要如 702 年的法律规定的五年间隔时间。与此相反，各行省在合格的候选人中间的分配则由君主来决定，而不像以前那样，时而通过人民决议或元老院决议来决定，时而通过官员们自己商议或通过抽签来决定。由于执政官出于各种原因常在年终之前退位，以给后选的执政官让出位置，且每年任命一次的行政官数额由八名提高到了十六名，其中一半像任命半数财政官的方式一样，由帝王来任命。最终帝王还保留了任命名誉行政官和名誉财政官的权力，尽管这一权力不包括任命名誉执政官。这样，恺撒在数量上为他安排行省总督这一职位保证了充足的他所喜欢的候选人来源。当然罢免也同任命一样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的。据估计，执政官级的行省总督在行省的任期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行政官级的不超过一年。至于首都及宫城的行政管理，帝王显然曾一度有意以同样的方式交予由他

任命的官员来管理。他又让国王时代的代理官员制重获新生。在他外出期间曾多次把首都的管理交给一个或数个由他未经与人民商议而任命的不定期代理人，由这些人集中掌握所有官员的业务，他们甚至有权力铸造带有自己名字、当然不能带有自己头像的钱币。另外，707 年及 709 年的头九个月既没有行政官，也没有与其级别相当的高级营造官及财政官。在 707 年执政官到了年终才被任命，在 709 年恺撒甚至是没有同事存在的唯一执政官。这看来是一种尝试，在罗马城内也全面更新，除了新君主在作民主派时所设的限制之外的老国王的权力，即所有官员中，除了国王之外，在国王外出期间只保留市行政长官以及为保护人民自由而聘用的护民官及民众营造官，而执政官、监察官、行政官、高级营造官以及财政官职位则被撤消[①]。但后来恺撒又与此保持了距离：他不仅自己没有接受国王的称号，而且也没有废除那些与共和国的光荣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庄严职称。执政官、行政官、营造官、护民官以及财政官基本上保留了他们此前的形式上的权限，而他们的地位却被彻底改变。罗马帝国应在罗马城崛起，是共和国的基本政治思想，所以把首都的自治市政官员与帝国官员同等对待是很自然的。而在恺撒的君主制中，随着这一观念的消失其后果也随之消失。此后，罗马城只是许多帝国自治区之首，特别是执政官这一职务成了纯粹的名誉职位，只是由于它与高级行省总督职位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权限才保留了一些实际作用。由于恺撒的安排，罗马市惯于强加给被征服区域的命运现在反变成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统治罗马帝国的主权变成了罗马帝国内有限的地方自由。与此同时，行政官及财政官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对于民众营造官也同样如此，他们中间又新增加了两名监督对首都的供应的“粮

---

① 在恺撒的法律中提到这些职务时措辞是谨慎的：人口普查由监察官或罗马人民管理机构的另一人负责；有权力在罗马宣布公告者为行政官或有符合法律权限者；国库由市政财政官或他人领导。

食营造官”。这些职务的人选由市镇决定，有关执政官、也可能包括护民官及民众营造官的人选也未作限制。至于每年选举一次的行政官、高级营造官及财政官的半数，帝王对选举人具有约束性的建议权，前面已基本谈到。人民自由的古老神圣的守护神丝毫未受侵犯，当然这并不妨碍对个别的反叛护民官采取严厉的措施，罢他的官、或取消他的元老院成员的资格。由于帝王在重大问题上大权独揽，财政由他的仆人管理，军队由他的副官统率，于是旧共和国的国家官职变成了罗马市政官职，这样专制便基本建立。

与此相反，尽管恺撒在国家计划中对教会部分颁布了详细的法律，但除了把最高祭司职位和可能把各个高级教士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与君主个人联系在一起之外，对教会等级却未作根本性的革新。其部分原因是在三个最高级委员会中各增设一个职位，在司宴官这第四个委员会中新增设了三个职位。如果说罗马国家教会在这之前是寡头政治统治的支柱，那么现在它仍可为新的君主制效力。元老院保守的宗教政策成了罗马新国王的政策；极端保守的法罗这时发表了《古代神圣事物》，这一罗马国家神学的主要著作竟可献给最高祭司恺撒。朱庇特崇拜发出的最后的暗淡光环围绕着新建立的王位，这古老的国家信仰在其最后阶段成了从开始就空虚软弱的恺撒教皇权的工具。

在司法事务中，首先恢复了旧的国王审判权。国王原来在刑事与民事方面就是法官，就前者而言，他在法律上不受人民赦免机构的约束，就后者而言，他在法律上没有把有争议的问题交予陪审员决定的义务。如同老国王一样，恺撒利用权力，把刑事制决与私法诉讼变为他独自的、最终判决权，如果他在罗马，便自己处理；在外出期间便交予市政代理处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恺撒完全以老国王的方式，时而公开坐在首都的广场上审判被指控为谋反罪的罗马公民，时而在他自己的宫内开庭审判被指控为犯有同样罪行的附属王侯。这样，罗马市民与国王的其他臣民相比所享有的特权似

乎仅仅是法庭审理的公开性。尽管恺撒以中立、认真的态度来行使这一职权，但就事物本身的性质来看，这一重新采用的国王总法官制实际上只用于特殊案件。此外，对于刑事及民事案件的通常诉讼程序基本上保留了现存的共和国司法。刑事案件一如既往地由不同的专职负责不同犯罪的陪审委员会来处理；民事案件一部分由继承法院或所谓的“百人委员会”负责，一部分则由专门陪审员来处理；法庭的庭长像往常一样，在首都主要由行政官、在行省则由总督来指定。即使在君主统治下，政治犯也仍交由陪审委员会处理；由恺撒为此颁布的新法规对可受法律惩罚的行为作了精确规定，开明地排除了政见迫害，把惩罚定为流放，而不是死刑。在陪审员的选用上，元老派希望完全出自元老院，坚定的格拉古斯派希望完全出自骑士等级，而恺撒出于调解各派的基本思想，则继续采用科塔的陪审职位分配法，但这一分配法可能已经附带了 699 年的庞培法所准备进行的修改，即取消来自下层人民的低等市民保民官，这样便把陪审员的预算定为至少 40 万塞斯特尔茨（3 万塔勒），由元老院成员与骑士分担陪审员这一两派长期争夺的职能。——国王的与共和式的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竞争的关系。这样，每一案都既可由国王法庭又可由对应的共和式法院来审理。在发生冲突时，当然是后者居劣势；但如果一法庭已对一案作出判决，那么案子也就就此了结了。—— 对于由所委派的陪审员对一民事或刑事案件所作出的判决，新的统治者也没有推翻的权限，除非一些特别情况，如：贿赂或武力事件，可导致撤消陪审员的判决，对此，共和国的法律已作了规定。与此相反，每个由于任意一个公职法令而受虐待者均可向主管部门的上级提出申诉，这一准则可能现在就已扩大了使用范围，并由此而产生了后来的皇室上诉机构：可能所有具有判决职能的公职人员、至少是所有行省总督都被视为统治者的下级官员，因为对他们的每一个政令都可向统治者提出上诉。—— 但这些革新并不能治愈罗马司法瘫痪的创

伤，革新中最重要的部分和上诉的普及并不一定能够算作是一种改善。刑事诉讼在一个奴隶制国家里不可能是健康的，因为对奴隶处理的方法如果说不是在法律上，那么就是实际上掌握在主子的手中。罗马主子对其奴仆的犯罪显然不是作为犯罪来处罚的，而是仅在犯罪使得奴隶对他失去了用处、给他带来麻烦时才被处罚；犯罪的奴隶被遗弃，就像好顶撞的公牛被卖给屠夫一样，奴隶被卖进角斗士学校。对自由民本来的、大部分依然如此的政治诉讼变成了刑事诉讼，这一刑事诉讼由于前几代人的胡作非为，而从一个严肃的法律事物变成了一个以恩惠、金钱、武力为手段的团伙战争。其责任在于官员、裁决委员会、党派乃至观众等所有参与者。然而，为法律带来最大的不治之症的则是律师的胡作非为。由于罗马律师诡辩术这一寄生植物的蔓延滋长，所有具有积极意义的法律概念都被瓦解，观众难以理解的意见与证据间的区别实际上被排除于罗马的刑事诉讼实践之外。这一时代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讲道："一个无能的被告可以被指控犯有任意一种罪行，无论他是有罪还是无罪，都肯定会被判决。"这一时代的刑事案件的辩护辞很多保留了下来，但几乎没有一个真正试图确定所涉及犯罪的性质并为此列出证据或反证[①]。几乎不需提及的是，与此同时的民事诉讼也同样不健康，它也同样处在党派政策干涉一切的恶果之中。比如对普布利乌斯·昆提乌斯一案（671 年—673 年）就有不同的、极为矛盾的判决，关键在于是秦那还是苏拉在罗马占上风。在这里，常常不是法律学者的律师有意无意地制造了足够的混乱。但一方面党派对此只是偶尔地加以干涉，另一方面律师的诡辩没有能力迅速、深刻地瓦解法律概念，这是由事物的特性决定的。比如我们现在所

① 西塞罗在他对讲演术的指导中首先就刑事诉讼说道："比证据或规定、法律准则或诉讼指令及法律更为经常决定人们的裁决的是反感或爱慕、偏袒或愤慨、痛苦或高兴、希望或恐惧、诓骗或任意一种激情。"对未来辩护人的其他具体指导也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掌握的这一时代的民事辩护辞，尽管以我们今天的严格概念来衡量它并不是优秀律师之作，但与同时代的刑事辩护讲演相比，它所含的争战内容更少些，法律内容更多些。恺撒保留甚至加强了庞培为他们制作的笼嘴，因此至少没有失掉什么，相反得到的更多。因为经严格选择的受到更好监督的官员及法官得以任命，明显地贿赂、威胁法庭的事件也纷纷告终。民众心中的神圣法律感及对法律的崇敬是难以破坏的，但一旦破坏之后再重建则更为艰难。无论立法人如何制止对法律的极端滥用，都无力根治基本创伤。人们有理由怀疑，在这里治愈一切可治之症的时间是否起作用。

这一时代的罗马军事处在与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的军事类似的状况。统治阶级只是派出军官，军队则由仆从、平民及行省人员构成。统帅在财政上、军事上几乎独立于中央政府，好歹基本上都要靠自己及其管区的支援。公民意识及民族意识已在军中消失，所剩的唯一纽带是军团精神。军队已不再是国家的工具，在政治上它没有自己的主见，但却可接受工匠的主见。它在平庸堕落的将领领导下沦为一帮散漫无用之徒，但如果在有能力的统帅的领导下它也可能成为一支公民军队难以比拟的完善队伍。处在严重堕落之中的，首先是军官等级。高贵等级如元老院成员、骑士越来越脱离军事。如果说人们通常极力争取的是参谋部军官这一职位，那么现在骑士等级中的任意一个想服役的人，都有把握得到军事护民官这一职位，因为这些职务中一部分已不得不由低等级人士来担任。即使高贵阶层中还有人想服役的话，那么他便可试图在西西里岛或另外一个肯定不会与敌人接触的行省度过服役期。具有普通军事素养及能力的军官受到了像对海中奇迹般的敬仰，如同庞培的同代人对他所搞的军事神化那样，这同时也是对这一神化的全面贬低。开小差或者叛乱的信号通常是由参谋部发出的，尽管指挥官表现出不可原谅的宽容，但是要求将贵族军官撤职的申请仍是常事。今天我们还掌握着恺撒亲手绘制的不无

讽刺意味的画像：当要对阿里俄维斯塔进行处置时，在恺撒的大本营中又是哭又是骂，又是写遗嘱又是申请休假。在士兵中较高等级的人消失得一个不剩。法律上还存在着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如果普征与募招同时进行，便杂乱无章；大量的义务应征者被漏征，而那些一旦参军的人便不得不服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兵役。罗马的市民骑兵队只是作为一种高贵的骑兵仪仗队而残延，油头粉面的骑士和优选的豪华马只是在首都的节日庆典时发挥作用。所谓的市民步兵是由最下层市民纠合而成的仆从长矛部队，骑兵及轻型部队则完全由臣民构成，同时他们也开始在步兵中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军团中支队指挥官的职位在以前的战争中曾是各部队勤奋顽强的基础，按照国家战争法，持长矛的小兵可通过努力晋升到这一职务，而现在这一职务不仅常常依照偏爱来授予，而且还时常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由于政府的财政管理错误和大多数官员的行贿、行骗，军饷不仅微薄，而且很不固定。——其必然结果则是，罗马军队掠夺行省财富、士兵哗变、临阵脱逃成了习以为常之事；很多部队，如697年庇索的马其顿部队，并不是真正由于败仗，而是由于管理不善而全军毁灭。有能力的将领，如：庞培、恺撒、加宾尼乌斯，把现有的部队造就成了勤奋、战斗力强的部队乃至模范军；只是这些军队更多是属于他们的将领，而不是属于国家。罗马海军的更为全面的没落几乎无需说明，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它始终不受罗马人的喜爱，始终没有彻底国家化。在寡头政治的统治下，可以被毁灭的全部毁灭了。——恺撒对罗马军事的改革基本限于重新严明由于总指挥的软弱无能而松弛的纪律。在恺撒看来，罗马军队或是不需要或是无能力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像汉尼拔一样，他接受了军队的现状。恺撒在城镇规章中规定，欲在三十岁之前担任城镇职务或进入城镇议会者，需有满三年以上的骑兵服役期，即做过军官，或有六年以上的步兵服役期。这一规定表明，恺撒希望较高的等级加入军队；同时也表

明，随着民族厌战思想的日益广泛，恺撒自己也认为，将名誉职位的委任像以前那样无条件地与服役年限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了。这也可以说明，恺撒为什么没有试图重建罗马市民骑兵队。征兵事宜得到了整顿，对服役期限作了调整、缩短。对纵队步兵主要征自低等罗马市民、骑兵及轻步兵征自臣民这一点未作变动。而奇怪的是，对舰队未作改组。给倡导者带来忧虑而迫于臣民骑兵队的不可靠所作的革新是，恺撒打破了古罗马的永不与雇佣兵同战的规矩，而在骑兵中雇用了租来的外国人，特别是德意志人。另一革新是实行军团副官制。在这之前部分由市民团体，部分由有关行省总督任命的军事护民官领导军团的做法是：每六人负责一个军团并轮流任指挥。军团的单独指挥员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临时由统帅指定。与此相反，后来的军团首领及其副官部分成了长久的有机机构，部分则由罗马的总指挥部任命，而不再由他们隶属的行省总督任命。看来这两者都是恺撒在继承加宾尼乌斯法的基础上所设的机构。在军队的等级中设置这一重要中间机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更有力地集中军事指挥权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有能力的高级军官的明显缺乏，而更主要的一方面是通过委派一至数名由帝王任命的军团首领来与行省总督抗衡。军事上最重要的变革是，树立帝王为永久的军事元首，他取代了此前非军事的、在各方面都无能的政府委员会，把整个军事指挥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把这一权力机构由一个总体上有名无实的职能机构改建成了一个真正的、有力的总指挥机构。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来了解这一总指挥机构与此前在其管区拥有无限权力的专门指挥机构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很可能是和行政官与执政官、或者执政官与独裁者之间的关系相应的，这样，尽管行省总督还保留了他在其管辖区的最高军事权力，但帝王有权随时把这一权力收归己有或交予他的委托人。因此行省总督的权力仅限于他的管辖区，而帝王的权力则像国王及以前的执政官那样扩展到整个帝国。另外，很有可能的

是，此前行省总督所拥有的无论是军事护民官还是百人队长的军官任命权[①] 现在已经直接转移到了帝王的手中，对新的军团副官的任命也同样如此。同样，对征兵、复员事宜的安排及对重要刑事案的处理也可能已由总指挥部来掌握。对行省总督的权力限制及帝王的调控，要做到既不担心军队的散漫也不担心军队会变为个别军官的私人工具，仍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不管现状对建立军事君主制的要求如何迫切，无论恺撒如何坚决地独揽最高军事指挥权，他却无意通过军队来建立自己的权力，或者把自己的权力建立在军队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他的国家有一支常备的军队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由于国家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它才需要一个全面的边界调整及边境驻军。在早些时候及在前次内战中恺撒为安抚西班牙做了工作，在非洲沿着大沙漠，在帝国西北沿着莱茵河他筑起了坚固的边界防卫阵地，对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地带他也作了类似的计划。他首先是想征战帕提亚人，以复卡里之日的旧仇。他决定让这一仗打三年，决心谨慎而彻底地与这一危险的敌人算总账。同时他也制定出了进攻猖獗于多瑙河两岸的基提人的国王布莱比斯塔斯，在意大利东北部设置他在凯尔特地区设置的那种边界地区来保卫意大利的计划。与此相反，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恺撒有像亚历山大同样的将胜利进程扩展于无限地带之意。有一种说法是，恺撒的意图是从帕提亚出发进军里海，并由此向黑海推进，沿黑海北岸逼近多瑙河，使整个西提亚及日耳曼直至——按照当时的想象离地中海不远的——北方的海洋归顺于帝国，然后经由高卢返回。只是没有任何一位可以令人置信的权威能够证实这一传奇式计划的存在。像恺撒的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国家本身已有大量棘手的野蛮分子，对他们的同化是一项几百年也未能完成的工作，

---

① 恺撒对由市民团体任命部分军事护民官这一点未作变动，这也表现了他是民主派。

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即使这种远征在军事上是可行的，但最终会犯比亚历山大出兵印度更为夺目、更为严重的错误。无论是从恺撒在不列颠和德意志的做法还是从那些恺撒的政治思想继承者的行为来看，有极大可能性的是，恺撒与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一样，不是祈求诸神扩大帝国，而是要保持现有帝国的疆域。他的远征计划限制在保证幼发拉底界线安全的、按他的宏大规模所规划的边界调整上，并确定多瑙河防线，使之有防卫能力，以取代非常不稳定的、在军事上毫无作用的帝国东北边界。当然，如果不能将恺撒称为像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一样的世界征服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肯定，恺撒根本无意把他的君主制首先建立在军队的基础之上，把军事权力凌驾于公民权力之上，他要把军事权力置入市民国民体之中，并尽可能使其隶属于后者。那些德高望重的作为军人国家的无比珍贵的支柱的高卢军团，正是由于他们与市民国家难以调和的军团精神而被以婉转的荣誉方式取消。他们的光荣名称只是在新建的市政机构中得以保持发扬。在复员时得到恺撒赠送的小面积土地的士兵们，并没有像苏拉的士兵那样，被军事化地集中安排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区内，特别是那些在意大利定居下来的人被尽可能地个别分散于整个半岛；当然，在坎帕尼亚可使用的耕地中，这些老兵仍然大批地聚到了一起，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为完成在市民生活中养活一支长久的军队这一艰难任务，恺撒一方面试图坚持以前的惯例，只规定一定的服役年限，而不规定连续的（即不因复员而中断的）服役期的章程；另一方面则是采用前面提到的缩短服役期的方法，这一做法导致了士兵人员的快速交替；再一方面则是定期把退役老兵安排为农业殖民者；而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把军队排除在意大利之外、民族的市民及政治生活的场所之外，士兵被指派到伟大的国王认为是他们唯一位置的地方：即驻守边防以防御外来之敌。建设、宠爱一支警卫部队，这一军事国家的典型标志，对恺撒也同样不适用。尽管在正规军中早已存在

保卫统帅的这样一个警卫部队机构，但它在恺撒的军事领导下早已退居次要地位。他的行政官护卫队看来主要是由参谋军官和非军事陪同人员组成，它从来都不是一支精锐部队，也从来不是野战部队忌妒的对象。如果说恺撒在做统帅时就真正取消了警卫团，那么，作为国王他就更难容忍身边有一支警卫部队了。尽管他知道不断有暗杀之手流窜，但他还是驳回了元老院要求建立一个高级卫队的申请。在局势稍微稳定之后，他解除了他在首都初期曾使用的西班牙卫队，而满足于在以前罗马高级官员中流行的使用法律仆人作为随从的做法。在与现实的斗争中，恺撒不得不放弃他的党以及他青年时代希望的在罗马建立一个以民族信任而不是以刀剑力量为基础的伯里克利式的统治权，但他现在仍然以举世无双的毅力坚持不建立军事君主制这一基本思想。然而，这也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一个幻想，在这一幻想中，伟大精神的炽热向往胜过了清醒的理智。恺撒所想象的统治权力必然具有个人性质，它不得不随着其建立者的死亡而消亡，正如伯里克利和克伦威尔所创建的类似政权与他们一起消亡一样。而且在民族严重混乱的情况下，罗马的第八个国王能够像他的七个前任那样以法律、法制来统治他的人民，这是难以置信的。同样不可能成功的是，把这支在前次内战中认识到自己力量并失去了畏惧感的军队重新作为仆从纳入市民秩序之中。谁要是冷静地考虑到，无论是社会的上层还是下层都已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对法律的畏惧，谁就不得不把这一希望视为梦幻。如果说，马利乌斯的军队改革使得士兵不再是公民，那么坎帕尼亚的哗变和塔普苏斯的战场则令人遗憾地表明，现在军队已在何等程度上成了法律的支柱。即使是这位使这巨大力量迸发出来的伟大民主派人士也只能艰难地、部分地使之驯服。他可一挥手使千把剑出鞘，却无法再挥手使之收鞘。厄运比天才更为强大，恺撒想成为公民国家的重新建造者，但却成了自己所厌恶的军事君主制的缔造者。他推翻了一种国中之国（贵族、银行家之国），而

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种国中之国(军人之国)。国家像以前一样遭受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虐待和剥削。但尽管如此,有创造性的失误仍是伟大人物的特权,伟人为实现理想所作的天才尝试,尽管达不到目的,却也构成了民族的最宝贵的财富。罗马军事国家在数百年后成为警察国家,尽管后来的罗马帝王与他们伟大的缔造者无更多相像之处,但他们基本上不用士兵来对付公民,而是对准敌人,他们对民族与军队两者如此敬重,以致未将军队作为统治民族的大棒来使用,这些都是恺撒的功绩。

相对来讲,财政秩序带来的困难是比较小的,因为帝国的辽阔及信贷体系的结余为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国家到目前为止始终处在财政困境之中,那么其原因并非在于国家收入不足,相反,国家收入前几年大大增长。除了被估计为 2 亿塞斯特尔茨(1500 万塔勒)的旧的总收入外,又增添了通过建立俾泰尼亚—本都斯和叙利亚两行省所得的 8500 万塞斯特尔茨(650 万塔勒)的收入。这一增长及其他新开发的或加强的收入渠道,特别是奢侈品税收的不断增长,远远超过了失去坎帕尼亚的地租所带来的损失;另外通过卢库鲁斯、麦特鲁斯、庞培、伽图及其他非正式渠道使大量资金流入国库。财政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是正式、非正式支出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管理上的混乱。在这些支出中,为首都群众发放粮食耗费了巨额资金:由于 691 年伽图对此作了扩展,每年这一项支出就高达 3000 万塞斯特尔茨(230 万塔勒),自从 696 年废除至此为止的有偿分配以来这一项开支甚至吞掉了国家收入的五分之一。除了在西班牙、马其顿及其他行省的驻军外,又增添了西里西亚、叙利亚和高卢的驻军,这样军费也得到了提高。在非正式支出中首先要提及的是海军装备的巨大支出,例如:在 687 年的大搜捕过去五年之后,一次开支 3400 万塞斯特尔茨(260 万塔勒)。另外,再加上远征及战争准备所用的可观数额,如仅为装备马其顿的军队便一次付给庇索 1800 万塞斯特尔茨(137 万塔勒),每年给庞培

2400 万塞斯特尔茨(182.6 万塔勒)用于西班牙军队的给养与津贴,并以相似的数额供给恺撒的高卢军团。如果罗马国库曾有过的模范管理不受这一时代普遍存在的软弱与不诚实的影响的话,它要满足高要求的能力还是有的;国库的支付常常停顿,只是因为应付延误了的催索的债款。国库的负责人是两个年轻的、每年轮换的财政官,他们的工作态度最佳也只是消极的。在以前曾由于他们的诚实而享有声望的书记及其他办公人员中间——特别是在这些职位可以购买之后——恶劣无比的滥用大为盛行。由于现在国家的财政事业不再掌握在元老院手中,而掌握在恺撒的内阁中,这样,新的生命、严格的秩序、紧密的关联便自然地注入了这一大机器的每个齿轮、每个驱动器之中。两个源于盖尤斯·格拉古斯的、像癌瘤一样侵蚀着罗马财政的设置:直接捐税的出租和粮食分配,都分别被废除和改组了。恺撒不想像他的前任一样利用银行家贵族及首都平民来制约罗马显贵,而是要铲除它,使国家从所有高级的、低级的寄生虫的侵蚀中解放出来。所以,他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采用的不是盖尤斯·格拉古斯的做法,而是寡头政治家苏拉的做法。而间接捐税的出租制则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体制是间接税收中的古老体制,加之恺撒毫不动摇地坚持罗马财政管理的准则:无论如何要使税收简单明了,于是这一体制便成为不可缺少的了。此后,直接捐税便或如非洲及撒丁尼亚岛的粮食及油料上缴,被视为直接交予国家的实物捐纳,或如小亚细亚的地租,转换为现金税收,具体款项的征收则由各税区自行负责。在这之前,首都的粮食分配被视为对统治城镇者有利的特权,正因为他们是统治者,所以是被臣民视为坐享其成的团体。这一不光彩的基本做法被恺撒废除。但不能忽视的是,大批非常贫困的市民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免费粮才没有死于饥饿。在这种意义上,恺撒仍坚持了粮食分配。按照伽图更新的塞姆普罗尼乌斯章程的规定,每个定居于罗马的罗马市民都在法律上有权利无偿得到粮食,这一免费粮的领取者名单最终

高达三十二万号；而现在通过对富有者及有其他供应保障人员的删除，免费粮领取者数量被降到了十五万，这一数额被作为免费领取粮食者的最高数额永久固定下来，并安排每年对此名单作一次修改，并由申请人中的最贫困者来填补因退出或死亡而空缺的位置。将这一政治特权改变为穷人救济，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历史上，这一有意义的规章都是首次真正付诸实施。市民社会只是一步步缓慢地走向了各种利益的相互支持与团结。在上古时期，尽管国家在面对外来之敌和杀人犯之时尽了它保护自己公民的职责，但它并没有义务以发放生活必需品来保护完全贫困的公民，使他们不受更为可怕的生活必需品短缺的侵扰。是阿提卡文明在梭伦及他之后的立法中首先提出了抚养残疾人及穷人这一城镇义务的基本法规，这一由于受阿提卡生活的限制而仅仅成为城镇义务的法规，被恺撒首次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国家机构，一个对国家意味着负担与耻辱的机构被改建成了人类无穷的怜悯与人类无尽的贫困作斗争的机构，它是今天无数满载福音的这类机构的先驱。——除了这些根本的改革外，对收入与支出制度恺撒也作了全面修改，在各方面对正式收入作了调整与确定。不少城镇乃至整个地区，或因被授予罗马或拉丁公民权而间接、或因被授予特权而直接被获准免交税收。如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城镇[1]都是通过前种、伊里昂市则是通过后种渠道获得免税权的。那些纳税数额被降低的城镇则更多。远西班牙的许多城镇已在恺撒任行省总督后的促动下获得了元老院降低税收的批准。另外，现在对被压制最厉害的亚细亚行省也不仅减轻了直接税的征收，而且税收的三分之一被免征。向伊利里亚被征服的城镇特别是向每年总共纳税4000万塞斯特尔茨（300万塔勒）的高卢城镇新增的税收也被普遍降低。当然也对个

---

[1] 法罗在西塞罗死后发表的文章中证实了对西西里的什一税的取消，在谈到供应罗马必需的粮食的行省时，他只列举了非洲和撒丁尼亚，而不再提西西里岛。西西里所获的拉丁权一定已包括豁免权（参见《国家法》）。

别城市，如非洲的小雷普提斯、撒丁尼亚岛上的苏尔西及一些西班牙城镇提高了税收，以惩罚他们在上次战争中的表现。获利极大的，在前段无政府状态时期被取消的意大利港口海关当然就更有必要恢复，因为其税收主要涉及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除了这些新的及重新启用的正式收入来源之外，还增加了那些非正式的，即内战后胜利者获得的数额：集中在高卢的战利品，首都的金库存额，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寺庙获取的财宝，以强迫出借、强迫赠送或罚款方式向依附城镇及家族收缴的的数额以及以类似方式通过判决或颁发交纳命令而强迫一些罗马富人交出的罚款，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变卖被击败的对手的财产而获的款项。对在元老院反对派中有席位的非洲大商人的罚款为1亿塞斯特尔茨(750万塔勒)，购买庞培财产的买主所付的价格为7000万塞斯特尔茨(530万塔勒)，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这些收入来源是何等丰富。这一做法是必要的，因为被打倒的罗马显贵的权力大部分是基于他们的巨大财富，只有强迫他们负担战争费用才能真正削弱他们的力量。恺撒将查抄所获的全部财富收归国有，即使是他的最忠实的心腹，如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也坚决向他索回应付的款项，而不是像苏拉那样，对他的宠儿的每一贪污都予以迁就，这样便使得查抄附带的敌意得以减弱。——首先通过对捐赠粮食的大量限制使支出得以减少，所保留的对首都穷人的粮食配给以及类似的由恺撒新设置的对首都浴场的燃料供应，大部分基于撒丁尼亚岛以及特别是非洲所长久提供的实物缴纳，于是这两项便完全或大部分被排除在国库支出之外。另一方面则增加了正常军费开支，这一方面是由于现有军队的扩大，再有就是把军团人员的军饷由每年的480塞斯特尔茨(36塔勒)提高到了900塞斯特尔茨(68.5塔勒)，这两项措施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真正的边界防卫体系几乎不存在，对此必不可少的前提便是扩军。当然恺撒加倍提高军饷是为了把士兵紧密地聚拢在他的周围，但并不是仅仅出于此目的才作了这

一永久性的革新。在这之前的每天1.33塞斯特尔茨(2格罗森)的军饷是古老的规定，那时钱的价值与当时在罗马的价值却完全不同；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到首都一个最普通的短时工平均每日能挣3塞斯特尔茨(5格罗森)的时代，是因为这一时代的士兵不是为了军饷，而主要是为了在服役期间可得到的大多为非法的外快才参军的。进行真正的军事改革，消除大部分压在行省身上的支付不固定士兵收入的负担的首要条件，是顺乎时宜地提高正常军饷。把其定为2.5塞斯特尔茨(4格罗森)可视为是合理的，因此而为国库增加的沉重负担是必要的，就其后果来看是有益的。恺撒出于自愿或非自愿接管的非正式支出的总额是难以想象的。战争本身吞噬了巨额资金，而为实现恺撒在内战中作出的许诺所需的数额可能不会小于战争所用。一个恶劣的遗憾的后来仍未消失的例子是，每个参加内战的普通士兵可领到2万塞斯特尔茨(1500塔勒)，每个首都市民可为自己未参与此战领到300塞斯特尔茨(22塔勒)的粮食补贴费。而恺撒极具国王风度，不为自己出于情况所迫而作出的许诺讨价还价。另外，恺撒满足了一系列出于荣誉排场所需的支出要求，特别是给由于共和国后期的财政困难而被大大忽视了的建筑业发放了巨额款项。他在高卢征战期间及此后在首都实施的建筑费用被估算为1.6亿塞斯特尔茨(1200万塔勒)。恺撒的财政管理总的成效表现在：他通过有见识、有效力的改革及节约与自由的有机结合，既充分又完全地满足了所有的合理要求。尽管如此，710年3月国库已存现金7亿，恺撒个人金库存现金1亿塞斯特尔茨(总共6100万塔勒)。这一数额超出了共和国最繁荣时期的国库存额的十倍。

解散旧党派、为新国家设置一部相应的宪法、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一个有条理的财政，这无论怎样艰难，都不是恺撒的业绩中最艰难的部分。如果意大利民族要重新诞生，就需要对大帝国的各个部分，即对罗马、意大利及各行省进行改组。让我们在这里也作

一尝试，既对旧的状况，也对新的、更为艰难的时代的开始加以描述。

拉丁民族的优秀根基已在罗马完全消失。其原因在于，首都的市政自治、甚至民族特色比任何一个下级城镇都损耗得快。上层阶级在这里很快脱离城市的普通生活，他们以在全国而不是在个别城市找到自己的家园。这里也不可避免地集中了外国人居住区、旅游、出差的流动人口，以及大量无所事事的、懒惰、犯罪、经济上道德上都破产的、因而具有世界主义性质的乌合之众。罗马为这一切提供了优越的用武之处。富有的罗马人通常把他们在这里的城市住所仅视为下榻之处。由于全体自治市政官员成为帝国的官员、城市的直辖总督机构成了帝国公民议会，同时又不允许较小的自治城区机构及其他机构存在，于是罗马的实际城镇生活已不复存在。人们从辽阔帝国的各个角落拥向罗马，以在此投机、放荡、施阴谋、接受犯罪培训或隐藏于此以逃避法律的眼睛。这些灾害产生于首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另外，还有其他偶然的、更为恶劣的祸害。可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像罗马这样完全没有自己的给养；一方面是进口，一方面是由于奴隶操作的家庭式生产方式，使得任何自由工业的发展都失去了可能性。奴隶制这一古代国家结构的基本祸害所致的严重后果，在首都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强烈。没有任何地方像在首都的大家族或新暴发户的宫殿中聚集了那样多的奴隶；没有任何地方像在首都那样，混杂了来自世界三大洲的各民族的奴隶，叙利亚人、弗里济亚人及其他半希腊人与利比亚人和摩尔人混在一起，基提人、伊比利亚人和不断流入的凯尔特人、德意志人混在了一起。在部分或完全受过教育的高贵奴隶中，那种与毫无自由不可分割的道德败坏及形式法、道德法之间的矛盾表现要比那些像牲畜一样锁在铁链中耕种的农业奴仆强烈得多。比奴隶大众更恶劣的是那些在法律上或只是实际被给予自由的人，那些乞丐的无赖与极为富有的暴发户构成的混合体，他们已

不再是奴隶，但又没有完全成为市民；在经济上、法律上他们完全依附于他们的主人，但又有自由人的要求。那些被释放的奴隶大部分拥向首都，因为这里有不少挣钱的可能性，小买卖及小手工业几乎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关于他们对选举的影响有着明确的记载，在由煽动者发动的街头混战中他们首当其冲，其通常的信号是关闭作坊商店。更有甚者是政府不仅不对首都居民的腐败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出于它自私的政治目的而为此推波助澜。禁止那些因重大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在首都居留，对这一明确的法律规定无能的警察不予执行。对乌合之众的串连而急需实行的警察监督在起初也被忽略，后来甚至被宣布为限制人民自由的犯罪行为。民众节日被放纵发展，仅七项正式节日：罗马节、平民节、圣母节、谷神节、阿波罗节、花神节及胜利女神节，就有六十二天，再加上击剑节及其他无数非正式的热闹节日。对贫穷的无产者实行的必要的低价粮食供应被以一种毫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来处理，粮食价格的浮动神奇莫测[①]。粮食的配给最终向所有那些无食者及好吃懒做的市民无产者发出了正式邀请，他们在首都安营扎寨。有恶种必有恶果。它是政治上的帮派体系、宗教上的伊希斯女神（埃及的司繁殖神——译者注）崇拜及类似虔诚骗术的根源。人们不断面临着物价上涨的窘境而常常处于饥饿之中。没有任何地方像在首都一样缺少生命安全感：职业性的谋杀是首都唯一特有的手工业；把牺牲品引诱到罗马来是谋杀的序幕；没有任何人敢在不带武装保镖的情况下进入首都地区。首都的外在状况与内在破落是相符的，这似乎是对贵族统治的活生生的讽刺。台伯河的治理毫无进展，甚至人们所始终依靠的唯一一座桥上的石路也未能铺至台伯岛上。七丘城的平整，除了瓦砾堆摊平了一些之外，也同样毫无进展。马路狭窄弯

① 在产粮区西西里岛每1罗马舍菲尔粮食的售价在短短几年内时而为2塞斯特尔茨，时而为20塞斯特尔茨。可以想象，在依赖海外粮食供应又是投机商老巢的罗马，其价格浮动会是怎样的。

曲，顺着土丘上来下去，保养极差；人行道狭窄、路石铺得也差。普通的砖瓦房建造得既潦草又高得可怕，其大部分是由那些投机建筑商为不很富裕的房产主建造的，结果是前者成了富翁、后者成了乞丐。在这破烂不堪的建筑物海洋中，富人的辉煌宫殿像单个的孤独岛屿，它们对小房屋的挤压就像它们的占有者限制小人物在国家中的公民权一样，在与这些宫殿的大理石柱、希腊雕塑像的对比中，大多仅有木刻神像的破落庙宇显得更为凄惨。另外也根本谈不上还有街道、河岸、消防及建筑方面的警察的存在。如果说政府对连年发生的水灾、火灾及房屋倒塌事件还有一点关心，那便是为从国家的神学家那里得到对这些现象及奇迹的真正凶吉含义的分析报告。我们试想一下，由新奥尔良的奴隶人口、君士坦丁堡的警察、今日罗马的无工业状况所构成的、动荡于 1848 年的巴黎式政策中的伦敦，由此便可大致想象出共和派的庄严成就。西塞罗及他的同仁在抱怨信中为之悲痛的正是这一状况的消亡。　　而恺撒并未为其哀悼，他试图拯救能够拯救的一切。当然罗马像以前一样，仍是一个世界都市。如果试图重新给它以意大利特有的风格，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也不符合恺撒的计划。就如同亚历山大为他的希腊——东方帝国在具有希腊—犹太—埃及风格的、首先是世界主义的亚历山大里亚市找到了合适的首都一样，处在东西方之间的罗马—希腊世界帝国的首都也不应是一个意大利都市，而应是一个失去了单个民族性的多民族首都。因此恺撒容忍人们除了崇拜圣父朱庇特之外也崇拜新定居的埃及神，甚至允许犹太人在帝国首都自由操持他们的离奇陌生的仪式。无论寄生式的、特别是希腊——东方居民怎样形形色色、令人讨厌地混杂于罗马，恺撒都未对其发展作任何的阻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首都节日期间，恺撒不仅允许用拉丁语及希腊语，而且也允许用其他语言表演剧目，这些语种可能是腓尼基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和西班牙语。——尽管恺撒非常有意识地接受了首都现有的基本状况，但他仍然极

力改善这里充斥的、值得诅咒的惨状。遗憾的是最根本的祸害最难铲除。恺撒无法消灭为国家带来严重灾害的奴隶制，至于他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至少对首都的奴隶人口加以限制，这里不作探讨。恺撒也同样不可能像变魔术一样凭空变出自由发展的首都工业来，但巨大的建筑业却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饥饿状况，并为无产者创造了微小的、但却是诚实的就业机会。与此相反，恺撒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以缩小大量的自由无产者的队伍。因粮食捐赠而大量流入罗马的人口，尽管通过把捐赠改为限定人数的济贫仍未能完全杜绝[①]，但却得到了有效的限制。恺撒一方面指令法庭对现存无产者这些乌合之众进行毫不迁就的严格清理，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在恺撒执政的少数几年里派往海外的8万名殖民者中，估计大部分来自首都居民的下层，如大多数科林特殖民都是被释放的奴隶。恺撒打破了被释放的奴隶无权获得市政荣誉职位的现行规定，为他们在殖民地打开了进入市政厅的大门，这一做法无疑是为了争取他们中间地位较高者移居海外。但海外殖民不只是一个暂时的做法。恺撒像每一个明智的人一样坚信，克服无产者贫困的唯一办法在于妥善的殖民制度。鉴于帝国的地理为这一制度提供了似乎无限的可能性，恺撒必定有意图坚持这样做下去，以便为铲除不断滋生的祸害开辟持久的可能性。另外还对首都市场上最主要食品的恶性价格浮动采取了限制措施。新整顿的、管理宽容的国家财政为此提供了资金，两名新任命的粮食营造官员专门负责监督粮食供应商和首都市场。依靠新修改的宪法，结社问题比通过禁止法得到了更有效的控制。其原因是随着共和国及共和式选举及法院的消亡，那些对选举及法官机构的贿赂和

① 值得提及的是，一位后来的、但有见识的政治作家，即那位以萨鲁斯提乌斯这一名字给恺撒写信的人，向恺撒建议把首都的粮食分配移交给各自治机构来管理，这一批评是有益的，因为类似的想法在罗马皇帝特拉扬努斯领导下的自治机构负责的孤儿抚养工作中显然起了主导作用。

强奸，及所有那些混乱可怕的政治无赖行为也自行告终。另外那些在克罗狄乌斯法基础上产生的联合会也被解散，所有串联组织都被置于政府当局的监督之下。看来例外的只是传统的行会、社团组织、犹太人的宗教联合会及其他特殊类别，他们只需向元老院提交简单通告。而要建立一个定期集会、有固定资金的持久性组织必须经由元老院获准，这一许可证通常是在君主同意后方可发放。另外，还严格了刑事司法，加强了警察队伍，特别是严明了强奸犯罪法。共和国法律中不合理的规定，如被提交的罪犯有权通过自我流放减免部分未赎的惩罚，这一条被合理地废除。恺撒为首都警察所颁布的详细规章条例大都保留了下来，有意者可在此确切了解到，帝王如何坚决地要求房产主保养街道，就现有的宽度铺筑人行道，并颁布相应的抬轿行车规定，就街道的状况它们只能在晚上与夜间自由行驶。对各区警察的监督像以前一样，由四名营造官执行，如果说以前没有，那么至少现在他们被指令每人负责监督首都的一个固定警察分区。最后要提到的是，恺撒集罗马人的建筑欲及组织者的才能为一体，使首都的建筑业及公共设施的建设突然高涨，它不仅使得此前无政府时期的不善管理相形见绌，而且把罗马贵族在其最强盛时期所创造的一切远远地抛在后面，就像恺撒的天才把马西乌斯派和埃米利乌斯派的辛勤努力远远甩在后面一样。不仅仅是建筑本身的规模，也不是为之所用的款项之多，使恺撒超过了他的前任，而是他出于真正政治家的公共事业感使罗马的公共设施所创造的业绩优胜于所有类似的功绩。他不同于他的继承者，他不是为了建筑庙宇及其他辉煌建筑物，而是要减轻罗马市场的负担，因为市场上拥挤着公民集会、交易所、日常业务往来及游人；至少为了减轻集会及法庭的负担，他下令为集会建立了新场所，即马尔斯广场上的尤利乌斯会场，为法庭建造了特别法庭市场，即位于卡皮托山和帕拉丁之间的尤利乌斯市场。出于同样的思想他提倡建造浴场设施，每年主要由非洲为首都浴场提供三百万

磅油用于浴客免费护肤——以满足负责卫生与健康的警察局按照古老的、主要基于澡浴和护肤基础之上的健身法所提出的有益要求。而这些良好设施仅是罗马全面变迁的开端,已计划设计的建筑还有新市政厅、一个新豪华商场、一个可与庞培的建造比媲的剧院、一个按照不久前毁灭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设计的拉丁文、希腊文公共图书馆——这是罗马第一家类似的设施——及一个无论在财富还是在规模上都要超过现有所有庙宇的战神庙。更为天才的设想是建造一条穿越庞普提努斯沼泽的运河,把水引向塔拉西那,然后改变台伯河的下游,使它从今天的莫尔桥开始,不穿过梵蒂冈和马尔斯广场之间的地带而绕过梵蒂冈场地和雅努斯山丘,把它引向奥斯提亚,让那里极差的停泊地让位于一个可完全满足需要的人造港。这一宏伟计划一方面排除了来自临近地区的污浊空气——这一首都的最危险之敌,一方面则一举扩展了首都极为有限的建筑面积,这样,转移到台伯河左岸的梵蒂冈场地便可取代马尔斯广场的作用。这样面积宽大的马尔斯广场便可用于公共及私人建筑物,同时它又获得了热望的安全海港。帝王似乎有搬山移海、与自然竞赛之意。然而,通过新秩序无论罗马市变得如何舒适与华丽,其政治上的最高地位却恰恰由于这一新秩序而一去不复返了,对此前面已作论述。罗马国家与罗马市的同一状况,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不自然、越来越不适合,但其实质却是与罗马共和国的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在后者消失之前消亡。只有一些合法的虚构成为例外,它在恺撒的新国家中才被彻底废除,此时首都的市政才在法律上被置于与所有其他自治同盟相等的地位。像对其他事物一样,恺撒在这方面不仅努力整顿秩序,而且还正式给其适当的名称。他所颁布的意大利市政规章同时也要适用于首都及其他城市,这无疑是他的本意。还可以补充说明的是,正因为罗马作为首都没有能力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城邦,所以远远落在皇帝时代的其他自治同盟之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是强盗

的老巢，同时又是国家；君主制时期的罗马尽管以世界三大洲的财富修饰自己并开始放出黄金与大理石的光彩，但在国家中它只不过是个与贫民院联系在一起的王宫，这是一个必然缺陷。

如果说在首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最大规模的警察治理来铲除显而易见的混乱，那么，重振崩溃的意大利国民经济则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关键的困境是此前已作过详细强调的、农业人口的下降和商业人口的畸形增长，接踵而至的是其他混乱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读者可能还记得前面谈到的意大利农业的状况。尽管为控制小庄园的消失作了极为严肃的努力，但这一时期除了在亚平宁和阿布鲁齐川地之外，农业在狭义上的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主要的经济方式。至于庄园经济，在此前所述的伽图描绘的状况与法罗向我们介绍的状况之间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不同的只是，后者无论是在褒义还是在贬义上都表现了罗马的大城市生活方式迅速发展的痕迹。法罗写道："庄园的粮仓通常大于住宅，而现在则往往相反。"在图斯库卢姆和提布尔蒂诺的土地上，在塔拉西那和巴耶海滨，这些拉丁及意大利农民祖祖辈辈耕耘的田野上，正耸立着一座座罗马大人物的、无农业效益的富丽的乡村别墅，其中许多还修建了园林设施、引水管道及养殖河鱼、海鱼、蜗牛和睡鼠的淡水、咸水蓄水池，并设立了饲养兔类、鹿类及野猪等野生动物的保护区，还建造了甚至可以饲养鹤类、孔雀的鸟舍。这类设施的占地相当于一座不小的城市。但这一大城市的奢侈也使得一些勤奋的人富裕起来，它所养活的穷人比发放施舍的仁爱要多。当然，这些富贵人士的鸟舍、鱼池通常是耗资巨大的嗜好。无论是在粗放还是集约意义上这一经济都非常发达，如一家养鸽房的存鸽数被估价值为 10 万塞斯特尔茨(7600 塔勒)。合理化的饲养业也随之产生，出自鸟舍的肥料又用于农业；仅一个鸟商便可一次提供五千只田鸫——甚至这类鸟人们也开始养殖——每只价格为 3 德纳尔(21 格罗森)；一个渔业主可提供二千条海鳝、卢西乌斯·卢

库鲁斯遗留下的鱼变卖了4万塞斯特尔茨(3050塔勒)。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善于经营,便可以以较少的投资获得很高的利润。这一时期,一个小养蜂人依靠他在法勒利附近的一个还不到一摩尔干(约合2500平方米——译者注)大的百里香小花园,每年至少可出售1万塞斯特尔茨(760塔勒)的蜂蜜。果树种植者之间的竞赛如此激烈,以致许多华丽的乡村别墅中的大理石果房也常常被作为餐厅来使用,外购的名贵水果也被作为自己的种植物来展览。这一期间意大利果园也引进移植了小亚细亚的樱桃和其他外国果树。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菜园、玫瑰和蔷薇畦果实累累,神圣大街旁的、通常出售水果、蜂蜜和花环的"美食市场"在首都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庄园及种植业在经济上处于极高的发展阶段。列蒂川地、福西努斯湖、利里河和沃尔图诺河沿岸地带乃至整个意大利中部都处于农业繁荣之中。一些聪明的农场主甚至利用奴隶兴办了适宜与庄园业结合的工业,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还在庄园里办起了饭店、织房特别是砖瓦厂。意大利的葡萄酒和食油生产商不仅供应意大利市场,而且还以这两种产品作大量远洋出口业务。这一时代的一个简明专业文献把意大利比作一个大果园,同一时代的一位诗人对他的美丽祖国所作的描述把我们带入了托斯卡纳和亚沃罗地区的繁荣画面:一行行黑幽幽的油料果树环绕着灌溉优良的草原、葱郁的粮田、欢乐的葡萄园;国家的掌上明珠以她微笑的丰姿环抱着美丽的庄园,披戴着养育她的果树构成的花环——这一描述想必是对每日都展现在诗人眼前的场面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和东南部深入发展畜牧业则由于以前说明的原因,它在任何一点上看都是落后的,但随着普遍的发展它的经营也有所提高,特别在畜种改良上作了很大的努力。如种驴的价格为6万(4600塔勒)、10万(7570塔勒)乃至40万塞斯特尔茨(3万塔勒)。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农业颇受知识的普遍发展之益和大量的资本之益,从而取得了在以前的农民经济方式中从未有过的辉煌

成果。它甚至走出了意大利边界而进入行省，在那里意大利经济学家大面积地开发畜牧养殖及粮食种植区。——在小农经济的废墟上庄园经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那么同时的金融业具有何种规模、与犹太人竞争的意大利商人如何拥入各个帝国行省及附属国并使所有资本最终聚集罗马，这一问题除此前的阐述之外，只要指出一个事实，便可明了：那便是在首都的金融市场上，这阶段的利率通常为百分之六，也就是说，钱的价值比古代通常的平均值低一半。——这一在农业及商业上都基于资本数量与投机的国民经济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常被引用或滥用的由百万富翁和乞丐构成的国家，这一说法可能对任何地方都不像对共和国后期的罗马那样恰如其分；靠奴隶的劳动生活的富人必然受到尊重，靠自己的双手生活的穷人必然是下贱的，这一奴隶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过如此可怕的确切的承认，并被视为所有公共与私人交往中不可辩驳的基本思想[①]。一个在我们理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一个发展健全的奴隶制国家它是不可能存在的。不仅表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的，是那些富有的商人和地主，也许是由于他们无修养或是因为他们修养太高，于是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的活动，而与外界的社会生活保持距离。鉴于在由被释放的奴隶及其他暴发户构成的商人队伍中广为流行的是摆高贵之谱，所以他们当中这类知情达理的人为数不多；这类人的典型例子是这一

---

① 典型的是西塞罗的《论义务》中的以下解释："哪些业务及行业可以看作是安分的，哪些是下贱的，一般有以下一些看法。被斥责的首先是那些惹起民众仇恨的行业，如关税员、放债者；被认为不本分、下贱的还有那些靠自己的体力、而不是靠脑力挣钱的打时工的劳动；因为为了这点工资他们把自己作为奴隶出卖。那些从商人处购买、又马上转手出卖的贩子也是贱人，因为他们不撒谎便无法生存；没有比行骗更为可卑的了。所有手工业者从事的行业也都是下贱的，因为厂房里不可能有君子。最不值得尊敬的是纵容大吃大喝的手工业者。"

时期的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他一方面在意大利和埃壁鲁斯有巨大的庄园业，一方面通过遍布于整个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融业务他获得了巨大财产，但他依然是个普通商人，未受谋取官职或作国家金融业务的引诱；他既不吝啬守财，也不参与这一时期盛行的、令人厌恶的奢侈挥霍——他每日的伙食费为100塞斯特尔茨(7.5塔勒)——并满足于能够感受城乡生活的美丽与罗马及希腊最上层社会交往，以及获得每一种文学艺术享受的舒适生活。数量更多、更勤奋的则是传统类型的意大利地主。在当时的文学中，在673年的流放中被谋杀的塞克斯图斯·罗西乌斯在他的描述中记载了这样一位乡村贵族的形象：他的财产被估为600万塞斯特尔茨(45.7万塔勒)，基本投放在他的十三所农村庄园，对此他投入的经营、合理的管理；他很少或从不到首都来，如果他出现在那里，他那粗鲁的举止与高贵的元老院议员相比便异常显眼，这丝毫不亚于他那一大帮粗俗的农仆与首都那些苗条仆人的区别。与那些享受过世界主义教育的贵族阶层及那些四海为家无处扎根的商人阶层相比，这些地主及主要由他们维持的“耕地城市”不仅保持了他们父辈的规矩与风俗，而且也保持了纯洁、高贵的语言。地主等级被视为民族的核心，那些获得了财产并想进入国家名流的投机商也购买地产，即使自己不想成为地主，至少也要培养这样一个儿子。我们所见到的地主阶级的痕迹表现于政治中的民众色彩及文学的新萌芽，爱国的反对派在这里找到了他们反对新君主制的最佳力量源泉。法罗、卢克莱提乌斯(亦译卢克莱修——译者注)、卡图鲁斯均属此列。对这一地主阶层生存的朝气焕发的描述，可能没有任何人像西塞罗在他的法律文集第二卷那优美的阿尔皮诺引言中表现得那样典型，这一引言是这位作者空洞冗长的作品沙漠中的一个绿洲。 但有知识的商人阶层和勤奋的地主等级，正处在乞丐与真正的贵族阶层这两个起社会主导作用的阶级的包围之中。我们没有统计数据

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代贫困与富有的程度，但这里可以回忆一下大约在此五十年以前一位罗马政治家说过的话："在罗马市民中拥有固定财富的家庭不到两千户。"此后市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足够的迹象表明，至少贫富之间比例失调的状况依然如故。大众的贫困化的加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索取救济粮及入伍的迫切。对同一时期的财富增长，当时的一位作家作了明确的证实，在谈到马利乌斯的领地的状况时，他把一笔 200 万塞斯特尔茨(15.2 万塔勒)的财产"按照当时的状况"称为"财富"，我们所掌握的个别人的财产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大富豪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阿希诺巴布斯对他的两万士兵许诺，从他的财产中分给每人 4 尤格拉(每尤格拉约合 2500 平方米——译者注)土地；庞培的财产总计 7000 万塞斯特尔茨(530 万塔勒)；演员埃索伯斯的财产为 2000 万塞斯特尔茨(152 万塔勒)；富中之富马尔库斯·克拉苏斯在他的生涯开始时占有 700 万塞斯特尔茨(53 万塔勒)，后来在他的生涯结束时，在向民众捐赠了巨额款项之后，仍占有 1.7 亿塞斯特尔茨(1300 万塔勒)。这一贫困及富裕的后果对各人来说在表面上看是不同的，而实质上则是同样的经济与道德的崩溃。如果说，平民唯有依靠国家的救济才能免于饿死，那么这一乞丐式贫困的必然结果则使平民顺从于乞丐的懒惰及乞丐的安逸，而这一后果又在相互作用中转变为原因而再现。罗马的贱民不劳动，而是混在剧院中看戏；酒吧、妓院如此受欢迎，以至于煽动家们也筹划把此类行业的店主拉入自己的圈子。角斗士表演是古老世界道德极端败坏的土壤与表现。它如此风行，以致使销售角斗士表演节目单都成了一个很获利的生意，这一期间角斗士表演的发展令人发指，决定败者生死的不是决斗法规或胜利者的决断，而是观众的情绪，得胜者按照他们的意图或是让被打翻在地的败者免于一死，或是让其一命呜呼。角斗士这一行业价值的剧增或者说是自由的价格的贬值，使得这一时代在战场上罕见的英勇无畏及高昂斗志普遍

流行于角斗场上；决斗法规所带来的后果是，在角斗士被刺死时人们一声不吭、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甚至不时有自由人为了挣钱糊口把自己作为角斗士奴隶卖身于角斗商。罗马纪元五世纪时的贱民也经受了饥饿与贫困，但他们并没有出卖自己的自由。那时的法律指导者也不会通过钻法律空子的不正当手段，把角斗士的既不符合道德又违反法律的合同解释为是正当与可诉的。角斗士的这一合同的内容是："如果角斗场具有类似法规，角斗士便得毫无抗拒地接受捆绑、鞭笞、火烧、杀害。"——尽管在贵族界未出现类似事件，但实际上却相差无几，状况丝毫也不比前者好。在无所作为方面，贵族人士与无产者不相上下。无产者游手好闲于街头，贵族们则懒觉睡到太阳高照。这里充斥着低级、无度的浪费，它蔓延到了政治、戏剧领域，导致了两者的堕落：为购买执政官职位所出的巨额资金使人难以想象——700年夏季，仅买通第一选举部的价格已达1000万塞斯特尔茨（76万塔勒）。舞台装饰的极度奢侈使得有修养的人失去了对戏剧的兴趣。罗马住房租金的增长也平均比乡村城市高出了4倍，罗马的一座房子曾以1500万塞斯特尔茨（115万塔勒）的价格出售。苏拉死时，马尔库斯·雷必杜斯（676年任执政官）的房子是当时罗马最漂亮的，而在一代人之后，它还没有被排入罗马宫殿的前一百名之列。有关乡村房产的投机买卖，前面已经提到。据我们了解，曾有一所房屋主要是由于其养鱼池而以400万塞斯特尔茨（30万塔勒）出售；非常高贵的人士现在至少需要两所乡村别墅，一座在首都附近的萨宾人或阿尔巴尼人的山中，另一座在坎帕尼亚温泉附近，另外，尽可能还有一个坐落在罗马城门外的花园。比这些别墅宫殿更为无聊的是那些墓宫，为了死得符合等级身份，富有的罗马人需要高耸入云的六面体纪念宫，个别保持至今的建筑物便是历史的见证。另外，这里也不乏马与狗的爱好者，花2.4万塞斯特尔茨（1830塔勒）买一匹豪华马是平常的事。在使用精贵木材家具方面，人们也非常考究——一张用非洲柏木

制作的桌子以100万塞斯特尔茨(6.7万塔勒)出售;穿着上讲究的则是紫色衣袍或透明纱罗,还有照着镜子压成的细腻的衣褶——据说演说家霍特西乌斯曾控告一同事污辱罪,原因是此人在拥挤中弄皱了他的长袍——装饰上讲究的是宝石、珍珠,从这时起这些物品开始取代在这之前更为漂亮、更有艺术感的黄金装饰;在庞培战胜米特拉达梯斯的庆典中使用的胜利者的画像完全由珍珠制成,餐厅的沙发和壁架用银子来包镶,炊具用银子来制作,这不能不说是十足野蛮的奢侈行径。同样野蛮的是,这一时期的收藏家把旧银杯上的精美圆形雕饰撬下来,重新镶在金制器皿上。同样不乏的是豪华旅游,西塞罗在谈一个西西里行省总督时写道:"如果这位总督要旅行,那当然不是在冬天,而是在初春,但这初春不是按日历计算的,而是玫瑰初开的季节;他按照俾泰尼亚国王的做法,乘八抬大轿,坐在装满玫瑰叶的马尔他纱罗的软垫上,头上戴一个、脖颈上挂一个花环,把一个装满玫瑰的、带小孔的精制麻布小香袋举在鼻子前面,让人一直把他抬到卧室门前。"但所有奢侈的种类都不像粗俗的餐宴那样盛行。所有别墅设施及别墅生活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餐宴;不仅有分别用于冬天、夏天的不同餐宴厅,而且他们也常在画廊、果树厅、鸟房或在野生公园搭起的平台上进餐;在平台的四周,随着预订好的身着戏装的"俄耳甫斯"吹响的号角,驯好的鹿只、野猪便蜂拥而出。而在这样的装饰中,他们并没有忘却现实,不仅厨师是高级烹饪家,而且主人也常常是他的厨师的师傅。烤肉早已被海鱼、牡蛎取代,现在意大利河鱼也完全在讲究的餐桌上消失,意大利的美食和葡萄酒甚至也被认为是低下的。现在在过大众节日时,除了意大利的法莱里葡萄酒外,就已提供了三种外国葡萄酒——西西里葡萄酒、雷斯博斯葡萄酒和开俄斯葡萄酒,而在这一代人之前,在大型宴会上斟一次希腊葡萄酒也就足够了;演说家霍特西乌斯的地下室中存放着一万桶(相当于三十三柏林夸脱)外国酒。这样,意大利的葡萄农开始对希腊的岛产

葡萄酒的竞争产生抱怨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研究者会像当时那些寻找新佳肴的美食家那样，处心积虑地在陆地与海洋中探寻新的动物与植物。如果一个客人在盛宴之后，为了避免其不良后果，而用催吐剂，也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奇怪。不同种类的放荡是那样系统与繁琐，以致竟有教授以此为生，即作为恶习先生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为贵公子们服务。我们没有必要更多地停留在这一无聊的、花花绿绿的糜烂画面上，其主要原因是，在这一方面罗马人并没有什么独创，他们仅限于更为无度、更为无聊地抄袭希腊—东方的奢侈。当然，普卢托斯会像克洛诺斯一样吃掉自己的孩子。对那些大多无用的高贵抢手商品的争购使得物价剧增，那些赶潮流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消耗了巨额财产，那些仅出于面子随波逐流而又限于最必要支出的人，也不得不眼看着自己继承的或是坚实积累的财富很快被瓦解。比如谋求执政官这一职务通常是使有名望的家族走向没落的大道；游戏、大型建筑及所有那些昂贵的娱乐范畴都起着同样的作用。那时能超过这些豪华财富的只有更豪华的债务：692 年间，恺撒所欠的债务在扣除资产之外，为 2500 万塞斯特尔茨（190 万塔勒），二十四岁的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欠债 600 万塞斯特尔茨（46 万塔勒），十四年之后为 4000 万塞斯特尔茨（300 万塔勒），库里奥欠债为 6000 万塞斯特尔茨（450 万塔勒），米罗的债务为 7000 万塞斯特尔茨（550 万塔勒）。罗马贵族社会的挥霍无度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贷款之上的，对此，执政官这一职位的竞争者们大量贷款，使得罗马的月息一次突然从百分之四猛增到百分之八，这一事实便是见证。债务的支付往往被负债者尽最大的可能拖延，而不是及时宣告破产或进行清算，以便至少理出一个明确的关系，负债者不是出卖他的家产即地产，而是继续欠新债，以表面上继续摆阔，直至崩溃与破产更悲惨地到来，如米罗便是一例，从他的破产中债主大约得到清算总额的 4%。在这从富有到破产的极速风云变换中、在这系统的欺骗中，当然的获

利者除了冷静的银行家以外不会有别人，因为他懂得发放或拒绝贷款。这样，贷款状况又回到了罗马纪元第五世纪社会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名义上的地产主同时又有求于他们的债主，负债人像奴隶般地屈从于他们的债主，于是他们当中地位低下的人就像被释放的奴隶一样成了债主的仆从；而高贵者即使在元老院也按照他们的债主的旨意说话和表决，或是欲向财产占有者宣战，并以恫吓来威胁他们的债主乃至以施阴谋、打内战来除掉债主。克拉苏斯的权力也基于这些情况，以"自由之叶"为信号的骚动也出自于此。秦那的骚动也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卡提林那、西利乌斯、多拉培拉更是如此。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之间的战争与百年前震动整个希腊世界的战争毫无两样。在如此被瓦解的经济状况下，每一财政危机与政治危机都会引起极度混乱是很自然的：几乎不需提及的是，资本的消失、地产的突然贬值、无数的破产及近乎普遍的清算，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同盟战争和米特拉达梯斯战争中是如此，在现在的内战中也是如此。——在这种状况下，社会所有阶层的道德及家庭生活都成了古董是不言而喻的。因贫穷而犯罪已普遍到这样的程度，它成了社会上唯一的犯罪现象：为了钱，政治家出卖国家，市民出卖自由；为了钱，军官职位和陪审员的判决权成了议价商品；为了钱，贵夫人像贱妓女一样献身；伪造证件、作假证如此猖獗，以致当时一位民间诗人把誓约称为"护罪膏药"。人们已经忘却什么是诚实；谁要拒绝受贿，不会被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而被认为是仇人。与意大利某乡村城市中一个很有声望的家庭中的奥鲁斯·克吕恩提乌斯诉讼案所展现的那一错综复杂、令人发指和厌恶的罪恶画面相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刑事案统计中都很难找出与此案相接近的记载。　　随着人民生活深处的污泥毒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不可测，在其平静的表面下，考究的风俗、普遍的友谊也变得越来越冠冕堂皇。整个社会都在互访，于是高贵的家庭便不得不由主人，有时也由管家来安排每天早上来访人的接见顺序，

受到个别接见的只是有名望的人，对其他人则是分组接见，对有些人干脆大批应付。据说，这一区分也是新君主制的发明者盖尤斯·格拉古斯的创举。如同礼节性的访问一样，礼节性的书信来往也大为发展；在那些既没有私人交往也没有业务关系的人之间，"友谊"书信也在陆路或水路上飞来飞去，相反，本来的正规的业务信件来往仅限于社团之间。请客吃饭、通常的新年送礼、家庭聚会的本质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异化，几乎成了公共节日；即使死亡也不能摆脱对无数"亲友"的顾及，要想安分地死，罗马人就必须为每个"亲友"至少考虑一件纪念品。就像我们今天的交易世界中的某些圈子一样，在当时的罗马，真正的家庭友谊交往已完全消失；所剩的已无实际内容的形式及客套仅是整个业务与个人交往的点缀。逐步取代真正友谊的是"友谊"的阴影，而在当时那些徘徊于苦难及内战之上的地狱幽灵中，这一阴影的排名并不在最后。——这一时代的五光十色的堕落的特点之一是妇女解放。在经济上妇女早已自立，这一时期已出现了妇女自己的律师，她们热心帮助单身贵妇人管理财产、办理案件，以自己的业务与法律知识获得女主顾们的喜欢，这样她们得到的小费和遗产的百分比比那些交易所中的游手好闲者要多得多。妇女们自认为在经济上摆脱了父亲与丈夫的监护，于是，各种爱情交易也屡见不鲜。芭蕾舞演员对行业技艺与戏路的掌握丝毫不亚于今天，但她们中的女主角和主演爱神或什么其他角色的演员却是史册中的污点。对她们的合法经营行业构成竞争威胁的是贵族界夫人的自由艺术，最高贵家族间的私通司空见惯，只有极例外的不快才能使她们成为特别花边新闻议论的焦点。对此法律的介入则被认为是可笑的。就像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693年在最高祭司家中举行的妇女聚会上制造的闻所未闻的大丑闻比五十年前以一系列死刑而告终的事件要恶劣千倍，而对此却几乎未作任何调查和惩罚便不了了之。四月是游泳的旺季，国务休业，贵族界汇集于巴耶和普特奥利，游泳旺季的主要吸引力

来自正当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除了音乐、歌唱及小舟中和岸边的美食早餐外，它还活跃了小游艇的业务。这里是妇女无限制统治的地方，她们绝非满足于在法律上应有的领地，而且也进行政治活动、参加党派聚会，用金钱、施阴谋，参与这时盛行的小集团活动。谁要是看到这些女政治家在西庇阿和伽图的舞台上活动，而站在旁边的却是一个下巴光光、声音细腻、戴着头巾、胸巾，穿着镶袖口的衬衣、女鞋并模仿着轻浮女人的花花公子的话，谁都会在这个男女角色互换与颠倒的世界面前感到毛骨悚然。那么，贵族界是如何看待离婚的呢？从他们中最出色、最道德的人马尔库斯·伽图的做法中便可看出，一个急于想娶他妻子的朋友要求他离婚，对此他毫不介意，在这位朋友死后他又第二次娶了这个女人。不结婚、不要孩子的倾向主要是在较高的等级中蔓延。在他们中间，婚姻早已成为一种负担，只是出于外在利益才勉强忍受之。这里我们在伽图和他的同伴的做法中就已看到了百年前波利比乌斯所认为的导致希腊消亡的格言：公民的义务是聚集大量财产，因此不要多生孩子。罗马人曾以“孩子生产者”这一称号为荣的时代在哪里呢？——由于这些社会原因，意大利的拉丁族缩减得令人吃惊，而遍及于美丽土地上的有一部分是寄生式的移民，有些地区则纯粹是一片荒芜。意大利相当一部分人口流往国外。为整个地中海区域提供意大利官员和占领军所需的专业人员及劳动力的数量已超出了半岛的承受能力，加之这个民族永远失去了派往国外人员中的大部分。罗马国家越是向多民族的帝国发展，作为统治者的贵族就越来越不习惯把意大利视为他们唯一的故乡。在被招募、雇佣的士兵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众多的战争特别是血腥的内战中丧生，而另外一部分则由于漫长的、甚至是一代人之久的服役期而对故乡感到完全陌生。与公职状况相同，投机生意使得一部分地主和几乎所有商人如不是毕生也是很长时间生活在国外，特别是后者，道德败坏的贸易旅行生活，已使他们完全不习惯祖国的市民生存方式及多种

因素决定的家庭生活。作为对此的弥补，意大利所得到的一部分是由奴隶与被释放的奴隶构成的无产者，一部分是来自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大量手工业者与商人，这些人蔓延于首都，特别是港口城市奥斯提亚、普特奥利、勃隆度辛。而意大利最大的、最重要的地区连这样一个由非纯洁分子填补纯洁分子空缺的补偿也未得到，居民日趋减少。对于畜牧区来说尤其如此，以畜牧业著称的阿普利亚当时被称为意大利人烟最稀少的地方；罗马郊区也同样如此，在农业减退和气候恶劣的交替作用下夏季收成连年荒芜。拉比西、伽比、波维拉这些昔日美好的乡村小城如今如此没落，以致找一个参加拉丁节庆典的代表都非常困难。图斯库卢姆尽管仍是拉丁最有声望的城镇之一，但城中的贵族所剩无几，他们保留了在这里的故乡权，但却生活在首都。从有选举权的公民数字来看，图斯库卢姆远远落后于意大利内陆的小城镇。这一地区曾是罗马的主要兵源基地，而今有武装能力的人全部外流。将这一现状与埃奎人和弗尔西人的战争史鉴中那传奇般的报道相比，人们不得不感到惊奇，或者说是恐惧。并非所有地区都如此恶劣，比如意大利中部其他地区及坎帕尼亚。但尽管如此，“昔日人口众多的意大利城市”却像法罗抱怨的那样，“全都破落了”。——这是意大利在寡头政治统治下的一幅令人生畏的画面。在乞丐世界与富翁世界这一厄运般的对立中不存在调和或缓和，双方对这一对立的感受越明显、越痛苦，财富的增长就越惊人，贫困的深渊也就越无底，也就经常有人在这投机与运气交替变换的世界中，时而被从低谷推向高峰，时而被从高峰抛入低谷。这两极世界在外表上分裂得越严重，在对构成所有民族性的萌芽与核心的家庭生活的毁灭上、在懒惰与享乐上、在无基础的经济上、在非男子汉的依赖、在仅是程度上有区别的腐败上、在犯罪和伤风败俗以及为财产而战的欲望等等这些共同点上就融合得越完全。富有与贫困的内在的紧密结合迫使意大利人背井离乡，充斥半岛的一半是大量的奴隶、一半是令人

生畏的凄凉。这是一幅恐怖的、但并非独特的画面。奴隶国家中的资产者统治在哪里全面发展，哪里上帝的美丽世界就会以同样的方式遭到蹂躏。如同五光十色的水面下隐藏着到处都相同的阴沟一样，西塞罗时代的意大利也基本上与波利比乌斯时代的希腊相似，确切些说，更像是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在那里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资本以完全相似的方式毁灭了中产阶级，使贸易与庄园经济高度发展，最终导致了表面上五光十色的民族在道德上、政治上的腐烂。无论当今世界中资本对民族与文明所犯的罪行何等严重，都不及古老的资产者国家那样罪恶深重，如同再穷的自由人也强于奴隶一样。在北美洲的不和之种成熟之时，世界将会重新收获类似的果实。

使意大利的国民经济陷于瘫痪的病痛从根本上看是不可救药的，可治的部分，只能通过人民与时间来改善。因为即使再聪明的政府也像最高超的医生一样，无法使肌体组织中腐烂的液体转换成新鲜的，对根深蒂固的疾病，也只能预防其阻碍自然免疫力的突发症状。但这一预防本身已为新政府提供了和平活力，使得一些极为恶劣的弊端自行消失，如：人为地滋生和扩大无产者的队伍，对犯罪不作处罚，购买官职等等。看来政府除了不做有损于国家的事外还可做有益的事。恺撒不属于那类因海堤无法阻止大潮而不筑坝的过分聪明的人。如果民族及其经济能够自行走上符合自然规律的轨道则更好。但因它已脱离了这一轨道，于是恺撒便竭尽全力，自上而下地使民族回到祖国与家庭生活中来，并通过法律及政令来使国民经济得到改革。为了控制意大利人长期脱离意大利，为促使高贵阶层及商界在家乡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恺撒不仅缩减了士兵的服役期限，而且还禁止元老院成员一级的人士除公务外仍在国外逗留，规定其他进入结婚年龄（二十岁一四十岁）期的意大利人不间断地离开意大利的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在此种意义上，恺撒初任执政官期间在建立卡普亚殖民地时就已对多子女的父亲实

行了优待政策,如今作为帝王,他对多子女家庭的父亲进行了特别奖赏;同时作为民族的最高法官,他以罗马前所未有的严厉处理离婚和通奸案。他甚至颁布一个详细的奢侈法,以对建筑上的浪费,至少是对大型坟墓建设这一毫无意义的畸形发展加以控制;这一法规还把紫袍、珍珠的饰用限制在一定时间、年龄及等级层次上,并在成年男子中完全禁止;这一法规也对餐宴支出作了最高限量,一些奢侈菜肴甚至被禁止。诚然,此类规定并非首创,而这位"道德大师"的新创,则是认真执行了这些规定,他雇用管理者来监督菜市场,指令他的法庭仆从对高贵人士的餐宴谱进行修正,并没收被禁止使用的食膳。当然,这些由新君主制的警察对高贵阶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作的节制规定所达到的,只不过是使这些奢侈行为退居暗处。但如果恶习对道德的敬重是虚伪的话,那么在当时条件下,采用警方措施所建立起来的表象正派也是一个不应蔑视的进步。更为严肃也更加可以取得成效的是恺撒改善治理意大利金融及土地经济的措施。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关于资金短缺及债务危机的暂行规定。由于对囤积资本的不满喧嚣而制定了法律规定,即任何人不准集存 6 万塞斯特尔茨(4600 塔勒)以上的金银现款。这一法律之所以颁布,可能是为了缓和盲目的公众对投机牟利者的愤怒。但在公布形式上采用的借口:这一法律仅是对被遗忘了的旧法律的重新严明。则表明了恺撒对这一做法感到羞愧,因此这一法律可能没有真正实施。另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对悬而未决的偿还债务的处理。自称是恺撒党的一派极力要求恺撒减免偿还,恺撒并未简单满足这一要求,前面已经提到。不过,在 705 年恺撒对负债者作了两项重要让步。一是免除未付清的利息[①],将已偿还的从资本中扣除,二是要求债主按估定价格接受负债者的动产与不动产,

① 尽管对此没有资料保存下来,但从允许把通过现金或支票支付的利息视为是违法支付,因而从资本中扣除这一做法中必然会得出此结论。

以取代现金支付，这一估定价格主要取自实物在内战前及由内战而导致的普遍贬值之前的价值。这后一项规定并非不合理，如果债主确实占有负债者的与所欠总额相等的资产，那么，他分担财产普遍贬值的份额是合理的。与此相反，免除已支付的或尚未支付的利息，使得债主除了利息外还平均损失了在此法颁布时他们应得到的资本付款要求的百分之二十五，这实际上部分满足了民主派竭力渴望的免除偿还贷款的要求。但无论放高利贷者的经营方式何等恶劣，也不能构成不加区别的并附带追溯效力的免除所有支付利息要求的理由。为了对这一行动至少能有所理解，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民主派在利息问题上所持的态度。412年，平民反对派所争得的在法律上对收纳利息的禁止，尽管实际上被借助行政官职位而控制民事诉讼的显贵停止使用，但在形式上却一直有效。七世纪的民主派仍把自己视为那一老的等级性社会运动的继承者，并始终坚持反对支付利息，使之在马利乌斯时代的混乱中至少短期地得以实施。恺撒在利息问题上采取与他的党派同样粗鲁的观点，这一看法是不可信的。他在关于债务清算事务的报告中，提到了有关负债者以其财产来抵押债务的规章，但闭口不谈免除利息，很可能是默默的自我责备。只是他同每个党派领袖一样，也依赖于他的党派，无法否认民主派在利息问题上的传统准则。况且，他在作此决定之时还不是法萨鲁斯的权力无限的胜利者，而是在他去埃壁鲁斯之前。如果说他可能更多是允许而不是主动造成了这一对法律秩序及财产法的违犯，那么驳回免除偿还所有贷款的强烈要求，无疑是他的功绩。可以视为是对他的荣誉进行拯救的，是负债人认为对他们所作出的让步是远远不够的，对此，他们比那些遭到亏损的债主还要不满得多。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在西利乌斯和多拉培拉的领导下试图通过骚动和内战来夺得他们想要得到的但被恺撒拒绝的东西，然而这些愚蠢之举很快就被挫败了。——但恺撒并不限于对负债者做一时的帮助，而是做了立法人可做的努力，以使资本

那可怕的无限权力永远屈服。他首先宣告了伟大的法律原则：自由不是与资产相通的财产，而是永恒的人权；国家只能剥夺犯罪者的权利，而没有剥夺负债人的人权的权利。可能是恺撒，受到了较为人道的埃及、希腊特别是梭伦的立法[1]的启发，他把这一与老的破产法章程截然相反的原则写入了普通法之中。在他之后，这一原则便毫无非议地保留了下来。按照罗马全国通行的法律，无还债能力的负债者原应成为债主的奴仆；波埃特利乌斯法虽然允许那些由于一时困难，但不是因负债累累而暂时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以实物抵债来挽救自己的人身自由，但对于严重负债者，这一法律条文虽然在枝节上作了从轻修改，而主要部分却五百年来毫无改动地保留下来。涉及财产的破产情况是很例外的，一般只出现在负债者已死亡、或者失去了公民权、或者失踪的情况下。是恺撒给予了严重负债者以下权利（我们今天的破产法仍基于这一基础之上）：无论债主是否满意，负债人可以以实物还债，从而挽救自己的人身自由，尽管其荣誉及政治权利将因此受到限制；负债人还可重建产业，在此情况下，他只有在有偿还能力而在经济上不致崩溃的前提下，才可因以前遗留下来的、未包括在破产范围内的欠款而受到指控。如果说从原则上使人身自由与资本脱离开来，是恺撒这位伟大的民主派人士的不朽荣誉，那么他的另一努力则是通过放债法，来限制资本的过大权力，其中也包括了警方措施。他本人也不否认他出于民主派的立场而对利息协议有一种厌恶感。因而就意大利的金融业务他对每个资产者可发放的有息贷款的最高额度作了规定，这一限额看来是依照资产者所属的意大利地产而定的，限额大概是地产价值的一半。违犯这一规定者将被按照共和国放债法中所确定的程序作为刑事犯来处理，并提交专门陪审委员会审理。如

[1] 埃及的国王法及梭伦法都禁止使用负债者在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债券，至少是梭伦法对负债者在破产的情况下，除了转让全部资产外，不作更多的要求。

果这些规定确实得到贯彻，便会迫使每个意大利商人也同时成为意大利的地产占有者，那么完全靠利息生存的资产者则会在意大利完全消失。也间接受到根本限制的，还有那些因负债累累而实际上只是为其债主管理地产的害处并不亚于前者的地主，因为如果债主想继续作他们的利息生意，就必须购买这些地产。另外，这也显示了恺撒并非只是简单地重复以往民众党的天真的利息禁令，而更多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收取利息。很有可能的是，恺撒没有局限于已颁布的仅对意大利有效的最高放贷数额的规定，而且出于对行省的考虑，他也对所有利息的最高利率作了规定。关于所收纳的月息不得高于百分之一，或不得收纳未偿还的利息的利息，或不得通过法律程序要求收纳超过资本等额以上的利息数额等规定，可能同样是依照希腊—埃及模式而定的[1]，在罗马帝国，这些规定始于卢西乌斯·卢库鲁斯，它们首先在小亚细亚实行，后被卢库鲁斯的较好的继承者保留下来，然后又被总督规定用于其他行省，最终至少有一部分通过罗马元老院 704 年的决议被赋予在所有行省都适用的法律效力。卢库鲁斯的这些规定后来全部被采用为帝国法，并成为罗马法，及至当今利息立法的基础。可能也可以归结为恺撒的决定。——与克服资本的极度权力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使土地经济返回到对国家利益最有促进作用的轨道上来所作的努力。对此至关重要的是法制与警察机构的改善。如果说在以前的意大利，任何人对他的生命及动产或不动产都没有安全感，是由于罗马强盗头目及其手下不是在首都帮助搞政治，便是在埃特鲁利亚森林中抢劫或为其雇主强占庄园，那么现在这类暴力强权行为便已告终。首先受益的是各阶级的农业人口。恺撒的并非仅限于首都的建筑计划也一定是从此着手，如：建造一条从罗

① 至少古埃及国王法中，有最后一个条款。相反，梭伦法对利息未作限制，而更多是明确允许任意确定利息数额。

马穿过亚平宁关口到亚得里亚海的舒适公路，以搞活意大利的内陆交通，降低福西努斯湖的水位，以使马尔西族的农民受益。恺撒甚至还直接插手改善意大利的经济状况，对意大利的畜牧业主作了强行规定。即被雇用的放牧者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自由出生的成年人。这样就使得强盗活动得到了控制，并为自由无产者创造了就业机会。早在初任执政官期间就具有了治理农业能力的恺撒比提贝利乌斯·格拉古斯更为明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要不惜任何代价地重振农业，即使是一场隐藏在法律条文中的反对财产的革命这一代价，他也不愿付出。对恺撒也是对每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所有政治格言中最首要、最牢固的是财产概念的确切性，即什么是财产，或者民众认为什么是财产。恺撒只是在这个确定的范围内试图促进意大利小资产者的发展，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涉及民族生存的问题。即使这样，在这方面也仍有很多事情要做。每一种私人权利，无论是被称为财产还是官职遗产，无论是由格拉古斯、还是由苏拉制定，都被恺撒无条件地认可。与此相反，极为节约的即使在小事上也丝毫不容挥霍浪费的恺撒在通过重新组建的二十人委员会对意大利的资产名称进行了普遍修改之后，决定对意大利所有真正的国有土地，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处于教会手中、但在法律上却属国家所有的地产，依照格拉古斯模式进行了重新分配。当然是以这些土地适宜耕作为前提的。属国家所有的阿普利亚的夏季牧场和萨姆尼的冬季牧场仍归国家使用。帝王的意图至少是：在国家用地不够的情况下，将由国家出钱购买意大利地产，以弥补所需土地的不足。在选择新农民时，当然首先考虑到的是退役的士兵，其目的是尽可能把征兵为农村带来的负担转变为善事，把以前作为无产者收入军队的士兵现在作为农民还给农村。值得注意的是，似乎在维依和卡佩纳这些荒芜的拉丁地区优先安排了新殖民者。恺撒作出的关于新地产主在二十年之后才有权出卖所得到的土地的规定，是一条幸运的中间道路，它介于将会导致大部

分已分配的土地重新流入大资产者手中的完全放开的出卖政策与提贝利乌斯·格拉古斯和苏拉对土地流通自由所作的徒劳限制之间。——如果说政府正致力于铲除意大利人民生活中的不良因素而增强健康因素，那么曾与国家并存的自治同盟制在摆脱了不久前的同盟战争的危机并经过重新调整之后，便应与新的绝对君主制共同承担与其相融洽的国家生活，以促进公共生活中已停滞的最佳因素的加速循环。构成705年为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制定的后来成为基本法的、709年为意大利制定的这两部城乡法[1]的根本准则，一是在不采用任何政治警察的情况下，坚决清除城市委员会中的非道德分子，二是对集权进行尽可能的限制，给已经拥有官员选举权、有限民事与刑事审判权的城乡以最大限度的活动自由。一般的警察规定，如串连法的限制性规定，当然也在这里占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恺撒为改革意大利国民经济所制定的规章。要指出这些规定的不足之处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规章仍使大量不良状况继续存在。同样也不难证实这些规定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因为流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非常敏感的限制。而更为容易证实的是，意大利国民经济的创伤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救药的。尽管如此，务实的政治既欣赏大师也欣赏其杰作：像苏拉这样一个人物在对改变这一状况的绝望中，仅满足于形式上的改组，而恺撒却抓住了根本症结，并对其进行斗争，这已是一大进步。我们可以说，从这位政治家和罗马人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来看，恺撒已最大限度地推进了他的改革。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期待这些改革能带来意大利的振兴，而更多是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来努力达到这一目标。为更好地阐述这一点，需首先看一下恺撒所面临的行省的状况。

恺撒上任时有十四个行省，其中七个在欧洲，它们是远西班牙和近西班牙、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意大利的高卢加上伊利里

① 这两部法的相当一部分残片保存至今。

亚、马其顿加希腊、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以及科西嘉岛。五个亚洲行省为：亚细亚、俾泰尼亚和本都斯、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叙利亚、克里特。两个非洲行省为：塞勒尼和非洲。另外，通过设立卢古杜努姆高卢和比利时这两个新总督区和把伊利里亚设为独立省，恺撒又增设了三个新管区[1]。——除了一些可观的成就外，寡头政治统治这些行省时，管理已经到了至少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与之相比的糟糕程度，就我们的理解，似乎已经糟糕到不可逾越的极点。当然，需对此负责的不仅仅是罗马人，在他们之前，希腊、腓尼基或亚细亚政权几乎到处都使一种对更高生活意义的追求及产生于较好时代的法律和自由感在人民心目中消失。每个被指控的行省居民都有义务按照要求，亲自到罗马去承担责任；罗马来的总督任意介入法律事务及附属城镇的管理，宣判斩首案，取消城镇委员会的会议。有战事时，总督凭想象，并常以卑鄙的方式使用民兵，如在围攻本都斯的赫拉克里亚时，科塔把所有危险的任务都交于民兵，而保存意大利人的实力；当围攻不尽其意时，便命令围攻首领提头来见，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很恶劣的。同样恶劣的是，没有任何道德及刑法规定以约束罗马来的行省长官及其随从。在这些行省中，强奸、亵渎、凶杀，无论有否法律形式都是司空见惯之事。唯一的安慰是，这些都已不是新鲜事，人们在各地几乎都早已习惯了这种奴隶般的虐待。至于是一个迦太基的总督、一个叙利亚的省长还是一个罗马的前执政官来扮演地方暴君这一角色最终都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行省的人来说，物质上的满足几乎是生活的唯一意义所在，尽管众多的暴君使许多人对物质生活的满足受到了干扰，但所涉及的最终是单个人。对物质生活造成更大干扰的是压在所有人身上的财政剥削所造成的负担，如此严重的剥削是空

[1] 基于恺撒规定每年有16个前行政官和两个前执政官分任总督职务，其中后者任期为两年，因而有人猜测，他曾有把行省的总数提高到20个的意图。而由于恺撒可能故意把职位设置得少于候选人，所以这里很难断定。

前绝后的。在这里，罗马人以恶劣的方式证实了他们对金融问题的精通。在这之前我曾试图对罗马加重行省负担的制度的一般简明基础及其强化与崩溃作一阐述，而崩溃加剧是不言而喻的。税收分配的不均及完全错误的征税制度对正常纳税造成了比税收额度更为强烈的压力。罗马的政治家们自己也承认驻军所造成的负担。如果罗马军队冬季在某城市驻扎，那么这个城市所要承受的压力几乎与敌人进攻所造成的压力相等。按其本身性质来说，征税的目的是补偿罗马所承担的战争负担，也就是说，纳税的城镇有权利被免除正规服役，而现在，以撒丁尼亚为例，占领军的后勤服务绝大部分都由行省负担，甚至在正规军队中，除了其他一些任务外，整个为骑兵队服务的重担也压在了他们身上。另外，还有同样经常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性服务的沉重负担，如：廉价或免费为首都无产者提供粮食，经常为舰队和对付海盗的沿海防卫提供昂贵的装备，收集艺术品、野兽及无聊的罗马剧院及狩猎所需的奢侈品，以及战时的军需。其严重程度，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在盖乌斯·维勒斯管理西西里的三年期间，农民的数量在雷欧提努阿从八十四名降到了三十二名，在穆托长从一百八十七名降到了八十六名，在赫尔比塔从二百五十二名降到了一百二十名，在阿及利昂从二百五十名降到了八十名。这样在西西里最富饶的四个地区中，一百个地主中就有五十九个宁肯让他们的土地荒废，也不愿在这一政权的统治下耕种。上例中很小的数字已经表明，但仍需强调的是，这些人绝非小农，而是有声望的庄园主，并且大部分是罗马公民！——附属国中的纳税形式稍有不同，但负担可能更为沉重，因为这里除了罗马人以外敲诈勒索的还有当地宫廷。在卡巴多西亚和埃及，农民与国王同样破落，因为农民无能力满足税务官的要求，国王无法满足罗马债主的要求。另外，真正实行敲诈的，除了总督本人外，还有他的"朋友"，这些打着总督的旗号招摇撞骗的人，他们通过总督也获得了作为功成名就的人从行省重返首都的权利。在这一点上，罗马的寡头

政权与强盗集团完全相同，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行省进行职业掠夺：一个精明的人并不把猎物全归己有，因为他要与主管官员和陪审员分赃，给陪审员的越多，他的偷窃就越安全。偷盗的荣誉等级也随之形成：大盗看不起小盗，小盗瞧不起一般小偷；谁要是出奇地被判刑，他便以被确证的极大敲诈数额来炫耀。于是这类人接管官职，代替了那些除了得到臣民的感谢与公民的赞扬外，从不以权谋私的人。——更为恶劣、更无控制的是那些居住于不幸的行省人民中的意大利商人。盈利最大的地产及整个贸易金融业的管理机构都集中掌握在他们手中。海外地区中那些属于意大利高贵人士的庄园地产也处于代理人经营所带来的贫困之中，这些庄园从来见不到它们的主人。构成例外的可能只是那些狩猎公园，这时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高卢，有的狩猎公园的占地面积几乎达一平方德里。高利贷业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法罗时代，伊利里亚、小亚细亚、埃及的大部分小庄园主实际上已经作为他们的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债主的负债奴隶来管理自己的土地，就如同以前的平民对他们的贵族身份的利息债主一样。即使贷给市镇的资本每月也要收百分之四的利息，这样的事也曾出现。为使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有能力、有影响的商人让元老院封他一个公使头衔①或让总督给他一个军官头衔，而且还尽可能附加一支队伍，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有一个经过考证的事件：在那些享有很高的荣誉又非常好斗的银行家中，曾有一位为了向塞浦路斯岛上的萨拉米斯市讨还一笔债款而长时间包围市政府，直至议会的五个成员被活活饿死。——这双重的压榨还没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令人难以忍受，而经过相互调节，这两者则更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般性的磨难，对于这些磨难，罗马政府至少间接地负有大部分责任。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大量资本不断地被野蛮人

---

① 指所谓"自由公使"，即没有实际公共委托的公使。

或罗马军队输往国外，也有相当数量的资本被毁灭。由于罗马陆路及海路警察的无能，陆盗与海盗比比皆是。在撒丁尼亚和小亚细亚内陆，强盗团伙像瘟疫一样流行；在非洲及远西班牙，人们不得不为所有位于城墙之外的建筑建造坚固的围墙和碉堡(有关强盗造成的可怕灾难在前面有关章节中已作过陈述)。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随之出现的是资金紧张、粮食涨价，对此，罗马总督惯于采用的手段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灵丹妙药，但是禁止行省的黄金、粮食出口同样也无济于事。由于普遍的紧急状态，再加上地方性的混乱及地方官员的贪污，各地都濒临崩溃。如果这种困境不是暂时地，而是不可改变地、连年沉重地在整个一代人时间内都压在地方与每个人的身上的话，那么即使最有秩序的公共及家庭组织也不得不夭折。难以描述的贫困席卷了从塔霍河到幼发拉底河的所有民族。发表于 684 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所有城镇都已破落。"西班牙和那波高卢，这两个相对来说在经济上还说得过去的行省的状况尤其证实了这一点。小亚细亚的一些城市，如：萨摩斯和哈利卡纳苏斯则几乎空无一人；与行省中自由人所遭受的屈辱相比，法定的奴隶等级似乎成了安乐港，据罗马政治家自己的阐述，甚至很能忍耐的亚洲人也开始厌世了。如果谁有意探讨，人会堕落到何种程度——无论是冷酷制造，还是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忍受所有可想象的罪恶与不公——那么可以从当时的刑事案卷中了解到罗马大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希腊人、叙利亚人及腓尼基人的忍受能力。即使是罗马政治家也公开地、毫无掩饰地承认整个希腊及亚洲对罗马这一名称的用语言难以表达的痛恨。如果说本都斯赫拉克里亚的市民曾有一次把罗马海关人员全部打死，那么遗憾的只是这类事件发生得太少了。——元老院讥讽他们的新主人一个个地视察他的"农牧场"。的确，所有行省的状况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难得的天才付出他的全部精力与智慧。治疗创伤需要时间。为此提供保障，并不再增添新的创伤，是恺撒所作的努力。他对管理机构进行了彻底的

改组。苏拉的前执政官和前行政官是自主的,并不受任何控制,而恺撒的这些官员则是被严格的主人管教的仆人。由于恺撒终身一统所有的权力,因而恺撒与他的臣仆的关系比那些连年换任的众多小暴君要自然得多,也融洽得多。总督的职位尽管仍然分配给每年离任的两个执政官和十六个行政官,但实际上最终还是由帝王来定的,因为十六个行政官中有八个是由帝王来任命的,且竞争者中哪些人得到哪个行省完全取决于他。总督的权限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为其所保留的是领导司法和在行政上控制城镇的权力,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却由于罗马的总指挥部及其安排给总督的副官而受到削弱。行省的征兵事宜可能也已基本交于皇家仆人管理,于是总督便处于辅助人员的包围之中,这些人员或由于军事等级法律,或由于更为严格的皇家管教而无条件地服从于帝王。如果说以前的前执政官及其财政官是被委派回收赃物的强盗集团成员,那么现在恺撒的官员的任务则是保护弱者、反对强者;以前不仅没有履行其控制职能,而且还做了很多坏事的骑士法院或元老院法院,现在则要对一个公正、严格的君主负责。恺撒在初任执政官时就强化了惩治敲诈的法律条文,现在,他坚决地、以超出条文规定的严格把这一法律使用于各机构的最高指挥者。如果税务官员敢做违法之事,那么他们便要像仆人和被释放的奴隶那样,按照当时残酷的家法向主人赎罪。非正常的公共负担被降至正确比例及真正急需,正常负担也大大缩减。对税收事务的彻底调整前面已经作过阐述:免税范围的扩大,直接税收的普遍降低,把什一税制度限制在非洲和拉丁尼亚岛,取消收缴直接税收的中间人,是给行省人民带来极大好处的改革。恺撒曾想以他的最伟大的民主派先驱之一的塞多利乌斯为榜样,为他的臣民免除驻军造成的负担而命令士兵自己建造长久性的兵营城,这一点尽管未得证实,但至少在他的角色从觊觎王位者转换为国王之后,他都没有把臣民置于士兵之下。他的继承人建造这样的兵营,又把这样的兵营发展为城市,进而构

成处于野蛮的周边国家之中的意大利文明的焦点，这是恺撒的精神遗产。——比控制官员的腐败更为艰难的是把行省人民从罗马资本的致命强权中解放出来。要制服这一灾害不用比它更危险的手段是不可能的。政府暂时只能制止个别腐败现象，如恺撒禁止在高利贷业务中使用国家公使头衔，对明显的强奸及确凿的放高利贷行为，则通过严明一般刑法和适用于所有行省的高利贷法而进行严格处置。但较彻底地根治这些灾害只能依靠妥善管理下行省的重新繁荣。为减轻个别行省的严重负债，恺撒在这段时间内颁发了很多暂行规定。为了使这些规定具有实际意义，恺撒在694年任远西班牙的总督期间就指令将负债人收入的三分之二付给债主，作为还债的钱款。与此相类似的是当时小亚细亚的总督卢西乌斯·卢库鲁斯就已部分地没收了无限膨胀的利息余额，对于剩余部分，则指令债主抽取负债人农业收入的四分之一以及房租和奴隶劳动收入中的相应比例。内战之后，恺撒在行省也进行了类似的普遍的债务清算，这一点并无记载，但根据此前所谈到的意大利的变化便可以确信，恺撒对此作了努力，或至少这一点已在他的计划之内。——如果说，恺撒在人的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了罗马官员及资产者对行省人民造成的压力，那么也同样可以有把握地期待由他新组建的强有力的政府能像初升的太阳驱散乌云那样，赶走周边的野蛮民族，并驱散陆盗和海盗。无论旧的创伤在怎样隐隐作痛，恺撒的出现已为他的灾难深重的臣民带来了使时代好转的曙光。数百年来，罗马再次出现了一个明智而又人道的政府和一种不是基于懦弱而是基于力量的和平政策。与罗马最佳人士共同哀悼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的首先是那些臣民，这是很自然的。

制止腐败现象并不是恺撒的行省改革的主要任务。按照贵族及民主派的观点，罗马共和国中的职位及罗马人民的财产，常常是像所宣称的那样被利用和滥用。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行省本身也将逐渐消亡，以便为年轻化的希腊—罗马民族奠定一个新的、

更为辽阔的家乡基础；他们当中的每个区不再仅为其他区而存在，而是大家为一区，一区为大家。在旧意大利无可救药的民族苦难和创伤将由年轻国家的新生存及更广泛、更有生机、更伟大的人民生活本身来克服。众所周知，这些想法并非新创。几百年来，无间断的、从意大利到行省的流亡，早已为意大利的扩展作了准备。当然，流亡者对此并无意识。首先是罗马民主君主制的创建者、出征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发起者、迦太基和那波殖民地的创立者，盖尤斯·格拉古斯有计划地把意大利人引出了意大利；然后是罗马民主派造就的第二个天才政治家昆图斯·塞多利乌斯开始引导野蛮的西方人走向拉丁文明。他让西班牙的年轻贵族穿上罗马服装，让他们说拉丁语，在由他创建的奥斯卡教育机构接受意大利高等教育。在恺撒接管政府时，在行省及附属国中就已有大量的、并且大部分在耐力与注意力上还很欠缺的意大利人。且不谈西班牙和南部高卢的实际上的意大利城市，我们仅需提及塞多利乌斯和庞培在西班牙，恺撒在高卢，尤巴在努米底亚，宪法派在非洲、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和克里特招募的大量市民部队，提及在塞多利乌斯战争中就给罗马统帅唱颂歌的科尔都巴城市诗人伴奏的、当然演奏拙劣的拉丁古琴音乐，以及最老的著名非意大利诗人、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普布利乌斯·特林提乌斯·法罗·冯·奥德在恺撒死后不久发表的，由于其语言优美而被推崇的希腊诗歌翻译。——另一方面，可以说拉丁和希腊风格的交融与罗马是同龄的。在统一意大利时，占主导地位的拉丁民族就已同化了所有其他战败民族，唯独原样接收了希腊民族，而未在外表上将其融合。罗马军团打到哪里，希腊教师就以其丝毫不亚于占领者的姿态跟随到哪里。很早以前就有著名的希腊语言教师定居于瓜达尔基维尔河畔，在奥斯卡的教育机构中希腊语与拉丁语同样使用。罗马高等教育本身实际上就是用意大利语传播希腊文化艺术这一伟大福音的机构，对推广文明的占领者以其小小的狂妄首先用自己的语言向西方的野蛮人传播

希腊的文化艺术，希腊人至少不能高声抗议。希腊人早已处处都看到了希腊主义在罗马的威力，特别是在民族感情最纯、最强之处，即受到野蛮民族带来的民族解体威胁的边界地区，如：马西利亚、黑海北岸地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畔。的确，庞培在远东修建城市，是继承了亚历山大终断了几百年的造福于民的大业。——建立一个两种语言并存的民族统一的意大利—希腊帝国并非新构想——否则将会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但这一想法从动摇不定的设想到确切成形，从分散的开始到集中的基础奠定，已是罗马的第三个也就是最伟大的民主派政治家的业绩。

帝国在政治上和民族上的同一化的最根本的首要条件，是保持与扩展已被确定为共同统治的两个民族，同时尽快消除并存的其他野蛮或被称为野蛮的部落。除了罗马人和希腊人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还可列举当时在世界中与前两者进行普遍生存竞争的第三个民族，这便是在恺撒的新国家中注定要有所作为的犹太人。这些格外柔韧、格外坚强的犹太人在古代世界与在当今世界一样，既处处为家又无处为家，既到处有作为又无处有作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大卫和所罗门的继承者并不比耶路撒冷对今天的犹太人更为重要。这一民族把耶路撒冷这一小王国作为他们宗教与精神统一支柱的外址，但这一民族绝非由哈斯莫尼家族的臣民构成，而是由分散于整个帕提亚和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犹太人组成。特别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塞勒尼也类似——犹太人在城市中有自己在行政上、区域上分立的居民体，与我们今天城市中的犹太人区不无相同之处，但要自由一些。作为最高法官和管理者领导他们的是一个“人民主人”。在恺撒之前，罗马市本身的犹太人已如此之多，团结已如此之紧密，当时一位作家的阐述便是对此的证明，他写到行省总督不太敢惹他省内的犹太人，因为他知道，在他返回首都后肯定会受到首都贱民的讥诮。当时犹太人的主要职业也是贸易，随着罗马商人的不断扩张，犹太商人也走向各地，就如同他们

后来跟随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一样。来自各地的资本不仅汇集到了罗马商人那里，而且也汇集到了犹太商人的手中。从那个时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人对这一纯东方人种及其陌生的观念与风俗具有特别的反感。在当时各民族混杂的画面中，犹太人并非是令人喜悦的一笔，但却是事物自然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因素，对此，作为一个政治家既不可否认又不可反对，所以恺撒像其先驱亚历山大一样，在正确地认识了形势的情况下，尽可能支持其发展。如果说，亚历山大作为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的赞助者，他为这一民族所做的并不亚于他们自己的大卫在耶路撒冷为他们建造庙宇的话，那么恺撒也通过特别优惠及特权来扶植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的犹太人，特别是保护犹太人自己的崇拜方式，以反对罗马及希腊的地方僧侣对他们的攻击。当然这两个伟人都没有要使犹太民族与希腊或意大利—希腊民族完全平等之意。但犹太人并不像西方人一样接受在政治上进行组织的潘多拉之盒，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基本上是无所谓的。另外，他们很难放弃自己民族特色的核心，但同时又自愿给这一核心披上任意一个民族的外衣，在一定程度上依偎于其他民俗——正因如此，对于一个将产生于数百个活生生的国民体废墟基础之上的、并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含糊不清的抽象民族概念的国家，犹太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在古代世界，犹太人就已是一个世界主义及民族分解的催化剂，因此犹太人是恺撒的国家中受优待的合法成员。实质上，恺撒国家的宗旨是世界公民主义，其民族性是人道主义。——而新市民的积极成分则完全由拉丁及希腊的民族性构成，也就是说，独具意大利特色的共和国家已经告终。不满的贵族认为恺撒有意搞垮意大利和罗马、进而把帝国的重点移向希腊东部，并设首都于特洛伊或亚历山大里亚。这一说法尽管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非常荒谬的无稽之谈。相反，在恺撒的组织中，拉丁民族始终占主导地位，从恺撒颁发政令所使用的文字就已说明了这一点。他的每一个政令都用拉丁文颁发，但为希腊

语区颁发的政令同时也使用希腊文。从整体来看，恺撒在他的君主制中对这两大民族的关系的安排，与他的共和派前任在统一意大利之后的做法是相同的：无论希腊民族在哪里存在都受到保护，而意大利民族则尽可能地得以扩展，它被定为有待解体的各种族的遗产继承者。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国家中希腊与拉丁成分的完全平等将很有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导致像数百年后拜占庭主义所经受的那种灾难。因为希腊人不仅在精神的各个方面，而且在数量上也优于罗马人。希腊主义在被迫或自愿流人意大利的希腊血统和半希腊血统的狂热者中有着无数不起眼的，但就其影响却怎样高估都不过分的传播者。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一点上极为典型的现象，即自从有君主制以来，希腊仆从就对罗马君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类人物又臭又长的名单中占首位的是庞培的心腹侍从特奥法内斯·冯·米提莱纳，基于他对软弱主人的控制，可能他对触发庞培与恺撒之间的战争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死后受到他的同胞们神话般的崇拜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是他开创了皇帝时代的仆人统治，这一统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统治。因此，政府完全有理由至少在西部遏制希腊主义的扩展。如果说恺撒不仅使西西里减轻了什一税的负担，而且还确定在它的城镇实施拉丁法随后并使它获得与意大利同等的地位，那么恺撒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则是让这一美丽的、但经济仍主要掌握在意大利手中的荒芜海岛能在意大利得到完全地振兴。因为自然并未决定让这一海岛成为意大利的邻国，而更多是让它成为意大利最美的地区。另外，对各处存在的希腊风俗都做了保护。无论政治危机多么迫切地要求帝王摧毁希腊主义在西方和埃及的坚强支柱，但马西利亚和亚历山大里亚既没有灭亡也没有遭到民族解体的厄运。——与此相应，政府通过殖民化和拉丁化极尽全力在帝国各个角落弘扬罗马精神。恺撒同样也坚持了虽产生于形式法律和残酷的权利斗争的恶性交织、但对腾出手来对付将要被

消灭的民族义是必不可少的条文。这一条文规定:所有未经政府特别批准移交给地方或个人的地产与土地都为国家所有,现行所有者仅仅拥有被容忍的、但随时都可被剥夺的继承权。这一条文被恺撒从民主派的政党理论上升到了君主制法律的基本原则上。罗马民族性的扩展首先涉及的当然是高卢,将波河以北的城镇纳入罗马市民联盟早已被民主派视为既成事实,而现在(705年)则由恺撒最后完成。这使得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完全获得了大部分居民早已拥有的与意大利本土在政治上的平等。在获得拉丁人权利的四十年之后,这一行省确实已经完全拉丁化了。无论上流人物怎样嘲笑英苏布里人和维内提人的凯尔特式拉丁语的粗宽的喉咙发音、嘲笑他们徒劳地寻找"我不知道首都的优美什么"之类的句子,但他们作为恺撒的军团士兵则用刀剑在罗马广场甚至在元老院争得了一席之地。同样如此,以农业为主且人口密集的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在恺撒之前实际上就已是一个意大利地区,几百年来它都是意大利风俗与教育的良好避风港:除了在首都之外,拉丁文学的教师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这里一样受到如此的喜欢并找到如此的共鸣。如果说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主要是在意大利才得以繁荣,那么现在取代其位置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行省。此行省被恺撒占领后从一个边界行省变成了一个内陆行省。由于其靠近首都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因此在所有地区中,它最适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同样成为一个意大利地区。意大利的人口外流主要是人们被引向罗马民主派海外殖民地的老目标,在那里一方面通过新殖民加强了老殖民地那波,另一方面,在离那波不远的巴埃特拉(贝济耶)、阿雷拉特(阿尔勒)和罗讷河畔的阿劳西奥(奥兰治)以及在新的港口城市恺撒城(弗雷瑞斯)建立了四个新市民殖民区,这些殖民区的名称同时也是对那些把北部高卢纳入帝国的勇敢军团的纪念。与此同时,似乎是绝大部分未经殖民的地区走上了罗马化的道路,做法是像以前对待波河以北的凯尔特地区那样,授予其

拉丁城市权利，特别是马西利亚人因反抗恺撒而失去的地区中的主要城镇纳马苏斯(尼姆)从一个马西利亚人的小地方变成了一个拥有相当面积、甚至铸币权的拉丁城镇。随着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从准备阶段向与意大利完全平等的迈进，那波行省也进入了准备阶段。如同此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这里最有声望的城镇也享有全部公民权及其他拉丁权利。——对帝国其他受意大利影响较小、同化进程缓慢的非希腊、非拉丁地区，恺撒仅限于为意大利文明建立像高卢地区中的那波那样的个别焦点，以便为未来的完全同一化做准备。类似这样的开端，除了在最穷、最小的撒丁尼亚行省之外，在帝国所有其他行省都可得到证实。恺撒在北部高卢的做法，前面已经谈到：在这里，拉丁语尽管还没有在公共交往的各个领域得到使用，但已成为普遍的官方语言；在莱芒湖畔诞生了意大利宪法最北部的城市诺维奥杜努姆(尼翁)殖民地。——在当时可能是罗马帝国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西班牙，在重要的希腊——伊伯里亚港口城市恩波里亚，恺撒不仅安置了与老居民共存的恺撒的殖民者，而且还在离安达卢西亚的中心塞维利亚不远的城市乌尔苏(奥苏纳)安置了一批可能主要是由首都无产者构成的殖民者，在这个行省的其他地区恺撒很可能也作了类似的殖民。如同新近发现的证件所表明的那样，恺撒在任行政官时就对古老、富有的商城加得斯的自治同盟制作了符合时代的改革，现在，这一城市又从帝王手中得到了意大利自治同盟制的全部权利(705 年)，就像以前意大利的图斯库卢姆一样。作为第一个不是由罗马创建的非意大利城市加入了罗马市民同盟。数年后(709 年)，其他几个西班牙城镇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利，估计还有一些获得了拉丁权。——盖尤斯·格拉古斯在非洲未能完成的事业，现在也开始实施。三千名意大利殖民者以及大批已定居于迦太基地区的租赁主和放贷主在曾经是罗马死敌的城市中定居。在无比优越的地方条件下，新的“维纳斯殖民地”——罗马属迦太基以惊人的速度重

建繁荣。唤醒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处于劣势的行省首府及第一大贸易城市乌提卡看来则通过被授予了拉丁权而事先得到了补偿。在新纳入帝国的努米底亚地区，重要的西尔塔及其他划给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的罗马卫队，归属于他自己及其同僚管辖的城镇而获得了罗马军事殖民地的权利。诚然，这些遭尤巴和宪法派残余疯狂洗劫的壮观行省不可能以它们被毁灭的速度重新得以振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些废墟还令人回忆起那灾难深重的年代；只有迦太基和西尔塔这两个尤利乌斯氏的新殖民地能够长久地成为非洲—罗马文明的中心。——在荒芜的希腊国度，恺撒除了制定像在（与科孚相望的）布特罗托恩建立罗马殖民地的其他计划外，主要还是致力于重振科林特。在这里，恺撒不仅设立了一个可观的市民殖民地，而且还制定了凿穿地峡、中止绕道伯罗奔尼撒的危险转运，使整个来往于意大利和亚洲之间的交通都经由科林特—萨罗尼克海湾的计划。最终，君主还在边远的希腊东部建立了意大利居民区。在黑海沿岸的赫拉克里亚和息诺普，意大利殖民者就像在恩波里亚一样，与老居民共同生活在这些城市中；在叙利亚沿海，重要的海港贝利托斯与息诺普一样，获得了意大利宪法；在埃及，甚至在控制亚历山大里亚港的灯塔岛上也建立了罗马驻扎站。通过这些措施，意大利的城镇自由以比过去要广泛得多的方式贯彻于行省。享有全部市民权的城镇，即：阿尔卑斯山以南的行省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的所有城市以及其他分散的市民殖民地和市民自治同盟，在自行管理和实施有限的司法权上与意大利的城镇是平等的。当然，较为重要的诉讼则属于在这里对此负责的罗马当局和行政区总督的权限范围。正式自治的意大利以及所有其他被解放的城镇，也包括西西里和那波高卢的非市民城镇，以及其他行省的大量城镇，它们不仅有自治管理权，而且还可能有无限的司法权，这样，总督只有依靠自己那非常独断的对管理的监督权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干预。当然，在以前的总督行政区内，也曾有过

如阿奎莱亚和那波一样享有全部市民权的城镇，有过如内高卢一样整个总督行政区都由具有意大利宪法的城镇构成的情况。现在有一个几乎与意大利一样的、完全由罗马市民构成的行省出现，并有其他行省也将成为类似的行省，这在法律上可能不是、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革新。这样便消除了确实存在于意大利和行省之间的大对立；另外一种对立，即在意大利通常没有驻兵，而在行省却有，这一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消失：现在部队只驻扎在需要保卫的边界，在与此情况不符的行省，如那波和西西里，军事首长只是在名义上还是军官。但意大利与其他行省间始终基于其他差异上的、形式上的对立却依然存在。意大利是市民司法及执政官和行政官的管辖区，而行省则是军事司法区，它在前执政官和前行政官的管辖之下，但实际上按照民法与按照军事法进行的诉讼早已没有区别。自从一个帝王居于所有人之上以来，官员的各种头衔已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贯穿于所有自治同盟的建立与调整之中的，显然是一个确定的体系，尽管其实施可能不完全归功于恺撒，但至少从计划上来看是这样的。意大利由战胜了许多民族的主人转变成了年轻化了的意大利一希腊民族的母亲。与这一母亲国完全平等的阿尔卑斯山以南的行省，是每个经拉丁化的地区都有可能在恺撒的君主制中及共和国更有生机的时代中获得与其姐姐们、乃至母亲同等地位的希望的例证。处于获得与意大利完全同等的民族与政治权利的准备阶段的邻国，有希腊的西西里和拉丁化进展迅速的南部高卢。与这一同等化有较大距离的是帝国的其他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大的沿海城市如恩波里亚、加得斯、迦太基、科林特、本都斯的赫拉克里亚、息诺普、贝利托斯、亚历山大里亚，如同此前那波是南部高卢中的罗马殖民地一样，现在这些沿海城市则成了意大利或希腊—意大利的城镇，构成了意大利文明在希腊东部的根据地及帝国未来的民族与政治同等化的坚实基础。罗马市对地中海沿岸的统治现已告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地中海

国家，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罗马市对文明犯下的两大滔天罪行赎罪。如果说，对罗马土地上两个最大的贸易中心的破坏标志着罗马市对附属地区的宗主统治在政治上走向暴政、在财政上走向剥削的话，那么现在对迦太基和科林特的迅速、辉煌的振兴则是对一个新的、使地中海所有地区都能得到民族与政治平等并促成真正国家统一的大国民体的基石的建构。由此可见，恺撒有资格为享有盛名的老城科林特加封"尤利乌斯荣誉"这样一个新名称。

如果说统一的新帝国具有的民族性必定缺少人民个性，作为缺少生机的人为产物必然不具有自然的活力；那么，在各民族一般生活运转的机构中则需要这种统一。如在宪法与管理、宗教与法律、货币与度量衡机构中便是如此。对此，多种多样的地方特点当然要与统一的基本点完全协调。这一切在各个领域中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因为恺撒的君主制的统一与彻底的建立还是未来的事情，恺撒的所为仅是为百年大业奠基。这位伟人在这些领域所勾画的线条至今仍可看到，在这里寻找他的足迹比在各民族的废墟要令人欣慰得多。

新的统一体中有关宪法与管理问题的最重要因素已在其他关联中作了强调：把主权从罗马市议会过渡到地中海的君主制独裁统治者手中；把罗马市议会转变成为一个代表意大利及诸行省的最高帝国议会，特别是已经开始的罗马及意大利的城镇法规在各行省城镇的实施。这后一种做法，即向完全加入统一国家并已成熟的城镇颁发拉丁法，随后颁发罗马法，逐步地自然导致了各地方均衡的法规秩序。对此只有一点是不容等待的：新帝国马上需要一个为政府提供清楚的主要管理依据、即各城镇人口及财产状况的机构，也就是说，一个有力的公民调查体系。对意大利的这一机构，恺撒首先进行了改革。恺撒对此所发的政令当然只是把那些因同盟战争至少在原则上做出的规定付诸实施。按照这一政令，将来在罗马城镇进行普查的同时，也在每个意大利城镇由城镇最高当局登

记每个城镇市民及其父亲或释放他的奴隶主的姓名、居住区、年龄及财产状况，并将这些登记表尽早呈交罗马财政司库，使他能够按时完成罗马公民及罗马财产的普录制作。恺撒的意图是，在行省也设立类似的机构，对此的保障一方面是恺撒所安排的对整个帝国的丈量及注册，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机构本身。因为，借此在罗马国家的意大利和非意大利城镇进行中央所需的调查登记中找到了普遍的模式。显然，恺撒的目的也同样是回到老共和国时代的传统上去，重新实行帝国普查。老共和国对此的做法与恺撒对意大利的做法基本是相同的。老共和国通过对城市负责调查的监察官机构做相应的扩展，按其所规定的期限及其他主要标准对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所有臣民及城镇进行了普查。这一监察官机构是在僵化的贵族手中没落的最早机构之一，随着它的没落，最高管理当局完全失去了对可支配团体及可左右的力量的了解，也失去了实行有效控制的可能性。现存的痕迹及事物的关联无可辩驳地表明，恺撒是恢复消失了数百年的帝国普查的准备者。

在宗教和司法上不可能考虑到实行彻底的同一化，这似乎无需说明；但新国家在对地方的信仰和自治章程实行宽容的同时，还需要一种与意大利—希腊民族相适应的共同信仰及一个凌驾于所有自治章程之上的共同的法律规章。新国家需要的这两者实际上已经存在。数百年来人们已在宗教领域作出努力，一方面通过外在的接受，另一方面通过内在的对神的概念的同一，来使意大利与希腊的崇拜相互融合。由于意大利诸神的不固定的形式及其伸缩性，在宙斯中扬弃朱庇特、在阿弗罗狄忒中扬弃维纳斯，以及在希腊相应的形象中扬弃拉丁信仰中的任意一种基本意念，都没有很大困难。意大利—希腊宗教的基本框架已经存在，而人们在这一方面是如何有意识地超越罗马特色，向一个意大利—希腊准民族性迈近的呢？对此，法罗在他的前面已经提到的神学著作中对“普通”的、即被罗马人和希腊人所承认的神与罗马城镇的特殊的神所做的区

别便是例证。在法律方面也没有困难，在政府直接干预的、通过明智的立法便可基本满足其法律要求的刑法和警察法方面，可以以立法的手段达到对帝国的统一至关重要的物质形式上的一致性。与此相反，在提议来自交往之中，立法人只有编写成文的权利的民法方面，立法人没有能力设立的、统一的帝国民法早已在交往中自然形成。尽管罗马城市法在法律上依然基于十二铜表法中包含的拉丁国家通用法条文。后来的法律对此做了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具体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要算废除以当事人各方的固定言辞构成的陈旧而笨拙的诉讼开庭方式，并以审判长为每个陪审员书写成文的指令取而代之；而对最主要的部分，人民立法只是在那陈旧不堪的基础之上设立了一系列像英国的章法那样杂乱无章的、大部分早已过时、被人遗忘的专门法。条文的科学化及系统化至少理清了旧民法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是对以这一四百年前制定的城市判例及其冗长杂乱的补充条款作为一个大国的法律所导致的根本缺陷，就是一个罗马的布莱克斯通（十八世纪英国法学家——译者注）也无能为力。法律实践只能自救。在罗马，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频繁交往早已创造了一种国际私法，即一系列有关交往关系的章程。在罗马法官既无法依照自己的、也无法按照其他全国通用法以判决某案时，便以此章程审判，因为对这种案例他们必须避开罗马、希腊、腓尼基及其他法律的特殊性而考虑到构成一切实践基础的共同法律观念。这便是后来的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取代实际上早已不适用的旧城市法，作为罗马市民之间法律交往准绳的首先是一种新城市法，其条文产生于国家十二铜表法与国际的或者说所谓的各国人民之间法律妥协的基础之上。这一新城市法除了一些必要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修改外，主要还保留了前一法律中的婚姻、家庭及继承顺序法；而在涉及财产交往，即：所有权和合同的所有规定中，国际法则起主导作用。这里甚至借鉴了地方行省法中一些重要的设置，如：高利贷立法和抵押机构。至于这一深

刻的改革是突然还是逐步诞生的，是出自一人或数人之手、是由谁、何时、如何实施的，我们对此没有圆满的回答；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一改革当然首先源于城市法院，首先成文于由每年新上任的城市法官为监护代理人颁发的、新的法律年中应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准则的训导。即使以往的时期为这一改革作了准备，但它肯定是在这一时代才得以完成。由于罗马的法律观念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排除了自己的民族特点，所以新的法律章程在理论上是抽象的，但在实践上它同时又是积极的，因为它并未陷入一般合理性的混浊的模糊之中或所谓自然法的纯粹虚无之中，而是由有关当局按照固定准则运用于具体案件。这样，这一法律章程不仅有利于法律成文，而且已经基本成为城市谕令的一部分。由于这一章程为诉讼、资产购置、缔结合同提供了因交往的扩大所需的简便形式，所以这一章程也在实体上满足了时代的要求。最终它也基本上普遍成为了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辅助法，其表现是，对那些主要不属交往关系的法律事宜以及法律行政区的成员之间的地方交往，保留多种多样的地方章程。相反，对意大利以及行省内的各法律区域的帝国成员间的财产交往，则一律按照——在法律上当然不可用于这些案例的——城市谕令的模式来治理。这时城市谕令法律所起的作用与罗马法在我们的国家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同：在下述对立可调和的情况下，这一法律既是抽象的又是积极的；这一法律也是由于其与旧章法相比更为灵活的实用形式而受到推崇，并成为与地方章程共存的辅助法律。与我们的相比，罗马的法律发展有着重要的优越性，其非民族化的立法不是我们的那种人工早产，而是及时的、符合自然的分娩。——恺撒所面临的便是这一法律状况。如果说他起草了编写一部新法典的计划，那么不难明了他这一做法的意图。这一法典只能总结罗马市民的法律，只有统治民族的符合时代的法典自身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成为普遍辅助法的条件下，这部法典才能成为普遍的帝国法典。假使这一计划也涉

及了刑法，那么也只需修正，编辑苏拉的法规就可以了。对于一个实际上是以人道为民族性的国家来说，民法中必要的、并且唯一可能的文本是那已自发产生于法律实践的城市谕令。需要作的是给其以法律的保证并使其精确化。对此，687 年的科尼利乌斯法迈出了第一步，它以法官在任职初期设立的准则对其实行约束，规定法官不得任意依照其他法律进行审判，这一规定可与十二铜表法相比，它对确定新的城市法所起的重要作用与十二铜表法对旧的城市法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但尽管在科尼利乌斯公决之后，谕令不再置于法官之下，而是法官在法律上位于谕令之下；尽管在法庭及法律教学中新法确实取代了旧城市法，但每个城市法官都仍然可以在上任时无限制地任意修改谕令。在形式上看，十二铜表法及其补充条款仍然优于城市谕令，这样，在出现具体冲突时，便只能通过官员的专断进行干预。确切些说，也就是通过违反形式法律，来废除过时的章程。在罗马的外国人法庭以及不同的行省法院中，城市谕令的辅助性使用甚至完全由最高官员自行掌握。显然，彻底废除老城市法中未收入新城市法的部分，对每个城市法官都任意修改新城市法的做法给予适当的限制，并对这一法律的辅助性使用及地方章程进行调整，这些都是必要的。这便是恺撒起草法典计划时的意图，因为他的意图只能是这样。这一计划未能实行，因而罗马法律界的令人讨厌的过渡状况便持久地延续下来，直到六百年之后，这一必要的改革才由恺撒的继承者之一——尤斯提尼安努斯大帝实施，但这一实施也并非完善。

最终，在货币与度量衡上，拉丁制与希腊制的基本同一化也早已在进行之中。这一同化已长久存在于对贸易与交通必不可少的重量、体积与长度计量的规定中，在货币方面稍许晚于银币的使用。但由于在希腊世界中有许许多多的长度与币制共存，所以这些老的换算法已无法满足需要。现在必要的无疑也在恺撒的计划中的是，如果在这之前还没有实行罗马货币与度量衡，那么现在在统

一的新帝国则要普遍实行。在官方交往中唯独按此标准计算，对非罗马制则部分限于地方使用，部分彻底理清其与罗马制的换算比例①。但恺撒在这些领域的活动只能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得到证实，即货币和历法方面。— 罗马的货币业基于两种同时在一定固定关系中流通的贵金属，其中金子按其重量、银子按其铸型流通使用。而由于海外交往的扩大，金子的使用实际上已远远超过银子。过去是否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都必须使用罗马银币，这难以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罗马地域上流通的主要帝国货币是未经铸造的金子，罗马人越是在行省和附属国禁止金币铸造，便越是如此。除了意大利之外，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西西里、西班牙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来看，德纳尔也已成为一种流通货币。帝国硬币的使用是从恺撒开始的，同亚历山大一样，他也认为，建立一个新的、包括整个文明世界的君主制的标志是：唯一能够联系整个世界的金属也应在货币中占首位。至于以何等巨大的规模马上开始铸造新的恺撒金币（按照当今的金属价值，1 金币等于 7 塔勒 18 格罗森），从恺撒过世七年后仅在一处埋藏地所发现的金币竟达八万枚就可想而知。当然在此也有财政投机的影响②。对于银币，恺撒坚决地关闭了西方唯一一个在铸造银制流通币中能与罗马银币竞争的马西利亚银币厂，从而在固有的基础上确立了罗马的德纳尔在整个西部地区的垄断地位。银质或铜制辅币的铸造则允许由一些西方城镇实施，如：四分之三德纳尔是由南部高卢的几个拉丁城镇、半德纳尔是由

① 依据不久前发现的庞培的重量制可猜测，在皇帝时代初期，除了罗马磅之外，阿提卡米纳（估计换算率为 3：4）也作为第二种帝国重量制使用。

② 看来，过去不可以在违背国家债主的意志的情况下，按照合法的兑汇率用金子偿还所要求的银子债务。与此相反，毫无疑问的是，自恺撒之后，便不得不以 1 金币比 100 银质塞斯特尔茨的汇率来接受金币。特别是在恺撒把大量的金子投入流通领域之后，曾一度使得金子的议价兑换率低于合法兑换率的百分之二十五，因而这一做法对当时来说就更为重要。

一些北部高卢的辖区制作的。即使在恺撒死后，许多铜质小单位硬币也仍是由西部的城镇铸造。但这些辅币完全是按罗马的规格铸造的，也可能只是在地方交往中才必须使用。对于东部货币业的统一调整，恺撒似乎与他以前的政府一样未作考虑。这里流通着大量铸造粗糙、而且重量过轻或磨损严重的银钱，其中有一部分，如在埃及，甚至是与我们的纸币类似的铜币；缺少与他们在这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流通货币相类似的国家通用硬币也使得叙利亚的贸易城市感到十分苦恼。后来才为德纳尔设置了统一的法定兑汇率，官方规定必须按此汇率换算[①]，地方硬币在其有限的区域内，尽管也有其合法的汇率，但它与德纳尔的兑换率却是不利的[②]；这一设置可能不是一次实行的，一部分可能在恺撒之前就已实行，但对其重要的补充则确实来自恺撒的帝国币制法规。可能是特别出于要在东方的流通的考虑，这一法规所定的新金币采用了重量大约相等的亚历山大硬币作为直接模式。——历法的改革也与此类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共和时期的历法仍是在默冬（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天文学家——译者注）以前的八年三国基础上胡乱制成的旧的十人委员会历法，在愚蠢无比的数学与无能之极的行政官僚的联合作用下，这一历法甚至能比实际时间提前整整六十七天，如：4月28日的盛花节被改在了7月11日。恺撒终于拨乱反正，在希腊数学家索西杰内斯的帮助下实行了按照埃及的欧多克索斯氏历法排序的意大利农历，对宗教及官方习俗也实行了明确的对应制，在取消4月1日的旧历新年的同时，首先确定1月1日为最高官员的换职日，这一因此在市民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日期便成为历

① 在皇帝时代显然没有不以罗马硬币为货币单位的铭文。

② 尽管阿提卡的德拉克马要重得多，但它却与德纳尔等值；平均重量为15克的安齐奥基亚银质四德拉克马等于重量仅为12克的3个罗马德纳尔。又如小亚细亚的西斯托福鲁斯按银子价值超过3个，而按照合法汇率却等于2.5个德纳尔。再如0.5个罗得斯德拉克马就其银子价值等于四分之三个，而按合法汇率则等于八分之五个德纳尔，等等。

法新年的开始。这两项修改在709年1月1日开始在罗马市生效，从此便开始了以其发明者命名的尤利乌斯氏历法的使用。这一历法在恺撒的君主制消亡很久之后在知识界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至今也基本如此。作为对这一历法的说明，在一详细的谕令中附加了取自埃及观象的、当然并不适用于意大利的星历，这一星历按照历法日期确定了重要星辰的起落时间[1]。在这一方面罗马与希腊世界也取得了一致。

这些便是恺撒的地中海君主制的基础。在罗马，社会问题第二次构成危机，其对立就其存在方式来看，是不可消除的，就其表达方式来看，是不可调和的，不仅在表面上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第一次危机时罗马得到拯救的原因是，意大利随着罗马、罗马随着意大利得到了振兴，在新的、扩展变化了的故乡，那些老的对立不是调和了而是消失了。而现在罗马又重新得到拯救的原因是，地中海地区随着罗马而振兴，或获得了振兴的基础。意大利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战争在旧意大利只能以民族的毁灭而告终，而现在这一战争在由世界三部分构成的意大利既没有战场，也没有意义了。拉丁殖民地填补了罗马纪元五世纪即将吞噬罗马城镇的鸿沟。盖尤斯·格拉古斯和恺撒的阿尔卑斯山北侧和海外殖民则弥补了罗马纪元七世纪更为深刻的断裂。对独一无二的罗马，历史不仅创造了奇迹，而且再次重复了它的奇迹，它使这个国家年轻化，从而两次治愈了依靠这个国家本身无可救药的内在危机。诚然，这一年轻化中夹杂着腐朽——如同意大利的统一建构是基于萨姆尼和埃特鲁利亚民族的瓦砾堆上一样，地中海君主国也建造在许许多多曾是

---

[1] 西塞罗的天琴星座将按照规定起落的笑话证实了这一可能是由马尔库斯·弗拉维乌斯编辑的谕令与所谓出自恺撒之手的关于星辰的文章是同一文本。——另外，在恺撒之前人们就知道，构成埃及历法基础的、也被恺撒作为他的历法基础的、365天6小时的太阳年定得过分长了一些。古代世界所了解的最精确的回归年计算是希帕恰斯的，这一计算把一年定为365天5小时52分12秒，而实际则是365天5小时48分48秒。

充满活力的、勤奋的国家与部落的废墟之上——而这一腐朽却发出了新生的，有些甚至直至今日还保持常青的萌芽。被新的大厦而消灭的仅是那些早已被席卷一切的其文明已宣告灭亡的二等民族。恺撒所做的毁灭行为，仅是执行了由历史发展写成的宣判书，而对文化的萌芽，无论在何处，无论其状况如何，恺撒都给予保护，在自己的国家是如此，对希腊兄弟民族也同样如此。他挽救、更新了罗马民族，不仅保护了希腊民族，而且还以其重建罗马的信心与天才促进了希腊人的复兴，重振了伟人的亚历山大的被中断的大业。人们可以相信，亚历山大在他心中的形象一刻也没有淡漠。对这两大问题，恺撒不仅是同时，而且是通过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在很久以前的萌芽中，人类的两大基本特点：一般与个别的发展，或曰国家与文化，在远离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以其古朴方式放牧的古老的希腊—意大利人中间是统一的，后来随着他们分化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便分割开来，并延续了数千年。现在，这一特洛伊王侯和拉丁公主的子孙又把一个无文化的国家和一个世界主义的文明构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国家与文化在其幸福的年富力强之时重新结合在人类生存的顶峰，充实着符合这一内容的国度。——以上所述便是恺撒对这一大业的构想，他本人是按照这一构想工作的，在他之后数百年，人们仍是按照这一构想并沿着他所确定的轨迹前进的。后来人尽管没有他的智慧与精力，但从整体上看却是按照大师的意图在做努力。完结的并不多，有一些甚至仅具雏形。至于这一计划是否完善，可由敢于与这样一位人物较量的人来决定。我们未能在其中发现重要缺陷，其每一组成部分都足以使一个人不朽，而其总合却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恺撒作为罗马国王，其统治的时间为五年半，还不及亚历山大的一半；七次重大的远征允许他在帝国首都逗留的时间总共不过十五

个月[1]，而在这些短暂的时间里他安排着世界的现在与未来的命运；在处理从确定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边界到清除首都小巷内雨水洼事宜的同时，他还抽出时间、保留足够的雅兴去聚精会神地欣赏剧院的竞赛剧目并以即兴诗作给优胜者予奖赏。这一计划的迅速而有把握的实施证明，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的所有部分也都是经过具体推敲才确立的。仅这一奇迹般的实施就已与计划本身旗鼓相当。这些基础的奠定也就决定了新国家的未来，而完成这一大业只能靠无限的未来。因此恺撒可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人们时而从他口中听到的，他已活够的言辞，可能也就是这种意思。正因这一宏伟建筑是无止境的，所以大师在有生之年不倦地为它添砖加瓦，他以始终如一的韧性与精力创造着他的业绩，从不过急也从不拖延，似乎对他来说只有今天，而没有明天。他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凡人，他建构着，创造着，作为一个建构者、创造者，他数千年之后仍然活在各民族人民的心中，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帝王——恺撒。

① 恺撒在罗马停留的时间是：705 年 4 月和 12 月，两次都只有几天；707 年是从 9 月到 12 月；708 年是 15 个月制年的四个秋季月以及从 709 年 10 月到 710 年 3 月。

特奥多尔·蒙森著

王建、王枘钧　等译

第　三　卷

从苏拉之死至
塔普苏斯之战

第十三版

柏林，魏德曼出版社，1922 年

怀着旧有的热爱与忠诚

献给波恩的奥托·扬

第五部

军事君主制的建立

当他反复地回顾以往，
几乎将头转向后方，
他将如何寻觅表达这一切的词汇？
他想如何把这泉涌的文思连缀？
他想如何始终保持住勇气，
连续不停地书写下去？

——歌　德